

布尔塞维克

第四卷

(第一期至第六期)

書叢會學究研史歷

考史古國中

著編同玄錢

1 9 3 1

布爾塞維克

第四卷
第一期

目錄

社論

中國革命的當前任務與反對李立三路線

澤 民

論文

三中全會的錯誤與共產國際的路線

澤 民

蘇聯十三年建設的成績

洪 易 譯

中國革命往何處去？

沙發洛夫
洪 易 譯

赤色工會在現在階段中的作用與任務

何 明 譯

武裝暴動與左傾冒險主義

洪 易 譯

中國革命戰爭的組織和領導問題

秋 白

社論

中國革命的當前任務與反對李立

三路線

澤 民

現在我們正在一個非常的形勢裏面。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暫時穩定的開始崩潰——世界經濟恐慌——與世界革命運動的高漲，尤其是中國工農羣衆革命鬥爭的高漲與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已使中國革命站在轉變到全國直接革命形勢的過渡階段上，這樣，就使我們的任務更加嚴重而複雜了。

一九三〇年中國革命運動的普遍的高漲已經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五月間罷工的蓬勃的發展，八月間長沙的被佔領，都是這高漲過程中最明顯的標誌。然而另一方面革命高漲的進展顯出各地和各部分革命羣衆間異常不平衡的狀況。農村與城市，中國南部與北方，此工業中心與彼工業中心之間，都是不平衡的。有幾省已經開始了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的建設，而就整個講，都還沒有全國的直接革命形勢。由于

革命高漲之迅速與黨的力量比較的薄弱，使羣衆鬥爭的一大部分成爲純粹自發的運動，而黨的組織的影響則遠落于羣衆鬥爭之後。由此得出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領導日常經濟鬥爭，團結羣衆，組織羣衆，使之由小的局部的鬥爭，轉變到廣大的統一的鬥爭；黨應當用這樣的方式去準備暴動。在另一方面，黨應當明確的認定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去積極準備這一勝利；創造真正的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紅軍，創造真正的以澈底實行土地革命爲基礎的蘇維埃政府——用這種方式去結合蘇維埃區域與反動統治區域的鬥爭，去使蘇維埃區域的革命運動成爲動搖全國反動統治幫助中心工業城市無產階級鬥爭發展與勝利的工具。

當然，要完成這一任務，需要最大的努力與極煩重耐苦的羣衆工作。同時黨在自身的工作方法上，幹部的引進與創造上以及整個的領導上，需要有重大而且迅速的轉變。然而中國黨內無產階級成份的薄弱，領導機關中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成份的佔據最大多數，和過去陳獨秀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殘餘的不會肅清，不但障礙了這一個轉變，並且在革命的重要關頭，使黨的領導走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的路線——李立三同志的政治路線。

什麼是李立三的路線的內容？就階級的根源上來看，這是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冒險拚命的情緒反映到黨的政治領導中來，不願意做艱難困苦的組織羣衆領導羣

衆革命鬥爭的工作，希望在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由于冒險的行動獲得暴動的勝利，完成奪取政權的任務；同時他們又害怕帝國主義和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力量和不信任羣衆的革命力量的情緒，不敢相信沒有全國暴動而一省數省能首先獲得勝利。沒有全世界的直接革命形勢而中國一國的革命能够單獨獲得勝利。因此遂產生了六月十一號政治局（在立三同志的政治領導下）的盲動冒險的，不顧客觀形勢佈置全國暴動的策略。

託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孫中山主義，布朗基主義等等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成爲立三路線的思想上的內容。由于根本不了解第三時期的特點（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中最後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世界資本主義的暫時局部穩定開始崩潰以至于完全消滅）而站到託洛茨基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取消派的觀點上去，認爲第三時期乃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與第一第二時期沒有區別，同時又把總危機看成經濟恐慌，以爲現在世界經濟恐慌既發生，那麼總危機就存在，而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末日已經到了。由於這種機會主義的了解存在，所以李立三同志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階段的問題上也就動搖到了託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上去。他認爲中國目前農村已經應當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因此提議發展蘇維埃農村和集體農莊。照李立三同志的說法，中國革命在目前階段上的勝利已經不僅僅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而已是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所以他提議在革命政權開始建立的時候，就立刻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並不經過中間

階段，這種明顯的託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使他在革命動力的問題上實際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否認工人農民羣衆的革命的力量，因而放棄了組織工人羣衆領導工人羣衆鬥爭的工作，放棄了建立以工農羣衆爲階級基礎的真正的紅軍，建立和鞏固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根據處，放棄了在農村中建立雇農工會（無產階級領導）貧農團的任務，於是同時也放棄了與中農的聯合。由於這種政治路線領導的結果，必然完全脫離羣衆，在整個策略上走到軍事冒險的布朗基主義，專門在軍事上講發展紅軍和『佈置』全國總暴動的策略是從這里發生的。然而這種『左傾』的冒險盲動的表面之下却隱藏着公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實際。李立三同志以前曾公然反對共產國際的指示，主張聯合富農。當他口頭上承認了國際的指示，取消了聯合富農的口號以後，他的全部領導在蘇維埃區域中所造成的實際現象，却是在許多區域內失掉了我們和中農的聯合，和形成了富農的領導，甚至地主，也鑽入了我們的黨和蘇維埃領導機關中來，『沒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號被富農的『沒收地主土地，只分配地主土地』的口號所代替，甚至有的區域，被紅軍佔據了以後，土地革命始終不開始進行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堅強的能够工作的，爲農民羣衆所擁護的蘇維埃政府自然不能建立起來，紅軍也依然不能成爲真正工農的階級軍隊。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任務自然被放棄了。長沙事件充分證明在立三路線領導之下的中央政治局，採取了非常可恥的公開右傾機會主義的

方針，事前不要說任何實際的準備，連這個問題也沒有提出過。以至于使紅軍佔領長沙以後，自動的退出。在工人運動方面，總暴動的「佈置」一方面使黨完全脫離了工人羣衆，另一方面完全恢復了國民黨式的對工人羣衆的命令主義。黨的領導立下了不可能的任務，強要下級黨部執行而不能指示（也根本不會有）具體的實行方法；在瘋狂的小資產階級的盲動冒險的路線之下，他並且不能容許有任何反對甚至懷疑的意見，于是反對立三路線的幹部被撤消職務或開除黨籍，完全消滅了自我批評和民主集中原則，實行陳獨秀時代所造成的黨內家長制領導。由于瘋狂的「佈置」總暴動，佈置了總行動委員會，實際上是取消了黨，青年團，和赤色工會的組織。最後李立三反馬克斯主義反列寧主義的政治路線引導到了必然不免的結果，就是由政治離開共產國際的路線一直走到公然反對共產國際，從李立三同志的口中，公然說出「不必忠實于共產國際的紀律」的話。

這樣看來可知李立三的政治路線實際已形成整個的系統，從思想方法，國際形勢，中國革命的性質，階段，動力，革命的轉變等問題起，以至於整個黨內組織原則，一切日常工作的方法爲止，無不到處形成了牠的反馬克斯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這種路線的形成使中國高漲中的革命運動遭受重大的損失；使赤色工會會員銳減，使黨脫離了羣衆，使黨的幹部遭受嚴重的犧牲，使黨員羣衆在工作上陷於無出路的

狀態。一言以蔽之，是使黨陷在嚴重的危機裏面。

李立三路線問題的嚴重性更因為下面的事實而增加了。就是這不單是立三同志一個人的錯誤，而是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中許多領導同志的錯誤。因為這緣故，所以立三同志在紅旗報上的文章成了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決議。共產國際的監督，把李立三路線在實際政策上最危險的實行（『佈置』總暴動）取消了，三中全會開始在回到國際路線的道路上走進一步。可是由於同樣的原因，使三中全會的路線成爲向李立三路線調和投降的路線。調和投降的路線不能使黨的實際策略有真正的改變。因此在三中全會以後，各地依然繼續以前的李立三的路線，是不必說了，就是中央自身的策略指導也不能開始真正的轉變，而依然繼續立三的路線（比如，準備『廣州暴動紀念運動的』籌備會組織依然回到總行委的組織方式）。直到現在在國際的指導之下，中央政治局才又更進一步發表告同志書指出三中全會路線的錯誤。

我們目前正處在異常嚴重的形勢之下：被世界經濟恐慌和世界革命運動所威脅着的資本帝國主義現在更加積極的準備進攻蘇聯。自從在帝國主義暗中指揮下的『實業黨』破壞五年計劃的反革命陰謀失敗以後，他們在蘇聯的「西歐波蘭邊界」反蘇聯的軍事進攻正在準備着。在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國民黨軍閥政府又在準備第二次的中東路上的進攻。另一方面，在帝國主義直接指揮和親自參加之下。進行大規模的進攻紅軍。這樣

，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進行着反蘇維埃運動。在我們的方面呢，羣衆革命運動也在高漲着。我們需要用革命的進攻去答復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的反蘇維埃運動。我們應當動員所有的力量去反抗進攻蘇聯和反抗進攻紅軍，我們應當到處動員我們的力量去領導工農羣衆鬥爭，因為每一個罷工都是在準備暴動的道路上一個前進的步驟。我們是生活在世界革命史上最負責任的時期！世界資本主義崩潰的過程在用着不可抗的力量引導到歷史上空前劇烈的階級鬥爭中去，決定勝負的最後鬥爭的日子一天天接近了，我們得準備着！在這種嚴重的形勢前面，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黨的領導有正確的路線。

李立三的路線是用左傾的辭句掩蓋他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在以反右傾爲主要任務的黨內兩條戰線的鬥爭中，反對李立三路線仍然是反右傾鬥爭的主要的內容。在目前這樣嚴重的時期，對於立三路線的肅清有絲毫的猶豫，那簡直是罪惡。

但是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却是目前最嚴重的現象。這不單是表現在三中全會的口頭承認了國際路線而實際對立三路線投降的態度中間而已。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當然是黨內一切李立三路線擁護者的強有力的護符。而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告同志書指出了三中全會的這種錯誤，對於反立三路線鬥爭自然給與了不少的便利。但是我們的任務決不是就此完畢了。相反的，反對立三路線與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的鬥爭

，今後必須用了加倍的氣力來進行，因為反立三路線決不是口頭上承認錯誤的問題，也決不僅是文字上解釋立三路線的錯誤的問題，而是在實際工作。如果我們不是一些錯誤理論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如果我們是布爾塞維克黨員，那麼除開理論的『解釋立三路線的錯誤』以外，我們應當嚴重的提出在組織上在實際工作中去克服立三路線的問題。

如果這樣的來立定反立三路線的任務，那麼我們就更加可以明白的看出目前到處有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國際的路線，一條是立三的路線。不論在罷工的策略上，紅軍的發展與蘇維埃的建立上，甚至支部的工作方式上，宣傳煽動隊的組織，開會的議事日程上，在最小最小的日常工作中間，到處都有兩條路線的對立。（舉一個例吧：上海青年團『採用』了蘇聯的方法，也組織了『衝鋒隊』。衝鋒隊又譯名突擊隊，是在工作薄弱處格外加緊工作的一種非常好的工作方式。可是青年團却很是李立三式的應用了這個工作方法，他們派幾個學生去立在廠門口，不論工人準備了去聽他的演講沒有，他就高談闊論的演講起暴動和蘇維埃來，而對於工人的實際生活却一個字也不提。工人們說：『你又來這一套空話嗎？』吐一口唾沫走了。）只有在這一切的實際工作上指出李立三路線的工作方式爲什麼不對，去創造和實行切實的，國際路線的工作方式，李立三路線才能够根本肅清。當然在這樣的實際工作上反立三路線的鬥爭中，理論問題

是更加明瞭和豐富了，理論和實際方才能够結合起來。同時，只有能够這樣去反對立三路線的時候，教育舊的幹部，引進新的幹部和掉換那些不能改化的李立三路線的幹部的工作，才能够澈底的進行。然而這都是非常浩大的工作，也是非常殘酷的鬥爭。不能改化的立三主義們必然用盡力量來抗拒這種轉變。只有在中央堅決的領導之下，這個鬥爭才能够有担保的進行。

在目前我們應當嚴格的提出反對公開或隱藏的擁護立三路線及對立三路線調和的人們形成黨內的小組織的口號。這種小組織是反國際的反黨的，對於這種小組織不鬥爭，這不是布爾塞維克路線，而本身就是擁護立三路線。這種小組織爲要隱藏自己的反黨行爲，爲要繼續反對國際路線就提出『防止組織擁護國際路線的小組織』的口號，對於這種反革命的份子不加以嚴重的鬥爭，實際上是幫助了立三路線的小組織的發展。

最後，我們得嚴重的說明：黨是在危機中間，不澈底肅清立三路線的領導，我們決不能擔負準備武裝暴動，領導全國革命到最後勝利的任務。在中國革命最嚴重的最負責任的時期，我們不需要立三主義者任何的爭辯。爲黨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對於不能改正的機會主義者，不論是勇敢的或者懦弱的，和他們作喋喋的爭辯是于黨的工作沒有用處的。

三中全會的錯誤與國際路線

澤 民

李立三路綫的領導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使中國共產黨陷於嚴重的危機。在事實的打擊和共產國際的嚴重干涉之下，中共中央召集了擴大的全體會議，這就是所謂三中全會。三中全會是回到國際路線上來的一個步驟，但是由於牠對於立三路綫的調和態度，所以仍然不會把黨救出危機。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的領導之下，黨在羣衆中的工作仍然不能得到轉變，而李立三路綫的實際依然繼續。

自從十一月十九日收到了共產國際關於立三路綫的來信以後，中央政治局經過幾次會議，終於發出了「爲反對和肅清立三同志路線的問題」的告同志書，指出了三中全會調和路線的錯誤，向全黨同志解釋立三路綫的錯誤所在。然而三中全會的影響實際已經普及到全國各級黨部去了。並且告同志書本身又仍然陷於調和主義。這在中央九十六號通告上，已經指出來了。爲要澈底肅清立三路綫和對於立三路綫的調和的情緒，中央黨報不得不在指出立三路綫的反馬克斯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性以外，詳細分析三中全會的路綫的錯誤，使全體黨員像一個人似的起來擁護國際路線的實行，消滅立三路綫和對立三路綫的調和態度。

關於李立三路綫的領導怎樣在沒有全國直接革命形勢的時候實行冒險冒動的策略，佈置全國總暴動，使黨幾乎完全脫離羣衆，幹部受到極大犧牲，並且使黨自身和黨在各羣衆團體內的工作方法工作系統受到極大的影響——都照着李立三的方式去佈置去了——關於一切這些，現在不詳細去分析。關於立三路綫所產生的這種策略有怎樣的整個理論系統爲根據，見社論和其他各黨報的文字，也不詳細來說明了。現在只說三中全會決議案的本身。

三中全會決議案一共有政治決議，組織決議，職工運動決議案三項，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政治問題決議案。當李立三同志的錯誤發展到了那樣狂妄的程度以後，當六月十一號政治局的決議中，李立三的路綫成了政治局的路綫。而中央政治局於是走到了反共產國際的路綫以後，爲「接受」國際的路綫而開的三中全會的所有的決議案中，竟不但對於立三路綫和中央政治局的路綫上的錯誤一字不提，不但連李立三同志的名字也影子都沒有，並且在政治決議案中反復的加以肯定，說：「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承認中央政治局的路綫——是正確的，是和共產國際的路綫是一致的」【註一】，「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的決議案，在一般的正確路綫之下……」因此要求全黨來「堅決徹底執行」這「國際和中央一致的路綫」，【註二】於是說「實行糾正政治局過去

策略上的錯誤，決不是變更黨的路線。」〔註三〕等等。在如此等等堅決的肯定之下，三中全會就把國際路線和立三路線混淆起來，而成爲調和主義的路線。這種調和主義的路線實際是肯定立三路線爲正確的路線，是在國際路線前面掩護立三路線，是用卑鄙的虛偽的辭句去取消國際路線，不使中國黨員羣衆認識國際路線。站在兩條路線前面，沒有中間的調和的餘地。路線上抱調和態度，結果必然幫助立三路線的成長和發展。

〔註一〕中央祕書處印發「三中全會文件第六號」〔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第三章第九節「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一致的總的政治路線」；原文第四頁。

〔註二〕同上第十節：「中央全體會議對於過去錯誤估量的糾正」；原文第五頁。

〔註三〕同上第十一節：「反對動搖黨的路線」；原文第五頁。

關於這一點，十二月十三日中央發出的告同志書內已經指出了。『到三中全會雖然一般的『接受了』（此引號是我加的——作者）共產國際的路線，但這還是站在調和主義立場之上去接受並且更沒揭發立三同志的路線——這就混淆了互相對立不能並存的國際路線和立三路線，因此，遂不能澈底執行國際路線，反而對於立三路線加以辨護——所以仍舊是不正確的了。』〔註二〕但是三中全會決議的錯誤他却祇像告同志書中所指出這一點。三中全會並不是在一切其他的地方都接受了國際的路線，而僅僅在路線兩

個字上把立三路綫與國際路綫混淆起來。不是的，三中全會既然否認了立三路綫是反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路綫，同時又在中國革命世界革命的幾個根本問題上離開了國際的路綫，依然站在立三路綫的立場上講話。不過措辭的形式略為巧妙一些，隱蔽一些罷了。告同志書不能詳細揭發三中全會的錯誤，不能具體的提出反立三路綫的戰鬥的任務，是牠成爲調和主義的文件的主要原因。下面逐一舉出這些問題來看一看：

(一)第三時期的了解。立三同志對於第三時期的了解是不正確的。他像國際的右派和托洛茨基派一樣，第三時期看做與資本主義總危機完全同樣定義的東西，而不明了第三時期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中的一個最後的時期：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由劇烈動搖而至於完全破壞的時期。在這種情形之下來寫政治決議案，首先就應當對於這種錯誤觀點給與駁斥。

三中全會沒有這樣做。放着許多別的決議案不抄，牠偏偏抄了聯共第十六次大會的決議案，在那個決議案上是沒有特別指明第三時期的。說是抄了聯共的決議案就不會對麼？當然不是的，在沒有發生立三同志的曲解的聯共，不指明第三時期不爲不對，在發生了立三路綫的中共，抄了不指明第三時期的聯共決議却是有意避開政治爭論問題，是機會主義。

(二)關於中國革命的內外關係的問題。李立三同志的最基本的觀點之一，就是說，中國革命不能首先勝利，因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如果不能得到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幫助……是不能繼續維持的」；但是亦不會最後勝利，因為據立三同志的看法，第三時期的意義等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而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意義又等於世界資本主義立刻要滅亡，而且這總危機的發展是沒有不平衡性的，只要一處爆發革命那麼立刻全世界轉入直接革命形勢——由於這一套「分析」他得出「結論」：「中國革命必然煽起世界革命」，「中國革命必然與世界革命同時勝利。」〔註三〕

三中全會政治決議案第一章第二節「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一題下面說：「同時，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革命，已經是在世界革命的總高漲的情形之下進行，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所以說只有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列強國內革命勝利之後，中國革命方纔能夠勝利，固然是錯的；同樣，看不見中國革命勝利，有促進世界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掀動世界革命的偉大意義，亦是非常之錯誤的。」〔註三〕一個造成立三路綫的基本觀點，一個使中國黨陷於嚴重危機，一個在三中全會和三中全會以前成爲爭論的中心點的問題，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僅僅說了這麼簡單含糊的一句話。對於立三否認中國革命有首先勝利之可能的觀點不加以否認，對於立三認爲中國革命必然與世界革命同時勝利的觀點不加以否認，反而用決議去更加肯定這個觀點，這就是三中全會依然繼續立三路綫的地

方。

【註一】『告同志書』第十二頁

【註二】『紅旗』七十六期

【註三】三中全會政治決議案第二頁

(三)不平衡發展的問題。立三同志否認世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像前面說過，這是他的冒險盲動的策略的『理論』的根據。三中全會既然『接受』國際路線，那麼毫不用說應當對於這種觀念加以最不容情的攻擊，揭破牠的機會主義的性質。可是三中全會決議不論在講國際形勢的一章裏，不論在任何別的地方，對於這問題却死守了沉默。對於這樣一個曾經成爲爭論中心的問題，似乎忽然的『忘記』了或者『忽略』過去了。這樣，三中全會就用沉默保住了立三路線的這一個最重要的根本觀點。

然而不單是在世界革命的方面。在國際七月二十三日的中國問題決議案中已經針對着立三路線，痛下針破，切實的指出中國革命的特點是革命發展的不平衡之後，三中全會開始來『承認』這箇指示。可是牠是怎樣承認的？國際決議案中說：

『中國革命新的高漲的生長過程，有他的特殊形式。新的革命高漲首先成熟起來的地方大部份還是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種下根基的那些區域，隨後才漸漸的推廣到其他的區域裏去。……鬭爭的羣衆不能一開始就佔有工業中心……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

的浪潮還沒有匯合起來……農民的革命鬥爭，現在能夠勝利的，還只不過在南部幾省發展着……」〔註一〕在這里，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不平衡，農民運動本身在各區域中間發展的不平衡，工人運動在各工業區域中間發展的不平衡都指出來了。但是三中全会却把這個最重要的指示曲解了，因而實際的否認了。

三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中說：「現在革命運動的特點，是從工農羣衆部份的革命行動進到總的革命進攻的過度時機」〔註二〕這句從國際東方部的「中國共產黨的最近組織任務」中抄來的一句話，原來是指中國日前時局的，牠去移來裝在講革命高漲的特殊形式上面，於是不平衡作為一種特點被模糊過去了。翻遍全部決議案，講到不平衡現象的，只在這裡有一句，就是「農民運動的發展和力量，也有各地方不平衡的現象，有些地方只在這裡有一句話，就是「農民運動的發展和力量，也有各地方不平衡的現象，有些地方剛在開始農民的游擊鬥爭，有些地方却已經能夠推翻當地的國民黨政權。」〔註二〕雖然說到「現在的事實是：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力量沒有平衡沒有匯合」〔註三〕然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不平衡沒有指出，各區域間的不平衡沒有指出，工人運動自身的不平衡發展也沒有指出。立三路線的最大的錯誤之一，用否認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不平衡來作為「佈置」全國暴動的「理論」的根據，在這裡又被「忘記」了「忽略」了。

〔註一〕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共產國際的「中國問題決議案」第一頁

〔註二〕三中全會政治決議案第三頁

至於不平衡發展的原因何在，立三同志「解釋」「表面上的不平衡」的原因，說是由於城市中的白色恐怖嚴重；秋白同志「解釋」成爲由黨的力量在有些地方薄弱所致。註一——兩個人的意見都是實際的否認不平衡現象的存在。但是三中全會不但不會對這種曲解不平衡問題的「解釋」加以駁斥，反而完全沉默過去，是不是因爲這問題不重要呢？當然不是的，看中央秘書處所發表的關於三中全會的很不完整的材料，就可以知道這在三中全會中亦是一個中心問題，所以這種沉默，亦是保持立三路綫的沉默。

把這三點綜合起來，我們看見三中全會的決議案中在中國革命的這幾個基本問題上所重複的立三路綫的錯誤是怎樣的一種觀點？很明顯的，都是託洛茨基取消派的觀點。因爲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都保留了託洛茨基取消派的觀點，所以在中國革命的許多其他比較局部的問題上自然不能「傳達」正確的國際的路綫。

先看蘇維埃區域的問題。

（一）蘇維埃根據地的建立。國際的路綫：發展貧農中農的土地革命，建立堅強而有工作能力的蘇維埃政府，團結鍛煉出真正的工農紅軍，在一個或幾個蘇維埃區域中有鞏固的物質基礎，這些區域應當就是革命的根據地（註二）。三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把牠簡

單化·成爲『建立鞏固的陣地，就是建立集中統一的真正和工農羣衆密切聯繫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在最有保障的地域——蘇維埃的根據地，創造並且鞏固真正堅強的，政治上軍事上有充分無產階級領導的紅軍，以便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進而佔領一個或者幾個工業政治中心』〔註三〕了。這裏的錯誤：第一、把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問題和建立統一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問題混淆起來，實際是放棄了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任務；第二、蘇維埃根據地看做『陣地』；因此是從一種軍事的觀點去了解根據地問題。這裏牽涉到。

【註一】三中全會材料第十二號秋白同志的結論

【註二】國際決議案

【註三】三中全會政治決議案第七頁

(二)紅軍的問題。國際沒有一次來信，沒有一個決議案不注意到創造真正的工農紅軍。他並不像我們過去的紅旗報一樣，專門吹紅軍的力量有多大，絲毫不注意紅軍的弱點。三中全會呢？對於紅軍問題系統的『忽視』了。牠只在上面所引的一般中帶說到了那麼一句話：『創造並且鞏固真正堅強的，政治上軍事上有充分無產階級領導的紅軍』，這句話是看去很漂亮的，却是錯誤的。第一、這裏應當說我們還沒有真正的工農紅軍可以被鞏固起來。第二、『軍事上政治上有充分無產階級領導』，很容易

被解釋成爲有共產黨員當指揮官的，有權力很高的黨代表的紅軍；這樣的紅軍還並不是真正的工農紅軍。實際的情形是現在蘇維埃區域大部分的紅軍是由國民黨軍隊轉過來的軍隊所編成，有些軍隊甚至連軍長都是原來的，一點沒有變動。這些軍隊的成份，多半雖是農民出身，可是大都脫離生產已久，不能算做真正紅軍。在這種條件之下，而諱言創造真正的工農紅軍，用創造並且鞏固軍事上政治上有堅強無產階級領導的紅軍去代替這個切要的任务，決不是偶然的，而是畏避艱難的任务，怕敢動搖這些紅軍首領對於中央的服從，是國民黨方法的殘餘。

(三)土地問題。國際指出應當沒收地主土地，平分一切土地。「註一」這個路線有深刻的意義：沒收地主的土地是因爲要消滅地主階級，同時平分一切土地必須將富農的一部分土地平分給其他農民，是動搖了富農的土地私有權，但是並不消滅富農這個階級。只有這樣，才能够打擊富農而不損害中農，不超越革命的階段而能徹底保護富農貧農中農的利益。過去在李立三領導之下的中央政治局在文件中只說了要平分沒收來的地主土地；現在三中全會在「國際的指示之下抄國際決議案，却把牠抄成了『堅決徹底的實行土地革命，分配由地』」(註二)這樣模糊不清的決議怎樣可以去指導蘇維埃區域的土地革命？

(四)決議案中沒有提出蘇維埃區域中組織階級工會的自由的問題；把國際所指出的

實行護保勞動的最小限度。變成實行最小限度的勞動保護；毫無限制的承認了在蘇區中實行以自由貿易為原則的經濟政策，等等；都是抄錄共產國際的決議案而抄錯了的

【註三】

現在在蘇維埃區域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黨對於土地問題，經濟政策，沒有明確的答復，對於組織工農紅軍沒有堅決的去執行，對於建立蘇維埃根據地有了不正確的了解，一切工作都把重心放到軍事行動。這些實在都是立之路綫在實際政策上的表現，而三中全會在這些問題上都錯誤了，口頭上承認了國際的路綫，而實際却繼續看立三路綫。

城市工人運動裏的任務。在這一問題上三中全會亦給了不正確的答復。

（一）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 李立三路綫在這個問題只是完全放棄經濟罷工鬥爭的領導，專門去「發動」政治罷工。國際指出了正確的路綫：「黨應當去組織並且領導中國無產階級的經濟戰鬥；盡量去發展政治罷工，定出準備各地的或者幾個主要工業城市的政治的總同盟罷工的方針。」【註四】三中全會都把重心顛倒了過來，說：「城市工人運動的中心問題就是在準備總同盟罷工的方針之下，去加緊組織政治罷工——因此，必須努力加強對於日常部分的經濟政治戰鬥的領導」【註五】這樣，依舊回到立三的路綫上去了，就是口頭上將政治罷工聯繫到經濟罷工，實際都把經濟罷工放在次要的地位。

(二)下層統一戰線的方針 國際作這個指示，意義是說牠們要問工人屬於那一黨派，受那種黃色職工會的領導，應當在各種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中將他們爭取到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來，加入赤色工會。所以「黨要加強自己在有羣衆的黃色工會裏的工作，同時應當盡量去鞏固赤色工會，堅強工人自衛的團體」〔註六〕李立三路線完全否認了「下層統一戰線」，三中全會繼續的不了解或不願了解這個任務，政治決議案中僅僅指出改組派，陳獨秀派，託洛次基派等等的活動，然後說：「要之更加加緊對於這些派別和這些分子的鬥爭，爭取羣衆自發運動的領導，主要的是在政治上解除他們的武裝，這就必須實行『下層羣衆的統一戰線』的策略——就是在一切鬥爭，尤其是在日常部分要求的鬥爭之中，共產黨應當和非共產黨的一般下層羣衆團結起來實行鬥爭，獨立的去領導他們的運動，使這些運動都走到蘇維埃政權的總口號之下來」在這里下層統一戰線被解釋成爲「政治上解除改良主義派別的武裝」的策略而「爭取羣衆」的總路線反被模糊起來了。什麼是「政治上解除改良主義切能的武裝」？那是一個工具，使我們能够奪取羣衆的；爲什麼要解除他們的武裝？爲什麼要爭取羣衆，把「政治上解除改良主義的武裝」來當做目的 而同時不提到組織的任務，這是實際上否認了「下層羣衆統一戰線」的方針。

〔註一〕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的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中央論李立三路線的信

【註二】三中全会政治決議案第五頁

【註三】同上

【註四】七月國際「中國問題決議案」第三頁，第十七節

【註五】三中全会政治決議案第六頁，第十五節

【註六】七月國際「中國問題決議案」第三頁，第十三節

(三) 這種錯誤觀點是和對於黃色工會的錯誤策略緊密聯系的。國際的決議案中提到統一戰線就提到到有羣衆的黃色工會裏的工作。因爲不到黃色工會裏去工作，統一戰綫是一句空話。黨在立三同志的領導下，從來不注意黃色工會的工作，而三中全会決議全文系統的忽略黃色工會的工作，在上面所引述的「下層統一戰綫」一條中更完全擱下了黃色工會的問題。把爭取黃色工會羣衆的問題簡單化到僅僅成爲暴露黃色領袖的問題。這顯然是依舊脫不了立三的影響，不曾明瞭國際的路綫。

三中全会對於反動區域的農民運動的決定也是不正確的。所有的二中全会的決議案中，沒有一個討論到這個問題。在偶然牽涉到的地方，依舊是組織地方暴動，或者最起碼一開始就做游擊戰爭，而領導農民做日常鬥爭完全被漠視了。其結果使各省做農民運動的同志依舊做盲動的行動。中央在三中全会以後解決河南省同志們的領導問題，依然不正確。對於主張「佈置暴動」的同志不能切實批評，而對於有正確主義，

反對佈置暴動的同志依然加以處罰，這里很明顯的亦還是立三路線的繼續。

三中全會在這些主要的羣衆運動的策略路線上依然不能對立三路線加任何打擊，依然在比較隱藏的形式下面去保持立三路線，自然就造成目前黨在一切羣衆運動中得不到真正轉變，而（甚至在上海）立三路線依然是在工人運動的實際工作中統治着的現象。

羣衆工作既然是放在不正確的基礎上，黨自身內部各方面自然依舊會保持立三路線之下的一切現象。最嚴重的就是。

（一）三中全會決議案中沒有一個字提到家長制的領導。立三的路線在許多地方是以陳獨秀主義做根源的，陳獨秀所遺留給中國共產黨的一部遺產——黨內家長制領導，在立三路線之下更充分的發揚起來，中央政治局遂有提出反對意見時，黨立即加以嚴重的處罰。當中央政治局在八月間實行全國總暴動的「策略」時，陳紹禹等四個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因堅決鬥爭的緣故，受到嚴重的處罰，由此造成極嚴重的現象，黨員羣衆明知立三路線下的種種「策略」「行不通」但是不敢說話。黨的文件被領導者稱爲「聖旨」，只可以建議，而不可以不同意的。黨員所受工作的掉換，不依照黨員的能力與工作上需要，但憑上級的喜怒。工作的進行不經過正常的組織上的手續，但聽監督者的隨時指揮，下級的決議和提議上級隨便擱置，或不加以答復，而上級的決議或指示

不許有任何討論。對於這樣嚴重的現象，三中全會一字不提。這就使

(二)自我批評的破壞。在黨內家長制領導發展着的地方，自我批評當然不存在了。的確，三中全會對於立三路綫的調和態度，便是二中全會沒有實行自我批評的明徵。然而在三中全會各種決議中却都一致的說三中全會已經實行了自我批評。意思當然是說中央第一次在自己的決議案上承認了一些錯誤。於是只要是被迫承認錯誤，就成爲自我批評了。這種了解完全是家長式的了解。〔註一〕由於這樣的曲解自我批評，「自我批評」這個名詞自然不再成爲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的主要工具，不再成爲黨的正確路綫的保障，而恰恰相反，成了維持黨的不正確路綫——立三路綫——和黨內一切惡劣現狀的主要工具。「自我批評」這個名詞被用做消滅自我批評之實質的工具。三中全會決議案中說「從中央一直到支部，都要站在國際和黨的路綫上審察批評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的錯誤和缺點……別方面要防止調和主義精神的非布爾塞惟克的『自由批評』離開黨的路綫甚至攻擊黨的路綫的批評」〔註二〕對李立三路綫調和的三中全會却要用「自我批評」的名義去限制自我批評，不許對於她自己的錯誤路綫說話，一說話就是「自由批評」甚至是調和主義！一切都顛倒了！這就是李立三路綫破壞黨內自我批評的實際狀況。

〔註一〕中央直支幹事會所發的文件中有這樣的字樣：「自我批評」相互批評」意思就是說：自

已專說自己的錯處就是自我批評，若說到別人的錯處，就是「相互」而不是「自我」批評了。這種奇怪思想與上述家長本式的了解自我批評是一貫的。只知有個人，不知有黨，以致不知自我二字是指「黨」而言的。這真是標本式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思想。

〔註二〕三中全会政治決議案第八頁

在這種情形之下，黨在兩條戰線上鬥爭的任務自然不能執行，而反左右傾及調和派的問題亦恰如自我批評一樣弄得完全顛倒過來。黨內鬥爭再不成爲使黨布爾塞維克化的鬥爭，而恰恰相反，成了李立三路線的統治用盡全力與搜羅出黨內一點點存留下來
的布爾塞維克種子，去將她們消滅淨盡的鬥爭。試看三中全会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因爲三中全会自身向着用左傾的辭句掩蓋着右傾的消極的立三路線調和的緣故，因爲三中全会自身在許多重要的根本的問題上是站在立三路線上的緣故，所以這種「解決」是不可能的。前面所指出的三中全会許多用左傾辭句掩蓋着的系統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消極的錯誤，在左傾的帽子一旦揭開以後，怎樣成爲系統的右傾的路線，在三中全會的決議案中自然不能被揭發出來了，於是被指爲「整個右傾線」而揭發着的却是取消派的路線而不是右傾的路線。政治決議案中說：「這種右傾路線是（一）說一國際無產階級幫助中國革命是空話，而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砲是實在的力量」，所以革命戰爭的勝

利是沒有希望的；（二）說城市工人沒有革命鬥爭，沒有同盟罷工的可能，只能實行日常的經濟的小鬥爭；（三）說農民的鬥爭，因為沒有工人革命鬥爭起來，所以不能成為什麼大的力量，說農民戰爭是「部落式的暴動」；（四）藉口發展不平衡，否認世界的總危機和一般的革命高潮（否認「第二時期」），否認中國全國的政治經濟總危機，和總的革命高潮；（五）因此認為不應當有組織革命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總路線」〔註〕——像這類的觀點難道不是陳獨秀派託洛茨基派的觀點麼，這些觀點已公開的否認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前途，成為綱領上不同意的問題，是黨外的取消派了，為什麼三中全會還認牠們是「右傾」的觀點呢？共產國際和聯共認為右傾比這類取消派觀點要不同的多。不必說工人沒有力量，農民部落式暴動，只要像三中全會自身的決議案中對於革命根據地問題露着不相信農民羣衆的力量，希望由軍事取得勝利的傾向；不必公然否認第三時期，和「世界的總危機」，「中國的總危機」，只要像三中全會一樣把第三時期與總危機混淆起來，否認中國革命首先勝利的可能，和希望中國和世界革命同時勝利，已經是有十足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了。把取消派的觀點當作右傾打，自然火力就打不到右傾，而右傾成爲「黨的路線」，自然誰要是依照了國際路線來批評領導的錯誤時，他就成了「動搖黨的路線」；同時三中全會這種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實質是用立三式的左傾辭句掩蓋起來的，那自然凡有批評三中全會的路線的都成了「右傾機會主義」或「調和主

義」的路綫了。這樣所以三中全會雖然口頭上同意國際實行上却不同意國際路綫並且對擁護國際路綫的同志加以無情的打擊。

註一 三中全會政治決議案第九頁。

這樣實行兩條戰綫上的鬥爭，當然非常危險，如果不及早糾正，其結果非弄到第二個八七會議不止。這樣的「同意」國際路綫，自然不會長久，如果不及早糾正，其結果非再像三中全會的前夜一樣公開反對國際領導不止。

實在的三中全會幾乎在所有的重大問題上都對於國際路綫加上保留二字，既有這樣的實際，就決不能在口頭上完全同意國際路綫。因此，口領上的「同意」國際路綫，在三中全會決議中並沒有寫得那麼明白，三中全會前夜不同意國際路綫的立場，在決議案中用了比較隱藏的情形保留着。試看政治決議案第三章中關於這問題的立題方式吧：

題目先不妥當了：叫做「共產國際對於中國現時革命情形的正確估量」表面看，似乎是有沒有毛病的吧？是的。但是這種措辭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國際的估量全是正確的，（二）是國際的估量之中有正確的部分。三中全會究竟是採取的那一種解釋，全看牠下文的措辭。下文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政治秘書處，一九三〇年七月對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估量中國革命運動說：中國「革命的爆發一天天的接近」『最近期間

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包括到整個中國，至少也要包括到幾個主要省份的地域」不過是「暫時我們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武裝暴動的情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滙合。總合起來，這些運動還沒有保證必需的力量，去襲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然而「中國革命運動的新的浪潮已成爲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委的這種指示」〔註〕不說對於國際的指示全部同意，而祇將指示中幾句話摘下來，說對於這種指示完全同意。這樣的方式去承認國際的指示，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大會以來到現在不會有過的，是共產國際下面一切兄弟黨的歷史中所不會有過的，這是有條件的承認，外交式的承認，是實際上的否認。何以不說，共產國際指示我們過去的路線完全錯誤，何以不說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全部正確，尤其是某某幾點上我們過去路線完全錯誤，應當用全力去糾正，在這裡指出自己所有的嚴重錯誤來？何以不用這種誠實的布爾塞維克的态度去承認國際的路線而用那種外交態度？因爲路線上是不同意的，因爲要避免直接與國際衝突而暗中保持立三路線。然而猶不止此

〔註〕三中全會政治決議案第四頁

在同一決議案的末了附帶的着「一個『註』，這個『註』中大意說過去把『高潮』二字習慣了用作『直接革命形勢』而『高潮』與『高漲』極易混淆，所以此後高潮二字應當

廢除。而代以「直接革命形勢」這個名詞。註中雖這樣說，可是六次大會決議案中却依舊寫着高潮二字，於是如果把直接革命形勢數字到處代進去，那麼三中全會所承認的國際指示中「中國革命運動的新高潮」等辭句都變成「中國革命運動的新直接革命形勢」了麼？這倒底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混淆國際的指示？這是一。此外，註之中又說「直接革命形勢」一字，此次國際決議案上稱之謂「客觀革命形勢」且爲之解釋說以後應常用列甯的名詞「客觀革命形勢」而「馬魯依可斯基同志最近的解釋：『直接革命形勢』是以前齊諾維也夫所用的，也有不妥當地方。」「註」豈不是奇怪麼？列甯全集上用「直接革命形勢」的地方不知有幾千百處，而三中全會忽然說這是齊諾維也夫所用的不妥當的名詞。這豈不是明欺黨員羣衆不懂俄文，和看不到國際決議的原文？但是爲什麼要這樣做？如果作爲立三路線者對國際路線的頑強抗拒來解釋，是客觀上最確切的，因爲「直接革命形勢」原是全客觀主觀條件在一起來講的。有列甯的最明瞭的定義。而客觀革命形勢却可以拿隨便一個客觀事實，如軍閥戰爭，國民黨政府的鬥爭，或經濟恐慌等來說明「客觀革命形勢」已經具備，又可以「佈置全國總暴動」了。這個名詞實在是橡皮性的，隨時可以把立三路線的內容貫注進去。我們不能說「主觀上」究竟這一句是甚麼意思（也許會用技術上的錯誤等等「原因」來解釋吧），然而「客觀上」，在盡查了三中全會的決議全部路線以後，却確定的能夠說這一件「小事」暴露

着一種立三路線者的政治上的陰謀，反抗國際的路綫。

【註】三中全會政治決議案第十頁

在共產國際的嚴厲的監督；和全黨布爾塞維克黨員的一致的反抗之下，現在我們對於立三路線作堅決澈底的鬥爭。現在揭露三中全會的一切錯誤，並不是削弱黨，却是相反的是來加強黨的力量。祇有在自我批評的砲火之下將一切錯誤的機會主義的實質，牠們對於革命的害處完全揭露出來，同時指出正確的國際路綫之後，全黨的領導羣衆鬥爭的工作才能够真正的發展。現在黨正在危機中。由於李立三路線繼續在實際工作中統治着的緣故，全國黨和赤色職工會的組織已經受到可怕的削弱了。上海的黨員一千多人，其中大半是學生，湖北武漢三鎮的黨員只有七十多人，天津只有二十多人，餘類推，全國黨員除蘇維埃區域以外，只有五千人左右。赤色職工會的組織日趨衰弱，最好的上海組織。在三個月內會員數從三千多人降到七百多人。這種極嚴重的現象斷不是用客觀原因所能解釋的，原因是由於黨的領導路綫錯誤。現在中國的經濟危機日益緊迫，反動統治的危機亦跟着日益發展；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崩潰的過程中間，中國的客觀環境使革命高潮日益前進。因此敵人作最後的拚死鬥爭來向我們進攻。武裝進攻蘇聯的積極準備，蔣介石親自督師進攻紅軍和蘇維埃區域，非蘇維埃區域內敵人偵探警察和取消派工賊等的積極活動，都一方面證明敵人殆用拚死進攻去消滅牠自身的危

機另一方面證明敵人最後死亡期後迫近，我們的決定勝負的鬥爭快要到來。我們是在歷史上最負責任的時期！我們要團結一切力量來做羣衆工作，完成我們的領導任務。只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要用全力來反對立三路線，執行正確的國際路線。

三中全會的決議應當廢去，在國際直接領導下的正確決議案應當產生。一切實際工作上的立三路線和對立三路的調綫和態度必須糾正。我們這樣做，並不是要丟開了服前了迫切的實際工作來清談反立三路線，相反的，只有在實際工作中和立三路線鬥爭，消滅立三路線的工作方式提出國際路線的工作方式來執行，並且只有在實際工作中才能夠撤去不可改正的立三路線的幹部，換上能夠了解和執行國際路線的幹部。我們也不要在反立三路線鬥爭中消滅黨的紀律，各人自由行動，相反的，國際路線對每個黨員的要求是嚴格的遵守黨的紀律，只有立三路線才蔑視布爾塞維克的黨的紀律——用家長制的領導去代替他。只有發揚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黨的紀律，對於離開路線的立三主義者加以嚴格的制裁，對於立三主義者們最初的小組行動的企圖加以嚴格的制裁，才能夠保持中國共黨的一致，使牠日益強固起來。現在為路線而鬥爭的工作方才開始，我們的任務還是重得很；我們要採取過去對陳獨秀取消變黨內鬥爭不徹底的教訓，在這一次鬥爭一步不放鬆的做去，把中國共產黨造成真真正正布爾塞維克的政黨，完成中國革命的勝利！

蘇聯十三年建設的成績

洪易譯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勞動農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衆均一致的慶祝自己唯一的社會主義的祖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第十三週年紀念。

十三年來蘇聯的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爲社會主義的建設會舉行了不斷的鬥爭，不顧國內外一切反革命勢力的阻撓，蘇聯的勞動群衆在聯邦共產黨與蘇維埃政權的領導之下總是一天一天的走向社會主義。蘇聯存在的每一年都要給社會主義的建設以許多新的勝利。蘇聯的無產階級在世界大戰與國內戰爭的大破壞後，從經濟恢復時期直到現在，存在了十三年已經成爲強固的工業的無產階級國家了。

勞動的農民群衆在一九一七年與無產階級共同奮鬥，推翻封建地主資本家，沙皇的政權，并沒收一切貴族地主的土地，十三年來，現在已經逐漸由鐮刀鋤頭轉用耕種機，從個人的土地經營走向社會的集體的農村經濟的耕種形式了。私人的大商業一天一天的縮小，代之而起的便是社會化的合作的和國家的貿易。

十三年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最偉大的成功還要算五年計劃，這是使蘇聯工業化的計劃，過去兩年對五年計劃的實行，已完全證明了蘇聯的工人階級與農民聯合在聯邦共產

黨與蘇維埃政權的領導之下，不顧一切的困難，不顧國外四周資本主義的進攻，國內一切階級敵人的反抗，現在仍已經獲得了很大的勝利，所有這些都是在聯邦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由廣大群眾自己的蘇維埃政權機關來實現的，在其領導下有計劃的集中了一切群眾的熱情，力量，以走向勝利，這種集中，這種有計劃的統一的領導全蘇聯的政治經濟生活，這乃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在過去十年來既未造成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將來也不會讓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在資本主義的世界在壟斷的時期內已經發生了極嚴重的經濟恐慌，而蘇聯的無產階級與勞動農民却在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五年計劃，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恐慌日益加劇，工廠相繼關門，生產縮小，工資降低，失業工人增加，在蘇聯則看見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興旺，勝利，發展。

關於這一點，在今年七月舉行的聯邦共產黨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曾有詳細的說明。下表是說明蘇聯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各重要工業的生產部門發展的情形。

	蘇聯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一九二七	八八，四	九五，五	一〇五，五	一〇〇，一	八六，一
一九二八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二九	一二三，五	一〇六，三	一〇七，九	一〇一，八	一〇九，四
一九三〇	一五五，五	九五，五	一〇七，四	九三，四	一一三，一

(第一季)

在這個表裏面，我們看得很清楚的，在資本主義的美國與德國，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均減少了百分之十五的生產，在英國，幾年來都是在一條水平線上無多大變動，只有資本主義的法國，因為從德國勞苦群眾的身上榨取了大批的賠款，所以他的生產略有一點增加。

在蘇聯怎樣呢？在蘇聯我們看到的，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發展，生產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只有軍事工業，槍炮，軍用飛機，潛水艇等等的生產是不減少的。在蘇聯我們所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種情形，蘇聯雖為資本主義國家敵人所圍繞，時刻準備軍事進攻，使蘇聯不能放棄自己的武裝以抵抗這個進攻，但蘇聯主要的還是注意於工業的發展，使蘇聯從農民的國家逐漸變為工業的國家，因此，在大戰前沙皇時代，全國工業品的生產只佔生產品總量的百分之四十二，一，農村經濟的生產則佔總量的百分之五十七，九，現在呢，工業與農業生產的比例，約有如下的情形：

	一九二七——二八	一九二八——二九	一九二九——三〇
工業	四五，二%	四八，七%	五三，%
農業	五四，八%	五一，三%	四七，%

因為蘇聯生產工具的生產之發展和原料來源之擴大，使着我們在一個短時期內要加

緊發展輕工業，以消滅商品缺乏的恐慌，這種恐慌是由廣大勞働群衆的需要增加而引起的。

一般生產品（大的，小的）總量的價值，現在與戰前比較，其情形如下：

一九二六——二七年	一九二七——二八	一九二八——二九	一九二九——三〇
一〇二%	一二二%	一四二，五%	一八〇%

資本主義國家內生產的縮小，首先就要反映到無產階級身上來，縮小生產，關閉工廠，資本家將數百萬工人都拋擲到街道上去，減少工資，增加工作時間，目前在美國約有六百萬失業工人，德國將近五百萬，英國約二百萬，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失業工人不是嚴重的問題。

是但在蘇聯怎樣呢？蘇聯無產階級的數量只是一年一年的增長。在現在約有如下的數目。

一九二六——二七年	一九二七——二八	一九二八——二九	一九二九——三〇年
工人 二〇,九〇,〇〇〇	二一,四五,〇〇〇	二一,九〇,〇〇〇	二二,二九,〇〇〇

蘇聯的失業工人，因為工業的發展，七小時工作和五天一週制的實行，很快的就可以消滅。蘇聯每年人口的增加雖然非常迅速，（二百萬以上）但失業工人目前并不過一百萬人，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智力勞働者，這些人過去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因為革命的

勝利使他們沒有剝削他人勞動的可能，因此到現在也就不能不到勞動交易所去登記了。

工業中，熟練工人的失業，不但沒有，而且相反的，感覺非常之不夠，如勞動交易所現在只能供給百分之二十的熟練工人而這些熟練工人也是從不熟練的工人中在很短的期間內教育訓練出來的。

與蘇聯無產階級數量的增加，同時並行的，無產階級的物質生活與教育狀況也是一年一年的改善。工人的工資與戰前比較現在已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七，社會保險的預算在大戰前是沒有的，在一九二七——二八年為九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值美金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則增加到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了。

工人住房的建築費在一九二九——三〇年為一，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住過療養院與醫院的工人在十二年為一，七〇〇，〇〇〇人。蘇聯沒有一個工人每天工作超過八小時，一千三百萬工人，有百分之三十三，五是做七小時工作的，凡在比較危險的工業部門（如化學工業之數）工作的，每天只六小時，有百分之六十三，四的工人是已實行五天一週制。女工工資與男工完全平等，并有特別保護。在危險有害的工業部門中是沒有女工勞動的，女工與青工均不作夜工，對於母親和小孩的保護（如津貼，醫藥的幫助，幼稚園的建立，母親的住房等等）在一九二九——三〇年的實用為四九四，

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對於入學前的勞働兒童的教育費在今年爲二〇四百萬盧布，對於青年工人及未成年人的教育則有工廠學校，每一個大工廠裏面均已建立，青年工人均可免費入學，工廠內禁止無代價的使用學徒，他們每天只做四小時工作，有學校，俱樂部以及其他各種組織等等。

在蘇聯的農村中，革命後的十三年亦有極大的變化，并改善了貧農與殷實中農的生活狀況，十月革命使農民從封建主張地主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可是，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吸血鬼，雖然範圍較小但仍常常從農民那裏榨取血汗，這便是富裕的富農。貧農與中農在十月革命時已取得了土地，但是他們常常缺乏牛馬與耕種器具，因此他們不得不向富農請求援助，富農便利用這點，短期借牛馬給貧農中農以敲榨他們，富農并且常常強迫他們將土地租給富農，替富農充爲僱工，這樣一來，貧農使要在經濟上依賴富農了。蘇維埃政府經常的與富農鬥爭，強迫他付更多的租，稅，而幫助中農貧農，完全不要他們納稅，或者只納很少的一點稅。同時蘇維埃政府復幫助中農貧農組織合作社，共同購買牛馬，器具，種子等等，這種共同購買種子的形式，足以幫助貧農增加收成，而逐漸使貧農中農相信集體勞働較個人勞動爲優，從這種形式逐漸使中農貧農轉向到新的更高的集體勞働的形式去，這種集體的耕種土地，集體的進行收穫，現在已經使中農貧農進而至組織集體農場——即社會主義的土地耕種與土地使用形式了。聯

邦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完全根據廣大農民的願望而竭力予以幫助，在最近三年來，蘇維埃政府會用了四十萬萬以上的盧布，借貸給農民及其各種組織。蘇維埃政府從國庫裏面拿出了一五四百萬蒲特的種子來播種，中農與貧農從蘇維埃政府方面得到這樣大的幫助使他一天一天的從個人主義的土地耕種走向集體的耕種了。集體農場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的耕種面積為四三〇，〇〇〇格克達爾，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則為八六〇，〇〇〇格克達爾，在一九三〇——三一年則為二百萬格克達爾了，這些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一樣，增加了土地的收成，改良了勞動農民的生活狀況，使他們有可能大批的採用蒸汽的耕種機，以代替鐮刀鋤頭，今年在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中有三萬架耕種機工作，有四十萬馬力，此外在每一個農村的附近都設有國家機器勞動站，在耕耘土地與收穫的時候，供給農民以機器。所有這些設施大大的提高了農村中的收成。

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出產了四百九十萬柴第業爾的麵包，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則為二千九百一十萬柴第業爾。蘇維埃政府因廣大農民都走向集體化，從蘇維埃農場與集體農場中取得大量的麵包，使他能澈底的肅清富農。在不久以前對於富農還是採取種種方法以限制他對於中農貧農的剝削，在現在則要澈底肅清富農這個階級，肅清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最後堡壘，因為他是障礙農村經濟的新形式之實現的。富農的財產均分給農民，他的器具則移交於集體農場，貧農與中農，假使我

們以爲一切農民都已加入集體農場，這是不對的，現在還有許多中農貧農仍是單獨的耕種他自己的土地，蘇維埃政府與集體農場的農民均不用絲毫強迫力量來強制他們加入集體農場，這些農民還依然可以從蘇維埃政府與集體農場方面得到很多物質的與組織上的幫助，聯邦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只使用各種方法使農民相信集體農場較個人主義的農村經濟是更優良，使他們都自願的加入集體農場。

城市社會主義工業與鄉村集體農場蘇維埃農場的發展可將一切私有財產者城市與農村的資本家，商人等完全排擠淨盡。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私人資本主義的工業只有百分之二，三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則降至百分之一，四在一九二八——二九則爲百分之〇，九。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則只有百分之〇，七了。在大商業中，私人商業只有百分之一，小的零賣的則爲百分之十一。

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增加了國民經濟的收入。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每年平均約增加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八。在蘇聯，國民收入的增加爲百分之十五，這究竟是對誰有利呢？換句話說，這些收入究竟是跑到誰的荷包裏去呢？在資本主義的美國，百分之一的資本家掌有所有人民財產的百分之五十九，在英國不到百分之二的私有財產者掌有全國民經濟的百分之六十四。在蘇聯呢？在一九二九——三〇年，蘇聯的國民經濟只有百分之二是在資本家手中其余的都歸勞動者所有，蘇聯國民收入的增加，使着蘇聯

政府的預算也能一年一年的增加，一九二九——三〇年蘇聯的國家預算較一九二六——二七年增加了兩倍，蘇聯政府對於這個預算的分配是盡量的設法以幫助勞働者，改善他們的生活，設立保護健康的機關等等，蘇聯勞働者的生活狀況較之戰前，實在好得多了，只要舉一個死亡率例子便可作為明證，在戰前，俄國的死亡率若為一〇〇，在現在則只為百分之三十六了，兒童的死亡也大為減少，在戰前若為百分之一百，在現在則只有百分之四十二了。

蘇聯工業，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等等的猛烈發展，同時復引起了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極大憤恨。他們雖在紙上寫了許多的和平條約，但各資本主義國家準備武裝進攻蘇聯的陰謀却仍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各國的資本家現在都是公開的反對蘇聯。去年中東路問題的爆發，不是別的這只是進攻蘇聯的第一步，蘇聯的紅軍，工人農民，在實際上已經證明了他們能够保護自己的蘇維埃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內革命的工人，首先是中國的工人與農民都能站在擁護蘇聯方面來，蘇聯雖然已經戰勝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但帝國主義者並沒有放棄武器，他們現在已採用新的形式以反對蘇聯，羅馬教皇并向全「文明」世界宣言，主張用銜血來消滅布爾什維主義的火燄。各資本主義國家抵制蘇聯貨物的輸出，所有這些步驟均不外為武裝進攻蘇聯準備相當的精神基礎，舊俄的軍官，地主資本家在一九一七年從蘇聯趕出去了，現在已得着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各方面的幫

助，他們重新有了軍事的組織，金錢的津貼，在資本主義的軍隊內服務，這些白俄僑民回到蘇聯來，爲的是組織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在工人農民中破壞蘇維埃的威信，他們并且常常給國家以大的危害，焚燬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田地上的稻麥，在蘇聯國內一部份資產階級的幫助之下，并常常組織破壞蘇維埃機器的行動，有時并毀壞整個的工廠，焚燬商品，白俄僑民的陰謀與資本主義武裝進攻的準備，都得到了蘇聯國內一般富農之或明或暗的幫助，富農出來反對集體農場化，以爲有資本主義世界的幫助，於是便有組織的怠工，不願意按照蘇維埃政府所規定的價格出賣他的麵包，富農反對貧農中農并祕密的將他們暗殺，在這種基礎上，目前蘇聯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實帶有非常尖銳的性質，蘇維埃政府現在不僅要使用許多經濟方法來反對富農，而且現在還須強迫的奪取他們剩餘的麵包，蘇聯的工人，貧農，中農與聯邦共產黨均一致幫助蘇維埃政府進行反對富農的鬭爭；但黨裏面却有少數領袖如布哈林，李科夫，托穆斯基却要曲解這個鬭爭，他們提議蘇維埃政府與聯邦共產黨要向富農實行部份的讓步，實際上他們這種主張都是反對貧農和中農的利益的。這三位同志完全和康米聶夫，季諾維埃夫，及反革命的托洛次基等人一樣，不相信黨與無產階級及勞働農民羣衆的力量，他們提議階級合作的政策來代表農村中的階級鬭爭，整個的黨與工人階級均以中央委員會與斯達林同志爲首領，堅決的反對此種機會主義的企圖，以實際生活的理論使他們的同道者相信他們主張的

不正確，并強迫他們放棄這些錯誤。

×

×

×

蘇聯的十三週年紀念又恰好與『中華共和國』十九週年同時。關於半殖地的中國工業，農業，工人勞動條件等，發展的狀況雖無精確的統計，但我們根據那些不充分的材料，還可十分相信的說，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已經在中國發生極有力的反映了。

帝國主義者爲爭霸中國而彼此鬭爭經過他的代理人——軍閥，在中國舉行不斷的戰爭，經濟的恐慌與不斷的戰爭完全停止了中國一切經濟的發展，大多數的工廠關門了，成千百的工人拋棄到街道上來，農村中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數百萬的農民與其家屬均死於饑饉，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的經濟壓迫和政治壓迫已經使着中國的工人和農民要與他的壓迫者進行不斷的爭鬭。工人的罷工雖然常常大部份是自發的無組織性的，但他們現在已一天一天的帶着戰爭的性質了。農民已由抗捐抗稅反國民黨壓迫的鬭爭走向與壓迫者舉行武裝的衝突，中國共產黨雖在極殘酷的白色恐怖條件之下，表失了許許多多的戰士，但他現在已一天一天，與羣衆更接近而成爲真正的領導者了，農民羣衆因爲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曾與豪紳地主軍閥舉行過長期的鬭爭，他們現在已經在中國南部，中部數省內組織了自己的蘇維埃政權，農民羣衆所選擇的道路，是使中國勞働羣衆從軍閥地主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之最正確的道路，這個蘇維埃的道路可保證中國的徹底解

放。保證土地革命的澈底實行，用蘇維埃的政權形式建立工農的民主專政。

洪易譯

中國革命往何處去

沙法洛夫（洪易譯）

托洛次基在他的『不斷革命』書中，又把中國革命和列甯主義對立起來了。托洛次基雖竭力回憶他過去有一個短時期怎樣參加布爾什維克的工作，可是他現在已經完全走到社會民主黨的泥坑中去了。

他在『不斷革命』書中，說：

「經濟的與政治的不平衡的過程之調和，只有在世界範圍中才能達到。局部的，這就是說：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不能夠視爲只是中國經濟與中國政治範圍中的問題，在這裡，我們就要談到兩個彼此完全不同的觀點：國際革命（Ⅲ）之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民族改良主義的（Ⅲ）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不僅是落後的中國，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在他自己的民族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已經超越了民族的界限，這對於不十分發展的民族也是一樣。例如英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在性質上便要和其他困難與矛盾相抵觸，而且他的困難也許不會比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更少，要克服這兩種情形之下的矛盾，只有國際革命的道路。這樣的提出問題，才能將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是否『成熟』或『不成熟』的問題取消。無疑義的，這裡只剩有一點：中國的落後，使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非常困難進行。這是否說，每一個甚至落後的殖民地

的國家，對於無產階級專政都已經成熟了呢？假使對社會主義尚未成熟的話。不是的，這決不是這種意思，如果如此，那還有什麼一般的德謨克拉西革命，特別是殖民地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呢？我用問題答覆問題說：每一個殖民地國家都已成熟可以立刻解決和完全解決他自己的民族德謨克拉西的任務，這些話要寫在什麼地方呢？問題應該從另一端來着想。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環境下，民族德謨克拉西革命要想獲得澈底的勝利，只有在該國的社會關係政治關係都已成熟，能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成爲人民羣衆的領導者的時候，才有可能。如果這些條件都還沒有，那麼民族解放的鬪爭，便一定要得着半途而廢的結果，完全反對勞動羣衆。」

（以上見托氏著『不斷革命論』一九三〇年柏林出版，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種社會民主黨的漂亮說法，我們實在不願意多廢布爾什維克的筆墨，因爲在這里托洛次基已經澈底的取消了殖民地的革命。假使他現在還能迷惑很小的一部份工人時，麥克唐納爾老爺，以及其他干涉中國革命的組織者，當然是非常誇獎他的。當托洛次基問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計算他自己的功績，并安慰他們說：殖民地的民族解放的鬪爭尚未成熟的時候，這些資產階級的老爺和社會法西斯蒂的先生們怎麼不會歡喜呢？當托洛次基先生向麥克唐納爾說，現在印度能够勝利的只有圓桌會議，而完全不是革命，當托洛次基先生虛偽的證明說：目前中國能够勝利的只有武裝干涉，農民革命是絕對

的沒有權利能夠存在的！ 麥克唐納爾這些老爺們怎麼不會向托洛次基先生鼓掌呢？托洛次基正是這樣肯定這樣說的，托洛次基說：

「中國地主的等級幾乎沒有，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的聯系比沙皇俄國還要密切，因此中國土地問題的比重較之沙皇俄國時代還要少得多。」（見「不斷革命論」三〇頁）

托洛次基始則在「理論上」反對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繼則取消富農是一個「異己的冒險主義的」階級，托洛次基實在不難再進一步的宣佈殖民地的革命在一個國家內是沒有勝利的可能了。斯達林同志老早就說過，托洛次基的確已經回到他的老父亞克雪洛德那里去了。他一天一天與布爾什維主義隔離，與社會民主黨的舊理論完全接洽在一起了。社會民主黨說：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有在全世界各國都同時爆發，才有容易勝利的可能。

這些話，本來是用不着多說的，因為他已與「左」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絕對一樣，假使托洛次基主義派在中國不企圖與黨的路綫爭辯，不企圖以不斷革命論，和工農民主專政相對立的話，托洛次基主義對殖民地農民革命的取消態度，必然要變成左的社會法西斯主義武裝干涉反對殖民地世界的一個不斷派。中國革命的勝利只有在他用廣大羣衆英勇鬪爭的精神澈底的肅清一切封建殘餘與帝國主義的農奴制度的時候。在他面前必須打破國際帝國主義流血的陰謀，對於這一點，中國的工農羣衆必須使用絕大的力量。

還是在一九〇八年的時候，列寧就指出過，帝國主義在殖民地之非人的壓迫已經造成了偉大的革命鬪爭力量的前提——「歐洲對亞洲殖民地的劫掠已經鍛練了一個日本取得了偉大的軍事勝利，以保證他獨立的民族的發展。沒有絲毫疑義的 英國人對於印度數世紀來的劫掠，與所謂『先進的』歐洲人反對波斯與印度的德謨克拉西的鬪爭，在亞洲已經鍛練了數百萬數千萬的無產階級使他們可以取得同樣的勝利（如日本一樣）以反對壓迫者。」列寧還是在最初的發展階段上使已如此指明出殖民地解放運動有力的那一面，托洛次基先生在一九三〇年——在世界經濟恐慌與帝國主義資本向工人階級與殖民地實行總進攻的環境下！——却無恥的向全世界宣言說：殖民地的革命在一個國家內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革命，有他的今天和他的明天，新的中國革命還沒有生長成爲完備的樣式，但是他已經在敲門了，爲要他公開的爆發出來，便必需無產階級有組織的堅忍的力量，需要羣衆發動的力量，在實際上團結起數十百萬飢餓的失望的農民。帝國主義在中國所奪取的一切優越權利，均應該完全取消，因爲經濟統治地位的保存與中國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是完全不兩立的，外國的企業必須收歸國有。至於中國的企業，這在目前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中國共產黨還不能夠把工業國有作爲自己最近的任務，這不 是因爲無產階級怕反對資本家的鬪爭而是因爲他爲取得鬪爭的勝利，不能將自己的革命

使命與農民羣衆的動搖性，及領導農民團結農民教育農民完全隔開。中國無產階級還不能嚴厲的集中供給，嚴格的限制貿易自由，因為他還應該避免一切虛偽的方法，免得農民羣衆誤解我們要破壞小農經濟。

目前根本的中心的任務，在革命的意義上講來，還是在轉變中國的農村經濟。中國的資產階級若要採取此種或他種方法，以停止國內一切工業的生產，那麼他便必須遭受革命打擊，一直到沒收他停工的工廠。但是一切革命的手段都應該產生於鬭爭的邏輯，——爲羣衆所通過，適應羣衆自己所了解的利益。

在中國，快要來到的並不是他自己的一九〇五，他已經更進一步了，然而還沒走到十月的直接門戶，他前面還有許多過渡的階段，這些階段只有戰鬭才能解決，只有將人民羣衆緊密的強固的團結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

中國革命的高漲需要國際無產階級偉大的幫助。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是要來壓迫中國革命的，帝國主義的殘酷鎮壓，只有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去回答他。中國現在全世界一切矛盾的集中點。中國革命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整個歷史過程中的一部份。每個勞動者不僅要明白這一點，而且要知道他自己在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爲社會主義而鬭爭的隊伍中的地位。

赤色工會在現在階段中的作用與任務

爲了精確的說明中國赤色工會在現在階級中的任務與作用，先把現在的階段概括的敘述一下。

首先要指出來的是，中國陷入在不停止的軍閥混戰中。蔣國馮戰爭剛剛「結束」，蔣張間已經在更大規模的進行新的戰爭。這些戰爭是新式的形式，牠的破壞力比過去的一切軍閥混戰大若干倍。廣大工農羣衆的貧困化，許多省區的饑災，一般的經濟危機，許多工廠的關閉，數十萬工人被驅逐到十字街頭，同時資本向已經可憐的萬分的工資與工作條件更殘酷的進攻——這些已經是整個中國的通常現象。

但是現在階段中特有的新的主要特徵是第二個中國——蘇維埃中國存在的事實。這已經不是宣傳口號，而是事實。湘鄂贛許多重要區域已在正式的工農紅軍手中。蘇維埃政府在這些區域中已頒佈牠的命令與法律；工會，黨，青年團與農民組織在那裏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地方蘇維埃政府的柱石。勞働法令的頒佈如八小工作制，農工享受同樣的工作條件，青工與童工的嚴格規定等等——這都是蘇維埃，黨與工會在這些區域中的日常任務與活動。直接在帝國主義公開幫助之下的反革命的軍閥的白色中國與紅色的工農蘇維埃中國之間已在進行殘酷的死戰。特別在最近期間帝國主義與國民

黨非常恐懼蘇維埃政權的擴張和深入與紅軍的活動，因此反革命勢力集中一切力量企圖消滅紅軍與蘇維埃區域。英日美軍艦之積極的進攻長沙（紅軍退出長沙後農羣衆被軍閥慘殺的有四千餘人之多。）許多德國的以及其他各國的軍事顧問之參與反革命軍閥的軍隊，各國領事，海軍要員以及軍事專家在上海與其他各處舉行的秘密會議已表現出反革命與蘇維埃中國之間的戰爭是如何的嚴重的進行着。

同時殘酷的白色恐怖統治着整個的白色中國。赤色工會處在嚴格的秘密狀態下，罷工以及任何改良工作條件的鬥爭都被禁止；赤色工會與工人羣衆的積極份子時時被慘殺（武漢，長沙，廣州，南京，每天都有槍斃及砍頭的事實。）但是廣大的工人羣衆在許多自發鬥爭與罷工運動中表現了牠深刻的、不滿。這些鬥爭常常直接的與軍警發生武裝衝突。但是這些鬥爭還是散漫的，還無有配合起來，這沒有充分的由赤色工會準備，而且許多鬥爭還不是由我們來領導。最近期內我們還沒達到將工人鬥爭擴大到一個產業部門的範圍。一般的講起來產業中心產業工人的革命運動在今天這是比蘇維埃區域內農民羣衆的革命運動落後。（落後的原因以下再講。）中國革命運動的不平衡發展是現在階段內的一個特徵。

x
x
x
中國赤色工會在這種形勢下的任務應該是：

1. 在最主要的產業中心中，應該積極在工場中擴大赤色工會，（首先在重工業中），有系統的利用羣衆的廣大不滿，艱苦的準備和領導廣大羣衆日常要求的鬥爭以發動一切羣衆鬥爭。自然在這些鬥爭中應該很靈活的將廣大羣衆經濟的直接要求與一般的政治要求聯合起來。簡言之，這裏的中心任務是廣大的發動由赤色工會準備和領導的羣衆鬥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消滅革命戰綫的不平衡性，使產業無產階級的主要隊伍站在革命鬥爭的前綫，使產業無產階級的運動與農民羣衆的革命鬥爭配合起來。

2. 在蘇維埃區域內的中心任務，是最大限度的在組織上鞏固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政權及紅軍的地位，這主要的是組織僱農羣衆的強大組織（政府執行土地革命最好的保證），以及組織手工業者，運輸工人苦力等等的廣大羣衆；動員號召工人與手工業者加入與鞏固紅軍，使紅軍的領導機關，蘇維埃機關以及地方政權等等無產階級化；在蘇維埃區域中積極監督與執行勞働法令；組織婦女與青工羣衆，不只把牠們吸引到工會生活中，並將吸引到蘇維埃生活中以擁護紅軍；從白色區域中派送有經驗的可靠的無產階級戰士與工會會員到蘇維埃區域去以執行這偉大任務，建立蘇維埃區域中的工會與非蘇維埃區域內的領導機關間密切的經常關係——這是赤色工會在蘇維埃區域中最主要的直接任務。

3 在與上述的聯系中，特別在最近反革命集中一切反動勢力剿襲紅軍與蘇維埃區域的時期中，赤色工會發生了特殊的迫切任務：把我們的一切毅力集中在運輸軍隊和製造

軍械攻打我們的運輸工業及其他工業中（如鐵路，輪船，地方的交通要道以及兵工廠等等），這裏應該特別努力擴大與鞏固工廠中赤色工會的組織，應特別積極準備與發動廣大的羣衆鬥爭。

4. 赤色工會在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準備運動中與在大會本身的工作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歷史上的實際任務：動員各工廠中的羣衆，使蘇維埃與牠的勞働法令普遍化，從重要的工廠與主要產業中選舉男女工人代表與青工代表，將這種準備運動密切的與組織經濟的和政治的羣衆鬥爭聯繫起來，并密切的與最廣大的動員工廠中的工人羣衆擁護蘇維埃區域紅軍及反對反革命現在所計劃的集中的進攻蘇維埃聯繫起來。

這些任務是偉大而困難的。但是這些困難不是在客觀形勢中。雖然白色恐怖嚴厲，雖然反動勢力直接在帝國主義幫助之下集中一切力量向我們進攻，但是客觀形勢對我們是特殊有利的，這是無所爭辯的事實。在每個企業，紗廠，礦山，鐵路工廠，鐵路以輪船中每天每時都有真實羣衆鬥爭的燃料與廣大基礎，如反對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反對資本主義進攻與軍警恐怖，反對可怖的饑荒，反對政治權力的剝奪（組織權與集會權等等），反對對於在奴隸條件下工作的女工與童工慘無人道的欺凌。在這裏還有國民黨工會與黃色工會出賣和壓迫工人羣衆的事實。工人羣衆不能要這種黃色工會，因

爲牠的主要作用是緝殺與摧殘工人羣衆的任何組織與羣衆運動。雖然有嚴厲的白色恐怖，赤色工會雖然有許多缺點與弱點，但牠在反革命統治的兩年中組織和領導了許多鬥爭，在羣衆中獲得了威信。赤色工會在爭取與動員廣大羣衆中的最大弱點與阻礙，是主觀上的：1 赤色工會組織上太弱（忽略了建立赤色工會的有系統的組織工作）2 忽略了工廠中工人的日常要求（有時認識不清，）因此忽略了對於日常經濟鬥爭的準備與領導，而經濟的日常鬥爭正是使鬥爭政治化與動員產業無產階級廣大羣衆參加革命戰綫的基礎，同時也是實行下層統一戰綫的基礎與反對自己行伍中取消派與機會主義者最好的武器。

明顯的，赤色工會組織上的鞏固與擴大只有在鬥爭中才能得到。赤色工會應利用我們在工廠中組織的領導的每個罷工，爭工資的運動，防禦鬥爭及進攻鬥爭鞏固與擴大牠在工廠中的組織，儘可能的保證公開的或半公開的存在（這只有在羣衆同情與羣衆壓力下方能達到。）

現在再詳細的說到準備與領導日常的經濟鬥爭以及牠對於政治口號及任務的密切聯系。

赤色工會領導工人羣衆經濟的迫切要求的鬥爭與經濟鬥爭底革命化絕不是矛盾的，而是牠最主要的前提之一。輕視日常要求的經濟鬥爭以及在經濟的罷工運動中企圖其

他類似激烈的口號代替此種要求的「左傾」，不會使鬥爭鞏固，而只有分散鬥爭的行伍甚至消滅鬥爭。從前好像只作經濟鬥爭，現在好像只應作政治要求的鬥爭，從前與現在時期的區別絕不是這樣。現在與從前的區別是，在上述的情形下（戰爭，白色恐怖，野蠻的剝削，帝國主義的壓迫，蘇維埃區域的成立等等），中國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已表現出超過狹小的經濟鬥爭範圍的趨勢。我們的任務是，教育羣衆在經濟鬥爭的過程中覺悟的將直接的經濟要求與無產階級的一般的階級要求聯系起來而同時不減弱本來爭取微小要求的鬥爭。

與經濟鬥爭聯系着提出正確的政治口號是最能表現出「階級反對階級」的真正覺悟的鬥爭性質——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底革命的基點。所以反對經濟鬥爭革命化的機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的與工團主義的）也特別反對罷工要求與任何政治口號聯系（列寧一九一七年一月九號在端士齊里奚城（Nizhny）講演一九〇五革命中對於一九〇五年及當時罷工潮流的特點有以下的說法：「在革命中經濟的與政治的罷工鬥爭之溶和是特有的。毫無懷疑的，這兩種罷工形式之密切的聯系保證了運動的偉大力量。」）共產國際自成立的第一天起以及在一切大會中再三再四陳述部份要求的鬥爭底必要，這絕不是偶然的事。爲甚麼？因爲有許多同志這樣說：「我們是在社會革命的階段內；爲甚麼我們徘徊在工資問題，社會保險與八小時工作制上？這些都是小意思，我們都應爲

偉大的一般的階級任務「鬥爭啊」這種觀念實質上是機會主義的，因為他在用左的詞句來掩蓋自己的消極。

有些真正革命者對於在個別罷工中應提出何種政治口號的問題也常常不能加以嚴重的充分的考慮。問題是如何將開始的經濟的罷工鬥爭更強大起來，將鬥爭引向更高的階段上去，同時用與這些罷工及所提出的要求有明確聯系的具體的政治口號擴大鬥爭綱領。

主要的是，工人羣衆已深一步的認識國民黨與黃色工會的干涉（軍警當局亦時常直接的摧殘）是直接的挑戰，這應以赤色工會正確策略與適當的政治要求的提出來回答。

純粹的政治罷工只能在與特殊迫壓的關於工人階級生存問題的聯系中或者在階級敵人新的進攻引起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特殊憤急的問題中順利的實現（譬如紅軍退出長沙後反動勢力之瘋狂的殺戮，或反動勢力向紅軍與蘇維埃區域實行新的集中的進攻以及我們對於蘇維埃第一次大會的準備運動等問題。）這種政治罷工多半是用粹純（或大都分的）的政治口號舉行抗議或示威的罷工。如無產階級，五一」「八一」「三月六號」革命的國際運動就是這種性質。

這應再重複的申述，無有赤色工會組織的強大（無產階級羣衆從牠們的經驗上已將赤色工會看作牠們利益的代表者，在鬥爭中團聚在牠的周圍，）經濟鬥爭革命化是不可

能的。現在階段的羣衆鬥爭對於赤色工會是最好的試金石，試驗牠是否已轉變爲工人羣衆底有鬥爭能力的機關以及對於牠的任務準備羣衆爲一般的階級的鬥爭執行到若何程度。在羣衆鬥爭中工人階級會由自己行列中產生新的積極力量與無產階級鬥爭底新的組織員。

對於政治與經濟罷工無有改善的組織則經濟鬥爭革命化無法前進；不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團結起來，不將失業工人吸引在共同鬥爭中以及不把千百萬的女工與青工組織起來則經濟鬥爭底革命化亦是不可能的。無澈底的罷工準備，羣衆鬥爭底革命化亦是不可能的。如果無有任何的準備而只號召羣衆總同盟罷工或其他的政治罷工（如最近在中國發生的現象）或企圖以左的機會主義辭句代替真實的罷工鬥爭（如「羣衆不願罷工，只願武裝暴動」的論調）這只有消滅羣衆對於革命者領導罷工底認識的信仰。

無情的反對國民黨走狗與黃色工會，在爆發鬥爭的前後與鬥爭中揭露牠們的罪惡，同樣的在工人鬥爭革命化中佔主要的地位。這個任務與下層統一戰綫問題有最密切的關聯，對於這個問題應有明確的認識。在現在的中國條件內下層統一戰綫有甚麼意義，赤色工會許多罷工及其他鬥爭中應如何處理黃色工會？我們在有赤色工會會員團體的工廠中（雖然這個團體是如何的弱小），應集中一切毅力擴大這個團體，經過積極參加準備和領導經濟鬥爭鞏固所在廠的赤色工會使牠成爲真正的羣衆組織。這裏應嚴格

的反對黃色走狗并在每個機會中在羣衆面前揭露牠們的罪惡。下層統一戰綫在罷工及鬥爭中的任務是增高羣衆的鬥爭力，而絕不是與國民黨走狗及黃色領袖妥協。

所以我們在各廠廣大工人羣衆中的統一戰綫應與反對黃色工會的艱苦鬥爭聯系起來。赤色工會在各處中應該在每個衝突的以前與衝突當中整頓自己的有規律的工會生活，經過鬥爭機關（如罷工委員會，行動委員會等等）爭取工廠中的領導。每個衝突在羣衆中引起來的憤怒都有利於我們建立廣大的下層統一戰綫，就是在黃色工會握有廣大羣衆的地方（雖然這是稀有情形）亦然。在可以選舉的機關中應選舉最好的有鬥爭煅煉的工人（包括無組織者或甚至黃色工會的會員）參加，我們知道，許多工人是被迫加入黃色工會的。無組織的與無黨派的工人應擔任罷工機關的各種職務，以使牠們共同工作與直接的參加鬥爭。在罷工期內召集各種專門的廣大會議（有組織的，無組織的，女工與青工）有莫大的益處，這能使他們中間最好的有力份子參加領導鬥爭的職務。在選舉的鬥爭機關領導下組織羣衆示威反對國民黨與警察恐怖對於擴大我們的影響與鬥爭效果是非常重要的。應嚴格反對想以對於黃色領袖妥協或企圖參與他們的領導機關來代替擴大與鞏固赤色工會的傾向。同時應該明瞭，在黃色工會握有擴大羣衆而無赤色工會的工廠中應派我們的同志在黃色工會內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有系統的揭露黃色走狗的罪惡擴大我們在工人羣衆中的影響以創立赤色工會的基礎。

赤色工會在現革命迅速發展形勢的階段中的作用是動員與組織廣大羣衆，領導羣衆日常經濟要求的鬥爭，並密切的與無產階級之迫切的一般的政治口號聯系起來。無有這個動員則有效果的革命鬥爭是不可思議的；無有這個則產業無產階級與革命的農民鬥爭的配合以及保護蘇維埃區域與紅軍亦是不可思議的……但是這種作用只有強大的組織和領導羣衆日常鬥爭的赤色工會（自然在黨領導之下）方能完成。

所以現在時機下的中心口號應該是：到羣衆中去，到工廠中去，加強赤色工會，準備，組織與領導日常的羣衆鬥爭等密切的與政治鬥爭聯系起來。

武裝暴動的策略與左傾冒險主義

洪易譯

列甯關於武裝暴動的理論是整個列甯主義主要的一部份。列甯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活中對於這個問題是非常之注意的。無產階級在直接革命形勢的時期內必然要而且必須要實行武裝暴動，這完全是直接從馬克思列甯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暴力革命的作用底理論而來的。

列甯在俄國三個革命中關於正確的了解和正確的運用武裝暴動的策略，亦和許多其他的策略問題一樣，總是屢次實行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反對右傾的機會主義，一方反對左傾的冒險主義。只因爲能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所以才能形成列甯的武裝暴動的策略，波爾什維克黨以列甯爲首領在俄國十月革命中正確的運用了這個策略。

列甯關於武裝暴動理論的中心和實質究竟又在什麼地方呢？在什麼條件之下他可以勝利呢？關於這個問題的答覆，列甯有許多著作，自1905年前他的第一篇文章起一直到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的演說止。在共產國際的綱領中第六章已將列甯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基本原則都很透澈而通俗的說到了。這些基本原則歸結如下：武裝暴動在下列條件下便可勝利：

1 假使武裝暴動能有強固的，在階級戰鬥中有鍛鍊的，在思想上，組織上均與羣衆有密切關係，羣衆中有偉大威信的共產黨來領導。

2 假使城市中農村中均有勞農羣衆的反對現存政權之強有力的革命運動；這些羣衆均不顧一切的犧牲願堅決的手持武器，爲他的階級目的而鬥爭，以摧毀國家政權制度，建立蘇維埃政權。

3 假使人民的中間份子（如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中等農民等等）都對現存政權失望擁護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鬥爭，或者至少也能在無產階級鬥爭中嚴守中立的態度。

4 假使統治階級在經濟與政治的恐慌的結果中，爲一切矛盾所混亂，目前從矛盾中找不到激進的出路的話。

5 假使黨能合時的採取必須的軍事政治的與組織的技術的設施，（如解除統治階級的武裝力量，創造無產階級的武裝力量等等）目的在奪取國家政權，并能正確的估量暴動的時期。

在所有這些條件之下，暴動的勝利是有保證的，反之，在缺乏這些條件的時候，勝利的暴動是一定不可能的。

這是很顯明的，黨嚴重的準備武裝暴動，準備羣衆的武裝暴動，并不是要消極的等待順利的暴動條件之造成，而是要在他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去使羣衆革命化。（在職工會

內，在農民中，在其他各種羣衆組織中，在軍隊，國會內的工作）積極的促進順利的暴動形勢之到來，俄國十月革命時的環境是絕對順利的，然而這并不是他自己生成的并不是客觀發展自流的結果，（雖然，這個客觀的發展，——戰爭，沙皇制度，資產階級政權，是十月革命的基礎）然而大部份還是布爾什維克的政黨在工人中農民中軍隊中積極工作的結果，全國從布爾什維克黨那裏得到了顯明的口號，得到了從俄羅斯帝國主義絕境中的出路。

這也是很顯明的，中國各省的直接革命的形勢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不是自流的，大部份而是中國共產黨積極工作的結果。

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共產國際的各分部并不常常注意列甯關於暴動勝利的條件，舉幾個例子作證罷！

在1917年七月的時候，彼得格勒有一部份黨員，認為暴動勝利的條件已經成熟了，須要號召羣衆到街道上去用武裝的力量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列甯警告多數黨說，「時候還早」「時期還沒有到」。羣衆出發了，遭遇了失敗，列甯在九月十月時則肯定定說：「時候到了」「恐慌成熟了」「或者現在或者永遠不暴動，革命還要失敗的」等等的話，他忍耐的解釋，說服，證明我們七月的暴動是不能取得勝利的，因為我們那時還沒有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在蘇維埃裏面還是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佔大多數，在軍隊

中還沒有充分接受我們的政治影響，政府在矛盾中還不十分混亂，他還有充分的力量可以鎮壓暴動，農民還希望從臨時政府那裏可以獲得和平與土地。

列甯在九月十月說：現在的情形不同了，我們現在有大多數勞働者的擁護，在蘇維埃內有大多數，人民是失望，我們能給他們以正確的出路，軍隊中的大多數也是擁護我們黨的口號的。

列寧正確的估量了環境，正確的選擇了暴動的時期。他懼怕環境將有暫時的變動有利於統治階段，因為他知道，資產階級並不是完全沒有出路的，他感覺到布爾什維克黨對於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負有很重大的責任。這就是列甯之所以要竭盡他一切威權的力量，來暴露季諾維埃夫和康朱聶夫及其同認爲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在布爾什維克一黨領導之下是冒險主義底錯誤。

假使黨不同意列甯的主張而同意季諾維埃夫和康朱聶夫的意見，那又怎麼樣了呢？結果是要和1918年的德國一樣，蘇維埃被社會民主黨所利用，後來又將政權轉交於資產階級。

在上面所引的例子裏面，我們可以看到兩種錯誤，一種七月左傾的錯誤，過分的估量自己的力量，對反革命的力量，估量不足，沒有革命的忍耐性，另一種便是十月革命時季諾維埃夫和康朱聶夫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這兩種錯誤，都是一樣的危險，有害的，列甯對於這兩種錯誤都是反對的。

另一個例子，便是1921年的德國，當時在德國造成了一種這樣的情形，即德國中部的工人較之其他各地的工人更要革命些，我們德國的兄弟黨決定號召德國中部工人總同盟罷工，目的在轉變這次罷工成爲全國的武裝暴動，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德國中部的工人接受了黨的號召開始了總同盟罷工，結果只在沙克遜以及其他幾個區域內轉變成了武裝暴動，但是暴動沒有德國其他各地成千累萬的無產階級的幫助，使政府能集中全國的大力量以鎮壓暴動，三月暴動便是這樣失敗了。

這裏的錯誤是很顯明的，德國的黨，正確的說，他的領導機關，沒有了解數百萬工人羣衆并不是黨的命令就可以都暴動起來的，他們沒有估量到，德國中部的工人的確是參加作戰，但是其他各地的工人還是在1919—20年失敗後的衰落時期，德國的黨將先鋒隊去作戰，以爲全國的工人階級會跟着來。這正是他們底錯誤。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列甯曾嚴厲的批評德國共產黨領導機關那種左傾的錯誤。

還有1924年列威爾的例子，愛斯托尼亞的共產黨認爲愛斯托尼亞因殘酷的白色恐怖之故，那里的統治與他國不同，愛斯托尼亞暴動的勝利條件已經具備了，他們認爲黨的軍事組織忽然發動起來，奪取愛斯托尼亞京城列威爾的政權，然後則號召工人階級來完成這個初步的軍事組織的勝利。列威爾的暴動便是這樣發動起來了，約有230至250

個無產者，開始行動，初來亦獲得很多勝利，但是沒有得到羣衆方面積極的幫助，致遭受了嚴重的失敗，列威爾的暴動於是竟變成了軍事的陰謀，沒有無產階級羣衆直接的參加，而欲幹無產階級的暴動。忽然之間的發動，不但對於資產階級是個忽然，而且對於無產階級也是個忽然。

假使我們分析廣州暴動，那麼我們便可知道，廣州暴動失敗的原因，主要的，還是因為無產階級，城市貧民，四郊的農民羣衆不十分積極的參加暴動，軍隊沒有完全瓦解，因此之故，反動軍閥能够無阻碍的，調動廣東省的軍隊來鎮壓暴動。

我們不能將廣州暴動與列威爾比較，這顯然是錯誤。廣州暴動是有羣衆參加的，不過不十分積極，因此暴動勝利的必須條件當然沒有完全具備，這一點，共產國際當時也指明出的。（見九次擴大會）

我們引這些例子，并不是要來責罰這些暴動，誰要是責罰無產階級手持武器的鬥爭，誰便不是革命家，而是小資產階級的俗人，這種人應該從革命隊伍中驅逐出去，所有這些暴動，特別是廣州暴動，德國的三月暴動等乃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大進步，但同時，我們又要承認，必須指出領導機關所做的錯誤，解釋失敗的原因，這是我們底責任，我們黨的義務。

我們中國的共產黨關於暴動的問題，不止一次的做了許多「左傾」的錯誤，不久以

前還聽到有些同志講，羣衆很快的就要暴動比罷工還快，這些同志根據這個概念，做出下列的結論，認爲黨應該集中一切注意力直接準備暴動，忽視職工會內的工作等等，這種說法與列寧主義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這是不着證明的，這種願望與黨的日常工作，向羣衆解釋階級的任務，組織羣衆，準備羣衆作堅決的革命鬥爭等等完全分離開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還沒有在各種重要工業中在中心地方奪得工人階級中的主要部份，武裝暴動當然是不能勝利的，將羣衆從國民黨反革命的思想與組織中解放出來，這便是我們底任務，在這些任務實現之後，黨才能大刀闊斧的直接準備暴動。

暴動的條件尙未成熟，在全國的中心地無產階級的主要份子尙無大多數人擁護我們，我們還沒有強有力的赤色工會，在這個時候，我們就發號召暴動的宣言，這顯然是左傾的冒險主義，我們應用所有的力量來反對這種冒險主義。

要在中國的某一城市中即刻組織暴動，只有在下列條件之下；假使中國的紅軍直接進攻該城市，目的在奪取這個城市，黨的組織在該城市內雖無工人的大多數，但亦應將自己的行動與紅軍的行動配合起來組織暴動，在紅軍奪取城市的鬥爭中幫加紅軍，因紅軍之接近城市便造成了該城市中直接革命的形勢。

在本文開始時，我便已經說過，勝利的暴動條件之一，便是黨應該在軍事政治與組織技術上充分的準備暴動，暴動要想當場來準備是不可以的，暴動應該是有組織的。

暴動應該有計劃，這個計劃應該建築在對客觀環境各方面的估計，建築在軍事藝術的規律與列寧主義的政治策略之上，我們應該注意，暴動的環境，對於無產階級之奪取政權，無論怎樣的順利，沒有堅決的武裝鬥爭，統治階級決不會將他的統治自願的退讓的，他們將要鬥爭到最後。計劃的製定，首先即須豫見這一點，並事前決定鬥爭力量的分佈，使無產階級的主要力量，能抓住鬥爭的客觀形勢，造成鬥爭力量相互關係的轉變，使之有利於無產階級，澈底的肅清敵人。

關於在鬥爭過程中造成鬥爭力量相互關係的轉變使之有利於暴動者的問題，這是一切暴動的根本問題，假使這一點不成功，像廣州暴動以及其他暴動一樣，那麼暴動者方面遲早便會放棄積極進攻的行動而轉向防守，從純粹防守的形式上看來，防守是暴動的死路，廣州暴動之所以不能勝利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暴動者的軍事力量自勝利的第二天起，就增加得不充分，同時反革命方面則逐漸將他的武裝力量向廣州進攻，關於鬥爭力量之不斷的增加，以造成偉大的轉變，使其相互關係有利於暴動者的問題，我們在廣州暴動中是沒有執行的，因此之故，我們便很快的轉向防守，在這種情形之下，暴動是不能堅決的勝利。

武裝暴動之軍事政治，組織技術和策略的準備其主要點又是些什麼呢？他是：

1. 首先使是要將統治階級的軍隊瓦解，渙散，并在政治上奪取他。列寧在1906年

論「莫斯科暴動的教訓」一文中，曾經說過：假使革命不能將軍隊奪取過來，那是不能算什麼嚴重的鬥爭的。這是完全對的，現代的軍隊，都是用一些新的軍事技術所武裝起來的，假使我們不能充分的使之瓦解，不能充分的使之加入革命，在軍隊中沒有共產黨的支部，或革命的士兵團體，而他們只是嚴厲的進行反對革命的鬥爭，那對於革命是非常危險的，黨對於這一點是應該計算到的，共產國際在他的決議案中曾經屢次說過，黨必須在軍隊中加緊工作，特別是在直接革命形勢的時期中。

目前的客觀條件，是有利於我們在中國軍閥軍隊中進行工作的。我們應該直截了當的說，黨近來在這一方面的工作雖有很大的進步，但我們還應承認，我們還是有許多沒有做的。這種工作我們做得愈順利，反動力量便愈加削弱，黨對於這種工作，應該經常進行，特別是當奪取政權的問題已在某區列入議事日程的時候，這種工作，更應加緊，例如現在，反動勢力集中一切力量來消滅湖南湖北江西的蘇維埃區域的時候，尤其應該萬分的緊張。

2. 如果我們認為，我們能將反革命一切武裝力量都瓦解，或至少也能使之完全中立，這顯然是妄想的。不管政治環境如何順利，不管我們在軍隊中底工作如何有成績，統治階級總常有他自己直接命令的軍隊和特別隊伍，積極的反對革命。歷史的經驗，特別是俄國革命鬥爭的經驗完全顯明的證明了這一點。瓦解這一部份軍隊之唯一可能的

方法，便是堅決的手持武器與之鬥爭，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我們必須有自己的武裝，能充分的與反動勢力的武裝力量作鬥爭。我們應該有紅色先鋒隊。紅色先鋒隊是奪取政權直接鬥爭的工具。這種組織不能在「和平」發展的時期內去創立，他的創立，只有在黨提出了直接準備奪取政權問題的時候，只有在那時候的環境，黨能將鬥爭的重心移向動員羣衆，從實現部份的要求，到直接推翻資產階級的口號的時候，（創造蘇維埃，工人監督，工業國有，沒收土地等；）加緊創造紅軍的鬥爭（雖只能半公開的存在）亦大部份能事先的決定這個暴動的勝利。

蘇維埃區域則不同，在那里，統治階級已經打倒了，那里的基本任務是在創立堅固的工農政權，徹底的實行政府的政策，用一切的方法去鞏固紅軍，這是工農政權的靠山，這是中國蘇維埃的靠山。

3. 關於暴動者的武器供給問題也是主要的問題之一，武器是不够用的，在資產階級的專政之下我們是不能及時的準備充分的武器以武裝一切準備作鬥爭推翻舊政權的無產階級，但是沒有武器，武裝暴動是不可能的，黨與革命羣衆應該及時的用各種方法準備相當的武器，以便在暴動開始時可以保證鬥爭的勝利。這是完全可能的，無產階級的地位，乃進攻的力量，將有利於問題的解決。暴動計劃的要點之一，便是奪取武裝。廣州暴動的領導者做了很大的錯誤，就是對於奪取廣州兵工廠和火藥庫的問題不注意，

或者注意得不充分，羣衆都來參加作戰了，但是武器沒有，而旁邊却有敵人的兵工廠。

4. 列甯還是在 1905 年革命時便已經說過，黨無論何時決不在兵士中作『軍事派』的遊戲，無論何時亦不作冒險主義的軍事陰謀。但是在革命時期，黨却應該將軍事問題差不多提到計劃中的第一位來，這就是說黨應該多多注意對羣衆的軍事教育問題武裝隊伍的組織，教育黨員幹部和革命工人幹部以戰略的藝術，等等問題，這就是列甯之所以在 1905 年革命時特別是在 1917 年革命時關於軍事問題說了許多的緣故。列甯正確的決定了軍事問題在奪取政權的一般鬥爭中的地位。

教羣衆使用武器，在技術上（軍事的）準備黨的幹部，關於舉行現代戰爭之軍事藝術主要規律的學識，偵探，防禦，等等，以及在武裝暴動的環境中正確的運用這些規律，將紅色先鋒隊的軍事行動與工農羣衆的行動相配合，不斷的吸收更多的羣衆參加武裝鬥爭，所有這些，並不見得是勝利的武裝暴動的次要條件。

所有這些關於武裝暴動之軍事政治與組織技術的準備問題，我們現在只說了一個綱要，全黨的同志對於這個問題，應該詳細的發揮，在一篇文章內要詳細的說到，那是不可能的。在結論中，我必須指明出，黨在準備武裝暴動中的主要槓杆便是青年團員，赤色工會，革命的農民協會等等。

中

書

中國革命戰爭的組織和領導問題

——長沙戰爭的教訓和蘇維埃根據地建立的任務

一

中國現在革命運動發展的形勢，正是『從工農羣衆部分的革命行動進到革命的總進攻的過渡時機』。當前具體的事實裏面，我們可以看見現在革命運動的特點：（一）城市工人階級的鬥爭，雖然還沒有發展到充分的力量，足以襲擊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整個統治，可是正在更加劇烈和日益高漲起來。（二）農民運動的發展和力量，也有各地方不平衡的現象，有些地方剛在開始農民的游擊鬥爭，有些地方却已經能夠推翻當地的國民黨政權。（三）而且紅軍戰爭的主要區域，已經進到規模擴大的反對帝國主義軍閥的正式戰爭，跟着軍閥這種戰爭的開展，軍閥軍隊裏面的兵士的革命譁變和響應紅軍的運動，也正在日益擴大，——這樣，部分的說來，軍閥混戰已經開始變成革命戰爭。（四）蘇維埃區域的逐漸滙合，要從零星散亂的各地方革命政權的樹立，進到建立蘇維埃的臨時中央政權，來指揮組織革命的戰爭，集中革命勢力，——用統一的革命的蘇維埃政

權去和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對抗，去領導起全國的革命運動，爲着蘇維埃政權在全國的勝利而鬥爭。

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這種具體的形勢之下的最主要的鬥爭任務，就是：一方面，鞏固和發展各蘇維埃區域，集中農民鬥爭的力量，加強無產階級對於工農紅軍的直接領導，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臨時中央政府去組織革命的戰爭——爭取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別方面，同時積極的擴大中心城市工人羣衆的鼓動和組織工作，發動並且領導全國反動統治區域裏面各種方式的羣衆的革命鬥爭，爭取廣大的勞動羣衆，來積極準備武裝暴動，以加強並且鞏固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權。這兩方面的任務，絕對不能夠互相割離起來，自然，更不能夠互相對立起來；恰好是相反的：這兩方面的任務，應當密切的互相聯系互相配合。中國共產黨現在所有的，是一個整個的任務，就是堅決的去領導羣衆鬥爭達到蘇維埃政權在全國的勝利；這在現在的形勢之下，就明顯的是怎樣運用正確的策略，去促進羣衆局部的革命行動進到革命勢力對於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總進攻的問題。城市中心的積極準備暴動和蘇維埃區域的組織革命戰爭，只是這個總任務的兩方面。同時，這兩方面的中心，都在於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權，都在於共產黨爭取廣大羣衆的任務。

對於城市中心爭取廣大羣衆來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應當有更深切

的認識，——將要另外有一篇文章來解釋。我們這裏，首先要特別說明的，就是農民戰爭的開展和勝利，尤其是蘇維埃政權普遍到全中國的鬥爭，必須有勝利的城市無產階級的暴動來完成。可是，這已經是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領導的更高的階段。現在，我們要詳細的來解釋：組織現在已經開始的革命戰爭的問題。這是目前無產階級實行對於農民戰爭領導的具體問題；而且只有正確的解決目前組織革命戰爭的任務，以及城市工人鬥爭和革命戰爭互相聯系的實際任務，方才能够使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從現在的階段更順利的更迅速的進到更高的階段。

二

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領導的現在階段的情形是怎樣呢？

首先，我們就要講到長沙戰爭的意義。一九三〇年七月底紅軍佔領長沙，八月初退出長沙，而集合紅軍第三、四、五、八軍四軍的力量再進攻長沙，直到九月底停止進攻，——這次戰爭，我們稱他叫『長沙戰爭』。長沙戰爭的意義是：第一、他的爆發和經過，顯然是在全國革命高漲的背景之上。長沙戰爭雖然暫時沒有得到勝利，可是，他的意義是非常偉大的。當時，正是蔣介石和閻馮汪的軍閥戰爭進行得非常劇烈的時候；全國大城市的工人鬥爭日益高漲；許多地方的農民，繼續擴大自己反對軍閥混戰抗租抗稅的鬥爭，進到游擊戰鬥的武裝衝突；許多地方軍閥軍隊裏的兵士實行嘩變，

反對軍閥混戰，同情紅軍，以至於直接投到紅軍方面來；其他區域的紅軍，如鄂西，鄂東北，贛東北，贛西南，閩西，東江的紅軍，都正在發展和擴大；甚至於河北省的南部也發生紅軍的組織，當地還有許多紅槍會的群眾表示不滿意自己的首領，要求改變紅槍會的名稱，改做紅軍，『請共產黨來領導』。這種情形之下，長沙戰爭的爆發，決不是簡單的『農民游擊隊攻城』，決不是『革命高漲前夜偶然的一次比較鉅大的游擊戰鬥』。不是的！他已經是全國革命高漲進一步發展的表現。第二，因此，長沙戰爭之中，湖南省城十天的蘇維埃，已經是新的革命爆發的『進兵戰鬥』。廣州暴動的失敗，是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末期，當時是全國革命高漲的形勢已經開始過去的時候，所以他成爲『退兵的戰鬥』。現在，從廣州暴動以來三年的革命鬥爭，已經走到新的高漲；城市工人鬥爭挫折的狀態已經恢復過來，從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的全國郵政罷工，上海法租界電車自來水的罷工之後，到一九二九年五一五卅的示威，這一過程，是表現得很明顯的；一九二九年八一前後全國群眾『擁護蘇維埃』的示威運動，就開闢了革命新的高漲的發展；今年一月到五月各大城市工人鬥爭的大大開展，尤其是紅色五月的全國群眾運動，以及隨後各地的罷工鬥爭，都在日益劇烈，時常發生工人羣衆和警察巡捕軍隊的武裝衝突。農民鬥爭的廣大發展，不但傳播到西北的回民暴動，滿洲高麗農民的游擊戰鬥，不但北方紅槍會大刀會等羣衆運動之中共產黨的影響日益擴大，而且從廣州

暴動時期保留下來的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游擊鬥爭的力量，繼續發展，經過去年八一運動，開展成爲擴大的農民戰爭，擴大了許多蘇維埃區域（現在已經有三百餘縣，）從游擊隊之中創造了很大的正式紅軍（極嚴格的計算，也有十萬人以上）。這些工農運動的發展，領導着貧民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領導着兵士羣衆以及一般勞動羣衆反對軍閥混戰的鬥爭，而日益前進。長沙十天的蘇維埃，正表現着這些革命勢力的高漲，已經要在一個工商業行政中心樹立蘇維埃的旗幟，來綜合全國的革命運動，而促進新的革命爆發。這種英勇的企圖，雖然暫時沒有成功，可是很明顯的，他預先警告着新的革命的將要來到，他是新的革命的『進兵戰鬥』，——他像戰爭之中的先鋒隊伍一樣，有前哨的作用，就是革命方面刺探反革命統治的鞏固程度，而企圖建立穩定的革命陣地，以便於革命戰爭的向前進展。第三，長沙戰爭是中國勞動羣衆反對軍閥混戰的鬥爭更高階段的表演；長沙戰爭之中明顯的表現着『中國軍閥混戰開始局部的變成反對軍閥的革命戰爭』。客觀的政治形勢的開展，那時候正是各地民衆反對蔣閥戰爭日益劇烈起來，兵士羣衆拒絕開到前線上去，農民和一般勞動者開始反對拉夫拉車，拒絕交納稅捐，而城市工人和他們的鬥爭，正是這種反對戰爭的總運動之中的組織和領導力量。當時的長沙戰爭，就在兩湖具體的集中所有這些各種方式的運動，形成『以革命戰爭消滅軍閥混戰的實際行動。——長沙戰爭之中，最初，何健的兵士整團整團的投到

紅軍方面來；後來，蔣介石的教導師的一團兵士實行革命的嘩變，歸到紅軍裏去。至於這一戰爭的勝利是全國反對軍閥混戰的勞動民衆所希望，——那更是不用說的。中國共產黨主觀的策略方面，一九二七年十月，就對於國民黨和奉天軍閥的戰爭，發出一「變軍閥戰爭爲反對軍閥的戰爭」的口號，這種原則上的決定，領導民衆對於國民黨軍閥戰爭確定自己的革命的立場；所以中國反革命危機的重新深入，經過一九二九年初的蔣桂戰爭，而爆發一九二九年九月的蔣馮戰爭，——國民黨改組派參加戰爭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就能够實行把這一口號作爲羣衆鼓動的緊急口號。長沙戰爭之中，我們看見這一個口號（「變軍閥混戰爲反對軍閥的革命戰爭」的口號）開始局部的變成事實。長沙戰爭的結果，雖然不是蘇維埃政權在長沙鞏固的存在，然而却是中國工農羣衆和帝國主義國民黨之間開始規模擴大的用正式軍隊交戰的革命戰爭。今年十月間國民政府，在列強帝國主義指揮之下，開始大規模的進攻蘇維埃區域和紅軍，這正是這一革命戰爭的繼續和擴大。

因此，長沙戰爭的意義，是在全國革命高漲發展到「從工農羣衆部分的革命運動走向革命的總進攻的過渡時機」，那綜合一切革命運動於蘇維埃旗幟之下，去推翻國民黨反革命統治的新的革命爆發，一天的接近，他就是這種新的革命的「進兵戰鬥」，他開始把軍閥的混戰，局部的變成反對軍閥的革命戰爭。

長沙戰爭之中，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情形怎麼樣？

這裏，我們開始來研究長沙戰爭的教訓。

長沙戰爭之中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是已經表顯出來。一方面，我們已經看見長沙戰爭之前，中國重要城市的工人鬥爭已經是在日益高漲，領導起各地種種方式的農民鬥爭，尤其是蘇維埃區域的紅軍發展。別方面，我們看見長沙戰爭之中的紅軍，已經是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能夠組織廣大的幾百萬工農羣衆在自已的周圍，能夠有鮮明的政綱：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自己分配，能夠堅決的打倒國民黨的政權機關，而建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政權。長沙戰爭之中的紅軍固然是三年來土地革命運動農民游擊戰鬥裏面產生出來的，這次規模擴大的正式戰爭，固然主要的還是農民戰爭，可是，的確已經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然而，這裏無產階級的領導是否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呢？——這却還沒有。當時，重要城市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沒有到可以起來襲擊反革命的整個統治的時候。當時還沒有城市的武裝暴動勝利而領導起這個偉大的農民戰爭，以開始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局面。那時候的形勢，正是開創更大規模的「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局面。當然，這明顯的指示出「過渡時期」的特性，這種局面，可以並且應當創造開始全國勝利形勢的前提和條件。部分

的說來，也就可以並且當應幫助重要城市造成武裝暴動形勢的前提和條件，可是，就拿「過渡時機」的事實基礎來說：長沙戰爭之中，無產階級經過自己的政黨和紅軍，去領導農民戰爭，是否完全實行了應當做到能夠的做到任務呢？——亦還沒有。這却是長沙戰爭教訓的最重要的方面。

無產階級的領導農民戰爭，在中國的條件之下，可以分得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無產階級經過自己的政黨和紅軍，在城市之中還沒有暴動形勢的時候，就去領導農民戰產的發展，創造「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基礎，而日益擴大紅軍的勢力。第二階段，就是無產階級用自己在重要城市之中的勝利的暴動，（同時，指揮着農民戰爭裏而產生的紅軍來幫助自己），領導起農民戰爭，而「完成」革命的勝利，——就是不但鞏固「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而且從局部的革命戰爭進到全國範圍的革命戰爭，不但開始革命總進攻的局面，而且得到最革命總進攻勝利的第一步。

長沙戰爭之中，當然還沒有這個更高的第二階段開始的形勢，可是已經明顯的是第一階段形勢充分發展的局面。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正是在這種階段裏無產階級領導的實際教訓。

長沙戰爭沒有能夠得到重要城市無產階級暴動的領導，這是客觀形勢的緣故。至於長沙戰爭之中，無產階級領導紅軍戰鬥的缺點和錯誤，那就是主觀策略的問題，所以

這裏的教訓對於現時以及最近將來組織革命戰爭的任務，有非常重大的實際意義。

長沙戰爭的教訓，第一是工農紅軍的許多部隊沒有很好互相配合的行動。

長沙戰爭的初期——第一次佔領長沙的時候，只是工農紅軍第五軍（彭德懷部隊）的行動。當時可以加入戰爭的紅軍部隊，可以牽制敵人的其他武裝勢力，並沒有統一的指揮機關，來調動和布置。後來，第三、四、五、八軍，以及其他部隊（農民赤衛隊等）雖然集中起來，統一指揮，再來近攻長沙，可是，鄂西的第二，六兩軍，鄂東北的第一軍，贛東北的紅軍（方志敏部），仍舊不能歸到統一的指揮機關之下，因此，他們的行動，也不能更適當的和進攻長沙的紅軍互相聯系和配合。

長沙戰爭的教訓，第二是工農紅軍沒有鞏固的後方和蘇維埃根據。

長沙戰爭之前，湘鄂贛邊境的紅軍勢力和羣衆鬥爭曾經有擴大的發展。但是，這裏的蘇維埃政權還沒有能夠鞏固的在後方一切縣城建立起來，使進行大規模戰爭的紅軍，有穩定的大本營，有更有組織的供給運輸探報的系統。只要看：五月六日，紅軍第五軍攻下平江縣城，農民羣衆有十萬以上的人參加，但是，平江縣城只佔了兩天；五月十五日，紅軍和農民羣衆八萬人攻下修水縣城，亦只佔了兩天就又退出；五月二十三日，紅軍第八軍和農民九萬人攻下萬載縣城，但是，因為要去打瀏陽，又是只佔了三天就

放棄；六月七日，紅軍和十萬農民攻下瀏陽縣城，雖然成立了縣蘇維埃，可是，仍舊只佔了五天便退出。這樣，直到七月二十七日第一次攻下長沙，這期間的詳細情形雖然還沒有知道，可是，一般的策略可以從上面所說的事實推想而知。就是沒有堅定的完全肅清蘇維埃區域裏的反動勢力，以至部分的反動政權的方針，以至於沒有造成鞏固的革命的後方——蘇維埃根據地。

長沙戰爭的教訓，第三是紅軍進攻的行動，沒有能夠和長沙城內的羣衆鬥爭充分密切的聯系起來。

長沙是湖南的省城，雖然還不是無產階級的中心城市，但是已經是很重要的行政中心，並且已經有不少的工人羣衆。紅軍進攻長沙的時候，工人自動的起來響應，而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太弱，沒有能夠充分的領導。尤其是第二次進攻長沙的時候，城內有十八個電汽工人因為響應紅軍並且破壞電網而被屠殺。而當時城裏已經沒有共產黨的組織。這自然是非常之大的缺點。

長沙戰爭的教訓，第四是仍舊暴露着許多游擊戰爭的散亂性質，並且沒有充分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

長沙戰爭之中，紅軍雖然能够在黨的領導之下，堅決的認清建立工農蘇維埃的主要目標，可是農民羣衆之中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還是太不充分，以至於部分的表現一反對城

市的意識」。這種游擊戰爭的散亂狀態，甚至於反映到紅軍的領導機關：第一次佔領長沙之後，紅軍的作戰計劃是極不完備的，甚至於普通的探報系統都沒有建立完全；因此，不但沒有堅決實行進攻的戰術，繼續擴大敵人兵士裏的革命鼓動，完全擊敵人的力量，反而使敵人的軍隊能夠很容易的奪回長沙。就是第二次進攻長沙的時候，也暴露紅軍裏面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還不充分；陳獨秀託洛次基派的分子，居然能夠違抗紅軍的總動員令，而破壞總進攻的局面。這裏更明顯的表示：保證無產階級政黨在紅軍裏的最高威信的萬分必要。

因此種種錯誤，長沙戰爭的失敗是有主觀上的原因的，——自然，這次戰爭失敗的客觀原因，亦是很多。

總之，長沙戰爭的教訓告訴我們：長沙戰爭雖然已經不是簡單的游擊行動，可是，他還帶着許多游擊戰鬥散亂性質的殘餘；長沙戰爭雖然沒有能夠勝利，沒有能夠成爲更有組織的勝利的革命戰爭，可是，他的確開始了規模擴大的正式的革命戰爭；他充分的表現出，「過渡時機」的現象；現在，他的教訓是要求無產階級經過自己的政黨，去極大的加強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就是堅決的建立蘇維埃根據地，鞏固革命的後方，而認真的來組織已經開始的革命戰爭——有計劃的有系統的集中的鞏固的向前發展——擴大「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基礎。

四 長沙戰爭之後的形勢怎樣呢？

蔣介石和閻馮汪的戰爭，正在這個時候有了一個「結束」。然而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却在中國又可以利用這個新的形勢來進行：日本帝國主義不但沒有損喪自己的勢力，恰好是他的另外一隻走狗——張學良代替了閻錫山占據北方的地盤；英國帝國主義更加幫助廣東的軍閥陳濟棠，向親近蔣介石的軍閥陳銘樞壓迫；所以，美國帝國主義就不能不更加指揮南京政府，更加排斥南京政府裏面的英日勢力，而準備新的軍閥混戰。張學良占據了北方後，蔣介石自然需要好好準備力量，才能够繼續戰爭。而長沙戰爭所開始的局部的革命戰爭和全國群眾廣大的蘇維埃運動，又使一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派別，都開始感覺到反革命統治的危險。於是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在列強帝國主義指揮下，再宣言「統一和平」，並且提出準備召集「國民會議」的問題，企圖欺騙民眾；事實上，這是他們一方面講着軍閥之間的假和平，準備自己內部的新的混戰，別方面却又無恥的宣告「三個月內肅清共匪」的中心政策，調動二十師的軍隊，從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廣東五省，來進攻紅軍和蘇維埃區域，——對全國的勞動民眾宣戰。

反革命與革命之間的戰爭，在長沙之後，更加擴大了。無產階級的政黨，對於革命戰爭的組織和領導的任務，就更加重要而緊迫起來。

如果輕視反革命的武裝力量和進攻勢力，那就是很大的錯誤。國民黨用『統一和平』『國民會議』『地方自治』的口號，企圖和擁護蘇維埃的運動對立起來，他們動員全國的地主資本家的政治勢力，所謂『輿論』，所謂『剿共運動』來進攻。他們並且企圖發動一切豪紳以至富農工頭等的反動力量，在進攻紅軍的前線，先組織『民團』『守望隊』等等，做援助的力量；並且蘇維埃區域的內部，例如贛西南，還有地主豪紳的武裝勢力埋伏着，領導着富農反動份子，企圖響應進攻紅軍。反革命的主要武裝力量，就在這種布置之中，向着紅軍和蘇維埃進攻，並且他們有精良的武器，飛機毒氣彈等還有帝國主義的軍艦和軍隊做後盾。同時，如果認為國民黨這樣大規模的進攻，就可以消滅紅軍，因此，散布恐慌情緒和失敗主義，主張退守偏安的『上山政策』，或者簡直承認軍閥混戰終了，反革命進攻紅軍是可以開始穩定他們統治的局面，——這就更露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離開散布國民會議幻想的陳獨秀託洛茨基派，只有一步了。事實上，部分的講來，如果單單拿紅軍進攻長沙的形勢來比較，當然現在這一部分的紅軍，是從進攻轉變到防禦的戰爭了。然而，長沙戰爭之後，接着十月初旬，就是紅軍佔領吉安吉水峽江，從湖北的通山通城，經過湖南的平江瀏陽，江西的修水銅鼓，聯絡上高萬載安福，這樣有經過贛西南，而連接閩西和廣東東江的形勢。十月下旬，贛東北的紅軍曾經佔領彭澤，同時，鄂西的紅軍侵入湖南佔領了南縣和華容。其他

地方的紅軍蘇維埃都有發展和擴大。而且最近上海紗廠（如統益怡和等），絲廠，以及其他工人，都有日益廣大的羣衆鬥爭和罷工發展，青島香港有新的罷工和示威，天津雙十的示威運動亦形成羣衆的武裝衝突。汕頭又有擴大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爆發。總之，長沙戰爭之後，我們看見反革命和革命兩方面，都調動着全國的力量，更進一步的接近決定勝敗的鬥爭，而紅軍的革命戰爭——反對國民黨進攻的戰爭，就是這些鬥爭的樞紐。無產階級必須調動自己的全部力量，農民兵士的廣大羣衆，以及城市貧民的鬥爭，去擁護紅軍的革命戰爭，並且認真的去領導和組織這個戰爭。帝國主義國家裏面經濟恐慌的深入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印度安南台灣等的羣衆鬥爭和暴動的生長，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衝突劇烈，中國各派軍閥的矛盾發展，——這些情形，是中國現在革命戰爭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之下，中國無產階級如果能够正確的領導農民戰爭，而且具有計劃有系統的去組織這個戰爭，如果能够發動並且領導全國極廣大的羣衆鬥爭，堅決的實行爭取羣衆而鞏固的向前進攻的策略，——那麼，一定可以擴大革命戰爭，促進革命總進攻的形勢，使國民黨這次的進攻紅軍，不但要遇到嚴重的反抗力量，而且要轉變到保守反革命統治都來不及的形勢。至少，『革命首先在一省幾省勝利』的前途，要在廣大的範圍之內實現出來。

這樣，領導和組織革命戰爭的任務。很具體的很迫切提到我們的前面了。

領導和組織革命戰爭的任務，首先，就是要在重要城市之中，不脫離羣衆的日常鬥爭，而和工人羣衆部分鬥爭密切聯系着，進行示威罷工反抗運兵運械拒絕製造兵器的反對進攻紅軍的運動，領導着起全國兵士農民貧民羣衆的鬥爭，來擁護紅軍的革命戰爭。而且要把這些鬥爭，用準備中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運動，去綜合起來。這就是要實行獨立領導羣衆鬥爭，實現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發展工廠委員會的運動，——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必要步驟。這就是要努力去領導農民抗租抗稅抗債的鬥爭，運用農民委員會的組織方式，而進到創造新的蘇維埃區域（地方暴動），深入土地革命。這就是要領導貧民羣衆，和一切勞動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以及兵士羣衆直接起來反對進攻紅軍，投到紅軍裏去的運動。尤其是在進攻紅軍的前線，要組織起廣大的羣衆鬥爭，阻擋軍閥軍隊的通過和前進。這樣，廣大的全國羣衆，將要在自己的日常鬥爭之中，實行參加革命戰爭，選舉出自己的代表，去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集中一切運動在蘇維埃政權鬥爭的旗幟之下。「擁護蘇維埃，反對國民會議」，將要成爲羣衆參加革命戰爭推翻國民黨的廣泛口號。

領導和組織革命戰爭的任務，尤其要求無產階級努力去建立並且鞏固蘇維埃的根據地。一切蘇維埃區域，都要鞏固的向外擴大，尤其要在最廣大的最有保障的蘇維埃區域，建立臨時中央政府的根據地——全國蘇維埃大會的召集，主要的任務，就是要選舉

蘇維埃的臨時中央政府。蘇維埃根據地的中心問題是：（一）建立和廣大羣衆密切聯系的政權——工農羣衆自己的政權；（二）改造和加強工農紅軍。使他成爲政治上絕對堅定的，共產黨有最高威信的軍隊。自然，爲着建立鞏固的蘇維埃政權，必須澈底實行適當的經濟政策（容許自由貿易，實行勞工監督生產和統一的累進所得稅），深入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歸農民自己平均分配），發展工人的階級鬥爭（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和勞動保護法），取消帝國主義的一切特權，『一直到把他們的企業收歸國有，如果他們破壞中國蘇維埃政權的法律』。這就是要發動更廣大的階級鬥爭，開展反對富農的鬥爭。爭取廣大的貧農中農羣衆，獨立組織雇農苦力；把一切投機分子和富農從政權機關裏肅清出去。自然，爲着要鞏固紅軍，就必須改良紅軍的社會成份，加強工人幹部的領導，提高黨對於紅軍的威信。只有這樣，真正羣衆自己的政權——蘇維埃政權集中起來，肅清蘇維埃的一切反動勢力，造成堅強的紅軍，然後革命戰爭的過程之中，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和組織作用，能够充分的擴大和鞏固起來。

蘇維埃根據地的建立，對於組織革命戰爭有極重大的意義。因爲只有這樣鞏固的根據地，才能保障軍事指揮的集中和統一，使工農紅軍的各部隊，以及羣衆的武裝力量，能够互相配合着行動起來，主要部隊的進攻，有相當的別動部隊的游擊來適應，有嚴密的完備的探報系統來輔助，有更有組織的鞏固的革命後方，去供給糧餉軍械，免除一

切游擊戰鬥的散亂狀態；而且政治上的影響和指導，不但一般的可以引起全國勞動群衆更加熱烈的擁護，而且特別對於戰線之中城市工人的鬥爭，可以互相聯系和配合。這樣，就可以免除長沙戰爭之中的錯誤和缺點，不至於仍舊是『無後方的作戰』，而受到可能的暫時的部分失敗。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能够這樣去組織革命戰爭，在廣大的全國羣衆擁護之下，必定可以打破敵人的進攻。更加迅速的轉變到革命總進攻的形勢。

『現在，不澈底的去鞏固蘇維埃根據地，不認真的去加強和改造紅軍，……而使單純擴大戰鬥的政策束縛了自己——這是很有害的』。這『決不是割據偏安的和平建設，恰恰相反，只有在鬥爭之中，才能够發展出堅強的政治上穩固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這種鞏固紅軍和蘇維埃政權，肅清蘇維埃區域內部反動勢力的方針，正是要用更加鞏固革命陣地的方法，使勝利的進攻得到多份的保證，這樣去真正擴大蘇維埃區域——實現更大規模的『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爲着全國蘇維埃政權的勝利而鬥爭。

『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他有他的過去和將來。這個前途是一個中國實際情形之中的具體的複雜過程。他的過去，是農民的游擊行動，以至鄉區蘇維埃政權的

建立和擴大。他的將來，却是革命戰爭和城市無產階級暴動所要開闢的全國革命總進攻的形勢。所以，他在實現的開始，不一定就是佔領大工業的政治中心城市，可是，他的發展，却必須有進而取得工業行政中心的方針。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一九二八年七月），不但斷定中國革命的新高漲不可避免的要到來，而且指出新高漲的一種可能的具體形勢，就是說：『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的鞏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漲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能够在長沙戰爭（一九三〇年七月）的兩年以前，就切實的認清當時『蘇維埃根據地及其少數的工農革命軍，要成爲這一新的高漲的重要成份』；並且就特別的注意到『城市領導作用的重要，和無產階級群眾的革命高漲，將要表現決定勝負的力量』。兩年以來中國形勢的發展，完全全證實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的路線，亦就是證明託洛茨基陳獨秀以及其他右派，輕視農民戰爭，認爲是『無政府主義的盲動』，並且斷定革命的新高漲是『遙遙無期』『已經推遲』的路線，完全破產。

所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三〇年的七月，已經要特別指出現在『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根據地）……的任務，有第一等重要意義』；並且說明『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上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務，解決這個任

務，就一定可以保證革命的強大的開展」。

這裏，正是組織和領導革命戰爭的問題，亦就是在現階段之上無產階級怎樣去適當的領導農民戰爭的問題。現在的農民戰爭，是無產階級所能夠並且應當運用的一種力量，無產階級對於這種力量的組織和領導是否充分，是否鞏固，正是幫助無產階級本身積極準備暴動的一個緊要問題。如果在中國現在形勢之中，中國工人階級深入着城市和鄉村的勞動反對資本的階級鬥爭，同時，就能夠對於農民群眾反對地主的農民戰爭，加以充分的領導和組織，那麼，他就可以在適當的時機，調動廣大的工農紅軍，來幫助自己在城市之中的羣衆發動。那個時候，勝利的無產階級暴動，就有可能很容易的統率起農民戰爭和反帝國主義的一般鬥爭，而進到肅清國內軍閥等的反革命，以及反抗帝國主義干涉的更廣大的革命戰爭，以至能完成中國革命全國的勝利。

無產階級和中心城市，是中國革命之中決定勝負的力量。一方面，如果農民戰爭得不到城市無產階級勝利的暴動的領導，那末，他就可以長期的停頓在零星散亂的革命進攻，即使能夠開闢革命總進攻的局面，也不能夠最終的完成對於帝國主義國民黨整個統治的總襲擊。別方面，現在農民戰爭的特別發展，不但已經是中國革命新高漲的重要成份，而且是這個高漲現在的特點；這固然是革命勢力的一種弱點（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沒有和他平衡，和他匯合），然而正因為如此，必須在革命總進攻之前，無產階級對於

這種農民戰爭，就經過自己的政黨，去努力加強自己的領導作用和組織作用，這正是準備革命的總進攻的最必要的條件之一。

所以，現在中國革命在「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和農民戰爭特別發展的特點，還表現着相當的聯系。原因是在於：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開始崩潰的地方，還只是他們陣地比較薄弱的區域——農民羣衆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之下，就能夠建立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同時，中國的工業中心城市——正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軍事政治力量集中的地方——這些地方的革命勢力，却還沒有能夠推翻反動政權的充分力量。可是這當然只是暫時的現象。農民戰爭之中，無產階級的領導和組織作用的加強，將要使反動統治的崩潰更加擴大而深入，將要使帝國主義國民黨喪失更多的更重要的陣地。那個時候「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形勢，就要更進一步而開闢革命總進攻的陣勢。這種陣勢的形成，就不能不同時依賴城市無產階級自己組織力量的加強，武裝準備的加緊，羣衆鬥爭的開展和擴大，一直到武裝暴動的爆發。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日。 秋白。

金貴銀賤之研究

一九三一年五月

中國經濟協會出版

布爾塞維克第四卷第二期

目次

目前政治形勢與我們的任務

思 美

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的鬥爭

顧秋莫夫

第三時期的中國

澤 民

中國經濟的性質

伯 虎

關於「金貴銀賤」與無產階級運動的幾個問題

澤 民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和機會主義的新活動

啓凡譯

目前政治形勢與我們的任務

思美

一

在世界經濟恐慌的背景上所展開的中國經濟恐慌，無疑的現在是更形深入了。工廠，礦山，各種企業與商店等的倒閉，還是經常的現象。中國工廠出賣給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移殖他們的資本到中國來的新聞，時常出現於報章雜誌上。金貴銀賤的困難，至今無法解決。農業經濟的恐慌，因農業產品價格在世界市場上的繼續低落，因軍閥官僚地主豪紳高利貸者的加緊剝削，因國內戰爭的繼續延長，因水災旱災的經常發生，而更加嚴重了。

工商業的恐慌的深入，使失業工人的數量空前的增加。資本家對於工人階級的進攻是一天一天利害了。工資因銀價低落，物價高漲的關係，無形中減低了百分之五十。工作時間實際上是比以前延長了。生產合理化的實現，大大的增加了勞動的強度，使工人的勞動條件比以前更形惡劣了。資本家用調通班等名義大批開除工人，已經變成了經常的現象。在農村方面，農村經濟的長期的恐慌，使整千整百萬的農民急速的破產。即以西北幾省而論，因為沒有飯吃而等着活活餓死的有六七十萬人！

在這種資本進攻的條件之下，中國工人運動的向上發展，是必不可免的事。自從去年紅五月之後，中國工人運動因為立三路線的實行而受到了相當的挫折，以至使一個偉大的工人運動的浪潮不能匯合起來而成為進攻統治階級的強大力量。但為時不久，這新的工人運動的浪潮又澎湃着衝擊前來了。在年關鬥爭中間，我們看到了工人運動新的發展。在北方唐山豐台等處鐵道工人和大沽鐵廠工人的鬥爭，天津四大紗廠的同盟罷工，電車電燈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的鬥爭以及最近自來水工人的怠工。在南方，無錫有四十五家絲廠參加罷工。在上海年關鬥爭中差不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企業都參加鬥爭，而且很有些地方還得到了勝利。一般的說來，雖是大多數的鬥爭，現在還是自發的，散漫無組織的，經濟的，赤色工會的影響很薄弱，對於黃色領袖與社會局等還有相當的幻想，然而在目前工人鬥爭的形勢已經不是簡單的抵抗，而是在反攻中，具有進攻的形勢，而且在某些產業還具備了同盟罷工的可能條件（如像在絲業方面）。除了工人運動的新發展外，兵變潮流的擴大，實是目前革命形勢的新的指標。雖是兵變行動在去年一年內也有發生過很多次，但是像目前這種廣佈的，包括人數如此衆多的兵變，是從前所沒有過的。譬如在今年一月六日，陝西鳳翔地方發生三團人的兵變。二月二十七日山西臨安發生四團人的兵變。山西高平於三月內發生孫殿英部兩團人的兵變。安徽六安，第四十六師一團人，河南新十二師袁英部的兩團人，以及第

六十八師趙冠英一旅人，福建古屏余卓部兩連人的兵變等等。這些兵變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爲生活惡化，軍餉不發，厭惡戰爭，以及土地革命對於他們的影響而來的。

除了兵變潮流的高漲外，我們更看到紅槍會等的新的活動。中國農民羣衆，在地主軍閥官僚商人與高利貸的剝削下面，實在不能找到任何出路，於是不能不加入紅槍會等帶有宗教性的祕密組織，而相當的實行自衛。這種運動散佈最廣的，卽爲山東、直隸、河南數省。除紅槍會等外，土匪的數量更是不勝枚舉。

兵變數量的增加，紅槍會的活動，雖不完全表示出農民運動的發展，因爲在兵士與紅槍會內部，除了失業破產的農民之外，還有不少流氓無產階級的成份，但無疑義的，這些運動中間很明顯的表示出了農民要求出路的鬥爭。並且除了兵變數量的增加與紅槍會等的活動外，農民運動的發展，也是無疑的事實。在白色區域，農民抗租稅的鬥爭，真是不勝列舉。舉例來說，如像福建很多地方，農民反對煙苗捐以及剝苗令等的鬥爭，河南四川等省很多農民自發的鬥爭，以及搶米等的騷動，往往與當地軍隊發生直接衝突。

目前革命運動的又一特點是江西吉安紅軍的大勝利，擊破了蔣介石第一次『圍剿』蘇區的計劃。現在京漢路上的紅軍的大勝利，已使蔣介石第二次『圍剿』蘇區的計劃，遭到了嚴重的打擊。這幾次紅軍的勝利，決不是偶然的事。不論取消派右派如何的

咒罵蘇維埃與紅軍，說他們是沒有羣衆的，說他們是土匪流寇，說他們在敵人攻擊之下必然消滅等等，蘇維埃與紅軍是已經發動了廣大的羣衆，是有千百萬工農的擁護，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紅軍與蘇維埃政府沒有廣大羣衆的擁護，他們在蔣介石幾十萬人數衆多，而軍械又精良的軍隊包圍之下，能夠維持到現在，而又能得到這樣大的勝利嗎？蘇維埃與紅軍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這是中國革命目前最主要的一個特點。

當然，在蘇維埃區域中，我們絕不否認，我們所有的一切弱點。最主要的是我們的鄉村中間的富農路線，我們還沒有把廣大的工農羣衆完全組織起來，蘇維埃尙還不是廣大工農羣衆的政權，紅軍的成份尙還缺乏工人的骨格，而且黨的力量還是很薄弱。但是這些弱點，並不足以否認蘇維埃與紅軍所有的偉大的成績，並不足以否認蘇維埃與紅軍是中國工農政權與中國工農的階級軍隊。

當然，在中國革命高漲的形勢之下，白色區域內工農兵運動的發展，紅色區域內蘇維埃與紅軍的勝利與鞏固，都是非常不平衡的。工人運動雖是現在又在開始發展，但他同全國的農民運動比較起來還是落後的。農民運動與兵士運動的發展，在各地也是不平衡的。河南安徽福建江西等省較之江蘇浙江等省，無疑的是比較的發展。在蘇維埃區域內發展與鞏固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鄂豫皖的蘇區有很大的發展與勝利。

江西衝破了敵人第一次的『圍剿』。但是鄂西與閩西是遭到了部份的失敗。

一一

中國革命運動的新的發展的局面，當然必然引起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以及一切反革命份子的恐怖，仇視與加緊的進攻。在目前政治形勢中間，我們所應該抓住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就是反革命對於蘇維埃與紅軍的死命的進攻。反革命與革命兩方面的主要策略，都是依靠於這關鍵而旋轉的。

自從蔣介石『平定』馮閻，中國在表面上似乎統一之後，反革命的主要策略，就是在用所有的一切力量先來消滅蘇維埃與紅軍。去年國民黨的四中全會決定了兩件最主要的事，就是消滅『共匪』（現在改名為『紅匪』）與召集國民會議。實際上，這兩件事是一個東西的兩面。國民會議的召集，固然表示出蔣介石利用這東西來反對其他軍閥，來牽制其他軍閥的企圖，但主要的，是南京政府想借此來同蘇維埃對立，來團結一部份反革命力量，來欺騙一部份小資產階級與農羣衆。簡單的說來，國民會議的旗幟是蔣介石用得來進攻蘇維埃區域與紅軍的。

除了國民會議之外，蔣介石還利用了什麼工會法工廠法，在一些欺騙的詞句之下，向中國的工人階級進攻，以此來取媚於帝國主義者與資產階級，並以此來『平靜』他的後

方。白色恐怖，在全中國現在是比從前更利害了。絲毫的對於南京政府的不滿意，立刻遭到南京政府軍閥的嚴重的壓迫。就是一切關於『剿匪』的實際消息，現在也不能登載了。因為在這時候，任何失利的消息的傳出，對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的欺騙宣傳，都是很大的打擊。任何的工人的鬥爭的發生，對於他都是很大的威脅。但是在他們這種屠殺壓迫政策的底下，並不能阻止他們提出什麼約法問題，來拉攏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來塞住胡適新月派的要求約法的臭口。此外，他還舉行了什麼絲業借款航業借款等，一方面來彌補他自己破產了的財政，一方面來『幫助』民族工業的維持。

對於帝國主義方面，蔣介石爲了要借一筆大借款以解決他目前財政上的困難，以進攻蘇區與紅軍，更進一步的投降了。代表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近來對於英日也表示了向所未有的馴良態度。他很快的解決了滄案與漢案，他在電信、航運、工業方面允許了英日資本家以很多的讓步。近來在南京政府外債整理委員會上，正討論着如何來給各國過去無擔保的借款以擔保。幾萬萬西原借款的償還，在原則上已經不成問題，現在爭論的祇是償還時的數目而已。現在爲了大借款的進行，不論這借款是金的或是銀的，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在準備着新的大出賣。正預備把全中國所有的鐵路，所有的富源，交到外國帝國主義的手裏，爲的是要消滅『共匪』，以維持他的運命。

對於各軍閥方面，對於北方的張學良以及西北馮閻的舊部，蔣介石極力採取收買與

拉攏的手段，甚至在有些地方，不能不表示讓步。對於廣東廣西等省許多廣東派，西山派以及桂系的許多軍閥，他使用威嚇與利誘的方法，破壞他們內部的團結，使他們西南各派軍閥反蔣的大聯合變為不可能。他的主要的策略，也同樣是在盡力和緩軍閥內部的衝突與矛盾，來進攻蘇維埃與紅軍。

雖是這樣，雖是蔣介石利用一切方法來和緩反革命內部的矛盾的發展與爆發。但是反革命內部不能和緩的矛盾，還是很明顯的表示了出來。胡漢民與蔣介石的衝突，黃紹雄與陳濟棠的衝突，四川各軍閥中間已經開始了的戰爭，雲南雲龍的下野，為了財政，爲了編造，在南京與張學良間所發生的暗潮，甚至在『剿共』軍內部何健與何成濬等的鬥爭……，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

此外，南京政府的財政的恐慌，使得他除了加緊剝削工農以外，不能不想盡一切方法，來搜刮金錢。他甚至主張鴉片公賣來刮一筆大錢。他的裁釐加稅政策，實際上變成了加釐加稅。統稅，特稅，營業稅，運輸稅，出口稅，很多很多的名目，中國工業與農業不但得不到什麼保護，而且受到很大的打擊。對於這樣繁重的稅則，就是中小工業資本家與商人也表示出不滿，至於大多數貧苦的消費者更不要說了。因為稅收的加重，就是商品價格的昂貴，商品價格的昂貴，就是購買者的減少，就是『生意蕭條』，結果就不得不閉門歇業。在青島無錫等地，一般工業資本家與商人，因為火車運費

加價百分之二十，發生過罷運的『風潮』。當然，這一切並不足以阻止南京政府『振興實業』的廣大的宣傳！

立刻取得大借款的企圖，因為英美的衝突，一時也不能實現，雖是小的，幾千萬的借款，差不多是天天成交的。帝國主義者決不能像『孫總理』蔣介石所想像的那麼簡單，肯決然『掃除一切成見』，把他們的資本借給蔣介石。大借款的實現，我們知道是有可能的，因為帝國主義者同蔣介石一樣的希望早日『肅清共匪』，使他們能安心的剝削中國的工農民衆，但必須要經過一個相當曲折的時期，經過帝國主義內部的『協商』，與蔣介石的買價。在蔣介石方面，雖是縮頭做烏龜都願意，但是帝國主義者內部絕不能一時妥協起來，而且他們也想利用蔣介石的困難來做一點投機生意，以便取得更多的代價。

可見，雖是蔣介石用盡一切力量，團結反革命的內部來進攻蘇區與紅軍，但是反動營壘中間，實潛伏着很多的危機。祇是因為統治階級對於革命的恐怖與仇恨，使他們內部暫時團結起來，來實行幾個月內『肅清共匪』的工作。

帝國主義者國民黨用了這樣大的力量，第一次調動了二十五師的軍隊進攻蘇維埃與紅軍，並且蔣介石限定在三個月之內完結這工作。但是結果怎樣呢？結果蔣介石是失敗了。英勇的紅軍與革命的工農羣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擊退了國民黨的進攻

，解除了他們一部份的武裝，俘虜了張輝瓚等。紅軍在這一次勝利中間，反擴大了他的武裝，與戰鬥的經驗。

這失敗在帝國主義者與中國反動階級的內部引起了更大的恐怖與仇恨。像一隻喋血的瘋狗似的，蔣介石現在又動員他所有的補充力量，定出了他們第二次進攻蘇維埃與紅軍的新計劃。這一計劃比較從前的是更加利害，更加殘酷，更加血腥的。他現在更大規模的使用了毒瓦斯，更殘酷的屠殺着當地貧苦的工農羣衆，以免去他們再受到革命的影響，更有計劃的來封鎖蘇區，以使用飢餓的手去扼住他們的喉嚨，強逼他們降服，他們更用盡一切力量來幫助蘇區內所有反革命的力量，如像改組派，第三黨，取消派以及地主富農等舉行反革命的暴動，並竭力組織民團，在蘇區內實行游擊戰爭，用這些方法來搗亂我們的內部。他們更用挑撥離間造謠等方法，來破壞我們的內部，如最近關於彭黃的叛變，反對毛澤東的鬥爭等的謠言等等。

但是，這第二次的進攻能夠勝利嗎？

平漢線上英勇的紅軍又擊敗了白軍的進攻，活捉了岳維峻！這一部份已經回答了帝國主義國民黨能否勝利的問題。

在反革命營壘中間，除了以武力屠殺民衆，以血與鐵來鎮壓一切革命運動的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外，還有一支比較更危險的軍隊，用反對蔣介石包辦的國民會議，主張『真正民衆』的國民會議的方法來欺騙民衆，向蘇維埃進攻。這就是改組派，第三黨，人權派。托陳取消派與右派叛徒！

你主張國民會議，我是反對國民會議，現在已經變成了革命與反革命的分水線。拿國民會議做帽子，在反革命營壘中間結所有對南京政府立於反對派地位的一切反革命力量，實是目前政治形勢中一個主要的特點。

改組派自從同閻馮兩大帥一場春夢醒了之後，暫時的銷聲匿跡了下去。雖是他在蘇維埃區域內積極的組織着內部的反革命暴動，準備以此來推翻蘇維埃政權與破壞紅軍。現在當全國革命運動有了新的發展，反革命統治發生了新的動搖，蘇維埃與紅軍得到很大的勝利時，改組派又起來開始他們的反蔣論調了。他們甚至起來反對蔣介石的國民會議，像煞有介事的主張甚麼總理的真正國民會議！

改組派的這種欺騙，我們在二年以前當改組派大出風頭的時候，曾經指出：這個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改組派這樣大吹大擂的叫喊，反對蔣介石，並不是爲了要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是爲了要維持這統治。過去的歷史告訴過我們，那時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目前的形勢又使改組派感到有起來反對蔣介石，維持統治階級統治地位

的必要。改組派的領袖汪精衛近來在『總理逝世紀念告同志書』一篇文章上寫道：

『南京當局，已做成了本身崩潰的趨勢，而反黨的軍事形勢潛在於北方，共產黨猖獗於江西，又都在南京政府當局孕育之下發榮滋長起來。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局面之下，我們於檢查過去一年工作之後，仍然繼續的提出工作的總標準：樹立民主政治，推倒個人獨裁』。（見三月十二日『華東日報』）

改組派反對南京政府的蔣介石的獨裁，爲的要救濟反動統治於滅亡，爲的要更利害的進改革命運動，更快的消滅蘇維埃與紅軍，沒有像汪精衛自己說明的再明顯了。他的甚麼真正的國民會議的宣傳，除了用來反對蔣介石的獨裁以外，主要的是在反對真正代表工農兵利益的蘇維埃，是在欺騙與誘惑一部分小資產階級與工農羣衆，使他們落在改組派的反革命的圈套中而爲改組派所利用。

同改組派的政綱大同小異的，卽爲第三黨，第三黨近來也大施活動，宣傳他們的勞動羣衆的國民會議。第三黨實際上不過是改組派的左翼，是改組派失敗之後的候補者。他們的反革命作用，他們的危險，是同改組派沒有甚麼分別的。主張甚麼勞動羣衆的國民會議的第三黨，他們在福建屠殺工農的成績，他們在蘇區組織反對真正代表勞動羣衆利益的蘇維埃，舉行反革命的暴動等等，難道還不足以表示出他們反革命的眞面目嗎？

不論是改組派或是第三黨，他們除了依靠另一個或另一羣軍閥之外，就不能有其他的力量來推倒蔣介石的獨裁。過去改組派投身馮閻兩個大軍閥的門下，當他們的姨太太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了。現在他們又玩這一套把戲，又捲土重來拉攏南方各大軍閥，北方張小帥，以組成反蔣的大聯合做倒蔣的運動。那時他們的『真正國民會議』，當然是李記張記陳記的國民會議，同蔣記的國民會議決不會有甚麼區別！現在改組派等所組織的『國民會議國民自決會』，實際上是上海野雞拉客人到家裏去過夜的迷人的媚眼。這些客人（當然也是汪精衛的『國民』）當然就是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張學良，以及馮閻等老相好！

改組派的這些把戲已經玩的令人惡心了，但是他們還是一次兩次的玩，爲的是要反對革命運動，反對蘇維埃，欺騙民衆，以鞏固動搖着的反動的統治。

至於那些『左』到比托洛斯基主義再不能左的『革命的』托陳取消派呢？那我們可以看下面的一段話：

『國民黨的國民會議是假冒名義的國民會議，換言之，即假冒人民名義的一黨一派的分贓會議……真正的國民會議，只有無記名普選的』（『我們的話』二十二期政治通告第四號）

無記名普選的國民會議，就不是一黨一派的分贓會議，就是考茨基的『純粹的德謨

克拉西』，這當然是『左』派的真正老牌的『革命理論』，但這對於我們不是重要的。對於我們重要的就是陳獨秀主義者與托洛斯基主義者曾經是主張參加這個『一黨一派的分臟會議』的。這是百分之一百的托洛斯基主義者，托洛斯基先生曾經在他給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的信上所發的一大篇言論的中心點！

但是革命的形勢發展，和改組派第三黨的宣傳，教育了中國的取消派使他們不能不更變他們的理論，使他們『左』傾。他們現在也同改組派第三黨一樣，反對蔣記的國民會議，要求真正的國民會議了。他們現在竟這樣說：

『在目下國民黨武力統治下，要召集一個全權普選的國民會議是不可能的……：召集國民會議的先決條件，必須恢復一切政黨的自由，停止警察與軍人對政治的干涉』。（同上）

這幾句話，如若在下面沒有『我們的話』的署名，那就一定要說是改組派第三黨與胡適之人權派的偉論。在國民黨統治下要求『一切政黨的自由』，『停止警察與軍人對於政治的干涉』，真是白天做夢！但如若蔣介石稍為聰明一點，那允許『反對派』取消派的自由，實際上也未嘗不可，因為這對於蔣介石祇有好處，沒有壞處的。

可見托陳取消派的主張同改組派第三黨以及人權派的主張，根本上實際沒有甚麼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們公開的主張相互間的聯合，以進行他們反蘇維埃與共產黨的工作

。在同一種文件內，他們寫道：

『在目前的階段內，即是說在國民黨以國民會議相號召的一個短期間內，力爭政·黨·政·治·的·自·由·，與人民普選是行動的中心口號。在進行這種民主鬥爭時，可以與資·產·階·級·的·左·派·，如改·組·派·，第·三·黨·，人·權·派·等作事務上的聯絡，如組織宣傳國民會議的演講會，組織人民自動的選舉會等』。（同上）

在政治上已經有同樣的觀點，當然在事務上也必須聯絡了。這反革命的出路，實是『左』的托陳取消派必然要走的，而且是走了的。

除了『左』到反革命的托陳取消派外，還有一支新的反革命的部隊，那就是以羅章龍為領導的右派。這右派在反革命中間現在已經盡了很大的作用。它除了在理論上否認中國革命的高漲，反對蘇維埃與紅軍，反對中國工人運動的罷工鬥爭，反對中國共產黨以外，更在實際上做反蘇維埃與紅軍，反工人運動，反共產黨等的鬥爭。這些叛徒們，實際上現在所做的是工賊，偵探等所做的工作。他們幫助國民黨破壞我們的黨部，屠殺我們的同志，甚至用綁票方法向我們同志敲竹槓！他們設法鑽到紅軍裏面去，幫助蔣介石分裂紅軍的內部。……難道還要其他的證據，來證明右派的反革命嗎？

這些派別，實是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維埃與紅軍中所有的反革命的尾巴。他們用對蔣介石取反對派的方式，來欺騙民衆，來擁護國民會議，來進攻蘇維埃與紅軍。

我重複的說，這些派別是在反革命營壘中比較更危險的派別。

四

從上面的這許多分析中間，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黨的中心任務是擁護蘇維埃與紅軍。我們黨在蘇區內必須用最大的力量，消滅立三主義下而所發榮滋長出來的右傾的危險與立三主義的『左』傾，執行國際與四中全會所給予我們的指示。祇有澈底反對帝國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執行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的土地法令，勞動法令，經濟政策，關於紅軍的決議，發展游擊戰爭，組織赤色工會，僱農工會，苦力工會，貧農團，真正由廣大的工農兵產生的蘇維埃政府，與有工人骨幹的紅軍，發動千百萬的工農羣衆起來爲了集中蘇維埃政權，爲了蘇維埃中央政府而鬥爭，肅清一切反革命的A B團，改組派，新共黨，第三黨的勢力，堅決執行反對富農的路線，鞏固與發展我們的黨與團的組織，我們才能衝破蔣介石的第二次『圍剿』，鞏固與擴大我們的蘇維埃與紅軍。

在非蘇區方面，我們也同樣的要和李立三主義的『左』傾，與在『左』的掩蓋之下的右傾的頹喪與消極鬪爭，我們必須反對對於中國工人運動過高的左的估計，與過低的右的估計。必須同忽略目前擁護蘇維埃與紅軍的中心任務，看輕反帝的鬥爭，對於目前的形勢表示悲觀失望，懼怕擴大鬥爭的心理，在實際工作中消極怠工，忽略兵運與農運，

忽略游擊戰爭的傾向等等，做堅決的鬥爭。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指導工人的日常鬥爭，使這些鬥爭從散漫無組織的變為有組織的，從經濟的變為政治的，從一廠的變為一業的鬥爭，並擴大這些鬥爭到廣大的示威與罷工的運動。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反對國民黨，改組派，第三黨，人權派，托陳取消派與右派的反革命的宣傳，尤其是關於國民會議的宣傳，揭破他們的反革命的面目，與他們在蘇維埃區域內所做的反革命的實際行動！

自從在四中全會上，國際路線戰勝立三路線之後，我們的黨在很多工作上，已經開始了轉變。在目前這一階段，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在堅決的反對被立三路線的左所遮蓋着的對於實際工作的消極與怠工。共產國際的路線，在思想上已經給與了立三路線以致命的打擊。現在在我們黨內差不多誰也不敢再出來反對國際路線，說這路線是不適用於中國的了。但是承認這路線的正確是一件事，在實際工作中執行這一路線又是一件事。在我們黨內，我們還看到不少同志，雖是在口頭上承認了國際路線與四中全会的路線的正確，但是對於國際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執行却是怠工的。堅決肅清兩派，反對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實是我們黨在兩條戰線的鬥爭中的最主要的任務之一。

其次，要在實際工作中真能執行國際路線，我們必須堅決的肅清過去立三時代的工作方式的殘餘。那些對國際路線的執行怠工的人不必說了，就是那些真正爲了國際路

線的執行而鬥爭，非常忠實於黨的同志，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因為太急於要求獲得很大的成績，因為不能澈底了解依靠羣衆，經過羣衆的工作方法，不能完全了解黨與羣衆團體相互間的關係，不自覺的露出了立三主義的狐狸尾巴。這種例子，我們可以舉的很多。比如，最近在很多鬥爭中，我們同志因為不能澈底了解輔助組織和赤色小組的區別，以至破壞了輔助組織。在工人羣衆中日常的經濟鬥爭，我們機械的把擁護蘇維埃和擁護紅軍的口號同工人經濟的要求並列起來，以至破壞了經濟鬥爭。行動委員會的組織，還是用指定自己同志來組織的方式，而不經過羣衆的路線。徵調工人到紅軍去，不能完全免去招兵買馬的舊調。一切這些殘餘，都是我們黨完成目前奪取千百萬工農羣衆的中心任務的障礙物。

最後，我們現在必須找出種種新的工作方法，真正來發動羣衆和組織羣衆的鬥爭。必須盡量應用各國共產黨，尤其是蘇聯共產黨的經驗，到中國來。黨的領導機關必須找出種種新的工作方法和經驗，介紹給於全黨的幹部。同時必須盡量發展下層幹部的創造性，使他們能自動地用各種各樣的新的方法去接近羣衆。新的工作方法的取得，單是靠領導的力量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多多的相信階級的創造力，並且用種種方法去把它發展出來。只有這樣，才能拿新的工作方法去代替舊的，立三主義的工作方法殘餘才能從我們黨的中間完全肅清出去。

發展黨內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實是啓發黨員羣衆創造力的一種最好的方法。

在立三主義統治的時候，沒有黨內的自我批評，一切都是命令的，官僚主義化的，所以一切下層黨員羣衆的創造力也就完全抹殺了。反對立三主義，必然要堅決反對這種對於自我批評的壓制，反對那些只以爲自己是知道了一切的工作方式而不相信羣衆創造力量的指導者。

革命競賽和衝擊隊等的方法，必須更廣泛的應用出去。這會引起同志對於自己所擔負的工作的責任心，會推動他們自動地想出種種方法去實行他們同其他組織所訂立的條件。革命的熱情是我們所必要的，這熱情會幫助我們找到組織羣衆，領導羣衆的新出路。

在全黨像一個人一樣，用革命的熱情，澈底的實行兩條戰線的鬥爭以執行國際的路線時，我們堅決的相信，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國共產黨之布爾塞維克化的鬥爭

顧秋莫夫

『在人口異常衆多，社會條件異常特殊的東方各國裏，將來的革命，無疑的要表現出一種比俄國革命更加厲害的特殊之點來：關於這一點，完全是歐洲的市僧們所夢想不到的，不消說，模仿考茨基而寫的那一種教本，在過去一個時期中是一種很有益處的東西，有人曾經這樣想：這一種教本，已經預察到今後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有的形式，現在，已經是埋葬這一種意見的時候了。誰如果還要這樣設想的話，那我們把這種人叫作十足的傻子，這是非常適合時宜的了。』（列甯：論俄國革命。見列甯全集第十八卷，第二編第一百二十頁）

（一）

中國革命含有許多極大的特點；因爲有這些特點，所以牠不僅和西歐各國革命不同，而且就是和俄國革命比較起來也是很不一致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期，俄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條件之下進行了自己的鬥爭，爲的是要奪得工農民主的專政。

這種民主的專政，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的環境之下（由於許多條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階級各政黨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實現了。這種民主專政存在的時期是十分短促的，而且是在一種特殊的「妥協的」偏狹的形式之下實現的，在兩重政權形式之下，在工農代表蘇維埃（甘願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的蘇維埃）與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合作的形式之下實現的。

一直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環境之下，俄國無產階級纔附帶地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澈底解決。

中國現時革命的行程便不是如此。

工農民主的專政在蘇維埃形式之下存在着，增長着，發展着，牠正在自己的旗幟之下收集成千百萬勞動的羣衆，使同時存在於非蘇維埃區域的，還很強大的（主要的是由於帝國主義之幫助），殺人無厭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不得不胆戰心驚，坐臥不甯。對於這一個不斷發展的工農專政，足以左右一切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之正確的解決，而解決這一問題的前提，就必須由無產階級握住農民運動裏面領導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曾經領導農民運動，來實行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平均重分一切的土地，中國共產黨將能擴展革命的鬥爭，將能發動幾千萬幾萬萬（不僅幾百萬，好似現在二樣）農民羣衆，不僅發動，而且在鬥爭中間把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去爭取土地，反

對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地主，——這樣一來，中國革命偉大的勝利便有完全的保證了。

要知道：正確的解決土地與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問題，乃是解決中國革命目前這一整個的，比較長期的階段（中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之全般任務的關鍵；而中國革命目前的形式，以及新的革命運動高漲過程中的許多困難，又在中國共產黨及無產階級前而提出了許多特別重要的組織的政治的任務，而這些任務，又把無產階級目前領導反帝國主義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務，具體化了。

在中共領導之下的新的革命高漲，已經獲得了許多重大的成績：蘇維埃政權已擴展到包含有四千萬人口的區域；紅軍已增加到十萬人以上；罷工運動正在向前發展，就罷工人數來說，中國罷工運動已居世界第一了。只有無產階級底仇敵或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才能抹殺羣衆運動這一些重大的成績，才能抹殺中國共產黨這一些重大的成績。

可是，在目前的中國，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蘇維埃政府，還沒有一個足以在全國範圍內領導武裝鬥爭以反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而又能在自己統治的區域裏澈底實行各種革命設施的蘇維埃政府，同時，中國紅軍，雖然正在發展與鞏固；可是，還有許多的弱點，還保存有許多農民游擊隊伍和軍閥僱傭軍隊底遺跡。中國的紅軍還沒有力量去向國民黨（更不用說帝國主義了）作一個最後的決戰。

其次，革命運動之發展，也是很不平衡的。南方各省已經充滿了農民戰爭的火焰；而北方的農民，却還沒有發動起來，而且，還有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工業中心裏面的工人運動，還很厲害地落在農民運動現有的規模之後，現在時局底特點，就是羣衆運動真正達到暴動程度的還只有單個的區域，在這些區域裏面，羣衆運動已經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取得了勝利，已經開始建設革命的軍隊和政府；可是，牠還不能給國民黨與帝國主義者以致命的打擊；因此，在目前，我們遠處在一個比較大的，「橫在國內戰爭總過程各個偉大戰爭之間」（列甯底話）的間隔裏面。

列甯在預察一九〇五年革命發展前途時所說的話，很可以應用到中國現有的環境上面來。列甯當時寫道：

『武裝暴動之採取更高度的更複雜的形式，武裝暴動之變爲長期的，籠括全國的國內戰爭，即兩部分人民之間的武裝鬥爭，這是完全必然而不可避免的。』

這個國內戰爭，必然是這樣一種過程：經過幾次大戰爭之後，就要經過一個比長時間的間隔，然後又開始一種新的大戰爭，並照這一種方式發展下去；同時，在這種比較長時間的間隔裏面，又要發生許多小小的戰爭。既然是這樣——而且無疑義地是這樣，那社會民主黨（這是列甯在一九〇六年寫的。顧秋莫夫註）就要努力造成這樣的組織，能夠最高限度地領導羣衆作這些巨大的戰爭，而且又能儘可能

地領導羣衆作這些小小戰爭的組織」

這種能夠最高限度地領導羣衆進行巨大戰爭與細小戰爭的組織究竟是什麼呢？關於這個問題，列甯在更早以前就回答過了。當俄國革命剛開始達到「民衆暴動最後發展階段」——組織革命軍隊的時候，列甯就說了以下的話：

『由這種隊伍（即指革命軍隊。顧秋莫夫註）來號召暴動，來給羣衆以軍事的指導；這一種工作對於國內戰爭（也如對於其他戰爭一樣），乃是必需的，這種隊伍要造成公開的全國鬥爭底支柱，將武裝暴動散布到隣近其他各區域裏面去；保證——首先也許只在國內不大的一個區域裏——十足的政治自由；開始用革命手段改造陳腐的專制的制度，儘量發展下層民衆底革命創造力量；他們在和平時期是很少機會表現這種創造力量的。革命軍隊只有認識了這些新的任務之後，只有很勇敢地将他們儘量提出之後，牠才能夠獲得完全的勝利，而成爲革命政府底柱石。

在民衆暴動目前這一階段，革命政府同樣是一個迫切需要的東西，正如革命軍隊一樣』（節錄列甯所著的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列甯全集第七卷第三八四頁）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這一個前途（就算在國內不大的一個區域裏，組織革命的軍隊與革命的政府）是沒有實現的；革命政府是沒有組織起來；而革命軍隊也沒有存在多久，而且牠所有的規模也是很小的。

可是，在現時的中國，情形却不是如此。在中國，存在有革命的軍隊及蘇維埃政權根據地，而這種根據地又在不斷地發生與發展，共產黨員正是根據這種事實來決定共產黨目前的任務。

中國所有各種重要的特點：全國分成許多帝國主義勢力的範圍，封建式分裂的狀態，中國反革命勢力沒有統一集中的政權，國內各地革命形勢成熟之不平衡，未了，中國疆域之廣大與人口之衆多，——所有這些，都是決定中國革命之特殊發展道路，特殊鬥爭形式與方法的因素，使其不同於其他各國的（例如西歐的）革命。

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革命這一些特點，根據擺在革命前面的各種困難，以及羣衆運動所已經得到的成績，便提出了下列的任務：

（一）組織常備的，紀律化的，工農的（就其成分來說），共產黨的（就其領導來說）紅軍。這個紅軍，必須在革命的蘇維埃區域裏面建立自己的強固的根據地。

（二）組織強有力的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必須要能夠在自己所屬各區域裏面，澈底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底各個基本的口號，必須以自己的行動來聯合與動員中國勞動的羣衆，使其去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鬭爭；

（三）在一切大的工業中心裏面，向前發展無產階級局部的經濟的鬥爭，更加緊使這些鬥爭革命化，將無產階級這些鬥爭與一般的政治任務聯繫起來，就是說，使其擁護蘇

維埃區域的鬥爭，爲達到蘇維埃政權（工農民主專政形式）底勝利而鬥爭，聯繫起來。

這是三位一體的任務，這是一個總的任務，把這一個任務實現出來，就可以使中國革命很有成效地發展前去；就可以使羣衆運動，使無產階級領導權所鞏固起來的羣衆運動，使無產階級經過國家政權而實現的領導權所鞏固起來的羣衆運動（紅軍及蘇維埃政府，都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得到一種極偉大的發展；就可以保證中國工農羣衆在國內戰爭之大決戰中，得到完全的勝利，推翻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統治。

（二）

反革命的托洛斯基派與被共產黨驅逐出去的陳獨秀派，爲要反對共產黨的總路線，相互之間已經結成聯合的戰線，企圖破壞中國工人與勞動農民羣衆日益發展的進攻。在他們中間，因各人嗜好與心理之不同，也有人照舊拿着虛偽的「左派」辭句作護符；而另一部分人，則簡直把這些早成爲廢物一錢不值的辭句，完全拋棄了。

虛偽的，欺人的，「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的」辭句，其唯一的任務，就是掩蔽托洛斯基派及右的取消派之間一致的反革命的口號——召集軍閥式的「立憲會議」——全權的「國民會議」（托洛斯基底話）的口號；他們這一個要求，是完全反革命的；反革命勢力（國民黨最近中央全會），已經利用牠來反對工農革命紅軍及蘇維埃政權唯一革命的（

在目前環境之下）口號了。

在目前殘酷的國內戰爭的環境之下，在蔣介石進攻紅軍與蘇維埃區域的環境之下，誰提出這種反革命的主張，企圖轉移革命羣衆底視線，企圖使革命羣衆不去擁護自己的政權和自己的軍隊，却使其反轉來走入「和平」「合法」鬥爭的邪途，使其停留在還未實現，可是早已反革命達於極點的，軍閥式的，劊子手的混血的「國會」範圍之內，誰提出這樣的主張，誰就是工農羣衆之公開的生死仇敵，這一點，已經是每一個革命無產者所完全明白了的。

中國先進的工農，正在向國民黨政權及蔣介石軍隊進行革命戰爭的工農，已經知道托洛斯基下面的說法，完全是反革命的，專門拿來欺騙民衆的說法。

『在目前，誰如果把蘇維埃口號看作迫切的口號，誰就是冒險主義者，空談家。反對軍事專政的鬥爭，必須採取一種過渡的形式，必須提出一種過渡的革命民主的要求，而這些要求又可以歸結成爲一個總的要求，即召集中國的立憲會議。』

這個立憲會議必須根據普遍的，平等的，不記名的，直接選舉制產生之，其目的就是解決中國目前各個重大的問題：施行八小時工作日，沒收土地，保證民族之獨立……。

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革命羣衆，正在爭取自己的蘇維埃的政權，建立自己工農革命

的紅軍，分配土地，設立革命的法庭以殺戮反動的奸細。在蘇維埃政權區域裏，革命羣衆之創造的發動性，一天一天發揚出來了，羣衆的犧牲精神與革命的熱情，一天一天增長起來了，朱毛紅軍鬥爭的歷史，幾百萬『少年先鋒隊』及工農自衛隊鬥爭底歷史，是一段非常英勇的，非常忠於革命的歷史。

當革命熱情這樣沸騰的時候，反革命的取消派，却企圖掩蔽在虛偽的『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的』辭句下面，引誘工農來出賣這一種猛烈的，成績卓著的（這一點特別重）鬥爭，引誘他們去要求國民黨式的『全權的國民會議』，等待牠來施行八小時工作制，解決土地問題與『保證民族之獨立』！

在這一個共同的反蘇維埃政權，反紅軍的政綱上面，中國右派的領袖——從共產黨開除出去的陳獨秀之和托洛斯基打成一片，陳獨秀之很快接受不斷革命的口號——一點革命氣味也沒有的口號，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現時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設條件之下，半托洛斯基主義者與右派（雖然兩者底綱領，還稍許有一些差別），都是反映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底動搖——傾向於使蘇聯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使蘇聯走上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在另一種條件之下，即在革命的中國，托洛斯基派與陳獨秀派也是共同執行資產階級底意旨：根本破壞工農革命的運動，幫助反革命來破壞與消滅新的革命政權與革命軍隊底萌芽——尙未鞏固的，年

青的，但已經很強大的，生氣勃勃的萌芽。

因此，向托洛斯基主義及陳獨秀主義作毫不調和的鬥爭，是共產黨向前發展，領導羣衆，以取得勝利的必要的條件。

(三)

因爲中國革命高漲及其全部國際及國內環境有許多特殊之特點，所以共產黨員必須要有非常嚴格的紀律性，無產階級的堅定性及組織性；奮不顧身的革命勇氣，同時又要慎重地估計到自己的力量及敵人底力量，要用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將這兩種特性配合起來。

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用無產階級底方法，應用無產階級一切組織上的力量，來解決資產階級民主的、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底任務。

要使革命高漲得到更進一步的、左右一切的勝利，就必須解決下列幾個最大的組織的政治的任務：從半游擊隊伍來組織工農常備的紅軍（在農民游擊運動向前發展的條件之下）；同時，并建立革命的蘇維埃的根據地，以圖向前收集與團結革命的力量；向前發展工人罷工的鬥爭，只有這種鬥爭，才能使革命運動擴展於全國，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領導權。

單靠革命的狂熱，短時期的革命衝動，是不能解決這些任務的。無產階級的紀律性，堅定性，堅忍性，組織性——這就是目前把革命運動推進到更高階段所絕對必要的性格。恰巧就在這種新的，要轉變到提出與解決中國革命新任務的條件之下，在中國共產黨一部分領導工作同志（以李立三同志爲首）中，便暴露出一種動搖來；這部分同志并因此而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路線——實際上便是半托洛斯基主義的、而且是冒險主義的路線，這路線是完全仇視中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底路線的。這部分以李立三同志爲首的領導工作同志，完全脫離了革命的工農羣衆，甚至於連一次也沒有到過英勇的反抗國民黨的鬥爭最劇烈發展的區域，更不必說蘇維埃區域了。李立三同志只是一味地從事於紙上談兵的勾當，專門坐在屋子裏起草『革命的』通告，論文，『最革命的』必遭失敗的計劃；結果，他就和共產國際劇烈衝突起來；同樣也就和自己的黨劇烈衝突起來；而他那種想把自己的黨拉來反對共產國際的企圖，也就遭受了可憐的失敗。在一九一八年時期（與中國現時局面完全不同），列甯在蘇俄給『左派』的所下的估計，很可以拿來估計李立三同志所領導的這一部分同志底情緒。

列甯當時說道：『我們的「左派」，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及其準備，他們遍身都充滿了失掉階級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心理。』（列甯：論「左派」幼稚病與小資產階級）

當這些知識分子的『上層分子』與上層分子兒』反對這些偉大的領導中國革命的政治的組織的任務時，在中共領導之下的工人及被剝削的農民羣衆——恰巧就是這些羣衆，却能在實際上，在實際革命工作中，一天一天地，布爾塞維克式地，平民式地（而不是政客式地）解決土地的問題，解決自己的工農軍隊與工農政權的問題。

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實，就是當聯共裏面『左』右派聯盟（洛明那慈與瘦草夫）正在用兩面主義的方法，來反對聯共總路線的時候，在中國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洛明那慈同志底學生——瞿秋白同志，在中共三中全會上面，以口頭上承認『單個策略上組織上錯誤』的方法，極無原則地掩蓋了分歧底實質，把半托洛斯基主義的、還未揭露出來的李立三路線，和黨內及李立三政綱內許多極端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都掩蓋了起來。因此，在這一個時候，斯大林同志不久以前在另一環境與對另一種任務所下的估計，便很適宜於拿來分析中共目前的任務。

『我們目前這一時期底特點，就是在於：反『左』錯誤的鬥爭，正是勝利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底條件，是勝利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底特殊形式。』（斯大林：給集體農莊同志們的回答）

那麼，這個反列寧主義的、半托洛斯基主義的李立三路線底實質（現在，就是李立三同志本人，也拒絕和斥責了這一個路線），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李立三同志用另一條，半托洛斯基主義的戰略的計劃，來對抗我們上述的那個戰略的計劃。照他的意見，中國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如果沒有同時發生的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他認為產生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已經到處成熟了。因此，共產國際應當在全世界採取『進攻的政策』。因此，李立三同志認為，在中國內部，可以實行沒有準備的暴動，而實現這一種暴動，是要使工人階級底革命組織陷於破壞的。

在這個理論裏面所包含的許多盲動主義的成份，很快就被中國共產黨所剷除了，並沒有在實際的革命工作中，得到完全實現的機會。因此，這個理論所剩下來的東西，就只是一種托洛斯基主義的，對列寧學說的否認，否認資本主義不平衡的發展，否認革命不平衡的成熟；只是一種托洛斯基主義的不信任主義的觀點，不信任：中國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之勝利，可以不需要世界革命直接隨牠發生或與牠同時勝利的條件。這一種理論，可以使黨陷入機會主義，消極等待主義的地位。可是，就是這一種理論，也已遇見黨內羣衆嚴厲的反抗；並且被他們稱爲一種與列寧主義沒有絲毫相同的觀點。

其次，李立三同志又根據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說沒有大的工業中心，就不能組織蘇維埃政府；因此，李立三同志在事實上是拒絕了組織蘇維埃政府的任務，拒絕了在革命的根據地上建設常備紅軍的任務，只是命令紅軍去作經常游擊的進攻省城的戰爭。

完全根據托洛斯基主義的精神罵中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路線爲「地方保守主義的」傾向。托洛斯基主義者認爲：蘇維埃政權只有佔據了大的城市之後，才能有成效地建設起來，如果沒有這種條件，那末，農民是不能有所作爲的，他既不能建設蘇維埃制度，也不能建設紅軍。可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分領導工作同志（以李立三同志爲首）並不能給這種觀點以反抗。

李立三同志是不能給這種觀點以反抗的，因爲，他沒有估計到無產階級目前已有的那種偉大的政治組織者的力量；在目前無產階級已經（甚至於就是在城市運動比較落後的條件之下）應用他這種組織者力量來領導農民運動了。

無產階級已經經過自己的先鋒隊（共產黨）而在政治上規定了農民的要求（沒收地主的財產，重分一切土地，以滿足貧農的利益），無產階級正經過自己的先鋒隊（共產黨）來領導紅軍的戰爭，而且無條件的要在中國蘇維埃政權裏面取得大多數。

在中國革命目前這一階段上，無產階級已經在工農民主專政機關中間（蘇維埃與紅軍）實現自己的領導權；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日益在國家政權裏面鞏固起來。

因此，托洛斯基主義的說法（說蘇維埃政權必須發生與鞏固於工業的中心，然後才能擴展到農村中間去），已經遭受了完全的破產，暴露出自己的投降主義的實質，這樣的說法，對於先進的工業國家（如德國）本來是正確的，可是，對於中國這類的國家，

則已經完全不符事實了；列甯早已預料到，在這類國家裏面所發生的革命，將『表現出一種比俄國革命更加厲害的特殊之點來』。

同時，中國革命的經驗，完全暴露出托洛斯基主義之孟塞維克主義的實質；不僅是否認農民運動的作用，而且完全不相信無產階級底力量，完全不相信無產階級的組織底政治領導作用。

李立三同志，因為抱着半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所以就忽略了一切在土地革命區域裏鞏固蘇維埃政權的任務。

很明顯的，李立三同志，既然抱有這種半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自然也就不能以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來提出目前階段中最主要的任務——在革命根據地上而建立工農常備的紅軍，也就不能『給羣衆以軍事的指導，保證（首先也許只有本國不大的區域內）十足的政治自由……盡量發展下層民衆的革命創造性』。（列甯底話）

因此，李立三同志，以及瞿秋白同志（在三中全會上）也就不能估計到紅軍進攻長沙所得的重要教訓，而只是用政客官僚的口氣，承認中國革命已經開始『和國民黨實行正式的（！）戰爭』（摘錄瞿秋白同志底結論），却沒有盡量提出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問題，完全沒有了解：在目前情形之下，在現有的工農力量組織程度之下，是不能給帝國主義的與國民黨的要塞以迎頭的打擊的。而且李立三及瞿秋白同志又沒有指出長沙黨

部領導同志所犯的那種不堪入耳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些同志以官僚主義的態度，完全忽視了羣衆的獨立性與發動性，完全忽視了組織工人階級的任務，完全忽視了建立真正羣衆的，真正由選舉出來的城市工人兵士貧民代表蘇維埃的任務。

李立三同志，既不了解由無產階級經過常備的，有紀律的紅軍及蘇維埃政府以領導農民的任務，自然，也就不能給土地革命（農民爭土地的鬥爭）目前的任務，以任何具體的回答了。

由公開右傾機會主義（主張『聯合富農』，反對給雇農與紅軍兵士分配土地等等），動搖到主張在目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就要開始『把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動搖到主張在蘇維埃區域內設立蘇維埃農莊與集體農莊，動搖到投降於托洛斯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這就是李立三同志在土地問題上的『路線』。

值得特別指出的，就是：中共領導機關中這一部分所謂『左傾的』同志，雖然在口頭上似乎喊得很『左』，要求共產國際採取左的『進攻的』方針；可是，他們却甚至於不能給許多黨部裏面這一種右到極點的機會主義的實際工作，如像將土地留給『賢良的』，沒有逃出蘇維埃區域的地主等，給以應有的反抗！

李立三同志與瞿秋白同志還比不上先進的農民，因為，先進的農民都知道以平民的手段對付地主，根據（主要的是這樣）人口多少（而不是根據生產工具之多少）來分配

土地；而李立三同志及瞿秋白同志則完全沒有了解到這一點。因此，關於沒收一切地主（『賢良的』也罷，惡劣的也罷）的財產的任務，關於給貧農與中農來澈底重分一切土地的任務，關於組織貧農團及鞏固與中農聯盟的任務，都爲李立三同志及瞿秋白同志所仇視，這一點也是完全顯而易見的。

恰巧就是在中國革命這一個中心問題（土地問題）上，完全暴露出『左傾』詞句的實質：『左傾』的詞句，不過是用來掩蔽極右的事業，掩蔽右傾機會主義的勾當，阻礙土地革命，擁護『賢良』地主及『賢良』富農底利益。

李立三同志在工人運動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也是同樣的嚴重，同樣是足以危及革命運動的發展。在這個問題上，李立三同志很巧妙地造出一種奇異的理論，否認工人運動落後的事實，反轉來辯護這種落後，讚揚這一種落後，稱之爲革命的美德。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工人羣衆中，中國共產黨是負有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影響。大家又知道：這種政治影響在組織上的鞏固是多麼薄弱；祕密的赤色工會是多麼薄弱，會員是如何的少；黨內無產階級的成份是如何的有限。

在這種條件之下，李立三同志不集中全力去提高工人階級底組織性，不去使黨的政治影響與其組織影響互相適應起來，却反而在其發表於布爾塞維克及紅旗上面的論文裏，說出這種的論調：『在客觀的革命形勢之下』，『主觀的力量』是不重要的。這完全是

追隨自發性的尾巴主義的觀點。而且，在他的冒險主義計劃十分流行之時候，他在事實上已經把職工會及青年團取消了，用官僚主義的，脫離羣衆的，上層分子的『中央行動委員會』，來代替了他們。

李立三同志，不但完全不注意工人階級職工會的組織，而且又完全反對發展工人階級局部的經濟罷工的鬥爭，而且以毫無準備的『總』政治罷工當作兒戲，結果自然要妨礙工人階級底發動性，自然要減弱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地位。自然，在這種反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共產黨無論如何也不能消滅現有的工人運動落在農民戰爭之後的現象；而同時，爲要保證中國革命真正的勝利的發展，共產黨又無論如何都要消滅這個落後的現象才行的。

很明顯的，中國共產黨，如果不戰勝黨內李立三這種半托洛斯基主義的盲動主義的觀點，如果不同時毫不妥協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在實際工作中，右傾機會主義依然還是主要的危險；而『左傾』的李立三路線，又正是右傾機會主義直接的掩護），就不能在中國革命裏面實現正確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領導。

現在中國共產黨所做的，正是如此。牠正在執行列寧底指示：

『唱高調，吹牛皮，——這是失了階級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固有的特性，富於組織性的無產者，會要懲罰他這一種『癖性』的；懲罰之法，大概是要將他們嘲

笑一番，并將他們趕出任何重要職務之外了」。

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就要使自己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化，更進一步，就要使自己的隊伍在共產國際列寧主義的領導之下，更加團結起來。

分析現在時期的鬥爭，應當注意到：暫時我們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匯合起來。這些運動總合起來還不能夠保證必需的力量，去襲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農民的革命鬥爭，現在能夠勝利的，還只不過在南部幾省發展着。統治階級各派的分裂和互相鬥爭，還沒有使他們完全削弱而走到政治上的完全破產。但是最近事變發展的趨向，即使革命形勢不能夠包括到全中國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幾個主要的省分。這一過程的促進，大部份要看共產黨有沒有正確的策略，首先是能不能正確的解決那領導和發展蘇維埃運動的任務。

——摘錄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政治決議案

蘇維埃的運動，已經對於黨提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以調節這一政府的行動的任務。這個任務是有第一等重要意義的。對於中國工農蘇維埃政府的問題，黨應當注意到：在最有保障的區域建立起真正的紅軍——完全服從共產黨的指導而能夠做這一政府的支柱的紅軍——然後這個政府纔能夠有相當的力量和意義。必須集中注意去組織並且鞏固紅軍，以便在將來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佔領一個或者幾個產業行政的中心城市。

共產黨應當明白：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上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種的任務，解決這個任務，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強大的開展。

——摘錄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政治決議案

校者附白：列甯論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那篇文章，已譯登紅旗週報第六期增刊。

第三時期的中國經濟

澤 民

第三時期是世界資本主義穩定由繼續動搖而至於完全破壞的時期。當一九二八年夏天，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上決定這個估計的時候，以布哈林爲首的右派曾提出一個對抗的大綱來，說：『第三時期是世界資本主義改造的時期』，右派的這種觀點，當然直接走向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和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綱領沒有絲毫相同點的。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以空前的震撼力動搖着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已經幾乎一年了，現在固然還沒有達到恐慌的最高點。而有些國家已經從經濟恐慌進到政治恐慌。這種事實當然證明右派的理論的完全破產，同時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兩條戰線的鬥爭中，正確的革命路線的一大勝利。

現在中國也在第三時期的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破壞之第一步——世界經濟恐慌——的抽搖中間。世界資本主義列強，重新鼓起力量向殖民地進攻以求獲得穩定。於是在大戰中乘機前進了好些的中國民族工業資本，就陷入慢性的衰落之中。同時，中國的農村經濟崩潰的過程亦加速前進了。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加緊吸收中國原料的結果，中國的農村經濟更加變成世界財政資本的附屬品，和受世界市場所左右。原料輸出的種類，在停戰以後十年之內，突然增加得異常繁多，大部分的中國農民家庭變成爲帝國主

義國家工業的需要而生產，同時，糧食的耕種却因此被放棄，於是連年發生景象可怖的飢荒。從一九二一年起，中國已變成糧食輸入的國家，此後逐年增加，至一九二七年而達一萬三千七百餘萬兩。中國經濟的這種破壞狀況，是第二時期內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穩定的基礎之一，然而中國及一般殖民地經濟恐慌之深入，亦促成此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既已用了空前的威勢在發展，中國的經濟狀況就更加沉淪入悲慘的境地了。

第三時期中世界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破壞，依照目前的世界恐慌所暴露出來的現象去觀察，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發生下列的諸種影響：（一）由於恐慌使列強間爭奪殖民地銷貨市場更加劇烈的結果，對於世界唯一協定關稅的中國市場將發生列強空前劇烈的屯併競爭。（二）由於世界農業恐慌異常深重，並且由於世界工業恐慌機械的使殖民地原料發生生產過剩的結果，中國的繼續已久的農業恐慌更遭受新的打擊。（三）此外，又由於世界資本過剩，輸出資本的需要愈加迫切的緣故，列強間為佔領中國的鬥也爭就空前的劇烈起來，由來已久的中國軍閥戰爭，至是乃不得不以新的和擴大的規模去重演。（四）美國的國內市場衰落，使美國對外政策的侵略性加強，在中國的政治上經濟上將有嚴重的影響。首先就是壟斷中國市場鬥爭的加劇，軍閥戰爭的更加殘酷，英日對美衝突形勢的嚴重，與對中國財政金融之控制，等等。

爭奪原料出產地，貨物銷售地和資本輸出地而鬥爭，原是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的一般的特徵，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開始破壞，把全部機械螺絲絞緊了。爲在劇烈的經濟恐慌之下求出路，帝國主義列強勢必傾全力於加深對殖民地的剝削，和重行分配殖民市場的鬥爭。處在這種狀況之下的中國，遂不得不走上國民經濟總崩潰的道路。現在雖然僅僅在世界資本主義穩定破壞的第一步中間，這種形勢已經非常明顯了。因此在第三時期中間，擺在中國勞動羣衆面前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沉淪入歷史上空前的經濟浩劫（*Catastrophe*）；或者是反抗這個傾向，由革命中把自已從帝國主義的破壞影響下解放出來，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

現在我們來提出中國經濟內部狀態的一些主要問題來攷察一下。

一 農業經濟崩潰中的新趨向

中國的農業經濟崩潰，不是從第三時期中開始的。農村的落後狀況和封建剝削關係的存在，帝國主義者的利用這種關係來剝削中國農民，就造成了農村經濟崩潰的客觀基礎。在這種基礎上發生出來的中國軍閥戰爭，加速了崩潰過程進展的速度。大戰以後，一九二一年中國開始大規模輸入糧食，此後年年增加，到一九二七年已達一萬三

千七百萬兩。同時原料輸出的在價格總額上，在品類的數量上，都大大增加。至一九二八年為止，輸出總額值銀一千萬兩以上者達二十餘種之多。即此一端，已可看見中國的農業實在是世界財政資本的附屬品，牠是為帝國主義列強的工業而生產原料的，因為要完成牠這種任務，牠就不得不放棄中國所需要的糧食生產。

但是作為原料供給者的地位的上升，還是第三時期以前（主要是第二時期內）的事。第三時期中間這種情形根本變過了。由於世界經濟恐慌，尤其是由於世界農業恐慌的發展，即以中國作為原料輸出的國家而談，其地位亦已經開始衰落，轉變成原料輸入國家，而同時糧食的輸入却用了新的規模在增進。

關於這個，如果需要一些事實來證明，那麼這種事實是俯拾即是的。由於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全國大飢荒，單是一九三〇一月至七月間在上海一埠，輸入的米已達七千多萬兩。同埠輸入的麵粉小麥尙不在內，而上海的許多中國麵粉廠却是用輸入的美國和坎拿大麥子為原料的。從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起，中國出口大宗的棉花，豆油，花生仁，花生油，紅茶，植物種子，等等，都驟然低落了。到一九三〇年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發展，中國輸出中佔首位的大豆，和佔次位的生絲輸出也驟然低降了。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下列諸端：

第一、世界農業恐慌，早在這次經濟恐慌爆發之前存在了。這次的經濟恐慌，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工業生產驟然低落，於是機械的引起殖民地的原料過剩，而使世界農業恐慌愈加深刻化。在這裏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大豆。大豆輸出，年年是突飛猛進的，而今年開始以生產過剩聞。因為大豆是中國的特產，並無他國競爭的緣故，所以輸出衰落是完全由於世界需要的減少。然而這還不夠，我們要注意

第二、由於世界農業恐慌，農產品大跌價的結果，競爭也劇烈起來了，中國的農產品，在世界市場上迅速的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原料所排擠了。這種現象，由來已久，如中國茶為印度茶所排擠，中國絲的輸出價額在過去曾有增進，但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地位却日益被日本所排擠。第三時期中發展着的世界農業恐慌加快了這種過程。比如棉花之輸出，百分之九十多是往日本的。自一九二八年起，日本因中國棉價貴，逐漸兼用美棉，印棉，和他種棉花，而使用中國棉就日益減少。自一九二九年起，世界棉花價格跌去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國棉花的輸出就更加低落了。絲在去年開始受到致命的打擊。人造絲的競爭已使絲業一般的受到排擠，這次的世界經濟恐慌，更使歐美各國對絲的需要驟然降低，於是絲價低落，而中國絲則以繭價甚貴，成本不能降低，以致輸出完全停止，演成目前絲廠全體停業的狀況；同時日本的絲更加佔據世界市場。甚至像牛皮的輸出，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銷路也被南美洲的牛皮所排擠。

羊毛則因澳洲羊毛生產過剩，而中國羊毛的輸出被排擠

這樣，可見第二時期中世界經濟恐慌的發展，使中國作為原料輸出國家的地位也衰落了。然而這也還不夠。外國原料在世界市場上排擠去了中國原料的地位，同時就窮追牠到中國來奪去牠在本國市場中的地位。大家知道的，中國的工業像烟草火柴是早就使用外國原料來生產的了，其他輕工業，像製藥，化妝品等，亦完全是使用外國原料的。但是最近幾年來，中國的主要工業，紡織業，也逐漸使用美棉印棉而不用中國棉花了。唯一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國棉價格便宜。尤其有趣的是絲。去年中國的絲業界開始了空前未有的現象，就是『華繭輸日，一變而為日繭輸華』。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據說是因為繭子來源缺乏；這當然是非常膚淺的解釋。實際是中國農民的繭生產事業早在崩潰之中，技術退步，成本加高，加以世界經濟恐慌使世界絲價大跌，中國的絲廠遂再不能用中國的繭子作為原料去繼續生產，而希望輸入價格較廉的日本繭子。這就是日本繭子侵奪中國繭子在本國市場的銷路的開始。甚至於麥子（作為麵粉廠的原料）也走入這一步了。因中國的糧食恐慌，麥價大貴，所以中國上海，天津，東三省等處（尤其是上海）的麵粉工廠，都用洋麥製粉。這樣看來，可以說中國的原料在本國市場上也普遍的被輸入原料所排擠了。

一方面是原料生產的絕對衰落與崩潰，另一方面是糧食生產的完全崩潰，形成中國

農業經濟的總崩潰。

這種過程的世界經濟的意義，可以簡單的這樣解釋：按照經濟學的規律，農產品的價格是由劣等土地的農產品的成本費，加平均利潤，加絕對地租所形成的。當供給超過需要時，則市場價格低落，劣等土地即以成本過高不能獲利而被荒廢，價格即由較次劣的土地上所生產的農產品來決定。現在世界農業恐慌有固定的降低價格和以世界規模縮小耕種面積的趨勢，凡屬劣等土地皆在被荒廢之列。中國的農村，不幸而是世界上最劣等的土地。

當然劣等的意義不是單指土質而言的，中國運輸系統的大規模破壞，使中國的土地在經濟的意味上都變成劣等。就講土質，那麼中國由於帝國主義者地主軍閥等的野蠻剝削，使農民絕對窮困，在奪去了土地中的化學質以後，再沒有力量用肥料加以補充，土質已毫無疑義的在變劣（甚至東三省那麼肥沃的處女地，因剝削過甚的結果亦日變瘠薄，所產大豆，品質已遠遜於前）。有些其他地方（如陝西甘肅等省），已快成不毛之地（原因是不但地力窮竭，並且連年飢荒，樹林草根都被食盡，以致土內不能含水，自然變成沙漠。），那麼這個世界的過程影響中國如何慘酷，不難知道。中國農業，並不是用資本主義方法來生產的，農民不但不能獲得利潤，並且因為無處謀生，所以連工錢的大部分也被剝削去，忍飢忍寒死守着土地免得立刻餓死。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的

大飢荒，顯然證明中國小農的抵抗，已經快到力盡筋疲的時候了。

尤其可怕的，就是中國農業目前所處的地位，並不是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前期現象。連年的大飢荒，農民的大批被迫離開土地，當然加速土地集中的過程，但是由於失地農民過多，地價異常高漲，高利貸的發達，和一般農村內部的政治條件，任何值得注意的採用機器耕種及資本主義化是不可能的。即使現在有些地方採用了機器耕種，他們的生產品的價格在世界市場上一樣是不能競爭勝利。所以中國目前這種農業恐慌，只能更加加深封建的剝削，佃租，高利貸，賦稅，商業資本等等吸盡了農民的血汗和土地內的滋養料，破壞了生產，可是並不引導到任何出路。

這樣，所以中國的土地問題，只有農民的土地革命可以解決，只有土地革命可以挽救這種總崩潰的危機。同時，從這裏可以知道目前中國土地革命的特點，是牠和反帝國主義的鬭爭簡直絕對不能分離的。即使農民已經完全沒收和分配了地主階級的土地，如果沒有掃除帝國主義的勢力，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還是不能中止的。

二 民族工業的破產

第三時期內帝國主義對中國榨取的猛進和中國農業總崩潰過程的開展，造成民族工業破產的客觀條件。

首先我們來對於民族工業的現狀作一個概括的觀察。

一九二九年起的銀子跌價，使外國進口原料價格機械的漲高了許多。加以進口業外國洋行和在華各外國工廠的操縱，進口原料的價格更漲到超過牠們所應漲的限度。這樣中國的火柴業和捲煙工廠就陷於原料來源斷絕的恐慌，紛紛停廠倒閉了。

國內戰爭，牠不但破壞了中國的國內市場，並且直接毀壞中國的運輸工業。『第二時期』中國國內戰爭的特點，就是牠的破壞性更加猛烈，牠的繼續期間更加延長，牠的休息時間更加縮短。自從一九二八年到去年，不曾有一年沒有戰爭，而且愈演愈酷。現在蔣對汪馮閻的戰爭還剛結束，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已在佈置新陣勢了。鐵路運輸系統是已經完全毀壞了，航業亦然。招商局實際已經破產了好幾次，虞洽卿的三北公司亦不能維持，要求南京政府發公債去救濟。

運輸系統的破壞，首先打擊到礦業和內地的民族工業。中國民族資本所辦的礦廠，實際已經全體停止工作了。內地的工廠，如鄭州的豫豐紗廠等，在戰爭期內，完全停工，原因就是由於原料不能運入，生產品不能運出。這種破壞的影響造成一種現象，就是使所謂民族工業，實際只集中在沿海及長江一帶的幾個主要商埠，而內地的民族資本工業歸於消滅。

這樣，在中國的民族工業當中，剩下來的已經不多了。除開製藥廠，製化妝品工廠

等較不重要的工業不計外，絲業是已經破產了，麵粉工業自經一九二三年以來已經開始破產，一九二九年的飢荒使麥價騰貴，給了北方的麵粉工業以最後的打擊。紗業自一九二九年起亦已轉入衰落的狀況，自八月起中國棉紗即繼續跌價，目前已跌到兩年以來的最低度。（這是在銀價跌去了百分之三十五的時候！）

綜合起來，我們可以說，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的破產，並不是前途的問題，而是已成的事實。

第三時期中，中國的民族資本工業不得不完全破產，是由於下面的許多原因：

第一、就是前面論農業中所說的原料的供給，完全轉到依賴於國外的輸入。這嚴重的事實的意義，就是中國的民族的民族工業的生產循環的前半段（貨幣——商品），已經被世界財政資本所控制了。

第二、就是市場的絕對縮小。這須得詳細攷察一下。在第二時期中曾有一個可注意的現象，就是中國的工業『國貨』頗有一些海外市場。這事實表面上一看，似乎中國的民族工業的發展使中國有成爲輸入原料品和輸出工業品的國家的趨勢。事實恰是相反的。中國工業品的出口是因爲國內的軍閥戰爭，農業崩潰等等原因，過剩的生產品被從國內市場驅逐到國外去。試一看那些國外市場是什麼就可以明白了。原來那個海外銷路，是在華僑中間的，主要就是南洋羣島和香港一帶。現在世界經濟恐慌發

展的結果，海外華僑紛紛破產失業，被逐回國，那麼這個『海外市場』自然就要消滅了。

不用說，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的基礎是國內市場。但是整個的國內市場是在縮小的，在第三時期中尤有以下的特徵：（一）軍閥戰爭的更加猛烈，加速破壞中國國內市場；（二）農村經濟的崩潰，與民族工業自身的破產，使失業增加，一般購買力降低；（三）運輸系統的破壞，使商品不能經常流通；（四）農村革命的發展，劃出一大部分蘇維埃區域，這些區域，即使現在還不會採用對外貿易壟斷的政策，事實上已經由軍事包圍與外界隔斷，幾乎為大工業生產品所不能侵入之地；（五）一般的農村中『土匪』如毛，使商品流通受到極大的障礙。凡這些條件，都是中國民族工業的商品流通與帝國主義國家輸入商品的流通所共同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市場異常的縮小了，嚴格的說，只是沿海和長江珠江等流域一帶火車輪船（用兵艦保送）所能及到的區域和一些最大的都市而已。

第三、航業由於戰爭的結果，已經幾乎完全被外國資本所壟斷了。這種過程到第三時期中已經完成。從此中國民族工業的商品的運輸要被財政資本所控制，受到制命的打擊。

此外，尤其重要的，就是——

第四、世界經濟恐慌的發展和深入。此次世界工業恐慌發展的結果，一切商品都

猛烈跌價。加以彼此爭奪市場加劇，競相鼓勵輸出以求減輕生產過剩的恐慌。在這種情形下面，中國民族工業的商品不得不跟着跌價，於是世界經濟恐慌機械的（Automatically）使中國民族工業陷於恐慌。

第五、這次世界經濟恐慌所顯示的第三時期特徵之一，就是關稅戰爭達到最猛烈的程度。各帝國主義國家增加進口稅率已經到禁絕的地步了。在殖民地中，也訂立各種優惠於母國，而禁絕其他國家商品輸入的關稅。現在世界上唯一有最低關稅率，足以爲屯併（Dumping）的舞台的就是中國了。這種向中國的屯併，將爲第三時期中世界財政資本挽救其危亡的方法之一，而且現在已經開始了。屯併的結果，是把中國民族工業所有的市場奪去，被『洋貨』所佔據。

大家都知道，當一九二八年，中國民族工業因戰爭暫停而稍有恢復的時候，取消派那時就異常興奮，高叫中國資本主義已經向前發展，中國『資產階級穩定』已經開始了，實際是剛剛相反，在那時候民族工業的非民族化已經開始。至於現在的民族工業現狀，當然使取消派的『理論』完全破產。根據上面的觀察，我們更可以斷言說，在第三時期中，中國的民族工業將歸於完全消滅。今後中國民族工業中一大部分的企業，將歸外國資本所管理。此外，除開許多企業倒閉後無人過問以外，其他一部分的企業一定是被中國的銀行或錢莊所吞併（歷來中國有許多紗廠早經銀行錢莊所『改組』了。這些

紗廠積欠累累，利息極重，不得已而『改組』，『改組』以後又陷於破產之境，再被別的銀行錢莊來『改組』，如此循環不已，在他們的管理之下逐漸歸於消滅。這就是中國民族工業的前途。

站在這種『前途』前面，中國的民族資本家想些什麼出路呢？也建築起中國的關稅壁壘來，禁止外國工業品的輸入麼？他們不敢夢想。（其實即使實現了這一着，也何嘗救得危亡？現在中國民族工業的競爭者已經不僅在國外，而主要的已經在國內了。）停止軍閥戰爭，和取消『苛捐雜稅』麼？這是辦不到的。阻止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麼？這是他們所不能也不願的。唯一的出路，他們就想到增加對工人的剝削。因為在生產循環中，前一段的原料購買既被財政資本所控制，後一段的生產商品（商品——貨幣）亦被財政資本所佔奪，那麼祇有在中間一般的生產過程和勞動力的購買中去求出路。所以『生產合理化』『科學管理法』的聲浪『甚囂塵上』了。

最近南京政府所召集的『全國工商會議』已於十一月八日閉幕了。閉幕以後發出一個宣言。這個宣言表面上看去雖然很空洞，實際却是一個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府聯合一致向工人階級進攻的宣言。牠裏面舉出『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也』的共有十條，實則所有其他的都是『希望』，『逐漸』『渴望』實行而已，惟有一條却認為當務之急，要馬上實行的，那就是『生產合理化』與『勞資協調』。然而這宣言還是極力修飾，做得很冠冕堂

皇的文字。至於對此工商會議的論文和會議上的發言，那就更加露骨了。比如閉會日的演說，每個都拿工人做中心問題，申報閉會特刊上載張軼歐一文，公然宣言勞方工作能力如不改進，則工資決不能比例照加，和『盡量增加生產，肅清匪共』，為唯一出路。申報工商會議特刊創刊號上一文，公然說增加關稅和廢除厘金都不能辦到，所以工商會議的唯一日程乃在『解決勞資糾紛』。看了這種資產階級的供狀，就可以知道這個工商會議的真實意義。

然而，在白色恐怖的威迫之下，中國民族資本的實行『合理化』不是從現在起了。工人們的大小便早就有了限制。『合理化』發生了上海最近絲廠女工爭渡溺斃十餘人，和軍服廠火燒不放女工逃命以致焚斃數十餘命的慘劇。『合理化』的結果使報紙上『形似工人之無名男子』跳黃浦，吃安眠藥水，上吊等等自殺慘案每天登載數起，也不是從現在開始的了。一般的對工人扣工資，加時間，扣賞工，罰工等等的苛酷，恨不得一手拿出來的工錢完全用另一手從罰工裏收回去。這樣的實行合理化，也無以復加了。然而民族工業的破產却毫不停滯的進行。上海絲廠女工因『合理化』的緣故，被迫從四隻眼做到六七隻眼，並且採用黑板制度，在版上照出一根絲做得不好就被罰工，甚至開除。但是這樣加強剝削的結果，現在還是一百零八家完全停業。從加強剝削中間依然找不到出路。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自掘墳墓，這就是第三時期中，中國民族資本的末路。

三 手工工廠與手工業

在第二時期內，中國各大工商業中心城市及其附近的手工業有了結構上的變遷。因為原料輸出的增加，發生了許多為粗製原料而工作的手工業。甚至農民的家庭手工業，也大部分轉移到為出口而工作。在第三時期中，這種關係根本改變了。最初是由於中國製造原料的技術落後，原料都由粗製後再輸出，改變做不加工即輸出。最重要的是油坊的衰落。從一九二八年起，豆油輸出銳減，而大豆輸出同時激增。桐油的輸出也有漸被桐子輸出所代替的趨勢。其他如花生油，棉子油等，莫不如此。第三時期內，中國原料的輸出既然普遍的衰落，那麼，這些為出口而工作的手工業生產，將完全消滅是不用懷疑的了。

此外專門銷售於國內的各種手工業呢？目前因絲業破產的關係，我們連帶的看到綢業的破產。因綢業破產而染業亦連帶破產。綢業在國內是遇見人造絲織品和印度綢等大敵的。

甚至於酒，也在洋酒的競爭之下而衰落了。紙在洋紙的壓迫下而幾乎消滅了。甚至於醬和醬油等中國所特有的消費品，也在日本和歐美輸入品壓迫之下而破產了。

在第三時期內，爲爭取市場，不論中國的或者外國的資本，都企圖侵入手工業所一向佔據的許多生產部門內，去開闢投資的領域。例如上海杭州一帶電機織綢廠漸漸多了，而許多手工業織造廠爲之倒閉。但是這種趨勢現在進行得異常遲緩，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世界經濟恐慌的環境之下，這些新工業起來時馬上就捲入恐慌的漩渦之中走向破產。另一方面，一般消費者由各種手工業品的製作粗劣，與價格之比較的昂貴，在消費的趣味上也發生了改變，捨去本國的手工業出品，改用洋貨的替代品。這樣，根本使許多種類的手工業商品漸漸絕跡，這樣的例子，比如綢緞之與人造絲織品，或外國綢緞，中國水旱烟之與紙煙等等。中國民族工業與手工業的關係之特點，就是，民族工業往往在外國資本主義工業已經消滅了某項中國手工業，而以某種新輸入品代替之後，才有華人的工廠，也仿製該項輸入品去與之競爭，這樣，他自己首先就處於不利的基礎上。像中國的紙煙業，因爲佛及尼亞煙葉已成爲中國人的口味，至於不得不輸入佛及尼亞煙葉從事製造，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外國資本開了破壞中國手工業的道路，中國工業資本跟在後面去推波助瀾。

然而手工業這一個生產部門，雖然現在是在破產的過程中，可是比起民族工業資本來，牠是『頑強』得多了。由於中國大多數失業者的無處謀生，由於積累起來的資本無處流通，手工業往往成爲這些過剩的勞動力與資本的逋逃藪。所以一方面天天有巨量

的手工業者破產，另一方面又有巨量的手工業發生，此外在農村經濟崩潰中，農民的家庭手工業亦是維持生存的一種鬥爭方式。因此，在這一方面，崩潰的過程是被許多相反傾向所中和而緩慢了。

由於以上這些原因，所以至今未曾破壞淨盡的封建式的行規束縛，就更加遭受破壞，而『在行會』與『不在行會』中間的鬥爭，就此更加劇烈起來。在這種鬥爭中，國民黨的軍閥政府是傾向於維持行會的，因此在立法上，封建時代的政治與行會的關係，遂一度再現。物強迫非行會中人服從行規。然而這種立法在目前的條件之下，實際是一種欺騙而已，因為一雙腳站在幾把椅子上的國民黨政府，決不會對於手工業者有什麼幫助，維持行會的結果，只是幫助大商人和手工作坊主人壓迫更小的企業而已。

四 國內市場

由以上所說的種種，我們對於中國的國內市場，已經可以作一個整個的攷察了。這裏首先要說明的，就是國內市場的崩裂為許多地方性質的市場，而統一的全國市場反日見狹小。

關於全國市場，上面已經略略的講過了。戰爭，運輸系統的破壞，與農村中革命運動的發展（包含土匪的活動擴大）使全國市場遂漸衰弱，商品的輸入內地困難增加，

而工業製造品的行銷，主要的漸被局限於各大城市自身及沿着幾條交通幹線的區域。

然而這是否說內地的商品交換衰落而倒退入自然經濟去了呢？

不是的。在這裏我們得到了市場的崩裂，與商品交換的價值數量的減少，可是交換關係却更加發展。這就是說，原來是統一於全國市場的地方市場，現在一天天的失去了與全國市場的聯繫，在這些市場上所交換的商品，由全國遠近和海外運輸得來的較少，而市場附近各地農民和手工業者所生產的商品的交換反增多了。實際在市場上買賣的商品與其價格數量雖然降低，可是農民羣衆的依賴於交換而生存的狀況却比以前增進了。

這種現象，根據於下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農民羣衆的貧窮化，使他們的購買力低，另一方面，他們愈是貧窮，愈是陷落在高利貸與商業資本的陷阱裏，而不得不用現錢或其他的形式出賣他們所有的生產品。同時，如果是有點小土地的小農，或佃農等是受到了異常猛烈的剝削，致使他們的所得遠在他們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以下，那麼日益增多的失地和地少的農民，却同時又不能得到適當面積的土地，使他們可以充分使用勞動力而形成勞動力的剩餘。這種剩餘，他們儘可能的應用於手工業的生產上面去。傾向於分離獨立的地方市場是這樣形成的。

地主階級的奢侈的增加，使他們逐漸由自然物租轉移到向農民收取貨幣地租，國民

黨軍閥政府的向農民改用貨幣收取田賦和捐稅，這種轉變至今是沒有完全，而是繼續着進行的。目前的世界農產品跌價，更增加這種趨勢，以便把農產品跌價的損失轉嫁到農民身上去。地主的高利貸者化，的兼商業，使地主階級在收取地租的範圍以外，更加去剝削農民的金錢。同時民族工業的破產，引起資本的急劇的倒流入鄉村，這種流動方向與由於鄉村中農民革命的發展，資本逃向大城市是很矛盾的並存的。從城市資本的流入鄉村，也更增加高利貸的作用。

這樣，所以農民非出賣他的生產品不能夠生存。另一方面在一次賤價出賣盡了他的農產物，去付租，還債，納捐稅之後，立刻不得不再借債去高價買進糧食和一切日用品來維持生存了，於是他不購買亦不能夠生存。農民愈窮，他所能買賣的數量愈少，然而這並不阻止他的愈加依賴於商品交換。

因此，我們得到了以下的奇特現象，就是資本主義的關係（貨幣關係）是日益擴大，可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更正確些說是一般的生產却異常的衰落了。全國市場崩裂，可是地方市場並不更加興旺。由是帝國主義者剝削中國市場的可能性不能不降低，可是中國農民和一般勞動羣衆的受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宰割却更深了。這種過程的結果，是在上面講農業的部分中已經提到過的，那就是空前的兇險的大飢荒與整千萬農民的餓死。

然而國內市場的分裂還不止像上面所說的那樣。還有另外一方的過程與之同時並進的，那就是中國市場的依着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範圍的存在，而碎裂成幾個中心。

這種過程已經進行了許久了。現在還沒有達到頂點，也永不能完全達到頂點的。第三時期中，世界資本主義穩定破裂的第一步——世界經濟恐慌——發展的結果，更增加帝國主義者彼此爭奪市場和侵入別國的勢力範圍的鬥爭。可是同時，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所造成的中國市場的分裂為地方市場，却促進了中國國內市場的重新組織，而愈加確定各區域內的地方市場與各帝國主義國家所佔據的中國通商口岸的關係。民族資本的破產與貨幣資本的佔到統治地位，更助進這個方向。

五 貨幣資本的統治與國家財政

從以上種種，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就是，在第三時期內，中國的國民經濟遭逢全部崩潰的浩劫。在這個基礎上發生了貨幣資本的膨脹與佔據統治地位。而這個現象本身亦即國民經濟崩潰的表現。

前面說過，中國國內市場雖然衰落，可是貨幣經濟關係却更加普遍。這就是形成鄉村中高利貸資本佔統治的基礎。理論上講，高利貸的發展，起源於貨幣貯藏，只要

在貨幣的幾種功用發展完全的時候，高利貸資本就能夠出現。現在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的過程既然是和交換過程的擴大同時進行的，所以凡貨幣流通所到的地方，就成爲高利貸剝削盛行的地方。

中國的地主階級大多數都是自己經營高利貸而成爲高利貸者。高利貸者也依靠高利貸而轉變爲地主。

這樣農村裏而形成高利貸資本，或者更廣泛些說，貨幣資本的統治。貨幣資本統治的形成，在第三時期的中國是和農業生產的衰落，土地的被荒廢同時並進的。如果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上升期，高利貸的發展（本身雖祇破壞舊的生產方法而不建立新的）間接的還盡了積累資本以便過渡到更高生產形式的作用，那麼在目前的中國，牠連這種間接的進步作用也失去了，牠只是破壞，直到農村盡成爲荒地的時候。

在工業方面怎樣呢？工業方面，在第二時期中，早已深陷於債務了。在這裏，第三時期的中國經濟是和所有歷史上的先例相反的。不是高利貸破壞舊生產方法，掃除了道路以待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却是侵入到已經有了相當發展的資本主義大工業的領域之內，宰制了牠，把牠屈服在自己的威權之下，而又並不像帝國主義各國一樣形成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混合生長的財政資本，却是用債權吞併了中國垂斃的民族工業，讓牠在貨幣資本的介殼之內逐漸腐爛而至於消滅。

這樣，在第三時期內，我們看見中國逐漸形成地主，商業資本，與高利貸，和工業資本的『三位一體』了。這種三位一體的具體形式，是貨幣資本的統治。

經濟上的三位一體必然要成爲政治上的三位一體。蔣介石的國民黨南京政府，早就有人說某『浙江財閥的政府』了。這是不正確的。牠是在全國國民經濟總崩潰之下，快要變成貨幣資本佔統治的地主資產階級政府。在已往，中國的貨幣資本經過代發公債，包攬稅務和借款給軍閥政府等等作用，早把政府機關變成剝削勞動羣衆的工具，且由此而伸張了他們對政府機關的影響。現在，在民族工業破產的時候，他們又經過發行絲業公債，航業公債，組織航業銀行等等，把政府機關作爲他們吞噬民族工業的工具了。另一方面，政府機關中的官僚們自身，也變成貨幣資本家。宋子文，孔祥熙一般人已和銀行老板沒有區別。『國府要人』莫不擁資鉅萬。蔣介石一個人在上海置有許多地產，好幾個大小菜場都是他的。在公債交易所中，他是一個最大的『大戶』，據說在蔣閥戰爭中，他曾不少次數用幾十萬元，賄賂馮玉祥的軍隊，叫他們退兵三十里，以便公債漲價，博取數倍於賄賂金的厚利。中國的貨幣資本已日益和國家機關混合生長在一起了。

然而這一切過程，整個的却只爲造成一個輸送管的系統，將崩潰中的中國勞動羣衆的膏血輸送到外國財政資本的銀庫裏去。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企業都有極高的利潤。

當美國和歐洲的銀行利息率低落至二%，三%的時候，中國的外國銀行保持着極高的利息率（短期存款八——九%）。一般的中國銀行利息率也都有這樣高度。長期存款，利息率有到一二%的。外國的一般在華企業，紅利至少二〇%，最多到六〇%至七〇%。然而這却在中國民族工業破產的時候！這種高度的利潤率，是和中國高度的高利貸剝削（最普遍的按月三〇%），息息相關的。中國的農民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的剩餘勞動和一部分必需勞動所產生的價值，經過地主，商業資本，高利貸者，資本家，和政府官僚等等的剝削，集中起來，經由原料輸出，商品輸入，軍火購買，匯兌操縱，投機事業等一切道路，匯流到財政資本的囊袋裏去。最明顯的，例如錢莊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一切商人的買賣，款項交付都經由外國銀行，而中國商人方面與外國銀行的一切交付手續，都經過錢莊。帝國主義者挑選了這個半封建時代式的貨幣資本企業作牠的代理人。最近由於貨幣資本更加集中的結果，銀行的勢力漸漸壓倒錢莊，開始在對外貿易上代替錢莊的任務了。但是無論銀行或是錢莊，都依賴外國銀行或外國企業，而是他們剝削中國的代理人。他們和財政資本混合生長在一起。

另一方面，由於貨幣資本不需要全國的市場，所以在工業資本日益衰落之際，中國的統一市場就更加崩裂而成爲許多區域，每個區域各以一個或幾個軍閥與帝國主義剝削中國的口岸爲中心。軍閥戰爭與革命更加加重這個趨勢。上海，天津，漢口，杭州

等大都市迅速的生長了，於是在歷史上又開創了新例：不是因爲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所以有大城市的勃興，乃是工業的普遍衰落，貨幣資本的集中，造成了大城市的生長。這種形勢，一方面加強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對抗的形勢，另一方面，由於貨幣資本與軍閥政府的結合，造成強固集中的勢力，去做統洋階級的暫時的避難所。他們要傾其全力以白色恐怖壓倒這些城市中心的工人革命運動是自然的結果。

統一於是愈加變成幻影了。各區域內佔統治的貨幣資本家，地主，商業資本，彼此之間並無共同的利益，相反的，由於他們各自依附於一帝國主義國家的緣故，他們相互間利害衝突愈加猛烈。軍閥戰爭於是走上更兇猛的階段了，於是全國國民經濟總崩潰的過程更加加速的前進。

這樣，所以貨幣資本的統治的真實意義，乃是中國歷史的向後倒退到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中去，牠是中國國民經濟總崩潰的過程的一種方式。勃興的貨幣資本家，他們自身是反動趨勢的代表者。因此，他們的統治的反動，無恥，詐僞，和貪酷，在歷史上也找不出第二個例子。

但是，這種統治地位本身就宣告牠自身的不穩固。因爲牠並不是貨幣資本發展或生長的表現，而僅僅是集中。在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破產的時候，中國愈加經工業資本的積累轉移到貨幣資本的積累。這種積累，是用了無數的細小的吮吸管，插到全國國

民經濟的一切毛孔中去吮吸血液的方法來進行的。因此，在第三時期險惡的世界行市和中國國內情況之下，被每一個經濟界的震蕩像鐮刀刈草似的剃去的小『暴發戶』，是比較從每次暫時『平靜』的期間，像雨後春筍似的生長起來的還要多。而資本集中的規律在此處的應用是像在其他部門中一樣的，所以貨幣資本的集中，是由鄉村到城市，由錢莊到銀行。銀行的得以逐漸壓倒錢莊而統治中國金融，並不是貨幣資本的加強，却是牠是衰弱。

最後，我們還得指出，就是根據整個民族工業破產與非民族化，外國輸入的加增與原料輸出減少的趨勢，中國今後的入超將在一個新平面上去增加。同時由於中國海外華僑的破產，與一般對華投資的不可能，中國的入超抵補也許要成問題。另一方面，政府財政的破產危機日益緊迫，而大批舉借外債或許被帝國主義相互間的國際矛盾所阻止。如果這樣，那麼中國貨幣資本家階級或許要在一個極大的金融恐慌中同歸於盡，也未可知的。

六 第三時期帝國主義的對華經濟政策

在這裏，自然不得不重行提出下面這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了，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大規模的對華投資究竟是否可能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復，一定得是否定的。

不錯，歐美工業恐慌，資本過剩，和中國利潤率的高，對於財政資本國家的資本輸出是極大的引誘。而中國的資產階級現在，由於工業資產階級的更加依賴於外國財政資本，由於中國失業失地的窮苦羣衆的鬥爭日益威脅統治階級的存在，已經改了口調了，例如他們用了孫中山的話，宣言說：『在不妨害主權的範圍內吸收外資來建設實業，解決民生是歡迎的』等等。同時在相當的範圍以內，日本確已遷移了一些企業到中國來，目的是在剝削中國賤價的勞動。但是大規模的外資輸入有極大的阻礙，這種阻礙在事實上是不可超越的。

這種阻礙之所以發生，整個的是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

由於中國軍閥戰爭猛烈化的結果，中國的國內市場破壞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在這種情形下，開設工廠，是沒有前途的。在第三時期帝國主義列強剝削中國市場的需要更加迫切的情形之下，投資於運輸工業是一切的根本。果然在最近一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航業投資有相當的增加。但是鐵路運輸系統，不但沒有任何新投資的可能，並且連舊有的系統也破壞到不能修理的地步了。革命運動的發展，中國市場的崩裂，羣衆購買力的降低，與一般世界經濟的衰落，使他們在中國的工業投資成爲不可能的事，十多年來，中國並沒有多少外國工廠建立起來，只有銀行，地產公司，及賭博性質的

跑馬場跑狗場等非常興旺，可以知道了。因此第三時期內帝國主義的對華經濟政策有牠的特點。下面試就各主要方面分析一下：

(一) 爲擴充中國的市場，採取利用和加深中國經濟崩潰的方法。美國的小麥麵粉之輸入，烟草棉花等原料的輸入，是利用中國農業崩潰去挽救他們自己的農業危機的。這方面運輸的增加，也可以挽救他們航業的恐慌，減少停船。

(二) 爲輸入工業品，他們所採取的方針是更加廣泛的研究中國商業習慣，深入內地，建立廣大的銷售網（仿效美孚公司的政策），務使至今尙屬手工業所供給的商品改爲由舶來品供給。因此各國都派代表團來華攷察。

(三) 儘可能的建立貨物運輸系統。這裏他們所注意的是汽車公路。因爲這項建設費用少而作用大，可以深入鄉村。可以解救他們自己本國內汽車生產過剩的恐慌，所以美國福特公司尤其想捷足先登。

(四) 盡量排擠中國民族資本，控制牠們，使他們非民族化。

(五) 爲實行上面的綱領，却有一個根本的障礙，就是中國的革命運動。上面這此政策的本身，其意義就是使極大的中國手工業者羣衆和農民生計盡絕，轉入反抗和革命。這樣，中國蘇維埃運動愈加增添了新力量。因此伴着上面的政策之施行，必然要採取慘酷的壓倒中國革命運動的血路（現在進攻蘇維埃區域就是這種政策）。

(六)對中國政府的借款，而取得財政上的控制權。中國政府的財政破產迫在眉睫，因此爲搶奪對於這個政府的控制權，必然爭奪借款給中國政府。最近美國人孫中山的朋友林百克往美國去商量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十萬萬)元的大借款，就是這種政策的一斑。

這些政策，與第二時期或已往的傳統政策有何區別？根本的就在乎這一點：如果在第二時期內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是資本主義暫時過渡期間內加強剝削中國原料，擴大對華輸出，因而並不會計算到把中國市場加以急遽的改變。那麼現有的政策是世界經濟恐慌發展下爲挽救自己的危亡，拚命的向中國勞動羣衆進攻，用全力來搶奪中國國民經濟崩潰中的餘燼的政策。因此，第三時期的列強對華政策是更趨於空氣的，換句話說，是帶有軍事意義的。這是一種用武力爭奪中國市場，使中國殖民地化的政策。在這政策中，政治是多於經濟，軍事是多於政治。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武力衝突是多於『和平的』經濟競爭。

這個政策實行的意義，是使中國多變世界的買主，少做世界的賣主，原料，糧食，工業品，都做消費者，去緩和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業和農業危機。(在這裏，連中國的特產原料也受到攻擊。由於經濟恐慌中資本移動的結果，他們在印度，南洋羣島，美國種殖大豆，桐油等等)。然而爲充分使這種政策有效，他們必須首先佔據中國領

土。因此戰爭的危機與武力干涉中國以消滅中國蘇維埃運動的聲浪一齊高起來了。實在的，不經過武裝干涉，上面那個『謙虛』的經濟綱領也是達不到目的的，但是『武裝干涉』，却要擴大中國的軍閥混戰，並且引到帝國主義者的中間相互的戰爭。

七 蘇維埃區域的經濟

爲什麼只有蘇維埃革命可以中止中國國民經濟總崩潰的路程，目前在炮火中的蘇維埃區域的經濟已經可已證明了。

據蘇維埃區域的報告，由於沒收和平均分配地主土地，取消債務的結果，糧食的價格大跌，米一石只售二元銀子。這證明什麼呢？這證明中國農民從封建的和帝國主義的剝削之下解放出來以後，農業經濟崩潰的現象立刻可以消滅。而『健全的資本主義』的現象就此發展起來。在鬥爭包圍中的蘇維埃區域已經發生『剪刀』現象。凡農業品價格都低降，而工業品的價格就上升，手工業因此有發達的趨勢。有許多商品像火油、鹽等，因爲都是自外輸入的，所以價格特別昂貴，一般的有許多工業品也都受同樣的影響。然而有一件事是和軍事包圍無關的，即此種工業品價格上騰中，一部分是由於蘇維埃區域內主要賴手工業生產，在世界市場的價格與農業崩潰再，不能屈折中國農業與手工業商品的價值的相互關係到相反的地步時，他們中間的正確的比例却標明出來了。

一旦蘇維埃革命還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時，這種狀態是常態。工業品價格的高漲引導到工業生產的進步。這恰恰和目前非蘇維埃區域的工業生產品價格低廉（造成工業破產）與農產品價格的高漲（由於農業崩潰）恰恰相反。

蘇維埃區域的經濟狀況，外面得不到詳細的報告。但是以上這一點已經可以指示中國蘇維埃運動全國勝利，推翻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起國家對外貿易壟斷（假如在短時期內蘇維埃的中國尚與資本主義的列強並存）之後，中國的國民經濟將起怎樣根本的變遷。

中國的蘇維埃革命決不會停止在資本主義的任務上。牠的勝利就要開闢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因此，在脫離了全國國民經濟總崩潰的危機而走出來的中國經濟，將不止由衰落轉到發達，並且要轉到用社會主義的速度去發達。在蘇聯的幫助之下，他可以有比蘇聯已往更迅速的恢復與改造。在牠沒有達到這一步之前，在目前的狀況之下，牠一方面供給了中國如何可以得到解放的實例，另一方面牠成爲積極的破壞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主要原素。在積極擴張，進行戰爭以推倒國民黨的統治時，牠日益擴大脫離帝國主義與地主資產階級殘酷剝削的區域，挽救幾千萬人於飢荒餓死；同時蘇維埃區域愈擴大，帝國主義和中國統治階級的市場愈狹小。牠在經濟上，也是破壞帝國主義和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一個要素。

中國經濟的性質

伯虎

國民黨人說：現在封建勢力，已經完全消滅，而資本主義，在中國本來是沒有的；現在只等他們來建設民生社會，推人民進大同世界。像這樣的說法，來判定中國經濟的狀況和前途，我們先把他撇開不講。因為他們的先總理，在民生主義裏，本來就說過，將來大同世界裏，『資本家將大發其財，工人亦可大得工資』，地主自然應該大收其租了。批評這種『理論』，對這種人辯論，那比對牛彈琴還不如呢！

我們這裏要講的問題是：現在中國的經濟，究竟是什麼性質，有那些勢力推動中國的經濟，向那裏發展上去？

立題法

要研究一個社會是部落社會，是宗法社會，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是要看這個社會上，他的全部國民經濟中，究竟是那種經濟形式，佔統治地位。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純粹清一色的社會制度。在一種社會裏，總包含有過去社會的餘跡，和新社會的種子。而且這些餘孽和種子，又與當時社會的成分互相作用，形成種種過渡的形式，攜帶各色各樣的外表。因此，不但是說不到什麼純粹的封建制度或資本主義等等，而且這些制度，還不是一目就可以了然的。

中國歷史非常長久，而地而特別廣闊，國內所有的經濟制度，尤其複雜。在蒙古

新疆青海西藏一帶，還盛行着部落，宗法社會的生活。其餘大部份都是鄉村。鄉村經濟中，獨立自耕的成份，到現在已經是很少，而多數是租佃過活。他們都是用最原始的工具有，作手工的生產。除農業生產外，就有手藝的生產，生產其他一切物品。只有在少數大城市中，有近代大工廠；有的是外國帝國主義開設的，有的是合辦的，有的是中國人辦的（現在暫且不講他們的比重和相互關係是怎樣）。上面這四種生產方法中，部落宗法社會，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佔不到重要的勢力，沒有多大的比重。手工藝的生產，或者是個人獨立的，或者是行會式的，或者是受商人的定貨，形成家庭手工業的地位，或者是工場作坊的形式，這已經是工業資本的第一步了。農業的生產，不是單交捐稅，便是兼交地租。至於新式工業，那是資本主義的式子。所以統統歸納起來，就是這些經濟，不是帶封建的性質，受封建勢力所支配，就是資本主義的制度。現在討論的，就在封建關係和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經濟中，究竟誰佔優勢，他們發展的程度和性質，究竟是怎樣？

同時，中國是受帝國主義經濟政治勢力緊緊壓迫的國家；財政，金融，礦山，鐵路，森林，海船，工廠，大商舖，多是他們的產業。因此，這些勢力，在中國經濟中，又佔什麼地位，起什麼作用呢？

簡單一句話，外國財政帝國主義，中國封建制度，民族資本主義，相互間的關係，

究竟是怎樣？

中國的商業資本

講到這裏，我們好像是忘記了中國的商業資本主義。其實並沒有忘記。商業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社會制度，並不是一種生產形式。只要社會上有了相當的分工，一個人或一個集團，不能完全產生自己所必需的東西，而却有餘下來自己所製造的東西，那末買賣的中人，商業資本，就可以存在。他是可以建築在任何種生產方法之上，可以存在於任何社會制度之內的（只有原始共產社會和將來共產主義時代，沒有他的飯碗）。他可在游牧部落和漁業部落間做買賣，他可在封建社會裏做生意，他可以販賣奴隸，他可以買賣手藝工人的產品，他可以替工業資本家擔任流通的責任，也可以充當外國帝國主義的買辦。他的作用，第一，就是把什麼東西都商品化。但是，這絕對不就是等於資本主義。中國的商業，發展了很久很久，而且很深很深。不僅是農民繳租納稅和自食外所餘下來的農產品，都商品化了；地主收租所得的穀物，除自用外所餘下來的，都商品化了；手藝品商品化了，而且連土地也商品化了，女子也商品化爲丫環了。

托洛斯基取消派的人們，看見中國的商業資本，就痰迷心竅的狂喊，說中國早已發展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已在中國經濟中，佔領導的地位了。嚴靈峯先生，在『再論中國經濟問題』中，竟把商品化，貨幣二個觀念，和資本的觀念，完全相等起來。照他

這樣說法，不但中國封建制度在沒有產生前，已經小產了，而且資本主義，真的在三千年前，已經盛行了。像這樣沒常識的人，還要罵人家是不肖之徒，真是可憐。嚴『肖子』的方法論，用來分析社會是不夠的，用來分析他自己足夠了。他的大作既登在『動力』雜誌商品上，一定是為資本家賣力了！

不過商業資本，自己雖然不是一種社會制度，不是一種生產方法，却有媒介社會變更的作用。他曾經把古代社會，變成奴隸社會。他販賣手工藝品。他還可以進一步的，因為他熟識市場情形，而向手藝人定貨（一定的式樣，質料等等）；供給他原料，工具；甚至於什麼都由商人作主，商品製好後，實際上是給手藝人工錢。這種家庭手工業，實際上，像馬克思說的，已經實用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了。再進一步，把這些手藝人集合在一個工場或作坊之內，這已經是工業資本了。也許工場主和作坊老板曾經是商人出身，或還是繼續做買賣，我們決不能指驢為馬，混說一切商業資本，就是工業資本。

中國家庭手工業，確是很多：紡紗，織布，編席，製鞋帽，織襪子，等等類類，簡直說不盡。但是他們在全部手工業中，絕對沒有佔統治地位。即使他們佔了統治地位了，也算不得是中國已經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並且家庭手工業，在封建制度之下，完完全全可以存在的，並且歷史上無論在那一國都存在過。只有工業革命後的機器

生產，才衝倒了家庭工業。

商業資本使土地變成商品，使農民更依靠市場，使地租貨幣化，這雖然使經濟本質沒有大多變更，却是使資本主義容易發生。他和高利貸一起，利用農民的缺乏，借貸銀錢，種子，工具，使農民破產，土地集中，使大規模農業，資本主義農業，容易進行。甚至於利用封建諸侯的短少現款，使他們的經濟命脈，受商人高利貸者支配，促進封建制度的崩潰。但是這種過程，本身並不就是資本主義。

中國商業發展得很久，不論向來怎樣的『重農輕商』，這類作用，當然是發生的。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買辦就幫着前者推銷洋貨，收買原料，殖民地化中國。但早買辦並不就是帝國主義者！

封建制度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握住中國的經濟命脈，設立新式的工廠。

中國人自己，除各地開設有許多工場作坊外，也設立各種近代式工廠。帝國主義，土著資本主義，商業資本，同時又不斷的破壞農村經濟。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封建關係，不但不會純粹，而且也不是全盛的時代了。

說到這裏，有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必須預先弄清楚。凡是一個社會，有他新興的時期，全盛的時期，衰落的時期。在衰落的時期中，舊的生產關係（生產工具的佔有，生產條件的分配，剝削的方式……），已經阻礙了新的生產力的發展；新的生

產力，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已經相當的破壞了舊的生產力，或者開始破壞他們；舊社會的經濟基礎，開始動搖或崩潰，舊的上層建築，拚命在衛護這種基礎；舊階級把住了政治權力，極力維持舊的制度，尤其是舊的剝削方法，這樣，當然阻礙新勢力的發展。但是新勢力，當然是存在了，這是不成問題的。內容雖在變換，而形式還維持着。這裏就要有新的衝破舊的革命！

現在試看中國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怎樣呢？資本主義，是否衝破了封建制度呢？這裏當然不是說，資本主義已把封建關係，打破得一點無餘，或者只有一點點影子，只有殘餘的殘餘。這是不會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本來就不會真正澈底的。英國的工業革命也好，法蘭西的大革命也好，普魯士式的解決土地問題也好，美的農主Farmer制也好，在經濟上，當然封建『殘餘的殘餘』，是要存在的，這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肅清。托洛斯基派的門徒們，居然把中國的封建勢力，看成只有『殘餘的殘餘』，『殘餘渣滓』。他們簡直想把中國的經濟狀況，和英，美，法，德同等看待。這種論法，簡直可以說是不害臊。最可笑的，就是他們把人民中間遺留下來的舊文化，數了一大套，算是『殘餘渣滓』賬裏的極大部份。要知道，文化本來是上層建築的上層建築。不僅是在新經濟戰勝了舊經濟之後，不僅是新政權替代了舊政權以後，就是在順利的迅速的建設新社會的時候，文化上的舊東西，還是要存在很久很久的。倘

若說：『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的特權慣例，……：鄉村中之一切風俗習慣，賽會，迎神，械鬥，私刑，……：僧尼，道士，巫，覡，神君，地保，鄉長，祭司，廟祝，舉，貢，生員，翰林，進士，』，那末英，美，法，德等資本主義先進國，難道就沒有這些名稱不同，而實質相同的東西嗎？難道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發展到英，美，法德一樣的程度了嗎？恐怕連嚴先生自己，雖然只坐在上海租界上，作坐井觀天之舉，也不至於承認吧！

封建制度，是否只是『殘餘渣滓』，是否『投降』資本主義，——這並不是看社會上還遺留有多少封建制度的文化來決定。實際上遺留下來的舊文化，就是在新社會中，也不是像托派所說那樣，只有一點『殘餘渣滓』，往往是整個系統。問題是在乎封建制度的基本特點，是否保存着，當時的政權，是否保障這些特質，不為資本主義的利益來取消這些利益。

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不論是採取任何種方式，他的內容總是：根據手工的農民生產方法，而農民把一大部份勞動結果，白白的交給封建剝削者階級。詳細的說，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關係是：

第一、封建領主或地主對於農民施行一種超經濟的壓迫，甚至於使農民失去身體上的自由；第二、根據這種權力剝削農民，不僅取得農民的全部剩餘勞動，還要侵佔到他

們工資的一部份；第三、主要的剝削外，還有其他種種的剝削。所以封建的社會關係，是地主用強力剝削農民，以至於侵佔他生活必須的部份，為要維持這種剝削，甚至於使農民的身體，在法律上，或實際上失去自由。

在封建制度全盛的時候就是這樣情形。但是在封建制度初成立的時候，並不是這樣，在封建制度衰落的時代，當然也不是這樣了。大家都知道封建制度是怎樣起源的，不論起源的具體形式是怎樣，總是在開始的時候，諸侯原是保護農民，免致受搶劫欺侮，因此就收取一定量的貢品或勞役。開始本來不很繁重的。後來才逐漸形成上述三種現象。此後，因為商業資本發達，商人販賣許多珍奇東西，諸侯就不願意只靠自己的農民，製造東西給他用了。因此各種田事以外的勞役，就都用各種形式免去：或增加田役時間，或增加田租，或添加各種捐稅。而且封建領主，貪得無厭（向來只靠農民土產過活，究竟一人只有一個肚子，吃穿都有限量。後來有商業資本做媒介，那就揮霍無窮盡了），所以剝削程度，就愈加重難，可是形式却可以而且必然變更。譬如一切勞役，都用租稅來替代，地主只要能夠得到高度的剝削，就不妨身體上讓農民自由，反正農民在經濟上受牽制，丟也丟不掉土地上的苦工的。譬如俄國在所謂『農奴解放』之後，俄國奴役農民的封建剝削，不但沒有消滅，反而加深。只有沙皇及其臣僚們，才會說『農奴解放』令實行後，封建制度已經是『殘餘渣滓』了。因為這裏的問

題，不是在乎表面上幾種形式的改變，是要看那維持封建制度的基本關係，是否還存在。封建地主，不僅因為自己的需要，必然變更幾種剝削的外表，而集中剝削於租稅，而且因為農民的反抗，也不得不用『贖買』等等形式，『放棄』幾種特權怪例。然而基本的剝削，還是保存着，而剝削的程度，却是有增加而沒有減少。苛捐雜稅，勒索，預稅，難道是資本主義式的，靠經濟勢力的『自由平等』的剝削嗎？這還不是勞役制的替身嗎？雞租，腳米，人專，解而，包三擔，租飯，年送，……還不是封建的形式嗎？至於拉夫，那簡直是『不自由』的復活。其實即使不拉夫，農民就有自由嗎？嚴先生說現在地主與農民是建築在『平等』『自由』的原則之上，大概他忘記了保護地主利益，而自身又抽括農民的軍閥剝削了！大概他根本忘記了現在統治鄉村和城鎮中的土豪劣紳了！嚴先生偏在這裏看得出農民和地主，有『名義上的平等』，說是『農民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則任何地主絕沒有強迫農民佃地的可能』。難為嚴先生，原來農民是這樣自由呀！在我們說資本家和工人有『名義上的平等自由』時，是有他經濟基礎的，就是說，工資一般的等於勞動力的價值。難道農民繳納一切租稅後，還留有勞動力的價值嗎？

托派的先生，總不至於否認現在農業危機普遍的情形，農民繼續破產的現象吧。農民因為實在生活不了（所得抵不了工資），當然就沒有餘錢來改良工具和土地，所以

土地一天一天的變瘦；有的只好放棄土地做土匪等等，因此荒地愈弄愈多。其中原因，除天災外，就是因為剝削得太嚴重。而這類的剝削，是由『超經濟的力量』，由政權，或例等的力量來維持的。這就是封建的勢力。封建的關係，現在的確不像全盛時代那樣了。但是最主要的關係：嚴重的剝削，還是依然存在。因為封建勢力是該滅亡的時候，當然有許多封建形式，已經消滅了或變換了。本來西歐各國，曾經也經過這樣的時代，並沒有什麼奇怪。中國和各國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商業發展的特別久，特別深切，因此土地就早已商品化了。既然土地可以買賣，小地主就容易多。這是封建制度下，商品化的過程。這固然可以促進土地集中，發生資本主義農業，但他本身並不就等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托派取消派所藉以否認封建制度的，在嚴先生方面，還有二點。第一，他說：『不管地租形式如何，剝削程度如何，其本質不外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吧了』。倘若地主軍閥，土豪，劣紳所榨去的，只是剩餘價值，為什麼農民維持不了生活呢？除非說：農民的生活標準是等於『該死』才行。不但如此，嚴先生還想把百分之五十到七八十的租稅率和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率來對比，說是兩者沒有什麼高下。大家知道，剩餘價值率，是剩餘價值和勞動力價值的比例，可是租稅率是由全部農產品來計算的，農產品裏，不只是農民當時勞動的結果，還有一部份原料，工具等等的代價也在內。這樣

的對比，不是明明的要欺騙人，便是太沒常識！

第二，他說到封建關係，總是說什麼『純封建式的』等。嚴靈峯開口閉口，罵人家是不肖之徒，不懂辯證法。難道按照辯證法，要不是『純封建』，就是資本主義已經替代了封建，而封建只是『殘餘渣滓』嗎？這種方法論，才是標本式的機械論，折衷說！倘若封建制度還是『純』的，——其實那裏有『純粹的』社會，不過是『全盛的』時代罷了，——拿地主還要農民造房子和製造用品，那末，根本就談不到推翻封建制度。只因爲封建關係，是在臨死掙扎的時候，因爲封建餘孽還用超經濟的力量，拚死的維持原有的剝削關係，才須要用革命的方法來推翻他，消滅他。現在封建勢力本來不『純』，本來是餘孽，但是還是維持着主要的剝削關係；却並不是『殘餘之殘餘』，『殘餘渣滓』，而且並沒有『投降』資本主義，還統治着社會。

托洛茨基取消派的方法論，本來是主觀論和折衷說的雜種。老托的中國門徒們，也只會坐在上海租界上，憑主觀的一味胡說。要知道，分析社會現象，不但是需要深刻的了解現在情形的底細，而且還要用歷史的觀點來考察；辯證法是歷史的唯物論。考察中國目前經濟性質，需要了解現在的現象是怎樣發展而來的，經過什麼變化。光看現在的情形，就免不了把租稅捐賦率看做剩餘價值率，把土地商品化，看做資本主義農業。中國現在的土地關係和剝削關係，是經過上述情形，演進而來的。主要的，

用『超經濟力量』來維持的剝削，還是保存，農民的土地問題，始終沒有解決。試問究竟什麼時候，曾經有過一番變化，使資本主義替代了封建社會，封建勢力投降了資本家？照托派的邏輯，本該是三千年前，就有過這般變化，可惜嚴先生沒有具體明白的說出來。我們且不要說得太遠，恐怕冤枉了嚴先生。就假定『國民』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吧。那末，『國民』政府的停止二五減租，屠殺農民，實行營業稅，大概就是十足資產階級的政策了吧！這樣把急的救護地主，真是難得。怪不得嚴先生一方面看到農民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却哭喪着臉說：『封建的，半封建的領主，貴族，官僚，也因此站腳不住了』。封建勢力真可憐，怪不得國民黨先總經理說，『地主要起來革農民的命』了。的確，應該跟着總理和嚴肖子作地主革命了！

資本主義與農村

半封建的勢力，封建的餘孽，至今還統治着中國，尤其是在政治上，這在歷來政府的土地政策上，可以看出來。中國現在革命中，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土地問題。而中國工業還沒有發展到社會化的程度。所以，除非說，等到資本主義大大發展之後，我們再來革命，那時候工廠國有問題和土地問題可以並重。不然，土地問題，是主要的急待解決的問題。就從這點來說，現在的革命，就已經不是托派說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只是附帶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了。再不然，就需要兩次社會主義革命了。這簡直是夢話。

我們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是有相當的發展，這是必然的現象。但是絕對不像嚴肖子所說那樣。他說『農業經濟踏進資本主義的領域』，『農民兩極化』，『一部份農民之變成鄉村資本家』。不錯，資本主義是開始侵入農業方面。但是這只是開始，這是半封建勢力統治下所固有的現象。據他自己引來的統計，農業機器的進口，抽水機，新式灌溉等等的使用，倘若和中國全國農業拿來比一比，那簡直是滄海一粟，絕對不能作為農村一般的資本主義化的表徵。

嚴肖子的救命王，護心盾甲，就是所謂『新式地主』，『商業地主』的理論。這種『新式地主』，既不實行中世紀封建式的剝削，倒活像孫總理『中國式的地主』，他也不像西歐地主剝削得那樣兇！這種『商業地主』的名稱，更是滑稽可笑。辯證法雖然是講矛盾，却容不了這樣矛盾的觀念。就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裏，地主的存在，也該當他是封建的遺孽看待。而商業資本在托派看來，本來是當作一般資本主義的一分子。那末，『商業地主』，應該是資本主義的地主了。中國地主原來比西歐地主還要先進呢！這樣先進的地主，却要用『超經濟』的力量，來剝削百分之七八十的農民生產品。其實，『商業地主』，並不是資本主義統治了鄉村的表徵，不過是土地商品化了，而剝削還是照舊。

嚴靈峯為要證明農民經濟的不重要，來證明中國經濟的資本主義性，竟把資本和貨

幣的觀念，相等起來。他說『農業經濟中假使沒有貨幣，嚴格的說，假使沒有與城市交換，不能進行農業經濟的再生產的，這難道不是城市『領導』鄉村的『性質』的關係嗎？』同時，他說地主向農民要的只是交換價值，而土地又可以用貨幣來買賣。他一而再，再而三，把貨幣當成資本看待。這也是把商品化當做資本主義的禍根。他以為鄉村必須和城市交換，這就是等於城市領導鄉村；那末，城市不向農村交換農產品和原料等，難道城市可以再生產嗎？豈不是鄉村領導了城市了呢！這裏只有把一切貨幣和商品，都當做資本看待才行。可是馬克思主義，一年萬年，也不會變成這樣的嚴肖子胡說。

農村中的確發生農民兩極化（除一般的貧窮化外）。但是第一，這不是主要的現象，雖是重要的現象。主要的現象，是地主的剝削，封建制度下所流行的高利貸和商業資本的剝削，豪紳的剝削，再加以軍閥的搜括。我們絕對不能把地主剝削和軍閥制度分開。兩極化的現象，就是照嚴先生自己說，雇農也只佔全體農民十分之一，而其餘的，却是受封建餘孽的剝削。第二，他沒有指出中國富農實行半封建剝削的特點。他並沒有看到兩極化的特殊情形。這或者是他不願說破的：說破了要打自己的臭嘴。

所以，農村中主要的關係，還是佃農半佃農受半封建式的嚴酷剝削和軍閥系統的搜

括；同時因為農民兩種極化的特別情形，應該格外加緊反對富農。資本主義在鄉村中有影響，但是現在農業危機，農民破產的情形，主要的不是資本主義在鄉村中發展的結果。

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城市中，資本主義，有沒有發展呢？有的。不但
是帝國主義侵入以來，介紹到中國不少近代機器的生產，而中國人也自己採用了許多機器生產，自己也發生了資本主義；而且帝國主義未侵入中國以前，中國已經有了手工場和作坊。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這已經是工業資本主義的第一步。但是中國民族工業的生產，是不是在非農業生產中，或甚至於自己一部門生產中，佔了優勢呢？不。一方面，手工業生產還維持着很大的地位。這還不重要。另一方面，頂重要的，就是中國本國的工業，不僅是由帝國主義所引起，而且是受帝國主義所支配。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介紹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同時，因為帝國主義偉大的財政資本勢力，却支配了中國經濟，而且阻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帝國主義發展的辯證律。嚴靈峯笑人家不懂得帝國主義的壟斷性，其實他自己真的不知道壟斷是什麼。壟斷不僅是沒有消滅競爭，却是更大規模更兇猛的競爭，以至於『動武』。帝國主義介紹給中國機器生產，可是中國資本主義幼弱，政權又不在資本家手裏，不能實行高度關稅政策等等來抵抗外資，却競爭不過帝國主義，所以又受他支配

和阻止。不久以前，上海厚生紗廠又要出賣給外國人，這是一件事實。這並不是說，中國人自己開的工廠，過了十年，一個也不會添加。這裏不能專靠加一個工廠減一個工廠的數目字來考察中國資本主義的情形，又需要觀察發展的（歷史的）過程和性質。

中國工廠中可以沒有洋顧問或洋工程師，但是在經濟上受外國資本支配。中國資本主義企業，可以踏龜步般增加，發展，尤其是像在帝國主義戰爭和用非經濟手段，抵制等時候，較快的發展。這是事實。嚴先生何必怕談戰爭和抵制呢？嚴先生在引用的統計中，一方面把外資創辦的和中外合辦的企業，都當做中國資本主義成份看待。另一方面，又把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五年中國企業發展的數字，胡亂的拿來，却把大戰期中中國輕工業發達和戰後大批破產的情形，輕輕掩遮過去。這明明白是自欺欺人的方法。而且軍閥制度的存在（各據一方阻礙投資和推銷，戰爭，沒有裁厘先加各種稅捐，借外債而對外資作種種讓步等等……），又要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鐵一般事實，那得否認。

所以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有這許多的阻礙。中國資本主義，是否能夠衝破，打倒這些阻礙呢？不。第一，中國資本家本身孱弱；第二，他自己土地化了（也佔有土地）；第三，恐怕動搖了土地私有，就要影響他自己資本的私有，所以不能打倒封建道學和軍閥勢力，不能抵禦他們的反抗，只好向他們投降。而且又因為同樣的緣故

，不能打倒帝國主義，排擠不了他的勢力，抵敵不住牠的侵蝕，只好受他支配。

帝國主義和中國經濟

那末，中國資本主義式的生產，一點不會發展了嗎？不。嚴先生說：『後進國工業有發展的可能』

，『資本主義經濟可以發展』，『資本主義關係可以在殖民地發展和起領導作用』，『帝國主義經濟整個方面是推動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前進』，……不錯。但是這些『成份』，『關係』，『方法』，是帶着什麼性質，是誰的東西呢？第一，大部份的資本主義式的企業：金融機關，工廠，交通工具，礦山，油井，等等，是帝國主義的。第二，許多企業，是合辦的性質，支配權是握在他們手裏。第三，許多『獨立』的中國企業，實際上是受他們牽制。第四，即使有些企業不受牽制，那末嚴先生也不否認，中國企業，本是世界帝國主義經濟一部份，和以爲這是細小微弱的部份。也只得隨着帝國主義的大浪潮漂流。所以中國所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是採取了受列強帝國主義完全支配的性質，是帶有帝國主義附庸的性質，簡單一句話，殖民地的性質，絕對不是獨立的性質。嚴先生自己也認爲『輕工業方面的發展，表現這裡民族工業的特性和經濟力』。試問有沒有『獨立』的資本主義，而只發展輕工業的？

現在我們暫時假定，這樣的發展形式可以前進下去。那末，這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叫做殖民地化！印度就是先例。什麼叫殖民地化呢？在工業方面，

不問帝國主義主觀上有什麼企圖，結果，上面所說的矛盾（帝國主義一方面促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普遍化，一方面又阻礙土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推進中國資本，只向帝國主義所需要，所缺乏，自己所不容易發展等等方向進行。所以，中國不但可以發展一部分輕工業，而且連一部分重工業都可以發展。不過都是帝國主義直接的附屬，一點也不能獨立。牠不但要受帝國主義支配，而且還少後者不得。譬如，在印度造成橡皮，爲的是給倫敦汽車廠做車輪。這裏要注意的，這並不是簡單互相依賴的關係，而是絕對不平等的關係。所以嚴先生說的『帝國主義這樣地供給原料來幫助中國輕工業的發展』，『殖民地可不需急速的發展重工業，能夠擴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在嚴先生的意思，固然覺得帝國主義居然這樣大慈大悲，中國資本主義可以佔着這樣千古難逢的便宜，可是，其實，這是十足的殖民地化吧了。我記得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叫人家去學習學習資本主義，中國的托牌取消派，竟在這裏捧帝國主義的場，真是古今爭光，後生可畏！中國人也該學習學習殖民地化呢！

現在來說一說帝國主義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帝國主義的商品，第一就是破壞鄉村的手工業。帝國主義需要中國原料，盡量搜括，只出低廉的價格。這一方面是加緊擁有原料的地主的剝削；二方面，形成各種專爲供給原料的耕種（大規模或小規模）；第三，加緊商業資本的作用，破壞農村；第四，直接成立各種墾植場。假定帝國主

義勢力，可以順利發展下去的話，印度又是我們的先例。鄉村中甚至於可以發展大規模資本主義的企業；外國的，中國的。但是，這是農業上的殖民地化！帝國主義爲要容易奴役農民起見，爲要得到額外高度的利益起見，一定要維持封建的上層建築，保持封建式的剝削程度；托派的肖子們，死也不會懂得這點，死也不會知道印度的情形，只知道帝國主義破壞封建經濟的空話。南美洲墾植場中的黑奴勞動，列甯就叫他是農奴式的。亂引列甯的話來騙人的嚴靈峯，應該去想一想。

嚴靈峯聲聲口口說，世界經濟是有機的整個體，好像人家都不懂。其實他自己真是不懂得。有機的整個體裏，難道就只有資本主義的成份了嗎？難道各部份都一例『平等』『獨立』的嗎？這樣只知道『一般的』整體，而不知其中組成部份的情形，真是見到森林，見不到樹木，是十足機會主義的方法論。托派罵人家機械主義，自己却是道地的機械主義。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兩種勢力

我們已經詳細說過，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能夠解決土地革命，而且自己也不能獨立發展工業。如果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展了，這是帝國主義勢力的膨脹，是殖民地化的過程。但是歷史的過程，並沒有這樣簡單。上面所說的殖民地化，是假定一切都是『一帆風順的』。實際上情形複雜得多。

世界上已經有了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他本身不但已經大大的縮小帝國主義的範圍，而且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就是促進帝國主義勢力的衰弱。帝國主義自身間，各國間矛盾一天天緊張（德國復興，意大利新興等等）。美國在戰後與英國爭雄。各帝國主義自身間的發展範圍縮小，競爭程度却擴大加深。最近全世界發生恐慌。企圖殖民地化中國的，不祇一個帝國主義，狗多肉少。這些情形，都要阻礙殖民地化的進行。而且各帝國主義自身的消長，也就是形成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帝國主義者又不敢一切投資。同時，却有一個最重要的勢力，就是中國工農羣衆，受帝國主義豪紳軍閥資產階級的壓迫剝削，必然要起來反抗。他要澈底的解決土地問題，消滅一切封建餘孽，却不推進中國經濟往資本主義道上走，而經過許多階段，用各種經濟的政策，推中國經濟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上。這種勢力，我們可以叫做蘇維埃的勢力。

說到這裏，托牌取消派連嚴靈峯在內，一定要說，這是斯大林民粹派的思想。現在我們且來詳細解說一下。

中國因爲受帝國主義協同軍閥買辦豪紳地主的壓榨，現在全盤的經濟，雖然各個別部門，有些進展，但是的確處在停頓和破壞狀態之下，農村裏尤其厲害。這樣的情形，是不能『長治久安』下去的。工農貧民羣衆必然，而且已經起來，爲土地革命，勞動條件而奮鬥。而解決民主革命任務，只有他們能擔任。革命成功，建設工農專政。

他是帝國主義的死敵，必然要打倒帝國主義。工農專政的階級性，是不能幫助國內發展資本主義的。倘中國幼弱的工業，還是向資本主義發展，還是要遭資本帝國主義滅亡或支配的（如土耳其）。所以只有經過各種經濟政策，導引中國全部經濟走向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帝國主義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必然結果。

什麼叫做不平衡的發展呢？古今中外，世界上的經濟，不是同時發展到一樣的程度。在中國北方有了部落社會的時候，南方正可以還存在着半猴子的羣。在英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時候，美洲還是部落的社會。在英國已經是帝國主義經濟的時候，美國還在發展工業資本。所以，某一個國家某種經濟條件先成熟，另一個却落在後面。政治條件亦是這樣：有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有的還是封建勢力領導的帝國。因此，某一國可以先成熟革命條件，起來作革命，而另一國却落在後面。法蘭西大革命，比德國革命在先。俄國已經成功無產革命。既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那就創立一種條件，可以建設社會主義。

這種不平衡的現象，不但各國間存在，而且各部門生產中也存在。最明顯的，就是工農業的不平衡。同時，進步的速度也不平衡，優勝劣敗的地位也時常變更。德國資本主義後發展，在戰前却要趕上英國。美國在戰後，步步的侵佔英國的地位。意大利現在又新興起來，要爭地盤。這是因為後進的國家，可以立即應用最新的技術

，來進行生產，所以發展得快。而先進的企業，却有許多舊設備，不能一下就毀去。英國在未用機器以前，手工場已經發達到極精細。一枚繡花針，就需要經過七十二番手續。所謂機器的生產，就不過是機械的動力，替代人工的動力罷了。然後機器逐步的進步。可是中國就用不着經過這樣時代，一下子就可使用最新的機器。所謂帝國主義經濟把世界打成一片。因此，對落後的場所，就發生促進的影響。這種情形同時却更促進不平衡的局面，更促進不斷的衝突。這種不平衡的現象，到帝國主義時代，特別表現得厲害，成爲發展中主要的定律之一。後進的國家，因爲這種不平衡的發展，不但可以而且必然要趕過先進國（德英，美英），而且越過一種以至幾種社會形式（當然是經過過渡的階段）。帝國主義打入非洲，設立墾植場，非洲部落社會下的土人，就變爲資本主義墾植場中的奴隸工人。蘇聯北方游牧，捕漁的民族，經過蘇維埃的幫助，要變成集體畜牧和集體漁場。中國的經濟，在工農專政之後，除非又落在帝國主義掌握中，那末工農政權從此消滅。不然，就是實行各種政策，經過幾個階段，把蘇聯經濟作爲先例，再靠他的幫助，進到社會主義的建設，不走資本主義化的道路。這是必然的現象，不僅可能的事。

可是這並不是說，工農專政一成立，資本主義企業就一個也沒有了。不。革命是一個政治的行動，是要奪取政權。就用政權做條件，來促進經濟的發展，來解決各

種經濟問題。開始的時候，向帝國主義沒收來的工廠，或反革命的中國資本家的企業，甚至必須出租或拍賣。但是他與『剖民』政府不同的，就是他以工農階級利益做出發點。他不但不會取消二五減租，還要下令沒收地主土地，不但不會壓迫罷工，還要幫助工人管理工廠。國家必須設方法來調節生產。一方面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使生產向一定的方向發展。托牌取消派，說這是民粹派的主張。這十足是拿『非資本主義發展』這幾字，用拆字的方法來哄人。有人把共產主義四個字拆開，說共產就是把產共一共。你有一百萬家當，讓四萬萬同胞來共一共，每人共到二分半大洋；你有一個老婆，我來共一下，你一夜我一夜，或者你先睡我後睡。這是最下流，最沒有常識的騙人混蛋話。民粹派說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可以發展社會主義，是非資本主義發展。你說循着蘇維埃路線來發展經濟，就是非資本主義發展，大家都是『非』，所以你就是民粹派。其實，民粹派的主張是怎樣呢？

從前俄國有一種公社，是像古代農村公社一類的東西。但是後來裏面起了分化，有貧農富農中農的分別，內部經濟上完全不平等。而且地主利用這種公社，用不着按戶收租，叫他們一起合繳。在公社中分擔租額時候，貧民受種種欺侮。而且爲要交租，土地根本不能放棄，放棄了還要交租。民粹派人却說這種公社，是原始共產社會的組織，內部完全平等。想利用公社來建設社會主義，跳過資本主義。其實資本主

義分子，早已侵入進去了。大家試拿來同我們的蘇維埃化比一比，那簡直不只差十萬八千里呢！

這種蘇維埃化的可能，比殖民地化的可能要大。爲什麼呢？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使中國殖民地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戰後蘇聯的存在，使帝國主義削弱，又使他不容易赤裸裸侵略殖民地。帝國主義相方間矛盾，現在愈複雜，愈激烈；譬如戰前有德國要爭雄，那戰後，德國復興，意大利新興，美國爭奪世界經濟領導權。他們誰也不肯放誰。帝國主義因爲勢力範圍縮小（蘇聯，殖民地自己發展工業，競爭者增加。），所以經濟上表現長期疲態，就要用合理化等進攻工人階級。

而現在又有大恐慌，工人就起來反抗。這都促進帝國主義的滅亡。帝國主義發展範圍縮小，誰都想爭殖民地。英國獨霸的印度，美國尙且要打進去，何況中國向來是好幾個『老板』侵略的，誰肯讓誰呢。所以借一筆債款，築一架無線電台，就有許多『友邦』，你爭我攘，需得到什麼『諒解』。而且帝國主義扶植封建軍閥，不但是你擠我拉，而且往往各人自己主要的有一個軍閥，或者幾個軍閥，弄得中國四分五裂，因爲他們大家都要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大。這樣又弄得中國不統一不太平。在這種時候，帝國主義又怕投資，恐怕損失虧本，沒有着落，拉不到債主。所以就不敢投資，需要一再參觀，攷察，談判，攷慮等等。現在美國銀借款問題，就是一個例子。雖然，我

們知道，他們背地裏是雙方而求之不得，也許暗地裏，非正式的正在進行。可是『觀望』究竟是事實。加以以現在工農運動高漲，蘇維埃區域擴大，不但使他們寒心，而且阻止他們發展。工農貧民必然的反抗，是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致命傷。

所以蘇維埃化是帝國主義世界經濟不平衡發展必然的結果，是要戰慄所謂殖民地化的。

嚴靈峯說人家保持『不動』的觀念，把主義看做『教條』。他不懂得『世界經濟有機整體』之下的不平衡發展，不懂得整個世界經濟是不能跳過一個階段，而其中一部分，一個國家，是可以經過過渡形式，越過一種社會形式的。像他才是形式主義者，把馬克思學說，當教條用。現在土地革命沒有完成，而土地問題立刻需要解決，而且可以由工農自己起來解決。而這種革命起來，同時却解決不了工廠國有，企業社會化的問題。那末，照他的『動』法，却要革命的民主性『動』一『動』，叫他做社會主義革命。可不知道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企業社會化的革命性質，不知又要『動』到那裏去！開一開玩笑：大概叫做『共產』性罷，

我們說，蘇維埃化要克服和終止殖民地化。可是我們不是一個定命論者。我們絕對不是說：殖民地化一點也沒有實現的可能，天生只有蘇維埃化。我們所說的，第一，最後的勝利，是屬於蘇維埃。殖民地化也許有相當的進展。我們並不擁護殖民

地化的理論，這是右傾取消派的理論。我們認爲殖民地化，也是一種主要的勢力，要推動中國的社會。『誰勝誰』的問題，是存在着，是在鬥爭中來解決的！這就是我們了解兩種勢力的觀念。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中國發展中，只有這兩種勢力。其他的力量還有，而且自有他們自己推進的方向。不過這兩種是基本的，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附屬的，跟着這兩種變化而變化，同時當然也能影響這兩種力量。好像俄國的發展，列寧曾經分析過有兩種路徑，一種是普魯士傾向，一種是美利堅傾向。中國因爲處在戰後帝國主義的時代，所以不能死板的抄襲俄國情形，應該具體化，特殊化起來。這就是我們提出這兩種勢力的所由來。

中國地主和資產階級，不會解決農村問題：他既沒有普魯士式的大地產，也不能像斯托柳賓的依靠富農。只有農民受無產階級領導，自己起來才行。實行土地革命，是和推翻封建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統治分不開的。而中國土地革命和反帝國主義鬥爭，又是一件任務的兩面，都不能任意拆開來幹。這當然也不是說，工農專政一成立，馬上就把外國工廠一下子沒收，領事館都一倒搗毀。不！革命是奪取政權的行動，當然要看具體的環境，有計劃有步驟的，根據工農的利益，真真動員數千百萬萬民衆的力量，引起國際無產階級一定形式的幫助，來完成我們歷史的使命。

托牌的嚴靈峯說：『非每次經濟危機，每次內戰爆發，都是革命局面。』我們說：『每次經濟危機，每次內戰爆發，都是統治階級及其經濟暴露弱點，表示動搖，可以做革命進攻的時機，尤其是在戰後帝國主義第三時期中經濟恐慌和軍閥混戰的時候。革命的導火線，連國會內的風潮都可以充當。』我們不像他們那樣坐等革命飛來，頌揚帝國主義美德，贊助資本主義脫離恐慌，掩護『國民』政府的半封建性。我們看到帝國主義的動搖，封建餘孽的將倒，羣衆革命運動的高漲，應當組織，組織，組織，動員，動員，動員羣衆。當然不學立三主義的一味抓住幾個人盲動！其實立三主義，不了解不平衡理論，混說世界經濟是整個體，倒是嚴先生的理論的同鳴者呢！

……立三同志的說法，以爲一省幾省的勝利，直接就是全國範圍之內已經成熟的革命形勢，這種說法把國際執委和中國共產黨的地位事實，一下子都推翻了。……這些事實是：中。國。封。建。軍。閥。的。割。據，帝。國。主。義。的。瓜。分。中。國，中。國。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

——摘錄共產國際來信

紅旗週報

第六期增刊

四月十八日出版

目次

今年的五一節

資本主義國家的五一節

社會主義決勝的一年

建立下層統一戰線問題

京漢路上紅軍的勝利

共產國際爲聯共黨內問題致各國共產黨的信

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

蘇聯的五一節

關於『金貴銀賤』與無產階級運動的幾個

問題

(澤民)

一 『金貴銀賤』的原因

自從一九二九年一月起到現在，上海標金的價格，從三百四十多兩漲到七百九十兩。在兩年之內，銀子和金子的比價相差了恰恰一倍光景。跟着這個，物價騰貴，工人階級的生活受到空前的痛苦。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們，當然是不會根據工人階級的利益，對於這樣重要的現象來加以正確的分析的。可是工人階級自己却必須有明確的了解，然後可以提出正確的階級要求，不致於受資產階級所欺騙。

爲了這個目的，毫無疑義，工人階級必須首先明瞭金貴銀賤的原因。

資產階級在這個問題上給了個什麼答覆呢？他們的答覆是：

(一)因爲上海存銀太多了。這當然是笑話。上海不是產銀的地方，存銀太多，必有來源。爲什麼銀子都擁到上海來了呢？資產階級祇看到上海的巨額存銀，壓低

了銀價這個事實，却不知道去找牠的原因。這樣，當然不能算是一個答覆。

(二)他們又說因為印度安南等殖民地國家，現在都改用了金本位制了。印度的農民和地主都喜愛把錢窖藏起來的。以前用銀，他們藏銀子，現在用金，他們改藏金子，藏銀流出，所以銀價跌落了。這個話是有相當的理由。但是夠不夠呢？不夠，不夠。爲什麼？因為銀子的價格是隨着銀子的價值來決定的。銀子的價值是由於銀子的生產技術來決定的。如果銀子的生產技術沒有什麼改變，那麼銀子的價格不過暫時動搖一下，依然回到原來的高度，決不像現在這樣一直往下跌到這樣大的程度。因此他們又說：

(三)因為銀子生產過剩了。現在生銀大半是銅錫鉛等金屬品的副產物。近來電氣事業的發展，使銅的需要增加，於是銀子的生產就增加了。『供過於求』，所以跌價。這裏我們看見他們觸到了一點根本的地方了，就是銀子生產的技術有了變更。可是這些資產階級却不在技術的基礎上去着想，單在生產的多寡上去着想，這又是錯的。如果真正是技術上沒有改進，單是生產得太多了，那麼『供過於求』的結果，必然跌價，跌價的結果，必然有許多銀礦破產，於是銀子的生產減少了，銀價又要回到原來的高度，決不會像現在這樣跌法。所以我們的敵人在這裏就是觸到了比較根本的一點，可是他們逃避了應做出的結論。

什麼是應當做出來的結論？就是：銀子作為銅的副產品，是技術上的一大進步，由於這個，生產一兩銀子所需的勞動時間根本減少，價值低落了，所以銀子的價格就一去不回頭的低落下去。

資產階級「學者」們不肯說這句話，因為他們害怕工人階級知道了這個真理，怕工人階級明白了銀價跌落物價高漲不是暫時的事，而是長久的事，就起來鬥爭，要求增加工資。

現在的事實是這樣，銀子的價值的確因為技術上的進步而低落了，將來即使價格上可以稍為回漲一下，也決不會回到原來的高度的。工人階級永遠不能再希望有物價重復低廉起來的一天。

不過，單像上面那樣去了解『金貴銀賤』的原因，却是十分不夠的。因為我們只是從資產階級口裏所已經說出來的話中間，去找得了一些原因，却不曾從他們所沒有說的事實中去找求原因。要知道，資產階級是永不肯向工人說實話的。因為他們要來欺騙工人羣衆。

試把上面我們所認為最根本的一點來仔細研究一下。

不錯，因為銀子是銅的副產品，所以價值低降了。可是試問這種技術上的進步，是不是現在才廣大採用到工業中去的呢？不是！用電氣分解去生產銅，順便得到了

銀子，這種大工業發展了也已經十多年了。而且在這個時間內，世界銀子的產額，據資產階級自己的調查，並沒有增加。就是拿現在講，現在銀子跌價跌到這樣，可是世界的銀產額也依然沒有增加，同時也並沒有增加出多少銅礦廠來增加銀子的副產量。這樣看來，這種技術上的進步，還不是目前金貴金賤的直接原因，而僅僅是一種潛在原因。

爲什麼說是『潛在的』原因呢？

比方是這樣，有一百個產銀的礦，其中五十個是用水銀去採礦苗中的銀子的，是舊法。還有那五十個是以採銅爲目的，而銀子是副產品的。一百個銀礦共總產銀每年一百萬兩。現在每年對銀子的需要也是一百萬兩。那麼，銀子的價格不會跌下去。

明兒商業衰了，銀子只要五十萬兩了，價格跌落，那時先關那些礦的門呢？自然是先關那些用舊法採銀的礦，因爲他們的成本貴，不能賺錢。這樣，新的價格就依照新法的銀礦的成本費做基本來決定。於是這些銀礦中所生產的銀子的價值就決定銀子的價值。那時我們說：現在銀子生產的技術基礎變動了，以前是新法舊法的銀礦一齊開工的，現在只有用新法來開採了。從比以後，銀價一跌，就不再回頭，沒有回漲的希望。這樣看來，可見，那五十個新法的銀礦雖然早已存在，可是一直要到後來才能夠降銀價，因此我們說，這種技術上的進步，在最初只是銀子跌價的『潛在的』原因。而

商業衰落，銀子需要減少，却是直接的原因。

現在的情形正是這樣。銀子的生產額現在同過去一樣，銀子的技術進步也早已有了，可是銀子老早並不跌價。直到世界經濟大恐慌起來，商業衰落，需銀減少了，那些用舊法開採的銀礦紛紛關門，於是銀價被那些作爲銅礦副產品的銀子的價值所決定，而跌價風潮突然爆發起來。

中國印度安南等殖民地國家，都是用銀的國家。在帝國主義的剝削之下，商業衰落。尤其像中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國民黨軍閥在一九二八年起連年大戰，商業幾乎完全停頓，農村經濟大規模的崩潰，演成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慘到極點的大飢荒，農民無米麥可賣，也無錢可買東西吃，這樣，銀子自然多餘出來了。商人們手裏拿了幾百千萬的現洋無處可用，銀價自然要跌。這是一個原因。

但是這種殖民地的經濟崩潰，不單使流通的銀子需要減少了。同時并且使窖藏中的銀子也流出來了。世界帝國主義的剝削和世界農業恐慌，不但使千萬小農民破產，并且使許多地主也破了產。農民固然把積蓄的銀子一齊拿出來買命，地主也只能把窖藏起發出來還債。中國，印度，安南等處都如此。這樣大批窖藏中的銀子都湧出來，使銀子已經過剩的流通市面，更加有銀子太多的現象，而銀價更被壓低。

不單如此，中國的軍閥和革命使地主不敢再住在鄉間。土地是搬不動的，多半是

帶了銀子到上海香港等大都市去『避難』。不單中國，印度安南以及其他許多殖民地，到處有農村革命暴動，因此地主逃到城市成了最普遍的現象。這樣又因為政治的原因加速窖藏的流出。

而這些銀子自然都集中到上海之類的都市去。前面說，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肯說出銀子所以集中到上海的原因，只把銀子集中上海來做金貴銀賤的原因，是他們的一種欺騙方法，現在可以明白了。銀子跌價在這種原因之下，乃是第三時期帝國主義加緊剝削和掠奪殖民地的結果。

依照經常的情緒，商業衰落，市面上流通的貨幣過剩了，銀子是走到窖藏中去的，現在剛剛相反，從商業流通界和窖藏一齊向外排擠，擠來擠去沒有地方去，銀價自然格外迅速的跌落。這又是第三時期殖民地經濟的一個特點。

在資本主義國家，因為世界經濟恐慌的結果，用作窖藏式用途的（如打首飾等）也減少了，用作工業原料的（如照相，電影片等等）因為經濟衰落，也減少了。所以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銀子的需要又減少。

這樣，全世界銀價壓低的結果，根本影響到銀子的生產技術基礎。凡技術低劣的都關了門，他們再不來決定銀子的價值，而銀子的價值却由那些技術甚高的，就是主要的把銅礦中的副產品銀子的低廉價格來決定，而銀子的價值遂一蹶不振。

假定以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稍稍和緩，商業又恢復一些，那時怎樣呢？那時候，即使有人又來投資銀礦，他們也不會採用舊法，而必然採用最新的技術了。所以銀價將來即使會稍稍回漲，可是永無完全回復的希望。工人階級吃這個虧是再沒有蘇鬆的時候的。

凡此一切，資產階級都封起了口不講，因為他們知道一讓工人們知道了，工人們就完全失望要起來鬥爭，所以他們故意把銀價變動說得異常之渺茫難測，好像完全有神祕的力量在操縱着，今兒大跌，明兒也許又大漲了，這樣就好使工人階級莫明其妙，只盼望將來。

不過『金貴銀賤』不單由於銀賤，而的確又因為金貴。金貴和銀賤不同的，就是，如果銀子跌價因為價值降低，金子漲價却僅僅因為價格提高。

金子的生產，在技術上並沒有什麼變動。價漲的原因主要的是有兩個：

(一)是世界經濟恐慌的起來的時候，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盡量的吸收現金，為的防恐工業破產，帶累銀行倒閉。

當一九二九年年底世界金漲特別加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二)是世界帝國主義國家積極準備第二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和進攻蘇聯的反革命戰爭，所以也拚命的吸收現金。大戰一起來，每個國家都要向別國大批購買貨物，現金

有時是特別重要的。他們不但爲準備戰時需用，並且爲在戰爭之前，預先破壞別國的金融基礎，也拚命的爭着吸收現金。

爲這兩個原因，所以歐洲各國都盡力的由虛金本位完全過渡到金本位制。爭奪現金成爲目前帝國主義國家間極大的鬥爭。法國積蓄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黃金，企圖吸空英國英格蘭銀行的現金，英國反過來用外交向法國交涉。

這樣鬥爭的結果，自然會把現金價格提高，而金貴銀賤的風潮更加猛烈了。

二 『金貴銀賤』能够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麼？

『金貴銀賤』使各種外國貨的進口，都因爲原來是用金價計算的，合到銀價來賣給中國人的時候，價格都合算得非常昂貴了。這對於中國工業發生兩種相反的影響：

第一，是工業製成品的輸入因此減少，使各項中國自製品勃興。許多小規模的日用工業品工廠，如製帽，製革，化妝品，橡皮鞋，醫藥用品等等都發展起來。最近兩年來，上海一地添加了不少這類的工廠。

『金貴銀賤』彷彿是天老爺對這班懦怯的，不敢得罪『洋大人』，不敢關於提高關稅的事認真的放一個屁（他們用關稅自主的宣傳欺騙羣衆，倒已經兩三年了）的中國資產階級十分垂憐，特地弄這麼一個機會給牠，用不提高關稅的方法，增高了中國資產階級對

外國輸入商品的競爭能力，在去年年底竟有了很滑稽的事，就是在中國紗價大跌的時候，中國的紗竟趁着『金潮』往日本輸出。因此，一部份的資產階級莫不額手稱慶，說是天幫助了他們。於是他們定到替自己描畫出一個異常可愛的前途。大呼『金貴銀賤正是抵制洋貨提倡國貨的機會！』這種呼聲，逐漸也成爲南京政府公文中的用語了。

可是，另一部分的資產階級却吃了金貴銀賤老大的虧。那是那些工業資本家專門倚靠着外國原料來生產的。紙烟業，火柴業，是其中最顯著的。這兩項工業在一個時期裏面，倒了許多大工廠，幾乎全體破產了。其餘如紗業，依靠印棉美棉的趨勢日益增盛，也在大聲叫苦，紗業的所以能夠維持，是因爲牠們用外棉還只部分的，而且同時世界棉花跌價，也幾乎和金價的抬高一樣迅速。由於中國飢荒和戰爭的結果，上海甚至天津的麵粉業也依賴洋麥去生產，所以麵粉業也受到打擊。而這些工業正是民族工業中最主要的企業。

所以算起總帳來，中國民族工業還是受惠於金貴銀賤的少，受虧的多。

當然，如果金貴銀賤能夠長久繼續下去，銀價不斷的跌落，金價不斷的上升，那麼，外國貨的輸入可以長久被阻止着，中國工業的發展可以長久的發達下去。就是原料方面，明兒亦可以改到完全採用本國的原料。這樣，中國資產階級『利用金貴銀賤以發展實業』的甜夢就可以做得成功。可惜，傻子亦知道決沒有這樣的事。

銀價是終究要穩定起來的。外國商品的大規模拋入中國市場是必定要恢復的，中國的民族工業在這裏是找不到前途的。

下面來比較仔細的攷察一下

銀價的跌落，貨價必然的比例上升，這是經濟學上的定律。如果銀價一跌落，貨價立刻按照比例上升，那麼中國的工業得不到任何好處，這是很明顯的。但是實際上却不是這樣，貨價的上升往往比銀價的下落來得慢些。這樣就暫時產生出中外商品價值平面的相差來了。中國的工業現在就在利用這一點相差，去和外國的商品作有利的競爭。

同時，這種相差的所以發生，又有以下的諸種原因：（一）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比工業品更慢，因為農民的落後，窮困，受商人、高利貸者、和資本家地主的操縱等等。（二）工人工資在資本家白色恐怖的壓制之下，上升得也非常緩慢。就是利用這兩種相差，所以中國工業品，可以在遠低於同樣外國商品價格以下的平面上出賣而獲得厚利。不過，這樣的情形是不會長久的。農業的生產以一年為週轉期，工人的生活標準一半跟農產品的價格為轉移，一切原料人工都逐漸上升的結果，物價終於要漸漸上升而達到與幣價跌落相比例的平面。現在全國已經是到處一片漲價聲了。銀價穩定以後，漲價一定繼續不止，而很快的便要達到這樣的高度，使外國的商品和原料的輸入重復

變成有利。那時候外國商品又要復佔一切市場，新興的各種小企業又要大批的破產了。

不單如此，中國的工業中，本來到處有外國資本工廠存在。他們有較優的技術和管理。他們同樣受着金貴銀賤的有利的影響。上海的中國紗廠在最近一個時期內僅能維持，上海的日本紗廠却大獲厚利。最近中國人的厚生紗廠賣給日本人更是明證。

從這裏又可以知道，金貴銀賤固然相當的阻止外國商品的輸入，却鼓勵外國資本的移入中國，而增長他們在中國境內對中國民族工業的競爭力量。最近日本在華紗廠大擴充，並時時風傳的日本企業移到中國的說法，都受了金貴銀賤風潮的一部分影響的。

最後關於市場問題。金貴銀賤使百貨漲價，無形中幫助一切形式的剝削者增加了對於一切勞動羣衆的剝削。勞動羣衆更加貧困，國內市場更加乾涸。中國的民族工業是倚賴國內市場去生存的，金貴銀賤的影響，最終的還是不利於民族工業。

這樣說來，可見金貴銀賤至今在主要的工業部門中，還只是使中國民族工業破產衰落，同時又不給任何玫瑰色的前途。在去年夏天，當金潮暫時的稍稍平靖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辦的報紙上，已經預先宣告秋天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競爭對中國『屯併』的時期了。這事實僅部份的開始的時候，第二個銀潮再起又中止了。現在帝國主義者正在等候第二個屯併的機會。屯併的意義，依照那個日本帝國主義者報紙說

，是大量洋貨『殺到』中國來，意義是中國民族工業的瓦解，是全中國國民經濟的比目則更猛烈得萬倍的恐慌。而這種大恐慌的來到，毫無疑義要把銀價穩定作為轉灣點之一。

三 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和中國資產階級怎樣企圖來

『挽救』『金潮』？

中國資產階級和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南京政府——這些剝削者階級和政府的所謂『挽救』政策，當然不是來挽救勞動羣衆於金貴銀賤的苦痛，而是挽救他們自己的垂危的運命的。

由於金貴銀賤，他們有些什麼事要來挽救自己？

首先就南京政府來講，牠負有巨額的外債賠款，都是用銀子折算成金價去交還的。

現在因銀價跌落一倍的緣故，每年外債賠款本息的交付就要增加一倍。牠必須準備軍閥戰爭，現在正用全力來『圍剿』有紅軍和蘇維埃區域，因此需要巨量的偷偷購買軍火，這筆費用，因為銀價跌落關係也要平添一倍了。而這種『意外』的增添，却是在南京政府自中央起，至各省各縣的政府機關的財源『羅掘俱窮』的時候。如果不能迅速想一

個辦法，那麼破產即在目前。而因為現在南京政府的國庫，事實上已經差不多變成了中國銀行資本家的私庫，所以這些銀行資本家是特別關心的。

其次，拿南京政府下面的各鐵路來講（這在戰爭中的作用自然是很大的），現在也因為銀價跌落的緣故，是在歷次戰事以後又加上了新傷。收支最良好的京滬鐵路尚且因此虧空一千多萬無法抵補。因為這些鐵路大概都負有重債，債主都是外國資本家，償清都是要用銀兩折算成金價的。

然後是一般的金貴銀賤對於中國最大多數中等資產階級，以至大資產階級的直接的破產威脅（關於這一點上面已經分析過了）。他們希望用一些什麼方法去穩定銀價。凡這些資產階級各階層的要求，都反映在南京政府的各種政策裏面。

他們採用些什麼方法來挽救自己？辦法是幾乎等於零。實際上，自己站在資本主義原則上的資產階級，當然沒有辦法可以想得出來的。

去年八月南京政府曾經頒佈了禁金出口，禁銀入口的命令。這個禁令在一部分的資產階級中間，早已批評是沒有用處的。『因為』——據他們說——『銀子跌價既然是世界市場上的問題，那麼一個國家來想法是沒有用處的。』據我們的看法，銀子既然同時又是根據於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而經內地的貯藏中流出的，那麼禁銀入口更是毫無用處的。果然禁令行了半年，毫無實際的効力。實際代表上海和浙江銀行資本家的

財政部長宋子文之所以頒佈這個禁令的目的，並不在真真阻止銀價跌落，而在便於操縱銀價，使這些銀行資本家能夠從中獲取標金市場的投機利益。

此外就是採用金本位的空喊了。由外國顧問甘末爾所計劃，中國的『經濟學者』（馬寅初博士所擁護的『中國逐漸採用金本位幣制法』，終於只是紙上的空談。南京政府並沒有力量，也沒有決心去做任何實際的準備實行金本位制。爲什麼原因？因爲在南京政府裏面佔得重要地位的，是銀行資產階級，他們本是利用了金貴銀賤的潮流發了財的。他們對於南京政府財政破產的前途，雖然很有些害怕，可是『逐漸採用』金本位制，却救不得目前；而目前的救急辦法，却很可以用大借外債來解決的。

然則他們爲什麼要來宣傳採用金本位制？那是一種策略，一種欺騙，一方面來安慰那千萬正在破產中的中小資產階級，一方面來欺騙那在陷到更深的水火之中去的勞動羣衆。

至於南京政府自己本身的（藏在他們幕後面的）『救濟』辦法，却是一個非常可恥的『賣國』的計劃，用我們自己的話，就是投降帝國主義的，幫助帝國主義者來殖民地化中國的計劃。這種計劃一點也不是從穩定銀價的觀點出發的，這個他們是讓資本主義的盲目的法則去自然地解決了。這種計劃，甚至也不是從發展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觀點出發的，因爲南京政府已經不十分是一個中國民族資本利益的代表者，而是國際帝國主

義（首先是美國帝國主義）利益的代表者了。是一種爲了外國財政資本，和中國一部分資產階級（首先是銀行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怎樣來對外國由向中國出口所遭受的損失給與抵償，更加殖民地化中國，和怎樣渡過南京政府的財政難關，裝飽中國銀行資本家的錢袋；——這樣，他們是要鞏固自己來壓倒中國工人和農民的蘇維埃運動。

在這裏，對於破產着的中國小資產階級羣衆，他們是企圖用關於紅軍和蘇維埃區域恐怖的造謠宣傳去鎮懾他們，使他們服從南京政府的政策。至於大資產階級中不利於銀價跌落的部分——一部分民族工廠主——那他們是早已逐漸與銀行資本和外國財政資本混合生着，不能形成獨立的鮮明的政綱了。

這種大借款（是銀借款）據報紙所傳，說是有十萬萬盎司。這筆巨額的生銀送到中國來，絕不是爲抬高中國的銀價，而是相反，爲壓低中國的銀價的，對於沒有經濟學知識的人，也應當是十分明顯的。大借款成立以後，中國必然有新的銀價跌落的潮流，新的破產，和新的困窮。這自然是中國一部分的資產階級所需要的，因爲他們可以從新再一次來降低中國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加重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

對於帝國主義者，這筆大借款將在短時期內造成中國銀價和國際銀價的剪刀式的相差。中國由於大批生銀進口的緣故，銀價更跌了，國際市場上却因爲借出了這大量生銀的緣故，銀價有相當的回漲。利用這個差數，他們又可以從買中國生銀賣到世界市

場上去的方法獲得大利。

環繞於這個大借款的週圍，帝國主義列強自然是進行着鉤心鬥角的競爭。

由美國單獨借款呢？還是由國際銀行團借款呢？

環繞着這個問題，中國各派的地主資產階級和他們在南京政府中代表，也在進行着殘酷的鬥爭。

代表着英國的由國際借款的主張的胡漢民被免職了。美國的企圖是乎是勝利了。國際中間的鬥爭如中國軍閥新戰爭的形勢於是更加緊張起來。

這樣大借款將來怎樣分配？中國統治階級中的各派也在圍繞着這個問題作殘酷的鬥爭。一部份的資產階級說：應當用到發展實業上去，於是他們引了『孫中山先生』的利用外資開發富源的話做旗幟。自然，孫中山的這個計劃，現在正好是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理論』的根據了。這班已經偎倚到了帝國主義懷抱裏去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現在已經除了做帝國主義的經理人，來分沾餘潤以外，沒有別的出路了。而中國的地主和銀行家，却主張主要的應用於『剿滅匪共』。當然，壓倒紅軍和中國蘇維埃運動，現在是所有中外統治階級共同的利害。這兩種要求，不能成爲完全對抗的要求，所爭的是分配中間具體的分量問題。而這中間的鬥爭，現在也正在發展了。

然而十萬萬益斯對於加在中國工農羣衆身上的痛苦來講是很大的，對於南京政府的

需要來講，却是很小的。不多幾時就可以化完，就可以再談第二次借款。

如果南京政府一天不滅亡，那麼借債生活將不斷的繼續，這樣，牠愈加積聚牠身上的債務，愈加喪失其對外的一切獨立性。

然而這裏，却絲毫找不到對於銀價問題的救濟。南京政府的『救濟』政策，是更加加深中國銀價問題的恐慌，而由中國的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和帝國主義者來公共分配金貴銀賤中的投機利益。

至於金本位制，將來在各種有利於帝國主義者的條件下，是可以建立起來的。印度安南不是都因為英國和法國財政資本的需要，而改用了金本位制嗎？然而，目前他們對於中國，却暫且還不需要這個，他們不能把為準備大戰而積聚着的現金，來給中國建立金本位制。

四 中國無產階級對於金貴錢賤問題的立場

金貴銀賤首先是對於中國勞動羣衆的生活，給與了絕大的打擊。農民因為農民自己的家庭手工業破壞，購買城市工業品日多，這一切都漲價了。而農民自己的農產品，却因為仰賴於商人的轉售，依然用極低的價格出賣，讓最大部分的利益給這些商人賺去。所以金貴銀賤增加了農民所受的剝削，加速了農業經濟的崩潰。

工人階級因爲日用品一切都貴了，而資本家對於工資却不肯增加。這樣，金貴銀賤是幫助資本家降低工人的實際工資。

最近兩年來，銀價的可怕的跌落，是繼續不斷的。物價指數跟着上升，工人即使每天爲工資而鬪爭，每天獲得相當的勝利，也還是趕不上實際工資降落的迅速。可是在這過去的兩年中間，資本家在蔣介石南京政府的白色恐怖幫助之下，不但不曾增加人工工資，并且藉口工業破產來減少人工工資。有許多工廠的罷工，是因爲資本家對工人進攻而引起的。現在在第二個銀潮來了以後，顯然物價的高漲用加速度進行了。一片漲價聲中間，提出了工人階級爲保持他們那餓死線上的工資而鬥爭的任務。

我們的口號應該是罷工，罷工，罷工，爲增加工資而罷工！（當然，工人階級在目前階段的全部要求絕對不限於這一項；在南京政府作垂死鬥爭，進攻蘇維埃革命運動的時候，我們的進攻路線是『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可是忽略了金貴銀賤下工人階級關於工資的切身要求，和許多其他經濟上的要求，如工作時間，反對合理化的鬥爭，關於女工青工的許多特殊要求等等，却要走到以『左傾』辭句掩蓋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消極的立三路線去的！）

現在的資本家很巧妙的應付着工人。一旦發現工人有什麼鬥爭起來，往往立即把這些最初的要求答應了，先等工人的憤怒平靜下去，然後再慢慢設法取消他所答應的條

件。這固然證明資本家欺騙手段的進步，同時却證明工人階級更應當由澈底爲工資而作進攻的鬪爭。

這是一種辦法。

此外我們應當反對大借款，不論是金的銀的！因爲這些借款只是加深中國的殖民地化，加重中國勞動羣衆的窮困與負擔，而是準備着更深的經濟恐慌的基礎。因爲這些借款，是用了去攻打紅軍和蘇維埃區域，延長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壽命，替帝國主義列強解決中國政府還外債的問題，同時外加上許多使中國殖民地化的條件的。這種大借款，不能救濟『金貴銀賤』對中國工農羣衆的苦痛，反而加深這些苦痛。因此我們必須反對大借款。

我們還應當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償付一切外債本息，都拿來充作工人階級的救濟金，尤其是失業者救濟金。應當要求南京政府真正禁止物價的高漲，不要只是一道空的命令來掩飾。

這些都不過是暫時救急的辦法。南京政府是即使這些辦法也不會實行的。至於根本的辦法，那唯有去掉上面所說的這些原因，那就是必須根本推翻帝國主義者和地主軍閥資本家的統治。現在的金貴銀賤，既是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劇烈爆發中，資本主義生產矛盾之一種表現，所以站在資本主義原則上的中國和外國資本家及地主資本家聯

合政權的南京政府，決不能解決這種問題。正像一個人自己提不起自己的身子一樣。

只有走向社會主義前途的蘇維埃革命，才能夠將這種資本主義原則打得粉碎，同時使牠的一切矛盾都消滅，金貴銀賤的這種現象才可以根本消滅。蘇聯已使用半紙本位的國家，逐漸國內一切生產和分配更有計劃更有組織時，就可以完全廢去金錢。只有學蘇聯的榜樣，才可以根本解決幣制問題。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和機會主義的新活動

啓凡譯

蘇聯共產黨揭露了瘦草夫和洛明那瑟派別的小組織的反黨工作，而很快的打碎了這種企圖。這些小組織——雖然他們的『幹部』很可憐，可是還在互相結合聯盟，來做反對黨的派別鬥爭。這兩個小組織聯合起來，反對黨的列甯政策，反對黨的領導，他們是有共同的政綱的，這個政綱，一般的講來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政綱。自然，這個聯盟的意義，並不決定於那兩個小組織的成份以及他們和黨部的線索——那成份和線索是充分的微小的。這個『左』右聯盟的『思想』和『歷史』，更加提醒我們：黨要實行強有力的兩條戰線上鬥爭的任務，尤其是要反對直到現在還是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領導的右傾的主要危險——雖然他們在第十六次大會上已經有過口頭上的聲明。

『左』右聯盟的路線和政綱，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主要問題裏面，都是和黨的政策互相對立的。

瘦草夫和洛明那瑟聯盟的整個政綱，是對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進攻目前時期之中的困難發生恐慌，而形成的，是根據於對着階級敵人投降的政策，這種政綱表現『左』右

聯盟是要趁着困難來投機。『左』右聯盟政綱的基礎，是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目前階段，對於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對於我們困難的性質，都有和黨絕不相同的了解。

五年計劃之中已經過去的一個時期，有了極偉大的成績，這些成績，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的背景之上，特別來得顯露。蘇聯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經濟發展的速度。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之後的時期裏，農民羣衆之中發生了歷史上偉大的轉變——轉變到社會主義方面來。蘇聯共產黨現在正在整個區域集體農場化的基礎之上，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蘇聯共產黨說，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是可能的這句話，成了幾千萬工人農民經驗上的成績，實際生活上完全證明了。『我們已經走進了社會主義的時期，因為雖然離着社會主義社會的完成和階級分別的消滅還很遠，可是，整個國民經濟裏面的一切經濟動力，都在社會主義部分的掌握之中了』。（斯達林）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進攻開展着，可是，這並不是沒有困難，沒有強烈鬥爭而平平穩穩的進行的。階級鬥爭現在達到了很大的緊張。我們的困難是階級鬥爭的不可避免的困難，是生長之中的困難，是我們勝利的進攻之中的困難。瘦草夫和洛明那慈聯盟的政綱，就根據於完全不了解我們困難的這種性質的。因此，這個聯盟對於現在的經濟狀況，就有恐慌的投降政策的估量。『左』右聯盟，和其他一切機會主義的小組織

一樣，總有這種恐慌和灰心的悲觀主義。每一次的反對派總是這樣開始的，這樣，他們就找着理由來攻擊黨，來要求變更『不正確的』路線。瘦草夫重複一切反對派所講過的濫調，暴露他自己的『分析』和恐慌的根源，他說：『我們任其自然的，很盲目的，無組織的走進了一種經濟現象，這種現象是現在全國警心討論的對象，部分的說來，亦就是大家在排着隊等待買東西的時候討論得很深刻的那些現象，——固然他們是討論得不正確』。『左』右聯盟對於前途亦是描寫得很黑暗的。照他們說起來，將來的一年並不是五年計劃之中決定勝負的一年，並不是新的高漲和生長的一年，並不是開展的勝利的社會主義進攻的年份，——在這社會主義進攻的旗幟之下，整個的黨，整個的工人階級正在鬥爭呢，——照他們的意思，將來的一年却是『堅決的去改正已經做出來的錯誤的一年』。這裏，暴露出來：他們對於過去階段的經濟結果和黨的領導，有很誣蔑的估量，完全不了解前一階段的成績，他們慌張起來，沒有氣力了，社會主義的前途也喪失了。這些投降份子，企圖用自己這種誣蔑，來和領導着幾千萬勞動者力爭『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黨所已經得到而無可爭辯的成績，相對抗呢。

蘇聯共產黨堅定着自己的意志，正在克服一切困難，克服一切向前進攻之中的困難，用布爾塞維克的精力打破一切障礙，因為我們的『力量在鬥爭的過程裏而同着革命的生長而生長呢』（列甯），因為我們『困難的本身就包含着克服這些困難的可能』（斯達林

）。而機會主義者現在却要往後拉回去，他們沒有布爾塞維克的精力，而只有市儈的唉聲嘆氣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這已經不止一次了，在一切陡然高漲的時候，機會主義者都是這樣的。

目前時期的特點，照機會主義的估量，就是瘦草夫和洛明那。這種否認蘇聯走進社會主義的時期。這種否認，是機會主義和黨根本不同的地方。這種否認黨對於目前時期的估量，是根據於不了解現在蘇聯經濟生活之中社會主義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直到現在，機會主義過份估量私人資本——瘦草夫所謂『無組織的部分』，他們不看見：雖然有生長之中的困難，然而『整個國民經濟裏面一切經濟動力，都在社會主義部分的掌握之中了』。現在蘇聯經濟之中，社會主義的部分已經有決定一切的意義，這表現於工業極快的發展，工業對於全國經濟的決定一切的影響加強，集體農場和蘇維埃國立農場強有力的發達，蘇聯全國經濟之中有計劃的原則加強起來。『究竟是誰打敗誰』這個問題——究竟是工業之中的社會主義打敗資本主義份子，還是資本主義份子打敗社會主義的問題——已經一般的解決了：工業的社會主義方式得着勝利了（斯達林）。機會主義者不了解現在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他們認為『黨過份估量工人階級的力量』（瘦草夫）。他們不看見：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根據於農民的主要羣衆轉變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以及中農在集體農場之中變成無產階級在鄉村裏的新支柱，他們不看見，這種

政策的轉變有歷史上的意義。機會主義者，在階級鬥爭的劇烈和階級敵人猛烈的抵抗之中，不願意看見蘇聯裏面現在正在進行的，向着完全消滅階級方面的巨大的階級變動。社會主義勞動的新方式極廣泛的發展，更多的羣衆日益引進到國家機關裏面來工作。羣衆的文化程度增高起來，工人和農民之中養成許多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指導幹部，——這些都適當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在階段。機會主義者却完全不了解這種羣衆之中的變動。

這樣，瘦草夫和洛明那慈這種機會主義者，就又來重新審定我們黨綱之中的一個問題：就是蘇聯能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右傾和「左傾」的機會主義者，企圖渙散無產階級，『把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踐踏在知識份子的懷疑主義裏面』（斯達林）。

瘦草夫和洛明那慈聯盟的政綱裏面其他的意見——對於許多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的意見，——就都是從他們這種對於革命發展現在階段的總估量出發的。而且「左」右聯盟政綱之中決定一切的一點，實際上是拋棄社會主義建設的高度的速度，就是在社會主義進攻的最主要問題裏面和黨的路線決裂。對於右傾機會主義者，『他們不了解我們布爾塞維克式的速度，不相信這種速度，總之是不贊成任其自然的漸進的發展範圍之外的任何東西』（斯達林）——這正是他們的特點。瘦草夫和洛明那慈的機會主義

的政綱，在這一問題裏面是要求：減低速度，『縮短大規模建設的戰線』（洛明那慈）。

這個瘦草夫和洛明那慈的新聯盟，實際上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裏面，也站到右傾的立場上去。又來重複那種罵黨的話：說只有行政官廳的『機械的對付農業集體化任務的方法』。機會主義者，假裝着預防黨內重複『左』傾過火的錯誤，而事實上是拋棄利用今年日益踴躍加入集體農場的潮流的可能，拋棄爲着黨的『五年計劃完結時候就要完成整個區域集體農場化』的口號而鬥爭。對於集體農場化的情形以及加入集體農場的新潮流的前途，既然有了這樣懷疑的估量，自然，一九三一年就只是『審查集體農場運動的年頭』（瘦草夫）。在牲畜事業問題裏面，機會主義者要拋棄黨在牲畜事業之中發展社會主義部分的速度，拋棄爲着發展牲畜事業的國立農場的鬥爭，重複右派在糧食恐慌時期的濫調，重複也們對於解決穀類問題的預言。可是，右派預言家關於穀類問題的預言早就已經破產了，現在新『預言家』關於牲畜問題的預言也一定要破產的。

『左』右聯盟的領袖，自己在慌亂狀態之中，要想找出和黨的路線不相同的路線，他們甚至於提議提高物價的政策。因爲這種提議的緣故，所以『左』右聯盟對於工資問題的意見，就更加顯得是謊騙和錯誤。

『左』右聯盟的破產領袖，也和其他的反對派一樣，企圖裝着『擁護』工人階級的樣子

，要求增高工資，改良工人的給養。自然，他們在這裏完全不提起黨是怎樣爲着增高工人物質生活和文化程度而鬥爭，他們故意曲解事實上的情況：——現在蘇聯的工業強有力的發展，農業集體化而有革命的改造，國內糧食來源極快的增多，這種情形的基礎正在鞏固起來，——所有這些，都是工人和勞動羣衆的一般生活程度增高的根本。現在，失業完全消滅，這正是工人階級幸福的增長的最明顯的表示，——可是，『左』右聯盟裏面的所謂工人階級的『擁護者』，居然完全沒有看見。

『左』右聯盟要辯護自己對於黨的攻擊，竟說出對於黨內狀態的純粹孟塞維克的估量，竟放出對於黨的領導的極惡劣的謊言，對於工人國家也是這樣。現在的反對派——『左』右聯盟，又來重複托洛斯基的老演說，說『國內最主要的不平等是黨內關係的不平等』。他們真正喪失了一切能力，竟會不看見黨的力量，不看見黨的中央委員會能夠領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進攻，克服極大的困難，日益引起新的幾百萬勞動者來爲着社會主義而鬥爭。他們竟說什麼『束縛工人羣衆的有益處的精神』，『假造對於我們缺點的批評』，『對於工人羣衆的主要幹部沒有及時的正確的指示』等等，——『左』右聯盟對於二百萬人的布爾塞維克黨，領導着工人階級實行『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口號的黨，竟給以這樣孟塞維克的，荒謬得無以復加的估量。

機會主義者誣譏工人階級，說工人階級的大多數走上了『小資產階級的投機道路』，

他們說社會主義的競賽是『假街鋒運動的廣泛的傳播』，是『假造強度的工業財政計劃』等等。機會主義者反映工人階級之中最落後的動搖份子的影響，把他們的『非階級化的習氣和消極情緒，當做全體無產階級的情形』，於是他們自己在無產階級隊伍之中覺着自己已是外人了。

正因為『左』右聯盟脫離了自己的階級和自己的黨，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所以瘦草夫和洛明那慈的機會主義聯盟對於蘇維埃機關的估量，居然會和托洛斯基反革命的謠言相同。蘇聯共產黨正在進行着反官僚主義的鬥爭，而他們不參加這種布爾塞維克的鬥爭，反而說國家機關腐化了等等，——這簡直是重複托洛斯基派的謠言。他們因此說蘇維埃機關裏面是『精力衰頹，元氣喪失，沒有創造的建議力，只有官場式的好消息，意志消沉。』（瘦草夫），說『在許多蘇維埃機關裏面統治着對於工人農民的需要和利益的老爺式的封建式的關係。』（洛明那慈）

瘦草夫和洛明那慈的派別聯盟的一切特點，他們對於黨的政策的新的一切特點，都和我們革命的現在階段的一切特性密切的聯系着，而且是被這種特性所規定的。無產階級開展着順利的社會主義進攻——很快的發展工業，發展蘇維埃國立農場和集體農場，剷除資本主義的根源，而要消滅國內的階級分別。最近根據五年計劃的頭二年成績而定出這一特別年的計劃，以及對於一九三一年的大約規畫，正是各方面的開

展的社會主義進攻的計劃。這一年的成績，將要是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更加強有力的鞏固。消滅富農的政策，將要在新的整個區域集體農場化的地方繼續開展下去。

現在無窮盡的力量正在甦醒起來，來爲着在城市和鄉村之中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

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方式，日益應用到工人和集體農場農民的新的階層之中去。幾百萬新的貧農和中農，在反對富農的殘酷鬥爭之中，轉到用社會主義發展鄉村的道路上去，轉到建設集體農場的道路上去。蘇聯共產黨堅決的工作着：改造工會機關和經濟機關的全部實際工作，真正鞏固他們的幹部，使他們之中有鞏固的『最積極最革命的工人人員的骨幹，排除並且隔離機會主義工會主義官僚主義的份子』（斯達林）。

我們的黨部，爲着要執行新的任務，也正在改造。爲着社會主義的改造而不斷的在城市和鄉村之中做實際工作，爲着列寧主義的政策而開展着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所有這些，都使二百萬人的無產階級政黨更加團結，使他在羣衆之中的威信更加鞏固，使他對於一切破壞黨的統一的行動，以及修改黨的路線的一切企圖，更加嚴厲的去克服。

我們蘇聯共產黨和他的領導，有幾千百萬的無產階級，集體農場的農民，以及鄉村的勞動者的強有力的贊助，並且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同情和贊助。

我們的社會主義發達的環境，我們現在階段的順利的進攻，以及黨的偉大的團結和統一，使右派和『左』派機會主義者最近的言論和行動，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響：他們不

敢公開的擁護自己的路線而公開的實行反對黨的鬭爭。因此，首先就是右派轉到暗藏的鬥爭方式——口頭上說同意黨的政策。因此，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對於黨內問題不講話，事實上不肯爲着黨的總路線而鬥爭。因此，機會主義者轉到兩面三刀的策略，而直接的欺騙黨。因此，瘦草夫和洛明那慈的聯盟轉到他們自己的秘密工作。現在甚至於右傾機會主義也不能不運用『左』傾的空談，來做『革命的假面具』，『塗着花臉，要想用外表的裝飾，使工人注意他們，而信仰他們這種反對派。』（斯達林）

正因為認識了黨的不可侵犯的力量，所以左派和右派的機會主義者聯合起來。昨天『右派還『反對』過左派，還造謠，說全黨和中央是托洛斯基的殘餘。』昨天『左派還『反對』過右派，還說中央委員會是『中派主義』的，是對右派調和的。』現在呢，右派和『左派』都在共同的政綱之上互相聯合起來，來反對黨了，——自然，並不因此就消滅了右派和『左』派機會主義各自的特點，所以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仍舊是有必要的。然而機會主義的『領袖』，除出呂汀，努西諾夫，加符萊斯基等類的人以外，竟找不着自己的更好的『幹部』，而這一類人，却是黨內不堪造就的一些智識份子，他們如果在別種條件之下，是要成爲另外一個非無產階級的敵視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政黨的份子的。

這樣，黨的強大的發達和鞏固，他的布爾塞維克的統一性，就使右派和『左派』機會主義者要運用那種兩面三刀的欺騙的策略，口頭上承認和黨是同意的，用這種假面具來

掩蓋自己機會主義的行動，走到無原則的聯盟，變成明顯是反黨份子的中心。

我們國內的資本主義的一切力量猛烈的抵抗各方面開展的社會主義進攻。『資本主義不是一下子就死滅的，他的死期越近，他的抵抗越猛烈』（列甯）。現在的鬥爭階段之上，現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的階段之上，列甯的話，比任何時期都要更加適用，列甯說過：『無產階級獨裁制是新的階級反對比較強大的仇敵，反對被推翻之後正在用着十倍力量抵抗的資產階級的最決絕的最無情的戰爭，（雖然資產階級只在一個國家裏而被推翻），——資產階級的能力，不但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但在於資產階級國際關係的堅固和力量，而且在於習慣的力量，在於小生產的力量。』（列甯：共產主義的『左派幼稚病』）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工業黨，勞動農民黨，以及其他破壞者），正是對於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爲着掘盡資本主義根源的這個『無情的戰爭』，用反革命的破壞運動來答覆；富農——就用破壞黨在鄉村裏的政策和工作的鬥爭，以及直接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來答覆；官僚份子——就在蘇維埃機關裏的怠工來答覆。

我們國內這些正在死滅的階級的抵抗，得到外面的積極贊助，得到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切力量的贊助。現在階段之上，世界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蘇聯的鬥爭，更加加強起來。世界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革命高漲的生長——蘇聯社會主義的五年計劃的成績對於這個是有影響的，——所有這些，重新又使世界資本反對蘇聯

的鬥爭要應用恐怖暗殺的手段，軍事破壞的手段，幫助反革命黨和破壞者，經濟的封鎖，武裝干涉的準備。的確的，世界經濟危機和衰落的背景之上，我們的發達日益加重，我們爲着社會主義鬥爭的國際意義。正因爲這個緣故，國外又在發展着反蘇維埃的運動。可是，不應當忘記：一方面世界資本主義反對蘇聯的鬥爭積極起來，而別方面世界無產階級對於蘇聯的積極擁護和贊助，也在日益加強呢。

蘇聯國內仇敵的抵抗，使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以及無產階級之中最不穩定份子的動搖，加強起來。這種情形不能夠不反映到黨裏面來。我們黨內右傾機會主義，以及一切傾向的力量，都在於『小資產階級潮流的力量，在於一般資本主義份子，尤其是富農，對於黨的侵犯的力量』（斯達林）。『左』傾機會主義當然亦是這樣，『左』傾機會主義雖然有『左傾的』主義，雖然有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的一切特點，可是，在這次『左』右聯盟的事件裏面，更多一次的證明：『左』傾機會主義的根本意見是和右傾派有共同的深刻的機會主義實質的。

如果因爲新發生的『左』右聯盟人數很少，只是些黨已經拋棄的人物，或者已經喪失了黨的一切信仰的人物，就認爲這個兩面三刀的『左』右聯盟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那就是很大的錯誤。雖然這一些智識份子反對黨的派別陰謀，沒有成功，而且是很可笑的，然而這些陰謀表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這個右傾機會主義是想阻滯和破

壞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領導的右派和這個新聯盟之間有密切的聯繫，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嗎？這個聯繫對於全黨都是很明顯的了。難道這個『左』右聯盟，不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環境之中從右傾和『左』傾的『根源』裏產生出來的嗎？難道這個『左』右聯盟在黨內已經沒有暗藏的同盟者嗎？他的同盟者就是：對於右傾的調和主義，『左』傾的過火和對於這種過火的調和主義。他的擁護者就是：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用空談掩蓋自己的錯誤路線，甚至於自己也沒有認識自己的錯誤路線，客觀上這亦是兩面三刀的反對黨的。『左』右聯盟的同盟者——兩面三刀派，在有些地方黨部裏面，也已經揭發了。只要舉幾個例子就夠了：莫斯科第一車站的貨棧支部的事件，西部西伯利亞黨部裏面克利明夸，苦茲聶礎夫等的小團體和瘦草夫同志的極無原則的結合。蘇聯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極豐富的革命經驗，他的不調和性和精明能幹，真正是揭發和肅清一切機會主義份子的保障，一直肅清到那種『不一定的散漫的』機會主義份子，他們是『會永久避開確定的沒有轉灣的提出問題的方法，而滑頭滑腦的』（列甯）。

這樣，『左』右聯盟的機會主義的實質和他的意義，是由他的階級基礎，以及階級仇敵對於社會主義進攻猛烈反抗的程度來決定的。同樣，『左』右聯盟的政治上的意義和作用，決定於他的反對黨的派別工作，這種工作引導到破壞無產階級獨裁制，客觀上是

和階級仇敵反對無產階級獨裁的鬥爭聯合起來的。的確的，『左』右聯盟反對黨的列甯主義政策的兩面三刀的鬥爭，他的組織上的行動，客觀上都是幫助階級仇敵的。列甯城區域的黨部委員會關於『左』右聯盟的議決案，直接的說出他的階級本質，這真是布爾塞維克的實話——這個議決案說：『現在兩面三刀的手段是機會主義者攻擊黨的主要的假面具；對於這種兩面三刀的政策，必須實行最堅決的無情的鬭爭。右傾機會主義反對派和新的『左』右聯盟，是在執行階級仇敵的同一樣的使命。……右傾和『左』傾的機會主義者成爲吸引一切反蘇維埃力量的中心，而這些反蘇維埃的力量是在實行着推翻無產階級獨裁的鬥爭。在決定勝負的戰鬥環境之中，黨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加有鐵一樣的團結和戰鬥的統一隊伍，自然，這個統一的基礎應當是列甯主義的政策。列甯說過：『誰要稍微削弱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尤其是在獨裁的時候），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列甯的這句話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準確。而右傾和『左』傾的機會主義者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受到這個教訓，他們重新又來企圖進攻黨的總路線和黨的列甯主義的領導』。

兩面三刀的手段是最叛變的手段，是黨內不能容忍的派別鬥爭的方法。現在階級鬥爭在兩個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正在決死的環境之中，機會主義派欺騙黨對着黨說謊話的策略，是要使他們自己轉到戰線的那一方面去的，不管他們自己願意不

願意，客觀上是要使他們在兩百萬的黨員之中處於仇敵的地位的，——怎麼那些機會主義的派別大家不看見這一點呢？

蘇聯有着一切條件，可以再往前進步，在社會主義的進攻之中得到勝利，在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競爭裏面得到勝利。然而，要能夠勝利的往前進步，必須要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使我們自己隊伍之中的機會主義份子孤立，這些機會主義份子妨害進攻，東歪西倒的儘在恐慌，而使黨內發生對於勝利沒有把握的心理』（斯達林）。我們的黨，從瘦草夫和洛明那慈聯盟的事件裏面，得到堅定的結論：使黨內右傾的『左』傾的機會主義者完全孤立起來，把事實上不肯拋棄機會主義觀點的人驅逐出黨，首先就是右傾份子。我們的任務是更加提高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尤其是反對現在階段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黨要特別用力去反對機會主義的一切種種的暗藏形式，反對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反對表面上的頌揚者，而無情的打擊一切兩面三刀派。

現在各地方黨部的決議，正是表示黨的布爾塞維克的精明，黨的不可侵犯的統一，黨爲着總路線鬥爭的不可動搖，他堅決的要停止右傾領袖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的那種不能容許的行動。現在各地黨部要求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答覆，並且要他們拿出證據來，證明他們是忠實於黨的路線的，——這不是偶然的事。右傾的領袖沒

對執行十六次大會的決議；他們沒有用理論上、政治上、實際工作上爲着黨的總路線的積極鬥爭，來證明自己承認錯誤的忠實。這些右傾領袖是不能夠不說話的；或者——事實上真正爲着黨的總路線而鬥爭，或者——黨就要根據十六次大會的決議而採取最嚴厲的辦法對付他們。

蘇聯共產黨莫斯科委員會的議決案說：『右傾反對派的以前的領袖（布哈林，額可夫，湯姆斯基），不執行十六次大會的決定，不積極的爲着黨的總路線而鬥爭，這種行爲再也不能夠容許的了。莫斯科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Bureau of Moscow Commit-tee）認爲中央委員布哈林，額可夫，湯姆斯基的這種行動，應當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來特別討論。蘇聯共產黨莫斯科委員會號召莫斯科區域的黨部的一切布爾塞維克，更加團結在列寧主義的中央的周圍，更加精明的審察，更加在反對『左』右機會主義者，反對兩面三刀派以及對於這些份子調和的調和派的鬥爭之中，表現思想上組織上的不調和的精神。』

蘇聯共產黨列寧城委員會『對於右傾反對派以前的領袖，要求他們拿出布爾塞維克的證據來，證明他們的確有決心實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首先就是反對主要的右傾機會主義危險——反對機會主義的具體的表現者，反對兩面三刀派和黨的叛徒。』

西部西伯利亞黨部，亦『認爲布哈林的行動是他暗地裏實行着反對黨的鬥爭，等於

號召他的一派加多自己對於黨的兩面三刀的派別式的攻擊。黨部積極份子大會認為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對於新發生的兩面三刀的機會主義的活動所站的立場，等於和這種活動表示同情。黨部積極份子大會向中央機關提出一個要求：堅決的停止右傾反對派領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派別行動。

別的黨部的決定也是這樣的。這是黨的布爾塞維克的堅決意志。

蘇聯共產黨的這種絕不動搖的意志，中央委員會的列寧主義的領導，黨在兩條戰線鬪爭裏面的布爾塞維克的不調和精神，尤其是反對右傾，反對兩面三刀的手段，反對暗藏的調和的機會主義，——這是黨的力量，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力量，這種力量保障蘇聯在整個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進攻是能夠有勝利的發展的。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經濟的機關雜誌『布爾塞維克』第二十一期的社論）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1112

金貴銀賤之研究

(第三集)

一九三一年六月

中國經濟協會出版

布爾塞維克

第四卷 第三期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出版

1 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對於立三路線的討論

附錄國際東方部關於中國黨二中空會與李立三同志的錯誤的報告

2 是取消派取消中國革命，還是中國革命取消取消派？

思美

3 國民會議與軍閥戰爭

華崗

4 最近蘇聯的國際及國內情勢

莫洛托夫

5 國民會議上蔣介石說些什麼？

秋白

6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華崗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立三路線

的討論

這討論還是在去年的十二月間。我們接到這寶貴的文件，把它翻好，把它印好，花了很多的時間，一直到現在方才能夠在黨報上發表出來。

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以為立三路線的錯誤，已經由四中全會改正，所以不用再談。這實是嚴重的錯誤。過去我們沒有深刻的研究陳獨秀主義，沒有深刻的研究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以及廣東暴動的經驗，所以我們後來犯了很多以前所犯的錯誤。立三路線的錯誤，主要的還是因為我們過去忽視了用我們鮮血所換來的寶貴的經驗。我們應該在自己的錯誤中，得到教訓。

那些怕談自己的錯誤，對於自己的錯誤除了寫些聲明書之外，不敢深刻的加以思索與研究的同志，實際上表示出他們還沒有真正了解自己的錯誤。他們祇是在國際路線的前面暫時的放棄了自己的武裝，他們只是在等待機會，重新來發表他們思想系統中所能找出的『理論』！

我們對於這些傾向，必須給以嚴重的打擊！我們在下一期布報上，還要發表

立三同志自莫斯科寄來的聲明書。希望同志們給它以正確的批評，尤其是那些對於立三過去的錯誤，同樣負有重大責任的同志。

編者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

立三報告：

我已經讀過了東方部的書面報告，並且參加了東方部的幾天的討論。我對於東方部一切指示，都認為正確的。

關於我的錯誤，具體材料東方部的書面報告已經充分的說到了，我不重複了。我只來分析我的錯誤的思想上的根源和歷史。東方部討論之中所提出來的批評，不但對於我個人是很大的教訓，並且對於中國全黨都是很大的教訓。這種討論和批評以及東方部所指出的路線，對於中國黨和革命有很大的意義。

從六月到九月中國有軍閥混戰和一般的政治經濟危機互相聯繫着。同時又有革命的高漲。革命高漲第一個表現就是農民戰爭的發展，農業危機的深入，和蘇維埃運動的擴大。

一百縣的蘇維埃區域，擴大到三百縣。小小的遊擊隊變成十萬的正式紅軍。工人運動亦漸漸的由經濟鬥爭進到政治鬥爭。兵士運動變成了軍閥的兵士直接投到紅軍

裏面來的形式。這個時候，黨的發展是很大的，與幾個事實：我們黨已經有紅旗日報，消一八〇〇〇份，單在上海就有一二〇〇〇份，都是消到工人羣衆裏面去，所有這些情形證明那個時期中國的確有革命的高漲。如果中國黨有正確的領導，那麼革命運動可以有熱烈的發展和勝利。可惜當時我的領導作了嚴重的錯誤，把錯誤的路線和國際路線對立起來。這種領導和列寧主義完全沒有相同的地方，因此，就是因為中國黨不正確的領導，就是我的領導，所以使中國革命受了很大的損失。

我的錯誤特別表現在六月十一號的決議案，然而在這個以前，錯誤已經是有，再者在實際工作上的錯誤就是要組織南京武漢上海等等的暴動。

我的第一個錯誤就是估量中國革命形勢不正確。我不了解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不了解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不平衡，我以為工農運動雖然形式上不同，但是他們的內容是相同的，因此我認爲工人運動不但已經反對國民黨，而且可以組織暴動奪取政權了。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下，經濟鬥爭一定帶着反國民黨的性質，然而決不能夠說那些關爭已經是純粹的政治性質，而且能夠推翻國民黨政權了。因爲有了這樣一個不正確的方針，所以我認爲上海南京其他大城市之中，工人運動已經激烈到這樣一個程度，就可以直接武裝暴動了。我有過這樣一個意見，以爲中國有一個特點，就是中國的總同盟的政治罷工應當和武裝暴動直接聯系在一起。我認爲準備總同盟政治罷工，同時

準備武裝暴動，這是一方面，別方面當時在南京和其他城市的軍家裏面有我們共產黨的影響，所以準備武裝暴動是可能的。我想既然總同盟罷工可以轉到暴動並且又有紅軍，那麼必須立刻準備武裝暴動。因此我以為只要提出一個武裝暴動的口號，就可以動員工人階級了。我們忘記了領導日常的經濟鬥爭。這種錯誤的結果，就是黨脫離廣大的羣衆，我們既然認爲中國已經有直接革命的形勢，並且武裝暴動不但是一個政治上的要求，並且要作組織上的準備，所以我們不但組織上去準備，並且技術上亦去準備武裝暴動，事實上我們的注意就完全集中在組織上和技術上而忘記了政治上的準備暴動。

當時我們注意組織紅軍，而我們的方法是不對的。對於職工運動的方法亦是不對的。當時職工運動的任務應當是：組織經濟鬥爭，組織罷工運動，領導經濟的政治的鬥爭，領導廣大羣衆到我們影響之下來。然而我們那個時候，這些要緊的任務，並沒有提出，實際工作也沒有作，而只有一個空洞的準備武裝暴動的口號，忘記了爭取羣衆的緊要任務。我們錯誤是：武裝暴動，單有政治上影響是不夠的，還應當有組織上的鞏固。我們那時以爲中國黨已經有很充分的廣大的政治影響，所以雖然組織上的影響不大，然而已經可以去直接武裝暴動了。當時領導同志的意見，以爲革命鬥爭爆發的時候，在很短期間就可組織很廣大的工人羣衆和革命羣衆。整個的方針是這樣的，就是以爲革命鬥爭是可以任其自然的，只要有客觀的革命條件，只要有黨的政治影響，主觀的薄

弱是不重要的，黨的組織上的鞏固亦是不重要的，鞏固羣衆組織亦是不重要的等等，這都是機械的了解，這是客觀的自然論，這種客觀的自然論，不管領導羣衆鬥爭的主觀動力，是和馬克斯主義完全相反的觀點。

第三個錯誤是我們不但不懂得革命發展的不平衡，並且我們亦不懂得工農運動的發展亦不平衡，不懂得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我們以爲一般的經濟危機之下，羣衆革命鬥爭是到處一樣的，假使一個地方已經有了直接革命的形勢，那麼在全國範圍之內都有直接革命形勢。當時我們以爲不但要在南京組織暴動，並且可以在武漢天津北京廣州等等大城市組織暴動，這是因爲我們的意見認爲一個地方有了革命的形勢，可以直接發展成功全國革命的形勢，因爲不懂得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所以我們也就不懂得國際必須鞏固根據地的指示，有了這種根據地就可以成爲發展其他地方革命運動的主要出發點。

我們不懂得這個根據地的意義，我們不懂得爲着在別的地方發展革命運動，還要有長期的過程，就是殘酷的革命鬥爭和國內戰爭的過程。我們以爲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到處一樣的，所以我們不懂得革命根據地的意義，自然也就不懂得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的意思，我們以爲既然全國革命形勢是一樣的，那麼一定要等到我們佔領了大工業行政中心城市之後，然後才組織革命政府。因此我們亦就不懂得鞏固紅軍的意義，不懂得要創造真正階級的紅軍。我們只想紅軍不斷的進攻，因爲全國既然有革命的形勢，那麼紅軍

的不斷進攻自然是應當的，而忘掉了鞏固紅軍，改良紅軍成份，加強紅軍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任務。這也是反對國際路線的。

第四個錯誤是我不懂得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間的關係。我不懂得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並且不懂得資本主義的各國裏面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我以為國際革命運動很快的就要高漲起來，一直向上發展，而中國革命不可避免的應當是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動力。中國革命運動的爆發，應當直接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這種估量是和準備南京武漢等的暴動相聯系着的，和蒙古問題，蘇聯政治問題亦是相聯系着的。我不懂得反對蘇聯的戰爭危險，我以為蘇聯應當採取對於帝國主義國際的進攻政策。別方面我過分的估量中國殖民地的地位。我以為中國的革命高漲是被帝國主義壓迫而引起起來的，所以如果世界革命不勝利，中國革命勝利的機會就沒有。我以為沒有全世界範圍之內的革命運動，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我以為單是中國的工農的力量，而沒有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沒有全世界革命運動，中國革命是不能夠勝利的。這個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問題，對於國際是早已解決的問題，我的估量和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的估量是一個樣子的，而列甯對於這種估量已經屢次批評過了，而且中國的情形比俄國一九〇五年的情形還不同。帝國主義的壓迫，一定要引起羣衆的革命運動，一定要發動中國極廣大的革命力量。斯大林同志說，帝國主義對於印度的壓迫一定要更

加推動印度的農民羣衆反對帝國主義。然而我沒有了解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但不能夠征服革命運動，而且他要引起中國工農羣衆的極大的反抗。關於保障中國革命勝利的國外條件，我亦不懂得中國革命有一個優點，就是現在已經有無產階級蘇維埃的國家。所以這些都表明我的錯誤是托洛斯基的錯誤，我的錯誤是在中國翻印的托洛斯基主義。

第五個錯誤是關於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反對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說要到全國範圍之內革命勝利之後中國革命方才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階段；一種觀點是說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部分勝利已經就是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甚麼地方勝利，甚麼地方就轉變。然而我提出我自己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勝利直接就是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觀點是半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我不了解這個問題，在共產國際黨綱上已經說明，在中國這一類的國家裏面，因為經濟狀況的原故，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應當要經過好些過渡的階段。對於這一點我是沒有了解，因此我就走到了托洛斯基主義的了解。對於轉變問題的理論上的錯誤影響到了蘇區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法。蘇區裏面自發的發生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運動，我們認為應當贊助這種運動。在第一次蘇區會議的議決案上面說，我們應當發展集體農場和共耕。我這個錯誤的確是和轉變問題的理論錯誤相聯系的

，我的錯誤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有很大的反應。在贛西南鄂東北這些錯誤現在中央已經去糾正了。再者我在土地問題上面還有一個錯誤，就是對於富農問題的錯誤，這是中央的總錯誤。當時中央以為中國革命之中應當和富農聯合，這個錯誤現在已經糾正了，但是還有好些影響，這種關於富農問題錯誤的殘餘，還反應在蘇區第一次會議的土地暫行條例上。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很明顯的：我的思想上的錯誤是托洛斯基主義性質的錯誤。我對於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之關係，對於革命轉變問題，對於土地革命問題的意見，都有純粹托洛斯基主義的性質。此外，我還有一種不要組織的理論。結果就形成不正確的冒險盲動主義的路線。我既然有了這樣半托洛斯基主義冒險盲動主義路線，我的確不了解國際路線的正確，而且我反對國際路線。今年六月到八月之中，中央政治局是我所領導的，我領導他反對國際路線的執行。這是在國際紀律上不可容許的。我用自己的不正確的路線，和國際的正確路線對立起來，不執行他的指示。

三中全會對於我個人的錯誤是抱調和態度的。對於這個問題，我完全同意這次東方部的書面報告。我現在深切的了解：三中全會把兩條路線——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弄模糊了，認為這兩條路線是一致的。三中全會沒有糾正我的錯誤，——這些錯誤在實際工作上，在許多策略上，是做出來了。因此，三中全會不但對立三錯誤調

和，而且沒有執行國際所給的指示，沒有站到正確路線上去。三中全會沒有實行路線上的轉變——沒有從不正確的盲動路線轉變到國際路線上去。而且三中全會對右傾錯誤也是調和的。許多右傾錯誤的極危險的表現，如富農影響等，三中全會都沒有給以打擊。一切火力都只集中在何孟雄一個人身上。他的確有右傾的錯誤，然而因為他批評我的錯誤，因此就責備他右傾——這是不可以的。中國黨內當時只有他一個人是公開起來反對我的錯誤的。根據這一點來責備他右傾是沒有理由的。

三中全會沒有充分清楚的規定現在時期黨的任務，尤其是關於幾個實際問題。沒有估計實際工作的教訓。如關於長沙事件，關於罷工問題，三中全會是採取了調和的方針，因此亦不能夠正確的指導實際工作。所以三中全會一方面對於一切傾向表示調和，別方面曲解國際的路線。

現在說一說組織問題。六次大會之後，中央的組織路線，是和我的錯誤密切相關的。我們機械的了解了黨的紀律。我們禁止自我批評，禁止對於政治問題的自由批評。譬如你們知道的『北方問題』，當時因此而不正確的開除和森同志的政治局委員。然而，江蘇問題解決之後，比較的有了正確的方針。而在一九三〇年六月我們在組織問題上又走到了不正確的道路上了。當時陳紹禹，秦邦憲，莫斯科回去的學生，批評六月十一的議決案，中央就對他們做了組織上的結論。這些錯誤繼續到現在。

黨實行黨部的軍事化。黨部軍事化只有在暴動的時候可以用。軍事化的口號在現在的應用，是表現極不正確的組織原則。這些組織上的錯誤，是和我政治上的錯誤密切聯系着的。取消青年團和工會，把一切工作集中在狹隘的中央，這亦是不正確的組織路線。雖然對於有些組織上的結論，我曾經反對過，然而因為整個組織路線是和我政治錯誤聯系的，所以我應當對組織工作負責任。

最後，我要說一說黨內小團體。東方部的書面報告說黨內有不健全的兩面派的小團體現象。我直到今天才明白這句話。秋白在莫斯科組織自己的小團體，而進行了無原則的國民黨式的反黨的鬥爭。這種鬥爭在共產黨內是不可容許的。我應當確定的聲明：立三主義在理論上是和秋白主義相同的。無疑的，我是在秋白影響之下。然而我申明：我和秋白的小團體是沒有組織上的聯系的。因此，大家不應當懷疑我。我要求國際主席團和國際監察委員會，讓我做一個詳細的報告，說明黨內的小團體和小團體的關係。我應當很鄭重的很忠實的報告你們。秋白同志理論上思想上對於我的影響是從五次大會開始的。然而我反對小團體反對無原則的國民黨式的反黨的小團體精神，是屢次反對過的。我曾經反對過國濤，和森或者秋白等等的企圖組織小團體。我堅決的反對過他們的。不但過去如此，現在和將來亦是如此。爲什麼我對於這個問題這樣鄭重呢？因爲，黨現在由於我的錯誤的關係，正在極嚴重的危機之中。

如果不及時救濟，那麼，可以弄到完全崩潰以至亡黨。我因此認為反對一切派別精神的鬥爭是實行國際路線的重要條件。而小團體的形成，黨內糾紛的發生却有很好的基礎。第一，我兩年以來在中央做工作，黨的工作都在我個人影響之下，而且我的路線曾經和國際路線對立。如果我所影響的同志要堅持自己的觀點，那麼，就要發生無原則的小團體。第二，我們黨直到現在都是奇形怪狀國民黨式的無原則糾紛的時期。雖然這種糾紛在六次大會上受着大大的打擊，然而他的殘餘還是有的。第三，有可能發生右傾。我黨右傾機會主義另有一自己的一個小團體。這種危險是很大的。再有一個條件，就是在中國的同志對於在莫斯科同志的成見和不信任，以及莫斯科同志對國內實際工作同志的不信任。這種互相的不信任是第四個條件。我認為這些可能是我的極大的錯誤所引起的。因為我對於黨所起的危機，要負極大的責任。我一定竭力來反對一切派別小團體糾紛的企圖。我認為只有堅決反對一切小團體，才能真正執行國際的指示。

現在我知道：我實際工作上的錯誤，在最近二年在中國做的，是在秋白同志影響之下的。別方面，秋白同志的錯誤是在羅明納茲影響之下。我現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確用了兩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會上的行動，就可以表現出來。黨的利益放到了第二位，而私人小團體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我直到到了莫斯科，方知道這裏有

過秋白的小團體。在中國我是不知道的。自然，我既然知道之後，我就要堅決反對秋白同志的兩面派的行動。自然，我不但反對這個，並且要堅決反對我在實際工作之中做出來的錯誤。前天我知道了：國內開除了批評三中全會不正確路線的同志。這顯然是小團體工作的性質。當時把陳紹禹留黨察看三個月，是我做的錯誤。然而我開除他三個月，却并非站在小團體的觀點上的，而是因為站在不正確的政治路線上。我承認我在這裏是做了錯誤，但是我再申明一次，我不是站在小團體的利益上的，而是因為站在不正確的政治立場上。可是這亦證明這種開除更加說明我的不正確的組織路線。我申明：我反對爲着小團體利益而開除站在正確政治立場上的同志。

結束的時候，我要向主席團提議。三中全會做了許多錯誤，有了不正確的方針，對我的錯誤調和。因此，我認爲必須原則上澈底的糾正這些錯誤。這種糾正不但要從上而下的去做，並且要一直達到下層黨部，一直到支部，到工廠，因爲現在立三路線的影響，不僅在上級黨部之中。因此，我認爲國際要向中國黨提議召集四中全會，來糾正三中全會的錯誤，批評我的錯誤。然而四中全會的成分應當比較不同些——不但參加三中的人要到會，而且當初反對我的錯誤的同志也要到會，工廠支部的同志，幾個蘇區的大支部的同志也要到會，以便不但糾正上級黨部的錯誤，而且糾正下級黨部直到支部的錯誤。四中全會必須設法反對一切無原則的小團體，必須在國際指導之下正確

的去反對一切傾向。只有這樣，才能夠使我們的黨離開危機的狀態，實行大大的轉變。我們在中國革命這樣緊要的時機，在國內嚴重危機的時機，必須在極短時期糾正我黨領導所做的錯誤。

我們黨現在有很大的任務，因此，如果黨的指導機關的錯誤不能夠糾正，那麼，這對於中國革命是極大的危險。我對國際申明：我放棄以前反對國際的一切武器，我在國際指導之下『改換武裝』，來反對我自己的錯誤，反對調和主義，反對兩面派的手段，反對小團體，反對右傾和盲動主義。我申明忠實的改正我自己的錯誤，而在國際指導之下來堅決的反對這些錯誤。自然，我不能深信我從今天起我已經完完全全深刻的了解自己錯誤，從此不會再重複這些錯誤。我這是不敢說的。然而我鼓起勇氣，用全力來糾正，用一切方法來反對黨內一切不正確的傾向，爲着在國際指導之下的中國革命的勝利而鬥爭。

苦秋莫夫發言：

立三同志在那裏承認了：不應當怎樣去幹革命。剛才發言的紅軍軍官是說了應當怎樣去幹革命。昨天我們問了同志之後，知道他們在廣東蘇維埃農村之中，怎樣實行實際上的改選，我們就深信下層黨部的幹部會用布爾塞維克的方法，估計工人和勞動農

民的需要和要求，他會用『布』的方法去解決當前的任務。小小一個例子。我們要
知道廣東東江怎樣解決土地問題，是否紅軍雇農苦力亦得分配土地，他們說：『凡是會
吃飯的人，而又不是紳土地主等等，都得到土地』，這又是他們的實際革命工作之中，
的確是雇農苦力兵士都給以土地了，他們是把土地去實行『黑色的重新分配』。我們
特別注意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知道中國黨中央政治局有一決定，禁止給紅軍雇農苦力以
土地，當然說了好些理由，理由是怕工人變成小資產階級，怕紅軍兵士得了土地不肯打
仗。這是中央走了陳獨秀的老道路。（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等不肯在土地革命之中給兵
士以土地。爲什麼？——因為怕國民黨的軍隊解體，因為地主的軍官反對）。

我們同地方上來的同志談話，我們不覺得他們有和立三及現在中央同志對於莫斯科
，對於共產國際的領導，對於共產國際的那種『毒恨』的態度絲毫相像的地方。

現在我要講到最緊張的問題。這問題就是一部分中國黨的中央和共產國際之問題
關係。因為現在秋白立三等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是無論在那一布爾塞維克的黨部
之中，都不能容忍的，所以不說明這一問題是不可能的。立三今天表面上口頭上很激
烈的承認自己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他甚至於走得更遠些（比上次東方部討論的時
候）——他以前只承認政治上的許多錯誤，可是不承認中國黨實行反對國際的鬥爭，不
承認中國黨領導之中有小團體，這個小團體實行反對共產國際的鬥爭。今天立三比較

更進了一步。他申明他將要在國際監察委員會說最近幾個月曾經有過的鬭爭。然而我們還要說我們不能深信：今天立三雖然說得很激烈，將來回到中國之後，或許又要重復過去的錯誤，又要實際放棄今天所說的話。爲什麼？我們有了好幾次這樣的例子——有些同志，在莫斯科，受着共產國際的布爾塞維克的壓迫，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意國際的路線，等到回到中國之後，個人的關係要厲害些，原則問題是最後的了，又去照舊執行自己的路線。中國黨與國際關係的歷史之中這種例子很多，最近一個例子就是秋白同志。他在這裏同意反對立三主義，同意國際一切指示，同意根本的當前任務的一切措辭，他回到中國之後，在私人關係的空氣之中，喪失了自己的一切原則，而無原則地領導了三中全會。我想必須使立三同志的這些承認成爲中國全黨的財產，一切黨員都知道這些錯誤，使立三同志將來沒有什麼退路。必要使立三把派別鬥爭說得清楚而記載下來，使全黨知道，可以不再重複。因爲立三同志這一次始終還沒有說清。最厲害的鬭爭方式——一部分指導者反對國際的鬭爭方式——立三同志對着國際主席團沒有說出來。立三說這個鬭爭是在於他有了托洛斯基盲動主義的路線，和國際路線不同的。這是不夠的。我們知道立三在政治局之中的說話之中，有些地方不但是路線的問題，而且造成了一定的原則上的基礎來反對國際，而且有了許多組織上的辦法，來進行這個鬥爭。

我來引幾個文件：政治局給國際代表的一封信中說：『國際工作之中這一問題非常重要，我們應當保障國際能夠了解這個問題。我看：國際……：』（速記生曰：苦同志讀英文）

同時，還有第二種理由，就是說中國有許多特點，國際很難了解，差不多不能了解，因此也就不能夠實際上領導中國的共產黨。立三造成了『中國除外的』的理論，甚至說到這樣的話：『我們到了武漢之後，那時再給國際講話就不同了』。

這種敵視的，非『布』的，非無產階級的對待國際的態度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極大多數的中國黨員，對於國際是沒有這種態度的。亦不會有的。然而這種態度，在黨的機關幹部的某些成份之中，是存在的，可惜甚至在政治局裏也有。

現在再引幾個文件，可以證明這種反國際的鬥爭沒有結束。立三形式上承認錯誤之後，這一鬥爭仍舊繼續。有一封信——政治局給長江局的——已經是在秋白同志到了中國之後寫的，這封信說國際的壞話，而且對着全黨公開的說。我念出來：

『……』（速記生曰：苦同志讀英文）

在武漢我們有二百赤色工會會員，黨員更少；國民黨有軍隊有海軍，帝國主義有軍隊，總數抵得到二十師光景。這種情形之下，竟要暴動，而對於執行國際決定的國際代表——要預防中國黨犧牲精銳的國際代表——却說他的壞話。

現在我還有一封信，是中國一個同志寄來的，他在這裏很久，是從這裏派到中國去工作的。立三同志今天也提起曾經把一些同志留黨察看的事情，但是他並沒有說爲着什麼而把他們留黨察看的。他們的被開除是爲着他們不同意三中全會的虛偽——三中全會說中央和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這是被開除的人自己寫的。他爲着國際路線而鬥爭，却被稱爲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細，因此留黨察看三個月到六個月。……這種同志起來說話防止黨去做錯誤，却對他實行摧殘——這是不能容許的事情。我還要舉出別的事情，這種事情真是難說，然而不能不說。南京被捕好些同志，三十個同志。

這三十個同志剛剛交到了一個部隊——那裏官長和兵士亦是我們的黨員，所以這部隊完全在我們手裏。於南京市委和官僚主義的江蘇省行委代表之間便發生爭論。市委以爲有完全可能救這些同志，只要把這軍隊開出城，變成一部紅軍——這種情形到處都有的。然而省行委反對，省行委的主張是要槍斃國民政府交來的那些同志，爲的是完成全國暴動的計劃，因爲如果這部隊開出南京，就不能執行暴動計劃了。於是這些同志就由我們自己親手槍斃了！事後，那一部隊仍舊被政府繳了械。

對於同志的摧殘這樣容易，有些黨部裏面確有這樣的特點——恩來同志在三中全會的組織報告之中也提到了這一點。（讀文件）……。

現在我重新說到中國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是極緊張的問題。爲什麼？因爲這並

不是我們不滿意，並不是因為共產國際的位分，不能承認中國黨領導的一部分人——這還是一半的不幸罷了。是因為這種關係妨礙中國黨得到世界革命以及中國革命的經驗。

我們已經寫過很多好的決議案。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的中國問題決議案，說明了廣州公社的錯誤。黨及其領導是否估計到這種錯誤和經驗，而應用到長沙去呢？沒有。九次全會的決議和其他的決議一樣，對於中國黨的領導機關，只是束之高閣的文書。廣州公社的經驗，一部分是在於廣州沒有創造羣衆選舉的蘇維埃。長沙現在重複這個錯誤。工廠街道所選的羣衆蘇維埃在長沙也是沒有。而且直到奪長沙五天之後方才召集第一次的羣衆大會。並且只到了三千人，而長沙的居民有四十萬呢。等到看見召集不成時，又推遲到明天，明天又有其他工作，又沒有開會。直到第六第七天才開了一萬人的會。然而工人羣衆的革命熱情却非常之大，當紅軍退出長沙的時候，雖然黨沒有羣衆工作，而跟着紅軍退出的有三千工人。

三中全會是否給了長沙經驗以分析呢？沒有。他說長沙是新階段的開始——中國紅軍『從遊擊戰爭進到反對國民黨的正式戰爭』（秋白）。這實際上是對於那種國民黨的遺產，國民黨式的不相信無產階級羣衆的能力——三中全會沒有給以打擊。三中全會沒有估計廣州和長沙的經驗。關於紅軍，三中全會說他開始了反對國民黨的正式戰

爭，這亦是官僚式的文章。難道以前紅軍沒有實行革命戰爭麼？這不是這樣說法的。

○長沙的經驗證明：——爭取武漢的問題不是戰術上軍事上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要看我們能夠怎樣去發動羣衆——在長沙武漢帝國主義統治的條件之下，要看是否已經有成千萬農民羣衆起來鬥爭。長沙問題是這樣的。這一問題三中全會亦沒有估計雖然有了好些很私定的國際的指示。

長沙紅軍的情形怎樣呢？軍隊是有許多游擊主義的遺產。軍隊進城之後，沒有鞏固，沒有組織城市的政權，沒有認真和國民黨軍隊作戰，又退出來了——這是因為舊的習慣，所遊擊之外不必有鞏固的地域，而是得一城失一城，再得一城再失一城……紅軍的薄弱，長沙事件又和以前一樣。這個經驗中國黨沒有利用。亦沒有認真去解決變更這種軍隊，使他們成爲有紀律的工農紅軍，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一定的地域——革命的蘇維埃根據地來行動。應當說明：遊擊戰爭對中國有很大的意義。然而在遊擊之中沒有無產階級式的紀律，堅決，那就不能夠勝利的。創造正式的紅軍——從現在這種紅軍部隊之中去創造——這是中國黨當前任務最要緊之一。

第三個問題是職工運動。赤色職工國際有許多很好的議決案。我們曾經和中夏同志爭論羣衆工作的問題。從九次國際執委全會起，就說必須開展部分鬥爭的罷工運動，使經濟口號和政治口號聯系起來。然而三中全會不顧這些共產國際職工國際的指

示。國際的指示是說：創造赤色工會的工作之外必須在黃色工會之中去工作。三中全會說：應當消滅黃色工會，中國文裏的意思就是打殺黃色領袖。廣州公社的經驗是又有用處了，廣州公社之失敗之一部分是因為黨不會在機器工會之中工作，不會去破壞機器工會。應當認明：我們在鄉村創造蘇維埃紅軍的成績大，而在城市之中成績很小。我在東方部的書面報告之中指出了職工運動薄弱的具體材料。我還可以引一引各產業的工會會員數目。這是很小的數目。至於黨，則有十五萬黨員，其中只有很少很少的工業工人，而數量上百分數上工人儘在減少下來。一年以前是百分之二，現在連百分之二也沒有了。爲什麼呢？我們看見有很大的罷工運動，照數量上說，中國罷工人數，佔世界第一位。然而工人階級的組織却很小，黨內工業工人很少很少。當然有客觀原因——白色恐怖在城市之中比在鄉村之中厲害。然而這裏立三路線的領導，玩弄暴動，玩弄政治罷工，完全不顧工人的部分要求，不去抓住這些部分要求——這是工人黨員少的原因。

最後，三中全會只把立三路線的最顯露最不能躲藏的『外表』去掉了。同時，却絲毫沒有走近國際路線一步，三中全會把半托洛斯基主義的立三路線病根趕到身體的內部去了，把不同意見混淆起來，把立三主義的實質掩蓋起來。病根在黨內沒有剷除，這是黨及全部革命運動的嚴重危險。

馬其亞爾發言：

請准我不僅說說黨內情形，亦應該說說中國的一般狀況。無疑問的，中國的經濟政治危機是在繼續，是在深入。只要看看美國領事，美國使館商務參贊的消息：他們說在北方大戰爭之後，在暫時停戰之後，北方商業不恢復，上海工業危機繼續，國內商業縮減，銀價繼續低落。經濟上的新現象是重要省份的年成今年算是好的。然而這對於反革命派，不見得是好處，因為年成一好，農業品的價格低落，尤其是商品用的農產品，農民是得不着好處的。

政治危機的表現是將要有新的空前的軍閥戰爭——這些戰爭是反映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反映國民黨各派的鬥爭，同時是英美日爭取中國的鬥爭。軍閥戰爭的暫時休止，使國民黨有運用手段企圖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的可能。……

國民黨的中央全會完全接受了托洛斯基的口號——召集國民會議。托洛斯基可以說了：我的口號總算由蔣介石來實行了。沒有疑問的，最近幾月我們看得見中國又要有新的軍閥戰爭，不但在北，並且在南。蔣介石現在打蘇區，同時，又是美帝國主義資本打英國資本。他不但去打蘇區，同時想去打英國勢力之下的廣東派軍閥。然而主要決定一切的是：國民黨反革命，中國地主準備很巨大的反蘇區戰爭。蔣介石現在

集中二十師的力量，所謂灰色軍隊去打蘇區。他不能調動北方的好軍隊，因為怕北方軍閥之間的新花樣。美國和上海資產階級給他錢去打蘇區。江西的蘇區受到相當的威嚇。（南京政府說打江西要五千萬元，這對於南方是很大的數目）國際的各國分部應當更加注意帝國主義的反革命的反對中國蘇區的戰爭。我們的各國共產黨做的太少了——雖然國際已經有具體的指示。帝國主義並且在實行思想上政治上的準備。已經有很多很多的文章演說，辯護攻打蘇區的『義舉』的。美國，英國下院（衆議院）有許多書出版，說只有外國出兵干涉才能救中國。美國外交部東方司前司長擬了一個出兵干涉的計劃，照他說起來，要用五萬萬美金，和廿萬軍隊。美國新近又出一本書主張必須出兵中國的。英國衆議院裏一個自由黨員提議由國際聯盟來干涉中國。

這就是中國的環境——在這樣環境之中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農民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農民戰爭正在日益生長。

然而中國黨正在此時做了不少錯誤。

立三講了這些錯誤，承認了，責備了這些錯誤。他的承認是否忠實，忠實到什麼程度，還要在事實上表現出來。然而不但對於中國黨，不但對於東方的黨，並且對於一切共產黨，却有幾個教訓。

第一，中國黨政治局和立三同志認為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發展的趨勢。這是主要的

方針。大多數不在此地的中國中央委員，也深信莫斯科不知道中國情形，不知道中國革命發展的趨勢——莫斯科如何能明白中國軍閥混戰，國民黨內部紛爭等等呢？這種理論是一切共產國際叛徒，機會主義者，從魯德非休，馬史洛夫，路夫斯東等一直到……都是說莫斯科不懂他們國家的特點，不明白他們革命發展的具體趨勢。莫斯科的俄國人很知道自己的事情。我們對於關於國際形勢的議決案，都是贊成的，都可以簽名的，然而對於我們國家的事情，那可對不起，我們知道得多些。我想用不着來證明：莫斯科是明白知道的——事實已經證明了，莫斯科是知道你們的軍閥混戰，知道中國情形，比你們還好些，莫斯科的估量永久比你們的正確些。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亦可以應用到中國——這是已經證明了的。我們對着中國同志要承認一件事：我們的確不懂得——中國黨內政治局內部的把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雖然我們很懂得軍閥之間的把戲——如果有四個軍閥打仗，那末，一定會有第五個第六個參加，我們懂得這裏的階級力量的對比。在政治局內的把戲問題上，我們至今也還不懂得。立三今天答應了幫助我們，這是很可寶貴的應允。這對於研究中國黨是很好的材料，使國際執委容易指導中國黨的內部事情。

爲什麼這些錯誤和傾向是可能的呢？中國黨是東方最重要的共產黨，難道國際沒有預先警告他嗎？沒有預先警告立三嗎？立三同志却來提議一個國際範圍之內的全

國範圍之內的大暴動計劃。雖道沒有告訴過中國黨：暴動是藝術，暴動應當怎樣做法嗎？國際對於這個問題給了很正確的指導，指示了中國黨的中央。國際九次全會，論到廣州暴動，批評了廣州暴動，分析了中國同志所做的錯誤——當時是在過去的國際代表領導之下做出來的錯誤。這個議決案怎樣呢？為什麼中國黨沒有估計這些廣州暴動的教訓，沒有實行這個議決案。為什麼重複這些錯誤。因為中國同志認為這些議決案祇是一紙空文，寫了自己的名字在這些議決案上就算了。因為政治局要想在極大的範圍之內來重複廣州的錯誤，所以不去估計那個議決案了。

如果再說一說九次全會的議決案，六次世界大會的議決案，那麼當時羅明納茲在中國做了好些錯誤，九次全會是認為與托洛斯基主義的錯誤同樣的。你們記得羅明納茲的理論，他說中國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資產民權革命，現在立刻就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這種錯誤，是有九次全會的批評的。這個理論現在却由立三同志來實行起來了，重複了，擴大，擴大到全中國以至於全世界。為甚麼？因為中央沒有認識羅明納茲的這些錯誤，沒有對全黨解釋。因為羅明納茲和有幾個政治局委員的關係很好。

既然立三今天承認自己的錯誤是托洛斯基主義的，他就應當說：這個錯誤的根源是羅明納茲發展的理論，國際對於這個理論是說明他的錯誤的，而中央把這些教訓和經驗隱藏起來不給全黨知道。政治局委員在第九次全會的議決案上簽了名，然而以為這議

決案沒有什麼重要，而沒有公佈這個議決案。蘇維埃區域之中有富農傾向的極壞的表現，如分配土地問題，富農小地主得勢的情形，富農跑到了政府和軍隊裏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人說——有地方不准工人加入蘇維埃機關，那裏有工人在蘇區不應當做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諸如此類的富農理論。關於富農傾向，共產國際沒有預先警告中國黨嗎？警告了的。中國黨六次大會上有了那句錯誤的話。立三就從這句話發展成整個的理論。說要聯合富農來做土地革命。秋白同志在這裏贊助這個理論。共產國際全體來反對這個傾向。史大林以下一切負責同志來解釋過：這是不對的，這不是列寧主義，不應當這樣了解。中國同志簽了名，寫了一封信到中國去。後來呢？而現在我們得到許多蘇區的兵士委員會的信，說那些地方以前沒有做反富農的鬥爭，富農甚至在黨內得勢得很。這樣，可見簽個名的議決案隱藏起來了，又做了不少錯誤。軍事動力問題。你們中國同志過份估量軍事動力。用軍事動力是不能夠解決問題的。苦同志已經講過，在長沙怎樣一回事。關於廣州暴動已經說過：單是有一兩營兵組織暴動是不夠的，而要動員羣衆組織工人等等。然而長沙又是這樣錯誤。一切中國黨的指導者都聽見過的：你們的紅軍太薄弱，不能去取大城市，一切負責同志，史大林，莫洛托夫等都給中國同志解釋了的。史大林對你們說——不要到長沙去，要不好的。莫洛托夫說：現在拿大城市是紅軍力量所不夠的。中國同志都同意了。到了

中國，又發命令要第二次進攻長沙。第二次沒有成功，中央又發通告要第三次進攻。

工人運動。中國黨不願意到黃色工會中去工作。在中國一般不注意工會工作。皮同志寫了一個議決案，通過了。中國同志簽名了，說要實行經濟鬥爭，要做工會工作，要到黃色工會做工作。然而一有機會，他們就利用來停止黃色工會之中的工作，解散赤色工會，停止經濟鬥爭。在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大會之後，中國通過了一個議決案，說蘇區之外，小小一個經濟鬥爭，就是政治鬥爭，經過部分鬥爭就可以實行……（原稿不明）。

三中全會上秋白同志說：工人的政治鬥爭應當和經濟要求聯繫起來。不是說經濟鬥爭要和政治的聯繫起來，而是相反的——這是秋白同志的說法。我可以數出好幾十個議決案，對於中國革命都是對的，都是中國同志所簽名的，後來却是不實行。

這種情形必須取消，然後國際的議決案和指示再不會變成一紙空文。不能夠簽了名之後，又去照着自己的思想解釋，弄成相反的路線。

就要完了，我想這件可悲的事實的國際意義是：各國共產黨的種種傾向和錯誤，過了一個時間總要反映出來。然而在革命的時候，革命過程之中——這種傾向錯誤的反映就要成爲悲劇——中國就是如此。因爲中央有不正確的路線，我們喪失極寶貴的時候，——這是革命之中的寶貴東西。就丟了革命的根據地。有些地方我們喪失了幹

部，喪失了我們階級的最好的力量。我以為立三同志講的話是忠實的，他說他批評自己的小團體，揭發秋白同志的兩面派的路綫——這似乎是立三忠實的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然而相信口頭上的是不行的——列寧這樣說的。立三應當用事實來證明。他應當幫助國際，使以後再沒有玩弄國際議決案及指示的事。

我以為這是中國黨那一時期錯誤的國際教訓。

張國濤發言：

我首先從自我批評開始，——承認我過去做的錯誤，我有書面的寫在這裏，請把他讀出來：（讀）

自然承認錯誤不應當只是口頭上的，應當在實際工作上來證明。中國黨現在正在最緊急的時機，要鞏固黨必須實行堅決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右反左，反對一切國民黨式的糾紛小團體鬥爭。這樣才能實行當前最重要的任務。立三的錯誤是半托洛斯基的冒險主義的性質。立三執行了反馬克斯反列寧反國際的路綫。這些錯誤不但在羅明納茲影響之下，而且在陳獨秀鮑羅庭影響之下。現在黨的領導在紅軍之中實行進攻的策略，沒有澈底執行土地革命，不反對富農對於土地革命的影響，這不是左的錯誤，這是右的錯誤。陳獨秀鮑羅庭亦曾經以為取得北京之後，再談深入土地革命的問題

。立三的策略就是這樣的。他們忘記了鞏固紅軍，土地革命，不反對富農影響，這種政策是有歷史根源的。現在一面反對立三主義，必要反對右傾的表現，——這是主要的危險。必要特別反對富農影響——表現在右傾之中的富農影響。職工運動中有許多事實，紗廠罷工時，我們同志甚至沒有企圖去反對黃色工會，放棄反對黃色工會的影響。這些事實的總和，可見右傾仍是主要危險，必須堅決反對。

三中全會是秋白同志領導的，有了兩面派的對待共產國際的態度，而對立三的錯誤調和，擁護他的錯誤，而自己沒有清楚的路線。三中全會決定了召集中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照材料看起來（紅旗）這一大會的準備只在技術上，而沒有任何的政治準備。土地革命問題沒有提起，沒有提貧農團的問題，沒有提起平均分配土地的問題。工人羣衆之中怎樣準備大會呢？

組織問題：中央和國際代表之間的組織上的關係完全是不健全的，苦同志已經說過許多事實，我不必來重複。對於個別的組織上結論，亦是表現組織路線的不對。好的同志，批評立三錯誤的同志，被三中全會當做反革命份子，留黨察看三個月。用這種理由開除了好的同志。這是現在組織工作不正確的表現。

立三同志承認了自己錯誤，我昨天和立三談了七個鐘頭。我們互相批評自己的嚴重錯誤。我同立三決定要徹底拋棄小資產階級的無原則的鬭爭。我們有很重大的任

務，要看得明明白白。我們黨現在有危機。這是很嚴重的，要救黨，要糾正錯誤，要服從國際路線。我們認爲口頭上承認是不夠的，在實際工作上要改正。我勸立三不要單在口頭上承認錯誤，還要在實際工作上執行國際路線。證明以前的錯誤是糾正了。

現在特別要國際幫助中國黨。馬同志已經講了許多關於國際幫助中國黨的話。我認爲國際要用組織上的辦法幫助中國黨解決危機。此外，黨的指導所做的錯誤，要使全黨一切同志及一切各國共產黨得到這教訓。只有這樣才能救中國黨出這一危機，而執行當前的偉大任務。

薩活洛夫發言：

現在中國黨的領導機關之中的情形非常嚴重。蔣介石得到軍閥混戰的暫時停止，正在積極進攻蘇區，要想『勦滅』他們。我們當然不相信蔣介石會成功。然而要知這情形是很嚴重的，國際所定的方針是：應當聯合，配合廣大的農民運動去反對地主高利貸及紳士。我們要聯合各蘇區，依據蘇區，而把農民運動推廣到中國的其他地方。而工人運動亦是這樣，自然，在西歐的條件之下這是不可能的現象：一方面有些區域有蘇維埃政權，有紅軍，有平均分配土地，而有些區域却是蔣介石的政權，帝國主義的

政權。中國的封建割據，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是有很大的作用。因此全中國現在革命還沒有成熟。成熟的過程是很困難長久。同時運動是在進攻，依據蘇區做自己的作戰根據地。國際的觀點之外，却有另一種觀點和他對立，這一觀點是完全獨立的。

如果以爲中國同志誤解佔領城市應當是同時一致的每城市爆發暴動，這就算錯誤的全部，那麼這是不對的。事實上我們有了一個獨立的路線。看中國黨中央的六月十一議決案，已經說：『中國革命要在世界革命過程之中去取得勝利』……（讀原文）

……』這議決案中就說革命勝利的開始，革命政權建立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其中沒有絲毫間隔』否認立即的革命轉變，被認爲是右傾，彷彿中國不要經過許多階段而後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蘇區會議的時候，立三說：『中國革命的勝利，依賴在全世界的革命形勢（讀）……』八一政治局會議立三說：『我們現在沒有組織上的力量，我們還是少數，然而如果……那就是機會主義，如果不估計到……』（讀）於是產生一個好大的計劃，蒙古要立即加入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立三等竟有割讓政策的傾向。再則，說西伯利亞的中國人要武裝起來加入革命。三則，蘇聯和日本開戰，牽涉全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戰，而全世界無產階級及東方民族，贊助蘇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中國革命得到勝利。

直到現在中國同志很專心的詳細的談論種種傾向，孔夫子式的談論，如三中全会甚

至說白郎德爾是托洛斯基派。然而自己却弄出了一條路線——不斷革命論的路線。托洛斯基說的不斷革命，說到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他這種方法論應用到殖民地。他的『不斷革命論』——最近公佈的他的著作，說殖民地革命亦不能夠勝利，殖民地革命一國不能勝利，因為只有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保障中國革命的勝利，自然，從此立刻得到的結論，就是托洛斯基主義式的去估量農民。似乎大家都應當了解：中國現在有農民戰爭，帝國主義說過比太平天國運動還要大，資產階級的報紙也在找歷史上的比例，想來了解自發的極大的農民運動，而中國黨中央却沒有一個半字來說農民土地革命及其主要任務，政治議決案只說『要徹底實行土地革命』，如何行法呢？——沒有說。創造正式的紅軍——從現在這種紅軍部隊之中去創造——這是中國黨當前最緊要任務中之一，而蘇區會議的決定，竟說紅軍兵士和雇農不應當分配土地，這簡直是不可容許的錯誤。

很有趣的，我們問廣東來的同志。他們說以前雇農和紅軍兵士分配了土地，後來中央來了指示，說不要分配，他們也就覺把無產階級變小資產階級不好了。我們問他這種意見你是不是以為對的呢？如果這樣實行了，是不是你們那裏的雇農都不再助紅軍了呢？他說——假使你們以為我們真照着中央的指示去做，那就是你們想錯了（笑）。

因為根本問題沒有弄清楚，所以弄成這樣不可容許的現象。現在條件之下『極左的左』傾，使黨脫離工農羣衆，實際內容上是極右的右傾。土地革命的根本問題是甚麼？富農在蘇區是反革命政府的外交官。富農反對平均分配田地，和地主封建的剝削密切聯系，妨礙徹底的取消不平等狀態，取消地主高利貸的剝削——在這種條件之下，反而不談貧農團及農村工人組織的問題，對這些沒有任何決定。三中全會的議決案之中，反而去談抽象的東西。再則就是說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而不平衡問題的了解是這樣的：當他們遇着立三同志說的時候，他說他們的觀點是誤錯的——他們以爲要反對右傾，就要把革命轉變說得快些。

關於富農問題，貧農團問題等，不過照國際路線而做些決定。這種條件之下的情形怎樣呢？看：中央給長江局的信，——『鄂東北的情形非常嚴重。肉體消滅的辦法（續）……』這真是極左傾的空談和極右傾的實際工作，這是一方面幫助敵人，一方面削弱蘇區的作戰鬥爭力量。秋白同志在三中全會上說的：南通用屠殺的方法，不但對付富農，而且對付富裕的中農，甚至小農……（讀）這是黨不去清楚指示怎樣孤立富農，團結貧農和中農，而放任地方黨部自己去尋辦法對付的結果。而且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問立三：紅軍兵士去打仗，他的土地怎樣呢？他說一般是他們自己把田租給農村裏有些錢的人去耕。這樣的解決問題的！我們把這個問題問東江來的同志，他的答

覆是不同的，他們十家之中有兩家沒有耕具，或者去打仗了，那其餘八家替他耕種用共耕的辦法。這種答覆才真正是中國革命的先進代表的答覆。中國農民像一九一九—二〇年的俄國農民一樣，他們的行動是這樣的。這種問題是生死問題，不能夠用托洛斯基的空談來搪塞的。

再則還有蘇區根據地的問題。如果我們問一問中共是否在執行國際關於這一問題的指示，那麼，可以說現在還沒有去執行。而中央給長江局的信，就說彷彿國際並不反對現在暴動，彷彿國際認為在各城市現在暴動是可能的，不過認為工人落後，所以要等等。這樣是中央解釋國際指示的話。不說弄玩暴動是冒險主義，首先要鞏固蘇區，反對敵人進攻，要使廣大農民運動，工人運動聯系，要使城市工人兵士和農民在鄉村之中的行動配合，不說這個，而說國際不反對全國暴動，只不過要等一等，這是不容許的。

這種情形之下，所以長沙會發現那種現象——英國新聞記者的好幾封通信說的比中央的正式報告還好些。英國資產階級被我們嚇壞了，他們把共產黨的行動描寫得天花亂墜。長沙城裏，我們的確是得到人民贊助的，三千工人跟着紅軍走的，然而並沒有能夠立刻開羣衆大會。長沙在紅軍手裏的時候，敵人偷進來了，因為全城一無秩序，白軍軍官假裝紅軍，把政治部圍起來了，弄得我們慌張的退走。這種情形是要有人負

責的。在國內戰爭之中，我們這裏是每人都知道應該怎樣負責的。

組織蘇維埃政府的問題，我們有許多要組織政府的決議。然而沒有保障可以實現。我們敢說：立三主義及秋白的兩面派手段的殘餘若還有些保留的時候，那是無論如何沒有保障可以組織與發展下去。

立三先在東方部承認並懺悔錯誤，第二次進了幾步，今天到了最高點。彷彿是說實際是對的：用不着在上海武漢佈置暴動，可以首先取長沙，組織蘇維埃政府。這樣組織政府的問題，仍舊是和冒險行動聯系在一起。我們的意見是組織政府要和鞏固蘇區相聯系，而立三的意見是：『不能夠在山上組織政府』。托洛茨基派十月號的公報亦曾說：只有工人的城市之中可以組織蘇維埃政府，山上是不能夠組織蘇維埃政府的。這不但是政治問題，而且是軍事上的政治問題。我問你，明天蔣介石，因為黨的指導做了許多錯誤，真正就會把你們迫近山脚，那時怎樣呢？如果照立三說來，那就又沒有蘇維埃運動了，沒有一個組織中心了，沒有一個統一的旗幟了，仍舊只能反對反革命進攻，亦不要土地令（清楚規定我們黨綱的土地令說明紅軍兵士是有取得土地的土地令）等等。這種政策是打斷中國革命的高潮。有人問，你相信立三的話嗎？然而我想現在不是相信不相信立三的問題。問題是在現在環境之中，革命高漲，很好的羣衆運動，推選了有力的青年幹部，我們却有了這樣一個領導，弄出極大的困難，並且：

……(原稿不明)

還有一句話說：有些同志在莫斯科的時候，很客氣的，到了中國又是另一種話了。例如秋白同志，他在這裏代表中國黨好幾年，他參加我們一切決議的討論，他參加對六月十一決議的討論，他自己說的，立三是發了癡了。他到了中國之後，一個轉變轉了一百八十度。甚至於他看了他的信仰可以受着損害的時候，他不去提出革命的根本問題，而在三中全會的結論裏說：立三懺悔得太多了，立三承認錯誤承認得太多了，不要承認這樣多，承認錯誤就要幫助右派。

總起來說，我想國際主席團要堅決的指出：立三的極左傾向應當到最下層的每個黨的支部之中都去公佈，每個紅軍遊擊部隊之中到最荒遠的蘇區之中去公佈去研究。只有這樣，只有說明立三指導的路線是不正確的，是反對我們的決議的，三中全會糾正這路線的企圖是很不確定的，是極端外交手段的，只有這樣，才能說立三主義的惡果不但在口頭上，並且在事實上將要能夠消滅。

蔡和森發言：

我只有兩句話。現在我們黨有危機。立三來莫之後，中國黨的領導機關之中，仍舊反抗國際路線，運用種種手段，來繼續自己的路線。下層羣衆已經起來反對領導

，開始贊助國際路線。我們的指導機關做什麼呢？他企圖說下層的代表是小團體，是右傾，來抑制下層代表。他是不是小團體呢？不是的。這是下層的代表，羣衆幹部的代表，幾千幾萬羣衆的，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貧農的代表——他們反對不正確的領導。

誰是真正的小團體？真正小團體的代表是秋白同志。李劍如是莫斯科的學生之中的小團體的代表，和托洛斯基派聯合，而現在劍如做了中國紅軍第六軍政治委員。

最好的同志都被趕到黨外去。最近從少共國際回去的同志，中央不給他們工作。好同志被開除，說他們是小團體。

立三同志，你應當堅決的和兩面派的手段鬥爭呵！這是我們的敵人呵！而新起下層代表不是小團體，這是羣衆的代表，他們批評上級的錯誤路線。他們是救黨於危機之中的唯一動力。黨的老輩——我也是一個——已經不能做新的運動了。他們有過各種左的右的等等錯誤，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已經落後。

如果還有人企圖抑制新生的幹部，我認爲事態是異常嚴重呵！應當對於這種企圖大大的打擊。

最後立三同志要在實際工作上證明，不但在口頭上來說。他應當去掉自己錯誤的根，這些根在中國是有的，這樣來執行國際路線。現在我們黨內兩面派的手段是特別

危險。對左對右的調和亦是。對調和主義要打擊。我在過去對於黨亦是用過兩面派的手段的，亦做過無原則的鬥爭的。然而我不但要口頭上承認，而且在將來中國實際鬥爭之中證明這種無原則的小團體鬥爭是絕對的停止了。我希望立三真正誠意的說出他所知道的中國的小團體。來幫助國際了解這個問題而澈底消滅小團體的現象。

馬努伊斯基發言：

關於中國問題，我們要在國際執委的擴大會議上來討論，要極廣泛討論一下，並且提出中國革命現在當前的根本任務——就是革命轉變的問題。我想，這個大問題今天不能預先討論了，今天要說的是立三秋白同志所做的錯誤問題。我應當立刻把我的意見公開的對立三說。如果不只表面上今天來討論，那麼，今天的討論情形真正是共產國際所希望的。立三做了錯誤，中央贊成了這些錯誤。中央因為莫斯科叫他，所以派他到了莫斯科來。莫斯科的空氣對於立三大大的打擊了，立三在東方部幾次會議之後，就承認自己的錯誤。彷彿最好也沒有了。然而我公開的說，我覺得這樣容易的戰勝立三的觀點，正是使我非常警心的。我想不但我，一定還有許多同志，尤其是在國際之中有過長期的反對傾向的鬪爭經驗的同志，自然而然要發生懷疑：是否整個的方針——立三同志領導之下中國同志所採取的方針就此消滅了呢？這是根本的問題。我

想問題不在錯誤上。錯誤是可以做的，錯誤是容易糾正的。如果要幼稚的中國共產黨——雖然是在國內戰爭之中鍛鍊出來的，當前還要去解決民權革命的任務，及其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然而沒有自己的列寧，自己的史大林，沒有這樣的歷史經驗，要求他實行這個革命道路，一些錯誤也不做，那倒是很奇怪的了。很難這樣希望的。然而假使沒有這樣一個整個系統的錯誤，完全和國際所認識的發展道路不同的整個錯誤觀點系統，那自然是很容易改正錯誤的。至於整個系統的錯誤，那就困難得多。而現在的問題正不是你們做了個別錯誤的問題。例如立三的錯誤之中有對於經濟鬥爭估量的不足，有實際上取消了共產黨（在要暴動的時候），然而我們並不是僅僅批評這些錯誤。所有這樣的錯誤，都是由於一個根本的錯誤——這個根本錯誤是發生於立三從中國革命發展的前途上對於整個國際狀況的估量。這裏我們發現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盲動主義的方針——立三及其一派的立場。正因為如此，所以取消這個是不容易的。這種錯誤的重新發現，現在就會有的；——因為世界恐慌的關係。我并不是不看見立三錯誤的國際意義。我想：既然現在發展着世界的恐慌，同時，各國共產黨主觀動力又是落後，那麼，這些時候會有人來責備共產國際沒有跳過歷史的階段而一躍而至獨裁。因此，立三的錯誤是現在時期的特色。根本錯誤在什麼地方？在於對世界形勢的估量。如果立三在這裏擁護他這觀念，而和我們逐條逐條來爭，那麼，我倒覺

得放心些。正因為立三這樣快的拋棄了自己的觀點，倒引起了我的警心了。如果立三說：你們以為中國還沒有『國際客觀革命形勢』你們錯了。歷史上從沒有造成中國這種的理想革命環境，因為經濟恐慌動搖了現在中國的全部經濟。如果立三來說：我們根據這個客觀革命形勢，動搖中國全部經濟的形勢，封建殘餘的基礎之上，還加上帝國主義的壓迫，有着極大的革命運動，現在中國所有農民運動非常之大，一九一七年都不曾有過。我們當然要起來反駁他這種說法。如果立三要說：你們要懂得我們中國的情形是和你們十月革命的情形不同的，你們當時還沒有自己的紅軍，你們沒有紅軍作戰的戰場，而我們有紅軍。如果立三同志提出自己的理由來，我們當然要討論，而且和立三爭論起來。如果立三說：你們不懂得一個根本問題——蘇維埃是不能建設在農民區域裏，像托洛斯基說的，必須要有無產階級領導權。然而立三這些問題都不說了。立三現在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在於立三，中國同志不估計到中國革命遇着了——一個很複雜的交錯環境。凡是不懂得交錯的環境，他一定要做錯誤。當一九二〇年我們打到華沙去的時候，列甯說為什麼沒有能夠打破一九二〇年的帝國主義戰線——當時好些國家我們有工人革命運動的高漲，當時是世界恐慌很利害的時候？為什麼我們應當退兵離開華沙？因為我們的進攻華沙遇見了凡爾賽和約的制度——整個的國際關係制度。立三是否懂得了：中國革命現在比一九二〇年的俄國革命，更好碰着了『凡

爾賽和約的制度』？ 列寧在第二次世界大會的時候，估量『凡爾賽』是全世界分成兩半邊——二萬萬人統治十五萬萬人。這是凡爾賽和約的制度。他仍舊保存着，然而在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時候，在第三時期之中，更加增加了新的矛盾。在凡爾賽基礎之上生長出來了新的世界制度。現在中國革命遇着了整個的凡爾賽制度。因此，現在的任務是：中國革命在現在的階段裏，在現在的世界恐慌的規模裏，在現在的共產黨情形之下，能否衝破這個制度？你們責備俄國共產黨員說，我們只顧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不看見中國革命的作用。然而你們是否想一想整個世界帝國主義的制度壓迫着中國呢？你們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依靠着蘇聯，依靠自己的紅軍衝破這個制度呢？這是根本問題，你們發展着一個整個的概念：一方面中國起來暴動，別方面……我們就可以開始衝破這個制度了。你們可忘掉了一個『小事情』：就是全世界的工人運動的力量還不夠呢。我們現在有各國的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穩定破產的開始。德國現在的情形是兩個階級走了決定勝負的戰鬥。我們看見好些國家有政治危機。然而危機還不夠——不能講到破壞整個凡爾賽制度。這裏要有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感覺力，來利用這個時機組織自己的力量，去動搖資本主義的穩定，我們有的是動力——就是共產黨，就是工人運動。這是現在的根本任務。現在國際舞台上有一極偉大的事實。而你們只看見你們的螺絲殼，只看見你們國內的關係，而沒有看見整個國際的複雜的交

錯環境。這是你們的錯誤。你們沒有了解：現在不估計到無產國家的情形是不能夠解決任何一個世界革命之中的問題的，現在沒有一個革命之中這個問題能夠不發生的。你們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的呢？這是你們的根本錯誤的來源。立三同志！問題不在於我們今天通過一個反對你的議決案，我們要你了解：你們表現了很厲害的地方主義。從此就發生其他的問題，因此說蘇聯有狹隘的民族成見，說俄國人不了解中國情形，其他一切觀點及整個的概念。自然，很可警心的是我們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共產國際團結力量的這幾年之中，我們慣於和各國共產黨談論，如果某黨與國際不同意，那麼，我們和他討論。然而最危險的是，表面上是同意我們的決定，實際上執行自己的路線。譬如說中國同志以為我們拿到了長沙以及其他的大城市之後，國際和我們談話就不同了。這不是共產黨的說話，這是國際聯盟的說話。立三同志，你以為你握緊了拳頭，你的事情就完了，你要知道這種說話是在國際聯盟裏面說的。國際聯盟裏面是看力量的。國際和各國分部之間的關係的基礎，決不在這裏。這是你們應當了解的。從此可見，你們只是很好的革命，可不是共產主義者。立三同志！你還只是一個很壞的布爾塞維克。

現在說兩面派的問題。兩面派是現在最大的仇敵。如果看了這種情形，那麼，議決案只管通過，到了中國仍舊執行自己的路線。如果這種情形是國際與共產黨的互

相關基礎的基礎，那麼，我們可以使國際滅亡。這就是你們幫助破壞國際的信仰，立三同志和秋白同志。如果你們實行今天的應允，今天的宣言——就是國際監察委員會裏面去詳細敘說中國黨內的派別，那麼，你們真是幫助共產國際揭破這個痛瘡，這個痛瘡是必須揭破的，否則不會有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黨。立三同志要幫助揭破這個痛瘡，揭破這種小團體的情形，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小團體狀態。小團體狀態是最大危險中之一。德國的小團體狀態沒有中國這樣的根基。你們中國的無產階級是很薄弱的，你們有很大的農民區域，那裏還沒有走出封建時期。從這個觀點上說，如果立三幫助我們，那是很好的。可是要立三真正和布爾塞維克一樣，誠懇的公開的把材料和消息交給我們的國際監察委員會。此其一。

第二，我想不能限於批評。必須召集中國黨中央的全體會議，提出所有這些問題，嚴厲的實行自我批評，不要糟蹋全體的領導機關，因為你們的行動之中亦有許多好的。在你們的榜樣上，一切幼稚的殖民地共產黨都要學習呢。中國的黨對於殖民地共產黨的作用，將要和蘇聯黨對於全體共產國際的作用一樣。應當說說所有的確是好的方面，同時嚴厲的自我批評，批評你們的錯誤。

第三，爲着創立三同志起見，要他在這裏進一進布爾塞維克的學校，要他了解自己錯誤的實質，不是隨隨便便的速成，而是在日常工作之中去學習，我想中央雖然只叫他

來做報告，可是現在他不用回中國去。立三同志應當在這裏留這麼幾個月，同着共產國際糾正他自己的錯誤。我想要認真的打擊這造成的『僑民』生活的不健全現象，這是滋養小團體狀態的。現在應當特別注意留在這裏的同志。

這是我認為要做的。

白臘昆發言：

從立三同志所說的看來——還有比我知道中國情形更多的同志所說的看來，現在對於中國黨最危險的一部分領導同志和國際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的確是所謂兩面派的手段。這還不僅僅是國際紀律的問題。這裏所說的話，可以總合起來——這種兩面派手段的基礎是一部分中國領導同志有了和國際領導和國際全體不相同的方針——關於中國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的方針。在這個原則的基礎上造成那種關係，然而經驗指示我們——一部分中國上層同志輕意的說莫斯科不懂得中國的特點，並且不知道怎樣應用國際十年來積聚的革命經驗。這些同志說彷彿國際不懂得中國的特點，自己就不會估量中國的特點。三中全會對於土地革命的方針完全證明這一點。在這樣的國家裏面——正在進行着有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前途的資產民權革命，而只寫了幾句關於土地革命的話，說要澈底執行土地革命。然而我們要提起譚平山以前和秋白立三現在所說的是

一樣的。我們知道平山是極右的右派，後來成了叛徒。我並不是要說秋白立三將來和平山一定是一樣走到那條路上去。然而立三秋白對於中國特點的態度，和平山的態度是有些相同的。事實上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的時候，共產國際屢次着重的說明必須使中國同志認明中國革命的前程和中國經濟狀況的特點。這正是共產國際做的。那些罵共產國際，甚至整個的莫斯科（聯共）不懂得中國特別情形的同志，他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也和以前陳獨秀譚平山，一點也不懂。他們不明白應用國際的革命經驗。我只來說一說土地暫行條例。這裏，領導蘇區的中央政治委員，或是政治局一部分，否認平均分配土地，而承認只有沒收來的土地才可以平均分配。他們不要分配土地給雇農，而現在就強逼雇農去組織共耕。這個土地條例說沒收來的地主土地要立刻組織蘇維埃國立農場，換言之，就是要立刻把這些地主土地來實行社會主義的農業。那班認爲國際不懂中國特殊情形的中央委員反而有這種主張，他們怕地主土地分配之後會損害生產力。並且可見領導這次會議的一部分同志認爲紅軍的兵士不應當分配土地，而要等中國完全蘇維埃化之後，要等到革命在極大的中國完全勝利之後。這一方面證明中國同志自己不顧中國特殊情形，別方面這是不願意承認國際的可悲的經驗——部分的說來，就是我的經驗，並且不止是我的經驗，其他國家裏（除出匈牙利），如臘德維亞，立陶宛，甚至烏克蘭，都因爲不顧列甯的指示，不顧俄國黨領導者的指示，

而反對了這種政策。

當我讀着中國蘇維埃區域會議的土地暫行條例的時候，我覺得這是重複我們匈牙利蘇維埃政府的土地法，重複華爾加等同志當時的所謂理論上的綜合——這是在可悲的經驗之後了。我記得我和華爾加同志，在做過了可悲的經驗之後，甚至於還寫過：用不着分配大地主經濟的土地給農民，因為如果這樣就不能夠保障城市之中來的無產階級分子的集團，這就是說分配土地可以損害生產力的意思。

共產國際以為這種可悲的經驗對於中國共產黨不致於是枉然的，然而中國有些同志却認為國際不知中國特殊情形，因而不能利用這種經驗。

我想，我們匈牙利共產黨人所經過的事情，現在立三同志也應當經過。我應當說：我當時還沒有立三同志今天這樣堅固的承認過自己的錯誤。然而正因為我沒有一下子就這樣堅固的承認錯誤，到後來却能夠根本上承認錯誤了。我在匈牙利蘇維埃政府因為我們錯誤而被推翻之後整整的一年，為着我的觀點而鬥爭，甚至於弄僵了，然而經過這樣的情形之後，更加真正的脫離了這個錯誤。

我覺得立三對於中國革命問題只有表面上的了解，輕意的反對了共產國際，同樣，又輕意的認識這些問題的錯誤。可見立三不過要逃避他們的指導——實際指導中國黨的一部分領導同志不願意了解革命不是一個先鋒隊單獨做得了的事情，而必須一切羣衆

，無產階級的大多數農民羣衆的大多數在先鋒隊領導之下來做——逃避這種切實的認識

他做了什麼事情？ 決定了七次總同盟罷工，這是在一個月之中。 這亦算中國的特點！ 苦烏西甫同志在布加利亞委員會裏面證明：布加利亞革命的失敗（以及匈牙利革命的失敗），都是因為輕意對付先鋒隊。 這是叫全部先鋒隊的祕密組織暴露出來，這是輕意的不去細想的沒有準備的用暴動去把先鋒隊送到警察手裏去。 並且，我們這裏亦有國際的經驗，我可以說一說回憶之中的事情。 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國那次事變之後，我們在德國亦是有些輕意的對付先鋒隊，沒有充分準備廣大羣衆去發動戰鬥，列寧罵我們，特別是罵我們犧牲先鋒隊，先鋒隊的恢復是不容易的。

立三說中國的特別情形，他做些什麼呢？他真正是犧牲先鋒隊。 薩同志和馬同志都說過了：他們開除批評領導機關的同志，開除在莫斯科求學過的同志，開除執行國際路線的同志。 我想在這方面，立三同志祇是形式上的承認錯誤，沒有切實了解他，秋白等所做錯誤的嚴重，這種兩面派的手段是由於中國黨的非列寧主義非馬克斯主義的領導，我想這並不是第一次——國際遇到各國黨內的『左』右機會主義者對付國際的關係的問題之中，這並不是第一次。

然而經驗告訴我們：不但中國這樣的黨——中國黨是已經真正在巷戰之中在國內戰

爭之中鬥爭過的，真正有勇敢的戰鬥員，用武器去打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者——不但中國這樣的黨，就是更幼稚的黨也能夠克服自己的錯誤，然而必須對於國際有正確的關係。因此，我認爲中國應當用快刀斬盡這種對付國際的不正確的關係——秋白的行爲之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關係。我相信秋白同志在這問題之中不是中國全黨的代表。秋白同志不過是一個小小團體的首領之一，他們雖然暫時的有了黨的領導，然而他是絕對孤立的，等到共產國際領導幫助中國分部和世界共產黨——共產國際之間建立不但是形式上的而且是真正的正確關係，這是中國黨發展的一個條件，而且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條件。

苦烏西甯發言：

現在用不着來重複大家已經說過的話，東方部同志說的話以及馬努伊斯基的話我與他是完全同意的。我祇要補充幾點，立三在這裏很勇敢的實行自我批評，這是很好的，但是亦有一種可能，在中國的同志聽見我們這樣利害的批評左傾盲動托洛斯基的傾向及應當爲着反對立三路綫而往右傾，這個不是我們的意見，亦不是我們的任務，立三講話之中有一個缺點，就是他沒有說是沒有注重的說他的左傾之中有很多右傾的成分。這成分在什麼地方呢？我想首先是在他對於時局的估量，他說中國一九三〇年的情形

與以前完全不同了，這當然是對的，如果他說在中國範圍之內確有了武裝暴動的形勢，那麼，這是很明顯的不對，這是很明顯的左傾極大錯誤。然而他的估量之中，他自己亦不相信全國範圍之內已經有了武裝暴動的形勢，因為他盡在等待蘇聯以及其他各國的幫助，他以為祇有這樣才能夠使中國革命勝利。他沒有相信全中國已經有武裝暴動形勢這麼一會事。

假使我們以為一九三〇年中國情形和以前沒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很錯誤的，你們記得一九二九年的時候，我們有一封信給中國黨，那時候我們對於中國形勢有一個估量，現在的情形和那個時候就不同了。在一九二九年年終的時候，我們只說中國有革命高漲的薄弱徵象，但是等到發展了很利害蘇維埃運動，有了幾十萬人，在蘇維埃區域之中，情形就不同了。我們在中國的策略就應當變更了。如果立三和其他同志要求變更以前的策略，那麼，他們是有理由的。一九二九年我們怎麼樣決定中國黨的根本任務呢？第一要鞏固祕密的共產黨，鞏固他的幹部及黨部的影響。第二要反對合法的，和平發展的幻想，要暴露國民黨的政策，動員勞動羣衆反對這個政策，準備羣衆到新的高漲。第三主要的任務是取消黨和廣大的勞動羣衆脫離的狀態，這種任務對於一九二九年是很對的，對於一九三〇年就不夠了。一九三〇年蘇維埃運動已經鞏固發展，我們應當把全中國範圍之內的中心任務另外來規定。我們對於中國同志最近的指示，很利

善評中國黨冒險主義的傾向，可是我們同時除出在全國範圍之內就要有準備羣衆去暴動的方針。如果中國同志就是那時的領導同志他們祇要求這一點，那麼這是很對的，因為要贊成蘇維埃運動就要有準備羣衆暴動的前途和方針。然而怎麼樣去準備呢？這裏就是主要的問題，中國同志沒有正確的準備羣衆去贊成蘇維埃區域去準備暴動。他們反而取消了羣衆工作。他們的方針是取消黨，取消工會，取消青年團等等，取消罷工運動，他們只知道技術上去準備暴動，這就表示他們的右傾。在工業中心開展羣衆的罷工運動去贊成蘇維埃運動，這應當是中心任務，然而他們所作的恰恰相反，他們的方針和他們對於工人情緒的估量，並不是去準備罷工的，而是所謂準備暴動的，這實際上是右傾的方針，這實際上是掩蓋他們右傾的消極行動。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失敗，主要的原因是我們農民的后備軍沒有來得及給工人運動充分的贊助。我們現在看見中國革命運動又高漲起來，正是因為廣州暴動之後，農民暴動又起來了，而同時工人運動還沒有發展到很高的程度。中國黨的任務，是要使工人羣衆起廣大的罷工運動，那才是真正的準備全國的暴動。所以我以為一方面我們批評中國黨的左傾錯誤，別方面我們不應當忘記我們的方針，我們的策略和一九二七年是不同了，我們應當簡直的說明中國黨的中心任務是準備羣衆去贊助蘇維埃運動，爲着要直接去推翻國民黨政權，準備中國的暴動。我想我們今天會議之後要最終的決定這個問題，就要對於這一點特別着重說

明，使中國黨的右傾分子不能夠利用我們的批評，就是利用我們反對盲動半托洛斯基的錯誤的批評，來解釋到右傾方面去。

我稍微說一說秋白同志的東方式的外交，我們在今年夏天曾經在政治委員會上面省察過秋白同志參加中大糾紛的問題。那時決定秋白同志最好不要再參加中國的代表團了。爲什麼呢？因爲他和其他的同志領導了中小團體糾紛。就是李劍如的小團體，這個小團體是實際上和托洛斯基派合作的。我們決定了秋白退出代表團，當然我想政治委員會的委員都沒有以爲秋白退出代表團就要加入政治局，彷彿是爲着在中大小團體工作反而得着了在中國的獎賞。現在在中國是甚麼情形，我們已經知道。這裏作了一個錯誤，秋白在工作裏面固然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同志，亦許還是在黨的中央，我不是說以後不能夠再用他。然而組織黨的領導不能夠是這樣組織的，因爲這裏一點都沒有保障——他是很會作東方式的外交的，不能夠保障這種情形不再繼續下去。

我應當說立三的自我批評是給我一個很好的感想，這裏的確沒有兩面派的手段。秋白同志從來沒有作過這樣的自我批評。

再者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立三在自已的結論之中應當再着重的說一次——這就是忠實於國際與忠實於中國革命並不是兩件事而是一件事。

立三在中國就作了這樣的一個錯誤：就是把兩種『忠實』分開起來，現在他應當明

白：忠實於國際就是忠實於布爾什維克路線，決計不能夠分開來說的。只有忠實於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就是忠於國際，方才能夠保障中國黨的領導能夠有正確的路線。

黃平發言：

立三同志的路線已經說過了，是半托洛斯基主義冒險主義的路線，這完全是對的。但是還要加一點，就是反國際的路線，他不但在理論上離開國際路線，他並且實行了很激烈的鬭爭反對國際的決定。他對於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錯誤了解，完全是托洛斯基主義，他不懂得地域上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並且不懂得工人和農民運動發展的不平衡，雖然他講許多左傾的暴動等等的話，然而實際上他不相信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力量，不相信能夠戰勝帝國主義，所以他說一定要有世界革命，一定要聯合蒙古等等，這很明顯的，證明他不相信中國革命，證明他的思想是托洛斯基主義。他在政治局裏面沒有注意中國革命的重要任務，沒有注意建立根據地，鞏固紅軍，鞏固紅軍之中的黨部，組織貧農團，貧農團應當是我們在鄉村之中組織無產階級的力量去保障革命之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城市之中呢，在他看來，每天都是政治罷工。中國城市最好的條件有最利害的危機，米價高漲，銀價低落，軍閥混戰，工人狀況惡化，合理化加強等等自發的罷工運動

很多，但是沒有去領導罷工，比如看海員工會的報告，一隻輪船開除了十幾個海員，然而我們在香港的赤色工會不利用這個機會根據工人的要求去組織真正的鬥爭，而說現在要準備香港一切輪船的總同盟罷工。我們給工人說發工資的時候你們不要去領錢而準備打死工頭，以引起政治鬥爭。這並不是一次兩次的事，我說的不過是舉一個例子來證明工會怎麼樣在那裏領導工人的經濟鬥爭，自然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這種實際工作之下，職工運動和我們的赤色工會自然不能夠發展，自然現在中國赤色工會的海員是非常之少的，因為黨不會去吸引最好的工人。現在的情形怎麼樣呢？有些同志說，立三路線還沒有取消他的錯誤，在黨的領導機關還是有，並且不但在中央，並且在各省亦是有，因為三中全會沒有反對他的路線，沒有暴露他的路線，反而掩蓋他的錯誤，並且沒有執行國際的指示，所以這些錯誤是不能夠糾正的。三中全會的領導對着國際把立三的錯誤掩蔽起來，這是外交手段。現在我們很明顯的看見全總常會擴大會的決議案亦有這樣的錯誤，這個決議案說應當着重政治罷工，現在政治罷工是和經濟要求混合起來的。這可以使我們驚醒國際路線還沒有執行。

東方部的書面報告對於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估量我們是完全同意的，這個報告的結論說，現在中國黨內的問題是小團體的問題，我亦是同意的。秋白同志在莫斯科的時候，中國代表團在中大的鬥爭裏面反對東方部的領導，亦就是反對聯共在中大的領導

，以及反對國際的領導，這都不是偶然的，這都是最沒有原則的糾紛鬥爭。中大的鬥爭裏面有一般同志是和托洛斯基派合作的，他們亦就是實行這種鬥爭的人。同時，在共產黨的領導極激烈的反對國際的代表，這是甚麼意思呢？這自然不是偶然的。國際代表在中國甚至於不能夠談政治問題，因為中央不允許他們談。這不但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並且在方式上亦和秋白等等在中大問題裏面一樣的。同時在國內反對莫斯科的學生，因為他們反對立三路線和贊成國際路線，甚至於把他們開除出黨。同時立三做了一個很大的錯誤，黨的領導不但不開除他的政治局委員，並且替他掩蓋錯誤。這是小團體的情形。我要舉一個例子。

在東方部討論立三錯誤的時候，我自己亦作了一個錯誤，我是對於他調和的，我現在明白了我所以作這個錯誤，亦是小團體的感情，因為有這種感情，不指出他的錯誤，不反對他。我很快的在反對立三路線的討論之中，在幾個人說話之後，立刻就跑到別個極端說，要反對張國濤。這不是政治上的，不是原則上的，而是小團體的情形。然而我要說東方部沒有討論之前，我參加了一次列留學院的學生大會，校長也在那裏的，我那時就公開的說立三路線完全與國際路線不同，這是托洛斯基路線，我們應當反對他。此外在職工國際的大會上馬同志是參加的，我亦是站在國際路線上的，說要反對不要經濟鬥爭的宣傳。我想我當時相當的是了解國際路線的。然而討論到三中全會

的時候，討論到立三路線錯誤的時候，我就不記得他的錯誤，而採取調和主義的態度——就是對於小團體情形和對於政治錯誤的調和。現在我一定在國際領導之下反對兩面派的手段，反對黨內小團體式的領導，而實行國際路線，我還要加一句，黨內領導小團體情形不是偶然的，現在領導機關裏面還有陳獨秀主義領導的殘餘。雖是同志聲明拋棄陳獨秀時代的機會主義，但是現在我們看看這些同志一部分說來就是秋白和立三還沒有脫離左傾托洛斯基的和右傾富農路線的錯誤，而且繼續小團體的鬥爭，我同意報告上所說的領導機關有兩面派的手段，所以我同意因此而應當有的組織上的結論。

皮同志發言：

我要講的話已經很少了，我的感想是這個樣子，中國同志甚至於中國黨的幹部直到現在還沒有了解去年黨所作的錯誤，我記得職工國際四次大會上的中國代表團在當時中國委員會裏面差不多都在每一句議決案裏面都要增加武裝工人，武裝訓練，創辦兵工廠等等的句子。後來與他們解釋了很久，說明我們並不是反對武裝，但是現在我們是討論職工運動的決議案，必須說明白在職工運動中怎樣作工作。今年職工國際五次大會開會時候是已經過了兩年了，而中國代表團的主席以及許多代表的意見是和立三一一樣的，當我們與他們說領導機關作了錯誤，他們就完全贊成這個路線，這決不會是偶然的現

象。我們的黨沒有作工作去研究一九二七年黨所作的錯誤。政治局說到處都要暴動，在一切工業城市裏面都要暴動，他說工人不要罷工，只要暴動，然而什麼人來舉行暴動呢？你們是知道的由黨部由青年團經過他們可以領導暴動。然而中國的全總解散了，黨部是解散了，青年團是解散了，怎麼樣可以領導暴動呢？中國黨却組織了一個萬能的參謀部，可是沒有軍隊的參謀部，因為這個參謀部的決議是號令不出都門的，是沒有人來執行的。我們有一九〇五年和十月革命的經驗，你們知道一九〇五年革命最主要的動力，組織革命領導革命的動力是和工人有聯繫的黨部。十月革命亦是這樣的，當時青年團還沒有鞏固，黨部是經過職工運動裏面的共產黨員去調動極廣大的羣衆，如果解散了這些組織，那麼還講甚麼暴動呢。我有這樣的感想，彷彿有一隻手在那裏指導我們的黨，指出來須要暴動了，可是同時這隻手把能夠舉行暴動的指頭都斬掉了，所以就是暴動在甚麼地方爆發起來，黨亦不能夠去指導，如果沒有這樣的手，那麼一定是不能相信中國的力量，所以解散了團體。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是很好的，比離我們最近的地方的交通關係都要好些。你們有了錯誤，我們曾經立刻糾正。當時你們通過了一個不正確的決議案，我們反對這個決議案的公佈，我們立刻就糾正路線，如果中國黨的領導同志願意糾正路線，那麼他們立刻就可以糾正，因為立刻我們就指出錯誤，並且就指出他們的出路。然而中央並不召集全會來報告他們和國際路線的不同意，而立

三同志反而公開的反對國際，他是說過兩條路線，他說國際不懂中國情形，中國革命比國際重要，立刻要反對國際路線，這是事實，我們有文件在這裏。國際曾經說對於帝國主義者亦要利用應付手段，不要一下子就反對帝國主義者，而要離間他們像俄國黨在不列斯特和約裏一樣的採取應付手段，可是中國黨回答說對於任何帝國主義者都不能夠調和，他們都是我們的仇敵等等，我們的指示裏面只有三四條主要的意思，這些意思到現在還是有用的，雖然我們已經空費了許多時間。這幾條是甚麼？創造有戰鬥力的紅軍，就算人數很少也好的，要有無產階級的成份和領導，要有很好的武裝，要極力的保持他，不要讓他散漫或者被打破，爲甚麼？因爲中國現在所有的情形，是在任何一個革命都沒有過的，比如說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我們在一九〇五年爲甚麼失敗，我們當時不但在城市裏面甚至於在小城市裏面都沒有一個軍隊是我們的，我們當時沒有武裝，就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當時資產階級在莫斯科暴動的時候，已經離開革命。我們還要反對警察，憲兵，軍隊，要反對當時組織起來的黑百團。如果我們當時在莫斯科或者在聖彼得堡有一個軍隊，就算只要有五萬人，我們就可以勝利的。當時工人階級全體是贊助我們的，小資產階級是跟我們走的。如果我們有力量抵抗俄皇的軍隊，我們就可以勝利，你們知道的，在莫斯科資產階級亦不能夠運動一個軍隊，軍隊不是我們的，但是軍隊是中立的，如東我們有了小小的部隊，那麼這些軍隊都可以圍繞着我們，那麼

我們就可以勝利。我們在中國，這樣部隊是有的，不過是很散漫的，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紅軍的紀律不好，在長沙的時候我們軍隊已經要進城，但是有一個軍官說退兵，於是大家就退了。所以紅軍要受新訓練，並且要造成技術的基礎。至少要有敵人一樣的軍紀。我們一定要使紅軍能夠建設，不能夠使他們兩三年都是跑來跑去的，這是我們將來革命勝利的基礎。沒有紅軍我們很難和蔣介石鬥爭，尤其是和帝國主義者。我們以前給的指示是這樣的，這種指示在現在還是有用處，一定要作到。我們以前希望當立三作錯誤的時候有同志從這裏回去可以糾正這些錯誤。但是他們在三中全會上面倒去研究他們的所謂不同意見。我們指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鞏固蘇維埃區域，這是什麼意思呢？首先就是要正確的解決土地問題，為什麼我們在一九二七年失敗了？因為我們黨不執行國際的指示，不發展農民革命，不給農民土地。不去這樣團結農民在我們黨的周圍。現在亦是做這樣的錯誤，第一個並且主要的問題是農民問題。我們革命的將來，要看解決土地問題的正確不正確來定：農民究竟是贊成我們還是反對我們。你們知道在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農民是極力保持革命的勝利，為什麼？因為我們給了他們的土地，他們怕地主回來奪回他們的土地，他們同着我們一起奮鬥，他們幫助了我們的勝利。你們難道以為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幫助了白黨武裝起來，無產階級若沒有農民的軍隊就可以勝利嗎？十月革命的時候，正確的解決農民問題

使我們得到勝利的。這個問題在中國怎麼樣解決的呢？在中國現在有些地方是按照生產工具分配土地，可是我們知道有生產工具的大半是富農，有些地方禁止給苦力土地，而苦力正是我們要依靠的人。不給苦力土地，彷彿是怕他們變成小資產階級，對於雇農亦是這個樣子。總之對於贊成我們的人能夠與我們一同奮鬥的人，我們不給他們的土地。在農民運動裏面作錯誤就是失掉我們的同盟軍，我們知道在十月革命裏面我們拿農民的麵包，他們不滿意，有的時候他們起來反對我們。然而哥爾加克佔領的地方，他要把土地還給地主和富農，農民總是幫助我們去趕哥爾加克，因為農民知道以前的地主回來，不但要拿麵包，並且要拿他們的一切。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對於中國的蘇維埃農村有正確的關係，那麼甚至於用不着很大的宣傳，因為這種事實到處傳佈出去說共產黨得勝的地方給了農民的土地，並且生產工具也分配了，所得稅很少，而且幫助農民組織設立手工工廠等等。而國民黨軍閥統治的地方，農民的一切都被人家奪掉了，這種情形是很好的宣傳，比千萬張傳單還有用。我並不是反對宣傳，反對演說，但是實行是主要的動力。我們主張蘇維埃區域裏面的農村應當真正的改造。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大概有八千萬的農民，俄國人口總共不過一萬萬兩千萬，而工人階級當時還只有三百五十萬，現在中國呢，我們有三萬萬五千萬農民，而工業工人頂多不過兩百萬。如果我們能夠使這個廣大的農民羣衆到我們這方面來，那當然要蘇維埃

區域有正確的政策，這是爲着革命的，所以這些錯誤一定要糾正。

我們只是說要發展工業區域裏面的罷工。我們知道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都有很大的罷工，在一九二九年有七十四萬人罷工，自然我們並不是永久能夠領導罷工的，自然有些地方我們是始終領導的。而到了立三大叫暴動的時候，我們反而不聽見大城市裏面罷工的消息，甚至於經濟罷工亦沒有，這是甚麼原故呢？是不是因爲他們禁止罷工？是不是我們同志作了反對罷工的宣傳？這要弄一弄明白，黃平同志說銀價低落，世界經濟的恐慌亦到了中國，工人狀況自然更加惡化了，然而罷工倒反減少了，至少在大城市。這是因爲不去發展工人階級的鬥爭，以便和農民運動聯合起來，所以農民暴動沒有無產階級的鬥爭。這是因爲不去發動工人階級使他們拿到領導權，所以甚至於經濟鬥爭亦沒有，中國黨領導同志對於我們指示的態度以及立三與我們的衝突都是很重要的。我們以前從這裏回去的代表第一個任務是趕掉立三亦許還要趕掉其他贊成他的重要委員。但是他們所作的事情剛剛相反，他們掩蓋立三的錯誤，他們作的事情國際九次擴大會之後英國同志作的錯誤差不多，他們想把兩條路線並成一條。當時英國共產黨領導同志不去執行九次擴大會的決議，就是『階級反對階級』的路線，他們反而極力的去對工人說沒有甚麼變動，路線只有一條。所以他們的舊路線仍舊在中央全會通過，現在中國黨的三中全會亦是這個樣子。中國黨的三中全會不去清楚的提出這個

問題，不去鬥爭和討論，不去明白指出一九二七年盲動主義的傾向弄成了甚麼樣子——這些傾向實際就是引起立三路線和國際指示的不同意的。這兩條路線是絕對不能相容的，絕對不相像的。應當要使黨的幹部明瞭究竟那條路線是對，那條路線是錯，無產階級弄得莫明其妙，亦不知道立三路線是不是國際路線，這個樣子怎麼去宣傳無產階級並且去領導他呢？關於這一點亦沒有寫。

我們接到一封信說『我們派立三到莫斯科是爲着好些組織問題，我們請求他作完了這些事之後就回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派立三來，是我們去叫他來要問問他清楚，究竟他的路線從甚麼地方來的。而政治局却要他回去仍舊執行他的路線。

爲甚麼以前不把這個問題很清楚的在黨報上提出來使全黨都清楚起來明白這些錯誤呢？我們枉費了很多很多的時間，我們放棄軍閥混戰的時期，我們以前以爲這裏回去的同志可以把事情弄好，可以把事情弄清楚。他們是不是這樣作了呢？所以我們在主席團把這個問題全部都提出來，使各個共產黨都知道國際是甚麼路線，中國黨是甚麼路線，就是那時的政治局是甚麼路線。

在蘇聯有許多學校有好幾百中國同志在那裏學，他們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和實際。他們回去了，但是不能夠作到領導工作，爲甚麼我們以前不明白，而現在明白了，因爲有一種小團體利益防礙他們加入領導機關。費了很多

力量和錢才能夠把他們派回中國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們作黨的工作，我以為這是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允許的。現在怎麼辦呢？我以為應當發動一個公開的運動反對立三主義和那一部分政治局，要無產階級知道已經作了甚麼樣的錯誤，這些錯誤已經作過二次，以後無論如何不能夠作第三次，現在還是有辦法的，應當要實行國際的指示。

政治局曾經不要給雇農土地，然而政治局委員甚至於並沒有去看看蘇維埃區域。也許是很困難，但是我們俄國亦有過田尼庚，哥爾加克，尤狄尼茨，可是我們在那些區域亦作過工作，我們亦是用性命去冒險的。而現在中國黨和蘇維埃區的交通關係還沒有建立，好的力量還沒有在蘇維埃區域裏面，這種情形一定要變更，我不記得那一個同志說過的，蔣介石已經派了很好的軍隊去打蘇區，我想這個同志是對的。現在軍閥戰爭有一個小小的停頓，然而這個戰爭一定又要很快的開始。我們應當仍舊注意蘇區派工人派黨裏面好的力量到蘇區去，去鞏固蘇區，當然並不是要立刻佔領長沙武漢等等，而是要在蘇區內部鞏固起來，實行我們的正確的路線給農民土地。要在非蘇區工業城市裏面發動羣衆的戰爭，提出具體的要求，反對帝國主義軍閥進攻蘇區，在工人羣衆之中廣泛宣傳蘇維埃區域使他們看見蘇維埃區域是一個基礎，可以建設全中國蘇維埃政權。

立三的結論：

今天討論之後，我聽了許多同志的講話，我更加了解我自己錯誤的精神了，我承認我自己的錯誤是很誠懇的，但是也許亦有個別的錯誤，對於我還沒有完全了解，然而我要研究我自己的錯誤。我認爲我過去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中國黨向來不尊重并且看輕國際，這已經有好幾年了，尤其是在陳獨秀領導的時代對於國際是很不尊重的，同時以爲國際不懂得中國的情形，不能夠詳細知道中國的實際狀況。我聽見說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總參謀部，他已經總合世界革命全部經驗。這是非常之對的。我作錯誤之前，我曾經有這樣的意見，彷彿國際是不會詳細知道中國的實際狀況，我現在知道這個意見是非常之錯誤的，國際是真正世界革命的領袖，只有列寧主義的領導能夠使中國革命勝利，企圖和這個路線對立是錯誤的。

我簡單的說說我的錯誤。起先我懂得了我的路線與國際的路線完全不同的，然而我以爲我的路線比國際的路線正確，在這個基礎上就發生很大的錯誤：第一，當我一個人在中國的時候，我認爲我的路線是一個特別的路線，但是恩來秋白回去之後，對我說你把自己的路線和國際的路線對立是不對的，如果你以爲你有一個特別的路線，那你就是不懂國際的路線。我以爲他們剛剛從莫斯科回去，一定是比我更加知道國際路線，因此我就與他們同意了。

（皮同志問：當時只有秋白說，還有別一個亦是這樣說呢？）

不對，恩來亦是這樣說，他們兩人都是這樣說的，他們說不要並且不應當把自己的路線與國際的路線對立起來，不要說自己的錯誤，不要削弱領導機關的威信。我爲着保存中央委員會的威信起見，所以不承認我自己的錯誤。不但我是這樣想，並且許多政治局委員都說不要講兩條路線。等到三中全會的時候，我已經覺得有一條別的路綫，我在自己講話的時候，把我自己的策略錯誤和政治錯誤聯系起來，但是不說明有二條路線，因爲怕損害了領導機關的威信，我到了莫斯科來了之後，看了國際給中央的信，批評我的錯誤說不單有一個策略的特別路線，並且有政治上的特別路線，反國際的半托洛斯基的，我就承認了這完全是對的。然而我從沒有像三中全會那樣想法。我在東方部作報告的時候，我還是顧到要保持中央的威信，要保持三中全會正式文件的威信。我同意對於我個人錯誤的批評，然而我怕批評三中全會。現在我知道這是不對的。我以爲如果我要批評三中全會，那就是黨的破產，那就要引起黨的危機，然而我現在明白了，能夠戰勝一切傾向的，只有國際路線，沒有別的路線能夠戰勝不正確的傾向，只有國際路線能夠領導中國黨勝利，只有國際路線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到完全的勝利。中國黨在現在這種危機的時期，尤其重要的是小團體的問題。形勢是非常之嚴重的。這種小團體狀態在中國黨裏面現在還可以發展，這種小團體的糾紛鬥爭，現在比六次大會時期還要嚴重。

這種小團體的鬥爭首先就是秋白爲領導的，秋白在六次大會的時期以及在六次大會之後，領導過不少次小團體的鬭爭，就是無原則的黨內糾紛。所以他首先會領導和組織小團體的鬥爭，別方面他是從來不肯承認自己錯誤的人，這是第二個原因。爲什麼他會領導小團體的鬭爭？自然還有其他的許多原因，我上次在報告之中已經講過了。

現在的確有許多條件足以引起黨內的小團體的鬥爭。現在這種小團體的鬥爭可以亡黨，因爲中國的客觀條件是極厲害的白色恐怖，這種小團體的鬭爭，就是黨的塌台。因此嚴重的要求國際立刻要有組織上的辦法去糾正三中全會的錯誤去糾正立三錯誤和立三錯誤的餘殘。要在黨內開始實行從下層直到中央的關於立三錯誤的辯論，要使黨員羣衆了解立三錯誤的根源，並且了解什麼是國際，應當怎麼樣去領導中國的革命，什麼是國際的正確路線。我要求國際把中國黨從危機之中挽救出來。

我承認和森同志的說話是完全對的，在黨的歷史上領導同志的確作了嚴重的錯誤，無原則的小團體的鬥爭還不算在內。領導同志的任務是要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拋棄以前的惡濁小團體的鬥爭，而把實行國際的路線擔任起來。我了解自己的錯誤之後，我應當完全拋棄他，並且堅決的實行國際路線，不但反對自己的錯誤，並且反對對我的錯誤的調和，以及對於國際的兩面派的手段。我答應國際，我要爲着國際路線而鬥爭，並且實際上到中國去實行這個路線。每一個領導同志在這個地方的都要拋棄以

前的小團體鬭爭，真正實行國際的路線去領導中國的革命。有許多同志要求我不但在口頭上承認，並且要實際上證明。我完全同意在實際鬥爭裏面我一定證明我已經改正我自己的錯誤，我已經有不正確的路線。我公開的說承認錯誤是一件事，改正錯誤又是一件事，我了能夠相信我自己在實際的工作上一點小錯誤都不作了，因為錯誤不完全由你願意作不願意作，我的錯誤有很深的歷史上的根源，所以要了解我的錯誤，一定要有長期的研究，因此我一方面極力要避免我自己的錯誤的重複，別方面我要研究我思想上的錯誤真正的去了解他，而使他不至於重複。

最後，我完全同意馬努伊斯基的意見，就是召集四中全会來改正三中全會的錯誤，澈底批評我的錯誤。然而我認為有一點，一定要指出來，就是四中全会的成分。四中全会裏面一定要有地方黨部的代表，大的支部的代表。尤其是以前批評我的錯誤的同志。四中全会裏面一定要有大的工廠支部和蘇維埃區域的代表。只有這樣的四中全会才能夠保障澈底的批評我的錯誤，而挽救黨的危機。這是挽救黨的危機的唯一辦法。

不論國際要有什麼辦法來糾正我的錯誤，我都要盡力來幫助國際來反對中國黨的領導的錯誤路線。我現在一點都沒有懷疑：我的路線是絕對錯誤，國際的路線是絕對正確的。然而我不能夠相信或者實際工作上不再做錯誤，所以必須堅決的站到國際的列

寧主義的路線上來，完全打破我的錯誤的路線及其一切殘餘。

六六

附錄國際東方部關於中國黨三中全會與李立三同志的錯誤的報告

(一)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國共產黨開了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之前共產國際和中國黨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曾經有過很長久的衝突——就是在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之間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以李立三為領袖，關於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站在半托洛斯基主義的立場上的，同時亦是站在盲動主義的立場上的。因此，要估量三中全會，就必須先簡單的說一說以前爭論的實質。

(二)共產國際最近對於中國問題的文件是這樣估量中國黨中央政治局一部分人的錯誤的性質：

「立三同志所作的錯誤並不是個別的錯誤，而是許多錯誤觀點的總個行動，形成了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總方針。這種方針不能夠不發展到盲動冒險主義的策略。

……」
的確的，立三同志的戰術計劃，策略上和組織上的路線是這樣的：

它認為全中國的，甚至於全世界的革命形勢已經充分成熟，同時，又完全不相信中國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有戰勝國際帝國主義力量的可能，認為如果不是立刻爆發世界大戰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那就中國革命不能勝利的——因此中國黨政治局的領導就在今年六月到八月的時候，完全沒有準備的決定在最大的工業中心城市到處去實行武裝暴動（武漢，南京，北京，天津，奉天，廣州，哈爾濱及大連等等），並且在上海決定實行政治的總同盟罷工。這些暴動的計劃，並且還是預算到蘇聯和蒙古來干涉中國事件——要想蘇聯和蒙古的紅軍派到中國去，要想蘇聯先和日本帝國主義衝突起來，然後才發生世界的大戰以及全世界的革命危機。

他們提議，為着實行五年計劃，為着領導世界革命，蘇聯和國際應當採取「堅決進攻」的策略。

這種托洛斯基主義式的觀念，是責備國際和蘇聯有狹隘的民族成見，其實是用來掩蓋自己的悲觀主義和拚命冒險的心理。這種半托洛斯基主義的，同時又是盲動主義的戰術計劃，就認為中國革命的現在中心任務是：

第一，創造城市的工農紅軍，要有紀律，成份要有工人的，要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並且要有堅固的基礎地。

第二，在這基礎地上建立蘇維埃政府。

第三，努力去發展工人階級的經濟戰鬥，使他更加革命化（而工人運動到現在還是比農民運動落後）——總之，這種共產國際的根本路線是清楚的估量了力量的相對關係，和現在階段上的革命任務，依照中國革命運動發展不平衡的情形，而規定出來的，可是立三等實際上是把這個路線推翻了，他們認為這是割據主義，這是不要蘇維埃政權在城市中勝利的上山主義，祇是要在無產階級直接影響之外的地方去建立蘇維埃政府。

很明顯的，這種方針在表面上用左傾的空談掩蓋實際上和托洛斯基主義的立場相同的路線，托洛斯基最近對於中國問題的主張，登載在它的機關報上（一九三〇年十月號托洛斯基派的公報）；這種方針是完全不能估計中國革命的許多重要特點（中國的封建割據狀態，中國的半殖民地性質以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極大意義，中國革命的發展不平衡，尤其是土地革命日益生長的环境之中，已經有許多紅軍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如果有正確的路線，他們『一定能夠保障革命的強大發展』。）

可是中國黨政治局有了托洛斯基主義的空談，自然就不能夠正確的解決土地革命的問題。立三沒有了了解土地革命的貧農中農的性質，貧農團的問題沒有提及，現在就過早的禁止土地買賣，現在就實行有些地方的消滅富農，企圖建立有計劃的經濟，集體農場和蘇維埃國立農場，使中農離開革命。這種托洛斯基主義的路線，甚至於土地問題裏面引起農民暴動起來反對蘇維埃政府（在湖北的某縣），並且引起遊擊隊在富農領導之

下變成紅軍的現象（第十四軍）。

可是，黨的領導却沒有充分的反對許多黨部裏面實際工作上的富農路線（比如按照生產工具分配土地，甚至於承認重新分配土地不是革命的辦法——這是孟塞維克主義）。

最後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城市之中玩弄沒有準備好的政治罷工（在二月之中決定過七次總同盟的政治罷工）並且阻障工人階級的鬥爭和開創精神，黨的領導完全不管組織工人階級部分鬥爭的任務。在這個時期之中完全拋棄在黃色工會之中的工作，同時解散自己的工會，而用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的上層機關，所謂行動委員會來代替工會。現在中國赤色工會總共只有十一萬四千會員，其中三分之二在蘇區，在太城市之中赤色工會會員是很少的，比如在上海——二一〇〇，武漢——二〇〇，香港——九〇〇，天津——五〇〇，唐山——八四〇。

今天夏天黨的領導，脫離羣衆而官僚主義化的證據，不但在於準備暴動的時候，取消了赤色工會，而且全國青年團的組織亦取消了，只剩了一個萬能的中央總行委，彷彿CY的組織由隘羣衆運動，彷彿十月革命的力量，是在於一九一七年沒有青年團。

很明顯的，這種敵視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路線，不能夠不使立三同志走到反共產國際的鬥爭。有好幾個禮拜中國黨中央拒絕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繼續準備已經決定的武

裝暴動，而開始把『忠實於國際』和『忠實於中國革命』對立起來，並且說國際不懂得中國的革命情形。甚至於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祇有權利和政治局幾個委員談論政治問題，而不能夠和別人談，甚至於和總工會的領導者亦不能夠談。

（三）雖然黨的領導有這樣嚴重的錯誤——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種荒謬絕倫的路線，但是同時我們不應當忘記中國共產黨和革命運動的確有極大的勝利和發展。

蘇維埃區域仍舊發展，現在已經有好幾千萬人民（四千萬到五千萬）；這些區域裏面的土地革命推翻了地主階級私有制度和高利貸者，推翻了國民黨的豪紳資產階級政權；紅軍已經有十萬人以上，槍枝有六萬，非常之勇敢的；工人運動雖然比農民運動落後，然而在全世界範圍之內，假使還不能夠算是全世界的第一位，那末至少亦是第一等國家之中的一個（一九二九罷工的人有七十五萬人，一九三〇年一直到夏天，罷工鬥爭是沒有低落）。如果中國黨有正確的領導，那麼就可以保障勝利的鞏固，並且繼續發展革命的進攻，當然要按照國際所給的指示。中國黨的三中全会是在這種條件之下開的。

（四）研究了三中全会的材料以及中央給各地的信，黨報上的社論，還有最近在東方部的討論（立三同志是參加的），所有這些，很明顯的證明：秋白同志所領導的三中全会沒有盡他的責任，沒有揭發和糾正以前的一部政治局領導的半托洛斯基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綫，沒有規定出具體的任務，沒有估量到革命鬥爭的經驗，尤其是蘇維埃區域紅

軍戰爭的經驗。

只要舉幾個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一，關於兩條路線的問題。國際最近給中國黨的信說，『必須要明白：不是什麼偶然的不同意，或者是在估量時局了解策略任務上的次要的不同意見。必須完全明白：在現在中國革命極緊要的時期，有兩條原則上不同的政治路線互相對立着』。

而三中全会的政治決議說：『三中全会認為政治局的路線是正確的，是和國際路線一致的。』這個決議案對於錯誤的批評是說：『可是三中全会認為必須指出政治局最近對於時局形勢的估量，在許多重要問題裏面，有不清楚的和不正確的地方，對於現在形勢有過分的估量，忽視蘇維埃根據地的重要，忽視工業區域日常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聯繫』，同時三中全会指出來：糾正政治局的策略錯誤並不只是變更黨的路線』。

三中全会在這種方針之下沒有一個決議案提到立三路線的問題。主要的火力不是集中在克服黨的一部分領導的托洛斯基盲動主義的路線，而是機械的了解右傾的主要危險，而把火力集中到何孟雄方面；這個政治上的手段，三中全会的領導者不但是用來掩蓋托洛斯基盲動主義的錯誤，而且模糊了真正右傾向實際工作上的表現，以及假的右傾表現（何孟雄）。比如右傾的極嚴重的表現是在好些區域裏面按照生產工具分配土地，是拋棄對於工人鬥爭的獨立領導，是在蘇維埃裏面常常沒有工人的領導等等，這些錯

誤三中全會都沒有討論。

第二，關於長沙戰爭的教訓，以及關於創造正式紅軍和蘇維埃革命根據地的問題。國際的信和電報裏面說：『這些情形（就是紅軍和蘇維埃的現狀，工人運動的落後等）使我們必須要知道，現在去佔領最大城市，猛攻現代的帝國主義軍隊，進攻最大的中心城市，還不是紅軍力量所能夠的』。

這種情形，這個進攻長沙的教訓，直接和國際上面所說的三個主要任務有關係的，（一是創造正式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二是創造蘇維埃政府，三是開展無產階級的部分鬭爭，而使他們革命化）而三中全會說『第十三項，現在工農紅軍從小的遊擊戰爭進到了反對帝國主義，軍閥的正式的革命戰爭……現在這種情形（就是說爭取一個和幾個工業中心）在湘鄂贛區域尤其成熟。

所有以後的許多文件都證明中國黨仍舊繼續企圖進攻長沙，南昌，而完全不管或者不了解創造正式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任務。

第三，土地革命的問題

很明顯的，正確的去領導土地革命，在革命的現在階段有第一等重要的意義，而三中全會對於土地革命的教訓以及以後的具體任務，在很大的一個糊塗的政治決議案裏面

只寫了三行：堅決的徹底的執行土地革命和分配田地。

三中全會沒有提起共產國際說的貧農團，沒有提起土地革命的貧農中農的內容，沒有說出消滅左傾的混雜物——就是企圖禁止土地買賣消滅富農，建立有計劃的經濟，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同樣三中全會沒有去糾正右傾的錯誤：比如不分配土地給紅軍的兵士，按照生產工具分配土地。

很有意思的，三中全會亦沒有責備立三的右傾錯誤，就是聯合富農的說法（秋白同志是贊助他的）

第四，同樣沒有估計城市之中最近罷工鬥爭的經驗，沒有估計職工運動的十分薄弱，沒有估計七次總同盟政治罷工的失敗原因。不去責備對於贊助組織領導工人階級真正廣大鬥爭的不注意和消極，不去責備沒有準備的玩弄政治罷工，三中全會却集中火力去反對一些尾巴主義者——他們是把準備政治罷工放在第二位。如果三中全會同時在這個問題裏面打擊立三的錯誤，那麼責備尾巴主義者是可能的。不然呢？這種說法就是很明顯對於右傾路線的調和。

關於黃色工會的問題，三中全會只說要實行消滅黃色工會的策略。

第五很自然的，關於立三反對國際鬥爭，必須研究他的錯誤，使以後這種錯誤不會重複，並且布爾塞維克的去教育黨員——關於這些，三中全會完全沒有說起。

總結起來，必須指出最厲害的立三主義的形式（到處暴動的戰術計劃），總算是取消了，然而托洛斯基主義盲動主義的病根却趕到身體內部去了，兩種的不同意見，無原則地混淆起來了，完全弄得糊模了。

（五）必須特別指出秋白同志的在三中全會的作用。關於國際的方針秋白同志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些，秋白同志在動身到中國去之前（已經在反對立三主義的時期裏面了）曾經聲明完全同意國際的路線而責備中央的一部分尤其是立三的錯誤。

可是秋白同志到了中國之後，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領導者，不但不去執行國際指示反而對於立三托洛斯基盲動主義的路線採取調和態度（政治決議案是他起草的，上面已經引過）這是對於國際的指示，運用兩面派的手段，因為他已經對於國際指示是表示同意的。他在三中全會上的演說，不去揭發立三同志敵視布爾什維克的路線，而只批評立三有個別的錯誤，就是不承認立三路線是和國際路線對立的。

很明顯的秋白同志的出發點，不是國際原則上路線的利益，而是小團體的利益。

秋白同志的錯誤不是偶然的，在六次大會的時候，他不但爲着右派的錯誤（一九二五—二七）而且爲着和羅明納茲共同在一九二八年所採取的托洛斯基盲動路線而受過批評。

總結起來，必須說：一，三中全會沒有揭發立三路線的實質；二，三中全會模糊了

這個路線和國際路線的原則上的不同；三，三中全會沒有研究中國革命過去階段的真正教訓；四，三中全會沒有提出並解決革命現在階級的現實任務；五，三中全會對於全黨同志沒有解釋領導機關所作的錯誤，反而模糊了這些錯誤的實質；六，三中全會沒有責備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國際不同意的時期，所表現的那些反共產國際的言論；七，三中全會上表現了領導機關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團體的兩面三刀的空氣。

（國際東方部對於國際執委主席團的報告）

是取消派取消中國革命，還是中國革命

取消取消派？

思美

——評『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

（參看布爾塞維克第二期）

經過了很久的爭論，取消派各派間，終究得出了他們各派共同的政綱。這政綱的特點，是在於一貫反對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和一貫對中國革命取消失敗的態度。我們爲得要揭破取消派對於中國工人階級所可能有的欺騙，特地在這裏對於這政綱加以嚴厲的駁斥。

一 取消派怎樣估計中國目前的革命形勢？

取消派在他的政綱內寫道：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第二次革命始而經過上海四一二與廣州四一五的屠殺，繼而經過武漢反革命的政變，最後又經過廣州暴動的失敗，早經終結，並未解

決其任務。工人階級不僅在組織上遭受了嚴厲的摧殘，並且因受機會主義的領導走到失敗，在政治上陷於無出路的狀態，散處在鄉村的農民便失了城市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資產階級在打敗革命之後，便得以建立起——縱然他本身不很容易——反革命的統治，已為革命所動搖的帝國主義統治便又鞏固起來」（政綱第一節，著者加圈，以下做此）

中國民主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終結，資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工農運動完全處於衰落狀態：這是取消派分析目前革命形勢所能得到的唯一結論。取消派認為「我們目前仍屬在上一個革命早經完結和下一個革命尚未到來的兩個革命過渡時期」現在是「反革命形式代革命的形式而起」。

那麼在這一時期內，依照取消派看來，取得了統治的資產階級幹了些什麼呢？在「政綱」第三節，取消派寫道：

「自一九二七年來，反革命的形式代革命的形式而起。中國資產階級在屠殺民衆後不得不容忍軍事獨裁。一方面因為資產階級與貧民羣衆間有不可調和的極端的對抗，另一方面因為中國資產階級依賴帝國主義，所以他不能領導革命的民衆，不能實行民主議會制度，在「訓政」時期的臨時政權組織之下，建立了各系軍人的統治。這些各系軍人代表各派資產階級之特別的及地方的利益，彼此互相衝突

和公開戰爭。這些戰爭並非表示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後奔潰，而正是壓平革命的效果』。(第三節)

換句話說，資產階級在得到統治之後，不能不建立各系軍閥的統治，這代表各別資產階級利益的軍閥，又不能不互相衝突和戰爭，這戰爭不是表示資產階級統治的奔潰，而是表示資產階級統治的勝利。

「但是軍事獨裁，軍閥戰爭，以至國民黨的「訓政」，畢竟不能滿足資產階級的要求，故在沒有革命危機的情形之下，資產階級利用民主的統治形式儘可能的抑制軍人，使國家政權更經濟的更便利的爲它使用，它尤其需要一個相當統一的國家主權，以便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條件（特別是訂立借款的條約）。它認爲若能成功的利用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并取得更有利的與帝國主義妥協，則它更容易使國民黨軍閥屈於集中的資產階級機關」。(同上)

這樣說來，爲了各派資產階級特別的及地方利益，而互相間發生不斷鬥爭的各系軍閥，並不能滿足資產階級的要求。資產階級要利用民主的統治形式來抑制軍人，來統一國家主權。資產階級這種企圖的代表者，依取消派的觀點看來，無疑義的是蔣介石了。換句話說，蔣介石的所以要召集國民會議，爲的要利用民主的統治形式來抑制軍人，來統一國家主權，同時也爲得要借得外債。

幸運的中國資產階級，國際形勢，對於中國資產階級現在也是非常有利的。

在取消派政綱第三節上又寫道：

『國際帝國主義爲開闢中國市場以挽救其經濟的危機，亦必須暫時妥協，幫助中國資產階級，經過中國資產階級爲中人，更加抑壓中國勞動羣衆於地下。國際帝國主義的剩餘資本可以造成中國的經濟復興。目前國民黨之決定召集國民會談，亦即是適應着這種要求』。（同上）

同時這種『以外資開發中國實業』的取消派的理論（同時也是國民黨各派的理論），說道對於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共產黨也是有利的。在『政綱』第四節上寫道：

『經濟復興，即使是微弱的和時間很短的，將重新集合工人到工廠，提高他們的階級自信力，造成組織工會和擴大共產黨影響的條件……工業復興將中國民衆從消極的被壓迫狀態中拯救出來。以後不可避免的經濟恐慌，將成爲革命的新的推動力』（全上）

可見沒有這一個經濟復興的時期，中國工人階級就不會集合到工廠裏，就不會提高他們的自信力，就沒有組織工會和擴大共產黨影響的條件，就不能將中國民衆從消極的被壓迫的狀態中拯救出來！這決定一切的經濟復興，工業復興，真是值得全中國民衆的感謝與贊美！飲水思源，當然更不得不歸於功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投資，歸功於蔣介

石的召集國民會議！ 贊美帝國主義，贊美蔣介石啊！

我想取消派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估計就是如此。 我想讀者一定會了解取消派所要說的是什麼，並且取消派也不能不謝謝我把他們所要說而說不出來的思想，這樣明顯的表現出來！

二 取消派的『反革命』與反革命的取消派

共產國際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會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都認為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是暫時的，造成大革命的一切經濟政治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所以斷定革命的形勢不久會到來，所以說那時中國政治的形勢是處在『兩個浪潮之間』，指出那時我們黨的中心策略是在奪取千百萬的工農羣衆來到黨的領導之下，以準備武裝暴動。

事實證明出共產國際的決定完全是正確的。 革命失敗後不久，中國工人運動即開始復興，在一九二八年罷工人數已達四十萬，農村鬥爭也有很大的發展。 到一九二九年革命運動還是繼續發展，在一九三〇年顯然中國革命已經進到高漲的形勢。 工人階級的鬥爭不斷的發生，蘇維埃區域擴張到三百餘縣。 祇是因爲那時中國共產黨內立三路線的錯誤，不免使中國革命受到暫時的挫折。 但是自今年年關鬥爭起中國工人運動

的鬥爭從南方一直蔓延到北方。鬥爭的性質並不像取消派所說的『還於限於經濟的與防禦的』反對國民黨改組工會，反對取消舊歷年的年關鬥爭，已帶有間接的政治的性質。在鬥爭中工人方面表示了很強烈的反攻形勢，而且在反攻中還帶有很多進攻的成份。蘇區的紅軍在帝國主義及國民黨軍閥圍剿之下，不但沒有消滅，而且還取得了幾次很大的勝利，相當的鞏固了蘇區的統治。中國革命的高漲在目前是無疑的事實。事實證明出了共產國際估計的完全正確。但這一切事實，是同羣衆鬥爭完全脫離了關係的一些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所完全不能看到的。被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着暫時失敗所嚇怕了的，並且退出了革命戰線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不能與不敢看到新的革命的到來，反對工農羣衆去做革命的鬥爭，反對先進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去堅決的領導鬥爭，實是不足爲怪的。（關於這一點下面再說）

共產國際指出：中國民主資產階級自從叛變了革命之後，雖然也參加了地主，與買辦階級的政權，但是政權的主要性質還是地主與買辦階級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因爲他同封建地主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的密切，所以自他叛變革命之後，不能不是代表地主與買辦階級的軍閥制度的附屬品與裝飾品，經常用一些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的口頭禪做他們各自依附的軍閥的旗幟，但是決定一切的還是帝國主義，地主與買辦資產階級。這些軍閥，無厭的徵收苛捐雜稅，經常的戰爭，破壞中國的經濟，使中國廣大的民衆

貧窮化，使中國變成割據分崩的局面，使高利貸在城市鄉村中間發榮滋長起來，使鄉村中地主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一天加緊一天，使中國資本主義的工業無從發展。說這些軍閥完全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那只是上帝知道！

共產國際指出，中國資產階級雖是已經叛變了革命，但是中國目前革命的性質還是資產階級的，因為過去革命所要解決的任務，現在還是沒有解決，革命的動力是工人與廣大的勞苦羣衆。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祇有工農羣衆的力量才能完成。這革命不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地主與買辦階級，而且也是反對民族資產階級與鄉村富農的。列寧常常說。資產階級的革命，可以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也可以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前者必然是不徹底的，半途而廢的，後者是徹底的，是一直幹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的任務，就是在爭取後者的道路的勝利。但這是取消派永遠也不會了解的。

在取消派看來，中國革命過去是資產階級的，所以祇有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革命，所以陳獨秀等大機會主義者就拚命把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而反對無產階級的爭取領導。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的革命，必須要有革命的資產階級，沒有後者就沒有資產階級的革命。這是取消派資產階級革命的唯一方式。

根據於這種澈頭澈底是孟塞維克的見解，取消派必然得出中國目前革命不是資產階

級的，而是無產階級的。所以百分之百的大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彭述之等變成了托洛斯基的『同志』！

共產國際指點出：世界經濟的恐慌使各帝國主義國家加緊了對於殖民地•的•剝•削•。事實也告訴我們，各帝國主義國家爲得要銷出他們過剩的商品，與他們剩餘的資本，近來派了很多政客，走狗，與商業調查團來同中國政府吊膀子，來考察中國的市場，研究如何把他們的商品在中國銷售，如何把他們剩餘的資本借給國民黨的軍閥。帝國主義這種進攻的政策，必然，而且已經，更進一步的破壞中國經濟，使中國的工業與農業發生更大的經濟恐慌，使中國的內戰繼續的延長下去，使中國更進一步的殖民地化。這是每一個稍有常識的工農分子都是親眼看見，親身感覺到的。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這種進攻的政策，必然，而且已經，使他們中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促成他們反對蘇聯的（在反對所謂蘇聯的屯併政策的旗幟之下），與相互間的戰爭的爆發。但取消派却給帝國主義者辯護，說這種政策，會造成中國經濟的復興，會『提高中國工人階級的信心』，會『將中國民衆從消極的被壓迫狀態中拯救出來』。取消派更給帝國主義者盡了很大和平主義的宣傳，說『國際帝國主義者爲開闢中國市場以挽救其經濟的危機，亦必須要暫時妥協』。

共產國際指出，在世界經濟恐慌的背境上所發展的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的恐慌，現在

不但沒有復興的希望，而且是在一天一天的加深。不錯，南京政府現在固然在大吹特吹，說要振興實業，發行了各種名義的實業公債，向帝國主義者用發展實業的名義借了許多外債，但是這些債款主要的是用得來彌補破產着的財政，而不是用來發展實業。苛捐雜稅，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增加。戰爭是無法停止的。最主要的，在南京政府統治之下，絕對沒有任何方法解決土地問題，提高工農的生活水平線，而且却正相反，因為南京政府的統治而中國工農的生活愈形惡化，民衆的生活一般的是在食不飽衣不暖的飢饉水平線的下面，南北各省飢荒的區域一天一天的擴大……請問那一件事實能指示出中國經濟在反革命統治之下，有一點復興的希望？

而取消派却不顧一切事實，大大的宣傳在南京政府之下有工業復興的可能，取消派看見了幾條汽車路，幾幢洋房，幾處無線電台的建築，幾架飛機的飛行，以及汽車數量的增加，以為這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為這就是中國工業的復興，而把中國各種工廠與各種企業的大批關門，與工人的大批失業完全忽視，完全不去考察決定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切基本原因。像這樣的馬克斯主義，我真是不敢領教！（關於中國經濟性質與發展前途問題，我們另有文章發表）。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我現在要請問讀者，取消派的這種觀點同國民黨現在所宣傳的以外資開發中國實業，則各方面（帝國主義者，中國資本家，地主，國民黨以及非國民

黨軍閥，官僚，以至工人與農民）都有好處的理論有甚麼絲毫的區別？國民黨的南京政府能夠復興中國經濟的宣傳，是爲了誰？幫助誰？反對誰？

取消派真是國民黨的留聲機，國民黨的欺騙的傳達者。

這就是取消派的『反革命』，所以變成反革命的取消派的重大原因之一！

三 取消派在過渡時期的過渡策略

在第一節中我們已經說到取消派看到中國資產階級怎樣不能滿足於軍事獨裁，軍閥戰爭，以至國民黨『訓政』，怎樣需要有一個統一的國家主權，以至因此怎樣要利用民主的統治形式以抑制軍人等等（見第三節政綱原文）。雖是取消派沒有敢公開說出這個資產階級的代表是誰，但是就是普通的工農分子也會知道，他們所要說的就是蔣介石與他的南京政府了，因爲誰都知道現在召集着國民會議的，祇有蔣介石的南京政府。

我們必須預先指出，在這裏取消派又在替國民黨做很大的宣傳工作。國民黨說他們的召集國民會議是爲得要統一中國，是爲得要抑制軍人，是爲得要以民權主義來統治民衆。現在取消派所說的，也完全是這樣。取消派完全不能了解，國民黨的召集國民會議，主要的目的是爲了要團結一部分反革命力量來進攻中國蘇維埃與紅軍，是爲了要以國民會議來反對蘇維埃，是爲了要以此來欺騙中國的工農羣衆，再其次是爲了要以

此來攻擊其他的軍閥，來取得帝國主義的大借款。對於國民黨這種反革命的，欺騙的政策，是取消派所不能也不願了解的。因為取消派已經自願的做了國民黨的宣傳隊。

對於國民黨所召集的這種國民會議，反對派起初當然是主張參加的。他們的祖宗托洛斯基在給他們的信上說過：『如革命的浪潮不能立刻推翻蔣介石及其國會則我們應參加國會，以暴露買辦國會的欺騙，提出我們的任務』（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托氏給中國反對派的信）。很明顯的，依照取消派的估計，中國現在根本沒有什麼『革命浪潮』，那當然參加蔣介石的國民會議是必須的了。

然而工農羣衆的不滿的增加，革命形勢的發展，甚至使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如像改組派與第三黨等，也不能不採取在野黨的反對派的態度，反對蔣記的國民會議，而主張召集什麼真正的國民會議以反對蘇維埃，以欺騙民衆。這樣，也不能不使取消派『左』傾，採取了改組派與第三黨等所採取的同樣的政策。

在『政綱』第三節上寫道：

『反對國民黨的訓政和軍事獨裁，必然採用過渡的革命民主要求。如要求召集自由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普選而產生的全權的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保障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內各民族的自決權。』

『現在國民黨召集其御用的國民會議，正需要我們拿出普選的全權的國民會議』

，號召工人及平民羣衆與之對抗，并提出我們的政綱』。

這就是取消派在他們的『過渡時期』所有過渡策略的全部！取消派在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南京政府之下，『要求』召集解決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等等任務的自由平等等等的國民會議！這是徹頭徹底的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的政策，却還要說這是列甯的布爾塞維克的政策，真……我不知道把什麼名稱去形容這類無恥到萬分的無產階級的叛徒！

他們無恥的說：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否決了過渡時期之革命的民主口號，陷中國共產黨於無口號的狀態，因此不能在反革命時期，進行動員羣衆的工作』。

照取消派看來，除了他們『要求』蔣介石『召集』國民會議這類叛徒的機會主義策略以外，就不能有革命的策略。除了召集國民會議與參加國民會議的反革命的口號以外，就不能有革命的民主的口號。說來似乎很奇怪的。那反對目前中國革命爲民主資產階級性質的取消派，現在却反而罵中國共產黨沒有革命的民主口號以動員羣衆！然而實際上這是很自然的。因爲反革命的取消派，祇看到那類反革命的口號，而不能看到革命的民主的口號。

中國共產黨在目前革命的階段，有他最明顯的革命的民主的政綱，如像打倒帝國主義，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八小時工作制，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民族自決等等，但是這在取消派看來，不是革命的民主政綱。因為中國共產黨要以革命，要以武裝暴動來實現他的政綱。武裝暴動，在取消派看來，現在是絕對不需要的，因為中國『第二次革命』已經終結，而第三次革命又遠在將來！

只有在國民黨統治下，要求要求召集國民會議，在這類國民會議中間去提出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保障中國民族獨立（！），國內各民族的自決權的政綱，才是『革命』的政綱！

是我們的革命？還是取消派的『革命』？我想聰明的讀者一定會不言而喻的了罷！

但是取消派終究不能這樣赤裸裸的給人家看穿西洋鏡，所以他們終究不能不用一點『左』的詞句，用一點胡椒，芥末，來做他們『革命』的民主政綱的調味。

在『政綱』第三節上他們這樣的說：

『我們的目的，並不是在爭議會制的和平發展，也不是在建立民主共和國，而是走上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真正按照工農羣衆所要求的國民會議，必須武裝暴動』。

這裏什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過是取消派的手法。主要的意思是說他們所提出的所謂革命的民主口號，原來不過是欺騙欺騙民衆的把戲，是不能實現，也不能實現的。至於甚麼『真正按照工農羣衆所要求的國民會議，必須武裝暴動』，那當然是將來的事，在第三次革命中所要做的事，同現在是沒有關係的。

取消派的所謂過渡策略就是如此！

四 『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中的教訓

取消派在他們『政綱』第一節開宗明義的就說：取消派『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就是明瞭的了解革命的失敗的原因。』而這一切原因的原因就是『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路線』。

關於取消派在政綱中第二節講到『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時所舉來證明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我們過去在反對取消派的鬥爭中已經說得很夠，取消派在這幾個問題上已經遭受到了我們嚴重的打擊。我想在這裏再來重複過去所說的，一定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但是，我必須要在這裏略略指出取消派在他們的『政綱』裏所玩的把戲。

第一，對於我們極感興趣的，就是反對派過去當民族資產階級還是革命的時候，拚

命反對我們同資產階級做政治上的聯合，去奪取在它影響下的工農羣衆到我們領導之下。那時不願共產國際的一切指示，拚命投降資產階級，拋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最主要負責者，就是現在大罵共產國際的叛徒陳獨秀。他現在不但不去思索一下他過去所犯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却最無恥的在『政綱』上寫道：

『共產國際領導的最重大的歷史罪惡莫過於幫助中國資產階級騎在中國工農的頸上，而且掩護牠以抵制革命的布爾塞維克之攻擊』。

當然，敢這樣把自己的罪惡推到共產國際身上去的，祇有無產階級的叛徒，與下流卑恥的市儈！

但是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公開反革命，屠殺工農羣衆的時候，取消派却主張同資產階級的政黨，改組派與第三黨，在國民會議中聯合起來，去實行他們『革命的』民主的政綱。（見『我們的話』）特別在現在，取消派很賣氣力的替國民黨的各種欺騙，做宣傳鼓動的工作（見上文）。也許這就是他們所說的『革命的布爾塞維克之攻擊』。（實際上應該讀做『攻擊革命的布爾塞維克』！）

雖是取消派的這種策略的『過渡』，表面上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實際上，他不論是從前或是現在，主要的目的是在幫助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時反對同資產階級聯合，爲的是要拋棄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爭取領導權的鬥爭，以幫助資產階級

。在資產階級公開反革命後，主張和資產階級合作，並且拚命給資產階級的欺騙做宣傳，也爲的是要幫助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

第二個對於我們特別有興趣的問題，就是關於蘇維埃的問題與聯帶而來的關於紅軍與農民暴動等問題。

大家也還同樣的可以記到，在中國大革命的武漢時期，托洛斯基曾經主張過那時組織蘇維埃。當時共產國際反對這種主張，因爲蘇維埃第一是準備武裝暴動的政權的機關。在武漢國民政府還是革命的時候，我們的策略是在利用這機關以奪取廣大的工農羣衆。組織這樣的機關，必然會使共產黨孤立，使它遭到嚴重的失敗。當然，那時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領導很頑強了抵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他不是去利用國民政府，來奪取羣衆，却投降國民政府來反對羣衆。這大概是叛徒陳獨秀現在已經忘記了的罷！

但是在大革命失敗之後，當國民政府已經變成公開反革命，國民黨的旗幟已經變成白色恐怖的旗幟，當廣州英勇的無產階級第一次舉起蘇維埃的紅旗時，取消派却起來大罵廣州暴動爲冒險，說在廣州組織蘇維埃『又是一種冒險罪惡。』（見第二節）

近年來全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一日千里，蘇維埃的旗幟已經變成全中國唯一革命政權的旗幟，蘇維埃的區域所占據的土地有數千方里，所包含的人民有數千萬。於是取消派起來大大的反對蘇維埃運動，而擁護國民黨的國民會議。

取消派在過去幾年內曾經把中國的紅軍當做土匪軍，同國民黨同聲共氣的反對蘇維埃與紅軍。祇是因爲懼怕，這樣露骨的爲國民黨的走狗，以至失去他們最後的欺騙作用，所以他們不能不在他們的祖宗托洛斯基的指示之下，改稱蘇維埃運動爲農民遊擊隊的運動。

在托洛斯基一月八日致中國反對派的信中寫道：

『有些信中，說有些個別同志對於中國紅軍認爲與土匪無異。此種觀點當然必須放棄。固然革命的農民隊伍之中，有職業土匪與遊民無產階級的份子滲入，然而一般講來，此種『紅軍』運動有極深刻的根源，將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當依據於此種根源。史大林派對此革命隊伍之政策，則爲官僚派冒險主義的犯罪政策。』

我們不能有任何對於遊擊隊之幻想或獎勵參加遊擊隊利用遊擊隊的幻想。我們應向參加遊擊隊者解釋：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及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農民遊擊隊無疑的是得不到勝利的。』

在取消派的『政綱』中寫道：

『蘇維埃口號在現在若是實行的口號，則只是冒險和高調。史大林派的領導，依靠鄉村散亂的遊擊隊來組織紅軍並創立蘇維埃政府以對抗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官僚的冒險主義政策。我們認爲必須到了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

治中心，然後才有組織紅軍及在鄉村建立蘇維埃制度之必須的前提。」

從這兩段連文字都差不多的言論中間，我們可以看出取消派雖是嘴上不再稱紅軍爲土匪，但是實際上他們根本反對有什麼紅軍，建立甚麼蘇維埃政府。這一切，在他們看來，都是史大林的官僚派的冒險主義。是呵，現在沒有甚麼革命，現在是反動時期，要這類紅軍，這些蘇維埃幹什麼呢？現在唯一「革命的」民主口號是國民會議。可不是嗎？

當中國的工農羣衆爲了打倒帝國主義，爲了推翻國民黨的統治，爲了奪取土地，爲了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拿着武器起來暴動時，取消派就嚇得魂不附體，拚命跪着向工農羣衆宣傳，說：現在沒有無產階級革命，沒有無產階級政權，現在你們還不能勝利，你們還用不着組織紅軍與蘇維埃。你們還是等等罷，你們要等到國民黨借外債復興了中國的經濟，再等到經濟發生恐慌，等到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的工人開始革命，等到了他們革命勝利之後，那時你們再來成立紅軍成立蘇維埃罷。

取消派是澈頭澈底的國民黨反革命統治的護擁者，我想難於找到更明顯的例子了罷！這些人，我想蔣介石很可以把他們組織成宣傳隊，大批的送到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福建等蘇區裏去。那他們也許更能施展他們的技倆給國民黨効力罷，更正確的說，那時他們將更其赤裸裸的把他們反革命的全部暴露給廣大的工農羣衆看罷。

在武漢國民政府還是革命，工農羣衆還對於他們有信仰的時候，取消派就要組織蘇維埃，在國民政府已經是反革命，在工農羣衆起來爲了蘇維埃而鬪爭時，他們却又反對組織蘇維埃。爲了甚麼？爲了要幫助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

五 『馬克思列寧的革命傳統之承繼者』

從上面說來，我想讀者一定很明白，究竟甚麼是取消派？取消派是脫離，懼怕，并反對工農羣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革命的集團。他所做的是用對於國民黨在野黨的態度，用一些『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空名詞來擁護國民黨的統治，給國民黨做宣傳鼓動員，反對工農革命運動，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共產國際的工作。他們最近發表的『政綱』是證明這一判斷之正確的最好的供詞。

但是取消派自己怎樣說呢？

『現在的整個的共產國際中已存着右中左三派。右派是社會民主主義在共產主義之影響的代表；左派是馬克思列寧的革命傳統之承繼者；中派則動搖於兩者之間。中派乘整個右派的趨勢與右派聯盟，霸佔黨以及國家的（蘇聯）機關壓害左派。因此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更當堅決的攻擊右派，同時鞭撻中派，使之不敢公開地走向背叛的道路』。（第五節）

我不知道讀者讀了這一段文字，有甚麼感覺？ 我呢，我只覺得……：……覺得要嘔。

這等於屠殺工農的僧子手蔣介石，自稱是綿羊一般的人道主義者一樣的惡心！

這統一的取消派除了他們自己說是「左派」以外，已經右到再不能右，右到公開的擁護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同改組派第三黨的政綱，根本上沒有甚麼大的區別。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雖是這統一的取消派已經有了一個各派共同承認的反革命的政綱，但是這些派別還是不能消滅的。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思想系統與人的結合到底同托洛斯基主義者的不能完全相同，在托洛斯基主義者的內部也有各種各樣的小派別，雖是同樣是崇拜托洛斯基的反革命的東西。這不是甚麼統一的取消派，而是各個派別在他們所謂「反革命時期」內的暫時的聯合。而且在這所謂統一的取消派中間的人物，都是過去革命的偉人，或各自的小派別的領袖。這是一羣沒有軍隊的大將軍的結合，他們的團結當然是不能長久的。

在國際上，所謂托洛斯基派實際只有幾個全軍已經覆沒了的敗將。雖是這位忙於替各國資產階級做反蘇聯與反共產國際宣傳工作的托洛斯基現在拚命想團結一切被共產國際不要了的，被世界無產階級所拋棄了的「左」右叛徒，然而他的效果到底是非常微小的。

托洛斯基在他自己的信上這樣說到法國的托派：

「法國的同盟原是各種派別合組的。他的週刊作了不少廣大工作，不但是國家的任務，並且作了國際的工作，這證明各派的聯合是進步。然而在最近這一同盟之中發生極厲害的不同意見，其中有關於工會問題的，形成了右派。他們的立場是根本猶豫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甚至可以重新分裂」。

在法國是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這位在愛爾巴島上的拿破倫。不論他跑到土耳其，或是西班牙，甚至於將來親臨中國，他的運命也祇能如此。他祇能給資產階級，同時也就是給法西斯化的社會民主黨做些宣傳的文學上的工作。這些工作，當然就是反蘇聯，反共產國際與所謂反史大林的官僚主義的工作。……

當然，這反革命的取消派取消不了中國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火車頭，他有充足的革命的火焰與力量，打破一切障礙奔向前去。

不是取消派取消中國革命，而是中國革命將取消取消派！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

國民會議與軍閥戰爭

華崗

歷史的諷刺總算沒有完全，現在又加上南京政府蔣介石召開國民會議的喜劇去補充了！

國民會議的口號最先便是托陳取消派的要求，他們在兩年以前，便提出『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來代替中國共產黨『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與『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兩個口號。以後改組派第三黨胡適派等反動政治派別也都跟着提出這一要求。去年十月間，大規模的蔣閻馮混戰暫時休止之後，使國民黨有運用手段企圖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的可能，所以接着在去年十一月間便有國民黨的四中全會，決定在今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會議，事後蔣介石並且允許國民會議可以通過約法，同時就有財政會議，高談什麼整理財政及稅制，答應提高關稅，廢除厘金，想借此來安一安資產階級及托陳取消派的心，事情總算順利，五百多個『國民』代表已經完全泡製出來，托陳取消派竭誠要求的國民會議昨天居然在南京開幕了！

其實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後，一直便是以殘酷的白色恐怖來對付革命羣

衆，尤其是最近一年來蘇維埃運動日益擴大，其殘酷屠殺更加嚴重，國民黨正依賴這一法西斯蒂手段來維持牠們的統治。國民黨的召集，不過成爲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點綴品，企圖在國民會議這一反動旗幟之下，把『和平統一，裁厘，大赦，勞資合作，地方自治，訓政建設，制定約法』等空洞名目來對勞苦羣衆施以改良欺騙，粉飾出一些民主民治的幻想與外表，藉以提高南京政府在帝國主義者心目中的地位，昨天國民會議開幕時蔣介石的演說便完全暴露出了牠們這種企圖與野心。

自然，因爲現在蔣介石召集的國民會議沒有儘量包含改組派第三黨托陳取消派的代表，所以改組派第三黨便『理直氣壯』的出來『反對蔣介石包辦的國民會議』，要求召集所謂『真正的國民會議』；托陳取消派也反對現在南京的『一個選舉標準很高的國民會議』，而要求召集一個所謂『普選的全權的國民會議』。我們暫時不管牠們誰真誰假，因爲如果有一百家『陸稿薦』或『張小泉』，便一百家都標着只有本店是『真正老牌』，誰有閒工夫去管牠們誰真誰假呢？總之，從蔣介石汪精衛鄧演達到托洛斯基陳獨秀都仇視蘇維埃運動，都主張召集國民會議，而牠們所主張召集的國民會議又都是軍閥豪紳地主資本家的分贓會議，那總是千真萬確的。不論是『蔣記』『汪記』『鄧記』或者『陳記』的國民會議，都只能代表軍閥豪紳地主資本家的反革命的利益，牠都不能給工農勞苦羣衆以利益，反而要加緊剝削工農勞苦羣衆的血汗，加緊進攻工農勞苦羣衆

，雖然在形式上也許有些差別。現在南京的國民會議居然開會了，這班被蔣介石稱作爲『全國彥英』的『國民』代表結果將要串演多少新鮮把戲出來，現在還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可以斷言：這班『全國彥英』既然都具備着牠們『獨有的歷史感覺器官』，而又有『萬古不磨的總理遺教』可以遵守，那末除了重彈一些『建設』『和平』的老調，照例通過『三民』『訓政』的所謂約法以外，一定還有許多反對蘇聯反對中國蘇維埃運動進攻工農勞苦羣衆的『碩謀奇策』產生出來。從前，這個反動的責任是由國民黨自己擔負起來的，現在牠將更積極執行這個進攻勞動民衆破壞蘇維埃運動的任務，但是却把責任卸在『國民』身上，說這是代表『國民』的國民會議的決議，實在那些『全國彥英』的代表才完全是軍閥豪紳地主資本家及其走狗，澈頭澈尾是代表軍閥豪紳地主資本家的反革命的利益的，不過蔣介石張學良這班劊子手玩了欺騙的手段，把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進攻工農的反革命政策加上一層『國民』的眼罩而已。

一一

如果這種血腥的國民會議將要遭到廣大革命工農羣衆的仇視和反對，那牠一定可以取得托陳取消派的贊助和膜拜。如果還有人要懷疑這個論斷，那我們馬上可以請他看看下面所引托陳取消派最近所發的所謂『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中的兩句『神

話』：

『國際帝國主義的剩餘資本可以造成中國的經濟復興，目前國民黨之決定召集國民會議，亦即是適應着這種要求』。

這一點用不着奇怪，托陳取消派的特點正在這裏，牠們可以閉着眼睛否認一切經濟危機與革命高漲的客觀事實，但是不能不死心塌地而又空中樓閣似的幫助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宣傳『經濟復興』與『政治穩定』。所以托陳取消派一切『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空談，不過是一種假面具，用來遮蓋牠們孟塞維克托洛斯基主義陳獨秀主義的『國民會議』的實際口號。

自然國民黨爲要挽救他垂危的統治，爲要削弱革命力量，爲要進攻蘇維埃運動，不僅想把國民會議來暫時緩和一下統治階級自己內部的衝突和矛盾，而且更想藉此來取得外國帝國主義的諛許和財政幫助，爲了這個目的，國民黨中央還準備了『六年期內實業建設程序』的提案，公開提出『借助外資，以從事建設』的口號。但是事實上南京政府的一切『建設』的空談，大借款的籌劃，不過是要假借名義，用公債，回扣，尾數等辦法，籌出款項來填補軍閥的需用，誰也不在認真的想甚麼『建設』，而只在想着彌補目前的財政困難的，一年以來，南京政府及地方政府又接連發行了許多公債，但是很顯然的這些公債的收入，都落到各地軍閥的腰包，過去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裁兵公債

不消說早已用光，也許一大半是用在軍費上的，用在準備戰爭上的，而兵却一個也沒有裁掉，現在五千萬元的實業公債，也必然逃不出這種命運。近來實行新稅則，關稅雖有點增加，但也不夠軍閥的中飽與稍稍救濟一下南京政府財政的困難，而且「自今年關稅自主以後，外商復移其投資方法，來華添設工廠，自二月迄今，由外商增設者多至六百所左右，亦為經濟侵略之新趨勢」（蔣介石在國民會議的開幕詞）。國外貿易雖有進展的狀態，但是這正是外國貨物占領中國市場的情形更加厲害的外國財政資本控制中國經濟的力量更加增加，根本談不上幫助中國經濟復興。

中國一般的經濟現在正在極嚴重的危機之中，一方面災荒擴大，農業危機深入，工業繼續破壞，另一方面銀價繼續跌落，財政更加破產，這是因為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必然要反映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來，再加上中國國內軍閥混戰連綿不息的特定條件，更加速度的破壞社會經濟，造成更大量的失業羣衆，使一切勞動條件都百分惡化，南京政府的所謂裁厘，實際上成爲加稅之掩護方式（消費稅，營業稅以及最近米捐鹽稅之增加等）。帝國主義指揮了幫助了中國國民黨軍閥暫時打退了工農革命的襲擊，但是，帝國主義不但不能幫助中國的什麼「經濟復興」，並且不能夠幫助國民黨軍閥真正部分的解決財政上的困難，而最近銀借款與金借款的諛鬧，却實際上幫助醞釀並促進了中國新的大規模軍閥混戰的爆發。

中國軍閥混戰，一方面是經濟危機的表演，別方面即更在加重危機：鐵路交通的破壞，內河航路的阻梗，苛捐雜稅，拉夫拉車的剝削更加加重，農業危機，工廠倒閉，失業恐慌更加厲害。軍閥的基礎，原本是『中國經濟的特殊狀況：封建殘餘的統治和鄉村中商業資本的存在聯合起來，而保存着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封建式的剝削和壓迫方法』。這種基礎，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能加以打擊，並且對於他還在竭力保護和維持。中國沒有統一全國的國內市場，而只在經濟上政治上半獨立的區域（地方市場），這種情形一方面做帝國主義瓜分勢力範圍的基礎，別方面亦就是各該區域軍閥割據的條件，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之後更加和封建地主混合生長的過程之中，首先就是在各個地方市場之內和軍閥政權的官僚機關更加親密的聯結起來。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決不是和軍閥制度對抗的力量，而恰好相反，正是軍閥封建豪紳統治的新的工具，封建式的剝削壓迫方法的附屬——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固然必須依賴軍閥的保護，而且資產階級的資本更多份的投入商業，投入軍閥公債，使他和當地軍閥的關係日益密切。資產階級的某些集團之間的競爭，和當地豪紳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互相錯綜着，形成極複雜的軍閥政客各派各系經常互鬥的局面。而同時地主資產階級各種集團，在極端劇烈的

經濟危機之下，互相爭奪這種剝削工農的份量，只有引起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特別
是外國帝國主義對華利益的矛盾，只有日益加強中國國民黨軍閥之間的相鬥和混戰。

所以國民黨召集國民會議的主要用意，本在於想藉此暫時緩和一下牠們統治階級自
己內部的矛盾和衝突，想藉此動員一切軍事政治社會的力量，積極進攻紅軍，破壞蘇維
埃運動，自從去年國民黨四中全會決定召集國民會議以後，馬上徵調三十萬軍隊與無數
飛機大砲，積極圍剿紅軍與蘇維埃區域，第一次圍剿被打破之後，馬上進行第二次更殘
酷的圍剿，同時頒佈緊急治罪法與出版法，封閉書店，大批屠殺共產黨員及一般革命羣
衆，兇暴的鎮壓罷工及一切革命反抗。因為蘇維埃運動的擴大，革命潮流的高漲，乃
是對國民黨反動統治主要的威嚇，尤其因為湘鄂贛等紅軍最『猖獗』的省份都是南京政
府直接統治下的地盤，所以對蔣介石的威嚇特別大，這種革命勢力的直接威嚇使蔣介石
對於反蔣的軍閥如張學良陳濟棠等不能不表示相當的讓步，採取金錢收買等各種方法，
去緩和反蔣勢力的進逼，以便能集中力量去消滅蘇維埃區域與紅軍。這種對於革命勢
力的進攻，自然是南京政府蔣介石最主要的任務，而且是一切國民黨軍閥的共同要求，
牠們將更殘酷的去進行。但是牠們統治階級自己的矛盾與衝突既然沒有方法消滅，而
且反而日益加緊，那末『統一和平』既然破產，就使沒有蔣胡衝突的事件，新的軍閥混
戰，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樣南京的國民會議便又成了新的軍閥混戰的信號。

四

蔣介石本來是想用軍閥豪紳地主資本家的分贓會議——國民會議來緩和一下牠們內部的矛盾和衝突，來點綴一下『統一和平』的把戲的，他而且用這方法徵調了三十萬大軍去圍剿紅軍與蘇維埃區域，趾高氣揚的向帝國主義與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担保『在國民會議之前消滅赤匪』，然而歷史的諷刺也總不免有些毒辣，結果竟是蘇維埃革命運動的威嚇更加厲害，而反動統治之內的矛盾與衝突也是更加劇烈起來。

事實上這種軍閥混戰在兩月以前已經在四川爆發出來，在雲南蔣系軍閥龍雲與改組派軍閥也曾一度火併，現在劉文輝劉湘李其相還正在打得興高彩烈。蔣胡衝突的破裂，更使他們內部的矛盾和衝突緊張起來，從此西山派改組派軍閥反蔣的活動，所謂西南大同盟便活躍起來，同時又有三何（何應欽，何成濬，何健）反蔣的空氣，在北方則張學良竭力聯絡團結馮閻部下，到五月一日正是國民會議開幕之前，於是陳濟棠在廣東宣佈獨立，驅逐蔣系軍閥陳銘樞出境，成立反蔣政府，同日林森古應芬鄧澤如蕭佛成發出反蔣通電，宣布蔣介石討共不力，要求釋放胡漢民，同時南京政府中反蔣的分子王寵惠孫科王伯羣紛紛辭職，據今日香港消息，則廣東已發生軍事行動，這樣南京的危機更加厲害，甚至那班臭有『獨有歷史感覺器官』的國民會議代表，也不能不有『風雨飄搖之感』

中國經濟政治的危機正在深入而擴大，各地方的軍閥用一切種種榨取方法，壓迫工農羣衆，破壞一般的商業和經濟生活。南京政府不過是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他却有接洽外債的優先權，有賣國的頭等地位，佔據江浙最富饒的區域。而江浙區域的資產階級，又正占着國內最發達的市場，和經濟最優越的地位，這種資產階級和當地封建軍閥的聯盟，自然也只有在美國帝國主義的『門戶開放』政策之下，做帝國主義的附庸，但是牠們可以給南京政府的軍閥以割據的體面招牌，用各種各式『民族統一』『和平建設』等的旗幟號召『反對割據』的鬥爭，蔣介石便時常用這種『統一』的名義，企圖征服其他區域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過去蔣桂與蔣閻馮戰爭都是最明顯的實例，這種戰爭不僅表現是各區域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之間的衝突互鬥，而且正表現着美國帝國主義排擠英日的對華勢力的矛盾，也就是英日美列強爭奪中國的鬭爭。自從去年蔣介石『戰勝』閻馮兩大軍閥之後，在牠面前本來還擺着兩個有力的新的敵人，這就是北方日益伸張勢力的張學良與南方陳濟棠，不過當時對蔣介石更厲害的威脅却還是在牠直接統治地方的蘇區與紅軍，使牠不得不暫時設法緩和一下自己內部的衝突，而集中力量進攻蘇維埃運動，在這種策略之下，一方面有蔣介石更加投降帝國主義，不僅對美帝國主義撒嬌勾搭，而且也對英日頻送秋波，更無恥的解決甯案與漢案，表示出賣中國民族利益

，第二方面即在欺騙的詞句之下，利用所謂工廠法工會法積極的幫助資產階級，進攻工人。發行各種實業公債，決定召集國民會議，並提出所謂約法問題，以取得民族資產階級與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歡心。第三方面即用地盤讓步與金錢收買等方法以和緩敵對軍閥的進攻，同時爲要拯救自己的困難，發展自己的勢力，却又不能不盡可能的分散敵人的內部，在可能的狀況之下更消滅敵人的某一部分的力量，如此蔣介石便在對帝國主義屈服的條件之下，把代表香港廣東買辦地主階級的胡漢民推倒下去。

所以蔣胡的衝突事件，一方面表示蔣介石和緩反革命營壘的內部來貫徹牠『圍剿共匪』的大計劃，然而另一方面，最近兩日事變的發展，却又表示出蔣介石的這種企圖結果竟反而把反革命內部的許多矛盾衝突揭破了。反革命內部的衝突，反而因胡漢民的『辭職』而加強了。這不但是反蔣軍閥爲要與蔣介石爭奪『國民會議』的勢力，而且亦因爲蔣介石圍剿紅軍與蘇區的失敗，經濟的恐慌，南京政府財政的破產，使蔣介石陷於更困難的境地。對於帝國主義方面，蔣介石的政策，在爲了集中力量來消滅紅軍與蘇區，一方面雖然可以得到各帝國主義國家一致的同情，但是在進攻蘇區與紅軍的中間誰能奪得南京政府，誰能經過南京政府而擴張牠的勢力，擴張牠對於中國的殖民地的剝削這一點上，帝國主義內部顯然暴露出了不能解決的矛盾。不僅如此，在英美衝突與英日聯合向『勝利』的代表美帝國主義蔣介石進攻的總形勢之下，英國帝國主義更表現

出牠恢復並且鞏固自己在華勢力範圍與一切對華特權的企圖，牠不但用國際聯盟的金借款去抵制美國帝國主義十萬萬盎斯銀借款的計劃，而且更不顧南京政府用『統一和平』的空架子去侵害牠的勢力範圍，牠很露骨的對南京政府說：你們既然可以輕易的把我的工具胡漢民推倒下去，那我們就連一點統一和平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空架子也不能給你們，所以正在國民會議開幕之前，英國便首先宣布法權談判的決裂，接着在香港英國帝國主義指揮之下的廣東軍閥陳濟棠古應芬等便立刻爆發反蔣戰爭。在這中間，日本與南京之間在捕漁與禁止日本發表新聞等問題上，顯然亦有露骨的衝突，尤其是美國帝國主義企圖經過南京政府單獨搶奪中東路（所謂贖路）事件引起日美更大的衝突。所以最近北方反蔣運動亦有展開的形勢，美國對於南京，自然仍要與以積極的幫助，這樣的軍閥戰爭便在『國民會議』的旗幟之下走到進一步的爆發。

五

這種新的國民黨軍閥混戰的迅速爆發正反映出：世界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在中國有多大的劇烈的表演，中國各區域軍閥之間的衝突，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內部各種集團之間的鬥爭，是怎樣的劇烈，他們的內部矛盾是怎樣的嚴重，在事實上揭破南京政府所謂和平統一的的面具。這一事變的發展正可證明托陳取消派所謂『國際帝國主義為開闢中國市場

，以挽救其經濟危機亦必須要暫時妥協』的謬言，這怎樣的無稽與可恥。

各派軍閥相互的混戰並沒有減輕國民黨軍閥圍剿紅軍與蘇區的危險，同時我們也要利用國民黨是反動聯盟內部的劇烈衝突，利用經濟政治危機的加深與擴大以發展我們的工作，特別要加緊擁護并發展蘇維埃運動，鞏固紅軍與蘇維埃區域的內部，以衝破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的圍剿。在此時期，我們更要立刻團結鍛鍊出真正的工農紅軍，他的社會成份，應當是工農的，主要的指揮幹部應當是工人的，要有堅強的共產黨的骨幹領導着，要有最好的最靠得住的指揮者，要有鐵的紀律。這種紅軍，要完全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裏，應當有鞏固的物質基礎在一個或者幾個蘇維埃區域之中，這些區域就應當是革命的根據地。

同時更要立刻建立堅強而有工作能力的蘇維埃政府，共產黨員佔多數而吸引最好的非黨工農兵士參加。蘇維埃政府應當建立在革命的根據地而依據着紅軍。蘇維埃政府應當立刻規定並且公布自己的政綱，反帝國主義土地革命的政綱，並且要立刻實行自己的政綱，用事實表現給勞動羣衆看：蘇維埃政權能夠去掉帝國主義與地主富農而創造新的生活。要立刻實行中農貧農的土地革命，極端的改良工農階級的生活，建立新的國家機關，肅清一切反革命勢力，一切潛藏在蘇區內部的改組派 A B 團（如湘贛區）第三黨托陳取消派社會民主黨（如閩西）等都要無情的肅清出去，勇敢的推進工農來參加

建立羣衆的組織——工會，貧農團等等。要立刻實行正確的經濟政策——這些都應當能夠團結蘇維埃區域幾千百萬的工農羣衆在蘇維埃的周圍。

第三，在非蘇維埃區域之中應當更加開展經濟政治的羣衆鬥爭，並且在這些鬥爭的過程中去組織羣衆，這是真正革命的羣衆工作。我們應當明白：每一個經濟鬥爭，每一個罷工，每一個羣衆的發動，這在非蘇維埃區域之中不但是進到組織羣衆的一步，也就是進到武裝暴動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對於蘇維埃區域的幫助。忽視工人的日常需要和要求，忽視農民的日常需要和要求，這在客觀上是幫助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事實上最近幾個月的形勢，工人鬥爭日益發展，開灤礦工天津自來水工人上海法電紗廠絲廠等工人都有罷工鬥爭發生，在鬥爭中有許多表現出工人勇敢的反攻和部分的進攻，但是這些鬥爭的特點，則幾乎十分之八九都有自發的性質，共產黨領導的力量很是薄弱，現在我們必須極力取得自發鬥爭的領導，必須有計劃地動員羣衆去爲日常要求而罷工，把這些日常要求和無產階級總要求聯繫起來，在目前尤其要和反對國民會議反對軍閥混戰擁護蘇維埃運動的口號聯繫起來。同時必須努力開展暫時還不是蘇維埃區域的農民運動，發展遊擊戰爭，用農民的騷動像一個箭的一樣的去圍繞城市，還要十倍加強我們在反動軍隊中的兵士運動，要使他 and 工人運動農民運動聯絡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夠準備工業中心的城市的暴動，用暴動起來的工人貧民和紅軍佔領這些城市。每一個罷工

都是組織羣衆和準備暴動的一步，每一個罷工都是對於蘇維埃區域現實的幫助。尤其是在目前國民黨資本家加緊進攻的形勢之下，在非蘇維埃區域之中去努力組織羣衆的經濟政治鬥爭，是黨現在最重要的任務。『這是主要樞紐，要抓緊着去幹』。

『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不兩立』，現在的國民會議更加成爲國民黨軍閥混戰的旗幟，我們在廣大羣衆之中從事實上去指出國民會議的反動性，所以『打倒國民會議』，『變軍閥戰爭爲工農民衆反對軍閥的革命戰爭』，『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治，推翻一切軍閥』，『擁護蘇維埃運動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應該成爲我們目前羣衆鼓動的中心口號。同時必須加緊反帝國主義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擁護蘇聯的運動，這是與反對軍閥戰爭不可分離的任務。

改組派第三黨托陳取消派等一切反動政治派別，不但直接贊助國民會議，而且成爲國民黨軍閥混戰的工具，我們必須在羣衆中指出他們的反革命性，與他們的改良欺騙作無情的鬥爭。並且要用同樣的精神與毅力去反對羅章龍小組織右派。最後更主要的便是要鞏固自己的黨——共產黨，要堅決肅清立三路線反對他的調和主義與兩面派，要堅決執行兩條戰綫的鬥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和『左』傾盲動主義閉關主義的傾向，反對理論上實際上的這兩個傾向，集中火力去對付主要的右傾危險。只有這樣才能夠清楚的真正布爾塞維克的去解決并執行黨的當前新任務。

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最近蘇聯國際及國內情勢

莫洛托夫（在六次蘇維埃大會之報告）

自第五次蘇維埃大會以來，蘇聯的內部和國際的情勢，都有很大的變化。這在我們從蘇聯內部的階級力量的關係之變化上，和從蘇聯與資本主義的周圍之相互關係上的觀點看來，是非常重大的。

在我們國內，所謂階級力量的關係，其變化的根本在什麼地方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困難。這個回答，必須在我們的經濟之社會主義的要素所扮演的角色之變化中去找求的。

因社會主義的工業的成效與農村中蘇維埃經濟及集體農場之成長的結果，社會主義的部分，已經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中，獲得了絕對的優勢。蘇聯內部的階級力量之目前的狀態，根本上是由這件事所規定的。

他方面，蘇聯內部的這一變化，對於蘇聯與資本主義的周圍之相互關係上，亦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國內的社會主義的建設的成功，特別在我們經濟中，社會主義的部分所確立的絕對的優勢，這件事決定了蘇聯與資本主義的世界之相互關係。蘇聯的社會

主義之空前未聞的猛進，恰遇着資本主義的恐慌之最深刻的時期；在兩個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的面前，這一事實，使社會主義的發展與世界資本主義間的對立，愈益尖銳化起來。在向前發展的世界恐慌的狀況之下，蘇聯內部的階級力量的狀態中所表現的變化，又特別顯著的表白在蘇聯與諸外國間的關係之變化中。

只要看一看最根本的地方，我們就可指出現在時期和第五次蘇維埃大會時期間的區別。農民階級之最大多數之轉向集體農場，這件事可作為最根本的事件來看。

在第五次大會的當時，我們是從社會主義的建設的全過程上，提出了農村之社會主義的改造這個問題。對於我們有決定的重要意義的，是為獲得中農而鬪爭，是為農村之集體經營而鬪爭。但是，這個問題在當時是還未決定的。當時還沒有中農羣衆之急激的轉變，可以看到；富農還是頑強的反抗着，且想盡力的轉為攻勢。而且，即在布爾塞維克的陣營內，機會主義的動搖都很強大。右傾的分子，繼續他們對黨的政策之猛烈攻擊。階級的敵人，正在幸災樂禍的磨着拳頭，因為他們誤算了蘇維埃政權之立時的崩壞。

但是，在無產階級方面，當時已經明白的表示，要全線的採取社會主義的攻勢之轉變。只需我們指摘出社會主義的競賽，就夠明白了，因為社會主義的競賽，早在一九二九年的前半年，已經成為勞動者之廣大的羣衆運動了。無產階級的前衛之這一轉變

，也就是農民羣衆的情緒之轉變的預兆。而事實上，從一九二九年後半年之後，已經形成了中農羣衆之向集體經營之轉變。

近年以來，集體經濟運動之成長，非常迅速，但從一九二九年秋以後，這一運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重要的階段。從這時候起，集體經營是在不斷的發展着，最初從小範圍開始，而逐漸的轉變到在規模上和經濟的意義上巨大的領域來了。在完全的集體經營的基礎上，最進步的區域，已經從進攻富農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這個階級之政策了。因此，我們現在的，在六次蘇維埃大會的現在的情勢，與前次大會時的情勢，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了。我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成功：即農民羣衆中也已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改造這個方向來了，而這一轉變是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的。

現在的狀勢是這樣：即社會主義的成份已經統治了國民經濟，而資本主義要素（富農階級），在不久以前，雖表示過某程度的成長，但現在已走向消滅的路途了。這就是過去一年半以來，在農村中所表現的根本變化。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允許我們現在新的式樣上，來回答蘇聯往那裏走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樣了，即我們現在是在直接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中，即已經走進了社會主義的時期。從內部的力量的觀點來看，這個意義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勝利問題，在我們國內已經是決定了，我們已經能夠確確實實的保持社會主義的勝利。（喝采）

去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所設定的任務之實現，其意義不下於使農民經濟之一半，過渡到集體經營之路上。而這事又確保我們今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之其他一半的實現，即實現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之基礎的建設。（喝采）在這個旗幟之下，我們現今更展開了我們社會主義向全線的進攻，對抗資本主義的要素之頑強狂暴的抵抗。蘇聯內部的階級敵人，已逐日消失其力量，但仍頑強的企圖獲得外國資本家的力量之支持。蘇聯社會主義之決定的前進，因此與蘇聯敵對的帝國主義的周圍間的鬥爭之尖銳化，是不可避免的結合着。正惟因此，現今蘇聯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這件事，是愈益負擔着向國際資產階級之妨害我們工作的一切及任何企圖，作鬥爭的任務。對於好戰的國際帝國主義，想在我們國內組織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之愈益明顯的企圖，我們必須以必要的鬥爭準備來回答他。（喝采）

這一切事實，要求對於國內及國際的階級力量，對於他們的相互關係，對於這裏所表示的變化，必須有謹慎的布爾什維克的估計。

在這樣的時機內，過高的估計自己的力量，過急及疏忽的行動，都是非常危險的。要是這樣，我們將不能確保我們力量之必要而適宜的準備，而將陷入於潰滅的歧途去。過低的估計自己的力量和為社會主義的工作而鬭爭的可能性，也同樣是不能容許的過失。牠將損害我們的工作速度，而我們的建設速度之破壞，對於我們外部的敵人

計劃，是有決定的重大意義呵。因此我們斷不可忘却，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工作速度的低落和速度的破壞，是一種生命的危險，是蘇維埃的危險。

一 爲和平而鬥爭與蘇聯外部的情勢

1 世界恐慌的深刻化與資本主義之矛盾的尖銳化

現在資本主義諸國中所展開的稀有深刻的經濟恐慌，引導資本主義之一切矛盾，都到非常的尖銳化。牠使資本主義體系之國內國際的各種對立，都尖銳化起來。

共產主義者在世界經濟恐慌開始時所逆料的一切估計，現在都完完全全證實了。

對於資本家的經濟家和政治家的意見，經過了一年又半的世界恐慌，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更向前深刻化。要證明這一結論，只要引證若干數字就夠了。

在最大的資本主義諸國中，若拿恐慌前的工業發展之最高點來比較（即一九二九年正中的狀態來比較），則去年年初的生產低落如下：即美國的生產低落爲百分之三二，德國的生產低落爲百分之二八，英國的生產低落爲百分之一九，波蘭的生產低落爲百分之二五，法國的恐慌較遲發展，而其生產低落也有百分之七。

同時，農業恐慌之深刻化，又與工業恐慌並行着。農業恐慌所表現的是空前未聞

的破壞的價格低落。農業之最重要生產品之批發價格，為全體資本主義世界的數千萬的農民所入所依賴的，跌落到以前的一半，甚至跌落到以前的三分之二。價格常常低落到農業生產品生產時所需要的支出以下。這樣低落的價格，使數千萬的農民經濟遭受了悲慘的打擊。

最重要的工業品和農業品之世界貯藏，在去年一年中，有重大的增加，同時資本主義諸國的城市和農村及其殖民地，因此招致的失業和貧困之增加到了前代未聞的程度。恐慌之世界性質這一尺度，在一九三〇年，是沒有例外的表現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輸出輸入之尖銳的低落上。

在一年以前，即在恐慌開始之時，在資本主義諸國有不少的人們，相信資本家之樂觀的解釋，以為恐慌能夠很快的結束，新的『全盛』時期將不久到來，但到了現在，已經被相反的意見所替代了。即資本家的御用報紙，也都不得不承認這件事了。

一九三一年，資本主義諸國中的經濟情形，不但沒有改善的徵象，反而產生了相反結果。恐慌的深刻化，還在繼續中，牠還沒有達到其極點。最近數月以來資本主義的公司及銀行倒閉的數目，也在增加着。經濟恐慌發展之極點，還在我們的前面，資本主義的事業，因為不能知道恐慌的究竟，都陷入於混亂的狀態中。

資本家的經濟家，已經陷入於困難的狀態中。他們必須尋求現在『經濟恐慌』之新

的說明。因為沒有能力去馬克思主義的，即實際科學的認識這次恐慌的原因，這些經濟家乃不得不困惑在無窮的矛盾之中了。

譬如英國有名的經濟家凱尼，這樣說着：『我們已經陷入了非常的混亂之中，因為我們不得不處理不知道其法則的，非常微妙的機械，所以犯了非常重大的錯誤』。（一九三〇，十二月，出版的『經濟』雜誌）

資本家的政治家的狀勢，也不見得比這好一些。他們從前關於恐慌短期的結束之預想，已經完全破產了。他們對於消滅恐慌的鬭爭之無力，現在也已經明白的證明了。資本主義諸國的廣大羣衆，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家和政治家之不信任，已經增長了。對於資本主義不滿之增大，即在資本家的報紙上，也很容易看出。表示不滿情緒的意見，時常出現於資本家的報紙上。有名的德國經濟家波氏，發表了一篇『美國恐慌之意義』。波氏這樣說着：

『無數的人們，很素樸的提起了這樣的問題：倘若在世界最富庶的國家中，不能保持秩序以保證勞動而勉力的，比較稀薄的人口之收入，使他們能夠獲得適應於近代機械發達時代的生活必需品，而不至時有數百萬的乞食求生和食不飽肚的苦痛，這樣都不能做到的資本制度，究竟還有權利存續麼？所以美國恐慌的意義，不僅是指示現在美國的經濟事情和美國的經濟政策發生問題，而且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成爲問題了』

。 (『新時事評論』一九三一，二月號，一五二頁)

這是很明白的，因為我們可敬的教授先生，要迴避他所提起的問題，所以把牠作爲『非常素樸的』東西看待。同樣，這也是非常明白的，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權利』，不僅僅在美國的『無數人們』是這樣想，而且是資本制度存在的任何國家的無數人們，都這樣想着。

奧國大資產階級的機關雜誌，『新自由報』在其新年回顧上，這樣寫着：

『許多人們，爲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否應負一切不幸罪惡的責任這個可咒問題而苦惱着』。

而事實上，正在增大的經濟恐慌，使資本主義的矛盾，尖銳化至於極點，在廣大的羣衆面前，愈益尖銳的呈現出資本主義制度之生存權利的問題。

從這個關係上來看，我們很容易理解英國自由黨的指導者喬治氏的說明。他說：『倘使我們沒有失業保險費的話，那末革命史在我們國度裏發生了吧。假使諸位不能給牠一些骨頭，諸位決不能將狗關閉在狗窩中的』。(孟鳩斯德導報，本年正月七日)

在這些發自衷心的話語中，表白了資本家對於勞動階級之憎惡，同時也表白了他們對於勞動階級力量增加之不安。

資本主義國家內，統治階級的情形既是這樣愈益陷入於混亂，而他們中間相互關係的情形，也沒有比這好些。

誰都不能主張帝國主義諸國和其殖民地間的相互關係，近來是比較改善了。

誰敢說近時英國和印度地主資本家的自由主義的指導者所達到的和解或一半的和解，即使是一時的，能使在印度的相互關係得到安定的保證麼？在勞動階級及勤勞農民之生活狀況，沒有絲毫改善，反而愈益惡化的狀態之下，人們沒有法子可以得出印度將行安定的估計。印度支那的勞苦民衆，爲防禦他們的利益所惹起的屠末的企圖，也被法國的資產階級的報紙，當作『布爾塞維克的陰謀』描寫着。對於『布爾塞維克的危險』這樣大驚小怪的叫聲，決不能使資本的統治得到鞏固，反而只有使布爾塞維克理想之傳播，在殖民地的廣大羣衆中增大起來。在中國，軍閥和最強帝國主義的代表者們，手攜手的活動着，數年以來，統治階級已經證明其自身沒有能力去造出一種狀態，以發展經濟的興盛和改良羣衆的生活狀況。

資本主義諸國的直接關係，也沒有任何實際克服明目的不安和不信之標幟，雖然資本家政府的代表者，終日孜孜於做出各式各樣的條約。德國一部分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者，『非公式的』追求着巴黎之可能的緩和。大不列顛的官府代表者，支持着法意兩國間關於擴張海軍軍備之條約。在法國，英國，德國及意國的統制之下國際聯盟發布

了一種爲『排除對於歐洲和平保障之疑惑』的宣言。但是事情一到決定國家間的政治關係的實際的重大經濟利害的問題之時，就不見有任何實際的前進運動了。前荷蘭首相而爲現在歐洲關稅會議議長的柯林氏，當他在國際聯盟歐洲委員會開會時，說出『諸國民已經對於國際聯盟之任何事業，失却了信用』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實際上，資本主義諸國間，爲爭奪市場和勢力範圍，爲準備世界再分割的鬥爭，是在一天一天的尖銳化。而此次恐慌，更使這一切矛盾尖銳化着。有幾個國家，受恐慌特別利害，使牠們衰弱不堪，因而喚起牠們懷抱在再分割世界時去多咬一口的希望。

總觀目前情勢，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正在增長。

恐慌的持久及其巨大的深刻化，證明救濟恐慌的方法，已經沒有效果。資本主義諸國，愈益利用關稅障壁，以局限於相互的關係。國際經濟會議，特別是『農業』會議，一個一個的都歸失敗。因此資本主義諸國，特別頑強的增加武備，擴大戰爭工業，牠們準備用武力去爲爭奪權力而鬥爭。一般的和平，經常的被脅威着。世界早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間分割完了，但爲世界之再分割而起的帝國主義諸國間的戰爭危機，是愈見增大了。

2 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態度及干涉準備

資本主義諸國對於蘇聯的關係，表現在每一事件上，而蘇聯與其資本主義的周圍的力量關係，亦愈現出變化。

在批准五年計劃的前次蘇維埃大會時期中，我們的敵人，預計着五年計劃之不可避免的破產，且以其沒有實現之可能性相慰藉。階級敵人期待着五年計劃之不能實行。但是，這是徒然的。他們的打算是錯了。

在現在正在開會的大會時期，資本主義諸國統治階級的情緒，已經大大的轉換了。他們之中，現在一談到五年計劃，常常又以聽到他們的驚恐之聲。若干的資本家的機關報，甚至非常熱心的企圖散布這樣的思想，即「五年計劃是毀滅資本主義諸國最確當的方法。關於五年計劃之破產的預言，已經成爲空虛的贅言了。當資本家的政論家，正在喋喋這種預言之際，他們的脚下，却發生了空前未有的大恐慌。現今的恐慌，在其影響上，甚且比帝國主義戰爭最深刻的恐慌尤見超過。只有蘇聯，不但沒有被世界恐慌所牽連，祇有蘇聯，不但避免了恐慌，而且正在實現着提高國民經濟之偉大的政策，

在這樣的局勢面前，從前對於蘇聯資本主義變質的希望，自然只有消失了。第一，當蘇聯採取新經濟政策之時，國際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如勞合喬治其人，是這樣想過的

「俄國已經從野蠻的，奔放的共產主義過渡到穩和的形式來了，共產主義已經是過去一二年前的，甚至是幾個月前的陳跡了。現在俄國的人民，已經認識了人性是怎樣的東西，且以此為出發點了。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是不可能的。」

勞合喬治及其他的許多政論家，都認新經濟政策為「不斷的轉向資本主義」。這些資產階級的先生們，表示了他們自身的社會水平線之極端的局限性，表示了他們除了資本統治以外想不出其他形式的自己滿足的資產階級之無能。他們的期望，是蘇聯不可避免的轉變而為資本主義，是俄國的地主，資本家之從新恢復權力，是富農在農村中的勝利，是自黨將軍們之復回莫斯科。

而且他們找尋每一機會，宣告蘇聯終究「開始」了「回歸」到「不可磨滅的」資本主義。不僅僅資本家們以這個幻想為自己的營養物，而且他們之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等等的「社會主義的」從僕們，也日夜以此為自慰呢。

五年計劃之最初的成效，已經把這個朽腐的幻想殘酷的打毀了，於是，一部分的資產階級，開始小心起來了，他們不得不把蘇聯要漸次變成資本主義的期望，決定的放棄了，同時他們也不得不變更對蘇聯的策略了。對於蘇聯資本主義變質這幻想的破產，使資產階級採取了新的策略，這個新策略之本質，是準備對蘇維干涉。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依照統一的計劃所進行的狂暴的反蘇聯運動，是他們的干

涉計劃之實證。

自一九二九年秋到現在為止，頗急速的進行着資本主義的包圍政策，開始着襲擊蘇聯之預習。這種準備工作是有種種方面的。

這樣第二國際的任務，在直接的幫助資產階級，他們在勞動者之前，雖用與蘇聯發生『正當的』關係這種巧言，但這不過想隱蔽其幫助而已。莫斯科關於孟塞維克的國際的劊子手們的裁判，已經把『第二國際』這一反革命的，『絕對反無產階級的任務』盡情暴露了。在其進攻蘇聯的新計劃中，資產階級特別著重於準備輿論。反蘇聯運動的指導者，爲這個目的，特別利用一種口號，以隱蔽進攻蘇聯戰爭之階級的內容。在煽動宗教的成見，特別在農民中的成見的期望之下，他們製造了『宗教壓迫』這個反蘇聯的口號，而組織了以羅馬法皇爲首班的反蘇聯的十字軍。

『十字軍』的政策失敗了以後，他們現在更製造所謂『蘇維埃屯併』及蘇聯『強制勞役』的口號，而組織大規模的反蘇聯運動。

A 『蘇維埃屯併』的真相

克服『蘇維埃屯併』這個口號，其所追求的目的，不外是想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及勞動者羣衆之中，喚起反蘇聯的敵對情緒。資產階級探求着一切手段和方法，百般想遮蓋資本主義經濟的崩壞，想隱蔽他們克服這個崩壞之無力，並探求着種種口實，以

卸却其責任。因此，凡是資本家報紙，都一式的努力做向壁虛構的勾當，濫說輸入蘇聯商品及其在國外的廉價販賣的危險。而製造出一種外表，好像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所陷入的可笑的狀態一樣。

全世界的資本家的報紙，昨天還有組織地散佈着蘇羅埃經濟的崩壞，布爾塞維克所指導的工業及農產的破產之謠言，而今天却不得不從相反的觀點上來散布新的謠言了。

資本家的報紙今天却從各方面來努力的證明，蘇聯經濟發達得非常的快速，致輸入蘇聯廉價商品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有危險。前後各種虛言，都不過證明這種報紙之卑劣的手段而已。敵視蘇聯的資產階級，利用這種手段，結局只有自打嘴巴。

凡『健全的』人們，誰都不至於採取這種卑劣的方法。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能，敲響了警鐘。恐怖心混亂了他們的頭腦。

但蘇聯外國貿易的基礎的事實，把這反『蘇織屯併』的反蘇聯運動之全部意義，暴露無遺。

一九一三年，俄國在世界輸出額中可占的部分為百分之三點五。這並不算多。但是我們到現在還不會達到這個數量。一九三〇年一年中，我們在世界輸出額中，所占的部分祇有百分之一點九。這裏告訴人們，我們的輸出額還不到戰前之一半。在若干國的輸出對照表中，指示出一九二九年蘇聯的輸出，動搖於百分之零點五（到英國

，意國及法國去的）及二點六（往德國的）之間。試問資本家的經濟制度，是不是能由我們微小的輸出就會突然的崩潰和震撼呢？

很可惜的，我們的輸出，在絕對數字上，還較低於戰前。一九一三年俄國的對外輸出，約值一萬五千萬盧布，而一九三〇年的輸出，只有一萬萬盧布，即尚少五千萬盧布。但是一九一三年之時，並不會有人嘵嘵不休的說沙皇俄羅斯的輸出，是使資本主義恐慌發生和深刻化的原因。

以『蘇聯屯併』的作用去說明恐慌之可笑，就是下述的事實也可證明的。被恐慌蹂躪着的歐美各處的工業部門，不僅我們蘇聯不是一個輸出者，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輸入國啊！

人們可以誠實的說『蘇聯的屯併』的作用，實際上波及於空前低落的鋼鐵工業麼？但是蘇聯不曾輸出過五金，反而輸入牠們。人們能夠說歐美機械工業的恐慌，是『蘇聯的屯併』所引起麼？但機械工業的恐慌，是在一天天的深刻化着。人們必須認清，只有蘇聯是一年增加一年的輸入歐美的工廠建設品。抑或可用『蘇聯的屯併』去說明汽車工廠之破壞的縮少麼？這是很可笑的，特別我們在現在，還不得不從外國輸入很多的汽車。

這樣例子的數字，還有幾倍可以增加，但是，這已足夠證明下述的事實了，即蘇聯

在全世界中，是唯一的國家，牠的輸入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增加了。

不過，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不必擴大我們的輸出，或放棄將來輸出的範圍。相反的，我們要擴大我們的對外貿易額。在輸入年年增大上看來，我們必須增加我們商品之輸出。這是兩方面都有利益的。難道資本家先生們，只望着蘇聯之進貢，要牠聽從牠們的條件，把牠分裂為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麼？但是蘇聯並不是資本家們的殖民地（喝采）。蘇聯也決不是資本家地主的羅馬尼亞那樣的國家，牠以其特殊的『五年計劃』，在對外國資本之廣泛的讓步的形式之下，而無限制的出賣其鐵路和鑛山。

外國的大土地所有者，地主及富農，把事實弄得甚囂塵上的，不過表示蘇聯輸入穀物的時期，已經過去一事而已。我們現在已經可以輸出穀物了。我們農業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使我們有確實的希望，一方面能夠實行改善穀物在國內的分配，同時又有增大穀物輸出的可能。至若關於價格之有利於我們，則我們正可公開的宣布，在我們與外國資本家的貿易關係上，我們是不能忘却世界最初的無產階級國家的利益的（喝采）。他方面，人們決不可忘了十月革命的國家，在生產費上是立在重要的有利立場上的，因為牠排除了寄生階級的生計，即排除了大土地所有者的絕對地租，排除了資本家們的利潤和超過利潤。至若其他，則十月革命之路，誰都可走，不會有人來禁止的！

（大喝采）

因此，反蘇聯的屯併運動之虛言，也可由此簡單的事實而暴露無餘了。要想把世界經濟恐慌之結果及其貧困之責任，加諸『蘇維埃屯併』的身上的我們的敵人，結局只有徬徨失措而失却廣大羣衆之最後的信仰。這個屯併運動之意義，只是這樣的，即不管手段與方法之卑劣到如何程度，一意要想製造出反蘇聯的情緒，而準備襲擊蘇聯而已。

當他們認識了他們所採取的屯併運動，明白的已歸失敗之後，我們的敵人，更找求新的虛偽的口實來支持這個運動。爲這個目的，他們利用着關於蘇聯內部的『強制勞役』的卑鄙齷齪的虛言。

B 所謂『強制勞役』

爲使反『蘇維埃屯併』運動，至少在外表上似乎有些近於真相起見，於是資產階級的報紙哭喪着臉說，蘇聯特別廉價在國外販賣其商品，牠的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爲使用着『強制勞役』故。

試考察這個問題吧，究竟蘇聯和資本主義諸國中的勞動，是怎樣的形式。

如果我們說到強制勞役，那末，實際上存在着強制勞役的，究竟是蘇聯還是資本主義諸國呢？

請先從這個問題之原則的方面開始吧。卡爾馬克思在下述的詞句內，指示着資本

主義下的勞動者階級的狀態。

「從社會的觀點看來，所以勞動者階級，即在直接的勞動過程的外部之時，也同樣是作為死的勞動工具之一而隸屬於資本之下。……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工錢勞動者却由不能見的線索而隸屬於其所有主。工錢勞動者的獨立性之外表，僅僅由其個人的資本主義經常的轉換，維持着而已。」（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第五三六頁第八版）

再引用一個馬克斯給予我們的，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之確切的特徵吧。

「用什麼形式去剝奪直接的生產者即勞動者之剩餘勞動，是唯一區別社會的經濟構造的東西，譬如奴隸制與工錢勞動之社會。」（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七九頁，第八版）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斯和昂格斯，已經確立了並無遺漏的證明了：資本主義的秩序之詳盡的分拆。

「資產階級……牠是以這個制度（及資本制度——譯者）比古奴隸制度較佳數倍的……牠可以不管他們雇用者，可以不必因此而損失其放下的資本，而且大體上牠能夠獲得奴隸所能提供的價廉數倍的勞動」。

在一八四四年昂格斯所著的「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態」一書所寫的這些話，到今日也沒有消失其意義。相反的，資本主義在剝削勞動者這點上，是更加進步了。

我們必須把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統治下農民狀態所說的話，常常回憶，他說：

『資本主義的制度……已經成爲吸血鬼了，他吮吸他們（農民）的心血腦髓，而投之於資本的鑄金家的手箱中』。（馬克思著，第三政變紀，第一二三頁）

如果說要找馬克斯在數十年以前所說的這些話之證據，直到現在，只要是資本家，地主和富農們統治着的地方，我們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找得這些話語之真實性。

自然，我們還不會說及下述之事，即在法國，英國，北美合衆國，白爾義及荷蘭的殖民地上，在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之傍許許多多的事實上，還保存着個人及全家族之賣買的直接的奴隸所有者呢！

資本家的報紙散佈着蘇聯的『強制勞役』的沒良心的虛言，但是他們對於資本主義諸國，工錢勞動者及農民之奴隸性之實際的事實，却喜歡箴口不發一言！但是，不管他們怎樣努力，真理終究要顯露出來。一切的勞動者和廣大的勞動羣衆，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奴隸性質和由十月革命所創造的蘇維埃制度之解放意義之區別，是愈見明白了。資本家的報紙却使其反『強制勞役』的運動，變成爲不利於其自己的事業了！他們終究將同這個事業一起的暴露出真相！

資本主義的奴隸制的原因，很早就被揭發了的。牠之所以成立，很明白的是因爲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中，生產手段是被資本家們所佔有着，而勞動者則被剝奪了生產

手段之私有，勞動者由此陷入於奴隸的隸屬在資本家之下。如我們國家的例子那樣，在蘇維埃制度中的事情，不是這樣的。勞動在蘇聯中是自由的。蘇聯達到了這個地步，因為牠剝奪了資本家的生產手段，而把他們驅逐出國了。在蘇聯，勞動者不是爲資本家勞動，而是爲他自己。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奴隸性是由這樣被推翻了的，我們國內的勞動是解放了的。生產手段已經不在於資本家的手中，相反的，他是在國民的處理中。

現在我們來說具體的事實：

A 失業問題。在資本家看來，有三千萬到三千五百萬的被丟在街頭的勞動者之存在，這個前古未有的失業的事實，是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的一個『自由的勞動』的證明，那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者，他們體驗着空前的而且正在增加的失業之恐怖，非常明白的知道，這件事對於勞動者是最惡的壓迫，牠使數千萬的家族陷入於饑餓之中。

照資本家的見解，必須將蘇聯已經消滅了失業這件事，永久的不使勞動者知道，至少須把消滅失業，作爲蘇聯的存在着一般的勞動強制之結果去解決，這也同樣是很明白的。但是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者，却在每天的經驗之中，愈益明瞭對於蘇聯的實際的真相了。就是勞動者之中最落後的部分，都已經明瞭，蘇聯之所以能夠消滅失業是因

爲勞動者國家之社會主義的建設，獲得了顯着的發展之直接的結束。

B 勞動日的問題：現在的失業，雖然是這樣巨大，但是資本家們對於勞動日，現在却仍舊的採取加強的攻勢，以儘可能的去延長勞動日。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者，現在只有夢想防禦他們從前所實行過的八小時勞動制了。

下面所述，是勞動日的現狀。

請先就鑛山勞動者來說，則在英國，自去年下院決議延長勞動日至七時半以來，鑛山勞動者之實際的勞動日，多至九小時至十小時的，並不是罕有的現象。北美合衆國的炭鑛中的勞動者，依照一九二九年的報告，則每日勞動時間爲九小時半至九點三刻。在日本，則去年已經施行了每天十小時的勞動日制。至關於纖維工業的勞動者的狀態，我們只說幾句話夠了。即在意大利，則依照年初所發佈的法律，對於纖維工作，沒有任何的限制或精確的規定。在德國，根據一九三〇年的工廠監督的報告，則纖維工業之許多部門及製造衣服類的工作場中，實際上十五小時至十六小時的勞動日已經佔有統治的地位。

資本家先生們在殖民地中，凡關於延長勞動日之事，無論如何不會嫌過長的，這是不消說的。所以印度的工廠監督官的報告，這樣的確說着：一九一九年的華盛頓會議，雖爲印度規定了十小時工作制，但印度勞動者之實際勞動日，却爲十小時至十五小時。

這就是資本家統治下的『自由』勞動之狀態！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勞動日之狀態，就是這樣！

試把這一事實，與在蘇聯的狀態比較一下吧。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者只有在夢想中去防衛此處彼處所已獲得的八小時工作制，而在我們蘇聯，却確立了相反的現狀。在蘇聯，已經縮小八小時工作日而實行了七小時工作日，而在當談集體的契約之際，不僅保持着原有的工錢，且同時增加了工資。蘇聯的工業，今年在本質上已經完全渡過到七小時工作了。對於各種的勞動者，如鑛山勞動者，化學工業的若干部門的勞動者等工，我們這裏早就實行了六小時工作日。看吧，蘇聯勞動者之所謂『強制勞役』，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啊！

人們必須把這個真相，傳達給外國勞動者之儘可能廣大的羣衆中去。

C 工錢問題。資本家先生們，現在正實行對工錢之強大的攻勢。依有名國民經濟學家庫思且思基（J. Kuzniski）氏的計算，則德國勞動者在一九三〇年一年中，因失業和短縮勞動之結果，其所損失的，至少約有一萬二千萬馬克。根據美國資本家的統計局『標準統計公司（Standard Statistics Co.）』（及雜誌 *Aune List*）之計算，則北美合衆國的勞動者，因工錢低落的結果，在一九三〇年每月至少要損失一千萬金元。因此一九三〇年一年中，北美合衆國的勞動者的工錢損失額，實爲一萬二千萬金元了。

從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我們也可引用近似的數字。看吧，資本主義下的勞動者之『自由』，究竟是怎樣的多啊。

而在蘇聯，却有絕對與此相反的現象。在和平社會主義建設之全期間內，蘇聯勞動者的工錢，從來不曾降落過。相反的，勞動者的工錢在我們國內，却每年在增加，而今年又特別的增加了多些。即在五年計劃的二年之中，蘇聯勞動者和職員的工錢基金已從七萬八千萬增加到十二萬五千萬，即總計約增加了四萬七千萬盧布。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〇年相比，則工錢總額增加了二八六〇百萬盧布，無論資本家先生們及其報紙，怎樣吶吶喋喋，全世界的勞動者必會承認我們，蘇聯之所以能這樣的提高工錢，這因為勞動者階級掌握着政權。

D 社會保險與勞動者生活條件之改善問題。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將勞動者的社會保險全部加諸國家費用上的。在最富庶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即在北美合衆國，資產階級迴避着採用對勞動者之國家的任何保險。北美合衆國，將近有一千萬的失業者。根據美國上院議員克雷維(Carvey)(二月二日的Daily Telegraph)所載的談話，北美合衆國每日要餓死一千人。而他們却依舊不會有國家的失業保險。看咧，這就是自由的勞動之財富！

在蘇聯呢，雖然消滅了失業，但勞動者之國家的保險基金(疾病保險，產婦救濟，

殘廢保險等等的）是每年在增加着。五年計劃的二年之中，我們的社會保險基金，已經從九八〇百萬增加到一五一四萬盧布了。若我們一觀察為改善蘇聯勞動者社會的及文化的生活條件，國家所給予的財政的援助之種種形式（社會保險，純收入之轉用，城市建築物之無債的利用，住宅建築，啓蒙事業，公衆衛生事業，公衆食堂），那末，在五年計劃的二年之中，為勞動者及職員而使用於上述事業的國家的基金，已經從三三七二百萬增加到六五七一百萬盧布，即約增三一九九百萬盧布。而在今年之中，這一基金將增至九六九百萬盧布，即在一年之內，將要增加三一二八百萬盧布。如果現在外國人買收的報紙，還哭喪着臉的高聲說蘇聯的『強制勞役』，則知道上述事實的任何勞動者，都不會相信牠了。我們確信，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最落後的勞動者，也將很快的嘲笑這種資本家的無恥的謠言吧。

五 勞動狀態的問題：在蘇聯，羣衆之勞動精神，不絕地增大着，勞動者及農村之集體經營者的社會主義的競賽，愈益發展着。全勞動者半數以上，已經參加了競賽。衝鋒隊，勞動英雄的成員之數，正在增加。人們應該明白，這正是自由的勞動之果實！但在資本家方面，事情不是這樣。在他們那裏，勞動者對於勞動毫無熱情之可言。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之不自由性一步一步的表現了出來之時，豈難道還有勞動熱情會發生麼？所以這是很明白的，從資本的羈絆中解放出來了的勞動者之勞動，是

每晝與夜那樣，完全與資本家統治下的無產階級的不自由的勞動不同的。

F 基本的區別，結局要確定蘇聯和資本主義諸國間的勞動條件之基本的區別之原因，並不困難了。這個原因，就是在我們方面，權力在於勞動者的手裏，而在資本主義諸國方面，則權在剝削階級的手中。因此，爲反『強制勞役』而由資本的報紙所計劃的反蘇聯運動，反使勞動者遇到政權的問題。

以上所述，就是關於資本主義諸國和蘇聯勞動者狀態之事實。爲扯碎對於蘇聯『強制勞役』的蔑的陰謀起見，外國的勞動者，只要知道上述的事實，已經充分夠了。

這些事實，劃分資本主義制度和正在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制度間之巨大的對立界線，而這個對立又證明對於資本主義是完全不利，對於社會主義是完全有利。

資本家先生們將不後悔事情之這樣的變化麼？以反蘇聯的目的所採用的反『強制勞役』運動，現在不却其全部的鋒芒來反對資本主義的奴隸制了。這對於資本家，真是意想不到的大不幸。但對於勞動者，事情却這樣的便宜。

資本家的報紙，特別賣力的曲構關於北部俄國的森林勞動者勞動條件之虛言。關於那個地區的『強制勞役』，他們真是集了曲構與誹謗的大成。在英國，法國及美國的許許多多的資產階級指導的代表者參加之下，他們掀起了反對輸入蘇聯木材及其他物品之運動，其理由是說這些東西，是『強制勞役』的產物，而且是囚徒勞動的產品。

不消說，他們自以為在擁護『高尚的』道德了。關於這件事，一部是出於無知，但大部分是出於故意的顛倒事實，於是那些可以任人買收的報紙，便怒髮衝冠的描寫蘇聯的各種住民的勞動的條件了。

從這點來看，英國政府的行爲，是應該認爲非常適當的，他發行了一本小冊子，題名爲『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現行勞動法選集』，這本書對於要知道真相的人，至少是能夠提供這種可能的。因爲這本書雖然有些專門，但的確包含着蘇聯勞動立法之原著拔萃，正因爲這個緣故，那惹起一切反蘇聯行動之主謀者，即反動的『晨報』(Morning Post) 竟大放厥詞，直接的非難英國政府，說牠竟發行了一本『實際上沒有價值的』書。很明顯的，這是因爲這本書沒有關於徭務蘇聯『強制勞役』的口實！

他方面，在合衆國那裏，外表上好似爲了『高尚的道德』理由，於去年很急速的作成了一種禁止外國商品輸入的特別法，凡是『囚徒』，或由『強制勞役』之幫助，或以懲罰行爲相威嚇而締結的契約的勞動之產品，一概禁止輸入。最近，參議院的關稅及全體委員會又修改了這個法令，而適用於凡是由『強制勞役』之幫助，或由於法律制裁所締結的契約勞動所織造，生產，製造，運輸，運搬及裝載以及起卸的一切外國商品，都禁止輸入。蘇聯的敵人的目的，要格外起勁的利用這種立法的標準去禁止蘇聯木材之輸入，而自以為這就是擁護道德的方案了。美國資本案，這個全部的外表，却被該

關稅及金融委員會，在上述的修正法令之結末的天真爛漫的條款，完全暴露了。這條款是這樣的：

『這個規定却不適用於下述種類的商品，生產品及貿易品，縱合他們是由強制勞役之幫助或由法律制裁所締結的勞動契約所織造，生產，製造，運輸，運搬，裝載及起卸的東西，即凡是不能充分的滿足北美合衆國的需要供給之要求的一切生產品和製造品，不能適用』。

所以，很明顯的，合衆國的資本家所注意的，並不是勞動條件，是他們的商品之競爭能力。

對於這個『不道德的』修正，資本家的『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都這樣譏笑的說：

『對於強制勞役所生產的商品之恐懼，却由我們的需要而劃分一個明確的界限了。假使國內的生產是充足的話，我們就立刻高興道德的原則作擋戰牌』。

人民可以看出，在美國資產階級的目光中，『道德』和利潤之間，並沒有任何區別。

外國的許許多多的報紙，既然散佈着關於蘇聯的森林事業之『強制勞役』和囚徒勞動之虛言，我們必須詳細的考察事實，作出北方區域的實際的狀況之概觀。初先就

外國報紙常常而且最多說到的森林勞動來說，現時在那裏從事勞動的，有一百三十一萬四千人，都在自由的勞動之通常的條件之下工作着。囚徒的勞動，與伐木工作絲毫沒有關係。

我們絲毫不想把事實祕密起來，健康的和有勞動能力的囚徒，是在城市的及市街建築工作中工作着。過去是這樣的辦法，現在也是如此，將來也要這樣的做。這件事有利於社會。而對於犯罪者也是有用的，因為他們可以由此養成勞動習慣，成為社會之有用的構成員。

讓我們確定的說出囚徒的工作對象吧。

在克雷利鹽地方，囚徒們已經築成了長約二〇八啓羅米達的公路，這是介於凱米與烏且達之間的，又在帕勒獨佛與基且海間築成了長為一九〇啓羅米達的公路。誰都不能爭論，這些路對於我國，是非常逼切而需要的東西。

現在在克雷利鹽開始動工的白海與波羅的海之間的運河，有重大的意義。這條長約九一四啓羅米達的運河，使波羅的海和白海互相連結起來。這一工程，需要很大的土木工作和浚渫工程。現在，工作正在維克海區域進行着。我們的任務，是在最近二年之中，把牠完竣。

這就是在克雷利鹽的囚徒之工作情形。

外國的資本家的報紙，無論他喜歡怎樣悲鳴，我們決不放棄這一工作和使用囚徒來建築這一工程。我們要使即使是囚徒的勞動，也要對於蘇聯的國民經濟有益有用。

在北方區域，囚徒也在從事道路和其他的建築工程。斯基且夫介兒和鳥且達間的三一三且啓羅米達的公路，正在進行，而且已經築成了一六〇啓羅米達。這條路連結着鳥且達縣，那裏正在開掘煤油。此外，囚徒還在從事建築鐵路的工作，即在築成斯基且夫介兒與丕紐間的三〇五啓羅米達長的鐵路。這條鐵路和其一切必要的建築，同樣要由囚徒來建造，現在所完成的，已有九七啓羅米達。這個工作，對於抬高新煤油區域之經濟的意義，有非常偉大的任務。在抬高這區域的經濟價值上，同時在全蘇聯之經濟的向上上，新鳥且達縣的煤油區域之經營，都有偉大的意義。

在這裏所舉的區域之一切工程中，現在約有六萬人在作工。

補充的，再說幾句關於這個區域中的囚徒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的話。在一切囚徒隊裏，勞動日之持續，是八小時。若再顧慮下述的事，即對於囚徒，充分的保障他們之扶養和其他的照顧，而且每月還能收入二〇至三〇盧布之給付，則可知道他們之勞動規準，與自由的勞動者的，沒有多大的區別了。這是一個殖民區域，住民一切自由，沒有任何的衛戍管理他們。而文化的和啓蒙的工作，在猛烈的執行着，書籍和雜誌，已經購就了許多。職業的教育，在北部區域，一九三〇年已經包括了一萬人。資本

主義應該自己去差死，因為牠之無數的失業者，現在不得不羨慕在我們北部區域的囚徒之勞動和生活條件！這是外國的勞動者，將要經驗的酸苦的真理。

看吧，『強制勞役』和囚徒，在採伐木材上並沒有任何關係，而且一般地，與輸出物品，絲毫沒有關係。所以，任何反蘇聯運動和反『強制勞役』運動，都不值一駁的。

關於蘇聯『強制勞役』的童話，現在已經是終熄的時候了。我為住在蘇聯的外國國家的代表者和外國的報紙的代表者，在使這種童話終熄上，是能夠給予貢獻的。

在外國方面，為『調查』蘇聯狀況，要組織特別的國家的委員會，這種企圖，蘇聯政府早就聲明不能承認，這是自明的。因為這種企圖，在其想實現單方面的性質的計劃之時，要與國家之整個主權相抵觸，所以不能承認。只有被征服國家，纔會忍受征服牠的國家之單方面的建議強制的執行。凡是自主獨立的國家，誰都不願意允許這種單方面的『調查』。住在莫斯科的外國國家及外國報紙的代表者，他們在我們國內是以自由行動的，假使他們願意的話，他們本身本來早就有機會可以確信，國外關於蘇聯『強制勞役』之卑鄙醜聞的虛言，是散布得何等之多。假使他們之中，有人感覺有知道這件事（即強制勞役和囚徒勞動等——譯者）之必要，那末，只要他訪問一次這些地域，就可確信，凡有關於輸出商品和木料輸出的勞動，絲毫不與囚徒勞動有些關係，而同時更可確信這與強制勞役，也沒有絲毫的關係。假使他能這樣，他同時還更能確

信，在蘇聯內部，事實上的確實行着這個原則，即爲十月革命所宣告，而早記述在『勞動羣衆權利宣言』之中，更爲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第五次蘇維埃聯邦會議所採取的這個原則：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宣布勞動爲共和國一切公民之義務，且昭示誰不作工，誰就不應喫食的標語』。（喝采）

這個『誰不作工，誰就不應喫食』的原則，與資本家的秩序，立於直接的對立地位。在資本家的世界裏，統治階級的不勞動的屬員，享受着世上的一切歡樂，而實際的勞動羣衆，則過着饑餓生活，甚至一片麵包都被掠奪盡了。在資本家那裏，當現在失業巨大的增加之際，却有不同的原則存在着。即『誰作工，誰不能得食』。在我們國內，反於此實行着無產階級的原則，因此，從前屬於富裕階級的上層的人們，現在也都有勞動的義務。勞動者歡喜那一種原則，我們可以去問他們，可向任何國家的勞動者去詢問。假使真有調查之必要，那末，在平等權利的基礎之下，我們願意任何外國的勞動者的代表者，只要是勞動者自己所選出來的，到我們國家來觀察我國的勞動條件。假使不是勞動者自己，又誰願對於我國或其他國家的勞動條件，發生興味呢？或許那些想把事實的真相，告知給外國的勞動者人們，來調查我們的勞動條件吧？那末我們只提出這樣的要求，即在平等權利的原則之下，對於我國的勞動者，外國的國家也

應承認有舉行這種調查的可能（喝采）。我們預先聲明，對於我國的勞動者及外國的勞動者，在我們國內及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實行調查的結果，所得的一切材料，我們將用我們充分的援助，去保證牠之無例外的公佈。（喝采）

但是我們疑惑，這個提議是不是能得到那些人的採用，因為直到如今，他們還在散佈着關於蘇聯『強制勞役』的誹謗。他們的目的，本不在使事實的真相顯露出來。他們的任務，寧是在製造反蘇聯的敵對態度，而準傳對蘇聯之攻擊。

C 干涉蘇聯的準傳

關於準備干涉的工作上，不僅有上述的反蘇聯運動，還有其他的事實。

干涉之一個預兆，是愈見增多的經濟同盟之組織。

反對輸入蘇聯商品之運動，真是以稀有的情熱在執行。上面所引用的事實，即美國的特別法及其追加法令之外，還有英國保守黨的關於這個方面之強硬的壓迫，都是這種事實之明證。在法國，反蘇聯之行動，格外來得狂暴。只要指示出一九三〇年十月三日的宣言，就足夠證實這件事了。在法國控制之下的反蘇聯的進攻路線，已經在若干國之中實現化了。這已成爲周知的事實。這種進攻政策的意義，只有這樣：即組織反蘇聯的經濟同盟。

法國和英國的坦白的帝國主義者，已經不害怕直接的說出反蘇聯的經濟戰爭之話了。

。所以不久以前在英國所發表的『保護貿易之聯合』的號召，明白的說出在反對共同敵人的，即共產主義。經濟戰爭中，有組織『統一戰線』之必要，而指導者，正是有名的勃崙福特卿（Lord Brentford，即 Joyuson Hicks）。在目前的情勢之下，經濟同盟之組織，是干涉蘇聯準備中之一個重要的因素。

在反蘇聯戰線的方向上，所謂歐洲委員會，演着顯著的角色。這個會是由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氏所發起而成立的，其目的在於創造反蘇聯之歐洲的國家同盟。白里安及屬於法國的諸國代表者，盡力的反對邀請蘇聯參加所謂『世界恐慌研究會』的五月會議，表示了歐洲委員會之領導者，懷抱一定的目的，要使這個組織變成爲準備攻擊蘇聯之大本營。不管邀請蘇聯參加歐洲委員會的會議之說明，是怎樣的曖昧模糊，但是蘇聯政府仍認爲有參加的必要，爲的是要在其時其地，究明這個組織之計劃和目的，使我們明白，我們的代表在會議中所必須採取的態度。無論以白里安爲首班的歐洲委員會之領導者，怎樣的努力封閉『外人的』，特別是蘇聯的眼目，以便貫徹他們的工作，但是人們可以洞見所以下的事實，即歐洲會議的五月會議之預備工作，所願以製成的三個附屬委員會，並沒有招待蘇聯的代表者參加。我們的代表者必給在五月會議中，表示更加偉大的布爾塞維克的炯眼和訓練。我們要用加倍偉大的精力，暴露出一切反蘇聯的陰謀——人們現在在想利用歐洲委員會來實行這種陰謀。

爲指出人們在撤廢軍備這種巧言花語的背後，怎樣的繼續作準備新帝國主義戰爭和武裝的攻擊蘇聯之頑強的工作起見，我們必須論及廢軍會議之準備委員會的結果。雖然蘇聯的代表者，爲貫徹實際的撤廢軍備而提出種種的建議，但是委員會始終固執作其完全不同的『工作』，——假使『工作』這個字在這裏可以使用的話，——一意專心的以口頭上的廢軍，去隱蔽熱病的軍備擴張。

準備委員會之存立，已經有四年之久，但在這期間，帝國主義諸國家的軍備，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非常增大了。在『廢軍』委員會這樣久長的存在之時期內，新的帝國主義的戰爭之危險，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成長了許多。準備委員會已經完全踏入了法國代表團要驅入他們的路途，而法國正是現在歐洲之最希求並歡迎戰爭的帝國主義的國家。這個對於和平的利益沒有絲毫共通性的法國的態度，而且得到英國和北美合衆國之全部的支持。波蘭和羅馬尼亞的代表，在拒絕減縮現在軍備之任何的建議上，表示了他們之特別的積極和熱心。和其他的代表取着不同態度的，是日本的代表，他們始終隱蔽着對於澈廢軍備之公開的反對態度。意大利的觀點，在根本上是被這樣的努力所決定的，即牠的武備不願比任何其他的大陸國家，即法國，劣等一些。德國在準備委員會中，採取了特殊的態度，他們有權利宣言，德國武裝的禁止，應該作爲一般的廢軍之開始看待。但是，現在在歐洲佔着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之代表者，是不願回

憶這種事情的。

廢軍準備委員會的最近會議的工作結果，在其建議和說明的報告中，已經到了失敗的地步。牠們的歸結是這樣的，即放棄某種軍備之任何的縮減，而承認他種軍備之保持現狀及其擴大。由美國代表之動議而採用了的提案本身，是對於廢軍思想之最好的嘲笑，這個提案要求承認每個國家，有下述的權利，即每一國家，當牠發見有威嚇牠的事情發生之時，牠可去棄條約所規定的軍備標準，不過這時候，牠必須知照參與該會議的其他國家，使牠們也有機會去增大牠們自己的軍備。

這一切事實，使蘇聯代表決定的從準備委員會的工作分離出來，而公然的暴露廢軍準備委員會的活動之完全無效。

最後，國際聯盟會議決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招集國際的廢軍會議；事實上為廢軍和一般的和平而努力的人們，對於這個會議，不能懷抱任何的幻想了。這是很明白的，為在必要的場合，能夠熟知擴張軍備起見，同『廢軍』委員會差不多同時的，至少在不妨害其工作以內，發生了如倫敦海軍會議那樣的種種會議，或者像現在進行的那樣，幹着祕密外交的交涉，而這一切，都是為決定軍備上的最逼切的事情而舉行的。新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準備，在一切徵象上，決不因此而感覺困難或受到延遲。

至若關於蘇聯，則牠之參加廢軍會議，只在此種會議，實際上真為撤廢軍備，或至

少是爲真正縮減軍備而努力的範圍以內，纔去參加。所以這裏，我們應當警告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我們決不承認會議前或在會議中，沒有我們參加及我們的缺席中所通過的一切決議及條約之強制我們的執行。

到現在爲止，所有一切關於撤廢軍備問題之資本家國家的委員會及協商之無結果，及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之新式軍備之迅速的進步，表示這些國家，對於實際的鞏固和平，根本沒有興味，反而爲準備並進行新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採取一切的手段。而在這裏，反蘇聯的戰爭又立在最尖銳的地位。

在法國，俄國白黨正在公開且組織的進行着向蘇聯宣戰的運動。去年夏，由梁蒲辛斯基（W. Kjaluschinski）氏在報紙『佛斯羅西狄尼』（Worioschedenje）上所發表的論文『必要的戰爭』，已是大家周知的事情了。現在的白黨亡命者梁蒲辛斯基氏，就是從前庫庸洛夫（Ojulow）製紙工廠的經理，莫斯科銀行的一個經紀人，莫斯科商人階級的代表者，又是其他類似的機關的所有主。莫斯科勞動者和其他的人們，一定還熟記着那些像梁蒲辛斯基一類性質的商人，這些大資產階級。現在梁蒲辛斯基的事業，非常的淒慘，除了挑發儘可能急速的攻擊蘇聯之外，他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希望了。梁蒲辛斯基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他觀察反蘇聯戰爭，也純粹從資本家的利潤觀點出發的。在以反蘇聯戰爭爲立論中心的那篇『必要的戰爭』論文中，他這樣的寫着：

『世界上沒有比解放俄國這件事，在經濟上更有權而有利的企業。人們在投下一千萬盧布資本之後，至少能收得五千萬盧布，換言之，一年的利息為百分之五百，而且每年更有收得百分之百至二百的利潤之前途。人們能夠找出一個比這更有利的事業麼？』

破產的商人梁蒲辛斯基，是這樣『意義深長的』思索着人類，而他在這裏所指的『人類』，當然是指商人階級。他是這樣的用他可笑的計算，唆使外國的資本家去進擊蘇聯。

今年年首，我們更讀過將軍米拉（Miler）的大定此語的宣言，他是在外國的白黨軍事部分的一個領導者，他最喜在報紙上濫說他的種種計劃：

『關於開始戰爭上，我們已經有充分的準備。我們只等待着有利的國際的事變和財政的援助，要想顛覆布爾什維專政的某強國，已經允許給我們以這種援助』。

不消說，白俄將軍之這種蠢笨不過的大言壯語，連爛腐梅子的價值都沒有的。不過這裏值得注意的，就是像梁蒲辛斯基，未勒及其白俄記這些『人們』的存在，而且現在他們都是法國的食客，所以如果我們說到威嚇和平，特別是威嚇蘇聯之和平的發展時候，這是不可輕輕看過的。

關於干涉蘇聯這個問題，現在已經不是遠在將來的問題了，這件事我們在不久以前

，在周知的莫斯科的『實業黨』審判事件之闡明上，已經指示過。從外國的干涉行動者及巴黎『商業委員會』的直接幫助及其一切梁蒲辛斯基，柯佛落夫，田尼索夫，庫格索夫等等，陳述中，說出已經準備在一九三〇年，至遲也不出一九三一年中舉行干涉，這事現在也已經周知了。同樣的口供，現在更在孟塞維克的干涉犯人，格羅邁，時沙諾夫，雪爾等等的事件上，得到實證了。干涉的準備，直到現在還在進行，而且更要繼續下去。

我們的敵人打錯了他們的算盤。他們的事業，因世界恐慌關係，極行惡化。而我們呢因爲五年計劃成功的關係，本質上一切都改善了。近年以來，蘇聯的權力，根本的成長增大。我們繼續幹提高我們地位，同時並幹增強我們的紅軍之工作。我們熟知我們將一天一天的強大。（喝采）

但是我們要牢記着 人們要在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〇前向我們挑戰。一九二九年夏的中東鐵路奪取事件，無條件的是一種試金石。我們的敵人，在當時已經要用他們的槍礮來測驗我們的力量了。誰都不會疑問，這次事變，不僅是中國的這個或那個軍閥的進攻蘇聯，而且是他們的後台老班，即更有力的外國帝國主義爲的國家進攻蘇聯。那時的進攻蘇聯是失敗了。工農紅軍表示了他自身是情勢的主人翁。（喝采）

用加緊工作去提高社會主義的經濟及鞏固國家的防衛能力，在爲獲得一般的和平及

爲蘇聯之和平的發展條件而進行決然的堅定的鬥爭之際，我們必須固守我們的態度，使我們的敵人不敢正眼窺伺我們蘇聯。（喝采）

3 蘇聯與帝國主義諸國間的關係和我們爲和平而鬥爭。

在與第五次蘇維埃大會的時期相比之時，蘇聯對資本主義諸國的關係上，確有一種轉變，而且是在公開的相對的增大這個意義上。這一結果，如我在前面說過的，是從蘇聯和資本主義的周圍之階級力量變化上產生出來的。

但是不管資本主義諸國的統治的資本家階層之中，怎樣的增大了明白的干涉蘇聯之情緒，蘇聯依舊把持着爲維持和平之有效的鬥爭。蘇維埃政權享受着正在增大的支持，這是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者羣衆給予牠的，同時牠更依靠着國內經濟的力量和防衛能力之增大，這一切加強牠在國際間的地位，而在這方面，無疑的獲得了不少有意義的成果。

資本主義周圍與蘇聯的關係之一般的及基本的傾向，雖然由牠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國家之增大的憎惡，和對於我們的成功之增加的不安所規定，但是，人們不應忽略若干的國家對於蘇聯之關係是有區別的。蘇聯爲鞏固和平，雖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與二三的國家之關係，如法蘭西——波蘭更無論矣——始終不能得到改善的狀態，他方面，

英國保守黨在前次國會選舉之失敗，生起了英國政府之更換，使大不列顛與蘇聯間正常的外交關係恢復起來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之利益，實與他國保持和平的關係，及發展蘇聯與這些國家間的貿易關係，不可分離。這種任務，鞏固和其他國家的和平關係與經濟的連繫的這種任務，是過去時期中蘇聯對外政策之實際的基礎。

世界經濟恐慌，不僅使舊的各種對立尖銳化及深刻化，而且還根來了新的對立。恐慌使支配的資本主義集團中的有些國家，利用一切人工的手段，即關稅政策，來禁止商品等等的輸入，以排除蘇聯的輸出品，但也使有些國家，特別是那些大量的輸入到蘇聯去的國家，不可避免的發生了要和蘇聯鞏固經濟關係之傾向。在資本主義的有些國家中，開始了明白的企圖，想在驅逐蘇聯輸出品上佔較優越的地位，結成經濟同盟，而組織武裝進攻蘇聯之準備。在其他的國家，牠們需要蘇聯的原料，特別需要對於牠們輸出品有重大意義的蘇聯市場，這種國家，正在努力，想在經濟問題上和蘇聯取一致的行動。世界經濟恐慌，決不緩和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的現存的各種對立。因此，企圖在進攻蘇聯上結成統一戰線這件事，現在也遭遇到重大的困難。在為維持和平的鬥爭中，在為鞏固對其他國家之和平的關係的鬥爭中，蘇聯反覆的表示了牠自己之堅決而非常堅強的態度。即在將來，蘇聯也要繼續這個政策，因為鞏固和平，不僅是我國的勞動者及勞動羣衆之利益，也是一切國家的勞動羣衆之利益。

關於我們和各個國家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在這裏我想只說幾句話。

先說和德國的關係。自第五次蘇維埃大會以來的最近二個年頭，我們可以把牠分為二個時期。第一時期是一九二九年末及一九三〇年初終結的。在我在蘇維埃大會所講的這本小冊子上，對於如下的事實，我是不能默而不言，即我們最爲可惜的，是德國政府及其公衆，在我上述的第一時期中，被反蘇聯的「十字軍」的波浪所牽連，因而一時的危害了俄德關係之鞏固和發展。但自一九三〇年中夏以來，蘇聯與德國間的關係，進入了較爲有利的方向，這是我可以斷言的。關於蘇聯的德國外交政策之根本路線，近來是親善的協動路線，是使經過九年長期試鍊的關係鞏固起來的路線，而我們也深信，爲雙力的利益起見，爲維持和平的利益起見，我們能夠而且必須發展這種親善關係。德國實業界領袖的代表之來我國，是互相諒解更進一步的證明，使德國的領袖們更深知俄德經濟關係之重要性及其價值。我更預說出我的確信，這些代表之來訪俄國及其他直接的與蘇維埃工業領袖們的交涉，得到了順利的結果，將使我們經濟關係之基礎，更形鞏固起來。

我們與意大利的關係，最近二年來，有正常而一般的順利的進展。關於通商關係，亦有相當的進步。去年夏（八月二日）所締結的條約，創造出我們可在意大利擴大購買的前提條件，依照這個條約，意大利政府保證我們，凡是我們國家的機關在意大利

預定貨物之際，可以利用長期的信用。這個條約在不久以前，祇有一種預期，但是現在已經實行締結了。同時，我們以為意大利對於我們的輸出品，如樟腦，穀物，煤炭，木材等，有很大的利益。我們與意大利經濟關係之發展的經驗，是一個最好的證明，表示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有互相利用通商關係之可能性，即令在社會政策的體系上有絕對的對立怪存在着。

俄意關係之順調活潑，使蘇聯外交委員李德維諾夫與意大利外交大臣格蘭第之間，為交挽意見而得到一個會面的機會。因為現在，資本主義諸國創造一種反蘇聯的同盟，這對於和平是一個最大的危險，在這時候，無論那種國家之接近蘇聯，對於和平都有偉大的貢獻，何況是意大利那樣重要的國家之接近蘇聯？

蘇聯和土耳其的關係，近時更見鞏固了。蘇聯的代理外交委員同志加拉享，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訪問土耳其，及關於蘇聯與土耳其間的巴黎條約，再行延長二年的俄土議定書，已經在安哥拉簽字。這二件事，證明兩國關係之鞏固。在補充巴黎條約的條款上，安哥拉議定書更擴大二方的義務，使二國應守下述的議定，即二條約國中一方要與隣國交涉之時，必須通知其他的一方，然若不得其他一方的條約署名者之諒解，則不許與這隣國締結任何的條約。一九三〇年丘的克，魯西弟，貝（Tevfik Ruschdi Bey）之訪問蘇聯，使蘇聯和土耳其之外交政策的領袖之間的個人的接近，更見鞏固，

而這又是二國親善關係之一個新的證據。

土耳其與蘇聯之經濟及文化的關係，更有發展。在過去時期中，開始了關於締結俄土兩國通商條約之談判，且將在最近期內簽字。因此，土耳其與蘇聯間的親善關係，已經有全般的鞏固，且更可擴大到各種方面之合作。

今天我們接到了關於俄土條約已於昨日簽字的安哥拉的電報。這個條約的規定上，二締約國有互相通知六個月來關於黑海艦隊之新的計劃或正在建造的船隻之義務。很明顯的，這樣的條約并不能變更我們撤廢軍備的提議，但在目前的情況之下，這條約是二國互相親善之一個新的證據。

關於我們與大不列顛之關係，如我所說過的，自第五次大會以來，有很大的變化。一九二九年的保守黨選舉敗北，同時就是他的反蘇聯外交政策之敗北，蘇聯和英國，對於牠們相互經濟關係之發展，同樣都有利益。在這點上，現在已經有相當的結果。第一，在我們相互關係之正常的年度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中，英國輸入蘇聯之物品，由去年之九九一二〇〇〇鎊士底林（Sterling），增加到一五三九五〇〇〇鎊士底林了，即增加了一半。我們有使我們與英國的經濟關係，更加發展之必要。在這裏還須說到下述的一個積極的事實，即現在倫敦正在開混合的英俄輸出委員會，調查相互的物質的要求。

但是我們必須估計次的事情，即英國國會及一部分英國報紙，是不斷的最顯明的反蘇聯運動之大劇場。某一部分的人物，尤其是保守黨，為破壞英俄關係之存續，無論什麼手段都會採取的。蘇維埃政府因此必須警告蘇維埃大會，我們對於英國內的事情之發展，有特別的注意之必要，因為那裏是反蘇聯運動之最尖端，有干涉蘇聯之準備運動上最有勢力的保守黨的領袖及英國之從前的閣員。這個黨及這些人，若實現了他們復掌政權之努力，則和平問題，無疑的將成為議事日程，因為在英國這些帝國主義的社會層中，那些干涉蘇聯之新的直接組織者，將必然的變為新的世界戰爭之直接組織者故。

我們對日本的關係，也在親善和雙方必要的諒解之更行鞏固的方向上發展着，這一基礎，是北京條約放下的。

我可以滿足的這樣確說，即在條約簽字以來的過去數年中，特別是最近兩年來，日本與蘇聯之間，不曾發生過任何政治上的衝突。通商關係，同時且有重要的發展，蘇聯和日本間的貿易，在其範圍上，已經超過四倍。

由實行漁業讓與權而引起的爭論問題，已經解決，我們確信，即在將來，也能站在親善和確守條約的觀點上來解決這個問題。某些孜孜於利益的追求的企業家團體之蔑視規律和蘇維埃法律之個別的企圖，蘇維埃政權自然要排斥的。

兩個利益之相互的尊重及適合於條約的義務之嚴重的遵奉，是我們二國親善關係之更加發展之基礎。

我們對波斯的親善關係，也沒有什麼變化。我要說的，是我們對於締結蘇俄和波斯的通商條約，已經開始談判，這將貢獻二國關係之鞏固。

對於阿富汗的關係，蘇聯政府始終站在鞏固親善關係及阿富汗之獨立自主的觀點上。我們對於阿富汗的關係，現在的發展，非常正常。我可以說，同阿富汗的經濟關係，是在有計劃的發展着。兩國皆已認識并承認有締結通商條約之必要，事實上也已開始談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估計我們與阿富汗的相互關係，有更加增大和鞏固之可能。

至於與法蘭西的關係，已經在上面說了很多，且不久之後，我將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中，在我的小冊上來闡明這個問題。總之，一直以來，沒有根本的變化。

在近來的反蘇聯運動上，法國的領袖界，演着特別的任務，已是周知的事實了。法國政府之反蘇聯的態度之特別的敵意，人們可在白里安的最近的會談中去看取的。據『麥丹』(Madin)的告知，白里安馬上會拒絕內閣之首席地位，爲的是仍要做外交部長而集中全力來幹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鬥爭，因爲『白里安非常苦惱，布爾塞維克主義倒反能利用嚴重的經濟恐慌，使世界完全在其支配之下』。(Madin, 一月六日)

同時在最近二年中，我們在法國的我們通商代表和經濟機關的工作，都遭到了非常的困難。我想起我們都熟知的反蘇聯的事變，都是從世界的各方到巴黎來的一切種類的灰黑色人物之告訴所挑發的，而法國的裁判所常常是滿足他們對於經濟機關之虛偽的請求。而且法國的裁判所，絲毫不梭巡的支持那些反蘇聯的告訴者之虛構和偽造。

除上述的一切之外，留下來要說的，就是關於與法國的關係之詳細的說明。很可惜的，我們必須說出俄法關係的領域上，實在橫梗着對於世界和平非常嚴重而重大的危機。法國政府對於我們提議締結非攻擊條約之事，總是加以拒絕的，好像排除戰爭危險一事，對於法國政府，沒有絲毫利益一樣。不管怎樣，只要我們能夠看到法國方面，也有鞏固俄法關係之正直的用意之時，我們始終準備為鞏固俄法關係而繼續努力。

蘇聯與波蘭之間的相互關係，可惜終是不能如意。雖然波蘭已經對於有名的莫斯科議定書加以簽字，但對於蘇聯政府幾次三番的鞏固俄波關係之提議，始終沒有必要的反響。他方面，我們不得不向其直接的鄰國喚起注意，波蘭在廢軍準備委員會之最後三次會議上，非常頑強而積極的參加下述的活動，即拒絕俄意及其他關於事實上限制軍備之提議。

在我們與波羅的諸國的關係上——立特蘭·伊斯特蘭及芬蘭——近來沒有什麼變動。不過反蘇聯的其餘列強的影響，對於這些國家的政策之壓力，並不算少，這是應該說

及的。

同立陶宛和坦占希 (Sarnie) 的關係，非常順調，而且有組織的改良了。

和瑞典，挪威，丹麥和奧國的經濟關係，都能正常的發展着。

希臘是巴爾幹諸國中唯一與我們有親交的國家，自從一九二四年以來，兩國就開始了正常的親善的關係。所以我以為有把五次大會以來的蘇希二國關係之發展和鞏固的事實，特別提出來的必要。

又我們與黑却斯 (Hedschas) 及葉曼 (Zernen) 的關係之發展，今可特別的提示出來。

在目前，我們沒有詳細的說到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之必要。誰都知道，為我們蘇聯的羣衆所熱情支持的那個合理而堅決的和平政策，幫助我們能於最短期間，消滅了中國軍閥之發狂的冒險行動，並充分的暴露了帝國主義諸國之挑戰的進攻，牠們到最後的瞬間為止，都還企圖破壞爭端之和平的解決。不管英法美三國政府，懷抱那種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的宣言內所表示的企圖，但是中蘇爭端已由直接的交涉和伯力會議之簽字而得到如次的決定，即承認蘇聯在中東鐵路及滿洲方面，恢復爭端以前的狀態。

我們希望中蘇會議的工作，能夠得到有效的終結，同時我們要用極大的注意，監視我們敵人的陰謀，暴露他們一切有害於蘇聯及中國民衆之挑戰的及敵對的活動。我們

認識了我們有準備抵抗凡是損害極東和平之一切嘗試的必要。（喝采）

和蘇聯還沒有正常的關係的國家中，我們還須說及北美合衆國。

不管兩國的通商關係，有不斷顯著的增大，尤其是合衆國對蘇聯輸出之增加，然而合衆國資產階級之冒險的分子之影響，却也愈見成長，他們對於蘇維埃的一切東西，對於無產階級的一切東西，始終抱着野獸的憎惡。我們只需指出美國議會中的費舒委員會就夠了，牠的無知的虛偽的罪科加諸我們的經濟組織而獲得了悲哀的名聲，更且負擔着創造統一戰線之某種任務，聯合歐洲的諸國，準備結成反蘇聯的經濟同盟及武裝干涉。統治階層對於克服美國資本主義的恐慌之無力，和想迴避擔負勞動羣衆之強大的痛苦的責任之努力，纔使費舒及其同伴們能夠扮演此少政治的任務。但若費舒及其他的反蘇聯的活動進展到事實上禁止蘇聯向美國之輸出這個地步，則合衆國必須估計到下述之事，即美國向蘇聯的輸出，將不要避免的受到影響。

如果我不再說到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現在在我們的表象裏，與其說是接近近代生活毋甯說是中世時代的遺物——那末，國際的生活之畫景是還不能說完全的。這國家是什麼？這就是范鐵幹（Vatikan）——羅馬法王的宮殿）。他近年來企圖參與國際的生活，當然，他是爲保護資本家和地主，爲保護帝國主義者，爲保護製造干涉及戰爭的張本人而企圖參加與的。誰都知道，天主教的教父是慣於參謀部的偵探工作的人們

之中選出來的。現在這些先生們每日熱情祈禱的，並不是『爲全世界的和平』，而是爲資本家先生們的委任及其金錢而組織反蘇聯運動。當近來羅馬法王自身立在反蘇聯運動的最先端之時，在英國的卑鄙醜陋的反蘇聯運動之中，不難有江端蒲利（Canterbury）大僧正其人，在他方面——也同樣是反對勞動者農民兵和國的政治的運動——有德國的杜爾海姆的大僧正，這一切是不難理解的。

我們偶然得到了樊鐵幹的非公式的代表者，奧國的維達來（Vidale）先生的報告。這個先生，從前是奧國的陸軍上校，正在展開他的計劃，想在維也納召集一次國際反布爾塞維克大會，羅馬法王之這個代理者的主要目的，是在要求進攻蘇聯的準備。在上述的文件中，這樣寫着：

『反布爾塞維克的鬪爭之意義，就是戰爭，這個戰爭必然要發生。……因此，現在已經沒有時間，也沒有餘地，再來研究怎樣避免這個戰爭的方法；現在是需要集中精力，來消滅這種沒有希望的和平幻想。』

在他開展了他的詳細的，但是頗爲簡樸的反蘇維埃運動的計劃之後，這個奧國陸軍上校出身的政治家，這樣寫着：

『假若事變的發展，到了宣告經濟絕交及實行上述的政治的手段（破棄與蘇聯的關係，在押收在外國的蘇聯財產之際，提出一切可能的要求），那末，不可避免的

結果就是以軍事的手段來進行反布爾塞維克的鬥爭了。』

在這文件中所展開的『聰明的』計劃，是以從前的白軍烏拉艾爾（Wrangel）及裘台尼基（Judenitch）為掌腰的，同時也以『為這目的，不難召集的數百萬在歐洲及美洲流離着的失業者』為掌腰的。至關於徵收金錢，則最大的希望是依靠『聖父』的屬附，依賴『大地主，金融家，實業家及國家的高級官吏等富裕人們的』屬附，在這些人們之中，特別可以舉出來的，是丘且爾（Churchill），弗蘭丁（Flandin），格耶達（Gaidar）及蔣介石等等。

樊鐵幹的代理者，是這樣很用心的計劃着。這就是『聖父』在準備新的世界大屠殺及攻擊蘇聯之際所扮演的角色。

關於國際情勢和蘇聯與諸外國的相互關係之概觀，我就以此為結束了。

所以，在這一報告期間內，力量關係在國際的規模上有重大的變化。最重要的是在國際的關係上，蘇聯演着重大的任務這個不可疑問的事實。因此，二種基礎的社會制度——資本制度和蘇維埃制度——間的對立，也一天一天的愈見尖銳化了。當作一個自由勞動的國家，當作一個自由勞動羣衆之真的政權，當作一個為鞏固一般和平及解放資本主義恐慌的羈絆中的勞動者的利益之真實的保護者的蘇聯，牠的國際的意義，是在一天一天的增大着。

這一切喚起帝國主義憎惡蘇聯的強度。蘇聯越是精力的爲和平而鬥爭，同時在其間地愈將加強社會主義建設之經濟的基礎，那末，攻勢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圈，必愈益熱病的進行干涉蘇聯及破壞一般和平的準備。這個帝國主義的政策，是以我們的五年計劃爲目標的；因而資本主義的周圍諸國，不惜任何犧牲，總以破壞五年計劃爲其直接的任務。

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標語，過去和現在都是以鞏固和平爲口號的。蘇維埃政權是和這個口號同時誕生的，雖至將來，牠亦將爲這個口號去堅決的鬥爭。當然，牠將反抗外國干涉主義者的一切和各種的企圖，並防壓『商工委員會』及其在蘇聯內部的反革命的代理者的一切活動。

爲蘇聯之和平的發展條件而鬥爭，是不可分離的和爲一般和平而鬥爭有關係的，因此是與他國鞏固兄弟的關係這件事，不可分離的。爲和平而鬥爭之意義，在現在的條件之下，就是直接爲反對現在準備中的反蘇聯的干涉行動及反對帝國主義的煽動者而鬥爭。我們明白的告訴蘇聯的勞動民衆及全世界的勞動者：威嚇和平的事情，正在成長。我們同時表示我們堅定的確信：武力的進攻蘇聯，現在對於那些敢冒破壞和平及襲擊蘇聯的國家，是一個主要的危險。（熱狂，久續的喝采之聲）。

（第一部完，全篇未完）

國民會議上蔣介石說些什麼？

秋白

——『天下烏乎定？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唯嗜殺人者，

能一之！』——改孟子

一

中國地主資本家的國民會議開會了。南京政府的主席蔣介石長篇大論的發表了一篇『訓詞』。你看他說些什麼東西？

第一，他首先就說：他遵照總理遺囑『毅然清共』。不錯！因為孫文的遺囑上面寫着『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喚起民衆……』，所以他，蔣介石不但要毅然決然的和蘇聯絕交，屠殺蘇聯外交人員，並且要大大屠殺共產黨員，工人，農民貧民羣衆。這表面上彷彿衝突，其實，一點也不，——那遺囑是鮑羅庭假造的，當孫文畫字的時候，口氣正喘不上來，隨手簽着，一面用腳指頭在牀畫『不，不不』三個大『不』字。所以誰能夠首先執行遺囑文字的反面，誰便是孫文的真正忠實信徒。蔣介石特別在這

點上首先來演一折『丑表功』，也是當然的事。

第二，蔣介石及一切國民黨殺戮工農民衆之外，第二件功績，便是屠殺兵士羣衆，實行混戰。所以蔣介石接着說：『自國民革命軍北伐迄於討伐馮閻軍事告終，就革命將士之死亡者，已達三十餘萬人，傷且倍於此』。總計死傷一百萬人，這是他自己的供狀。而且他說（請譯成通俗的白話文吧）：『凡是這些空前重大的犧牲——死傷的一百萬人，都是這次統一和平的代價，我們全國同胞……對於這一百萬已經死傷的兵士，應當深刻的去認識他們，應當一致的去愛護他們，盡全力去保障他們！哈哈，我們一百萬死人和殘廢的兵士，都是軍閥地主資本家自相爭奪的犧牲品，承你蔣主席的大面子，等我們死了傷了，再來『認識，愛護，保障』我們，我們毫不願意留在陰間十八層地獄了，請蔣主席高招貴手，把我們從棺材裏拖出來再活幾年，把我們斷了手脚再裝上去多享享你的『認識，愛護，保障』的福氣吧！』

二

蔣介石屠殺了工農兵士三四年之後，又正在進攻紅軍和蘇維埃區域。——這紅軍和蘇維埃區域，以及全國的蘇維埃運動，正是反抗屠殺的偉大的革命運動。因此，正在這個時候，蔣介石（以及汪精衛陳獨秀托洛斯基）要號召國民會議，遵照烏總理遺囑，

用國民會議來抵抗工農兵會議（蘇維埃）。

蔣介石報告他這兩大功績——殺工農，殺兵士之後，就對着這國民會議大談其國民黨的政治『理論』了。屠殺政策的軍政時期，據說是過去了。其實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到處正在進攻紅軍，屠城燒村呢。蔣介石當然『不管』這些小事，他說現在訓政時期開始了。訓政時期是什麼？他說這和共產主義不同。當然大不同呵！他說共產主義認為無產階級應當把國家據為己有，『以消滅其他階級，待其他階級消滅淨盡，乃可同歸於共產社會，國家亦將從此消滅。故一黨當政的國家而階級鬥爭反更殘酷，消滅反對者之過程，雖列寧亦難為之預期，但斷其必久。此種殘酷手段，尤不適用於中國產業落後情形及中國固有道德』。哈哈，列寧倒比你們國民黨的蔣作賓也不如了嗎？蔣作賓最近經過俄國，報告說，『俄國商人已消滅盡淨……』而且五年計劃的實行，集體農場的進行，不久要將大部分農民小資產階級都轉變成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的確把大商人資本家富農，認為是無產階級以及農民的敵人和『反對者』。但是共產黨從不把農民羣衆認為自己的『反對者』的。俄國無產階級能夠領導一萬萬以上的農民羣衆，共同合作的建設社會主義，所以不到十五年，已經把地主資本家商人都消滅了，現在正在消滅富農階級。當然，哼，俄國沒有『中國的固有道德』——『仁愛的皇帝和孔夫子的道德』。所以蘇聯政府消滅反對者是『很殘

酷的』，譬如，最近反革命的實業黨及孟塞維克的領袖被捕之後，還化了三四個月的偵查審判功夫，有些判決死刑之後（這在蘇聯是『非常的刑罰』），還給他們特赦，改爲終身監禁。這是多麼『殘酷』呵！看『咱們』的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三民主義的中國！這裏『沒有』階級鬥爭！而天天中外工廠主巡捕警察包探工頭打，殺，壓迫，剝削工人！這裏『沒有』階級鬭爭！而天天地主紳士土豪打，殺，燒，宰割，壓榨農民！地主資本家的政黨——國民黨，帝國主義走狗的政黨——國民黨，爲着『消滅他的反對者』——革命的工農貧民共產黨員起見，天天把他們任意逮捕，非刑敲打，槍斃，砍頭腰斬，火燒，活剗，零割，挖奶，掘陰，斬成肉醬……，用大炮，機關槍，飛機，開花彈，毒瓦斯去屠殺他們。國民黨除掉殺死『國民革命軍』兵士一百萬人以外，這樣殺死的工農貧民以及紅軍兵士，至少也在二三百萬以上了。這是多麼『仁愛』呵，多麼『不殘酷』呵，這是文武周公孔子孫文戴傳賢蔣中正一脈相傳的道德呵，這是『中國的固有道德』呵！

自然哪！你們貴國——地主資本家的中國國民黨的訓政時期，是和共產主義不同的，絕對不同的，沒有一絲一毫是相同的！！

據蔣介石說，國民黨的訓政時期和『自由民主主義』的議會政治是不同的。真的不同麼？他說：自然，『最後的目的在於民主』，那麼，這樣說來，原來國民黨的政治『理論』不過暫時和『自由民主主義』不同罷了。將來的目的就只不過是這樣的『自由民主』所謂憲政時期，就祇不過是這樣『資產階級據國家爲己有』的議會政治的資本家專政罷了。現在呢？現在是所謂訓政時期，據蔣介石說，這和法西斯蒂也不相同。不見得罷？你聽他自己說：『而所以致民主之道，則必經過訓政之階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國家危難，領導青年政治經驗之民族，是非藉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使不可，況既明定爲過渡之階段，自與法西斯蒂理論有別……而以大同爲鵠的可知矣！』

啊哈！原來國民黨和法西斯蒂的分別，只是規定了這種法西斯蒂式的較有效能的統治權』是過渡階段，此外還要比法西斯蒂多一個將來的『大同國的』的鬼把戲。這樣說來，現在這個過渡階段是什麼東西呢？豈不是明明白白是法西斯蒂的『過渡階段』嗎？這叫做不打自招。過渡？過渡到什麼地方去？——過渡到民主——憲政時期，再過渡到『大同』——不但治國，還要平天下呢！哼！這平天下的大同把戲，大概就是孫文戴傳賢說的『多多的把中國人的血流傳播到全世界』，把中國紳商的『奴才性』的血種去『同化異族』了。再請問這過渡時期，過渡到什麼時候才完呢？祇有鬼知道！只好去問孫文的死鬼，『孫文頗能爲之預期』了罷。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蔣介石自己的供狀是明明白白的說：
國民黨的政治『理論』是：

第一個過渡階段是軍政時期——軍閥主義——殺工農兵士！

第二個過渡階段是訓政時期——法西斯蒂主義——殺工農兵士！

第三個過渡階段是憲政時期——資產階級的民治主義——殺工農兵士！

第四個過渡階段是世界大同——幫帝國主義——殺天下的工農兵士！

第五個大概就是『中國的』三民主義平天下，同化一切異族，使歸於孔孫蔣的
道統了罷？！

四

蔣介石國民黨的『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法西斯蒂的訓政時期，把中國訓
成了個什麼樣子呢？再聽他自己的供狀：

(一)『建設』呢？——因為打仗，外國資本家不肯借錢；

(二)割共呢？——『星星之火，逐漸燎原』，也是因為『前方大規模作戰，無
兵可調』；

(三)禁烟呢？——因為有租界，烟是禁不了的；

(四) 銀價跌落呢？——這是全世界的事情，沒有辦法；

(五) 外交呢？——又因為『國內戰爭發動之日即外交機關清淨無為之時』；

(六) 吏治呢？——貪官污吏到處都是；

(七) 賑災呢？——災區擴大，『政府竟無法施賑』。

這樣不行，是國內戰爭不好，那樣不行，又是租界不好。蔣介石自己，以至於一切國民黨軍閥剝削工農，互相打仗，勒種鴉片，吞沒賑款，投降帝國主義，企圖借款回扣，這些一切，難道不是國民黨負責的嗎？！他還『太息痛恨』於沒有痛快的調兵去打紅軍，沒有舒舒暢暢的大借款大賣國哪！

最無恥的，他還吹着他的大牛皮：說(一)裁厘了——其實，厘金名目裁掉，添了種種色色的營業稅什麼稅什麼稅，這兩天報紙上就有不少，『抗議』『請願』『哀求』的商會電報；(二)關稅自主了——其實，和日本英美都訂了『互惠的優先權』條約。

而且他自己都說最近四個月內外資移植國內，外商的工廠多開了六百多所。他還要說到取消治外法權，這已經取消到了什麼程度呢？日本英美要求個個法庭雇用外國顧問，租界周圍五十里不取消治外法權。而且現在日本英美各帝國主義，已經『不損害中國主權』而派兵調艦隊，深入中國內河去開砲打紅軍。這是蔣介石國民黨歡迎之不暇的。還取消什麼治外法權？！他還說到『紅匪』主力，快要被他剿滅了。不錯！

最近兩個月單是申報的電訊甯都會經被白匪攻陷了三次，現在據說又在圍勦甯都了。我們不知道江西省內還有沒有第五個第六個甯都城！

五

蔣介石居然還接着說國內國際的經濟狀況呢？

國際帝國主義的經濟恐慌，據他說是分配制度的不平均。『此種分配制度一時既難變更，則帝國主義侵略亦決難中止』。中國的失業兵匪，工農貧民羣衆的痛苦，就不是分配制度不平均了嗎？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和資本制度一天不打倒，你們國民黨軍閥的壓迫剝削，以及自相混戰『亦難中止』呵！

蘇聯情形呢？他說：『以一萬三千餘萬人之總動員，運用八萬兆盧布之資本，將全俄農場工廠，作集產的科學生產化，其規模自有可觀』。爲什麼蘇聯共產黨（這是你說的紅匪呵）能夠動員一萬三千餘萬羣衆，爲什麼蘇聯之八萬兆盧布之中，一個外國金鎊也沒有，而能夠實行這樣偉大的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社會主義建設，而你們國民黨三民主義的中國，現在是這樣『不能不令人怒憤悲傷』呢？爲什麼？因爲蘇聯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是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政府，而中國——是地主資本家的帝國主義所支配的國家，是國民黨的國民會議的政府！

他又說，蘇俄這樣興盛起來，西土鐵路環繞着新疆，中東鐵路深入我國東北，使蘇聯生產力『突飛猛進之數量，勢將以中國爲厄閻』。哈哈！這是多麼危險呵？譬如說美孚洋油亞細亞洋油在中國要賣五元六角一聽，蘇聯洋油來了，只賣四元一聽罷，——這對於中國的貧民羣衆更是多麼大的『痛苦』呵！！

至於他說中國國內情形，他自然免不了貓老哭鼠的假慈悲。他說：

- (一) 失業衆多——是『社會安定亦爲之搖動』；
- (二) 外國資本經濟侵略——是『貨棄於地供仰於人』；
- (三) 每年進口入稅平均總二萬萬兩以上——本國產業落後得不了；
- (四) 三千五百萬兒童失學，百份之八十不識字——『雖有聖智亦難謀國』。

這樣『千孔百瘡』情形怎麼辦呢？他却有一個『萬應靈藥』，就是『和平統一』，『統一和平』！

現在好容易『統一和平了』！——於是乎『不特政府可以表示建設上的成效，即私人經營之事業，所投之資本，亦將風起雲湧，協力並進，利用外資更不待言』。這是蔣介石唯一的夢想呵。這利用外資——大借外債，大開外國工廠，這風起雲湧的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官辦工商業交通業賺大批汗血錢，——原來就是蔣介石國民黨唯一的所謂造產政策。這造產不用說是造不成功，即使成功了——又正是工農民衆的汗血

再受大大大的榨取，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大大大的發財，而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從中取得些『肉骨頭』吃吃。這是這是多麼高尚的理想呵，這是大同呵！哈哈！

六

真正『和平統一』嗎？這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風起雲湧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夢想真能夠實現麼？

國民會議代表諸君子！誰要破壞這和平統一，誰就是國民公敵，誰要破壞我蔣介石辛辛苦苦爭來的『統一於我蔣介石』的統一局面，誰要被壞我『蔣介石可以對人戰爭，人人對我蔣介石應該和平』的和平局面，誰便是國民公敵。既然是國民公敵，就要打他，既然要打他，就是要戰爭。這就是蔣介石所說的和平統一。

這種『和平統一的國民公敵』正在開國民會議的時期拾起頭來了。蔣介石自己說：『約法所以立共守之信條，定安人心，——中正屢次堅持，致不諒於平日敬愛之友』。這當然是指胡漢民說的。那騙人的約法，有了是這樣，沒有也是這樣，我們這裏不說他。可是，胡漢民借着反對約法，代表廣東小軍閥反對蔣介石的大軍閥。正在這幾天，古應芬，鄧澤如等彈劾蔣介石的通電發表了。所以在這裏蔣介石是說：你們看——破壞和平統一的人來了，這是『國民公敵』！於是在這所謂『擁護和平統一』

的國民會議，又在準備着再來一次的軍閥混戰了。

七

蔣介石的結論是這樣：

『今日吾人所能託以集會之議場，亦僅係一工程師之設計，而由無數荷磚伐木之勞工日夜不息，依照預定圖樣設置，乃能按期完成，世間絕無工程師相聚而闕，工人袖手旁觀，可以有完成任何建築之理。建國之道，亦與此同』。

這本來是孫文主義的嫡傳。孫文自比諸葛亮，把四萬萬工農民衆當作昏蛋糊塗的阿斗。蔣介石自比獨一無二的工程師，把民衆當作苦力牛馬，替他『荷磚伐木』……而且他對着『國民會議代表諸君子』說這個話，意思是：

你們不要來相聚而鬥，好好的做我的走狗，替我搖旗吶喊，去打『破壞和平統一的國民公敵』！去打『紅匪』工農共產黨！

（完）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的中國

共產黨

華 崗

本文是我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史』的第六章，大革命史全書雖在半年前就已經脫稿，但因客觀條件的困難，直至現在尚無出版之機會，現把第六章抽出先在這裏發表，不但可以供給研究中國黨史的同志以一部分寶貴的材料，而且這些重要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也正可幫助我們有力的去肅清立三路線及對他的調和主義與兩面派，幫助我們真正實行兩條戰綫的鬥爭，保障真正在實際上能夠執行國際路線。

一九三一年四月 崗誌

一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問題

研究中國大革命問題，絕對不能撇開與中國革命息息相關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大

革命的發動與發展，在極複雜的階級關係之中，在極迅速發展的階段之中，中國共產黨顯然都演着極重要的作用，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過去指導機關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也就是中國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們記載大革命經過之後，更不能不用點篇幅來說明一番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不過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這裏我只能從幾個中心問題上加以扼要的說明，至於要詳細論列中國大革命中之各種爭論問題，則應讓另外的專書去完成它。

這一章中之劈頭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因為在這一問題中包含了中國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戰線與爭奪革命領導權等重要問題，自然這裏的任務並不是有系統地詳細敘述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歷史，而只能扼要說明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發展之關係的歷史。

中國國民黨在辛亥革命之後，原已崩潰瓦解，經過一九二四年改組才復生的，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也就從一九二四年改組時開始。共產國際為什麼要決定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呢？因為中國國民黨自始就不是一階級的政黨，當它初發生的時候，就包含着中國各種複雜的社會階級，自初生的資產階級（主要是華僑），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至一部分的工人（如海員），破產的農民，失業的羣衆（如會匪）等各種社會階級都有，甚至在當時只反對滿清的漢族封建地主軍閥勢力也有很多加入國民黨。辛

亥革命之後，國民黨孫中山與袁世凱妥協，一方面許多官僚軍閥買辦都加入了國民黨，另一方面國民黨原有黨員，大部分腐化反動，投降袁世凱，投降種種軍閥，於是國民黨更加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垃圾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所以從孔子道統以至平均地權，甚至階級鬥爭的思想都染着一點，成爲一種夾七夾八的東西，固然是反映當時社會思想的複雜，同時也就是反映國民黨內成分的複雜。這種複雜的政治集團，『如果他牽制共產黨的手足，不妨害共產黨煽動和宣傳工作的自由，不阻障無產階級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而又使共產黨這方面便於作事實上領導革命運動的事』，那末共產黨就可以加入進去，使他轉變到真正民族革命聯合戰綫的組織。而且『共產黨爲得在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中去分離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與夫引導城市和鄉村幾十百萬的小資產階級羣衆隨着自己走，他儘可以而且應該加入公開的聯合，與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合作』。自然這裏所說『合作』的意思並不是『混合』，因爲『我們共產主義者，幫助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僅僅當這種真正革命的，且運動的代表不阻礙我們組織農民和被壓迫羣衆的時候』，而且就在與革命派資產階級暫時合作的過程中，也必須堅決保存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那怕這種運動尚在萌芽的時候；不僅如此，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的聯合戰綫當中，應極力爭取革命的領導權，以領導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之澈底完成，以爭取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前途。共產國際根據這一系列主義的路綫，所以當國民黨孫中

山表示接受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聯合蘇俄』等革命政綱的時候，便正式決定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亦因此得以改組成功。國民黨經過一九二四年這一次改組，因為得到最急進最革命的共產黨員的加入，因為接受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聯俄』等革命政綱（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及政綱），便開始轉變成為中國民族革命聯合戰線的組織，成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旗幟。於是在國民黨的領域之內，工農組織及鬥爭的發展，也開始得着相當的自由；一九二四年勃興的反帝國主義宣傳和馮玉祥政變以及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都在國民黨的聯合戰線之中發展出來。國民黨在當時的確是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政治組織。孫中山赤化和馮玉祥赤化的名聲，也在這一時期諠騰於帝國主義者之口。而且國民黨改組不久，就發生了反帝國主義的沙面大罷工（一九二四年九月），當時國民黨左派對這罷工是與以積極幫助的。一九二五年五卅事變發生，接着廣東爆發省港大罷工，這一罷工是極明顯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當時國民黨左派的確是在積極的支持這一罷工，在各方面來幫助罷工，對於反對罷工的都加以打擊。同時廣東農民運動也在這個時候發展起來，許多地方與豪紳地主發生武裝衝突，國民黨左派當時主要的傾向也是站在農民方面，相當幫助農民去反對地主，農民的組織也可得着相當的自由，可以有自己的武裝，並且曾經收繳一些地主的武

裝來交給農民。這些事實都可證明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路線是很正確的。

然而中國國民黨既然不是一階級的政黨，國民黨之中，不但有民族資產階級，並且還有地主買辦階級的成份；這些地主買辦階級的成份自然不願意國民黨革命化，所以一開始改組，國民黨內便有馮自由等所代表的極右派起來反對，這種鬥爭事實上繼續到消滅劉鎮寰楊希閔的戰爭。馮自由等被打擊下去之後，接着便又發生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所代表的階級背景，實際上和馮自由等所代表的一樣，亦是地主買辦階級，不過西山會議派發生的時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有些反動的端倪，五卅之前，孫中山死後的第一次國民黨中央會議上（一九二五年五月），戴季陶沈玄廬等已經起來提出所謂國民黨的最高原則——反對工人階級鬥爭，這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戴季陶主義的發端。自此以後，國民黨內反對改組的右派表面上消滅，而承認改組，同時要求控制共產黨的新右派之鬭爭已經開始。五卅之後，戴季陶主義便公開的發動，孫文主義學會組織起來，黃浦軍官學校的右派形成起來。於是國民黨的右派中央委員在北京西山開會，以廖仲凱被刺後廣州國民政府成立與省港罷工開始時之左傾政策為反對目標，中心的反革命政綱是在打擊共產黨。這一轟動一時的西山會議實際是在戴季陶主義的旗幟之下，進行他們反共的鬥爭，不過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還只很小心謹慎的發動自己的鬥爭，覺得公開反動太早於己不利，所以戴季陶本是發起西山會議之一人，結果竟不能不中途逃

席。這一複雜的過程我在前兩章敘述大革命經過時已經分析過了。

可是另一方面，當時中國共產黨雖然執行了加入國民黨的策略，但是對於列甯主義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論却並不瞭解。首先，『中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大會時（一九二二年），已經決定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並贊助中國國民黨，提出的口號是：「民主的聯合戰線」「推翻帝國主義推翻軍閥」。在此大會後，共產國際派代表向中國黨提議：中國同志們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使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更進一步實現，使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加速的進行。當時黨中雖尊重國際的提議，而大多數同志只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因此，在實際上，國際的提議未曾實行』（見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中之第四節『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革命運動政策之經過』）。到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三年六月）重新討論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指示的時候，又曾經發生過爭論；陳獨秀領導的右傾的思想，贊成加入國民黨，同時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共產黨不應該有什麼獨立的工作，甚至說：『中國共產黨早生了五年』，這是無疑的取洋主義的思想。同時有一派左傾的思想則『反對在勞動羣衆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見同上）。他們起初是反對加入國民黨，後來贊成共產黨加入國民黨

，但要保留產業工人不要加入，這是一樣的。不了解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略。

這兩派主張的根本思想，都是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的理論。前一派的主張認為現在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產階級應該竭力幫助資產階級，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等到將來再說，所以甚至覺得共產黨都可以取消。後一派的主張認為現在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固然應該參加，可是我們的任務是準備將來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產業工人決不應該加入國民黨中去受資產階級思想的洗染。很明顯的這兩種思想都是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有一座萬里長城的隔離，而不知道從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路線。

三次大會的結果，沒有能夠把這樣的机会主義的思想駁斥下去，因此一方面固然實行了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指示，另一方面機會主義的思想却充滿了當時的指導機關。於是『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共產黨不要有獨立的工作』，『一切運動都是國民運動，工人運動只是國民運動的一種』，便成爲當時指導機關的路線。甚至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還說：『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這是很明顯的與列寧所指示的『不要與資產階級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完全相違反；這就是極可恥的以階級利益去服從民族利益，以無產階級去服從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這樣自然不會去在這聯合戰線中去力爭革

命的領導權，更不會有『對待同盟者要猶如對待敵人一樣』的認識。所以在接受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策略時候，就只認識了應當『加入』一點，而完全沒有注意加入以後在聯合戰線中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略。他們遂這樣的把列寧主義的路線，變成了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的路綫。

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既在這樣機會主義路線領導之下，於是加入國民黨以後，對資產階級採取極可恥的讓步政策。實際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並不是積極去爭革命領導權，反而去到國民黨裏送領導權給資產階級。有時雖然也模糊的提起爭領導權的問題，但是，『祇要國民黨能聽從共產黨的主張與政策，便可以說實際上的領導權在共產黨之手；因此說國民黨左派是有的，不過不能對他們有過分的奢望，革命口號要是他們所能接受的才能提出去，如此可保領導之權；因此，國民黨黨部的委員與職員，共產黨也不可多佔，以免惹起左派反感而踏包辦之嫌』。中國共產黨既然學得這樣一種『謙讓之德』，自然便不會積極去爭革命領導權。一九二五年冬發生西山會議派，同時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有反動的端倪，已經開始反對工人階級鬥爭，極力控制共產黨，而共產黨的路線乃是認凡半封建勢力的西山會議派為右派，而以戴季陶主義為中心的資產階級為中派，採取向中派讓步以孤立右派的策略，實際上對右派也是一樣的讓步。當時廣東的黨一方面反映着階級鬥爭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廣東的國際代表鮑羅庭同志在那時還能

相當執行國際的指示，於是廣東黨與中央在許多問題上都發生過爭論。當時廣東黨的路綫，一方面發展羣衆的組織與鬥爭，另一方面在國民黨內採取不斷的向右派進攻的政策——一般人叫他剝筍政策。征服了商團事變之後，馬上肅清東江，削平楊劉，繼續又驅逐胡漢民許崇智等，左派與共產黨的勢力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機會主義的中央却天天斥責廣東太急進了，罵廣東黨破壞了中國民族革命聯合戰線。最值得記憶的一次爭論，就是在國民黨二次大會以前，廣東黨堅決主張反對右派，把當時幾個著名的右派領袖如戴季陶孫科等都驅逐出廣東，並且準備在這次會議上把國民黨造成左派與共產黨聯合的中央。可是當時中央的主張却確實與廣東相反，認為當時革命形勢（郭松齡反奉失敗後），在全國各處都受到了打擊，因此必須向右派讓步以保持聯合戰線。於是廣東驅逐出來的右派領袖孫科葉楚傖邵元冲等到了上海，中央却馬上與他們實行『談判』（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並訂立了極可恥的條件：（一）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指導機關中不得佔有過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數；（二）由共產黨中央命令廣東黨部延遲二次大會，等候這些右派領袖回到廣東以後再開。於是這些被廣東驅逐出來的右派領袖在共產黨中央自行讓步之下，又回到廣東參加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了。

國民黨二次代表大會之後，不久就發生了三月二十號事變。這一事變的意義，很明顯的是當時資產階級要先打擊無產階級的力量取得國民黨的領導權，然後再行北伐，

使北伐的結果完全合於他一個階級的利益。在這一事變中，廣東黨與中央又有不同的意見：第一討論這一事變發生的原因，廣東黨認為是『當進攻而沒有進攻』的結果，中央的主張又確實相反，認為是『當退讓而沒有退讓』的結果。第二個爭論就是對於三月二十號事變的策略問題。廣東黨認為『退出國民黨就等於放棄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放棄革命的國民黨旗幟給資產階級，這就是莫可補救的損失，在這個時候是應該採取暫時讓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國民黨之內，同時積極的準備着新的進攻以繼續奪取領導權的爭鬪』。另外在上海有少數同志的意見，認為三月二十號事變是莫大的恥辱，應該毫不猶疑的退出國民黨。當時中央的主張却是第三種意見：陳獨秀在當時提出來的有名的一句話可以完全表現出當時中央的意見。就是『辦而不包，退而不出』，這一句話的意思是說：三月二十號的事變是共產黨的急進政策，是想包辦國民黨的事逼出來的，所以以後只應『辦而不包』；馬上退出國民黨是錯誤的，但是一定要向右派退讓，所以只要『退而不出』。當時主張退出國民黨的固然是錯誤的，可是陳獨秀的名言『辦而不包，退而不出』，却正十足的表現了專一奴服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精神。

三月二十號的事變，已經在事實上充分暴露了資產階級的動搖與反革命的必然性，共產黨經過這一事變的教訓之後，應當更堅決的在政治上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積極爭取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尤其要積極爭取農民與兵士羣衆，使之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

圍，並切實批評資產階級的動搖，積極的領導羣衆的鬥爭準備自己的力量，以鎮壓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到來，以奪取這一革命聯盟到自己的領導之下。廣東省委當時對於與國民黨關係的策略雖然比中央的投降路線要正確些，但是對擴大羣衆基礎的工作也不十分堅決。北伐開始的時候，曾向中央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北伐過程中，到底準備推翻蔣介石呢，還是擁護蔣介石？廣東黨的路線是主張在北伐過程中要同時積極準備推翻蔣介石的。可是當時共產黨的中央答覆得異常奇妙：『不是推翻蔣介石，也不是擁護蔣介石』。這無異於說：『現在是北伐的時候，爲什麼想到推翻蔣介石去』，這是幫助資產階級的最妙的理論。可見當時共產黨中央始終沒有想到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這一重要策略。反之，『既然要聯合戰線，就應當自己讓步』，這一機會主義策略的原則，倒是當時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

中國大革命的最劇烈最複雜的鬥爭時期，是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的時期，中國共產黨便站在那些主觀與客觀的條件之中。雖然前幾年的革命發展時期，國民黨改組後及五卅以來的革命時期，已經孕育着許多機會主義的理論與方法，雖然共產黨的組織在這期間已帶着這種機會主義的傾向，自然也就帶着許多宗法社會的習性，指導機關之中不能推出工人同志的領導者，甚至工會之中也都是知識分子的『革命職業家』，但是客觀上勞動羣衆的鬥爭却依然急劇發展；赤色工會運動發展到將近三百萬會員，吸收極多的

店員手工工人參加；農民協會以湘鄂贛粵計算，發展到將近一千萬會員；國民黨左派運動有極大的發展，軍隊之中也有一部分的力量。雖然這些發展大半屬於自發的。可是前一階段中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以及客觀上革命勢力的發展，使「取得國民黨取得國民革命軍取得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策略事實上部分的實現，而形成部分的革命勢力，共產黨以工農團體中的領導權之取得而成革命的先鋒與主幹。當時的任務，就在「一面認清五卅以來『中國無產階級暫時還沒有革命之領導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雜誌的社論）。一面堅決的進一步而取得政權與軍權的領導權。這是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時的形勢。中國共產黨中央便放在這種形勢之前。

那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便議決中國革命問題的議決案，指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行動政綱，指出中國革命非資本主義的前途，須以無產階級爭得革命領導權來達到，須以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來對付必然要背叛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指出中國革命的主要社會內容是土地革命，必須勇敢的領導農民之自發的鬥爭，指出無產階級及手工工人的階級鬥爭之劇烈，須要勇敢的領導，以成爲爭取整個革命領導權的力量，須要加入國民黨以擴大並贊助工農的鬥爭，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並且要「有系統的堅決的反對國民黨右派及戴季陶思想，反對他們想把國民黨變成資產階級政黨的企圖，徹底的批評在左右之間的一切動搖。使國民黨成爲真正

平民的政黨——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被壓迫者之堅實的革命同盟』。

事實上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底，亦正是工農左派聯盟的『極盛時期』，如果將當時的客觀形勢與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的『中國問題議決案』相對比，大家都可看出國際決議案是非常正確的。可是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已陷於機會主義的泥坑，一切原則都在動搖之中，根本沒有執行國際『爭取國民黨領導權』的指示。

此時客觀上革命運動是突飛猛進，一九二七年一月漢口九江工人苦力等革命羣衆奪取租界的奮鬥，二月間上海的總同盟罷工，一直發展到上海三次暴動，但是共產黨中央對於國民黨領袖依舊一味退讓，甚至當時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竟和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發出那種可恥的聯名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陳宣言），因此有人說，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可以說是以一九二三年『越飛與孫中山的宣言』始，以『汪陳宣言』終。

汪精衛在『武漢分共之經過』一文中說，他的分共是經過三個階段：第一，是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國民黨中央議決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以『制裁違反本黨（國民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是五月二十一日長沙政變至七月十五日的國民黨分共會議，算是『和平分共』；第三，是『因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退出政府，『對國民黨厚誣醜詆』及葉賀舉兵，便實行嚴厲反共。不論汪精衛的『供

詞』如何的矯揉造作，說得『仁至義盡』，但是，這幾句話中有一個真理：就是武漢一方下令討蔣，一方便已下令『討共』；討蔣和查辦湘鄂贛各省『過激』言論行動之特別委員會組織的決議，差不多是同日同時的（四月十九日下令討蔣，四月下旬即組織特委）。這時中國共產黨正在開第五次大會的時候，正是共產黨五次大會高呼『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合作到底萬歲』的時候呵！

這時候，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共產國際執委開第八次擴大會議，再議決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這次會議對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更有如下之進一步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要想把他肩上的任務完成，只有保存自己工人階級先鋒的政治面目，就和那最急進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面目也須劃分清楚。

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共產黨不許融解於別個政治組織之內，他必須成爲獨立的力量，他是一個特殊階級的組織，是無產階級的組織，是全國最澈底最革命的階級的組織。因此，共產黨在宣傳自己的政見時，在自己的旗幟下動員羣衆時，不能爲外力所阻，對於革命小資產階級民主的動搖不定，尤不能放棄批評的權利。恰恰相反，須知只有這種批評，才可推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向左，才可以在革命鬥爭中，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權。

不過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不可解作是與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尤其是與農民斷絕關係。從這點出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最堅決的反對那退出國民黨的要求，因爲在目前的瞬間，無產階級的政黨恰要在國民黨，確定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固有的組織形式，是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及農民合作的黨。

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共產黨——工人階級的政黨不能在國民黨內取得領導作用，則無產階級便不能在全國取得領導作用。

共產國際執委認爲，如果看輕國民黨這個革命運動的特殊組織形式，實際上便是助成右派攬得國民黨的旗幟，正因爲國民黨的旗幟是國內一個非常主要的政治因子，所以蔣介石引着資產階級領袖們，千方百計，要打起國民黨的大旗前進。共產黨的策略，萬不可爲蔣介石的機變作保障（退出國民黨的路線，便不能免這種結果），而要揭破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是民族革命的叛賊，是國民黨的叛賊，是中山主義反帝主義的叛賊，是投奔帝國主義者的降將。

共產國際執委認爲，說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已經『告終』，另一革命即工農階級革命已經『開始』，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在蔣介石政變之後，便是廣大的羣衆也明瞭了民族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才能繼續前進。正因爲這樣，所以不能把國民黨的旗幟，不能把民族自由鬥爭的旗幟讓給民族自由鬥爭的叛賊！

共產國際執委認爲，中國共產黨既要大胆的堅決的擴大羣衆運動，也必要一般大胆的堅決的努力變國民黨爲真正的羣衆組織。使他包納城鄉勞動民衆才行。

共產國際執認爲，國民黨爲完成其自身任務，須使其組織形式能相當適應。

趕快改組，儘量接近羣衆，實爲必要；其次，要在工農手工業者中間大徵黨員，容納工農兵士手工業者之整個組織入黨（工會，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手工業者行會，軍隊組織，農民遊擊隊如「紅槍會」以及工人自衛團等等，惟須肅清其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的地方及中央指導機關厲行選舉等。只有把定這個堅決的路線：使國民黨發展成爲真正廣大的羣衆的革命民主的組織，指導機關真正由選舉產生——才能爲中國民主革命之鞏固與勝利的發展，造下先決條件。

只有把定這個路線，才能爲防止那國民黨左派某個動搖部分之可能的而且必然的退伍（如廣州的事實），爲防止那某個動搖軍官及其他軍事領袖之叛變，造成制裁手段。應時的揭破一切勾結蔣介石或帝國主義之動搖趨向，並在宣傳煽動上採用具體辦法，或竟用組織上的制裁手段，這是共產黨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除維持且擴大自己黨的組織外，尤須極力影響國民黨的行動。要想實現這種任務，必須先完全了解自己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澈底把定自己思想的政治的路綫，加強鞏固自己的組織，使工人同志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在工農羣衆中

加強黨的影響和黨的威信。

共產國際執委認定，在中國共產黨中，恰恰對於這點有些動搖存在；黨在批評國民黨的領導者，不能常常表現充分的堅決，而且在黨內對於發展羣衆運動表現相當的畏怯，尤其是在農民運動中，關於沒收土地，驅逐豪紳地主等問題上，可以看出。這些動搖，在目前階段中，特別有害於革命。在這裏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并非人人都能充分了解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路線。共產國際執委認爲，大規模的說明中國共產黨同志內上述的錯誤和動搖，是必要的；不然，則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之中，相當的動搖之危險便加高了」（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對中國問題議決案）。

然而在這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中央所有的活動，簡直與國際決議案上所明明白白指出來的路線相反。國際決議再三指出，中國共產黨要想把他肩上的任務完成，只有保存自己工人階級先鋒的政治面目，就和那最急進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面目也須劃分清楚。然而實際上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竟完全放棄自己獨立的政治面目之任務，而且儘可能的做到了與國民黨領袖完全同化的工作。例如在中央五月（一九二七年）通過的關於國民黨聯席會議的決議案（國民黨工作大綱）上說：「共產黨員在聯席會議應討論各種主要的問題，提出具體的建議，但是這些具體的建議不應根據我們黨的最大要

求，而應注意到民族革命發展的利益與團結國民黨左派」。從這個中央的決議中，可以得到的結論是：（一）『共產黨的最大要求』與民衆運動的利益是兩不相容互相衝突的兩方面；（二）共產黨的『具體建議』不應當建築在黨的『最大要求』，就是說在現在的革命的階段上不適用共產黨的政綱，策略與一般的政治路線；（三）民族革命運動與團結國民黨左派只有在共產黨放棄自己『最大要求』的條件下才能發展。再此決議案上又說：『在國民黨報館服務的黨員，不當使此等報紙變爲共產黨的報紙，而應照國民黨決議的精神去工作』。這豈不是放棄共產黨自己獨立政治面目完全服從國民黨之表示！？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服從作用』，到處可以表現出來，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團作用（如在聯席會議中），實際上已經被黨的指導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國共中央聯席會議上，汪精衛說：只有國民黨中央有認可與公布通過的決議之權，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的回答，竟同意於這種辦法。當時共產黨領袖也有這樣說的：一方面自然共產黨員不應完全放棄自己的獨立，但在別一方面則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的獨立，因爲我們現在還須與國民黨聯合，有了這種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數主義策略基礎的妥協辦法，還要裝出莊嚴的樣子說，這是實際的『共產主義的策略』，共產黨領袖簡直沒有想過政治上的獨立。那末，對於國民黨的動搖與各種不澈底的騎牆政策，實際上當然不會有什麼批評

，共產國際所要求的徹底激烈的公開的批評，當然更不用說了。對此最明顯的就是中央在黨整個公開的時期中，都沒有打算出版一份黨的日報，雖然經過國際之多次催促，中央關心的不是這些事，而是怎樣使共產黨員不在國民黨報上發表共產主義的文章！

中國共產黨中央不看見國民黨羣衆，永遠沒有打算與他們接近，而只看見領袖。

遇着主要的政治問題，總是想着應當看某某領袖對此的態度如何，但不是說工人農民羣衆對此的態度如何，往往爲要想使某某領袖中立而放棄革命口號，譬如爲要使李濟琛在廣東中立，所以把改選國民黨省黨部的口號取消；爲要使汪精衛中立，所以把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一九二七年四月）對於土地問題的建議取消；爲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不堅決的去取締湖南的叛徒；爲要使朱培德中立，所以當他驅逐共產黨的時候（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旬）亦不提出反對他的口號；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都由國民黨『左派』領袖之願望來確定，而所謂左派領袖之願望，就是武漢軍閥的要求。因爲『左派』要求共產黨人到東部去工作，而中央要停開第五次大會；又如中央一向贊成北伐，但當左派決定東征，則中央也馬上通過那樣的決議，雖然中央以前很堅決的反對國際代表不主張北伐的建議。在其他許多問題上，都是如此。

共產黨這個空前的妥協的機會主義總路線，是繫於一個總的理論。這一理論就是『既然要聯合戰線，就應當自己讓步』。列甯說：『要幫助動搖的人，先要自己不動』。

搖』，而事實上，那時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格言是：『要自己退後些，免得人家跟不上』。那時不是運用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去革命，乃是爲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所束縛而阻礙革命。那時共產黨中央不但自己確信，並且還要使全黨及在共產黨指導之下的革命羣衆也要確信下列的理論：『共產黨及跟他革命的工人與農民已經走得太遠，現在必須退讓以挽救與國民黨的聯合』。當土地革命剛剛開始發展，當工農羣衆運動剛剛走上革命大道，並且羣衆自己想到武裝自衛的組織正須要共產黨的積極參加和領導，使革命發展并鞏固與國民黨羣衆之實際聯合，築下堅固的革命基礎的時期，而共產黨的領導者却說：『要退讓，要退讓』，以爲這樣，就可以營救自己在國民黨的狀況，創造了整個退讓的理論。不僅於此，當時中國共產黨不僅有這樣一個可恥的理論，而且還要步步實現於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拒絕土地革命，爲着所謂『過火』，贊成成批的解散工農的組織，以同樣的口號去解散勞動童子團。在湖南問題的膽怯政策與最後所幹的自動解除武裝的工人糾察隊。所有這些，都是一九二七年五六月間武漢時期共產黨中央整個的退讓投降政策之一部分。

這條退讓投降的道路，集大成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中央擴大會議所通過的十一條國共兩黨關係的議決案，現在指幾條出來看看。

『（四）中國國民黨既然是反帝國主義之工農及小資產階級所聯盟的黨，當然處

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

(五) 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分子，雖然參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國民黨員資格參加，不是以共產黨員資格參加。兩黨聯席會議，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而不是兩黨會議公開執行形式，這件事並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產黨員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

(六) 工農等民衆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等民衆運動之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與中央會議之決議案及政府公佈之法令，但國民黨員亦應該依據黨的議決案及政府之法令，保護工農羣衆之組織自由及利益。

(七) 依照國民黨主義，須武裝工農，但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武漢現有之武裝糾察隊，為因避免政局之糾紛與誤會，可減少或編入軍隊。

(八) 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國民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如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事。

(九) 店員工會應即由黨部會同省總工會派員組織，店員的經濟要求不得超過店東的經濟能力以上，工會不得干涉店東的用人權，管理權，更不能侮辱店東，如逮捕罰款及戴高帽子等事。

(十) 童子團執行警察職務，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應嚴行禁止。

這在客觀上已經是十足的取消派，不僅完全放棄共產黨的獨立，並且代替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取消了一般革命羣衆運動之存在！把所有的羣衆運動完全交給國民黨資產階級的領袖去監督，並且是自動的交出來，還要說是『照例』。這不是客觀上對於羣衆運動出賣，對於革命變節是甚麼呢？

當時中國共產黨領袖所認識的與國民黨合作的方法就是這樣！這種方法已經完全喪失共產主義政策的精神。列寧說：『我們共產主義者，幫助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僅僅當這種運動真正是革命的，且運動的代表不阻礙我們組織農民和被壓迫羣衆的時候。倘若沒有這種條件，則我們共產主義者，應當奮鬥，堅決的反對他們』。（列寧對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演說）。列寧對於與小資產階級聯合又時常說：『要注意友軍如同注意敵人一樣』。當時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態度却恰恰相反，以致於不是共產黨指導國民黨，而是國民黨的上層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虜了共產黨的指導者。

集機會主義之大成的十一條國共關係政綱發布的時候，共產國際的緊急訓令到了，這一緊急訓令嚴厲斥責中國共產黨所犯機會主義的錯誤，訓令中國共產黨要立即示威式的宣言退出國民政府，要加倍發展工農運動，以制裁國民黨領袖之叛變，對於國民黨的策略則說：『不退出國民黨，雖國民黨的指導機關要大批的開除共產黨員，但仍留在，

內要密切的與國民黨的下層羣衆聯合，由下層羣衆提出堅決的反抗國民黨中央的決議案，要求撤換現在的國民黨的領導機關，並且在此基礎上就準備國民黨的大會」。於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宣言國民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但是並不退出國民黨，而且還在七月二十九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告國民黨同志書，號召國民黨左派羣衆起來反抗國民黨中央。此時武漢國民黨中央七月十五日分共會議已開過，正是南昌暴動發難期間，這對於國民黨左派羣衆，號召他們反對寧漢反動中央在當時是有必需的。但是共產黨對於這種行動政綱過於伸張，於是「八七」緊急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反機會主義鬥爭的新紀元，有非常重大意義的一次會議，以後還要說到——竟還通過復興左派國民黨的決議，甚至決定中國共產黨還應當組織工農暴動於革命的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認為「革命的國民黨的這種組織，可以使將來發展到更高的階段時，政權形式將要進於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那時的過渡更容易些，更沒有流弊些」。當然是很大的錯誤。事實上武漢反動之後，整個國民黨的政治生命已經宣布死刑。假使那時在國民黨中還有些單獨的革命的反對派的成份發現，但是整個國民黨以前在羣衆中的革命威信，已經因為資產階級軍閥及小資產階級領袖之陸續反動，到處利用國民黨的旗幟實行流血屠殺，恐怖與壓迫而消滅了。國民黨主義在中國革命前一時期的發展上固然實現了相當的積極作用，但到此時新的發展階段中已經完全變成反動的力量了。所以不久之後

廣州革命工人羣衆即首先宣布『國民黨已經是反革命的象徵，已經是白色恐怖的旗幟』，於是中國共產黨亦即取消『復興左派國民黨』之決定，正式提出蘇維埃的口號。至十二月廣州暴動，工農兵士羣衆高高豎起鐮刀斧頭紅色旗，國民黨左派汪精衛陳公博等亦大屠殺工人，於是整個國民黨更成爲反革命的旗幟，更成爲共產黨及一切革命羣衆之死敵了。

二 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及動力的估計

中國共產黨『八七』緊急會議告同志書中說：『黨的指導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其基礎在於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不了解各種階級在每一革命階段裏的作用，以及共產黨的作用』。因此我覺得在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及動力的估計這一問題上應該有專門的說明。自然關於中國大革命的性質本身問題的內容，上面第二章中已經有詳細的分析，這裏我只說一說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一根本問題的估計。

爲使問題更容易處理得清楚起見，我們可以先把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估計介紹一點在這裏。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會議對於中國革命之性質就已有明白之表示：

『中國革命發展之現在階段，從歷史上說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但是如

果無產階級握到革命的領導權，則革命的結果不一定造成使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政治環境，而將成爲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被剝削的階級政權，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前途。中國共產黨決定要用全力去實現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發展之革命前途。否則資產階級倘若勝過無產階級，則中國實際統治又將落於帝國主義之手。

『必須從經濟上打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基礎，就是革命政府，應逐漸沒收屬於外國資本的鐵路，租界，工廠，鑛山，銀行，企業等等。因此以爲中國革命目前的任務僅限於：（一）推翻帝國主義；（二）消滅封建勢力；這是錯誤的。中國革命若不超出於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範圍之外，決不能推翻帝國主義的。』

但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與前途這一根本問題是不了解的。中國共產黨所了解而且成爲黨的正式意見的實際上就是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的理論。遠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國共產黨二次大會時候的意見就是如此，二次大會宣言中說：『我們無產階級有我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根據這種孟塞維克的觀點，無產階級對於民主主義革命

便只好取「隔岸觀火」的態度，用不着熱烈去參加，更用不着積極去領導，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澈底勝利，實現工農專政，走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只須等待民主革命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的時候，無產階級才可「因此」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所以無產階級應該把革命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交給國民黨，使資產階級「迅速發展」起來和無產階級來「對抗」。機會主義者永遠不會懂得下面的真理：資產階級因其自身階級的地位，必然產生它在民主革命中的不澈底性。無產階級則因自身階級的地位，逼使它不得不爲澈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的頭是往背後看去的，因爲它害怕民主主義的進化，因爲這個進化有使無產階級強大起來的危險。無產階級却除了失落套在自己頸上的鎖鍊而外，別無所失，而得民主主義之助，反可得着全世界。所以資產階級革命在其民主主義的改革方面愈澈底，則這個革命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範圍將愈縮小。若資產階級的革命愈澈底，則它愈能保證無產階級與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我們固然不能跳出目前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但我們能擴大這個範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之內，爲無產階級目前的直接需要及爭取革命領導權使中國革命過渡到非資本主義前途而奮鬥。

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會議依然繼續這種錯誤，而且擴大這種

錯誤，在對中央政治報告決議案中說：『中國民族運動的前途，我們可以看出有兩條道路：一是由工農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推動資產階級，以革命的手段達到民族的資本主義的建設；一是由買辦性的資產階級拿住小資產階級，并結合買辦階級與帝國主義妥協，撲滅革命運動，實現道威士的資本主義之侵略。我們（共產黨——恕我加了這樣一個失當的註釋！）的責任，就在努力擴大工農羣衆的力量，拿住小資產階級，推動資產階級，始終能夠鞏固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則中國民族運動便有由第一條道路之可能。（見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會議決議案』十三頁）。共產黨領導工農羣衆參加民族革命的責任，是爲『達到資本主義的建設』，這在現在看來，好像過於荒唐，不知這正是過去中國共產黨指導者的政治路線。

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根本問題既然墮入了極庸俗的機會主義的泥坑，所以對於共產國際『現在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力爭革命的領導權，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政權，力爭非資本主義前途』的指示自然不會接受，而且把國際決議案加上一些機會主義的曲解，說什麼：『國際這個提案，不是說現在的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革命；不是說現在已經不需要國民革命，而立刻就要實現無產階級革命；不是說現在的國民革命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性；』（一九二六年底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越解釋越糊

塗，中央只在過着文章的快樂生活罷了。

自然，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內部並不一致，然而無論如何，這種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却是當時共產黨指導機關中多數而且是正式的意見。共產國際七次擴大會議決議案到達中國之後，形式上中國黨雖然一致接受，甚至也能跟着高叫幾聲『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然而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依然充滿着機會主義的精神。對於中國革命性質與前途這種根本問題都沒正確了解，自然在許多實際問題中都很容易發生錯誤，各種錯誤中之最嚴重的一點便是沒有和資產階級堅決爭奪革命領導權；以為中國資產階級等於零，革命領導權『天然』在無產階級手裏，根本用不着去爭；或者以為我們無產階級的任務是準備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目前資產階級革命應該達到資本主義的建設，所以革命領導權應該交給資產階級，結果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緊急關頭，完全對共產主義變節。

這就是一九二七年『八七』之前的情況。八七之後，經過極艱難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經過武裝暴動之英勇的嘗試，中國革命已經進到較高的階段——工農蘇維埃革命階段，此時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估計又發生不正確的觀點，認為中國革命是『無間革命』的性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決議案）想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這種觀點顯然陷入了托洛斯基主義的錯誤，這一錯誤是當時國際代表維米那茲與瞿秋白所做出來的。所以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便公開批評糾正了。

關於中國革命之社會動力之估計，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機會主義之間亦表現出顯著的分歧。

中國共產黨機會主義的指導者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既然沒有正確的認識，因此也就會不懂得各種社會動力之作用及其結合的根本趨勢。依據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會的估計，中國「資產階級在民族民主的革命運動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現時世界政治環境，中國的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必陷於異常困難或至於危險」，又說「在事實上，自五卅以來，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漸漸成了民族運動中之重要成份，且有領導此運動之傾向，特別在上海是如此」。雖然也會指出過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革命到底」，但同時却肯定說中國資產階級要得到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領判權，收回租界等，「方可與帝國主義妥協」，換過說，便是資產階級如果沒有得到這些東西，便不會與帝國主義妥協，這是何等機會主義的觀點！其次又說：「中小商人受帝國主義經濟之壓迫，苛捐雜稅之剝削，只有感覺革命之必要，無反對革命之必要」。可見共產黨指導機關根本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的特性，只看見中國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表象，却不懂得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真正用意，而且沒有同時「在事實上」指明資產階級當時已經發端的妥協背叛傾向，如五卅運動中及以後的各種事實。所以自然的結論便只能是：「因此，我們（共產黨）此時對於資產階級

的態度，應該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資產階級，使之接近工農羣衆，而不完全爲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所統治，以與資產階級爭此革命運動的領導地位，以防其將來之妥協，一方面極力鞏固各階級的聯合戰線，促進資產階級之革命化』。至於在聯合戰綫中對資產階級之批評監督則根本沒有必要，這種對於動力之錯誤估計，也就是第一節中所說共產黨退讓投降政策之張本。

反之，共產國際的估計却完全根據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原則。國際指出：中國革命中階級力量的發展，是在非常落後的中國經濟背景裏。其原因則爲工業資本主義低度之發展，農業經濟停留於原始技術，大多數中國人民生活程度異常的低微以及許多半封建制度的殘留等。現時中國經濟情形的主要特點，就是中國經濟的成份，可比雜色的荷包，從財政資本以至宗法祠族制度的經濟關係之餘跡，都同時存在，其中佔優勢的乃是各種形式的商業資本及城市鄉村的小手工業和小工業。這就使中國民衆之階級分化不明顯，並使國民革命中之社會政治力量的組織程度不甚高。中國革命運動發展之連續的階段，可以各種社會力量的改變結合以證之。在第一個階段裏，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爲主要動力之一，他們在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隊伍中找助手。第二階段，社會力量轉變到另一方面結合形勢。爭鬥的方式，亦發展得更新而更革命，工人階級在中國鬥爭場上出現，成爲最重要的政治原素。現在（一九二六年底

），革命運動已到了第三階段之門，正是階級的新結合之前夜。在這階段裏，發展運動的主動力，將是更有革命性的結合——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結合，而離開一大都分的大資產階級。可是，在這階段中，革命運動的領袖權，將日漸落在無產階級身上。在此時期，是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大資產階級看見反帝國主義戰鬥，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超過了他的控制，客觀上不免危害他的階級利益，於是大資產階級拚命搶奪領導權，以達破壞革命之目的。反革命力量之形成，與革命的階級力量之結合是同時並進的。這個反革命團結之進程，與帝國主義的政策，有密切關係，並受其影響；猶之乎中國革命勢力之發展，是與世界革命（蘇聯與西方無產階級）有密切關係，並受其影響一樣。帝國主義者見軍閥不能作消滅革命運動的有效工具，於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勢力中，找尋他的同盟者。帝國主義者企圖叫醒民族資產階級，使之脫離革命戰綫。並為使民族運動內增加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勢力起見，於是那些迄今還站在民族革命鬥爭之外，或甚至軍閥，開始轉變到國民政府方面。這種舉動的目的，是從革命的聯合（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手中，奪取革命領導權，以阻礙革命的發展。這些反革命舉動的主謀者，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在這過渡時期，歷史必然的，大資產階級必定日漸離開革命，當此時際，無產階級應該從很廣泛的利用現在事實上還作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鬥爭的各種資產階級。另一

方面，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該在策略上利用離開革命的各種資產階級間的衝突，猶如利用帝國主義間的一切衝突一樣，但是決不要忘記無產階級的主要目的，而要在利用敵人的各種衝突之時，使戰術上的應付和策略上的步驟，都能一貫的奔赴這些目的（七次擴大會對中國問題決議案）。

這一指示使我們了然於中國革命各階段中階級結合關係之變動，各種社會動力的作用及我們應有的戰術和策略。但是布兩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總隔着不可逾越的鴻溝，所以這樣明確的指示也竟驚醒不起中國共產黨機會主義的領導，中共政府局竟以下列機會主義的解釋表示『接受』以了之：『國際告訴我們：革命的主要成份是無產階級及其所領導的農民和其他被壓迫的勞苦羣衆，而不是富裕的資產階級；因此，中國國民革命前途之發展，得超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照這種『無產階級是天然的領導者』的孟塞維克的理論，自然要把與資產階級鬥爭的問題置諸度外，這是中國共產黨『接受』國際指示之滑稽的典型。

對於革命動力估計之錯誤必然產生實際行動中機會主義之惡果，對此最好的例證便是當時中央直接指導下的上海三次暴動。

在第一次與第二次暴動的時候，黨只發出『歡迎北伐軍』的口號去號召羣衆，後來雖然提出建立『市民政府』的政綱，但是仍然犯了極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就是拋開

一般急進的小資產階級，而極力與資產階級妥協。其實當時資產階級已經開始叛變，蔣介石已經從南昌開刀，經過九江安慶蕪湖一直殺來（殺工人）上海，武漢已經提出『打倒蔣介石』『反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口號，而中央的路線仍然是聯合資產階級，仍然提出『歡迎蔣總司令』的口號。於是發生可悲的結果：上海市民政府因資產階級的背叛，因蔣介石一紙禁止的命令，遂至無聲無臭的消滅了。到『四一二』的一天，上海工人階級遂遭受了空前的大屠殺，革命的上海一瞬間遂變成了反革命的上海。

當時客觀的形勢，革命還是空前的高漲，上海八十萬工人都組織在上海總工會之下，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離開資產階級而同情於工人階級；就是在軍事上，同情於革命的軍隊仍然是優於反革命的軍隊，蔣介石直接指揮的軍隊都動搖起來。所以假如中央是一貫的堅決執行國際的路線，在進行北伐的過程中，已準備着鎮壓資產階級的反叛，退一步說，就是在三次暴動的時候，不採取專與資產階級勾結的機會主義的路線，而是極力與資產階級爭鬥，在準備暴動的時候，就很堅決的有計劃的預備第二步鎮壓資產階級的反叛，那麼當時上海的工人階級不一定遭受這樣可怕的失敗，全國的革命也不一定受到這樣的打擊。上海三次暴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偉大的一頁，是暴動的藝術上偉大的成功，可以垂爲歷史的教訓，可是並不因此就掩蓋了當時機會主義的錯誤，這是值得我們重書一筆的。

上海「四一二」慘變完全證實了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於中國資產階級必然脫離民族革命戰線轉變到反革命的診案，同時也就產生了主要階級力量之新離合。

中國資產階級與其軍事領袖背叛革命之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於工農羣衆運動之發展與中國共產黨之勝利，他方面在於帝國主義聯合壓力之強大。民族資產階級看見羣衆革命運動發展，看見了革命工農羣衆的要求與口號，必然要與帝國主義軍閥勾結，不願革命繼續進展——他也真這樣做了。這樣一來，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民族革命戰線，跳到反革命的營壘去。革命受到部分的失敗，但是走進了更高的階段——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的聯合破裂了，開始轉變到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聯合，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同時加大。

此時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重要指示之一，便是：「革命繼續的前進與深入，國民黨左派領袖與某些軍官的繼續叛變，很有可能——而且必然不可避免，共產黨必須極力調動廣大的下層工農羣衆，嚴厲批評一切的動搖，應時的揭破一切勾結蔣介石與帝國主義的趨向，採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制裁這些動搖的分子，然後才能防止或鎮壓那些國民黨上層領袖不可避免的叛變」。而當時中央執行的路線，却是一味懼怕上層領袖與將軍們的動搖，極力抑制羣衆的革命鬥爭，以讓步妥協來企求這些領袖與將軍們的諒解，不離開革命。實際情形與共產黨所估計的相差甚遠，結果諒解不可得，共產黨反而跟隨動搖

的小資產階級領袖跑，實際上也就是跟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跑。

中國共產黨對於革命動力估計之錯誤，更莫過於把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相對立去看待這件事了。

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使牠與帝國主義接觸而引起最堅決的衝突，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足以掘斷帝國主義力量之根源。可是中國無產階級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國民族的使命，祇有隨着力爭自己的階級要求鬥爭發展，就是反對外國資本同時亦反對中國資產階級鬥爭的開展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事實上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之後，如果不加強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簡直就談不上反帝國主義與肅清封建勢力的勝利，徹底的民權解放鬥爭，不但不會和工農羣衆運動的開展及土地革命的要求相衝突，而且是動員下層廣大羣衆之前提。誰要民族解放革命成功，誰要中國完全脫離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與封建殘餘的壓迫，他便應當促進，擴大並激勵工農羣衆的社會階級鬥爭，因為這是徹底完成中國革命的重要原素。然而過去（特別是一九二七年武漢時期）中國共產黨中央却完全是孟塞維克似的，居然把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對立起來，彷彿認為階級鬥爭的開展，足以破壞國民革命，而要想叫全黨及工人階級和農民都自己來限制階級的要求，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地主不用革命鬥爭方法。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所發給上海黨部的信，對於上海鬥爭的指示說：「一方面反帝國主義運動消沉下

去，別方面工農運動發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資產階級看來是如此。單調的去武裝工農沒收土地，高叫非資本主義前途等等口號，使小資產階級懷疑共產黨快要革國民黨的命，要進行階級革命而不是國民革命。足見那時共產黨中央認為階級鬥爭是一事，國民革命又是一事，兩者之間有不能相容的衝突存在着。這一信裏又說：『小資產階級看不見沒收土地是國民革命的必要前提（實在當時共產黨中央自己也看不見！），以為只有共產黨要沒收土地實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農的力量，因此小資產階級不能不提出這種問題，不能不要求限制工農運動，甚至於與共產黨破裂。在這種情形之下，能不能完全轉變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呢？如果這樣，那就是取消我們的力量，拋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投降蔣介石，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前途。然而（好一個『然而』！）能否硬要沒收土地武裝工農呢？這個結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滅革命的根據地。如果我們不能用相當的方法過渡這種難關，那就是資產階級勝利。我們若因此就拋棄沒收土地武裝工農的政策，這當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許的問題，我們已經決定領導農民自動的沒收土地，武裝起來，這是獨立的政策。但這種政策太危險了（十足的機會主義者的口吻！），假使我們完全獨立的幹起來，那末，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將要破裂。固然這是光榮的失敗，但是破裂對於我們是不利的。我們應該找新的道路。經過新的道路來渡過現在所遇的危險與困難，使革命深入，而得到最後的勝利。這一指

示的結論是：中央叫上海的黨部『不要看着國民革命運動是工人問題，而要到了各階級中去宣傳反帝國主義』，這就是說要去宣傳上海資產階級。這真是聞所未聞的不革命的非共產主義的方針。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這種機會主義乃是資產階級影響的反映，中央的這種方針，完全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及決議不符，完全與黨員羣衆工人階級及革命的農民之鬪爭不符。

『誰要替這種機會主義者辯護，或者主張繼續這種機會主義，他便永久和共產主義分離了！』（八七緊急會議告同志書）。

三 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運動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就是無產階級最先進最革命，階級覺悟最高的一部分。共產黨的工作應當始終從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出發，要求以革命的方法，變更全社會的組織。共產黨既然以工人階級利益爲最重要的前提，同時，更要提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時期中客觀上可以解決的要求，在這一革命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上的時期中，都是如此。共產黨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組織工人羣衆而指導他們的鬥爭，堅決的力爭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爭得絕無束縛的工人組織及階級的工會之完全自由，爭得無所限制的罷工權，努力反抗以及消滅工人無權無利的奴

隸狀況。

這種要求，工人都可以在民權革命中提出，但是必須用無產階級羣衆的獨立鬥爭。共產黨應當發展擴大並激勵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應當領導工人每次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共產國際屢次命令中國共產黨，要力爭增進工人階級羣衆的物質生活，堅決的要求改良工廠生活，提高工人的社會生活，激進的取消一切壓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極力爭取自己組織工會及罷工之權利。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七次擴大會議決議案中說：

「無產階級要在革命中佔領導的地位，必須堅強其政治的經濟的階級組織。共產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使他能盡這個歷史使命。中國無產階級數量之少及其幼稚，須以有組織的力量及明確的思想補償之。」

共產黨的基礎，是現在代表幾十萬產業工人的全國總工會與鐵路總工會及海員總工會。共產黨最緊急的任務，是吸收廣大的工人羣衆，以鞏固這些組織。在二年來之國民革命爭鬥中，工人階級展開了很大的力量。在實際鬥爭中，他已獲得革命運動的領導。在這些經驗及成績的基礎上，工人階級的組織，應當按照下列各項，以求更強固發展：

(A) 創造羣衆的產業工會，以產業爲基礎聯合一切工會，鞏固全國總工會。

(B) 加緊羣衆的工作，鞏固工會上級指導機關與下層工人羣衆的關係；職工聯合會中要吸收手工業工人，小企業工人以及文化教育工人等。

(C) 更加注意工人經濟鬥爭，使經濟鬥爭轉變到政治鬥爭，規劃罷工運動的策略，組織互助和罷工基金，援助和創造協作社等。

(D) 作反對改良主義的方法之鬥爭，以加緊工人羣衆中的教育工作。

(E) 加緊中國職工運動與世界職工運動的關係，對於遠東各國的職工運動，特別須密切聯絡。

為吸引工人階級羣衆到鬥爭陣地，並加強他在革命中的地位起見，中國共產黨應當宣傳下列的要求之實行：(1) 革命的工農組織的活動完全自由，工會公開，頒佈最進步的工會法，承認罷工權。(2) 勞工法，八小時工作制，每星期休息一天，規定最低工資。(3) 社會法；衛生監督及勞工條件之檢查，改良住房，疾病，衰老，殘廢，失業等等的危險。保護女工童工，禁止女工作夜工，禁止雇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做工。(4) 創立監督工廠的機關。(5) 取消罰金及肉刑制度。(6) 撤退工廠中各種駐兵及警察等。(7) 救濟失業，擴大工會在失業工人中的影響，工會中設立工人職業介紹所。

在革命的現階段中還有一個很大的後備軍，未曾充分利用他們的革命力量，這

就是被帝國主義破產的城市的手工業工人羣衆，他們是反對外國資本的。代表無產階級先鋒的共產黨，必須組織並吸引這些羣衆，使之參加國民革命運動的總潮流。

一九三七年五月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對於中國工人運動亦有同樣之指示，並且特別指出發表與鞏固階級工會，爭取罷工權及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之重要。共產國際的這種指示和各地工人羣衆自己鬥爭是相適應的，和共產黨各地黨員團員羣衆的行動亦是相符合的。然而過去共產黨指導機關，特別是武漢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所走的却是別條路，他只在阻止或緩和階級鬥爭和工人的一般革命行動，中央不去開展推進罷工運動，却同着國民黨領袖規定強制的仲裁辦法，而且最終決定主權屬於政府。這種決定對於資產階級很有利益，可是實在大大的阻礙工人運動，那時國民黨中央已有『不得政府同意，工人不能實行罷工』之決議，又有要工會不爲工人要求而鬪爭，須要遵守勞動紀律的決議，共產黨中央並沒有表示反對。中央以爲限制些工人運動，可以保存和資產階級的聯盟；沒有懂得我們不堅決的擁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只有使資產階級更加右傾。中央想盡方法限制工人的經濟鬥爭，不使他們爲自己階級直接的利益而鬥爭，其實這種要求不能實現，便永世也說不到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中央當時規定這種策略。實是因爲自己對於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觀察是錯誤的，對於國民革命之利益的

觀點也是錯誤的。

自然爆發而發展的工人運動，自下而上建立了強大的工會，完全在共產黨員影響之下，並且發生了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及廣大的勞動童子團等等。工人階級自己覺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來反抗資本家，而資本家早已反革命，對於生產則怠工，故意造成工業的危機及金融紊亂。只要工人逮捕幾個廠主店東，一般資產階級便大叫其『過火』，如是不僅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跟着亂叫，而且那時共產黨中央也跟着這樣承認，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堅決說『過火』怎樣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說給工人聽，說不應占領工廠，即使工廠主故意關廠也不應當；說不可以封店，即使店東故意抬高物價也不可以；又說決不應該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顯然是反革命黨也不應該。

潮流似的工人階級向着真正工農民權獨裁進行，中央却盡力阻止工人運動走上這條革命大道。

中央不但沒有設法武裝工人，他一遇見資產階級方面的不滿意，立刻自動的解除武裝，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爲保存與小資產階級聯盟起見，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勞動童子團。武漢國民黨中央下命令叫工人嚴守中央紀律，還要工會去執行，工會只準處罰工人，違法者交政府處理。共產黨中央對於這種命令，連一句抗議也沒有提出，湖北省的省總工會接受這種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認。中央對於工人階級表現的獨立性，

每次都說是『過火』或『幼稚』。他們根本沒有注意自己所說的話，實在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話。

黨的指導機關的錯誤，在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上有更壞的影響，武漢工人奪回英租界，是有很大的歷史意義的，但是這不但不是經過黨的指導機關而實行的，並且中央在事後還說這種舉動不對。又如在中央直接指導下的上海三次暴動中，中央竟使上海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只是成了響應北伐軍的軍事行動，同時又使工人暴動勝利只成立了一個依賴大資產階級的上海市民政府。當時中央又曾傾向於自動取消上海秘密工會（四一二之後），而使工人加入蔣介石的黃色工會，同時却又沒有注意在黃色工會中工作的任務。都可證明當時共產黨指導機關實在沒有盡他無產階級先鋒的責任，而且還有壓制工人階級鬥爭之可恥現象，我們必須根本掃除這種機會主義，以開闢工人運動新的革命的道路。

（四） 中國共產黨與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中的中心問題，因為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中國經濟的落後，依據於中國農村中的封建制度遺毒，帝國主義維持着地主豪紳及封建式的行政機關，封建勢力又轉而維持着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

治。所以非常明顯的是：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同時就在以全力反對地主豪紳的政權。封建勢力的掃除，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上嚴重的致命的打擊。而要根本掃除中國的封建勢力，又只有用劇烈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愈堅決愈劇烈，農民羣衆加入鬥爭的愈多，殲滅地主豪紳的統治愈厲害，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規模愈廣大，國民革命取得勝利愈有把握。所以土地革命實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中樞，共產國際特別說明這一問題已經不只一次了。

當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七次擴大會就已嚴重指出此問題：

「在現時革命發展的過程階段中，土地問題開始緊張起來，成爲現在局面的中心問題。那個階級能夠毅然擡住這個問題而給以澈底的答覆，這個階級就是革命的領袖。中國現在的環境，只有無產階級是能夠實行澈底的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階級，澈底的土地政策之實行，乃是反帝國主義勝利及革命往前發展的先決條件。

不去勇敢地接近土地問題，以擁護農民羣衆客觀的一切政治與經濟要求，這才是革命的大危機。如果因爲猶豫，且誤給資本家一階級單獨協作，而怕把革命的土地問題放在民族解放運動政綱的主位上，那便是錯誤的。這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共產黨必須免去這個錯誤。現在情況的特點就是過渡性，此時無產階級應當選擇他自己的將來：或與大部分資產階級聯合，或與農民強固其同盟。倘使

無產階級不能提出農村政綱吸收農民加入革命，就要失去他自己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袖地位。

鄉村階級分化的增長，加緊了農民羣衆與剝削階級間的鬥爭。共產黨必須十分注意鄉村間的階級分化及從此而起的劇烈鬥爭；共產黨應爲農民運動的指導者，並提出適當的政治經濟口號，以助農民運動之發展。中國共產黨應當承認土地國有爲無產階級的農村政綱之基本要求，但在現時，必須按照中國各地的特殊經濟政治情形而分別的應用農村策略。」

資產階級背叛革命，革命形勢發生變化，於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八次擴大會對中國土地革命問題又作進一步之指示。

「要戰勝中國革命中新的困難，只有動員廣大勞動羣衆加入鬥爭，只有實行土地革命，才有可能。目前要堅決取消繳納富豪之佃租，分配土地，沒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等之一切田產，禁止高利契約，取消貧農受重利盤剝之債務，大減賦稅，課稅攤派於富豪之家等等——這些要求必須在全國，首先在武漢政府領域內實現出來。」

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沒收土地及土地國有——這是中國革命新階段之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這時主要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來解決土地問題，使幾千百萬農

民羣衆起來自下而上的解決土地問題，而共產黨則應當做這一運動的領袖，指導這一運動。」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機關的工作，恰好和這種革命方針絕對相反，湖南農民運動發展，成了強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極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反對豪紳地主，然而這都不能算是過去中央所指示發展的，乃是違背他的指示意旨而做出來的。事實上中國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祇有自下而上的農民運動，各地農民運動只有下級黨部及黨員羣衆領導者，中央只是時時阻滯革命的農民運動，甚至於拉他向後轉。「這一問題是最主要的問題，是機會主義最深的禍根。中國共產黨當初對於農民問題差不多沒有注意。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之主要的聯盟者是農民，無產階級的領導革命，必須是取得對於農民羣衆的領導權，這就是說必須有明確的土地革命的黨綱。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直到五次大會。五次大會（一九二七年五月）之前，對於農民運動的意見有許多：（一）最早有說「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加也難成功」的；（二）有說「誰能真正打倒軍閥，幫助農民反抗地主的壓迫，農民便跟着誰走」的；（三）有說「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的。但是關於土地問題，誰也不會說起——認真的說起。後來農民運動事實上大大發展，農民政權與土地的問題成了事實的問題，中央才一步步「落後的」追着農民羣衆走。總之，當時有一個一般傾向，便是認農民運動是日益重要

起來了，無論中央主觀上如何的講「鄉村聯合戰線」，也不能拉得住農民了；無論中央如何認為「不應當空想出地主問題來講土地問題」，也不能「勸醒」農民或鄉村中的「共產主義的實行家」了；於是對於農民運動，不得不認為他是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動力，但是對於土地革命始終懷疑。中國革命只被認為反帝國主義革命——五卅式的革命，不認為土地革命。一切「耕地農有」直到「不宜由農會議決實行減租」之激進的或妥協的決定中，都沒有堅決明顯的對於革命內容之認識在內。所以對於以土地問題來決定國民黨左派是否真正左派，始終是不贊成的」（見瞿秋白著『中國革命與共產黨』七十八至七十九頁）。當時各省歷次的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全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及一九二七年一月江西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都沒有拿出自己對於土地問題的政策。直到一九二七年三月間湖北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方才提出這一問題。

在第五次黨大會時（一九二七年五月），土地問題決議案雖然通過了，但是當時黨的領袖陳獨秀譚平山（後來都背叛無產階級已被共產黨陸續開除出黨）等，却說現在祇要擴大而暫時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沒收土地還要等一等。

武漢國民黨中央的土地委員會開了三個禮拜，以譚平山為領導的共產黨員幾次改變了自己的主張，兩次都是看着國民黨代表是否接受而改變的，最後擬出了一個草案，只

在原則上定出解決土地問題，而不求立即解決，當到國民黨中央決定不公布這一議決案，共產黨黨員之中，沒有一個人提出抗議的。

共產黨湖南省第七次省委擴大會議，甚至決定凡田租超過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減租——這個時候是湖南農民協會開始積極的鬭爭，甚至於已經實行分配土地的時候了。

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反對革命的方針到處可以發現。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央宣傳部通告說：「我們應當記着，我們黨對於農民的政策是堅決的實行制止反對小地主，革命軍人，小資產階級的過火行動」。六月十四日中央通告又說：「放任農民無組織的自由行動來解決土地問題，已經引起了無數的過火行動，這種情形，必須糾正」。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不但跟着地主軍閥及小資產階級極力反對農民運動中的「過火行動」，而且甚至於還有一種非常可恥的論調，居然說武漢境內的過火行動是蔣介石奸細所做的——這簡直是代表武漢將軍們說話，因為他們也說這種過火行動是蔣介石的奸細做的，可恨共產黨的指導者也居然這樣無恥的替壓迫農民運動的人辯護。全國農民協會的訓令說：「蔣介石及土豪劣紳利用小數農民，侵犯軍人家屬的事，專門從事挑撥離間，他們故為左傾之宣傳，而後再從而壓迫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負指導者之一曾說：「自由逮捕，使小資產階級戰顫不安，他們覺得彷彿國民政府做了共產黨的俘虜了，

他們這種感想必須使之消滅』。實際上當時國民政府並沒有做共產黨的俘虜，倒是我們這位替反革命擔憂的共產黨員却實實在在做了國民黨的俘虜！

上述情形，足可說明，當時偉大的兩湖農民暴動，不但驚嚇了地主軍閥及資產階級，甚至於驚嚇了共產黨的指導者；那時正是各地共產黨員羣衆力爭這個運動的發展，勇敢的犧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貴，然而中央受着國民黨領袖恐嚇猶豫的影響，不但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動政綱來解決土地問題，而且還處處阻礙農民運動的前進。對於農民政權問題，也是非常之機會主義的，不去考察農民羣衆革命鬪爭的經驗而引出相當的結論來，却想只靠着死板組織鄉村自治的系統表——這不但不合實際生活，且大有害於革命，其實客觀革命潮流已經將革命的政權交付於農民協會，發動了沒收大地主土地及減租的運動，解除了民團豪紳的武裝，懲治鄉村中的反革命派。

黨的中央不去贊助並發展這一革命政權的方式，反而同意國民黨中央提出死板的組織農村自治，這鄉村自治的意義是怎樣的呢？只要看全國農民協會的訓令就可知道了。這一訓令上說：『建立鄉村自治以鞏固農民之勝利，而消滅鄉村中之無政府狀態』。這就是說農村中一切農民自動沒收土地，自由逮捕豪紳的現象，都應使之消滅，而恢復地主豪紳之秩序，這還說得上甚麼『鞏固農民之勝利』呢？！

中央雖不敢公開的反對沒收土地，然而一切實際政策都是取消這一口號。五月二

十五日的中央決議上說：『關於土地問題，我們固然不能放棄第五次大會所議決的政綱，但我們須知道中國土地問題尚須經過一個相當的宣傳時期，並且必須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鄉村政權問題，因此，我們即須：（一）擴大土地問題在各方面之宣傳，尤其在軍隊中；（二）着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及縣自治政權』。如果將這一決議和各地農民羣衆自動沒收土地之事實併在一塊兒看，那末共產黨中央機會主義的方針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這種政策對於湖南政變中黨的行動有異常之惡劣的影響，長沙馬夜事變之後，因湖南共產黨員的建議徵調農軍，進攻長沙的反革命，如果農民的武裝進攻不受黨的指導之懦弱的猶豫的阻滯，那末，一個長沙城被十萬農軍所包圍，並不是不容易打下來。最後的幾分鐘，正當進攻長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派往湖南的特派員李維漢同志下了一個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說武裝進攻長沙可以引起整個政局之糾紛，應當等一等中央的訓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說應當等一等進攻，先團結些力量，等國民政府來解決，停止進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的農軍，大多數農軍因此而退却，只有瀏陽的農軍部隊偶然沒有接到命令，因此而有五月三十一日下午瀏陽農軍單獨進撲長沙之壯舉，經過堅決的奮鬥方始因爲衆寡不敵而退却。這一總敗退的結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凱歌，後來弄到幾月幾年全省的大反動。共產黨中央在農民暴動的關頭，表現這樣沒有鬥

爭的決心，簡直等於出賣革命，這是無論如何不能辯護的，的確是我們黨歷史上的一大污點。中央何以決定停止暴動呢？只要看一看五月二十六日議決案就可知道：『現在本黨的職任既不是推翻他們（仇敵），也不是我們完全投降，還有中間的路，要找這中間的路，現在不宜於直接和他們武裝衝突，我們的職任是等候時機，深厚自己的力量以準備不可免之進攻』。中央表現如此可恥的無決心，實際上不是幫助農民運動等候時機，乃是幫助反革命的長沙叛徒等候時機。長沙事變時，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地步，只要看當時決定贊助唐生智專電的主張，中央總說唐生智的好話，引起許多幻想，彷彿長沙事變，是違反唐生智的志願似的，中央雖然有時在口頭上提出對於長沙摧殘工農團體的抗議，並要求懲辦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實際上的動搖猶豫，完全幫助了湖南事變的反革命派鞏固政權。

這種敗亡的失策，應當給我們以嚴重的教訓，中央對於土地革命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竟如此之深遠，甚至於弄到所有緊急關頭與指示，都帶着有背叛羣衆運動的性質。

不僅如此，共產黨在國民政府中的代表譚平山（農政部長）的行爲，更是萬分可恥！當時國民政府農政部極力反對土地革命，極力想使農民運動就範，走上資產階級式改良主義的道路。農政部在五月裏出了一個布告說：『必須糾正農民幼稚行爲，尤其不能不懲辦其出軌範而侵害無數農民之分子。至於與反革命奮鬥，懲辦土豪劣紳，則

須以合法的手續進行，遵照黨及政府之訓令規章即須交付正式官廳，不得自由行動」。這一佈告及一切農政部的行爲，最足以表現當時共產黨中央對於土地革命問題之反革命的妥協的方針。

中國共產黨這種對於土地革命問題的機會主義的方針支持得很久，一直到八七緊急會議都還沒有完全糾正過來，甚至還依然定出「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對小地主則減租」這樣不正確的策略。在實際行動則在八一南昌暴動與葉賀南征過程中，起初有「只沒收二百畝以上地主的土地」之規定，接着又改爲「祇沒收五十畝以上地主的土地」，都顯然是機會主義的留毒。

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雖然糾正了這些錯誤，但是黨中對於土地革命問題還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所以中央接着便又提出「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這自然又犯了抹殺農村中階級意義的錯誤，同時各地農民暴動及少數鄉村蘇維埃區域不能堅決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的現象也還有不少存在。直到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得堅決確定「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歸農民」的口號，通過了土地問題決議案，定出土地政綱，於是中國共產黨對於土地革命問題才算得到了初步的認識。

布爾塞維克 第四卷 第二期

目次

目前政治形勢與我們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的鬭爭

第三時期的中國

中國經濟的性質

關於「金貴銀賤」與無產階級運動的幾個特點

布爾色維克的進攻和機會主義的新活動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金貴銀賤之研究

(第四集)

一九三一年七月

中國經濟協會出版

布爾塞維克

第四卷 第四期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版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目次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擴大會議決議案

反對軍閥戰爭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前途

最近蘇聯的國際及國內形勢（續）

論革命轉變問題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續）

華崗

莫洛托夫

猶新

華崗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決議案

(一九三一年四月)

——各國經濟危機的加深，革命危機條件的長成，與共產

國際所屬各國分部的任務——

一 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蘇聯社會主義的猛進

在去年，由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危機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歷史上最大世界經濟危機，影響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與生產的一切主要部門，同時，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有飛躍的發展。這就空前銳利地暴露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制度與正在崩潰的資本主義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間的矛盾，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地猛烈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超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優點，從沒有像現在暴露得這樣明鮮。基於剝削、奴隸、市場競爭的資本主義制的破產，現在明白地暴露出來了；基於生產手段社會化、廢除剝削、有系統地改善勞苦羣衆的物質水平文化水平的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的制度）的優點，現

在也明白地暴露出來了。

兩種制度間的這個天天生長的矛盾，現在成爲國際關係的核心，影響到帝國主義世界內許多矛盾進一步的發展。因爲危機的結果，這些矛盾已經特別地劇烈化了。諸帝國主義者，既然被十月革命剝奪了剝削與奴隸蘇聯人民的機會，現在又被蘇聯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化所直接威脅，正在猛烈地競爭市場，不過因爲危機的結果與民衆的逐步貧窮化，市場業已縮小了。按蘇聯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化，正在創造若干條件，來發展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經濟，不依靠諸資本國家的技術。各帝國主義者，正想犧牲勞苦羣衆，犧牲其勁敵，犧牲殖民地，犧牲蘇聯，努力從危機中解脫出來，其結果自然採取無限制的保護與傾銷政策，加強帝國主義爭取世界領袖的鬥爭，加強帝國主義重新分配殖民地的鬥爭，努力準備帝國主義戰爭與武裝進攻蘇聯的戰爭。

自從上次共產國際執委的擴大常務會議（一九三〇年二月）開會以來，已經有一年了，這一年算是歷史轉捩的一年。牠暴露了資本制度的危機日益擴大與牠的末日快要到來。

資本主義穩定，正在走向日暮途窮。在蘇聯，正在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安穩

（一）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危機的發展，從（甲）生產繼續的縮小中，（乙）

（一）民衆貧窮化，國內市場內消費的銳利減少中，（二）對外貿易的巨大減少中，表現出來。

在蘇聯，不但沒有危機，而且有迅速的進展，生產增加的速度，爲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可企及。工業建設的五年計劃，不僅是做到了，而且超過了。在基本工業中，五年計劃，已於三年內完成了，在若干重要工業（煤油業，工程等）中，五年計劃，已於兩年半內完成了。對於工業、交通、電氣的投資，步步增加了（一九三〇年百分六十；一九三一年百分八十）。基於社會主義的競賽與最新技術的使用，勞動的生產力，也步步提高了，民衆的消費也步步加多了；無產階級政府所執行的規定物價的一貫政策，確定了商品在工業與農業間的流通，擔保了真正工錢與農莊進款的逐步提高。

（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和農業危機連系一塊兒的經濟危機，大大地加速了幾百萬農民的貧窮化。農民們因爲農業出品的價格減低而破產了，再加上繁重的課稅，強迫勞動，地租，與高利貸款，已經負擔不起了。小農中農降低的過程，已經變得很顯著了。資產階級的政府，爲着解除農業危機，正在設法減少耕種大宗糧食與農業原料的面積。在若干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業的機器化，越加增多，大半影響到資本主義的農莊，更足以加速廣大農民羣衆的貧窮化。

蘇聯，農業有迅速的發展（耕地與出產，都有增加），是由於貧農中農的決然轉

變，他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底下，趨向於集體農場。五年計劃中的集體化，已經在兩年內完成了。因為鄉村社會主義化（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的結果，農民勞苦羣衆的物質水平文化水平都大大地改進了。五年計劃中的五穀生產，在兩年內超過了原定的數量。農業已經放在機器與電耕機的基礎上，每年無產階級政府投入農業中的資本也逐漸加多了。基於大量集體化，富農階級快要消滅了，組織於集體農莊的中農羣衆，正在變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強有力的保障。

（三）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正在進攻工人階級與勞苦羣衆，正在設法以經濟掠奪的手段，把危機的惡果，轉移到勞苦羣衆的肩膊上，如大批開除工人，大批失業，減少工錢，增加工人階級的稅率，提高農村勞苦羣衆與城市貧民的課稅，提高關稅，故意阻遏零售價格的降落，減少社會保險等等。這一資本家進攻，把無產階級弄得窮苦不堪，使他們感受深刻的痛苦。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失業，差不多影響到三千五百萬產業工人（除開幾百萬失業的農業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殖民地的與半殖民地的，沒有列入這些統計內），他們廣集於勞動市場上，被資本家利用來減削在業工人的工錢。這一資本家的進攻，不僅是針對着工人階級，而且是描準着鄉村中與城市中的廣大勞苦羣衆的各階層，後者爲着自己的切身利益，必須和無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來反對強盜式的壟斷資本。勞苦羣衆中的死亡，自殺，與被殖爲娼，都增加了。殖民地的資本進

攻，特別厲害，因為殖民地的工人階級，必須忍受帝國主義與本地資產階級的雙重壓迫，並且感受最野蠻的剝削。在危機的當中，資本主義企業中工錢勞動的奴隸性，比以前暴露得愈加顯明，在工業農業中是這樣。在殖民地與帝國主義國家內也是這樣。

在蘇聯，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化，與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改進了工人階級的與一般勞苦羣衆的物質水平與文化水平。一方面無產階級的數目，大大地與不斷地增加，另一方面，失業早已沒有了（一九三一年，打算額外徵調兩百萬工人到工業中來，這是第一次）。一九三一年蘇維埃工業，過渡到七小時一日，同時真正工錢加多百分六，大半業已完成了（在過去兩年，工錢增加百分十二）。社會保險基金，辦事處僱員福利基金，在五年計劃的頭兩年內，增加了三。一九九百萬盧布，在一九三一年，又要加多二。一三八百萬盧布。民衆的叛逆熱，業已增加了，產生了社會主義的新勞動形式（社會主義競賽，突擊隊等）。

（四）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世界經濟危機的發展與劇烈，產生了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內與法西斯蒂國家內統治階級的政治反應的銳利地劇烈化；所謂資產階級民主，不過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假面具，而法西斯蒂主義，却赤裸裸地代表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企圖降低廣大勞苦羣衆的生活標準，增加對民衆的經濟與政治壓迫，以便從經濟危機中，找一條資本主義的出路，所以牠（資產階級）正在組織許多法西斯蒂的恐怖主義隊

伍，正在破壞勞動與一切革命組織，正在剝奪工人與農民的集會自由言論自由，正在以強權仲裁與暴力壓迫罷工，槍殺示威的失業工人與罷工的工人，殘剝地鎮壓革命的農民運動。

在蘇聯，工人階級的政府，在肅清剝削階級的最後殘餘當中，發展了最寬泛的無產階級民主，空前地改善了工農中最落後的階層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一九三一年有六〇・九百萬勞苦羣衆參加了各級蘇維埃選舉（一二・八百萬參加了城市選舉，四八・一百萬參加了農村選舉）。勞苦羣衆的政治活動與創造精神，正在突飛猛進地發展着，並且應用到蘇維埃，職工會，工廠突進隊，蘇維埃農莊，集體農莊中去了；在這種種地方，工人與農民於蘇聯共產黨領導底下，結成了兄弟同盟，來進行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化與鄉村的集體化。

（五）在蘇聯，工人階級政府的存在，在於維持堅決的和平政策，和各國建立相親相愛的關係，一貫地爲完全解除武裝而奮鬥，聯合蘇聯內諸民族中的勞苦民衆，發展以前被沙皇壓迫的諸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使牠成爲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主要障礙物。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機關，被財閥獨占了，其掠奪性特別表現於危機（目前經濟危機）中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強，表現於帝國主義者企圖擴大殖民地與勢力範圍，表現

於奴隸殖民地的各種形式的加強（劇烈化），表現於企圖以危機的負擔加於較弱的，不能獨立的國家以及被奴役的人民身上。

目前的危機，特別猛烈地加強了資本主義世界內的主要矛盾，——英美爭取世界領袖的鬥爭。美資本主義現在以壓力加於英國自治殖民地，英國採取帝國主義關稅政策，英美加緊爭取南美與中國內的勢力範圍，都是那一個爭取世界領袖的鬥爭的具體表現。

目前的危機，將巴黎和約遺傳下來的一切矛盾，更銳利地表現出來了：第一，戰勝國家與戰敗國家的衝突，主要的是法國的帝國主義派與戰敗了的德國的資產階級間的矛盾，前者企圖維持並且擴大其對於歐洲大陸的軍事霸權與政治霸權，後者努力執行楊格計劃，却遇着了勞苦羣衆有加無已的反抗；第二，戰勝各國的強取豪奪的鬥爭，正在加緊——法意爭取地中海與北非殖民地；第三，主要的帝國主義強盜的附庸國家間的矛盾，也正在劇烈化，如巴爾幹，捷克，匈牙利等。因此，修改楊格計劃的問題，協約國戰債問題，國界（波蘭走廊——指但雀城譯者）問題，德奧合國問題（關稅聯盟），德國企圖收回殖民地與取消軍備限制的問題，都變得更加銳利了。因此，出現了軍事同盟政治同盟的新制度；軍備的猛烈的增加，却以國際聯盟的軍縮會議來掩護牠；軍費的增加，達到國家總預算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海軍的重新整理（倫敦海軍會議）；軍事航

空的發展；化學戰爭的準備；陸軍的機器化與建立資本主義的軍隊，並且引用可靠的階級幹部。因此，帝國主義加緊壓迫殖民地，波蘭，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希臘，意大利，法國（亞爾色斯，羅林）內的主宰民族，壓迫其他少數民族。

資產階級專政的帝國主義政策，加強了世界帝國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到處樹立了新軍事衝突的基礎，自然不可避免地要進到新的大規模的帝國主義戰爭。這一政策，並沒有絲毫解除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自然要劇烈地準備向蘇聯進攻，準備明顯的帝國主義戰爭與反革命戰爭，來奴隸蘇聯的民衆與恢復資本主義。

（六）世界經濟危機進一步的發展中，階級鬭爭也發展了。牠在廣大勞苦羣衆的前面提出了這一問題：讓資產階級專政麼，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願意當經濟與政治的奴隸麼，還是推翻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壓迫；願意受殖民地式的壓迫與帝國主義戰爭呢，還是要國際和平與親愛；願意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與種種危機麼，還是要消滅無政府的狀態與危機的社會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間，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間各種矛盾的發展，極端地加強了武裝進攻蘇聯的危險。資本主義國家內階級鬥爭的劇烈化，資產階級企圖犧牲蘇聯以便從危機中解脫出來，資產階級恐怕社會主義的勝利，他們希望蘇聯資本主義復興與垂死的反革命階級（富農，城市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擁護所採取的策略失

敗了，這種種逼迫世界資產階級採取向外進攻的策略，一面用經濟封鎖，一面用軍事干涉。

「實業黨」與孟塞維克「全聯局」的審判，暴露了以法帝國主義為領袖的進攻蘇聯的廣大國際陰謀的存在，這一法帝國主義，正在從巴黎和平條約所奴役的諸國中榨取點滴的血汗，正在組織歐洲的法西斯蒂政權，正在從事巡查歐洲的工作，和以前的帝俄一樣，那些審判，更顯示了諸帝國主義者，得到第二國際的幫助，準備於一九三〇年春季，現在依然準備向蘇聯進攻，為着這個目的，正在利用英法帝國主義的附庸國家，如波蘭，羅馬尼亞，芬蘭等。為着積極準備於一九三〇年進攻，胡佛（美國總統）建立了一個特種組織，美其名曰聯邦農莊局，任命中校勒格做局長，以便供給進攻各軍的糧食，按勒格氏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曾經做過軍糧總管，供給協約國的軍隊。為着同樣進攻的目的，出現了所謂農業會議，軍縮會議，大歐洲會議，以羅馬教皇及其他宗教代表為領袖的反蘇維埃壓迫宗教的種種運動，反蘇聯的傾銷運動，反蘇聯強迫勞動的運動。

二 資本主義國家國內階級鬥爭的劇烈化，資本主義國家

內的革命高漲與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的生長

一、首先影響到資本制度最弱的環子的經濟危機，更加促進了資本主義一切根本矛盾的劇烈化；廣大羣衆的不滿。日日銳利化；共產主義的發展，以及蘇聯聲望的提高，這種種一面使資產階級公開地使用暴力機關與獨裁機關，另一面推動了若干國家內革命高漲的發展與革命危機先決條件的發展。

法西斯主義，原來從資產階級民主發展出來的（資產階級民主，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假面具），現在赤裸裸地成爲資產階級的獨裁，銳化了鎮壓與奴隸勞苦民衆的一切方法，這一鎮壓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而且是和資產階級獨裁的整個體系分不開的。法西斯政權，和資產階級的殘餘打成一片，已經成立了，並且在破壞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的過程中，在鎮壓共產黨的過程中，在建立特種軍事恐怖組織（不管是存在議會形式，或廢除牠）的過程中而加強了。

法西斯蒂使用社會騙術以便欺哄羣衆，以便掩蔽資產階級獨裁的反革命目的，爲的是要削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對全世界幾百萬被壓迫被奴役的民衆的革命影響，爲的是要和緩工農羣衆及殖民地民衆的革命運動。法西斯蒂，被財政資本所收買（如希特勒），利用勞苦羣衆的痛苦，挑撥民族惡感，激起戰敗國報仇的帝國主義精神。激起反猶太的情緒，傳播反資本主義的詞句來掩護他們爲資本家奔走的勞役，更在德國利用楊格計劃，借題發揮，以便加強資產階級的獨裁，以便殘刻地鎮壓工人階級。

法西主義最近發展的可能，僅僅由於國際社會民主黨，在戰後資產階級獨裁的整個時期內，不問牠（法西主義）的形式如何，予以誠懇的擁護。社會民主黨，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與法西主義不同，其目的在和緩民衆反對政治反動與法西主義的積極性，在掩護資產階級民主其名，而資產階級獨裁其實的反革命性，這樣，社會民主黨，變成了資本國家法西斯蒂化的過程中的積極原素與督促者。

反法西主義鬥爭的成功，要求共產黨調動羣衆自下而上地組成統一戰線，反對資產階級獨裁的一切形式，反對走向公開法西獨裁的一切反革命辦法。這一成功的鬥爭，要求火速地堅決地改正過去的錯誤。主要的錯誤，是用自由主義的眼光，區別法西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的不同，區別資產階級獨裁的議會形式與公開法西斯蒂形式的不同，這簡直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反映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了。

（二）自從共產國際常委二月擴大會議以後，因為工人階級生活標準銳利的減低，失業的蓬勃發展，辦事處工人（可以譯作店員）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農民受巨量的剝削，殖民地極端地貧窮化，蘇聯革命影響的擴大，革命高潮益加高漲了。

革命潮流的高漲，可以在以下的各項中看出來：

A 罷工鬥爭與失業運動的更加劇烈化；

B 中國蘇維埃的發展與加強，與紅軍佔領廣大的地帶；

C 殖民地革命運動的發展；

D 農民革命運動的發展；

E 重要的共產黨（如德國，中國，捷克，波蘭）政治影響與組織勢力的發展，

F 社會民主黨內反對派鬥爭的劇烈化；

G 城市小資產階級，辦事號工人以及下級文官中反對派的發展。

革命高漲的發展，自然是不平衡的，其程度與速度，須合於某一國家內資本主義的危機與內外矛盾的發展與劇烈化。在某幾個資本國家內，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戰後的總危機的特種情況打成一片，因此變得非常銳利，如德國，在這裏，資產階級的國家，已被巴黎和平條約與揚格計劃的負擔所壓倒，並且被剝奪了剝削殖民地的機會，又如在波蘭，波蘭已被民族矛盾所撕碎，負荷軍國主義的負擔（謝謝波蘭帝國主義），目前正在準備向蘇聯進攻。這一經濟危機的發展，將要進到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的成熟。在目前，基於經濟危機的劇烈化，西班牙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正在迅速地發展着，西班牙仍保存着封建主義的巨量殘餘，所以發展的法則，也就特別深刻。

在許多最大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如中國印度），因為經濟危機與農業危機打成一片，因為帝國主義封建高利貸剝削的加強，因為民衆的極端貧窮化，幾百萬民衆們正在起來舉行民族革命，反對整個帝國主義殖民地式的制度，而深刻的革命危機的原素，迅速

地成熟着。

這些革命危機的原素，由資本主義總危機與現在經濟危機生長出來，現在更連繫到民衆的非常貧窮與痛苦的劇烈化，連繫到民衆的革命行動，連繫到資本獨佔的整個國際與國內制度的打碎，連繫到階級力量的迅速地重新結合，連繫到社會上層份子想以法西斯主義，新帝國主義戰爭，武裝干涉蘇聯來於各種矛盾中找一條出路。

(三)在德國，資產階級在斥退米勒(社會民主黨——譯者)政府以後，於社會民主黨直接幫助底下，逐漸地並且堅決地採取了傾向法西斯蒂獨裁的道路。資產階級與他的國家，一方面利用社會民主黨來做破壞工人鬥爭的主要工具，另一方面保護，組織與利用小資產階級羣衆的法西斯蒂運動(國家社會黨)，其目的在把民衆的不滿轉移到加強資本主義途徑中。革命危機條件的逐步發展，表現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的發展中(共產黨會員增加百分之五十，革命羣衆組織的發展)，表現於社會民主黨羣衆基礎的破壞，表現於羣衆鬥爭反對法西斯蒂獨裁的成立，表現於以勞苦羣衆的社會與民族解放的政綱來擊退法西斯蒂運動，表現於『民衆革命』口號下，爭取被剝削者的新階層來同情於無產階級革命，表現於統治階級的步步恐慌，以致引起資產階級內政治上的重新結合，表現於廣大羣衆對巴黎和約與楊格計劃的繼續不滿。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成功，要求對於採用法西獨裁的白魯兢政府，加以及時的指斥。德國經濟危機的發

展，正在引起階級鬥爭的劇烈化與政治衝突的加深，因此加速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的成熟。

在波蘭，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正在進到整個經濟生活的坍塌，無產階級有一半失業了，農民迅速地破產了，於是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表現於城鄉革命鬥爭的劇烈化，（失業工人積極示威，反對苛稅，反對修路的強迫勞動的等），表現於被壓迫民族鬥爭的劇烈化（西烏克蘭），表現於社會法西斯蒂與法西斯蒂黨內下級的反抗，表現於皮爾蘇得斯基派（波蘭政府黨——譯者）與其走狗如法西「工黨」（註）波蘭社會黨（社會法西斯蒂黨）以及諸法西農民政黨的羣衆基礎的縮小，表現於法西營壘齟齬的日益擴大與波蘭共產黨的加強。

〔註〕牠的官名是「非黨社會主義者」，是從波蘭社會黨分化出來的，自命爲革命黨，但是比波蘭社會黨還要法西斯蒂一點。

在中國，革命危機表現於蘇聯埃與紅軍的組織，牠們所佔據的領土內，有幾千萬的戶口，因此，中國遂站在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前線。蘇維埃與紅軍的成立，證明了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反帝革命，與農民革命中領導的成功，這一領導，在政權建立的初時，已經把牠自己加強了。從土地革命產生出來的蘇維埃與紅軍，正在以蘇區的具體經驗，引起產業中心的工人與農民羣衆來加入鬥爭，沒收地主的封建財產，分配

土地於農民，消滅反革命國民黨的劊子手的政權。中國蘇維埃運動進一步的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世界的革命，連系到蘇維埃與紅軍根據地的擴大與鞏固。

在印度，反對英帝國主義的革命羣衆運動，由於工農運動的發展，與民族改良資產階級和英帝國主義結成的反革命同盟與叛逆行動，正在變得愈加寬泛愈加深刻。革命羣衆運動，正在吸收幾百萬新的工人農民以及城市貧民，正在破壞反革命甘地主義的基礎，把民衆從甘地主義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開始革命鬪爭的公開形式，（和軍警武裝衝突，北華夏武裝暴動，緬甸農民暴動，公坡爾的武裝暴動，廣大工人示威反對甘地與國民會議）革命運動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是印度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牠所以能夠實現的原故，是由於（一）工人羣衆逐漸拋棄民族改良的影響與最危險的『左派』的勢力，（二）共產黨已經成立了。工人階級當前的任務，在於組織被壓迫者的革命行動，來反對英帝國主義與國民會議，來發展工農運動，來組織一個全印共產黨與赤色羣衆職工會，來準備一個總政治罷工。

在安南，革命高漲，正在極端的恐怖中發展着，（被法軍大批槍殺，全村燒燬），可以從工人階級反帝運動的繼續發展中，以及農民城市貧民的反帝運動中看出來，這一運動，大半在共產黨領導的底下。牠（運動）採取大規模示威，遊擊戰爭，與軍警武裝衝突的種種形式，並且在北部形成了蘇維埃的成立，因爲在那裏中國革命的影響特別

厲害。

正在發展中的革命高漲，同時，資產階級，又不能解決帝國主義世界（尤其是殖民地）的根本矛盾，生產了種種條件來發展德國與波蘭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來進一步發展中國與印度的革命危機，來促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內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的成熟，主要的是看各國共產黨能不能調動與領導羣衆運動，來反對資本家的進攻與政治反動，來向無產階級與其他勞苦羣衆證明要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覺悟到：要解除資本主義的危機，必須革命，即是說，只有革命才是出路。

三 社會民主黨成爲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保障

（一）世界經濟危機，很明顯地暴露了國際社會民主黨的作用，在於做資產階級獨裁的主要社會保障。自從世界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專政成立以後，在階級鬥爭發展的一切基本階段中，社會民主黨總是站在資本家方面來反對工人階級。牠在國防的旗幟下，將幾百萬無產階級送到帝國主義劊子手裏去了。牠幫助各國資產階級於一九一八——二〇年向蘇聯進攻。牠於戰後救護了資本主義，使無產階級革命功敗垂成，如在德國，奧國，匈牙利，意大利，芬蘭。牠積極幫助資產階級鞏固資本主義的工業。牠把大批工人羣衆放在資本合理化的桎梏內。牠在目前銳利危機的時期內，特別

努力於救護剝削的與奴役工人的資本制度，使牠不馬上倒塌。

(二)自從大戰時起，自從蘇聯成立蘇維埃政府起，社會民主黨的整個發展，在於不斷的走向法西斯主義。

關於向工人階級的資本進攻，社會民主黨的政策，是直接地或間接地擁護減削工錢，減削社會保險，擁護殘酷地合理化的新浪潮，組織破壞罷工，完成仲裁制度，以作破壞罷工與奴役工人階級的工具。

關於民衆們的經濟與財政掠奪，社會民主黨的政策，是極力擁護銀行，托拉斯，加德爾的政策，擁護民衆消費所需要的一切商品的高價政策，擁護提高課稅，與保護關稅。

關於殖民地的掠奪，牠的政策是直接鎮壓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運動，這一政策的意義，是印度幾十萬民衆被逮捕與大批槍殺，農村被飛機炸毀；牠直接擁護蔣介石的劊子手政府，直接擁護外國兵船在揚子江作戰向南華的紅軍進攻，直接擁護安南的
大批屠殺。

關於帝國主義的掠奪，牠的政策是積極地直接地主張巴黎和約中的合作，以及陰謀與祕密外交中的合作，在和平主義的假面具底下，擁護軍備的增加與準備戰爭，擁護帝國主義的軍事同盟。

在英國，工黨允許於執政以後，救濟失業，改善失業者的景況，反對工人生活的降低，要和印度議和，要採取堅決的軍縮政策。實際上，工黨政府爲着執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命令，正在實現資本合理化，藉仲裁與延長工時來減削工錢（煤礦法），減少社會保險，摧殘印度，埃及，阿刺伯的革命解放運動，建造與重新武裝海軍。比包爾溫政府（保守黨政府——譯者）還要進一步，正在和法帝國主義者組成聯合戰線來向蘇聯進攻。

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最近才退出政府，當牠在米勒（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譯者）政府時代，就已經開始向社會保險進攻，開始建造新巡洋艦，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槍殺柏林示威的工人，禁止赤色先鋒隊，壓迫工人的報紙，鎮壓工人的罷工。社會民主黨，執行楊格計劃與通過反勞動的『擁護共和國』法令以後，採取了許多反動辦法以便白魯寧政府樹立法西斯獨裁以後，便被資產階級一脚踢出去了，但是牠不論在權或在野，總是替白魯寧政府的反勞動法令投票，組織破壞罷工，施行警察恐怖來反對罷工者與失業者，積極擁護武裝德帝國主義（建造新巡洋艦），加緊反蘇聯的宣傳，加緊武裝進攻蘇聯的準備。

（三）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整個的反革命反勞動的政策，集中於準備封鎖與武裝干涉來反對全世界的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世界資產階級，因爲對於蘇聯資本的復興，蘇

聯右派的勝利，都失望了，而蘇聯反資本分子的進攻已經成功了，資本國家內革命高漲也發展起來了，於是牠轉向武裝干涉，第二國際底下的一切政黨（尤其是德國社會民黨，牠是第二國際的核心），都較前更加劇烈地傾向於武裝進攻蘇聯與破壞蘇聯，因牠們知道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將要消滅牠們在資本國家內工人羣衆中的影響。

俄國孟塞維克（社會民主黨）『全聯局』的審判，證明了社會民主黨所起的欺詐作用，證明了第二國際以武裝進攻爲恢復蘇聯資本主義的手段，並且利用牠在蘇聯的走狗來於工業的各部門中組織破壞，牠企圖擾亂工農的供給組織，牠企圖減削工人的真正工錢，並且變成了準備進攻蘇聯的世界帝國主義的突進隊。

（四）社會民主黨，在工人羣衆天天表現不滿與大批離開牠的營壘的壓力底下，而本身又絕無能力來應付危機與失業，於是爲欺騙羣衆起見，不得不採取『左派』欺詐的論調，假裝贊成工時縮短與一週五日，贊成擴大社會保險，贊成軍縮，反對法西斯主義。但是實際上與行動上，社會民主黨，却幫助資本家執行向工人階級生活的進攻，鞏固資本家的獨裁，加速資產階級國家的法西斯蒂化，破壞工人羣衆結成連合戰線的努力，掩護進攻蘇聯的準備。

這一切以及同樣的事實，明白地披露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反革命作用，牠是資產階級進攻無產階級的鬥爭中的主要社會擁護者。

所以披露社會民主黨，揭破第二國際，把工人羣衆從社會民主黨的影響解放出來，克服社會民主黨，這種種是各國共產黨的最近任務（當前任務）。假如這一任務不能成功，那末無產階級，便不能成功地從資本主義的桎梏內解放出來。

四 共產國際各分部的實況與他們的任務

（一）共產國際的第十一次全會 對於所屬各分部（即各國共產黨——譯者）在政治上組織上所表現的種種成績，認爲滿意。自從第十次全會以後，蘇聯共產黨內的右派分子，反映了蘇聯主張恢復資本主義的分子對於社會主義進攻的反抗，但是已經完全被擊敗了，同時，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中的右派與調和派，把資本主義進攻與社會民主黨的壓力反映到共產黨運動中來，也同樣被擊破了。這一切便利了以成功的鬥爭反最嚴重的右派危險與反對培養右派的『左傾』機會主義來布爾塞維克地鞏固共產國際所屬各分部，這一切產生了一個條件來履行各國共產黨當前的主要任務——獨立地領導羣衆來爭取工人階級的多數，消滅社會民主黨的羣衆基礎，以便推翻資本主義與成立無產階級的獨裁。

在過去，共產國際所屬各分部的主要成績如下：

A 中國成立蘇維埃與成立紅軍，共產黨領導中國與安南的農民革命。

B 各國黨的政治影響的加強：德國黨在反對成立法西斯獨裁的革命鬥爭加強了對於羣衆的影響（上次投票得四、六百萬），德國捷克工廠委員會選舉的成功，各國黨領導底下革命失業運動的大大發展，德國黨保加利亞黨在城市選舉運動中的成功。

C 在組織工人階級對資本進攻的反抗與工人階級的反攻當中，各國黨的領導作用加強了；在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中，各國黨的獨立領導加強了，特別是德國。

D 關於組織德國的獨立革命職工運動，成功地執行了赤色職工國際五次代表大會的總路線。

E 各國黨在農民中的政治影響增加了（如波蘭）。

F 各國黨的組織發展了，如中國，捷克，意大利等。德國黨在爭取工人階級多數方面，表現了大大的進步，牠的經驗，獲得了偉大的國際意義。

G 印度的黨成立了，並且發布了一個積極的革命政綱，安南的黨也加強了。

（二）同時，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要從大多數分部的工作中，指出許多嚴重的弱點與缺點；主要的是，羣衆激烈化，黨却落後了；揭破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做得不夠。這些缺點弱點，在階級鬥爭發展到目前較高的階段中，確成爲特別地嚴重危機的信號，現在更將缺點列舉如下：

A 在若干重要革命運動中，如失業示威，罷工，農民運動，黨都跟着尾巴跑，各國

黨在農村，尤其在僱農（農業工人）中的工作做得薄弱。

B 在保護工人日常需要的基礎上，黨的動員羣衆工作落後了，同時連系這個鬥爭到無產階級獨裁的鬭爭，也做得不夠（對於二月二十五國際失業日，各國黨的大多數，只有微弱的活動）。

C 對於軍隊工作，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對於進攻蘇聯，只是機會主義的消極（各國黨的大多數，沒有利用『實業黨』與孟塞維克的審判，來加強這一工作）。

D 關於芬蘭拉浦暴動時的反抗猛烈法西斯主義的工作，未免太消極了，這是不可饒恕的。芬蘭黨的中央與大會，都承認了這一錯誤，加以銳利的批評。

E 對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要求解放的革命運動，各帝國主義國家內共產黨的擁護是絕對地不夠；對於歐洲被壓迫民族的革命解放運動，主宰民族內的黨雖然參加了，但只很微弱的參加。

F 機會主義式地忽視了改良工會內的特別重要工作；工廠內的工作做得不夠，特別是大企業與工業，工廠支部的政治生活不健全。

G 各國黨的組織工作，一般地不健全，從組織上鞏固政治影響的工作，繼續地不健全，對於黨員數目的時加時減，表現了不可容許的消極。

H 對於一般的指導，只是機械的運用，並沒有把牠具體化，並沒有指定牠適用於某

國或某一階級鬥爭的場合。

各國的黨，既已沒有表現充分的活動，來反對黨內的右傾危險，只是機械地呆板地運用了階級反對階級的策略，沒有顧及共產運動的水平線。更沒有根據各國的特殊情況，把這些策略的運用具體化；各國的黨，完全把社會法西斯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混為一團，又把社會法西斯蒂的上層與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羣衆混為一團；這樣一來，牠們（各國的黨）削弱了對階級鬥爭的獨立領導，削弱了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的積極性，因此遂自然而然地允許社會民主黨得以執行對法西斯主義的假鬥爭（如奧，波蘭），讓牠哄騙隨着牠走的羣衆。

（三）第十一次全會，完全承認共產國際常委改正各國黨的工作上的缺點與弱點的總路線與工作，認為必須喚起各國黨注意以下的目前根本任務。

各國黨的目前主要任務，在爭取工人階級的多數，這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以及準備工人階級為無產階級獨裁而最後決鬥的重要條件。這一主要任務的完成，連系到革命職工運動的鞏固，連系到革命職工反對派與獨立的革命職工會轉變為純粹的羣衆組織，這一組織，可以領導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可以變為黨與廣大工人羣衆間的主要「橋梁」。

經濟危機與革命高漲不平衡的發展，要求各國的黨，在準備羣衆行動時，必須具體

地運用自下而上的統一戰線的形式，務求吸引廣大工人（男女），失業工人，青工，店員（事務所的僱員）及其他半無產階級的各階層到鬥爭中來。

這，除開詳細地估量一般局勢外，要求對於工業各部門中與每個企業中的局勢與力量對比加以準確的估量，要求對於工人階級中各階層的特殊情況，加以估量，然後運用適當的具體鬥爭方式：經濟罷工，短期反抗鬥爭，革命示威，大規模政治罷工等。這需要一個堅決的鬥爭來反對右傾的危險，反對一切尾巴主義的表現，反對消極，反對派別主義。

爭取工人階級多數的鬥爭，在目前的階段中，應該由各國的黨，沿着以下的主要路線而進行着：

（1）反對資本家的進攻，組織無產階級廣大羣衆的反攻，反對減削工錢；要增加工錢；反對大批開除工人；要七小時而不減少工錢；要社會保險，由僱主與國家出錢；要給失業工人的目前救濟。

（2）反對資產階級獨裁的一切形式，反對僱主害人，反對警察恐怖，要革命工人組織的自由，言論集會的自由，要立刻解散法西斯組織，要解除牠們的武裝，要武裝工人，要防備法西斯進攻的保障，反對殖民地內帝國主義的恐怖，要宣傳與組織政治罷工，來反對資產階級獨裁的一切形式的政治反動，要以工廠為基礎組織羣衆的自衛隊。

(3)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向蘇聯進攻。揭破帝國主義政府的武裝進攻的準備，反對進攻中國的蘇區，要採取及時的組織辦法，以便於黨必要時走到地下去，要加強反帝工作，要加緊青工中的工作。

爲着爭取農民羣衆與加強黨在鄉村中的領導，黨應當極力設法領導與組織勞苦農民的鬥爭，來反對課稅的負擔，強迫勞動，地租與債務，並且要連繫到反對地主，無代價地沒收土地，反對資產階級的統治，要蘇維埃政府。

第十一次全會，感覺到各國對於反對進攻蘇聯的鬥爭，做得不夠，要求各國的黨積極地爲保護蘇聯而鬥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要求和平，要不斷地揭破第二社會法西斯蒂國際的可鄙的和平哄騙行動，要揭破牠是最積極地鼓吹與組織反蘇聯的反革命戰爭的。

在準備與組織革命行動的各種形式中，必須不斷地猛烈地向社會民主黨與改良派的領袖進攻。同時，要根據自下而上的統一戰線的策略，不斷地爭取社會民主黨的工人與改良工會的會員。

在揭破社會民主黨的哄騙行爲，在指出牠的『左傾』詞句完全不合牠的叛背行爲，各國的黨必須根據日常要求的具體綱領，用通俗的爲羣衆所了解的方法，來揭破社會民主黨的每個叛賣行爲，來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共同反對資本家的進攻，來反對戰爭，來

反對法西斯蒂的反動。

只有發動一個有系統的不斷的經常的鬥爭，只有真正爭取工人的日常利益，只有利用工人羣衆的每個反抗，不管牠是如何的微弱，來反對剝削者與法西斯蒂的反動；各國的黨才能夠成立自下而上的寬泛的統一戰線，才能夠翹造革命的羣衆工會或革命的工會反對派，才能夠取得工人階級的多數，才能夠領導工人階級來爲無產階級獨裁作最後的決鬥。

反對軍閥戰爭與中國蘇維埃

華 崗

運動的前途

一

事變迅速地簡直是瞬息萬變地發展起來，當去年蔣閥馮軍閥混戰暫時停止的時候，因為中國革命日趨高漲，首先是工農紅軍與蘇維埃區域的存在與發展，給了反動統治以莫大威脅，教訓了反革命團結起來進攻革命，所以國民黨蔣介石就在帝國主義支配之下，調動了三十師以上的兵力，動員了一切反動勢力，分工合作地向紅軍與蘇維埃區域進攻，一次圍剿失敗之後，立刻便又進行第二次的圍剿。同時蔣介石為要欺騙民衆與提高南京政府在帝國主義者心目中的地位，為要企圖緩和一下反動統治自己內部的矛盾與衝突，集中反動勢力以進攻革命，所以一面加緊白色恐怖鎮壓革命，一面又提出了所謂裁厘及國民會議與約法的把戲，想用這種把戲去裝飾一下牠那『統一和平』的鬼臉，但是蔣介石這種種政策現在又都宣告破產了。

首先在國民會議之前出現的正是一幅與『統一和平』恰恰相反的畫圖。剛剛在南

京國民會議開幕的當兒，廣東軍閥陳濟棠便對南京政府表示了獨立的行動，接着改組派汪精衛西山派許崇智及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等再度樹起倒蔣的旗幟，於是反革命營壘中的在野派與反蔣的各派各系軍閥便聯合起來在廣東進行反蔣戰爭的佈置與組織反蔣政府，北方的所謂第三派軍閥如石友三孫殿英宋哲元龐炳勳等也在佈置與蔣系軍閥爭防地的戰爭，如今國民黨統治已正式分裂成兩個中央政府（南京與廣東），北方各派軍閥亦更積極進行自找出路的離合活動，奉軍亟亟增兵入關（按奉軍自去年蔣閻馮混戰暫停進駐平津者，有于學忠之第一軍第十六二十兩師，王樹常之第二軍第二十四與三十三兩師約四萬餘人，連近日增兵入關者，合計將達九萬人），雖然吳稚暉張繼這班走狗還在猴猴做戲法一般的做甚麼奔走和平的勾當，南京政府還在高唱『以政治手腕解決粵變』的爛調，但在實際上各方都在調兵遣將，新的軍閥混戰已經處在劍拔弩張的形勢。

更重要的是國民黨蔣介石第二次圍剿紅軍與蘇區的大計劃也跟着宣告失敗了，蔣介石在開始進行圍剿紅軍與蘇區的時候曾正式宣言在三月之內『澈底消滅共匪』，但結果所得到的却是江西魯滌平路孝忱兩師的先後失敗，京漢路岳維峻兩旅人的被繳械，袁英吉鴻昌夏斗寅趙觀濤乃至蔡廷楷蔣光鼐各部隊的不斷失利，福建盧新銘雜色部隊的損失。反之，在革命方面却除掉江西紅軍一三集團軍與鄂豫皖第四軍在數次勝利中都得到壯大外，便連湘鄂西的遊擊隊，湘鄂贛的十六軍，贛東北的第十軍在最近以極少的兵力

，配合着廣大羣衆，都能支持着原有的根據地，不斷的給敵人以打擊。至於江西贛區 A B 團的被解決與閩西社會民主黨的肅清，自然更是給予敵人搗亂蘇區內部的一個嚴重回答。特別是最近一週間的消息，證明不但白軍蔣蔡兩師在江西與國一線遇到挫折，皖西的白軍有兩團人投到紅軍中去，而且公秉藩許克祥等四師人在吉安西線被紅軍打得落花流水。公秉藩僅以身免，許克祥不知下落，胡祖玉做張輝瓚第二，第五師完全瓦解，孫連仲也有兩團人打了敗仗，帝國主義報載江西吉安又重新被紅軍佔領。一切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工農紅軍在國際路線與四中全會以及中國共產黨正確「之下，不僅能夠衝破國民黨的「圍剿」，而且能夠取得新的勝利。現在蔣介石第二次「圍剿」紅軍與蘇區的大計劃固已完全失敗，而托陳取消派與繙章龍等右派叛徒所謂「在目前環境之下，組織蘇維埃的口號只是指示着一條不能前進的死路」的謬言亦已被事實打得粉

二

列強帝國主義爭奪對中國統治利益的衝突是中國軍閥混戰的主要原因，這一次仍然不能例外。我們祇看正當廣東軍閥陳濟棠等宣佈討蔣的時候，英帝國主義也恰於此時宣佈關於領事裁判權的談判決裂，這不能不是英國帝國主義從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所以不

但古應芬蕭佛成等直接在英帝國主義香港政府保護之下進行反蔣的活動，而且廣東括民政府成立之後，英國領事及香港政府都表示好意，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更要利用這一時機盡量擴大他的勢力範圍，美國帝國主義不但很露骨的教訓南京政府要加緊進攻蘇聯，而且還給南京政府的軍閥以割據的體面招牌——所謂『和平統一』，這樣江浙區域資產階級和當地封建軍閥的反動聯盟，便用這種『和平統一』的名義，要征服其他區域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這種列強帝國主義在爭奪中國利益的衝突，正與國際形勢緊相關連，最近因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是一日千里的進步，五年計劃不但可以保證在四年之內完成，而且有些部門還可以超過，但是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恐慌却日益嚴重擴大。許多國家的經濟恐慌已經轉到政治危機，德法波日等國都有新的罷工浪潮的發展。於是帝國主義列強在最近法意海軍協定國際商會大會與全歐委員會上，都更加露骨的表现出他們對於蘇聯進攻的急迫。日本帝國主義竟利用漁業及鮮銀等問題公開向蘇聯挑戰，這一方面自然表現出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與其經濟恐慌及政治危機仍是無法避免，另一方面也就表現出他們對於蘇聯的進攻是完全一致，而中國國民黨便是他們在東方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南京政府企圖與蘇聯恢復邦交的目的，據他們自己說，不恢復連抗議的機會都沒有，那是說恢復邦交是為更便於向蘇聯藉口挑戰，所以國民會議中反蘇聯的空氣高唱入雲，他們現在正利用蒙古贖路等問題多方向蘇聯進攻。因此種種，帝

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尤其是英美間與美日間的矛盾，反映在中國國民黨各派各系軍閥中間，更加上中國各派各系軍閥互相爭權奪利搶劫地盤的衝突，自然更要混戰不休，事實上在國民會議之前已經發生蔣胡的衝突，改組派第三黨加緊的活動，西南大同盟的出現，四川雲南的軍閥混戰，北方閻系軍隊不斷的騷擾，現在甯粵破裂與火併不過是國民黨反動統治內部的矛盾進一步的暴露。

但是國民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內部目前還能這樣公開破裂和劇烈鬥爭，另一方面也就因為中國革命運動在目前依然發展得不平衡，而且革命勢力的發展在目前還未能達到根本摧毀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整個反動統治的地步，革命運動的發展固然已經使統治階級顛覆危懼，逼使他們感覺到自己反革命末日之將臨，但是至少在暫時之間使他們還有用各種分工合作的方法各找出路的可能，而且目前中國統治階級各派各系，正因為在南京政府兩次大舉勦共遭受慘敗及國民會議實驗宣告破產之後，需要用各種分工合作異途同歸的政策來各找挽救反動統治階級的垂死命運的出路。廣東反蔣政府之成立，一方面也就因為國民黨改組派西山派第三黨等，深恐羣衆對南京政府的不滿情緒會發育滋長起來，加速革命火山的劇烈爆發，促成統治階級的根本解體，於是打起南京政府「勦共不力」的旗幟來，企圖將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團結在「廣東國民政府」的周圍，以廢除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北方石友三孫殿英韓復榘等進行着第三

派的團結，馮及奉系舊派等新北洋系的醜態。和久已消聲匿跡的吳佩孚及安福系等都表示躍躍欲試。部下外乎想把「剿共」重責自己担負起來，以免因國民黨統治形式的破產而根本葬送了中國地主豪紳資產階級軍閥的血腥統治。國民黨蔣系的南京政府當然也不能不作困獸猶鬥的掙扎。牠一方面拚最後一滴血去「努力剿共」，另一方面盡最後一息去準備對粵和對北方作戰。

軍閥戰爭是完全反革命的戰爭，因軍閥戰爭而金融混亂，物價昂貴，所以蔣陳戰爭風雲一起，僅僅在兩禮拜之內光債便上漲五分之一，混戰的兩方都在相競濫發庫券，南京政府固然不顧民衆死活的又發行了二十年統稅庫券八千萬及乙種鹽稅公債八千萬，使公債大大跌價，廣東亦連發一千萬行軍庫券及一千萬軍需庫券，因軍閥戰爭而市場停滯，工廠倒閉，必然增加失業恐慌，國民黨因軍閥戰爭將更加加緊對工農貧民羣衆的壓迫，禁止一切自由，資本家更乘機進攻，加重對工人的剝削，因軍閥戰爭而加增捐稅，攤派軍餉，拉夫拉車，強佔民房學校，使災區更加擴大，災民更加活活餓死，都是必然的現象。不僅如此，軍閥戰爭愈延長，帝國主義列強便愈加深中國殖民地化的統治。

三

軍閥戰爭是帝國主義列強與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必然產物，只有推翻帝國

主義與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工農兵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才能消滅軍閥戰爭。事實上經過國民會議實驗破產之後，更加明顯替我們指出：真正工農兵士貧民的代表只有參加那絕對反對地主資本家豪紳軍閥官僚工賊以及一切剝削者的工農兵代表會議，驅逐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革命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才能消滅軍閥戰爭，求得工農勞動羣衆真正的解放與中國的完全獨立。

這種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以及他的正式革命武裝工農紅軍在中國已經存在兩年之久，而且已經佔領着三百餘縣的區域，包含着五千萬以上的人民，雖然多半還在鄉村中，但是已經做過許多英勇的革命鬥爭，現在正在國民黨軍閥圍剿之中壯大發展起來。

不管反革命的動員是如何寬廣，他們進攻革命的政策是如何狠毒，只要紅軍與蘇維埃區域真能依照國際路線，發動廣大羣衆，執行正確的土地勞動經濟蘇維埃建設等政策與紅軍進攻的策略，國民黨「圍剿」蘇區與紅軍的計劃始終是要失敗的，最近經過幾次英勇的革命戰爭，中國工農紅軍固然又取得偉大的勝利了。

中國工農紅軍這種勝利是在中國反動統治的政治經濟危機的繼續增長的背境之上獲得的。這種革命前提不但可以幫助工農紅軍衝破國民黨的圍剿，使工農紅軍鞏固並壯大起來，使蘇維埃政權得到工農民主專政的初步鞏固，鞏固以至擴大了蘇區根據地，而且不能不推進全中國工農羣衆的革命鬥爭向前發展，最近上海與北方工人鬥爭特別表現

出鬪爭的政治意義日益濃厚（如烈山礦工罷工與上海英電鬥爭都是爲反對逮捕工人而起），鬥爭的發展向着重要部門（如北方礦工與上海天津市政工人……），而且帶着顯露的進攻性質（如上海工人要求增加工資鬥爭等）。農民鬥爭在北方已發展到關外的遼河流域，吃大戶的分糧運動與紅槍會大刀會的武裝鬥爭在目前春荒時候更加發展，兵變的潮流，學生的罷課與小商人抗稅的鬥爭及一般羣衆的反帝運動都在繼續開展之中，自然這種革命鬥爭還帶着很嚴重的不平衡性，特別是黨對於白色區域羣衆鬥爭的領導還十分薄弱，但是只要共產黨能夠堅定自己的意志，用布爾塞維克的精力向前奮鬥，那末這種困難也就不是不能克服的。

而且中國工農紅軍這種偉大的勝利還有很大的世界意義，現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一日千里的進步，而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恐慌與政治危機却日益嚴重起來，國際的罷工浪潮日益開展，最近特別是波蘭法國瑞典挪威的罷工與巷戰，表現階級鬥爭更加尖銳起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更因中國革命發展的影響而發展。在這樣國際背景之下，中國工農紅軍的勝利，即使還不是很大的勝利，還不足以直接去襲擊帝國主義的統治，對於世界革命也是很大的興奮和助力。

固然不錯，國民黨軍閥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內部衝突無論如何厲害，但是統治階級決不會忘記進攻革命乃是他們主要的任務，所以廣東陳濟棠汪精衛等討蔣的第一個罪名，就是說蔣介石『討共不力』。南京蔣介石與稚暉等更公開宣言：『赤匪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故應先清赤共再攻廣東』。事實上現在各派軍閥都以進攻紅軍與蘇區作他們反革命的競賽，而且就在國民黨軍閥戰爭的加緊佈置與開火中間，國民黨軍閥對於紅軍與蘇區的進攻，仍然是主要的危險。蔣介石在現在自己軍閥戰爭中，事實上不能不削弱一點進攻紅軍的兵力，不能像以前那樣一調十師，但是他們可以從政治方面與軍事戰略方面加強新的進攻方法，所以蔣介石在新的進攻計劃中，便特別着重於組織蘇區內部反革命份子，設法收買紅軍，組織民團，組織蘇區周圍的反革命遊擊戰爭以擾亂蘇區，提出國民黨政軍一致合作的口號，組織宣傳隊，提出調解地主佃戶糾紛的辦法，主張官兵同甘苦，並隔離兵士與羣衆的聯絡與接觸等，在戰略上主張不用費力多而行動呆板的圍剿，改用『長追』『堵擊』『會剿』『預備』等等部署，而側重於不分畛域的長追以消滅紅軍爲止，同樣在非蘇區內施行更殘酷的白色恐怖，尤其對羣衆的欺騙更層出不窮，國民會議的欺騙破產了，於是又注重反帝的欺騙，他們企圖利用羣衆正在高漲的反帝情緒，抓到他領導之下去向帝國主義講妥協投降的代價，一方面可以束縛和壓迫羣衆反帝的革命鬥爭，同時又可以轉移羣衆憤恨本國統治的情緒去『對外』，這種欺騙政策現在

南京政府正玩得起勁，接連發布收回法權及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宣言，把各種慘案後援會都搶到自己領導之下，反革命營壘中的反蔣各派軍閥政客汪精衛等以宣傳「蔣介石賣國」——「實現民主政治」的口號來欺騙羣衆，來對抗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自然統治階級這些一切的企圖是不能如願以償的，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就忽視他們用這種種方法以阻礙革命進展的危險。

再則中國工農革命的發展不但直接和國民黨地主資本家軍閥相接觸，而且要和世界帝國主義的整個制度相接觸；中國工農革命的勝利不但要直接推翻國內地主資本家國民黨軍閥的反動統治，而且要根本動搖世界帝國主義的整個制度，所以各國帝國主義都非常敵視中國革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廣州暴動與去年七月的長沙戰爭，一方面因為領導革命的主觀方面犯了許多錯誤，另一方面也就是因為列強的直接干涉與武裝壓迫，所以都失敗了。這種失敗自然不能不使革命勢力受着嚴重的打擊，但是因為革命任務根本沒有解決，社會經濟危機日益嚴重，反動統治日益動搖崩潰，工農貧民勞苦羣衆的生活更加惡化，所以中國革命雖然經過立三路線錯誤領導及羅章龍等右派叛徒的破壞，受着很大的挫折和損失，可是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仍然是迅速地向上發展。自然這樣革命發展之中還包含着許多的弱點，尤其是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匯合起來，同時雖然在中國共產黨四中全會之後，各地紅軍與蘇區大多已開始執行國際路線的轉變，

而且已經表現出一些進步，可以說凡是能夠執行國際路線的地方，大都有新的勝利，但嚴格的說來，紅軍與蘇區內部仍舊還有很多的弱點，對於國際路線的執行還不十分堅決，還需要有更堅決的鬥爭去克服許多內部的困難，例如紅軍第二集團軍直到現在還是繼續立三路線，完全脫離羣衆，在白軍的長追堵擊戰略之下繼續受着挫折過着那逃跑奔竄的生活。但是雖然有這許多困難和缺點，而中國共產黨還是能夠運用中國蘇維埃運動許多活的經驗，動員幾千百萬的工人和農民，來力爭社會的和民族的解放。

這種解放的鬥爭——中國工農革命蘇維埃運動，在目前階段上自然還保存着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但是他的勝利就要開闢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中國的前面站着一個絕對的問題：或者完全殖民地式的奴隸化，而羣衆更加破產；或者是蘇維埃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同時中國的工農的革命民權獨裁，比較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條件之下所決定的民權獨裁，亦將要有很大的不同。這裏的分別，首先就是中國革命的國際環境——現在已有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即蘇聯的存在，他正在迅速的發展着社會主義的建設。加以中國革命不但要和封建制度軍閥制度實行殘酷的鬥爭，而且要和外國資本家及中國資本家實行殘酷的鬥爭。中國的民權獨裁，將要有澈底沒收外國資本以及中國資本企業的必要，將要不能不進行很重要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步驟。所以不但目前執行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任務的階段就在準備着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

義革命的前提，而且社會主義成份的存在，也就成爲中國目前蘇維埃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特點。所以共產國際指示我們：中國革命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將要比十月革命有更多的過渡階段；然而中國革命把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縮短很多，比俄國一九〇五年條件之下所看得出的速度起來，中國革命從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要快得多，自然這就更需要保障徹底的實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五

現在中國局勢的特點，正是軍閥戰爭與革命戰爭交錯發展的形勢，一方面因爲帝國主義與中國國民黨軍閥各派各系在共同進改革命的一致中，不獨不能真正消滅牠們之間的各種矛盾與衝突；而且要增加和尖銳化牠們相互間的各種新舊矛盾，新的軍閥混戰又走到短兵相接的地步；同時因爲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階級矛盾始終要超過於反革命內部的矛盾，國際帝國主義及中國統治階級各派各系在自己內部相互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時，依然是企圖以暫時統一的反動勢力來鎮壓革命運動。所以國民黨已經正式分裂成南京與廣東的兩個國民政府，蔣介石與陳濟棠李宗仁正要磨拳擦掌實行火併的時候，只因江西紅軍又一次擊退敵人的進攻，獲取新的勝利，帝國主義強盜使又馬上號召國民黨各派軍閥暫時隱忍以便「合力勦除赤匪」，國民黨蔣介石得到帝國主義這

種『聖旨』，便又立刻準備第三次更窮兇極惡的圍剿紅軍，而且預備御駕親征，想用更殘酷的流血的壓迫戰爭，以維持帝國主義及國民黨政府對於數萬萬工農兵士貧民勞苦羣衆的剝削與統治。

我們必須深刻的認識：軍閥混戰是國民黨軍閥反革命內部的戰爭，國民黨軍閥圍剿紅軍與蘇區乃是反革命進攻革命的戰爭，我們要反對這兩種戰爭，但是我們反對的策略却不能一樣，對於軍閥混戰我們要用失敗主義的路線，使各派軍閥都失敗，使軍閥戰爭變成民衆反軍閥的革命戰爭；對於國民黨軍閥圍剿紅軍與蘇區的壓迫戰爭，我們就不但要努力使國民黨軍閥一敗塗地，而且要積極的努力保障紅軍與蘇區的勝利。我們要認識清楚：紅軍不是『敵人』的軍隊，而是工農的革命軍隊，是中國蘇維埃運動的主要柱石。

中國蘇維埃運動是全國工農兵士貧民勞苦民衆自求解放的唯一道路。誰要真正從帝國主義與豪紳地主資本家國民黨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誰便要堅決鬥爭起來一致爲蘇維埃政權而戰。帝國主義與中國豪紳地主資本家國民黨軍閥的任何一派，對於中國工農紅軍及蘇維埃政權都有極深刻的階級仇恨，它們一定要用所有的力量來和工農紅軍拚命，蔣介石第二次圍剿紅軍與蘇區時比第一次增加更多的兵力，定出更殘酷的計劃，國際帝國主義者在後面出過更大的力量，在這第三次圍剿中，國際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各派軍

閥政客們一定要用更多的軍力來和紅軍作殊死戰，一定要更加重對全國革命運動的壓迫與一切欺騙手段，我們絕不能因為我們兩次衝破圍剿的勝利，便存下輕敵僥倖的心理，我們必須認識：衝破第三次圍剿，需要我們比衝破前兩次圍剿用更多的努力。

因此，現在落在我們肩上的中心任務是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克服一切工作中的困難，動員千百萬的廣大工農貧民勞苦羣衆起來，用布爾塞維克的鬪爭精力，去衝破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第三次對於工農紅軍與蘇區的圍剿，完成湘鄂贛三省打成一片的蘇維埃區域，爭取在更短的時間內建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爲着達到實現這一中心任務，首先就要領導廣大勞苦民衆擁護紅軍與蘇維埃的羣衆運動，加倍地鞏固蘇區根據地與紅軍，蘇區內部要加緊并有系統地進行肅清反革命的工作，要把肅反工作的真實基礎建築在廣大羣衆階級自覺性及積極性的身上，要堅決地實行『土地革命不是富農的而是貧農中農的』這一正確原則，要利用現時戰勝的便利條件，更加緊建立與鞏固政治上堅定軍事上有強固戰鬥力的真正鐵軍似的工農紅軍的任務。要積極建立蘇區周圍的白區區域的羣衆工作，使蘇區與紅軍能夠更鞏固的向前發展，以擴大蘇區的領域。同時必須加強各地兵士工作的轉變，加強黨在中心城市的工作，加緊領導各種工人羣衆的經濟的政治的罷工和鬥爭，組織和領導有可能的某一產業的同盟罷工，加緊發展各種工農羣衆的組織，特別是赤色工會與僱農工會貧農團等，加緊反帝運動的領導與八一運動

的準備。尤其主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鞏固與布爾塞維克思想上的一致，在黨內要更加緊實行無情的兩條戰線的鬥爭，肅清立三路線及一切離開列寧主義的傾向，對於一切反革命派別提出的一切武斷宣傳與欺騙口號，都要及時地揭破他，尤其要有力地掃除一切托陳取消派及羅章龍右派的影響。同時必須廣大地採取革命競賽的工作方式與應用銳利的自我批評的武器。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死鬥爭一天天更加逼近了，我們只有堅決執行這些基本任務，才能爭得革命的勝利。

反對軍閥戰爭，以革命戰爭消滅軍閥戰爭，衝破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第三次圍剿，中國工農革命蘇維埃運動萬歲！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日稿

最近蘇聯國際及國內情勢

(續)

四二

(莫洛托夫在六次蘇維埃大會報告)

二 爲五年計劃及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

1 最初二年中實行五年計劃之成果

關於我們國內政策要說的，首要的是五年計劃，是爲實現五年計劃而鬥爭的事情。前第五次蘇維埃大會所批准而爲社會主義建設之程序的五年計劃，已成爲我們工作之基礎。五年計劃是黨的政治路線之實際的重心。五年計劃是我們一切活動部門之方針。五年計劃已成爲勞動者階級之目標。

我先從各種成果說起。在我提議數字之前，我要先說及這一報告期間之政治的各種成果。

第一，最基本的成果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五年計劃之過去二年中，這一計劃不僅被實行了，而且在有決定的意義的經濟的里程上，可以說有超越計劃之上的成就。五年計劃有不少的敵人。敵人期待着五年計劃之不可避免的破產。他們把蘇維埃政權

之運命，和這個破產連結在一起。布爾塞維克把這種期待打得粉碎了。蘇維埃政權不僅實現了社會主義建設之五年的程序，而且把牠超過了。這是最重要的成果。

第二的成果，是與勞動者階級的狀態相關連的，在過去二年之中，我們根本上已把失業消滅了。這種成果之政治的意義，和世界恐慌及資本主義諸國的沒有前例的失業相比，特別章明昭著。

第三的成果是，穀物問題的解決。穀物問題之解決，本質上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如大家所知道，這是我們所遇到的最大的政治問題之一。我們在這件事情上的成功，與我們五年計劃之第一時期的全部工作之成功有相互關連。我們在根本的發展蘇維埃農場之連繫上，解決了穀物問題。

第四的成果，在這二個年度的報告期間之各種成果中的最重要的，是農民羣衆之積極的轉向集體化這件事。數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結果，主要的集中在工業，在商品流通等之上，而農業經濟差不多依然停留在分散的微小的個人經濟的平行綫上。到十月革命的十二週年，纔看到中農之轉向社會主義。而過去二年時期，實築成了這一歷史的轉變之基礎。

最後說到的成果，這是與上述的農村之轉變有直接關係的，自小農和中農實際上決心從事集體經濟以來，這一運動開始了全區的，以及全縣的不斷的集體化方向之發展。

因此，對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的要素（富農）的態度問題，提出了新的方式。由這關係，蘇維埃政權就從限制並驅逐資本主義的要素這種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這個階級的政策來了。這是報告期間的第五的政治的成果。

現在，我歸到二年中經濟的成長之具體的資料方面來說。根據蘇聯的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的報告，基本的數字如次：

五年計劃之二年中（1928——29和1929——30）的各種成果

對於五年計劃之 實際的成果

二個年的預計 絕對數 百分比

國民收入（單位千萬盧布） 五八·三 五九·五 一〇二

國家歲計（單位千萬盧布） 一七·〇 二一·〇 一二四

投資在經濟之社會化部分中的固定資本（以當該年度的價值基礎為準則單位為千萬盧布）

一二·七 一三·八 一〇九

實施計劃經濟的工業和生活資料工業之總生產（以一九

二六——二七年的價值基礎

爲標準，單位千萬盧布）

二九·三

三〇·五

一〇四

耕田面積（全部以百萬黑克

脫爲單位）

二三九·〇

二四五·八

一〇三

穀物之市場生產（單位一百

萬鎊）

二二一·二

二六七·三

一二一

貨物交通（單位百萬噸）

三五〇·九

四〇九·二

一一七

這表所表示的是什麼呢？表示我們在這種有決定意義的任務上，如國民收入，國家歲計，投放在經濟之社會化的部分中的資本，工業之總生產，耕地面積，市場生產，貨物交通，不僅實現了五年計劃對於最初二年的預定，而且把牠超過了。自然，關於穀物耕種之總生產，我們只實現了五年計劃所預定的百分之九四，但是，市場穀物之生產，却超過計劃所定的許多。

對於工業五年計劃之本來數字之一般的超過成就中，我們最大的成功，是重工業（百分之一百零十）及輕工業百分之九九。各個工業部門，如生鐵生產（百分之九九），煤炭採掘（百分之九六），及棉織業之製造（百分之八八）等，其生產行動雖見落後，但最大部分的工業，其超過前次蘇維埃大會所批准的計劃是很大的。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所統制的工業之成長，在這報告期間內，其總生產價值從九點五千萬盧布增加到一五點六千萬盧布，即與五年計劃的原來預定相較，其百分比是從四一增到六四了。這裏，重工業的總生產在這期內，約增加二倍的百分之一九三了。機械工業之發展，特別迅速，其生產增加約為二倍，而在農業機械的製造上，竟增至二倍半以上。

至關於電流之生產方面，我們也已經完全貫徹了哥爾洛（註）的計劃。今年我們在這方面有很大的一步前進，將使橫斷中央發電所的容量增加二倍。在電氣化的五年計劃完全實現之後，則蘇聯在電流之生產上將佔歐洲之第一位，在世界中則後於北美合衆國而占第二位。

〔註〕 蘇聯電氣化的國家委員會，爲列寧所創設。

現在我簡單的說到五年計劃在成本費問題上的任務。

照五年計劃，對於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用計劃經濟的方式去經營的工業，其成本費的降低應爲百分之一四點五，但事實上只有一點四（根據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報告）。所以關於降低成本費方面，我們沒有達到計劃之實現。但是，這個差額，證明五年計劃所確定的降低費用的任務，實有無條件的實現之可能。這個事實必須成爲我們將來的教訓。

工業和農業間的關係之變化，首先可從總生產的報告中看出來。牠所表示的，是工業的全生產部分在二個年度（一九二八——三〇年）中的農業和工業一起的總生產中，從百分之五七增加到百分之六七。這就是說明，過去年度中的工業生產，已經構成國民經濟之全生產之三分之二了。這個事實，反映出我們國家工業化之迅速的進步。

引用若干關於消滅失業的報告，我想已經沒有必要。因為事實已經非常明瞭了。後面的基本的數字，指示穀物問題之解決。

我們的穀物徵收，去年已經達到百萬普特，這樣大的數量，從前我們想都不能想到。今年穀物徵收的狀況，雖然這個運動還未終結，但在三月一日的決算日已有一三一一三百萬普特。為具體的理解這個數字之意義，我指示下述的事實，在一九一三年時，市場穀物的全數量（除了農民自己需要的之外）為一三〇〇百萬普特，就是說，還少於我們一九三〇年收穫所得的數量。一九一三年的一三〇〇百萬普特市場穀物之中，地主的部分佔二八一百萬普特，富農佔六五〇百萬普特。地主和富農共計九三一一百萬普特，即佔當時全體市場穀物之百分之七五。

特別重要的，是我們怎樣的解決穀物問題。我們的解決，是由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造，蘇維埃農業的任務之增加和集體經濟之結果。

關於這個問題，使我們不得不起二年前右派的預言。當時他們對我們說：「蘇

維埃農業及集體經濟，要等到五年或十年之後，纔能供給我們所需要的穀物數量，我們現在必須立刻尋求一個出路』。或者他們是這樣的說着：『人們無從承認這種事情，即集體經濟的耕地面積能在五年之內，增加五倍之數』。這種說明，就是一切右傾逸脫分子的情緒之表白。右傾分子以這種預言遮蓋他們的路線，他們以其向敵人後退的路綫，代替黨所採取的向富農進攻的政策，他們想法祕密的輸入投降敵人的路綫，使蘇維埃政權之決定的地位獻給敵人。

現實情形把這種預言完全打得粉碎了。黨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穀物問題解決之結果，凌駕了一切從前的期待。

讓我們來說事實吧。最重要的是我上面所力說的事實，即五年計劃在關於市場的穀物生產上，在過去二年中已經超越了預定的範圍。

次述的比較，尤其格外顯著。當時曾發表了一種圖表，裏面載着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市場穀物之全儲藏量爲六二〇百萬普特，其中富農所佔的部分爲一二六百萬普特，而蘇維埃與集體農場所提供的，合計不過三八百萬普特。我們那時的任務，在於實行對富農的進攻，使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之穀物，去代替富農經營之穀物。這一任務，是五年計劃中最重大的之一。我們把牠解決了沒有呢？我們不僅把牠實現了，而且還很高的超越了牠的範圍。次述的是其確證：在今年的穀物徵收運動中，蘇維埃與

集體農場在三月一日的決算日止，已經徵收了四八七百萬普特（不包括食麥控除部分）。

最後，直接關於集體農場的數字，也證明這件事。據前次蘇維埃大會所承認的五年計劃的最高計劃，集體農場應於一九三三年，提供三〇〇百萬普特的市場穀物。實際上現在怎麼樣呢？一九三〇年的收穫，已經給予我們以這種可能，即我們可從集體農場，徵收四六〇百萬普特（包括食麥控除部分）了。由此觀之，五年計劃關於一九三三年的集體農場的市場生產之預定，我們已經在今年中超過了半倍以上。

根據五年計劃所裁可的最高計劃，蘇維埃農場應於一九三三年提供二〇七百萬普特的市場穀物。但是，情形已經大有變化，我們已經有充分的理由，確信一九三一年中，蘇維埃農場能夠提供一九〇至一九五百萬普特的市場穀物。蘇維埃農場應於五年計劃之最後年度達到的目標，我們差不多在今年已經達到了。這裏我想特別說到穀物托辣斯的成功。這個托辣斯在其工作中所表示的速度，是我們各種經濟組織之一個模範。穀物托辣斯所到達的成功，確為蘇維埃政權之光輝。

我們的雜誌報章，早已有了農民羣衆轉向集體化之很多的報告。所以我想只說最根本的事實。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列的圖表：

集體農場所包含的農民的個人經營

日期

集體農場所包含的

全部個人經營之

個人經營之數字

集體化的百分比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	二八六〇〇〇	一〇一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五九五〇〇〇	二〇三
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	二一三〇〇〇	八〇一
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	五五六五〇〇〇	二二〇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	八八三〇〇〇〇	三五〇三

從這個圖表可以看出，在把集體化作為黨在農村中的中心口號的第十五次黨大會的直前時代，農民經濟屬於集體農場的，還不到百分之一。一年之內，在第十五次黨大會終了後，集體化經濟之數，已經增加了先前的二倍。終局的轉變，還在全部農民經濟百分之八以上轉向到集體化去的一九二九年的秋季。

照集體農場運動所到達的結果，百分之八的數目，在我們現在是一點不覺得什麼了，但在一九二九年秋的當時，這一數目第一指示集體化速度之巨大的進展，第二，個人的大區域之穀物耕種，表示集體農場有高度的百分率。一年之後，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已經有百分之二二以上集體化了，而在今年的三月一日，却已經有百分之三五以上了。

一九二九年之秋，像北高加索那樣的縣分，其集體農場之數，已經二倍於全蘇聯當

時的平均百分率。在若干其他的縣分，如在伏爾迦河下流區域及烏庫蘭的沼地區域。集體農場之數，其增加速度亦甚快速。

很明顯的，在若干縣分的實際工作上，當實行黨的路線時，曾遭遇不少的混亂。黨稱這種現象為『急於成功的輕舉妄動』，堅決的糾正這種過度緊張。集體化政策之這種混亂（的曲解）的反列寧主義的本質，已經充分的闡明了。反過度緊張之鬥爭，尤其對進行集體農場之際採取破壞出自本願這個原則之鬥爭，也已經有了效果。

集體化運動在一九二九年的轉迴點，最明顯的表現在下述的事實上，即全縣進行完全的集體化，且其數目在不斷的增長。這些事實，是我們在農村中轉變政策之前提條件。黨在全部的集體化的基礎上，從限制及驅逐資本主義的要素之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這個階級的政策。這個政策，成為蘇維埃政權全部活動之基礎。即在現在時期，我們在農村中的任務，也仍受其規定。這個政策之法律的表現，就是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的公告：『關於鞏固完全集體化的縣分中農業之社會主義的改造及反富農鬥爭之法規』。在完全集體化的區域裏，這個公告，廢止了從前承認農民的個人經營之土地租借及適用僱傭勞動之有效的法律。牠給予地方機關以很大的權力，使其在完全集化的區域中，『有採用一切為反富農鬥爭所必要的手段，及沒收富農財產並驅逐出縣的權力』。

集體農場比個人經營有利之事，農民羣衆現在已經非常明白了。這在下述的事實上反映着：在北高加索，烏庫蘭（沼地區域）伏爾迦下流及中流地方（左岸），德國伏爾迦共和國及克里米亞等這樣重要的農業區域中，農民經濟之百分之六〇以上，已經集體經營化了。去年秋以來，有許多縣分，正盛行參加集體農場之新的巨大的潮流。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到處見到這樣的文件：

我名叫克拉甫狄耶，庫爾白獨佛，是一個自耕農婦，而且是一個地方女通信員，願加入衝鋒隊。我以為再繼續自耕農婦生活，是一種恥辱，因此我要在地方集體化大會開會之日，參加集體經營。

這樣的聲明，已經成爲普遍的現象。最近六個月中，加入集體經營的，有三百萬以上新的農莊。集體化的速度，現在非常之大，即就上述農民的個人經營者三百萬人之中一百五十萬是今年二月進來的一事，可以窺見一斑了。

集體農場對農民個人農場之優越性，可在次述的實例中，得到確實的證明。集體農場保證其耕地面積之非常迅速的擴大。我們可在這種事實中看出這件事，即在一九三〇年，蘇聯全體的夏季穀物之平均耕地面積，在個人農場爲二點七黑克脫，而在集體農場（每一農場）爲五點二黑克脫。而關於去年每單位耕地之收穫額，則大抵相同。但每黑克脫的裸麥收穫，在一九三〇年個人農場之平均收穫爲八點四百磅，集體農場

的有九點一百磅，麥收穫（冬麥）則各為九點六和一〇點六百磅。

最後，小農和中農羣衆已經確實的知道蘇維埃政權用很大的力量幫助集體農場之建設，且知道農業之實際上急速的興盛及小農和中農的生活狀況之實際的改善，都是由此援助而來的。革命前的國家對於農業及農民的訓練之一切需要所給與的幾百萬盧布，不能與蘇維埃政權在支持集體農場及蘇維埃農場的工作相比擬。祇今年一年。蘇維埃政權已經為集體農場之需要，支出了三千萬盧布。且電耕機，農業機械及人造肥料之提供給農民生產，也正在急速的增加。

電耕機事業總局之設置，農業機械及電耕機驛站之組織者之設置，對於集體農場化上，確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種驛站同蘇維埃農場，已經成為蘇維埃政權在使農村集體農場化上的最重要的支柱。

同社會主義的大經營農業之空前急速的發展相關的，是一九二九年新決定設立農業聯合委員會這個問題。這個委員會和其地方的一切機關，已經成為真實的生產委員會了。這個委員會，不消說是顧慮到蘇維埃農場與集體農場之根本的區別，前者的所有主是國家，後者的所有主是一致集合的農民。所以這個委員會之任務，在於盡力的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的大經營農業。

大會倘有機會，聽取農耕聯合委員會及其最重要機關之活動報告。

蘇維埃政權在建設集體農場及蘇維埃農場所獲得的成功，其根本的意義是非常偉大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大經營農業之發展，解決了有最偉大意義的歷史的任務。資本主義，在保證大經營農業去完全代替小經營農業等上，已經表示其沒有能力。馬克思於一八五〇年在『新萊茵報』這樣寫看：

「當法蘭西開始從小的分割地進行集中之時，而英國大土地所有却走進巨大的一步到土地零碎化去了。這無疑的證明下述的事實，即資本家的關係存續一天，則耕種必須在土地之集中和分散的循環中繼續運動」。

列甯把這同一的思想，以下述的話公式化着：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範圍內，人們不能希望完全驅逐農業小生產，因為當農民的破產達到極度之時，資本家自己和農業經營者就立刻努力使之恢復」。

因為資本主義的大經營農業的狀況，正如馬克思和列甯所說的那樣，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在現時有高度科學和技術的水平線的大生產之勝利的前進的時代，沒有能力完全驅逐農業小生產的資本主義，已經成爲一個反動的殘餘，而背負必須沒落的命運。資本主義創造高度技術水平的農業經營。但在資本主義底下，大經營農業之成果與意義，不能與完全統治了其全領域的工業的大生產的成果相比擬。資本主義却支持着無數的農民小經營之存在，讓他使用完全落伍的技術，停留在低落的生產水平線之下，使農

村之絕對多數呻吟於赤貧之中。祇有社會主義的建設，使農村的狀態有急激的變化，保證全部農民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大經營農業去。

城市和農村間的各種不可克服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固有的本質，這些矛盾之本原，是生產手段之私有。列甯這樣說過，「資本主義不僅不能排除工業和農業間的矛盾，而且反由牠而增大，且愈見尖銳化」。社會主義的建設所達到的，恰巧是與此直接相反的結果。牠使城市和農村間的矛盾，歸於消失。農民小生產者向農業大生產之轉移和蘇維埃農場之建設，使城市和農村間的對立有排除之可能。實現這個目標，是蘇維埃政權之歷史的任務。

2 今年與五年計劃的實現

計劃所賦加於今年的任務，在實現整個五年計劃上，有決定的重大意義。

關於農村方面，今年我們有這樣的任務，即至少要把農民經營之百分之五十，使之集體農場化起來，去年秋季開始的，羣衆的參加集體經濟之新潮流及其速度之不斷的增大，指示這一任務能無條件的實現出來。不過，依靠今春播種運動的實施的地方，也非常之多。爲夏季播種之耕種契約所發出的人民委員會和聯共中央委員會的號召書，包含着春季運動之實際的綱領；牠說明國家對於援助農民，尤其對於集體經濟之義務，

和農民對於國家之義務之一切必要的陳述。我們無論冒着任何犧牲，必須實現這個綱領。

集體農場化所已經得到的成功，使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支柱，廣大並鞏固得很多。同志耶殺夫來夫，姚金及馬爾克維支的綱領上，即在本大會提出的綱領上，關於這個成功是這樣說着：

「……從現在起，包括在集體經濟中的農民，是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最決定的部分是其主要的支柱」。

其實還不止此而已。我們必須向每一小農及中農的自耕農面前，提出「贊成或反對集體農場」這個問題。在同一綱領上這樣說着：

「小農和中農的數百萬羣衆，確信了集體農場之有利以後的今日，已經自動的奔向集體化方面來了，而自反對集體經濟之主要敵人的富農這個階級，歸於消滅的現在，還未加入集體經濟的每個小農和中農的自耕農面前，當然要遇到這個決定重要的問題——贊成或者反對集體經濟」。

贊成或者反對——問題現在是這樣的擺在全體小農和中農羣衆的面前了。贊成集體經濟，贊成擁護集體經濟運動——這就是擁護蘇維埃政權和為反富農而堅決的鬥爭。

反對集體經濟，反對支持集體經濟運動——這就是幫助富農而反對蘇維埃政權。在

每一小農及中農的前面，今年擺着對於集體經濟之態度如何的問題。他必須選擇一種態度。單是這件事，就可知道，對於我們集體農場化的全部事情，對於整個社會主義的建設，一九三一年實為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年頭。（有大呼『對的。』喝采）

關於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我想不詳細的來說。這已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最近會議上報告過。這裏我只引用若干的數字。

今年預定國民收入應增加百分之三九，這一數字，表示整個國民經濟之偉大的興旺。再，計劃中更預定全體國家的工業（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和供給委員會統制下的工業部門）的總生產，應增加百分之四五。最後要補說的，就是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所統制的工業之生產費減低百分之。把供給委員會所管理的工業之生產費減低百分之。我只說及整個國民經濟計劃中這些最重要的數字。在完全實現了這些任務之後，我們將可判斷我們為獲得布爾塞維克的速度之鬥爭之實際的成果。

為說明布爾塞維克的速度起見，我想引用一個實例。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的四年之中，我們一共開設了三三三個新工廠。請將此數與下述的比較一下，即僅僅一九三一年一年之中，依照計劃，我們必須開設五一八個新工廠（喝采）。投放在這些新建築物上的資本的價值及其總生產，將二倍超過最近四年來新的工業企業之成就。

布爾塞維克的速度，表現在口號上的就是『五年計劃在四年中實現』。這個口號

，能在事實上實現起來麼？事實將回答這個問題。

在生鐵生產及鋼鐵生產、輪轉機械及綿絲工業之生產這些領域的工業中，五年計劃大體上能於四年內實現化。假若綿絲工廠之實現要較長於四年的期限，那末在生鐵生產上確實不要四年就可實現。五年計劃的士敏土生產，能於三年半以內實現，電氣技術、煤炭探掘、泥炭探掘及製糖工業方面，能於三年之內，煤油及銅開掘，機械生產，電耕機及農業機械生產船舶及機關車生產方面，能於二年半之內實現化。關於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所統制的工業之總生產方面，五年計劃之實現，所以只需三年半好了。因此，「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這個口號，可以實現。而且還有更縮短這個期間之可能。

特別重要的，是重工業方面（全部的）的五年計劃，能比三年還短的期間內實現。我們可就下面知道這事：在工業「A」羣中，一九三一年能產生價值一七點二千萬盧布的總生產，而五年計劃為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所規定的原來數字，却是一五點二千萬盧布。所以，我們現在的計劃，建築在三年中實現五年計劃的關鍵工業上面。

五年計劃的一問題之中，最主要的是冶金工業問題。關於這件事，我想特別說及生鐵生產之生產程度。

前次蘇維埃大會所採決的五年計劃，預定五年計劃之最後年度（一九三二——三三

年），要生產一千萬噸的生鐵。這是很明白的，這一數量對於我們正在成長的各種經濟的逼切的需要，不能滿足的供給。我們必須『修正』前次蘇維埃大會的決定，重新規定生產計劃。五年計劃最後一年的生鐵生產之計劃，現在決定為一千七百萬噸。我確信現正開會的大會，將完全的同意政府關於生鐵生產之計劃上，規定五年計劃最後一年至少要實現一千七百萬噸的決定。（喝采）

這個計劃的實行，伴隨着非常之大的困難。但是，黨在集中一切精力實行這一計劃上，已經確信這一計劃能在規定的期間內完全實現。人民委員會不久以前，關於冶金工業所公布的訓令所指的方向，就是不僅要實現這一計劃而且保障其加速度的成就。在訓令內，規定在南方建造五處具有一點四至一點五百萬噸的生產能力的新的鎔鑛爐。除此以外並定建造三個新工廠，分配於土拉，列丕之克及徐奈爾三處，各個皆具有生產三十五萬噸的能力。訓令更指出烏拉爾工廠，應在一九三三年中，至少生產七十萬噸品質高貴的棒鐵。今年我們就應開始這些建造，而在一年內把牠們完全做就。我們冶金工業是這樣向前發展的。

這裏還需要指出怎樣實行第十六次黨大會所規定的任務：在我們南方所現存的鎔鑛基礎之外，怎樣在東方創造出鎔鑛工業之第二大基礎。二個數字，能回答這個問題。去年中，烏拉爾庫芝耐支克的鐵和煤炭企業聯合，在蘇聯冶金工業的生產上，所佔的

部分爲全體五分之一。根據已經批准的計劃，則烏拉爾庫芝耐支克的鐵和煤炭企業聯合，應於五年計劃終結之年，生產冶金工業總生產之五分之一；這樣，這種生產可以有巨大的增加，同時，烏拉爾庫芝耐克區事實上可成爲蘇聯第二個重要的鎔鑛基礎。

最後，我將簡單的說到今年第一個月的成績。誰都知道，一月和二月的生產和財政計劃之實施，不能算爲滿足。這樣的狀態，不能作爲正常的現象。我們決不可因此氣餒。戰線必須展開起來，我們必須保證國民經濟計劃之完全而適時的實現化。

同時，生產的品質也不應忘却。到現在爲止，在這一方面，我們還沒有很好的轉變。對於生產的品質，我們常常沒有絲毫的注意。我們必須立刻改變這種傾向。

無論如何，布爾色維克的路線是勝利的。但是在今年，我們要特別用力來爲獲得布爾色維克的速度而鬥爭。沒有這個成功，今年龐大的計劃將受挫折。讓他們從這裏來油出布爾色維克的結論。

布爾塞維克必須在實現生產計劃之後，批評我們的組織對於實現黨的一般路線的態度。爲獲得蘇維埃政權所決定的速度的鬥爭，不僅是每一布爾色塞維克的義務，也是每一勞動者和蘇維埃國家之每個誠實的支持者的義務。

黨已經把右傾機會主義者打倒了，但在實際工作中的右傾逸脫的傾向，還非常濃厚。這種傾向須要最嚴重的鬥爭來克服牠。沒有這種鬥爭，我們將不能克服障礙，以保

證五年計劃最重要年度的任務之布爾塞維克的執行。在我們機關的實際工作中的右傾的傾向，對於我們敵人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必須集中火力來反對實際工作中的這個主要危險！

同時，我們必須打擊在「左傾」辭句掩蓋之下的誇大的粗心和隱頭露腳的政策。我們所須要的，不是大言壯語，而是爲獲得速度而鬥爭的實際的用意。

黨已經指出了路線。計劃已經確定了。讓我們在正確的方法上去實現這些任務吧。事情之成功與否，全懸在我們肩上。無論是黨員或者非黨員——每個必須爲獲得布爾塞維克的速度而鬥爭，必須爲實現五年計劃而鬥爭。

3 駕御技術是中心的任務

今年我們已經開始了大而困難的任務。我們還不能主張我們能夠保證這些工作之實現。現在我們可以說，在開始執行上述任務之際，我們經濟的活動已經表出了極大的不足。有一件事已經可以明白的看出：用舊的方法，我們已經不能進展工作了。現在我們各種工作部門中沒有一條這樣的路，即爲達到目的，只要我們把工作依着這路去做。而經濟的狀況又有許多根本的變化，特別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之加速的速度有關的方面。

最大的弱點及困難橫梗在這樣的領域上，即在經濟的任務加速的成長的地方和在改造經濟機關之活動上陷入於遲鈍狀態的地方。鐵路交通和屯河地方的煤炭之關係，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一個實例。

我們先說交通事業。你們已經知道：人民委員會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鐵路與船舶事業之宣言。這個宣言，是在中央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中，經過了澈底的討論後所做成的東西。許多地方的活動分子，經濟家，專門家及黨組織的指導者們，都會參加這個會議。這個會議曾詳細的研究鐵路和船舶交通機關中的缺陷與弱處。

調查研究的結果，在鐵路交通上發現些什麼呢？這裏發現了在採用某種方法時，犯了一種錯誤。數年之前，各處路線曾皆企圖採取一種新的制度，不使運轉手經常的在一個同一的機關車裏做工，而把他常常替換。這個方法，後來又被其他的路線所採用。其結果，就是機關車站目前的惡劣狀態。

倘若我們以前在必要的方法上，研究並試驗這個最初的嘗試，倘若我們的地方和中央機關，對於這種嘗試之統制曾有相當的注意，那未必不至陷入於現在那樣的惡劣的結果；而且重犯至數年之久。附帶要說明的，就是依照這一新的改造方法，運轉手不能在某一的機關車裏做工，而且沒有一些事前的必要準備，大規模把牠介紹到其他路線。其結果，在鐵路交通上乃發生一些消極的，且不可允許的事實。我們機關車站所患

的疾病，是由這種改造而來的，工作紀律之廢弛。更是不用說了。

鐵路交通之這種錯誤的改造，是指出我們在經濟機關的活動上最特徵的弱點之一個實例。對於這種有嚴重意義的改革，我們還不知道先下一番必要的準備和注意，且不會對其結果預備相當的補救方法。而採用這種新的改造之際，我們的經濟機關的活動是多麼不充分之事，可在下述的事實中看出來，即交通人民委員會，甚至連鐵路行政部自身，都還不知道關於機關車狀況之最重要的事實。

我想只引用唯一的實例來說。不久以前，人民委員會收到了交通人民委員會關於南方線上的機關車之『病的』狀況報告。根據這個報告，南方線在二月中已經有百分之十六的『病』機關車。但是調查之後，知道這個數目並不符合於實際事實。去實際調查的同志，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安特萊夫同志及代理交通人民委員米洛諾夫同志，根據他們的調查所得的事實，作了報告。報告這樣寫着，南方線在二月中，不僅有百分之十六的病機關車，而且全機關車之百分之四一都犯着毛病。這個事實說明一切了。

人民委員會和黨中央委員會從這個及其類似的事實中，得到了一個結論，而這種結論在關於鐵路交通之有名的宣言裏，已經說的非常明白。

上列的事實，證明我們有與我們最惡的病患作頑強的鬥爭之必要。從上面所說，可知我們經濟活動之病患，在於實行工作上缺乏統制。要引用許多的事實，來指示我

們的機關在實行工作中忽略統制，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們決不要由這種狀態而灰心。我相信蘇維埃大會將同意人民委員會關於設立專門委員會的決議，以適時的醫治工作上的病態。

關於這點，想起列寧堅決的主張統制工作之特別重要性，是非常有價值的。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全俄勞動者的大會上，用非常適切的話說明這個必要：

『人們統制工作之執行和實際的工作實現統制牠自己，這件事，再說一句，只有這件事是我們現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之根本要素。這不是幾個月或一年之事，而是數年之事』。

那時以來，已經經過了數度歲月，但是在許多事件中，關於實際工作之實際的統制方面，還有許多許多不能滿意之事存在着。我們必須從這裏得到必要的結論，而用全副精力來執行統制工作。

關於由鐵路交通的統制上所獲得的教訓，我將在後面來說明。但是現在可以說的，尤其是從這個事實所獲到的結論，不是只能適用於鐵路交通一方面的。

試再舉另一個例，舉屯河流域的實例來看。大家都知道，屯河流域炭礦工作之經濟活動的缺陷，不是現在才發生的。屯河流域的問題，不僅是一個有直接經濟意義，而且有政治意義的問題。

黨已經決定這個地域之機器化，爲炭鑛工業之最根本而不可推延的任務。如果任務之這樣的規定是正確的，是適宜的，那末，這個任務的實現是不是經過實際工作之確證，有沒有勞動者階級同意這個決定呢？

對於這個疑問，我們可以非常確定而無絲毫保留的說：是的。任務的規定是正確的，而且是適時的，實行方法也在實際工作上得到了確證的，而且勞動者階級完全贊成黨之這個決定。但是屯河流域的煤炭採掘之發展，依舊不能順利的進行，生產計劃不能實現，就是機器化自身也是非常遲緩。

去年秋季，纔發見了關於屯河流域機械裝置未被充分利用，鑽孔機及其他的機械也未被充分利用之可驚的事實。蘇維埃政權早在當時，爲保證正確的利用炭鑛中所裝置的機械，曾命令屯河流域之一切組織，要迅速的改變其活動方式。但是，事情依舊不能很有效的前進。試舉近來關於利用鑽孔機和裁切機之實例吧。這裏指出一九三一年一月，不曾利用的，在重鑽孔機方面有百分之二〇。輕鑽孔機方面爲百分之四二，及裁切機百分之四二。這種事實，爲什麼會發生呢？

我再提出一個問題。爲更好的利用現在所存的機械裝置，我們有否在屯河流域發見了一條實際的出路呢？從報紙可以看到，最近幾月來，我們在這點上已經有很大的進步。我們要指出關於同志卡爾答希夫，柯沙路夫，費列麻羅夫及李布卡爾特的實際

工作中的設計之實施的實例。同志卡爾答希夫，柯沙路夫及費列麻諾夫之設計，使裁切機能夠不斷的工作，同志李布卡爾特關於廣泛的利用傳送帶的設計，已經具體的實行了。這些方法之採用，產生了很好的效果。真理報有這樣的報告（二月二七日）：

「關於史丹林區域二一鑛區採用不斷生產制的結果報告。在採用新制度之前，平均勞動日的開掘量為每鑛道四七〇七噸，在採用新方法之後，為六九八六噸，即增加百分之三七。生產能力之增高為百分之三〇點六。每噸的開掘工資，減低百分之二五。」

在同電報上，真理報這樣報告着：

「克拉斯屯斯克的鑛山經營部，最近已把二個機器化的鑛道改為卡爾答希夫制度了。在改造的第一日中，已經有空前未有的順利的開採結果。第七〇鑛道鑛第二十二號，在採用卡爾答希夫制之前，每日可產六〇羅連（載貨車），採用之後，其生產增加到二二五至二三〇羅連。第十三東方鑛道鑛第一號其生產從一二〇增加到三四五。」

我們還可引用很多這樣有力的實例。同志卡爾答希夫，柯沙路夫，費列麻諾夫及李布爾特之光輝的創意，蘇維埃政權之中央機關已經有相當的表章。黨中央委員會認為這些同志是真正的勞動英雄，授予光榮的列甯章。上述以機器生產煤炭之新方法，已

經漸漸的散布到屯河流域之各個礦道中去了。當採用機器化的方法之際，過去對於準備工作有極大的缺陷。

這裏有一個實例。我將朗讀這封發自現時在屯河流域工作的列甯格勒的勞動者之信。信是由同志邱道夫交給我的。勞動者這樣寫着：

「署名的是爲排除屯河礦區之缺陷而被動員的機械工人，我們就是華希利埃夫，余可洛夫，馬士金可夫，（馬爾梯工廠），埃格爾斯坦（軍事工業工廠）卞爾腦且夫（凡爾幹工廠），亞布洛麻夫（格達拉夫列克工廠），我們現在到達了索羅多——多希可夫斯基的礦山管理部，這裏正是豎礦第三，第五，第十三及第十四所在地。每一豎礦之平均產額爲一萬二千五百噸，而依照計劃，每個應該生產二萬一千噸。所以在這些礦區內，計劃祇實現到百分之五〇。這是非常不充分的，要使全部工業得到危險，特別要危害列甯格勒的工業」。

他們是純粹的列甯格勒的青年，所以忘不了列甯格勒，這也是應該的。（有叫「好青年」的聲音）

他們這些人，更寫着他們關於屯河礦區的機器化的經驗：

「爲消滅這個非常嚴重的缺陷，唯一的出路是礦道的機器化。我們就是爲這種目的，被派來此。但是主要的錯誤，是對於這種機器化沒有一些預先準備，既沒有勞動

工具，又沒有工作機器」。

不但他們不得不報告沒有勞動工具和工作機器，而且他們還有這樣的報告：「鑽孔機一天做不到十小時而只做四小時工作，照這裏的現狀，實在絲毫不足驚奇。因為其餘的時間，都化費於修理工作之上，而且其工作方法又是非常的不適當。在這些敘述之後，信中提出這樣的要求，請列寧格勒的同志送給他們三把作工樣子，若干勞動工具和十六立方的鹽酸。該信之結束是這樣的：

『如果列寧格勒的黨組織能夠儘可能快送給我們這些必須的工具及我們得到這些工具之後，我們就可盡共產黨員的義務，第一，用最大速度來整頓這裏的全部裝置，當然不要礦山管理部為這些工作支付工錢，第二，我們將完全消滅一切的缺陷』。

這是真正無產階級，真正布爾塞維克的語調。（喝采）

這羣派遣者只向列寧格勒的組織要求簡單的援助。實在我們大家，都有援助這些同志及一切為使屯河礦區機器化而工作的同志之義務。

從列寧格勒的同志信中可以看見，我們的經濟機關，在使屯河礦區之礦道機器化上，其準備工作是何等的惡劣。這些準備工作，直到現在，還是非常遲緩。但是煤炭的需要，已經非常的逼切，而其他一系列的工業部門之狀況，又懸於煤炭供給之多寡。若說我們在屯河炭礦所當面的任務，已是束手無策，這當然是錯誤的見解。下爾答

希夫的新法及其他的方法，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必須更發展煤炭生產之機器化。我們現在的目標，在於加速度的促進機器化，比前更快速的去組織這一工作，把適宜的人才放到適當的地方，充分的利用現有的裝置，打破管理部和礦道自身內的懈怠和舊式方法。祇有絕望的機會主義者，一遇到困難，就思後退。一個布爾塞維克，在遇到屯河礦區機器化這個嚴重問題之時，不但不會退却，也不會減低實現所規定的任務之速度。

使屯河礦區機器化這個任務，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在目前情勢之下，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我們一定能夠成功，如果我們把牠作為當前最逼切而最偉大的政治任務之一看待，集中我們所有的力量，發揮對於這一工作之布爾塞維克的頑強性。我們必須犧牲一切代價而儘可能快的把牠完成。

在使屯河礦區機器化的實例中，必須抽出的基本結論，我將在後面來說明。這個結論，不僅僅適用於屯河礦區。

在我處理這個基本結論之前，我將再說一個史達林格勒的電耕機工廠之實例。

如你們所知道的，這個巨大的工程，是較預定期限早十個月完成的。這一工程是用美國式的速度建築成功的。但是，如你們所已知道的，到現在為止，史達林格勒工廠的生產，還不能十分滿意。這個工廠已經數月不能實現預定的生產計劃。這件事

證明我們在建造新的大工廠之能力，較優於組織牠們的生產。組織生產方面，我們還受挫折，還有許多弱點。關於建築工程方面就令是最大規模的建築工程，我們已經能夠很好的完成建築了。但是，關於新生產部門之組織化，情形就不同了。這裏明確的表示，我們在生產問題上的弱點及我們技術的落後。

現在我們可從所引用的事實，歸納到一般的結論。所謂所引用的事實，就是鐵路交通機關，屯河礦區及史達林格勒諸問題。一般的結論自然得出來了。

倘若我們這樣的提起問題：爲消滅鐵路交通機關之缺陷，使鐵路的機能能保證與整個國民經濟成長之急速的速度於適合起見，我們所最需要的是什麼呢？這裏只有一個答案：我們必須技術的駕御一切事情，我們必須在生產技術的問題中，成爲鐵路交通機關之現實的專門家。

爲完成屯河的礦區之機器化，我們應幹什麼呢？這個任務之解決，已經不能再推遲了。這裏的解答也是非常明白的：屯河礦區的布爾塞維克，必須通曉採炭之機器化問題，必須實際的專心研究技術而不要完全依賴任何的老專門家。他們必須在建築工作上成爲真實的專門家而精進於近代的技術，並且發展這種技術。他們自身必須成爲礦山技師及專門家。

要充分的發展史達林格勒電耕機工廠那樣巨大經營之生產任務，不消再說的，也只

有這一條路。

我們的工業，在各種生產部門之機器化及生產技術之習得上，已經表示出偉大的成功，這是不能否認的。這樣實例，也非常之多。

最好的實例，是巴庫及格羅之尼的煤油生產之機器化。這裏機器化之開始，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的最初一年，巴庫的機器化之創始者同志餒來布來夫斯基，在這點上，留給我們一個光輝的實例。所以煤油工業能夠超過生產計劃。煤炭生產則相反，牠在最初的二年中，還沒有實現五年計劃之預定。倘若我們不從此拿出必要的精力來貫徹機器化之實現，則各種經濟部門之發展，將不能維持現在那樣急速的速度了。

再舉另一實例。你們都知道達逆波羅斯特羅衣的建造工程。從前，我們有權誇耀我們以六年功夫所建造的福爾柯夫特羅衣的工程。但是，到了今天，牠已不能代表最大動力站的一個了。電氣化計劃的巨大工程，達逆波羅斯特羅衣將於一九三二年，開始工作了。這個建築工程之速度，一方由於從事此工作的指導者的，他方由於地方組織之偉大的服務精神，纔能這樣迅速。其成功的原因，是在建築工作上利用美國式的機器化，和我們布爾塞維克的固有的精力。倘若在達逆波羅斯特羅衣的工作上不會應用機器化——和美國工程師庫潘的協助——那就決不能得到這樣的結果，使我們在整個建造的速度上有偉大意義的士敏土工程，成爲世界的紀錄。

最後，來說一說關於穀物托辣斯。穀物托辣斯的工作，開始於二年半之前。舊式的農業專家，如馬克羅夫，梁錚金柯，陀耶蓮柯及其他等，簡單的以為穀物托辣斯的任務，沒有依照當時預定的速度實現化可能（陀耶蓮柯這樣說過：人類的性質不能允許這樣的速度）。但是，我們不但已經把牠實現化了，而且在更短的時期中把牠實現了。當然，當時蘇維埃農場所採用的機器化，在解決這一任務上，扮演了很大的角色。我們必須指出的是：穀物托辣斯及其各省的代理者，即刻把機器化作為一件主要的工作而開始實行，這在保證托辣斯的成功上，決不在小。

煤油工業，達逆波羅斯特羅衣及穀物托辣斯的實例，不僅表示牠狹義的機器化之意義，並且證明布爾塞克在通曉了技術，理解了生產之根本問題及正確的分配必要的勞動力於相當的勞動部門之後所能做到的一切。

這些實例——他方面還有交通機關，屯河礦區及史達林格勒的工廠——證明工業發展之現時的速度，若沒有通曉技術及理解有重大意義的生產問題，是不能實現的。布爾塞維克的速度與精進技術是不可分離的結合着。

這些實例，更表示在改造時期，即生產的舊基礎進行根本的改革；及需要認識新的非常複雜的生產過程之際，若我們沒有理解我們工作之本質，若我們不能成為生產技術問題之正真的專門家。那末，我們的經濟任務，沒有實現的可能。在改造時期中，倘

若我們不能知悉生產技術的問題，那我們就無從完成我們所規定的經濟工作。

本來沒有再說的必要，但我特別要你們想起這件事，即我們經濟中已經發現的怠工事件，證明我們關於經濟工作之基本的任務之結論，沒有絲毫不明暫的地方。怠工事件已經明白的證明，布爾塞維克被白黨破壞者愚弄的地方是何等之多。因為我們在生產問題上的微弱和沒有技術的準備智識，已經受白黨的破壞者的吃虧不少了。因我們的弱點和缺陷，白黨的破壞者什麼地方都可打擊我們。我們必須想起列甯的指牠：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是一個『空前尖銳的鬥爭時期』（列甯著：國家與革命）。不管我們對於破壞者們已經給予一種嚴重的打擊，不管我們已經肅清了一系列最重要的破壞的主謀者，但是對階級敵人，對躲藏在我們機關中的這些代理人的冷酷無情的鬭爭，還依然不能放棄。只有到我們能夠駕御一切事情，只有到我們在工作上成為專門家之時，我們布爾塞維克才能打碎他們的破壞工作，才能防禦他們從後面再來打擊蘇聯的詭計。

我必須使你們想起列甯關於專門家問題給予我們的教訓。列甯說：

『我們必須破壞他們（資本主義的智識分子——摩路托夫）的怠工，必須把他們作為一個階層或一個集團而隸屬於蘇維埃政權之下。我們必須跟他們學習一些東西，——我們共產主義者如果不願為一個孩子或有孩子脾氣的人，——因為無產階級的黨及其

前衛，都沒有創造大規模的事業來供給數百萬住民的獨立工作之經驗。

俄國的最良勞動者是知道這件事的，他們已經開始跟着資本主義的組織中，指導的工程師及技術家，專門家學習自己的不足。

在許多地方，列甯曾重複說明同一的思想，指出不僅要打破資本主義的專門家的怠工，及使他們的工作隸屬於蘇維埃政權之下，而且要向他們學習我們自己的不足。我再引用列甯關於這問題的演說辭一次：

『我們必須管理我們的經濟，吸取被我們所顛覆的階級出身的人們之援助，吸取被他們階級的成見所浸透了的，但我們必須從而學習的人們之援助。同時我們必須從我們的營壘裏尋出行政上的活動分子。我們必須把國家機關這樣的組織起來，即訓練，學校外的教育，實地的陶養——這一切在共產主義者的領導之下，都要為無產階級，為勞動者，為勞動農民去進行』。

這裏我們又可看出，列甯對於養成能夠擔當執行我國經濟建設之任務的我們自己的前衛，是怎樣的着重。那時以來，已經經過了十年以上的歲月。在這方面，現時本應有重大的進步表現出來。但是，事情總沒有這樣容易。

同志史達林在社會主義工業之負責領導的最近會議上所說的話，非常正確，他說：黨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第一年所確定的政策，——即不要干涉技術上的事情，只要學習這

種技術及管理生產的智識——在實際工作的許多場合，却被顛倒而誤用了，因此這個任務到現在還不能滿足的得到解決方法。這種顛倒誤用的態度，完全不能容忍。所以同志史達林在上述會議的演說結論，有非常深刻的意義。他說：

「現在是，現在正是把我們的注意，集注到技術問題的時候。現在是廢除舊的口號，即不干涉技術這個用舊了的口號，而使自己成爲專門家，成爲事情之通曉者，即完

成爲一切事情之主人翁的時代」。

在這演說上更這樣的說着：

「布爾塞維克必須駕御一切技術。在改造時期中，技術是一切的決定者」。

我們必須認識，同志史達林這些話語之中，已把我們現時的中心任務公式化了。

這個中心任務，可總括在這樣的口號之中：「布爾塞維克必須駕御技術」。

這個意義，就是黨要求我們全部，要在我們所擔任的工作上學習，要把握我們工作的本質，要熟知生產之技術的問題，要我們成爲我們工作之現實的駕御者和專門家。這就是事情之核心。

駕御技術這個口號，是中心的口號。牠已經在廣大的勞動者羣衆之中發生了影響。莫斯科，列寧格勒，沙爾柯夫及其他工業中心區的許多工廠，已經開展了爲具體的

實現化這個口號之鬥爭。這個口號之實現化，必將提高我們的工作水平。這個口號將用全力來切割官僚主義的膿腫，這是更不消說的了。

最近三年來，和沙克戴事件相關的，黨在培養技術的前衛工作上，有很大的發展，因而這方面已有很大的進步。從技術高等學校及技術學校出身的技術家，與我們二年前的相比，已經有數倍較優的訓練。在工業中，工程師及技術的專門家的前衛，也有顯著的增加，特別由於青年技術家的參加。今年我們將有三倍於一九二七年之數的工程師和技術家（以每一百勞動者計算）。單是科學的工業勞動者的前衛，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一一〇，而科學的研究機關的協助者總數，增加了百分之一〇六。這一工作，必須用全部精力來繼續下去。

最近數年來在訓練技術前衛上的轉變和特別在訓練勞動者階級出身的技術前衛的轉變，是我國文化革命的開始之一個標幟。去年以來，文化工作開始取得了真實的布爾塞維克的速度。這可在下述的例子中看出來：在一九二八年，一切形式的學校所包括的人數為一四點八百萬，在一九三〇年，已經到達四七點一百萬了。在這二〇中，消滅文盲的工作，確有非常迅速的速度，幾乎增加到十三倍之數。強制的一般教育之採用，已經成功。僅今年一年，我們將有兒童全體之百分之四四點八來進初等小學。我們進行這一工作基礎，在於消滅蘇聯勞苦羣衆之文盲，這與爲實現五年計劃及社會主

義建設之鬥爭有相互的關連。

這一切事實，創造各種前提條件，使駕御技術這個口號，能成爲推動羣衆的真實力量。布爾塞維克必須站在這一鬥爭的最先端。

經濟工作之增大及其性質的變化，使許多變化有實行的必要。蘇維埃政權因此採取了許多的改革方法，不問機關之上級或下級的，一概轉變其工作方式。

關於廢止縣行政區域而鞏固作爲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之最主要的基礎的州之決議，有非常偉大的意義。這一決議，使我們國家機關及一切其他機關更接近於羣衆，但同時使上面各機關增加了新的複雜的行政工作。

同時，在我們中央機關中，最近也採取了各種的變化。

你們都知道，遵照蘇維埃政府之決議，二個人民委員部已經分離了，且設立了一個供給人民委員部。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現在能夠更佳的組織其巨大的工作。這個部的工作，有很大的困難，亦有很大的意義，這個或那個的改變，都是經濟建設之成長及我們的經濟機關有採取一系列的組織上的變化之必要的結果。

黨已經提起了依適應社會主義建設之任務去改造蘇維埃之口號。這個口號已被羣衆熱烈的接受。前次的選舉運動是在這個口號之下進行的。先進的勞動者及農民之新的前衛，參加了蘇維埃，從衝鋒隊及集體農場來的勞動者和農民，尤特別的多。我

們的任務，在使改造蘇維埃的工作實現化，由此來提高蘇維埃的任務，使之成爲黨的一般路線之實行者。

4 最近十年來的對照和我們的政治路線

我們大會的日期，恰與採用新經濟政策以來的最初十年間的終局相一致。因爲這同時又是社會主義建設在和平的關係之下的最初的十年，所以其結果是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義。

我們從前的任務，在於用布爾塞維克的方法去實行新經濟政策。我們的敵人却期待以孟塞維克的，即資本主義的方法實行新經濟政策。這兩個政治路線之間，在全時期之經過中，發生了不能融和的鬥爭。這一鬥爭，到現在亦還沒有停止。這一鬥爭之本質是這樣的，即我們黨專心爲社會主義的勝利和消滅資本主義的殘餘而努力。我們的敵人則專心爲使蘇聯變爲資本主義性的國家和消滅社會主義的成分而努力着，他們想在我們失却了地盤之時，用外國的武裝干涉來進攻蘇聯。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統治關係之下，資本主義的成分對社會主義的鬭爭，不能公開的活動，但是這種成分之壓力，不但在勞動者的一小部分中，有其政治的表現，即在黨的某些部分中，也時多時少，有時以這種形式，有時以那種形式，表現資本主義成分之壓

但是列寧的政策 對於托洛斯基主義和使資本主義的影響波及於無產階級的前衛
種形式的右傾逃脫之毫不假借的鬭爭政策，總歸勝利了。

事實本身 動人的說詞着列寧主義的政策之勝利。

我將從蘇聯的國家設計委員會的報告中，引用若干數字，這些數字，足可表示過去
期間，即一九二一到一九三〇年的蘇聯經濟的成長之特徵。

在這期間中，蘇聯的國民收入增加了四倍；工業之總生產增加了十二倍又半；全耕
地面積——增加了一倍又半；商品販賣——增加了五倍又半；鐵路的貨物交通——增加
六倍以上。

再引用若干的數字來表示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的部份之增大的意義，和私人資本主
義的部份所演角色之縮少的事實。

這裏就是數字。 決定工業及小工業二方面的全部工業中，私有的部分所占的成分
，在一九二一年為百分之三六，在一九三〇年為百分之五。 關於耕地面積方面，這一
期間中私有的部分從百分之九九降低到百分之六七了。 在商品販賣（小商業）上，私
有的部分從百分之七五低落到百分之五點五了。 這些數字，表示出社會主義之勝利的
行進。

再說直接關於勞動者的狀態之若干數目。 工業勞動者的數量的強大，一九二一年

至一九三〇年的期間，由二百四十三萬人增加到六百三十五萬九千人了。在決定工業中的每一勞動者之工資（以每月平均計算），從一四盧布增加到八〇點四盧布，即大約增加了六倍。每一勞動者之生產力（月平均）增加了五倍。

這是最重要的數量上的成果。

過去數年中，我們國內不僅在經濟上有偉大的變化。在社會的階層中，也有非常重大的大變化發生。

勞動者階級從那時候起，即當他掌握了政權及占有了生產手段之時，當然已經成爲嚴密科學意義上的勞動者階級。當作蘇維埃國家之領導的力量而勝利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無產階級，在這一時期中，不僅顯著地增加了數量，充滿着新的分子之參加，而且已經成爲堅固的社會層，任何資產階級都已不能把他們驅入到從前的，即爲資本主義做奴隸的狀態去了。

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已經經過了十年以上的歲月，農民之大部分仍殘留在小私有者的地位。但是農民羣衆中，最後也發生了一種轉變，農民羣衆已經開始成爲集體農民的羣衆了。從前的農民之社會的面目，由此開始了變化。克服小私有者的數百年的傳統及習慣，雖然極其緩慢，但是我們的集體農民之性質，已經與從前的大有不同了。從集體經濟的農民之中，已經發生了一種新的社會主義型式的社會階層，我們已經

不能把這集體農民驅回到從前貧苦的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去了。他們向着社會主義突進着。

卽在我們敵對階級的階層中，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們的根蒂已經到處被掃光了，被驅逐了。因爲階級敵人眼見自己地盤之天天的削弱，他們已經料到在蘇聯內部，決不會再有堅固的支柱。因此，他們投到外國帝國主義的力量中去，參加反蘇聯的干涉。

拉姆辛，格羅姆等等裁判事件，完全暴露了這種成分之政治的道德的極端墮落事實。這一事件之『英雄們』，只是被革命所摧殘了的可憐虫。他們是死滅的資產階級之最後的呼號，是在這最後的一息中，崩潰的腐朽過程所發散的惡臭。

這樣，我們所經過的路程，並不很短。我們已經能由和平的關係之下的最初十年間的社會主義建設之偉大的成功之援助而向前進展。但是，在我們面前，還擺着更大規模的任務。我們現在是進去的十年，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時期，我們必須在其經過中，不僅要在事實上追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技術——經濟的關係，而且必須凌駕其上。（喂采）

追趕並凌駕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之技術——經濟的關係這個任務，格外使我們明白下列諸事，爲我們布爾塞維克目前的中心任務，卽獲得技術，成爲實際活動一切部門之通

曉者，在我們中間產生專門人材，及產生社會主義建設各部門所需要的最高等品質的專門人材。新經濟政策最初十年中所達到的成果，無疑的是偉大的。這一成果，引導廣大的勞動羣衆到確信共產主義之終局的勝利。但是我們必須牢記布爾塞維克的義務，我們不應該因成功而自己陶醉，因為這對於社會主義而奮鬥的戰士，有害無益。

同時我們不應忘却表現在過渡時期中的分裂性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成長，是這個要素之根本的及固定的特徵。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之各種階段上，分裂性的要素並不把持同一的性質。這裏，我們就有正確的判斷具體的條件之必要。我們必須估計某一時期之特殊性，各區域及各建設部門之特殊性，不可一意的依靠一般的公式及處理方法。

我們走進了社會主義的時期，但是我們還沒有克服有特殊性質的新經濟政策。馬克思主義者的我們，不會忘記雖然走入了社會主義的時代，但還沒有把昨日的一切，完全全的打倒這件事。在新經濟政策的問題上，我們應該充分的考察牠在現階段中的具體的特殊性，這很有必要。

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曾這樣說過：『在新經濟政策中，我們把農民作爲小商業者，對於私人交易的原則，作了讓步。我們現在發見了私人利益，私人的交易的利益之融合的程度，由國家來試驗并統制這私人的利益，併使之隸屬於一般的共通利益之下；從前許許多多的社會主義者，都在這裏遭受了挫折』。

從寫這句話的時候以後，新經濟政策現在已與其在第一時期的情形，有了多少不同的地方。這祇要說到我們現在已經走入了直接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就夠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的部分已經達到於統治的地位。

我們更須想起列甯關於初期共產主義所說的話。在這方面，有非常重大意義的，是列甯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的下述諸句：

「所以，在共產主義社會之第一時期（通常稱為社會主義時期），我們還未曾完全廢止『資本主義的公正』，只有部分的，只適應於已達到的經濟的變革，即只關於生產手段的方面，把牠廢除了而已。『資本主義的法律』承認生產手段為各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使牠成為社會的所有物。在這樣的範圍中，——只在這樣的範圍中——資本主義的法律停止作用。

在其他的部門，牠還繼續存在，社會成員中的勞動及生產物的分配之際，牠還是一個調節者。誰不勞動，誰就不能得食，這個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已經實現化了；等量的勞動，應得等量的生產物——這個社會主義的原則，也已經實現化了。但是，這還不是共產主義，也不會廢止資本主義的法律，牠對不同等的個人之不同等的（實際上不平等的）工作數額，給予同等的生產物。」

列甯還在十月革命之前，著就這本『國家與革命』。當時列甯關於初期共產主義

所說的話，是只以理論的基礎為出發的。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之實際工作，確證列甯這一以馬克思及昂格斯的學說為基礎的理論的分析，是完全正確。上面所引用的列寧的話，現時特別有實際的意義。

試舉集體經濟之建設為例。

準備在本會提出審查的，關於集體經濟的建設之綱領，指出在集體經濟的收穫的分配上，不依照集體農民的勞動之量和質的多寡，而依照人數之多少這個方法，是集體經濟建設領域之最重大的缺陷。撤銷這個最重大的缺陷，是現時不可推遲的任務之一。

我們必須完全了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認識，關於集體經濟建設的布爾塞維克的見解所要求的，是集體經濟的收穫之分配，必須事實的與所放下的勞動之量和質相合致，不應依照，農村中的富農及其同伴者所希望的以人數來分配。集體農場生產物之分得部分，若不與實際投下的勞動量和生產力相一致，——若沒有這樣一致，那就等於沒有集體經濟的運動一樣。若不堅決的在實際工作中貫徹這個原則——當然要與集體經濟狀況之其他的各種情形相和諧的——那末我們建設集體農場之政策，在現實事情上不是布爾塞維克的，反成為小資產階級性的了，換言之，在實現的事情上，這將不是幫助蘇維埃政權去建設社會主義，反將幫助富農反對集體經濟的鬥爭了。

試從工業領域中舉一例來說。

在工業政策上，我們所採取的，現在也繼續着的路綫，是不斷的提高勞動者及勞動女工的工資。關於最低工資的勞動者部分，我們也非常注意的實現這個原則。而這完全是正確的。但這是不是我們要問高級熟練勞動者及初進生產過程的勞動者之區別，而實行平均工資的路綫呢？當然不是的。但在實際工作上，顛倒這個工作政策的事件，的確不少，人們不去細心估計生產過程中的高級勞動者及技術家的特殊的任務，而只把工資引導到粗魯的均等主義的方向去了。這種均等思想之根本的性質，完全是小資產階級性的，與列寧主義的政策，沒有絲毫的一致。對於這種完全表現小資產階級性的傾向，若不作嚴重的鬥爭，則保證經濟發展之布爾塞維克的進度，將成爲不可能的事情。最近，工資政策之實際運用上，已經施行了若干的修正。例如增高鐵路工人的工資（機關手及其助手等），增高海員工人的工資（船長，波羅機的指導者，技師及火夫等等）。除這些之外，還有提高最重要的勞動者部類——炭礦地下勞動者——的工資之決議。在我們工資政策之實際的運用上，這些修改是絕對必要的。

不僅關於工資問題，同時關於供給問題，黨也已經發出了關於對某種類的勞動者，有給予特殊待遇之必要的指令。最近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統制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通過的決議，說明消費合作社的活動有這樣的改造之必要，即「首先第一」要無條件的能保證「社會主義的建設之最重要部分和供給問題之與實現生產計劃，增加勞動生產力，

反對變更工作地位的傾向之鬥爭及鼓舞社會主義的勞動方式（社會主義的競賽，衝鋒隊等）之結合」。可惜的是，雖然這些決議對於經濟工作上的布爾塞維克的速度之實現化，有很大的實際意義，但到現在為止，實現這些決議的工作，還做得很少。

最後，我舉消費合作社的例子來說。

近來，我們非常注意消費合作社的問題。爲什麼惹起了我們的注意呢？因爲我們在這方面，堆積了許許多多的缺陷。真理報的某一社論上，關於合作社的情形，簡單的這樣寫着：「從他們在市場中獲得了獨占地位以來，合作社開始忘失了牠們是爲消費者而存在，不是消費者爲合作社運動者而存在的道理」。我們的合作社運動者開始忘却了下述的任務，即合作社的蘇維埃交易要扮演的角色，至到達終局差得很遠，又我們還不能把事情化爲簡單的分配及生產物之直接的交換。甚至事情到了這樣的狀態，即合作社機關不去發展蘇維埃交易，有時反變成爲停止貨品流通的機關。甚至手中保存着很多很多的貨品，而合作的組織却狡猾的不許消費者得到貨品。我們必須明白，若合作社不經過實際的蘇維埃交易之學校，若他們不與他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的方法，不與一切官僚主義的習慣，不與「新經濟政策的暴富者精神」作堅決的鬥爭，那末，合作社沒有進展較高階段，到達生產物交換的階段之希望。

我以這些實例爲結束。他們已經指示出：我們的工作路線是什麼，及我們怎樣向

曲解路線的作鬪爭之方法。

同志們！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誇耀我們全十年的期間中，特別是最近一年中所得到的經濟建設之成果。但是擺在我們前面的任務之規模，還是非常的巨大，我們必須利用以前所得的結果為基礎，來為社會主義去實現更偉大及更重要的工作。

重視過去時期的工作之特別意義，對於我們是必要的。一九三一年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年頭。牠是對於四年中實現五年計劃有決定意義的年頭。牠要求我們要特別的努力去克服現在的一切困難，要求我們在執行規定的路線之際，要有高度的組織性及不被動搖的決斷力。一切不願更進一步的傾向一切在舊的工作方式上去工作的傾向，如遭遇困難，不想克服的而想迴避的一切傾向，凡此一切傾向，絲毫不能在一九三一年顯露出來！

為保證我們工作之完全的成功，現在有特別必要的，在確保我們一切組織之實際的堅守這一同一的路線，如射擊同一的目標一樣。中央行政機關，在實現規定的任務之際，已經給予我們以一個共同行動和共同努力的榜樣。這或可當作全國的模範。蘇維埃和黨組織方面之共同行動，保證我們全活動領域之最高的統一性，保證我們在列寧黨的領導之下，動員一切所有的力量。一九三一年在實現五年計劃，在為實現社會主義建設之實際的綱領而鬥爭的事情上，是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年頭。當我們把衝鋒隊向

全部戰線分配了之後，讓我們確保一切組織之工作，真以衝鋒式的速度來進行啊！

同志們，有一時期，我們蘇維埃政權之代表，關於我們現在時期，即資本主義的制度和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制度，這兩個原則上不能融和的制度之並存時期的見解，不得不加以特別的說明。一九二七年，我們的代表曾在歐洲經濟會議上，作過這樣的聲明：

「社會主義不僅僅代表經濟及社會平等之制度。社會主義的意義，比什麼還先的，就是和平。兩種經濟制度間的對立，將在一定的歷史的期間內不可避免的共存着，然而這決不會除去兩者間的實際的締約之可能性」。

我們現在仍舊抱持這種觀點。

我們更有這樣的意見，即蘇維埃政權之這種態度，已由事變的經過而得到了政治的確認。

當我們說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兩種原則上不能融和的制度，在特定的歷史的時期內的共存之不可避免性時，我們就從這個事實抽出我們的結論。同時，我們知道資產階級也從這裏得到他們的結論。

我們的結論是：為確保社會主義的勝利，我們必須最大限度的利用上述的歷史的時

期。我們階級敵人也確立了要把蘇維埃制度，把社會主義的制度，從地球上驅逐出去的任務。鬥爭將在這兩種世界之間發展并猛烈化。我們認為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爲共產主義，爲馬克思，昂格斯及列甯的主張之完全的實現而作堅決并激烈的鬥爭，是我們的任務。（烈狂的持續的拍手，變到敬意）。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蘇聯）

論革命轉變問題

猶新

九〇

目前中國革命的發展正在革命復興到直接革命形勢的過渡階段，在這階段中擺在黨的面前有許多的問題值得同志們特別研究的，而革命轉變問題正是這許多問題的一個。革命轉變問題一般說來並不是目前的直接實際的口號，不過在這個時期中，黨內對於這個問題應該有明顯正確的了解，尤其是在目前黨在反對取消派及李立三主義的時候，這個問題更有闡明的必要。

革命轉變問題的內含異常複雜，其中包含有革命動力問題，革命政權問題等等，所以詳細的發揮，自非長篇大論不可，不過作者暫時在這裏只提出一個大綱，以供同志們作參考，以後如有必要時當作專論敘述。

一 列寧主義中的革命轉變問題

(一) 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問題底幾個基本法則

革命轉變問題，一般說來在馬克思的學說體系中就有了相當的理論基礎，不過因為種種社會條件的限制，這個問題從不曾佔為直接的行動口號，所以牠未曾被具體化，實踐化，到了列寧主義時代革命轉變問題却成爲一個主要問題。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

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牠的形成底社會背景與馬克思主義有許多重要的分別，在這個時候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爲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的要求。加以列寧自己曾領導俄國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革命轉變問題在列寧主義中已不是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實際行動鬥爭的結論，所以研究列寧主義對於革命轉變問題的貢獻，在了解革命轉變上有異常重要的意義。

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底基本法則可以簡單的歸納爲下面的幾個，即：

(1) 列寧主義認爲不能機械的將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兩者分開，第一個完成乃轉變於第二個，並且第一個完成越徹底則越容易，越迅速轉變於第二個。

(2) 列寧主義認爲在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中間沒有萬里長城的形而上學式的深淵遠隔着，反之在兩個之中只有一種辯證法的過程，牠兩者互相轉變着，甚至錯綜着，第一個轉變於第二個，同時第二個又繼續地完成第一個。

(3) 列寧主義認爲革命轉變絕不是修正主義者，改良主義者所謂『自然的』，『和平的』過程，而是一種鬥爭的結果，這種鬥爭的完成將由該社會的客觀背景和整個國際環境來決定（列寧主義並不否認在某種特殊條件之下，革命有和平轉變的可能，不過這種和平的轉變仍須經過不斷的鬥爭）。

以上是革命轉變的幾個基本法則，這種法則適用於任何革命的轉變，不過這些法則仍須有具體的說明，作者在這裏特將俄國革命的經過作為例證來說明一下。

(二) 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在俄國革命中的運用

俄國革命經過了三個主要階段，即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與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當時革命的客觀任務在推翻封建勢力的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發展資本主義，所以當時列寧領導的多數派認為必須參加這種革命，無產階級在這革命過程中應該奪得革命的領導權，反對資產階級的妥協，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工農民主專政。工農民主專政在本質上是小資產階級的，牠不能具有實行社會主義的任務，牠的目標只是在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牠方面，工農民主專政又與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不同，牠在形式與內容上已高一級，這就是說牠不只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是從這一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工具。

所以當列寧論及工農民主專政的時候，特別指出這種特徵，譬如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名著『兩個策略』中他這樣的描寫着說：『民主革命的工農專政，像世間一切存在的物件一樣，是有其過去與將來兩方面的。其過去的方面為專制，農奴制度，君主，特權等。……其將來的方面——是反對私有財產制，僱傭工人為反對主人而鬥爭……』（中譯一一，九一，一二〇頁）。除此以外，列寧在該書中並指出工農民主專政越實

現得徹底，則越容易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列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對於革命轉變問題一般的估量。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因種種客觀的和主觀的原因結果失敗了，接着便是反動勢力的統治。不過革命雖然失敗而革命客觀任務，仍沒有完成，封建勢力的統治絲毫沒有動搖，所以革命復興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到了一九一二年初革命運動果然復興起來了。這種革命運動因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爭的影響到一九一七年形成了二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二月革命在本質上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當時革命的客觀任務，仍然和一九〇五年的時候一樣，斯托里平的改良雖然創造了少數的富農與整個封建經濟基礎沒有絲毫的變更。二月革命的結果推翻了沙皇政府，組織了臨時政府，他方面在羣衆中組織了工農蘇維埃。

在這種形勢之下，多數派的意見怎樣呢？我們首先來看列寧的觀點。列寧在二月革命的時候，尙未回國，他當時對於國內的實際情形完全沒有得着詳細的材料，不過從電報中已經知道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因此在他的遠方來信中作了一個普遍的分析，並指出這次革命不是最後一次的革命（參照全集十四卷下冊『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二月革命以後，列寧回到了彼得堡，便即刻發表了他的有名底『四月大綱』，這是多數派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一切行動底根據，也就是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

的主要文件。

列寧的意見，認爲二月革命的歷史意義便是在牠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在這一點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他說『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前，俄國政權，是握在一個舊的階級手裏，就是握在尼古拉，羅曼諾夫爲首的『農奴主，貴族和地主』階級手裏。自這次革命以後，政權轉到別個新階級，即資產階級的手裏。在革命的嚴格科學意義以及實際政治意義上講來，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到別個階級，是革命的第一個根本的主要標誌。因此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已經完結了』（同上『論策略書』）。

二月革命的另外一種歷史意義便是在牠實現工農民主專政，這種專政的形式表現於工農蘇維埃之中。他說：『在俄國革命中『工農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在某種形式上，某種程度上），這個公式所能預見的，只是階級的相互關係，而不是實現，這種相互關係和相互合作的具體的政治機關。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在生活中實現了的工農民主專政』（同上）。

這樣，代表封建地主的沙皇政府被推翻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建立了，工農民主專政也實現了——這種事實都證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但是有人就問多數派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說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只有根本剷除封建的統治，

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現在沙皇政府雖然推翻了，而革命的任務尙未會完成，封建地主的統治尙未會打倒，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這豈不是和一九〇五年的主張自相矛盾嗎？多數派中的卡米尼夫便這樣的反對列寧，他堅持着一九〇五年的主張，自稱爲『老布爾塞維克』，說革命尙未完成，工農民主專政口號仍是必要。

這種論調曾被列寧堅決的駁斥。列寧認爲他的『四月大綱』和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主張即『兩個策略』沒有絲毫的矛盾，『兩個策略』的主張一般的說，已經被生活證實了，不過因爲社會條件的變遷，實現的結果稍微有些特殊的形態罷了。他說：『布爾塞維克的口號和思想，一般的講，已全爲歷史所證實，但具體的事實，却和任何人所期望的不同，他要奇異些，特殊些，複雜些』（同上）。『工農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但是實現得非常奇特，並且帶着極重要的形式上的變更』（同上）。

卡米尼夫的錯誤，照列寧的意見，便是機械的死板的保守着舊的已經腐爛了的公式而不能把握新的現象底本質而提出新的任務。列寧對於這種傾向會給與劇烈的批評，在『論策略書』中這樣的說：『好朋友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却是常青的。誰要照舊提出資產階級革命『完成』的問題，誰就要使活的馬克思主義，成爲死的字句底犧牲品』，『現在要是誰祇講『工農民主專政』誰就落伍在生活之後，他因此在實際上就投奔小資

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因之就應把他送到布爾塞維克的革命以前的古物陳列所去（或者名之曰「老布爾塞維克陳列所」）（同上）。接着又有說：「卡米尼夫的錯誤，就在他至一九一七年，還祇看着革命民主專政的過去。實際上，這專政的將來，已經開始，因為實際上，僱傭工人和主人的利益及政策，已經背道而馳了，例如對於這樣重要的問題，如「保護祖國」問題及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等問題」（同上）。

卡米尼夫另外一種錯誤，照列甯的意見，便是不曾認識二月革命所組織的蘇維埃底意義，他不知道這種政權與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分別的地方，列甯說：「卡米尼夫並不詳細考慮事實，考慮已經存在的蘇維埃的意義，及蘇維埃在形式上，社會政治等性質上公社式國家（指巴黎公社的）的相同之點……，他對於這些切身的實際的，生活上最緊急的問題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是什麼？他是否富於國會制的共和國……他是否更要民主些……等等置之不顧」（同上）。因為不曾了解蘇維埃的本質和意義，所以卡米尼夫便肯定說工農民主專政尙未曾實現而不知道正是已經實現了的工農專政形式。

在事實上，我們如果詳細的分析二月革命以後俄國的情形，便可以看出卡米尼夫的意見是何等落後。二月革命雖然組織了蘇維埃，但是當時因為大多數的領導是少數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不斷的處在搖動的狀態中，結果蘇維埃雖然具有武裝的工農羣衆，然而牠不敢自行奪取政權，反把政權恭敬地讓諸臨時政府，自己變為牠的附庸。至

着多數派的領袖大多數尚在外國，一部份的幹部也沒有認識當時的客觀變化，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臨時政府反成了當時的形式上的主人翁。可是資產階級不但不從推翻封建的統治，反之他們極力在進行帝國主義大戰的繼續，革命的任務一點也沒有實現，所以完成這種任務祇有無產階級革命。

卡米尼夫所以患了這種嚴重的錯誤，首先就是因為他不了解革命的轉變問題，他機械的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分開，似乎以為兩者中間有條形而上學的深淵遠隔着，他始終以為先行必須澈底地完成第一個（在這裏他把革命的完結與革命客觀任務的完成兩個問題混合起來），然後才能開始第二個，而不知社會主義革命可以而且應該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會和卡米尼夫堅決的鬥爭，結果列寧勝利了，多數派便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而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準備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正是在多數派領導下完成了。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因為革命的目標在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工具，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但是牠同時在鄉村中又是資產階級革命，因為二月革命沒有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這種任務在十月革命中澈底地解決了。因此在十月革命過程中，我們看見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兩者的錯綜及併行——這是十月革命一個重要的特徵，也就是牠所以能夠成功的

一個主要原因（無產階級革命一直到十月革命後幾個月才在鄉村中開始）。

在一九二一年十月革命四週年紀念的時候，列寧回顧這種轉變的過程，曾在他的紀念論文中，重新提及這個問題，他這樣的說：「無政府主義者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論者（即少數派及社會革命黨人之類）說過，而且說着許多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關係的問題的蠢話。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的了解和對於過去革命經驗的估計，被四年來的事實完完全全證實了。我們達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底，比任何人更澈底。我們完全意識地，堅決地，不論白地向前進行到社會主義革命，知道牠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間沒有萬里長城遠隔着，知道只有鬥爭能解決……」。接着又有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早已說過并證明過，是無產階級即社會主義的革命底附屬產物。所有考茨基，希爾福丁，馬爾托夫，……麥唐諾；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的英雄不能夠了解這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聯系。第一個轉變於第二個。第二個，無意的，解決第一個的問題。第二個鞏固第一個的事業，鬥爭只有鬥爭才能夠解決第二個轉變於第一個」（全集十八卷，上冊三三四——三三七頁）。

這一段話是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問題的精華，我們從這些話中也可以認識革命轉變理論在俄國革命中的運用如何了。

（三）少數派，托洛斯基主義派的革命轉變的理論

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和其他的列寧主義部份同樣是從不斷的與各種機會主義傾向鬥爭中產生出來的。列寧在這個問題上曾與少數派，托洛斯基主義派堅決的鬥爭，因為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根本是錯誤的。少數派完全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機械的分離，看兩者中有形而上學式的深淵遠隔着似的。他們認為必須等資產階級革命澈底完成以後，資本主義經濟得着廣大的發展，那時才開始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這樣的「階段論」。因此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奪取領導權的必要，並且根本不贊成工人有任何「過分」的政治要求，以免「破壞」統一戰綫。工人在革命中的任務，只是推動資產階級，幫助他們奪取政權。蒲列哈諾夫的意見和少數派原則上完全相同，他機械的運用西歐十九世紀中葉資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忽略了俄國革命的社會條件的特點，認為革命成功後資產階級得着政權，然後無產階級才起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少數派這種論調曾被列寧堅決的批評（見他的「兩個策略」）。列寧認為這種理論是工人運動中的自由主義傾向，因為牠運用的結果將使無產階級失掉獨立的作用，變為資產階級的尾巴。少數派的一個重要錯誤便是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他們不知道無產階級可以而且應該領導農民參加資產階級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作為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工具。

托洛斯基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同樣是錯誤的。他們不能了解革命轉變是一種過程，這種過程的完成，必須經過許多的階段，所以他們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中就提出「打倒沙皇，建立工人政府」的口號，企圖跳過必經的階段。托洛斯基主義者的一個主要錯誤，便是與少數派同樣的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他們機械的認為俄國革命必須得着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幫助，否則失敗，這完全否認無產階級可以領導農民去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以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

托洛斯基主義這種理論被他們自稱為「不斷革命論」（或「永續革命論」），其實這種理論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這個名詞曾被馬克思運用過，在一八四八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失敗以後，在「告共產主義者」一書中馬克思綜合過去革命失敗的經驗，曾指出革命運動的高漲不日決要復興，無產階級應該組織獨立的政黨去領導革命，繼續地完成革命的任務，并不停留於原有的階段而應該不斷的推進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與托洛斯基主義的在本質上完全不同。馬克思雖然指出無產階級必須繼續地完成革命任務並不斷地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然而他沒有馬上主張建立工人政府，此外他始終不會忘記農民革命作用，反之，他特別的申明無產階級必須奪取農民小資產階級羣衆，作為革命轉變的必要條件。

托洛斯基主義者一直到十月革命成功以後（現在也是）還不會了解這一點，托洛斯基

基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十月革命的教訓』一書中不但不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且還肯定的說，十月革命完全證實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確，甚至列寧在二月革命以後，也放棄了他的工農專政口號，而運用了托洛斯基的理論等等。這種論調完全是機會主義者無恥的詭辯。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俄國二月革命以後，列寧所以放棄了工農專政口號，是因為二月革命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實現了這口號，並且政權已經過渡到新的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舊的口號已不適用了，而絕不是因為信仰了托洛斯基的理論。而且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是否定農民革命作用的，而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多數派得着廣大的農民羣衆的擁護，十月革命時在鄉村中大多數農民參加了反地主的鬥爭。這就是說十月革命的成功完全證明了托洛斯基主義革命轉變理論的破產。

綜合以上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是唯一正確的，因為他把革命的轉變當作一個辯證法的過程，與少數派，托洛斯基主義派的形而上學，機械論，詭辯論的觀點根本不同。因此了解革命轉變問題，只有站在列寧主義的立場。

二 中國革命轉變問題

我們在上面的分析結論中，已經指出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是唯一正確的，因此了解中國革命的轉變問題毫無疑義只有站在列寧主義的立場。但是列寧主義並不是教

條而是行動的指導，所以不能機械的把牠籠統地套在中國問題上，而應該顧慮及中國革命發展的特點和其他許多中國社會的具體特殊條件。換句話說，我們主要的在把握列寧主義的方法，即唯物辯證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正確的解決中國革命轉變問題。

(一) 中國革命發展中目前階段的特點

目前中國革命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牠的國際背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的形成與發展正處於所謂國際資本主義局部的，相對的穩定時期，帝國主義者在這種條件下具有充分的力量來幫助中國的反動勢力，以鎮壓中國革命運動，同時西歐各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在這種形勢之下，却不能給中國革命有力的援助，這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之所以失敗的一個主要的客觀原因。目前中國革命的國際背景便不同了。現在國際資本主義整個的發展已經走進所謂戰後資本主義的第三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在原有的資本主義普遍的危機底基礎上開展着更加劇烈更加尖銳的經濟危機，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在這個形勢下從局部的相對的穩定而走向腐蝕甚至完全崩潰的時期。

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的特徵尤其是到近年來更加表現得明顯。經濟恐慌現在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現象（這種現象的背景不平衡），同時這種恐慌在本質上與以前的不同。以先恐慌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週期現象，現在則成爲不斷的過程，以先

恐慌是局部的，牠的範圍只及於部份工業，或大部份工業方面，現在恐慌則為全部工業與農業的普遍現象，這就是說第三時期的經濟恐慌是在原有資本主義一般恐慌中展開的恐慌，是資本主義整個體系走向完全崩潰時期的恐慌。

經濟恐慌擴大的結果形成了千百萬的失業工人羣衆，失業問題現在已成為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鬥爭的對象，尤其在美，英，德先進的國家中表現得嚴重。因為經濟恐慌不斷的繼續更引起市場的問題爭執，更加緊了帝國主義者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進攻，更引起帝國主義中間的衝突，他方面促成世界革命運動的高漲。現在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運動得着廣大的發展（這種發展的程度不平衡），在德國，法國等工人的鬥爭已經達到了異常嚴重的階段，無產階級的政黨在羣衆中的影響日益擴大起來。

除此以外，目前中國革命的國際背景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聯的存在。蘇俄自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後，轟動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成為世界革命的大本營，尤其是現在蘇聯在國際上的影響更加擴大了。蘇聯自一九二六年以來便完全成了恢復的階段而開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接着偉大五年計劃的實施得着驚人的成績，這種成績昭彰人目，甚至資產階級的報紙也不敢否認。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給世界革命莫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時候應該估量到的。

以上所說的只是指國際背景一項，現在再就中國革命自身來說。中國革命一直到現在經過了許多的階段，從五卅慘案起經過兩年間的大革命，到最後廣州暴動，以至於革命失敗，國民黨統治到目前革命復興的階段，革命運動仍不斷的向前發展。在這長期的鬥爭過程中給我們許多的教訓，就我們的黨來說，黨會有過國共兩黨合作的經驗，武漢時期的經驗，廣州暴動的經驗，反孟塞維克機會主義鬥爭的經驗，革命失敗時期的經驗，蘇維埃政權的經驗，反取消派，托洛斯基主義派等的經驗。就羣衆方面來說，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運動與國民黨統治下連年不斷的軍閥戰爭，以及廣大的蘇維埃政權的發展，這些事件都給羣衆異常豐富的教訓。所有這些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教訓，對於最近年來的革命進展有很重要的意義，這是我們應該注意到的。

綜合起來，國際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一般背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飛躍的進展，以及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與深入——這些都是目前中國革命發展階段的特點，只有從這些特點中我們才能夠得着關於革命轉變問題正確的解決。

(二) 中國革命轉變一般的預測

中國革命轉變過程的具體形態我們目前不能預測，因為革命的轉變的完成將由該時候的客觀條件，階級力量對比的關係來決定，不過一個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者可以而且應該根據科學的分析去指示出革命轉變的一般特徵，作為黨的策略底根據。

據我們的觀察，中國革命轉變的形式與速度與俄國革命將有許多的不同，因此俄國革命的經驗不能在中國機械的運用。俄國革命的轉變底完成是這樣的，即：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與工農蘇維埃，但是革命的客觀任務並沒有完成，因為蘇維埃在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如少數派，社會革命黨人領導下走向與資產階級妥協的道路，然而他方面革命却不能停留於原有的階段而應該更進步開始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領導農民小資產階級澈底地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在十月革命中我們看見了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兩種過程的錯綜與併行。但是中國革命的轉變將不依照這種方式。

中國革命轉變的開始，將先行實現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工農民主專政與俄國二月革命後所實現的不同。二月革命以後所實現的工農專政並不是一種具體的政治機關，在說專政中我們只能看見工農階級的相互關係，這種專政列寧稱之為「不是純粹的工農專政，他在「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一文中說：「當革命超出了普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但還沒有達到「純粹」工農專政的時候，兩個政權是革命發展中的過渡階段」，正是因為不是純粹的工農民主專政，所以革命的客觀任務沒有完成，中國的工農民主專政將不是這樣。在中國工農民主專政將是一種具體的政治機關（這種機關現在已局部的存在了），在這種機關中無產階級不但在思想上能夠領導農民小資產階級羣

衆而且在國家的組織上領導他們，並且在這領導中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將佔唯一的地位。這種特點並不是偶然而是在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結果，中國革命，在上面已指出經過許多的階段，蘇維埃已經成爲唯一的革命政權形式，共產黨已經成爲唯一的革命黨，所以在中國實現工農民主專政的時候決不會有兩個政權的存在和兩個或三個政黨的聯盟（在這一點上布哈林所說中國革命將來組織的工農專政中共產黨有與第二個黨組織聯盟的必要的話，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論調）。在這種特殊條件下中國革命所實現的工農民主專政將澈底的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中國革命所實現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另外一種特點，便是他不能只限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而應該更進一步進行很重要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步驟，即他不但應該推翻封建的統治沒收地主的土地，而且應該澈底的沒收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資本以及中國資本家的生產工具。這種特點也不是偶然的。中國革命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所以一開始便受着帝國主義者的打擊，以後又不斷的勾結封建勢力，資產階級破壞革命運動，如若民族資產階級自一九二七年便叛變了革命，投降於封建勢力及帝國主義，進行種種反革命的工作，因此當中國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時候，帝國主義及民族資產階級一定要更加殘酷破壞革命，無產階級在這種情形之下，不但要堅決的反對封建地主，軍閥而且要與帝國主義及民族資產階級作堅決的鬥爭，所以沒收他們的資本和企業等是絕對必要的。

。地方紅軍奪取了武漢的政權，建立了工農民主專政，帝國主義者必然聯合民族資產階級來破壞革命，如軍隊的進攻，經濟的封鎖，怠工抵制等等，無產階級政黨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不沒收他們的生產工具，便不能自存，這是很明顯的。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肯定的預測中國革命的發展，從資產階級民主的轉變於社會主義的階段底時間和速度，要將比俄國革命的轉變短些和快些，因為工農民主專政已完全實現了——作為政治機關的實現——無產階級的政黨取得了唯一領導的地位，革命不但推翻了封建的統治而且沒收了帝國主義的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工具——革命的轉變當然要迅速些，容易些。關於這一點列寧常常在他的作品中有說，他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完成得越徹底則越容易，越迅速的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例如在「兩個策略」這樣的寫着：因此資產階級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十分有利，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着想，資產階級的革命是無條件的必要。若資產階級的革命來得愈決心，愈徹底，則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之鬥爭也愈有保證」，又有說「現時革命之完成勝利，就是民主革命之終結，也就是社會革命堅決鬥爭的開始。實現現在農民的要求，完全壓倒反動勢力，取得民主共和政體——這就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革命性的終結。也就是無產階級真正爲社會主義而鬥爭之開始。民主革命愈完滿，則無產階級之新鬥爭也愈將推廣，而堅決的發展」（見中譯五三，一九四頁）。

(三) 取消派，與立三主義等的革命轉變理論

取消派的革命轉變理論表現於他們所謂『中國第三次革命論』，這種理論主要的內容是說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已經完結了，將來革命運動的復興將不是資產階級民主的而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例如他們這樣的說：

這個根本不可爭的中國第三次革命的社會政治的前提條件，不僅是證明民主專政（指工農民主專政——猶新誌）的公式已經壽終正寢，而且這第三次革命連像俄國十月革命後半年的『民主』時期也不會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七月）而將於開始就要堅決的動搖而且推翻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見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三〇——三一頁）。

這就是說，中國革命目前的發展已經超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而直接地走進了社會主義的階段，在目前工農民主專政已經『完結了』，牠早已成了『反動的口號』（除托洛斯基著作外，見『無產者』陳獨秀，彭述之等的論文），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去繼續完成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的任務而是馬上便推翻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第三次革命論。

取消派這種理論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們整個理論體系的必然結論。取消派的理論要點是否認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及歌頌統治階級政權與民族資本主義的穩定。他們說中

國封建經濟因爲商業資本的侵蝕及帝國主義商品的深入遂變成『殘餘的殘餘』（陳獨秀）自國民黨——『資產階級的政黨』——統治以來，中國的政權日益走向統一，民族資本主義得着空前的發展，更加以帝國主義者的『幫助』，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穩定』起來。這就是說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克服了自己的敵人——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所以目前革命的性質已經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而是社會主義的了。

取消派這種論調的錯誤稍有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眼光的人都容易看出的。中國封建勢力至今尚未消滅，國民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盟——自一九二七年叛變以後，便投降了帝國主義，在三年的政治中不但沒有完成任何肯定的任務，反之，更加殘酷的剝削一般勞苦羣衆，尤其是在近年來不斷的軍閥混戰，使一般的羣衆更受着空前的損失，民族資本主義在這種條件之下，日趨於破產的道路。所有這些種種事實都證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推翻帝國主義者，軍閥，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仍是目前的主要對象。

取消派認爲目前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已經超過了俄國二月革命後的階段而達到十月革命的前夜（見任日署的『中國經濟研究緒論』及劉仁靜的『反修正主義論』序言）這種論斷是不妥當的。我們認爲機械的將中國革命目前的階段和俄國革命任何的階段相

同，這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觀點。我們必須注意到中國革命的客觀背景與階級力量的對比——這是決定革命戰策及策略的出發點。如我們肯定的說：中國的『二月革命』已經過去了——這句話將引起種種不正確的結論，因俄國的二月革命雖然不會澈底的完成革命客觀任務，然而牠在某種程度上確曾實現了工農民主專政，在這一點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了，此外當時俄國客觀的階級力量對比及國際的環境——世界大戰，這些條件不但使革命轉變成為必要而且簡直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目前中國革命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如階級鬥爭的尖銳，政黨的發展等）固然超過了二月革命後的俄國，然而牠仍尚未會實現工農民主專政，所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仍未完成。

取消派的中國第三次革命論在本質上不過是托洛斯基主義的『不斷革命學說』的運用，我們在本文前半部已經指出『不斷革命論』的錯誤是企圖跳過必經的革命階段，忽略了農民的革命作用，忘記了革命轉變是一種過程——這種與貨色王被托洛斯基的黨徒們搬運到了中國來了。取消派的第三次中國革命論在原則上完全否認了土地革命的必要，因為封建勢力已不存在，民族資本主義已經穩定了，則土地革命當然也不存在了——取消派的理論在這一點上與改組派陳公博等的論調却正是無獨有偶。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取消派的革命轉變理論，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現在我們來看李立三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如何。李立三主義者

雖然不否認目前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性，然而他們和托洛斯基主義者同樣不會把革命的轉變當作一種過程看。他們不知道中國革命的轉變的時間和速度雖比俄國革命要短些，快些，然而這種轉變的完成仍須經過許多的準備及過渡階段。例如他們說：『所以革命勝利的開始，革命政權建立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中間決不會有絲毫的間隔』（見『紅旗』九十六期立三論『建立政權與革命轉變』），這就是說革命高漲一到，政權一建立，馬上就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中間決不會有絲毫的間隔，這與取消派否認目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而主張無產階級革命的論調相差幾何呢？

此外，我們這個地方應該特別指出的，便是中國革命的轉變的速度雖然比俄國革命要快些，時間要短些，然而從革命的轉變到社會主義將要比俄國有更多的過渡階段，在這種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生長不但成爲可能而且是必有的趨勢，所以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是極力的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運用各種適當的步驟，以保障中國到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李立三主義者對於這些過程的步驟一點也不懂，所以他們主張在革命轉變之初，馬上就建立集體農場和國家農場，要即刻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實行專賣——沒有軍事必要的地方也去調節經濟生活等等，這種論調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

我們在上面已經檢討了取消派及李立三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這裏順便說幾句關於

孫中山主義的非資本主義發展理論。孫中山自己也曾提出過中國非資本主義發展問題，也曾計劃過達到這種目的的種種方法，然而這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沒有絲毫科學的分析。即就他的民生主義理論一項來說完全是一種空想的社會主義。他企圖運用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種手段去實現社會主義，稍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常識底人們即刻可以看出這種思想是何等錯誤。節制資本一項固不必說，因為這不過是一種妥協的手段，而平均地權却絲毫不具有社會主義的色彩，平均地權更具體些說，即土地國有實施的結果只消滅了絕對地租（等差地租是保留了），這是發展資本主義最徹底的方法，因為牠消滅了封建制度土地的關係與壟斷，使土地的流通買賣為自由，即使土地更適合於市場的要求，孫中山主觀上以為這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而結果却變成了最積極的資本主義的土地政綱。至若他的民權主義否認政權的階級性，企圖組織「全民」的國家，這同樣是小資產階級空想的理論。

綜合起來，上面所檢討的各種革命轉變理論，在本質上均是錯誤的，只有正確的運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中國革命的轉變問題才能得着完滿的解決。

當然，我們在這裏不過根據科學的分析指出中國革命轉變一般的趨勢，至若轉變的具體形態，將由鬥爭來決定，我們黨的任務是加緊無產階級的領導，鞏固黨的組織，堅決的和各種機會主義傾向鬥爭——尤其是兩條戰線的鬥爭更為必要！——只有在這種條件

之下革命的勝利才有保障。

——(完)——

~~~~~五月二十日~~~~~

編者按：猶新同志這篇「論革命轉變問題」的文章，介紹列甫主義對於革命轉變的理論及其在俄國革命中的運用雖然沒有什麼錯誤，但是說到中國革命轉變問題却忽視了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階級關係對比的問題，而這一個問題却正是將來革命轉變中基本問題之一，實是很大的缺點，但是我們仍舊將牠發表出來，爲的要引起同志們對這一重大問題的注意，希望同志們熱烈做文章來參加討論。

~~~~~編者——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的中國

共產黨

(續)

華崗

五 中國共產黨與參加革命政府問題

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於國民黨政策之不正確與違背共產主義原則，在其參加國民政府委員的同志的行動上，與黨對於參加國民政府的整個方針中也充分表現出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此問題的立場，亦與其他許多主要革命問題一樣和國際的方針及初步的共產主義政策都發生衝突。

本來在廣東時期，共產國際就主張中國共產黨應該堅決參加國民政府，領導廣東國民政府走上工農民權獨裁的道路，共產國際在其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決議中說：

「爲着加緊共產黨在國民黨裏的活動，以推進革命運動往前發展起見，共產黨應當加入廣東政府，以幫助左派反對右派之懦弱而動搖的政策。廣東政府轄地之廣大的伸張，使共產黨參加國民政府的問題，比任何時更爲必要。

廣東政府，雖然是資產階級民權性的，但究其根基和客觀上，則包含有無產階

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等革命聯合的民權獨裁制之萌芽。小資產階級民權運動在中國之所以是革命的，因為他是反帝國主義的。廣東政府之所以是革命的，第一亦應有此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因為中國的革命及由革命而產生的革命政府，第一均是反帝國主義的，故必須打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之根基。取消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尚不足削弱帝國主義之地位。必須從經濟上，打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基礎。這個意思，就是革命政府，應當逐漸沒收屬於外國資本的鐵路租界工廠礦山銀行企業等。如此才能即刻擴充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狹路，而走入到革命獨裁的過渡階段。

中國共產黨雖然曾經參加廣東政府，而且曾經指導廣東國民政府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在中國大革命的第一階段中，廣東國民政府所以能夠形成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毫無疑義的，中國共產黨有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嚴格的說來，共產國際這一明顯的正確的指示當時並沒有被中國共產黨所重視，中國共產黨過去參加廣東政府的根本政策與國際的指示是不符合的。

革命的進展使共產國際入次擴大會對於中國共產黨參加革命政府問題不能不有更深刻的指示：

『共產國際執委以為看輕武漢政府的意義，因此實際上否認他極偉大的革命作

用，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武漢政府及國民黨左派領袖，就其階級成分而言，不僅代表工農及手工業者，亦代表一部分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所以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還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但他已經走向工農專政的路上；在階級鬥爭中，如果無產階級獲得勝利，趕去了那些跟着資產階級跑的人們，戰勝了無數叛變之後，則武漢政府便必然發展到這個專政的方向去。

共產國際執委認為，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武漢『臨時革命政府』的活動，是必要的。那個不主張參加，或對於此問題抱一種不定的懷疑的態度，他形式上很是『激進革命』，但在實際上是重演一九〇五年俄國少數黨的錯誤：俄國少數派那時以為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不可能的，甯願組織『極端左派的在野黨』，但是實際上跟在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背後，搖尾乞憐！少數派態度的特點，正因為他反對參加革命的政府，而參加反革命的混合政府。

參加武漢革命政府與歐洲資產階級社會黨的混合政府，並無絲毫相同之處，因為武漢政府的確用革命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者，反對封建制度，現在更反對本國資產階級之大部。

因此，共產國際執委認為，中國共產黨必須積極參加武漢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同時，對於自己最親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堅決，也要加以批評，並確定政府的政策

之正確路線。

共產國際執委促中國黨特別注意：革命政府與民衆間的親密聯合，在目前實在是空前的必要。只有靠着這種親密的聯合——這種聯合是特別要國民幫助才能做到的，只有堅決的打條走向羣衆的路線，才能永久加強革命政府的威信和地位，使政府成爲革命的組織中心。

爲武漢政府劃定這條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不實現此項任務，不擴大羣衆運動，沒有農民革命，不堅決改善工人階級地位，不變國民黨成爲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偉大的組織，不繼續加強職工會，擴大共產黨，不造成武漢政府與羣衆間之最密切的聯絡，則勝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得的。

共產國際執委以爲，共產黨人參加政府，僅僅可用這策略辯護。不是這樣，則參加政府將成爲領袖結合政客勾結的戲劇，受了實際生活的衝刷，受了巨大的階級鬥爭之進展，必至烟消雲散。中國共產黨的第一等任務，便要把政府中的活動和羣衆中的活動聯結一起。

共產國際執委以爲，在目前的條件之下，擴大國民黨內民主化，收容最廣大的羣衆，迅速發展各種工農的羣衆組織，最合革命的需要。中國發展中的特點，像革命的國民黨這樣特殊的組織，可以直接決定政府的成分，是絕對不可忽略過去的。

，用國民黨收容廣大羣衆，使羣衆選舉國民黨的指導機關，經過這些在選舉制的基礎上建設的組織，成立民族革命的政府——這是勞動羣衆和革命的國家政權間聯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適合中國革命的目前階段。因為武漢政府統治下各省狀況之不同，則地方政權的組織，在最初時期，必然採取種種色色的形式（在鄉村間「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政權，以及國民黨委員會政權等等）。共產黨人組織地方政權時的主要任務，便是領導廣大勞動羣衆，領導千百萬工農參加組織和工作」

這就是共產國際爲參加武漢政府問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指示，當時中國共產黨固然也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而參加武漢政府了，然而中國共產黨參加武漢政府的政策却恰恰與共產國際所指示的相反。當時共產黨中央與國民政府中共產黨員所擔任的部長做了些什麼？請看八七緊急會議告同志書中所舉出來的事實：

共產黨員在得到委任令後兩月，才開始組織自己的部務。農政部長譚平山（當時的共產黨員，後來公開背叛革命，組織反革命的第三黨）就職典禮時的演說，除批評他是可恥以外，沒有別的話說。他對於土地革命沒收土地，消滅土豪劣紳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政權，都默默無言，他却說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改良農民狀況」和反對「過火」的話。譚平山就職後馬上就發表對農民的訓令，禁止農民反對豪紳地主的「妄動」。

邊規則「嚴罰」。

實在的說，當時武漢國民政府中共產黨員所擔任的農政部及勞工部與其他的官僚機關並沒有什麼區別。他們就職後幾個月內沒有公布過一個減輕工農痛苦狀況的法律，沒有一個改變城市與鄉村中剝削壓迫的法律及改良經濟關係的法案（如勞動法案，土地法案等）。有些並沒有預備向政府提出。這些部長的共產黨員的工作，照國際的指示應該堅決引導武漢政府走向羣衆的路綫，用最大的努力贊助工農羣衆運動，造成革命政府與羣衆的密切聯系，同時要堅決批評自己的同盟者所表現的一切動搖與妥協性；然而實際上竟完全和這一革命政策相反，當時我們共產黨中央與政府中農政勞工兩部長不會有過一個革命的建議，對於武漢政府包蔽反革命之種種錯誤，也沒有一點批評，而且農政勞工兩部亦竟成了最腐爛的資產階級官僚政治，只是在羣衆面前消去共產黨的面貌；特別是農政部長的政策，除了說他是反對農民的政策，孟色維克的政策，簡直沒有別的適合名稱。土地問題應該是農政部頂主要的問題，但是完全被他忘却，甚至農政部發到各省的調查表，竟無一個關於土地關係問題的。不僅如此，當時農政部長譚平山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算「鎮壓」湖南的農民運動；中央對此是贊成的，並且還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領袖，實行「恢復秩序」的任務；這一次出征已經成行，但走到了目的地，而長沙已經發生反革命的叛變，這次叛變很敏捷的很徹底的實現了譚平山所擔任

的出征之任務。

當譚平山結束他那不光榮的部長之地位時，還是藉口長期請假的退去。當反革命漸漸在武漢境域內鞏固，當國民黨正在醞釀不要共產黨參加政府的趨向，以便可以完全的自由壓迫工農運動，而與蔣介石及其他反革命軍官妥協時，譚平山却很願意去迎合反動軍官與多情的國民黨領袖之希望。他的拿手的辦法，是藉口於理想的病症，來實現他的部長假。並且他的請假，是事先與汪精衛商量，然後再與中央討論；但中央不僅不反對他這種行動，反而完全同意這種計劃。在中央看來，同意於臨陣脫逃，乃是所謂革命政策。

譚平山既因病（！）而請了長假還不夠，還要說：「因政局困難未能納農運於正軌」。一個當國民政府部長的共產黨員在最負責任的時期中，由戰場上脫逃還不夠，而且重新要向農民進攻一次。每個人都應該問一問，從這句話裏得到的是什麼結論？即：（一）農民運動走上了不正的道路；（二）祇有武力能糾正他，因為共產黨員的部長有了共產黨與羣衆組織的完全威權，尙還不能「納入正軌」呢！這是直接承認許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動作（屠殺農民）是對的，這簡直是直接號召反革命的代表們進攻革命。共產黨員的部長在政府內做了一些玩意，實在是共產黨的最大恥辱！但是中央對於譚平山這種反革命的行動，不僅沒有處罰，並且沒有發表一句話。

本來中央亦無從反對起，因為這正是他自己的政策。

共產國際主張中國共產黨參加武漢政府，是爲的要更左的去推動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爲的要消滅所有的反革命成份，並經過堅決的實際的革命鬥爭去得到廣大羣衆的贊助，變武漢政府爲工農民權獨裁。中央對此問題的革命提議，完全不了解，他變共產黨參加政府爲資產階級改良的部長主義。這與多數派主張共產黨員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一九〇五年）的見解相差不知有多遠。當一九〇五年俄國亦是同樣的民權革命的任務（自然中國的民權革命還有自己的特點），亦有無產階級政黨參加革命政府之要求，而且亦是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的問題，列甯對此，在其『兩個策略』的小冊子中說：

『我們還應當爲臨時革命政府，指出一個合於目前歷史客觀條件，且合於社會民主派目前責任之行動與無產階級之德謨克拉西的政綱。這個政綱，就是本黨的全部的最低限度的政綱，是在現有的社會的經濟之關係的基礎上，最近儘可實行的政治經濟改造的政綱，亦即本黨最近將求全能見諸實行的政治要求與經濟要求，這是一方面根據目前社會經濟關係的必要，別方面就是爲今後鬥爭起見，爲實現社會主義起見，這都是不可少的要求。』

無產階級爲要實行自下而上的來威逼政府，就應該武裝起來。武裝威逼的目的

的，是爲保持鞏固並發展革命的勝利，從無產階級的利益觀點上看來，這些勝利，應爲本黨全部最低限度黨綱之實現。

臨時革命政府是爲革命趕快得到勝利且即時壓倒反革命的鬥爭機關，而決不是求實現一般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之機關。

且這種勝利定將成爲一種專政，就是他必須要依靠武力，依靠武裝的羣衆和暴動，而不是依靠什麼別的機關——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而造成的機關。因爲要實現爲無產階級及農民一些急不容緩的要求，必定要引起地主與大資產階級以及專制政府之殘酷的反抗，只有用專政來對付，沒有專政便不能壓倒此種反抗與打破反革命之企圖」。

一九二七年七月之後，武漢政府亦變成專政的機關，但不是工農的革命專政，而由地主軍閥資本家的專政，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者之機會主義的政策，即是客觀上幫助這種反革命專政之實現的。

這裏連帶有一個問題必須加以簡單的說明，這就是托洛斯基取消派主張在武漢時期（一九二七年五月）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問題。托洛斯基這一主張，是從他整個路線之下得出來的結論。他認爲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武漢的國民黨政權就是反革命的政權，所以應當建立蘇維埃的政權來推翻國民黨的政權。共

產國際的路線是認為國民黨是民族革命的各階級聯盟的特殊組織，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的叛變，是反映資產階級的離開革命，武漢國民黨便是代表着革命的新的階級結合——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所以當時武漢國民黨是革命的組織，武漢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前）是革命的政府，因為國民黨是一種民族革命的各階級聯盟的特殊組織，所以他的階級內容可以隨着客觀的階級關係的轉變而轉變。因此在武漢時期共產黨的政策，應該號召廣大的工農羣衆加入國民黨，使他成爲一種羣衆的組織，同時極力擴大國民黨的民主化，實行羣衆的民主選舉，漸次推翻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以至把他開除出國民黨，使國民黨政權轉變成爲工農政權，使工農民權獨裁在國民黨這一特殊組織的形式之內表現出來。這就是革命政權內部轉變的策略。如果革命已經向更高的階段發展，預備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當然毫無疑義要建立蘇維埃以代替國民黨政權，所以應當極力擴大並鞏固工會農會的組織以準備蘇維埃的基礎。在理論上如果說托洛斯基主張在武漢時期（一九二七年五月）建立蘇維埃是對的，那末便應首先退出國民黨，若一方面留在國民黨之內，同時又建立蘇維埃去推翻國民黨政權，便是不能解答的矛盾。在當時事實上，運用革命政權內部轉變的策略來建立工農政權比較用蘇維埃來推翻武漢國民黨政權的策略更便利得多，所以托洛斯基取消派的主張是錯誤的。

六 中國共產黨與革命武裝問題

關於革命武裝問題，則過去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一問題的態度，亦是完全錯誤的。有一個俄國同志所做的一本『武裝暴動』小冊子上，曾經簡單的恰切的論到這一問題，現在節錄如下：

『說到共產國際支部對於軍隊中工作之缺點，在裏應該簡單的論到中國共產黨之錯誤，當與國民黨合作的時候（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前），中國共產黨有非常順利的條件，可以國民革命軍中進行政治工作，使兵士羣衆革命化。但是中國共產黨，正確的說，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二七年八月會議以前之黨的指導機關），因爲他對於中國革命中之最基本問題採取的是投降的雙料的機會主義的政策，所以對於在國民革命軍中奪取兵士羣衆的革命工作也完全沒有進行。試看一九二五年廣東軍事委員會關於在國民黨軍隊中之工作大綱會怎樣說：『我們在革命軍中的工作，不在於破壞國民黨的軍隊而在於鞏固國民革命軍而保持其統一。我們不應當在軍隊中進行我們的觀點與國民黨的觀點不同的政治宣傳而引起軍隊的破裂』。這一段對國民革命軍之關係的論調，可以看作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時期自始至終的政策的一覽表，牠完全與中國共產黨在八七會議前之一個著名的領袖陳獨秀的

觀點相符合。陳獨秀說：「先要擴大革命，然後再深入。」就是說在擴大革命這沒有打倒北方軍閥（張作霖等）和佔領北京以前，土地革命的發展，與國民黨政策不符的工人階級之革命運動的發展，在軍隊中之革命的工作（爲的是不破壞他的一致及不損害他的戰鬥力起見）也是不容許的。這些事情僅只有在北伐成功以後才可以實行。因此共產黨僅只在軍隊中做了合法的工作，而拒絕在軍隊中組織秘密的黨的支部。因此國民黨叛變的時候，他很容易將共產黨員由軍隊中趕出去，而我們黨在軍隊中表示沒有一點組織上鞏固的影響，於是黨便失了軍隊。

當北伐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甚至完全沒有提出奪取革命軍中之軍官地位的問題，雖然在當時對於實現這種任務的條件是非常順利的。因此在國民革命軍中之共產黨員的軍官是很難以遇見的，有之則是幾個下級軍官班長排長連長，至於營長便非常之少了。一九二六年末命令葉挺當團長，與其說是共產黨自覺的工作之結果，不如說是乃是李濟琛當時的策略，但是事實上即是在葉挺這一團中，雖然這裏有很多的共產黨員，而實質上仍然是與其他軍閥的軍隊沒有甚麼區別。在這一團中既沒有驅逐反動的軍官，在兵士羣衆中也沒有進行政治工作，軍隊中也沒有政治機關。他的變動僅只是將這一團的領袖，用共產黨員代替了軍閥。在中國共產黨的整個指導時期中，未曾有一次提出將葉挺這一團擴充爲師，而在裏面設立政治工

作的問題。僅只是在南昌暴動不久以前，才將這一團擴充爲師。缺乏政治工作，沒有適當的政治口號，這是葉挺及賀龍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在汕頭失敗之基本原因中的一個。

在北伐時期中，黨員的數量雖然是很快的增長了，但是在軍隊中之共產黨員的數目仍然是很少的。如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初國民革命軍計有九萬四千人，其中的共產黨員僅只有一千二百人，其中有九百個是在留守廣東的軍隊裏。在一九二七年中，軍隊中之共產黨員的數目固然已經增加了不少，但是對於在軍隊中工作之指導是一點也沒有的，因爲根本就沒有指導軍隊中共產黨員的工作之中央機關。

在下層兵士羣衆中的政治工作幾乎完全沒有進行的（若在有些地方進行了的話，則完全是由當地軍隊中共產黨員自動去做的），雖然黨的領袖們有時也記得這一句漂亮話：必要鞏固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影響。兵士羣衆們往往不知道共產黨的存在，或是知道他的存在而不能看見他與國民黨的區別。黨的領袖們不注意軍隊中之真正的革命工作，盡量的去與軍閥將軍們做上層拉攏的技倆，目的在保持軍隊中的一致。高談其左派國民黨之真正原則。

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八七緊急會議（一九二七年）告同志書中還舉出了下列之事

「人人都知道武漢政府之中極大多數（少數共產黨員及黨所號召他們加入軍隊的工農除外）都是僱傭軍隊，和中國其他軍閥的軍隊是一樣的，人人都知道這些軍隊的將領大多數都是由地主和資產階級出身，他們暫時與革命相伴，不過是借此升官發財，共產黨的領導者應該了解對這種軍隊的關係，共產黨的路線應完全以兵士羣衆為標準，而不是以反動將領為標準，共產黨應當在兵士與下級軍官中發展廣大的工作，在軍隊中造成堅強的基礎以資反對那些反動的將領。」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觀點與行動却完全與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將領辦外交，只注重種種方式的軍事結合，實際上在兵士羣衆中沒有任何工作，也沒有想到要進行這種工作。雖然軍事問題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會（一九二七年五月）竟沒有討論牠。而中央軍委討論了三四個月的軍隊中工作的問題，也沒有結果。

可是和將領談話辦外交却有許多的時間，對於唐生智朱培德等類的反動派，中央那時的政策都是非常機會主義的，湖南政變及隨之而至的對工農羣衆的大屠殺，多是唐生智部下幹的，唐生智當然是與謀的，他到後來都正式與以合法的承認。

然而中央所決定湘贛事件的宣傳大綱之上說：「湖南政變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贊成湖南民權運動，並表示好意於被壓迫的農民」（六月十四日）。那時湖南的情

形已是很明顯的了。

湖南每一個工人，每一個農民，每一個共產黨員聽見了這種宣傳，豈不要冷笑？然而中央還不限於此種口頭上的宣傳，甚至於組織總示威反抗長沙的事件的時候，同時還在歡迎北伐凱旋的北伐將領，這樣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實，居然在武漢實現——難怪汪精衛說共產黨勾結軍人。

關於朱培德的事亦是如此，朱培德驅逐共產黨員及左派國民黨員出江西，我們自然要反對這種策略和他們的陰謀，然而中央始則等待猶豫，繼則決定，開始總的反對江西之變動，不提出朱培德的姓名，彷彿是說，朱培德總算爲人好些，如果他也離開我們，反動更要厲害，這樣說來，朱培德還不是江西反革命的領袖，而是我們的保鏢，所以應當對他要包涵些，黨的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這種對於軍隊的態度，也就使中國共產黨中央始終沒有認真想到武裝工農的問題，沒有想着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武裝。中央軍委對此完全沒有工作，也沒有提及一般共產黨員的軍事訓練——這實在是共產黨第一等重要的重要的責任，沒有提及有系統的集聚那散亂零碎的工農武裝隊伍，使以後成爲有組織的堅固力量時，便做發展革命的真實的擁護者，沒有想盡方法去取得武器以武裝

工農。中央那時認爲武裝工農是次要的問題，甚至於以爲武裝工農是有害於與國民黨軍隊領袖聯合的，所以根本不積極去做，到國民黨左派領袖已經由動搖而趨於反動，中央忽然「積極」起來，然而可惜是相反的積極，是積極自動解除武漢工人糾察隊和勞動童子團的武裝（一根短棍子也被解除）。「爲避免挑撥離間的衝突起見」，自動的解除武裝，這不是公開的取消主義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對於革命中這樣主要的問題，却採取了這樣的態度，這便是他對於中國革命一切根本問題之機會主義路線的直接結果。

七 黨的生活與對國際的關係問題

黨在組織上的機會主義也非常厲害。對於羣衆的懼怕，不信任羣衆的力量，在黨的問題上亦是如此，黨的指導機關中佔大多數的是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而不是產業工人同志。因此在階級鬥爭的緊急關頭，常常表現動搖以至於背叛革命利益。

共產黨中央完全受不着羣衆的監督，不提出黨的政策交一般黨員討論，黨內完全被一種家長制度支配着，陳獨秀便是施行這種家長制度的典型。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前，下級黨員羣衆可說從來沒有討論過黨的政策，一切問題只有黨的上層領袖決定，下級黨部只有絕對服從，根本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而且根本沒有黨內的民主與自我批評。

組織上另一個重要弱點便是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支部生活，支部成了僅僅是黨的命令傳達所和宣傳機關，很少健全的黨的生活，沒有支部生活便沒有黨內健全生活的基礎，也就沒有無產階級黨的基礎。

黨對青年團的工作沒有正確的指導，甚至不承認青年團工作有政治地位，當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間中國共產黨青年團曾經表示反對中國黨中央的錯誤政策而表示擁護共產國際路線，黨的中央竟因此不許青年團說話，陳獨秀則更拿出他那家長式的威風，隨便將青年團的意見書撕毀，不肯提出討論，恐怕青年團一說話就要妨礙黨中央自己機會主義的領導，同時青年團自己也做了許多錯誤，如工作不青年化，團的工作始終沒有深入青年工人羣衆中去等，黨也沒有給團以足夠的幫助和指導。

黨與羣衆的關係也是如此，黨辦工農會的傳統政策很深。自然在中國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對於廣大工農運動起過極偉大的領導作用。但是在一般工作中黨總是命令羣衆，而不是說服羣衆。黨在羣衆工作中總是使羣衆依靠政治勢力而不依靠羣衆自己的鬥爭力量。因此發生很壞的影響，革命鬥爭一失敗，羣衆便與組織脫離關係。黨內充滿着委派制度命令主義，却不知道如何取得羣衆組織羣衆，甚至用黨的組織去代替工會農會的作用，結果便走到取消工農會。

尤其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與共產國際的關係非常惡劣，陳獨秀這班英雄常

有一種奇怪的論調，就是說共產國際不懂中國實際情形，因此便造成種種口實，去拒絕共產國際的指示，或者只在口頭上接受，而實際對共產國際的指示怠工。事實上八七會議以前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很少對共產國際做工作報告，甚至為要維護他們自己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不惜破壞共產國際的紀律，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對黨員羣衆隱秘起來，實際上去做他們背叛革命利益的事業。

這種種非布爾塞維克的現象，經過共產國際的批評斥責與六次大會的鬥爭，總算克服了一些，但是他的傳治還很深鏽，有時僅在表面上受着一下打擊，而實際的勢力還在黨內潛伏着。遇着有一點機會便又抬頭起來，加之黨內無產階級基礎的薄弱，政治水平線的低下，黨內派別鬥爭的滋長，使黨在走向布爾塞維克的途程上常常受着嚴重的阻力，後來黨內發生反列甯主義反共產國際的立三路線與瞿秋白同志兩面三刀的政策，實際上都是這種歷史錯誤在一種新形勢之下的爆發，所以公開揭發大革命中黨內生活及對國際關係問題上，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實質，乃是幫助黨走向布爾塞維克化的一種重要工作。

八 反機會主義鬥爭與盲動主義

上面我已經在幾個中心問題上指明了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所做的機會主義錯誤，

中國共產黨中央過去這種機會主義，應當要說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究竟甚麼是過去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所做的機會主義的根源呢？是不是共產國際主張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初期可以有條件的和民族資產階級暫時妥協和聯盟這一路線根本便是機會主義的路線呢？這種問題本來在上面幾節中都已有事實的答覆，現在可以總起來再說幾句。

現在從托洛斯基反對派到中國機會主義者陳獨秀等（他們已經結合成為取消派，所以以下便簡稱他們為取消派），差不多一致都說：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應該加入國民黨，民族革命聯合戰線的策略乃是違反列寧主義的路線，而且說『是機會主義的根本來源』。因此他們共同的口號便是：『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的路線斷送了中國革命』。顯然是無恥的躲閃與卑劣的誣蔑。其實我們只要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教訓，詳細考察一下，馬上就可以瞭解共產國際列寧主義路線的正確與過去中國共產黨機會主義錯誤的內容。

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完全是依據列寧主義對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論。中國資產階級因為感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會積極的起來與帝國主義鬭爭，很明顯的有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作用，所以無產階級應該與資產階級暫時的協作，建立民族革命的聯合戰線，推進這一革命更有力的向前發展。同時無產階級在這一民族的聯合戰線中要力

爭革命的領導權，使這一革命不致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而半途失敗。中國國民黨原來就包含了各種複雜的成分，所以很有可能使他成爲民族革命的各階級的聯盟，所以共產黨應當加入進去，爭取國民黨的領導權，同時保存共產黨的獨立的活動，極力發展羣衆的組織與鬥爭，以監視資產階級的妥協與動搖。這樣可以使中國革命得到更快的發展，在客觀上便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很好的助力，同時中國無產階級的組織與鬥爭力量，在這一革命的過程中，也就可以很快的壯大起來，而漸次奪取并鞏固在這一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托洛斯基主義的路線，認爲資產階級對革命是妥協的，無產階級開始活動便應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決不應與之協作。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所以共產黨不應加入，而應該反對，就是根本不同意民族革命聯合戰線的策略，這是完全不瞭解應當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後備軍中奪取過來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後備軍這一重要的策略，中國革命歷史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這一觀點的錯誤了。托洛斯基表面上用列寧主義對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階段中的策略來反對列寧主義對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策略，這是已經錯誤的了！實際上還是用他的不斷革命的理論來反對列寧主義的路線，因爲他始終沒有注意到中國最嚴重的農民問題，同時還造出中國沒有封建剝削關係的奇怪論調來證明他之不要農民的觀點爲正確。

中國機會主義的路線，執行了共產國際「與資產階級暫時的協作，加入國民黨」的一點，但是根本不瞭解共產國際列寧主義的整個的路線。不只是不知道加入國民黨應當保存共產黨的獨立活動，並且主張一切工作都歸國民黨，甚至認為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不只是不知道無產階級應當毫不放鬆的對同盟者資產階級的動搖給以嚴重的批評，力爭革命的領導權，而且公開的主張對資產階級讓步，犧牲階級的利盡去服從民族的利益——這是十足的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當時有一種所謂左傾的意思，認為共產黨可以加入國民黨，但應保留工人羣衆不加入。他們的理論基礎一樣是二次革命論，一樣的不瞭解爭奪領導權的策略，所以不過是機會主義的另一方面的表現。所以共產國際的根本路線是無疑的正確的，而中國機會主義者開始執行的時候，便把它修改成爲孟塞維克的路線了。

事實是不容假借的。共產國際的路線，認為在實行聯合戰線的開始，便應一點不放鬆對於資產階級妥協動搖的批評，到了北伐的過程中，便應積極準備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因為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是決不可避免的事實。在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資產階級已成爲帝國主義的新工具，更應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極力深入土地革命，使廣大農民羣衆脫離資產階級影響，而與無產階級親密的合作，並且要儘可能的武裝工農羣衆以鞏固無產階級。應以堅決鬥爭的精神去領導他，對於他的動搖猶豫，也是要毫不讓步給以

批評與監督。因此應當把資產階級的份子不斷的排除出國民黨去，引進廣大的工農羣衆加入國民黨，使成爲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同時準備着進一步的排除動搖的上層小資產階級，而轉變到工農民權獨裁，繼續着便是建立蘇維埃政權形式以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實行革命政權內部轉變的策略。所以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擴大會議便提出了工農政權的口號，同時指示中國共產黨應當堅決深入土地革命，擴大國民黨的組織，參加武漢政府，極力武裝工農等。可是當時中國黨所執行的策略却恰恰與這一路綫相反。

中國共產黨過去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是一貫的孟塞維克的路綫，對於共產國際的指示完全怠工。在北伐的過程中固然沒有準備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且在蔣介石叛跡已露，上海的三次暴動，還是採取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在武漢時期不只是沒有積極去領導土地革命的深入，而且跟着小資產階級的尾巴，咒罵工農運動「過火」。不只是沒有積極去武裝工農，而且自動的解散工人糾察隊，禁止湖北農民的暴動來反抗馬夜事變的屠殺和叛變革命的將軍。對於引進廣大工農羣衆加入國民黨始終沒有執行，對於參加武漢政府則把國際的革命政策變成部長主義，勞工和農民兩部成立數月之久沒有進行絲毫的革命工作，反而成爲阻遏工農運動的官僚機關。中國共產黨這一路綫，很明顯的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完全相反，所以中國大革命主觀方面的錯誤，完全是中國黨

的機會主義違反了共產國際的路線，決不是共產國際根本路線的錯誤。

從以上各節所述，可知中國共產黨陷落到機會主義的泥坑是很深遠的。在討論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案的時候，中央內部雖然發生了爭論，瞿秋白同志不同意中央的解釋，尤其不同意中央對上海暴動的策略，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批評彭述之主義，批評當時的機會主義，的確是一個相當有力的攻擊。但是，一則因為瞿秋白同志自己當時對於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也還沒有弄清楚，例如秋白同志在『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小冊子中把中國革命性質解釋成『可見中國現時的革命，既是資產階級的，又不是資產階級的；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又的確是社會主義的』。對於土地革命問題雖然已經指出『中國革命的中樞是農民革命』，然而還沒有很認真很實際的指出無產階級應當堅決領導土地革命深入的路線；對於民族資產階級亦只說：『不僅反對買辦階級的壓迫搗亂政策，而還要反對資產階級的妥協軟化』。並沒有指出民族資產階級不可避免的叛變與我們積極準備羣衆力量以鎮壓資產階級叛變的路線，其實當時（秋白同志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跡已經表露。因此打擊機會主義的力量還不很大。二則瞿秋白同志這本小冊子在當時沒有能引起全黨同志嚴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會時也沒有熱烈的討論，於是黨的機會主義的危險，並沒有挽救過來。

本來一九二七年五月黨的五次大會以前，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已經很深，特別是在北伐戰爭中與上海三次暴動及四月滬粵事變中，黨的機會主義已經使革命受到很大的危害，然而五次大會上，雖然有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但是對於國際整個的路線仍舊非常模糊。反機會主義的陣線既然這樣軟弱，當然不能攻擊機會主義的要害，發動全黨同志的注意，無法使機會主義受嚴重的打擊。同時，當時國際代表羅易（現在他完全是右派的主張，共產國際已經將他開除黨籍了。）自然是站在共產國際的路綫上，可是他只注意鮑羅庭的右傾，而忽視了中國黨的機會主義。在他的演說中竟這樣說：『中國共產黨是從鬥爭中產生出來，決不會發生機會主義』。這不僅是當時調和傾向的思想，而且是極端錯誤的意見。於是軟弱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在五次大會上的影響，幾乎完全消滅了。自然在組織上更形成一種調和派的結果。

五次大會後的新中央，集合了黨內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但是機會主義派仍然是居於領導的地位，所謂反機會主義的份子，既然是十分軟弱，且不久都跟鮑羅庭的路綫跑了，就是五次會前號稱反對機會主義的秋白同志也是如此。的確武漢時期整個的共產黨中央都墮入機會主義的錯錯。時勢是日益嚴重起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機會主義却日益深沉下去。當時動搖與猶豫是黨的政治路綫。於是黨的指導，不只是成了羣衆的尾巴，而且是替資產階級服役，破壞革命的進展。

後來中國取消派陳獨秀等竟無恥的說：「共產國際機會主義路線斷送了中國革命」，其實當時（一九二七年五月）與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同時舉行的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擴大會議，不但根據七次擴大會一貫的路線，對於中國革命的形勢前途與策略都有更深刻的指出，不但對於當時一切嚴重的問題，都有正確的解答（參看上列各節所引共產國際八次擴大會對於中國革命決議案），而且指出了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和動搖，指出「大規模的說明中國共產黨內有上述的錯誤和動搖是必要的；不然則中國革命根本問題之中相當的動搖之危險更加高了」。其實如果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決議案在中國實際的鬥爭中發生了些微的影響，武漢的危機，都不是不可以挽救。然而中國共產黨當時的路線與國際指示不僅不符，而且完全相反，於是革命的危機固然更加高了！

豈但『更加高』而已，客觀革命形勢是迅雷閃電似的急轉，而黨還是動搖猶豫，結果，黨的機會主義的領導，遂使革命受到嚴重的失敗。尤其是黨受到莫大的打擊，政治上已經走到絕路，黨在羣衆中的威信幾乎完全喪失，組織上已經走到分崩離析的狀態，一般同志無所適從。許多動搖的分子如施存統之流，遂實行叛變，公開投降敵人。當時的形勢，黨真有暫時瓦解消滅的可能。共產國際爲挽救中國共產黨的滅亡，因此解散當時中央政治局，超過中國黨的組織，直接召集臨時緊急會議——這就是在黨的歷史上有極重大意義的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反機會主義鬥爭的新紀元。雖然八七會議本身還有很大的缺點：例如因為對土地革命問題認識的模糊，因此而有『沒收大中地主土地，對小地主則減租』的錯誤決定；對於國民黨左派關係問題也是一樣，（參看前面『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與『中國共產黨與土地革命』各節）可是，無論如何，八七會議始終有極重大的意義，當時共產黨簡直是在潰散的狀態之中，八七會議不過是建立新的布爾塞維克路線的第一步，沒有他——中國共產黨簡直是要『亡黨』的。八七會議改選五次大會的中央政治局，發出告全黨同志書，將機會主義的錯誤都明顯的無所隱藏的指摘批評出來，這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告同志書中指出當時反機會主義鬥爭的意義說：

『現在的形勢是反革命派屠殺工農羣衆，壓迫羣衆運動，搗亂工農團體；所以中央委員會首先要告訴你們的便是你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中國共產從羣衆運動裏發展成了偉大的力量，在革命鬥爭的時期，他的作用是絕對的偉大的，現在我們黨的作用更加重大了。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歷次決議案，都說黨的政策與黨的指導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過去中國革命的進程，大半與本黨政策有關係的。將來革命的命運在形勢變更之後，更加要靠我們黨的政策正確，要看我們黨對於形勢變更之

後的職任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最近決議指出我們黨的指導做了極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全黨積極的自己批評這些錯誤而糾正之。這些錯誤並不是指各個的偶然的錯誤而說的，而是說黨的指導執行了很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拋棄這一機會主義的方針，糾正過去的錯誤，那就不能正確的規定將來的工作，自然更不能進行革命的鬥爭，適當前艱巨責任。要糾正錯誤的方針，必須指明是怎樣錯誤的，應當要使每個黨員都得着過去的教訓，我們黨如果不糾正指導機關的錯誤，那就一步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進。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只有公開的批評這些錯誤，而且要使全黨黨員都參加這種批評。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怕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如果共產主義者不能無所畏懼無所忌諱的批評黨的錯誤疏忽和缺點，那麼，共產主義者也就完了，我們的黨公開承認并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我們深儒本黨的生命與力量決不致於怕披露和批評我們的疏忽和缺點，甚至於披露我們階級仇敵之前也無所怕。等共產黨的敵人幸災樂禍好了！讓他們去亂叫共產黨崩潰好了！這種攻擊是嚇不了我們的，我們勝過敵人的地方，正在於我們是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夠在自己錯誤經驗裏學習出來，絕無畏懼

的披露自己的錯誤並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

我們黨有這種偉大的力量，不但因為我們黨的階級性使然，而且因為有羣衆之奮鬥，無產階級及貧苦農民羣衆之奮鬥做保證——這些羣衆是我們黨的基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的決議案上說：「中國共產黨英勇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廣大黨員羣衆，艱苦犧牲的在社會下層工農城市貧民之中，實行真正革命的鬥爭」。我們黨的指導機關却有機會主義的錯誤，經常的動搖和猶豫在緊急關頭總是沒有堅決行動的決心，既有非共產主義的不革命的理论，還有更加不革命的行為，這些情形，不但絕對的與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相矛盾，並且和我們黨員羣衆工作相反。

譬如說：上海，廣東，湖南本黨普遍黨員羣衆都有過偉大的奮鬥，屢次光榮的總同盟罷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動——最後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勝利，這些都是光榮的歷史，不但在中國歷史上有無上的光榮，而且在世界革命運動史上也是如此。這一頁光榮的歷史，是上海共產黨——無產階級所寫的。

上海無產階級在共產黨員指導之下所表現出來的勇敢性，革命性，階級意識的堅決和政治意識的高度甚至於歐洲各國無產階級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國裏的工人革命運動，差不多都有了幾百年的歷史呢。中國共產黨可以以上海的共產黨羣衆自豪的了；上海工人在蔣介石屠殺之後，雖然受着聞所未聞的壓迫，許多最好的

指導者（如陳延年，趙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殺，一切運動都被壓迫到非常祕密的地位，然而仍舊繼續着鬥爭，表現不可摧殘的偉大力量。廣東的共產黨員領導了鐵路工人的暴動，以反抗李濟琛，領導農民羣衆的武裝暴動能夠在各地方繼續抗爭至兩月之久，真正像勇敢堅決犧牲的革命黨人，奮鬥到最後一滴一點的可能，這些共產黨員真正可以做革命形勢中工人階級的先鋒榜樣。湖南同志領導農民運動的鬥爭，亦是這樣光榮的中國歷史裏的一頁，農民協會實際上的政權，是共產黨員領導，而農民羣衆所創造的，自動沒收大地主，分配土地與鄉村貧民，解除豪紳團防的武裝，創立武裝的農民軍，嚴厲的鎮壓封建的反動份子，極偉大的農民運動的規模，而且會和國民黨下層羣衆結合革命的聯盟——而不是對機會主義聯盟——最後組織農民暴動，以反抗長沙的反動政權。（這次暴動如果不是中央黨部機關在緊急關頭採取可恥的讓步政策，無疑的是勝利的。）——這都是湖南共產黨員努力的成績。這是解決土革命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產黨員羣衆，亦是如此。黨員羣衆的行動真正是英勇澈底的革命鬥爭，這種鬥爭要忍受很大的犧牲，但是我們黨的羣衆沒有怕犧牲的。中國革命之中，他們的奮鬥，使得我們的黨取得偉大的光榮和信用。黨的羣衆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有他們的幫助，黨的指導機關之錯誤，無論如何大，都是很容易糾正的。固然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動搖猶豫沒有堅

決實行的能力，這對於中國民衆的革命鬥爭，和共產主義的運動大有損失；然而本黨有上海廣東湖南的經驗，決不因指導機關之錯誤而陷於敗亡。本黨一定有這個力量，保證今後有正確的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

八七會議，既然堅決批評了過去黨的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同時在政治上指出武漢失敗使革命受了一次打擊，但是革命因爲階級關係的新變動，必然向着新的階段——工農革命的階段發展。因此堅決的決定了新的策略，決定湘鄂贛粵四省秋收農民暴動計劃，並且決定了對於農民土地革命及職工運動的新路線。在組織上提出了澈底改造黨，引進工人同志參加指導機關，實現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口號。所以雖然八七會議本身還有缺點，然而他始終在政治上組織上都給了黨的新的生命，全黨同志在黨的新的精神與策略之下，重新興奮起來，把黨在瓦解崩潰的前面挽救過來，走上布爾塞維克的道路。同時黨的新口號深入羣衆之後，得了羣衆的擁護，使工農羣衆感覺到政治上找到了新的出路，而重新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堅決的鬥爭，把黨因機會主義喪失了的在羣衆中的威信，也相當的挽救過來。所以八七會議的確是黨的歷史的一大轉機，只有這一歷史轉變的落伍者陳獨秀們才會極力詆譏八七會議，一方面說他是盲動主義的開始，另一方面又說並沒有把機會主義根本糾正過來。

固然不錯，八七會議之後，各地黨部與團部都發生很多盲動主義的錯誤，些先便是

江蘇倒蔣時期的『暴動』問題，那時（一九二七年九月）寧漢妥協，蔣介石下野，上海政權在更迭反動人物之際，自然反動統治因為內部糾紛而混亂。江蘇省委便決定武裝奪取上海總工會舊會所（湖州會館），而稱之為『暴動』。這顯然不顧羣衆力量的冒險主義。當時國際代表便加以制止。其次便是順直『大暴動』的問題。那時（一九二七年十月）奉晉戰爭發生。『戰爭開始之時，北方局即決定在三特區，南口，京津，唐山，京東六處準備暴動，現在奉軍日潰，時機已迫，各級黨部應迅速準備』，『暴動軍事計劃——係以三特區和京東四縣為目的地，如天津唐山暴動不能持久時，則一直衝出三特區保持熱河北部與外蒙聯絡，如此則進可以戰，退可守』，『各級黨部於接此通告，便應火速進行暴動的組織和佈置，山東山西亦應於接此通告後準備動作，以資應策』（摘錄十月六日所通過的『北方局暴動計劃』），這顯然是玩弄暴動，而且北方局決定暴動的顯明目的，不是建立工農民衆的政權，而是想造成第二個五卅似的，以大暴動來發展工農會和黨的組織，及『建立我們的軍事勢力和根據地』。（見同上）這更加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暴動觀點了，何況當時主客觀條件都還沒有成熟，於是北方局的『暴動計劃』，便只好成爲歷史的諷刺料。第三，在十一月初江蘇宜興無錫的農民都暴動起來，於是又引起了上海暴動問題，以上海影響無錫的傾向在省委中發現出來，省委也認爲『暴動實實在在已經到來』（省委第八號通告）。於是發動上海暴動的特

別方法就來了：先用幾個武裝的紅色恐怖隊去一廠一廠的威嚇工人罷工，以爲等到如此弄成總罷工，暴動就可以起來而成功！這正是玩弄暴動的傾向。第四便是湖北暴動問題。上海問題是在甯漢戰爭之中，湖北問題也在寧漢戰爭之中。當時有人專看軍閥內部衝突，希冀他們內潰，不管羣衆如何，只想『趁火打劫』，主張武漢那時（一九二七十月），立即暴動，『即使組織一二月蘇維埃也是好的——就算暴動沒有相當勝利的希望』。湖北省委爲『避機會主義之嫌』起見，也就閉着眼睛下總同盟罷工令，下動員令。實際上羣衆的情形是還不能暴動。唐生智下野時，武漢許多黨員團員還在這『假暴動』之下露出臨陣逃脫的也有，慌張失措的也有，這都是機會主義弱點的暴露。但是，並不因此而『暴動命令』就不是盲動主義的。其他可以指出的盲動主義錯誤還有很多，這裏用不着一一舉明，總之，八七會議之後，盲動主義的錯誤確實是有的，這是無可辯難的確鑿的歷史事實。

然而我們決不能因爲有這些盲動主義的錯誤，就根本否認八七會議決定暴動政策的重大意義，當時（八七會議之後）提出『暴動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總方針，不只在政治的意義上針對着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適合羣衆的要求，而且在政治的形勢上，一般說來，武漢與南京政府都是在動搖崩潰的狀態中，工農鬥爭雖然受到新的打擊却在不斷的爆發，革命的浪潮高漲並未完全過去，所以提出號召羣衆武裝暴動

的口號，在總的路線上是很正確的。至於在每一個實際暴動當中而發生了策略上錯誤，或時期估量的不正確及發生或多或少的盲動都是事實，但並不能因此遂推翻這一總的路線。

因此在八七會議以後黨所組織的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雖然在每一個暴動的具體的策略上，都發生了或大或小的錯誤，並且都不是勝利的暴動，但在總的路線上是毫無疑問的正確的。

托陳取消派指斥這些暴動都是盲動，這是根據他們一貫的政治觀點出發得出來的結論。他們認為武漢的失敗，『已經是中國革命最後的失敗，已經是歷史的轉變時期，就是武漢失敗以後，資產階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勝利，已經開始了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定，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的時期，黨應當取消一切革命的口號而準備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合法運動』。自然要覺得這些暴動，在總的路線上都是盲動，八七會議的路線根本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這不過證明中國機會主義者與托洛斯基在這時候都已經開始走上取消主義的泥坑了。

廣州暴動是中國革命的先鋒隊——無產階級企圖挽救革命一次的英勇鬥爭，開始了中國蘇維埃革命階段，有它偉大的歷史意義。暴動的爆發，使全世界帝國主義與全國反動勢力，都震驚起來，馬上互相妥協聯合一致的來鎮壓暴動，同時在指導這暴動的主

觀方面，也犯了不少的錯誤，遂使暴動受到嚴重的失敗。（參看前面第四章第八節）

廣州暴動失敗以後，反動統治階級對工農羣衆的革命運動，尤其是共產黨加以極殘酷的壓迫，一切革命的羣衆組織——工會農會都被解散，許多革命的幹部與領袖尤其是共產黨員，遭受空前的大屠殺，革命勢力受到莫大的打擊。因此第一次革命的高潮隨着廣州暴動的失敗而完全過去。所以廣州暴動，的確劃分了中國革命歷史的時期：一方面在革命的階段上，開闢了中國工農蘇維埃的革命；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形勢上，結束了第一次的革命高潮。

革命的形勢轉變了，領導革命的黨，應該很迅速的抓住這一轉變，而提出新的策略，然後才能適合於領導革命的新任務。如果不能極靈敏的注意客觀的革命的轉變，而死守自己劃出來的環圈，那麼不成爲時代的落伍者，便要不可避免的脫離羣衆。暴動是『玩』不得的，沒有相當的前提就舉行暴動，決不是列甯主義的路綫。廣州暴動以後，黨的盲動主義的錯誤，沒有抓住革命形勢的轉變是最主要的原因。

廣州暴動的失敗，不可否認的革命勢力受到極嚴重的打擊。中國工農廣大的革命運動之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固然革命的根本矛盾一點也沒有解決，統治階級決不能穩定他的政權，革命是有新的高潮的必然趨勢。可是革命的主觀力量經過這樣的嚴重挫敗以後，決不是馬上可以恢復，而且統治階級在經濟政治上也沒有表現馬上就崩潰

破產，所以革命浪潮，決不能馬上高漲，尤其不是一直高漲。因此當時黨的策略路線，應該轉變到重新聚合力量，徵取羣衆，組織羣衆，以準備新的革命高潮，應該把武裝暴動的口號轉變爲宣傳的口號。當時指導機關，忽視這一革命形勢的轉變，只看到統治階級無法穩定的一點，而忽視革命隊伍在經過嚴重的壓迫以後的潰散疲困的狀態。不知道自己的隊伍在這零亂的狀態，就是敵人的力量異常削弱，仍舊是無法向敵人進攻，因此而誤認革命的形勢是『繼續高漲』，『一直高漲』，並使主觀的造出『在革命形勢的方面，也是無間斷的性質』的理論。在這樣的錯誤估量與忽視盲動主義危險的情形之下，自然在策略上無法轉變過來，而仍然機械的守着在革命高潮時『直接暴動』的策略。用這樣零亂薄弱的隊伍而去與強大的敵人作拚命的嘗試，甚至自己隊伍完全潰散了，而以少數幹部作毫無把握的孤注一擲的犧牲，這毫無問題的就是玩弄暴動的冒險主義了。

所以盲動主義發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於不認識革命的轉變，不承認革命的失敗而發生對革命形勢的錯誤估量，盲動主義的表現是脫離羣衆，不顧羣衆，而以少數的先鋒隊作拚命的犧牲。黨在這樣盲動策略之下，又受到了可怕的損失，如果繼續的是這樣發展下去，將不可避免的要使黨走到滅亡的道路。所以盲動主義與機會主義一樣的可以損害黨的生存的危險。幸而經過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的糾正與中國共產黨六次

大會堅決的鬥爭，已經開始轉變，中國共產黨遂又前進一步走上布爾塞維克的道路。六次大會以後，中國共產黨又開始了新的鬥爭——反機會主義，反托洛斯基主義及反對取消派調和派的鬥爭，然而敘述這種鬥爭的歷史已經不是本書的任務了！

九 結論——經驗與教訓

中國大革命雖然已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可是始終受了失敗，革命在這一歷史的階段裏，沒有充分的力量戰勝當前的許多困難。這些客觀的困難和原因之中，應當說到：（一）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的力量強大，（二）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聯合戰綫，（三）中國軍隊是僱傭軍隊，反動派有着數量上佔優勢的武力，（四）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五）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

然而這些客觀上的困難，並沒有完全決定中國大革命必然要失敗的力量。我們每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應當坦白的承認：中國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當時無產階級先鋒的共產黨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政策。當大革命危急存亡的關頭，離開布爾塞維克路線的機會主義政策，客觀上簡直是背叛正在鬥爭的勞動羣衆的利益。「機會主義是傳播資產階級影響於工人階級，并傳播社會民主黨傾向於共產主義運動之一種間諜」。這種機會主義的政策，最先便是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違反共產國際列寧主義

的指示，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及聯合戰線的任務有不正確的觀念，不能保持共產黨自己的獨立性，對於革命同盟都不能實行階級批評，不去動員革命力量，以求戰勝自己暫時的同盟者之反動的企圖；有時候反而去阻止羣衆運動的發展，以遷就自己對於聯合戰線的不正確的觀點。當時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不去發展土地革命和工人羣衆的階級鬥爭，却祇做上層勾結工夫，隱蔽階級的矛盾，不去征取兵士羣衆，不去武裝工農，不能利用參加政權機關的機會，去爲羣衆謀利益；再則，當時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不了解從一階段到另一階段，從一個政治和策略到另一個政治和策略的轉變，所以在緊急關頭不能打破敵人的包圍，不能事先準備反攻的力量，俾能在一個過渡的階段上取得勝利，而反被敵人包圍，常常受到敵人『出其不意』的攻擊。實際上中國共產黨過去指導機關不但沒有堅決的爭取革命領導權，反而自己斷送無產階級領導權。這樣，中國共產黨當時指導機關這種機會主義政策，就使中國大革命受着不可避免的失敗。

這種嚴重的錯誤不但對於中國革命階級與共產黨是直接的教訓，而且對於共產國際其他支部尤其是對於各殖民地的黨都是很寶貴的經驗。革命教訓這樣迅速這樣徹底，自然不是尋常政治生活中所能感得到的，尤其主要的是這個革命的教訓，不僅教訓了領袖，而且亦教訓了羣衆。中國大革命確實授與社會階級以真正的洗禮。然而我們中國共產黨可憐的遭際却不曾很深刻的吸收過去的經驗，甚至許多做領導工作的同志也

不會好好的去省察自己的錯誤，總不肯在實際鬥爭中去學習，去確實改正自己的錯誤，因此往往有許多歷史錯誤竟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出來。譬如說立三路線與瞿秋白等人兩面三刀的策略，現在大家都明白它們是可以危害革命的，但是我們如果探究一下他們的歷史根源，那我們立刻可以明白，他們的錯誤的大部分顯然就是在六次大會前形成而到現在黨內還沒有肅清的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在一種新形勢之下的復演和補充，他們不能正確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與現在階段的任務，而用托洛斯基否認中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階段的觀點，來代替列甯主義對於革命轉變的理論；他們不了解共產黨是革命組織者的作用和無產階級先鋒與工農羣衆之間應當有的關係，實際上去重演過去大革命中取消工農羣衆組織取消青年團的錯誤；他們曲解而且實際上拒絕馬克思列甯主義對於武裝暴動的理論，使共產黨脫離羣衆；他們承受過去大革命中共產黨內家長制度的遺產，更巧妙的破壞列甯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他們而且用了共產主義『左』右叛徒所用過而已經被打碎的理論，竟不惜師承過去大革命斷送中國革命的機會主義者陳獨秀的啟智！居然說共產國際不懂得中國實際情形，共產國際不能領導中國革命，以達他們藐視布爾塞維克的詭計。對於他們，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竟完全是空過的了。

現在這種情形絕對不容許再繼續下去了，每一個真正革命的同志，都應該極深刻的

警醒起來，認真的起來執行自我批評的任務，要認真的去研究并吸收過去的革命經驗與教訓，自然這種工作不是與目前實際鬥爭分離的，相反的，我們要使這種工作與目前實際鬥爭切實聯系起來，同時這種研究應該處處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原則和革命的教訓爲立場，而不應只認識一些孤零的事實，祇有這樣我們才能積聚并運用自己的政治資本，以達到新的革命的勝利。

(續完)

(附註)：這篇文章只有第七與第九兩節於最近抽出在此發表時加了一些修正，其餘各節都完全是一年前所寫的原稿，同時因爲本文只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一書中的一部分，故本文的結論與全書的結論微有不同，該書現已設法付印，大概不久即可出版。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崗註——

氏年

氏年

布爾塞維克

第四卷 第五期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出版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目次

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決議

反帝大同盟執行委員會決議案

中國革命轉變的前途及任務

論陳獨秀主義

反列寧主義的布哈林

華崗

和森

少林

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

次全會總結的決議

聽了張彪同志關於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報告之後，中央委員會完全一致同意第十一次全會的決議，並責成中央及各級黨部以布爾塞維克的堅定性和不折不扣性來實現共產國際的決議到實際工作中去。

A、深刻的世界經濟危機。蘇聯的發展，與許多國家內革命危機的成熟：

(一)自從一九三一年年初一直到現在，世界經濟的恐慌，還是在繼續加深與擴大。而在蘇聯，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了很大的成功。此種形勢正如國際執委第十一次擴大會所說的『資本主義的穩定已經走到了末路。而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奠定正在完成』(全會決議)深刻的兩個世界的對立是目前國際情勢中最基本的因子。這個對立加緊了資本主義內部的一切矛盾與衝突。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衝突，日益緊張。中國，印度，安南的偉大的反帝國主義革命高漲空前的勃發；帝國主義列強間的衝突和紛爭與楊格計劃的破產，同樣的在繼續增長，雖然這些矛

屑不能夠減輕反而只有增加他們對於蘇聯的共同的敵視和反蘇聯的反革命鬥爭的準備。

在深刻的世界經濟危機的基礎上，由於工人階級生活條件的惡化，驚人的失業，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農貧農的破產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革命化的作用。世界革命運動比之一九三〇年二月國際執委主席團擴大會有更進的發展，這主要的表現在：

a 蘇聯已經奠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b 中國創立了蘇維埃政權與紅軍，他在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血的鬥爭中逐漸鞏固與壯大起來；

c 在西班牙工人和農民推翻了巴爾龐的專制政府，正在爲着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

d 在印度，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已離開了並反對着甘地主義而與英帝國主義與印度的地主資產階級作英勇的鬥爭；其他殖民地革命的增長；

e 在德國與波蘭工人階級的鬥爭極端的緊張，走向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底成熟，

f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階級鬥爭和失業運動之更加深刻化；農民運動之崛起與發展，

g 主要各國的共產黨政治與組織影響之擴張；

但是「依照各國危機進展的程度和速度，資本主義內外的衝突的緊張的程度和速度，各個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革命高漲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這次經濟恐慌和戰後資本主

義總的危機因特殊條件密切錯綜的國家中（如德國波蘭）。已經走向革命危機先決條件的成熟。目前，因於經濟危機的深刻化，在西班牙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是很快的在增長，那裏因為封建勢力殘餘的強大，這一過程特別來得深刻。『在許多大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國印度——由於經濟危機與農業危機的交錯，帝國主義與封建高利貸的剝削及羣衆的大量破產，千百萬的羣衆起來作民族的革命爭鬥反對整個的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制度，革命危機的因素是很快在成熟』。（全會決議）

（二）在目前的階段上由於經濟危機的深入與革命運動的更進的高漲，資產階級日趨於公開的法西斯蒂的專政。他們按一連二的公佈緊急法令，禁止工人羣衆的集會遊行和最低限度的『人權與自由』，逼迫工人階級的組織走向地底下去，組織不滿的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和流氓份子爲法西斯蒂的武裝團體以進行革命工人及共產黨員的屠殺；但是必須清楚的了解，民主主義和法西斯蒂僅不過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兩種形式；由掩蔽的財政資本的寡頭專政到公開的法西斯的專政的轉換，絲毫地沒有更換其階級的實質。有時，更可以不變動民主形式的表面，而實行極端法西斯蒂政策。（如白魯賓政府）並且亦不能認爲法西斯蒂的形式已成爲目前資產階級統治的惟一形式。

世界經濟恐慌更加明白的揭露了國際社會民主黨社會法西斯蒂面目，他的作用是鞏固資產階級專政的主要的扶持者，他不僅替公開的法西斯蒂專政開路清道，而且一切的

資產階級進攻工人的步驟都假手於社會民主黨而實現。他們間接和直接的幫助資產階級減少工資，增加工作時間，削減社會保險費，增加稅捐，實行資本主義合理化，破壞罷工，壓迫殖民地革命運動與屠殺本國的革命工人。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的米勒政府壓迫柏林的五一示威，解散『赤色戰士隊』，頒佈『保護共和國法』鎮壓罷工，而為法西斯蒂專政的白魯甯政府開路。在失去政權之後，並極力擁護白魯甯政府的一切法西斯蒂的進攻工人的步驟。麥克唐納爾因為鎮壓印度革命的勞績，而受到英國資產階級的一致喝采，最後，他更是反蘇聯戰爭中資產階級的一枝尖兵。他們在全世界上為資產階級進攻蘇聯的戰爭的政治的輿論的準備，在蘇聯他們與實業黨及少數黨手攜手去進行反革命的破壞工作以為帝國主義反革命干涉的內應。

(三) 兩個世界的對立不能不引導到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積極準備。目前反革命的蘇聯戰爭對於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是直接的威脅。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順利的執行，使資產階級失了其使蘇聯走上資本主義後辟道上的最後的幻想；更加上經濟恐慌的劇烈，使他們不得不以侵奪世界上六分之一的蘇聯為危機的出路，使世界資產階級不斷的採用武裝進攻和經濟封鎖的政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的增加，蘇聯邊境各國的軍士準備的完成，美國的糧食準備，……一切一切都說明反蘇聯戰爭，已經近在眉睫。目前的事變，更加證明這種估計的正確，胡佛提議的

其實意義，除了企圖挽救德國的革命危機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團結資本主義的國家在美國的領導之下，進行反蘇聯的戰爭。萬寶山事件日本的武士道曾公開的宣稱這是對俄必先對華政策之先聲，而且毫不隱蔽的說，蘇聯五年計劃的成功第二次日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同樣，帝國主義內部的爭鬪，英美爭取世界霸權法意，英法，德法，美日等等等的衝突與矛盾亦日趨緊張，以戰爭來重新分配世界，以挽救資本主義之危機已經變成了各帝國主義列強政府的唯一出路。

B、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危機與工農民主專政的發展。

(一)由於半殖民地的地位與廣大的封建殘餘的存在；世界的經濟危機，推動中國的國民經濟走到完全潰滅的地步。經濟危機與農業的危機密切的錯綜在一起。在一時期中已經處在長期的停滯與恐慌狀態中的民族工業（絲，紗，烟等）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之下，形成了大批的倒閉與非民族化。民族資本在重工業中的地位，更是逐漸減少，成爲外國帝國主義的完全的統治。交通運輸方面，鐵路因爲軍閥戰爭的原因而破壞不堪；海運則非但外洋船完全在帝國主義者的掌握之中，而且內河船亦不能與外洋船競爭而宣告停班（長江上遊）。另一方面正因爲世界經濟的危機，帝國主義者更加緊迫地加緊在華投資。（從今年二月到六月各帝國主義者在華設立的新工廠約七八

百所資本達一萬萬五千萬元）在帝國主義地主高利貸的重重剝削下的農村經濟，正處在空前的浩劫的地步。在原料供給的市場上，中國除了特產品（大豆桐油等）外，幾乎完全地被排擠。因為帝國主義和地主的非人的剝削和長期軍閥戰爭的結果，毀滅了一切灌溉的設備而喪失千百萬農民的生命，成爲經常的現象。去年的西北的大旱及今年普遍十六行省的水災，接着地震撼着世界的聽聞。帝國主義者及國民黨官僚們（華洋義賑會賑務委員會等）更藉賑災的名目來進行搜括，高利貸和奴役農民（工賑，貸賑，急賑）。工業的破產與非民族化，帝國主義侵掠的深入，與農村經濟的空前浩劫，這就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圖畫。空前的羣衆失業，工人生活水平線的低降，資本的進攻，農民的破產與餓死，災荒，戰禍，這就是國民黨統治所必然造成的而且已經造成的結果。

（二）世界經濟危機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影響，引起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根本矛盾更進一步的緊張。羣衆生活的惡化到餓死的水平線上不能不引導到一方面革命運動的繼續增高，在幾千萬人口的區域的蘇聯政權與紅軍的建立，革命危機在全國範圍內的日漸成熟，另一方面，反動統治以全力保全自己的政權，動員一切力量進攻蘇區與嚴厲地厲行白色恐怖。同時，他們更加積極地進行武斷與欺騙的宣傳。在土地革命中湧現出來的蘇維埃政權和紅軍，是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中實現

自己的領導權的條件，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政權的形式中實現和加強起來。蘇維埃和紅軍的建立，使中國的階級鬥爭走到了最高的形式——國內戰爭的形式。在國內戰爭中，紅軍正在奪取敵人的武裝而武裝自己。蘇維埃政權亦正在與蔣介石，內部的敵人（A B團等），及自己的錯誤（立三路線）奮鬥中獲得了工農民主專政的初步的豐富經驗。千百萬的暴動起來的中農和貧農，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是不可戰勝的力量。

不論紅軍怎樣槍械缺乏和陋敗，不論作戰條件怎樣困難，而第一第二次的圍剿的衝破給了帝國主義者蔣介石陳獨秀羅章龍及黨內的灰心失望的機會主義份子以一個良好的教訓。第三次的圍剿，蔣介石『游擊親征』的結果，在江西線上，除了紅軍為作戰的必要而縮短戰線之外，蔣介石沒有任何的進步，而左翼的朱毛（是蔣介石的兩個將軍，（朱紹良毛炳文）不是紅軍的領袖！）的覆滅，陳誠的潰敗是國民黨的檢查員和帝國主義的報紙所不能隱蔽的事實，在鄂豫皖，湘鄂邊線上，紅軍的發展已屢屢的引起國民黨和帝國主義者的驚懼。英勇的工農紅軍的戰績，在中國的革命史已經寫下了光榮的一頁。

『今後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更進的發展，是依據在蘇維埃和紅軍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之上』。

（三）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和封建的割據，中國革命運動的特點，便是發展的不平衡，雖然，全國革命危機一般的成熟起來，但是他的程

度•和•速•度•是•不•一•樣•的•。一方面存在着蘇維埃政權，工農民主專政，另一方面在更大的地域上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還維持着自己的兇燄。前者正在發展與壯大而後者則日趨崩潰。帝國主義列強的在華的矛盾與衝突，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國各地地主資產階級的集團間的鬥爭，說明了爲什麼在對於工農民主專政一致的威脅之前，統治階級內部的紛爭與分裂的產生的真實原因。南京和廣東的分裂，北方的軍閥戰爭——反映着國際帝國主義的爭鬥，反映着英美日爭取中國的鬥爭；另一方面，他更是中國統治階級間爲着怎樣能夠更好的挽救自己的統治與消滅蘇區與紅軍的爭鬥。這種分裂和戰爭的本身，便是國民黨統治嚴重的政治危機和更進一步的崩潰的表現。這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是日趨緊張，不過他們內部矛盾的增長不但不能減弱而且只有增加他們與蘇維埃運動的不可調和的衝突。產生軍閥混戰的社會條件與社會基礎沒有被工農革命的浪潮所推倒以前，軍閥戰爭的重演與擴大將永遠地威脅着中國的勞苦羣衆，祇有工農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才能夠消滅軍閥戰爭與從完全的殖民地化與經濟浩劫中挽救中國。

（四）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侵略的加緊，國民黨更進一步的屈服與投降帝國主義，經濟的恐慌和災荒，資本的進攻，羣衆的失業，生活水平線的低落與飢餓，及蘇維埃運動的影響，引導到反動統治區域內的革命更進一步的高漲，這主要的表現在：

a 反帝國主義運動新的怒潮；在工人貧農苦力激烈的反帝情緒面前，上海買辦階級的反日援僑會，只不過是一幅可恥的滑稽畫，這些分子的企圖便是『領導』反帝國主義運動使反帝國主義運動，失去其真正的領導；

b 工人罷工爭鬥的更加緊張化，爭鬥更明顯地暴露其反攻的以及政治的性質；

c 兵變潮流的高漲；

d 農民運動的繼續不斷的爆發；因為水災的關係，在今年秋收爭鬥，黨將處在空前的廣大的農民騷動面前；

e 城市小資產階級對於南京政府的反對態度的增長；

客觀條件對於黨的工作是最順利的。全國的革命風暴漸漸接近了，革命爆發的鎖鑰是在我們黨的手裏，只有黨的積極性的活躍，才能決定革命大爆發的程度和速度。

C、黨的工作的條件與目前的緊急任務。

(一) 在四中全會時，以及四中全會以前；共產國際曾經正確的指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放着下面的三位一體的中心任務：

a 創立有工作能力的得到羣衆擁護的蘇維埃政府，來組織與領導蘇區與非蘇區的革命運動；

b 創立強有力的工農成份的政治上絕對是在黨的指導之下的紅軍及鞏固紅軍的根據地。

c 開展工人階級的部份的日常的經濟鬥爭，引導他們到總的政治爭鬥上去；加倍對於反帝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領導；

這些任務中央認為在今天還是中國黨的中心之迫切任務。

(二) 在共產國際直接的幫助之下，四中全會堅決地責譴政治局過去的錯誤路線，指斥了三中全會的調和態度，斷然地肯定，立三路線為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半托洛斯基主義的路線；指斥了當時政治局的某幾個同志的對於共產國際的虛偽和兩面派的态度，更新了黨的領導的成份，毫無二語地同意並堅決的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中國革命中惟一的正確路線。半年來黨在工作的過程中，在執行國際路線的過程中，黨得到了下面的成績：

a 對於蘇區領導的加緊，造成了蘇維埃和紅軍的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黨和蘇維埃政策的真實的轉變，澈底的平民式的重新分配土地，因而大大的提高羣衆的鬥爭的積極性；在創立真正良好的鐵的紅軍的工作上，得到了初步的成功；蘇維埃機關的改造，混入蘇維埃機關的富農和階級敵人的肅清。所有這些工作的結果，使我們在蘇區中的力量，更加鞏固。

b 正確的政治領導與兩條戰線上的堅決鬥爭；使右傾機會主義的小團體（羅章龍派）完全地破產；並解除了立三主義的武裝。思想上的鬥爭與某些組織的結論，一方面，保證了一部份被右傾機會主義所欺騙或立三主義者的「左」傾辭句所玄惑的工人同志，回到黨的路線上來，另一方面，黨的和職工會的指導機關中右傾機會主義者與李立三主義者的肅清。這樣使黨有在思想上的布爾塞維克的一致與組織上之穩固。在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道路上，竟成了重要的一步。

c 開始了真實的艱苦的布爾塞維克的羣衆工作與廠內活動，恢復了青年團和工會的組織與加強了他們的領導；提拔了一部份新的幹部作領導工作；改變了李立三時代以及陳獨秀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家長制度委派制度的惡毒的遺傳，開始向布爾塞維克的作風轉換。

(三) 但是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鄭重地指出：在這個時期的工作中的許多嚴重的缺點和弱點。這主要的表現在：

a 第十一次全會所指出的：「落在羣衆的積極化之後」，「落後於許多重要的革命運動，失業運動，罷工，與農民運動之後」。『忽略了保護工人羣衆的日常要求，基礎上動員羣衆爲這些要求而爭鬥，將這些爭鬥與爲無產階級專政的爭鬥聯繫起來』。對於中國黨同樣是正確的。不論在蘇區與非蘇區之中，黨還不能善於

利用和組織羣衆的積極性。在反動區域中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依然沒有重大的成功。許多黨部不善於依據工人羣衆的日常要求而動員，而組織他們的鬥爭。在黃色工會中的工作，至今沒有什麼成績。沒有學會把部分的與一般的要求聯繫起來，與下層統一戰線策略的運用。許多自發鬥爭沒有能夠抓住與領導；對於罷工鬥爭的準備常常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對於失業運動的消極是極端不能容許的現象。

b 第十一次全會所指出的：『反對戰爭危險的鬥爭和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的鬥爭，其程度並不能到處趕得上帝國主義準備反蘇聯戰爭的程度。反戰爭危險的鼓動，進行得沒有系統，有些地方只是一起一伏的。』這個指示，對於中國黨亦不是例外。中央嚴重的指出：這時期對於反對進攻蘇聯的工作非但趕不及國民黨軍閥進攻蘇聯的準備而且有些黨部是忽視了這個任務。特別是審判孟塞維克及實業黨的材料沒有充分地利用向工人羣衆作廣大的鼓動。

c 同樣，對於擁護紅軍和蘇維埃區域的工作亦是做得非常的不充分。關於動員到紅軍中去的工作各地黨部都沒有達到預定計劃。甚至將動員工人到紅軍中去的工作，曲解為招募。

d 關於士兵中的工作的積極性亦是非常的不夠，中央的二月決議仍然還是紙上的空文；

e 對於反動區域內的農民工作還是表現有機會主義的消極性；

f 還沒有學會布爾塞維克的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聯系，及地下黨與羣衆的聯系，以少數的黨的幹部領導廣大的羣衆爭鬥；

g 許多黨部還沒有學會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與工作檢查；許多「漂亮」的決議，依然成爲紙上空文；與下級黨部的活的領導與聯系，還依舊是不夠；新的幹部的培養與提拔實現得非常遲緩。

h 因爲黨的組織還沒有能夠深入羣衆，因爲多數黨員，還沒有了解地下黨遵守秘密工作原則的重要，以致黨的組織與黨的幹部受到了很大的破壞與肉體的摧殘。

i 對於一切反動派別的鬥爭還不夠，未能及時深刻揭穿一切反動武斷的宣傳，（如對於改組派，人權派，第三黨，取消派等）因此這種宣傳時常或多或少的影響到一部分黨員羣衆。

j 黨還沒有能夠很具體的教育黨員羣衆怎樣在實際工作中去實行正確的政治路線。

（四）爲着利用良好而順利的客觀環境來爭取工農民主專政在全中國的勝利，爲着執行中國革命及共產國際在黨面前提出來的三位一體的任務。中國共產黨必須動員一切力量，來執行和完成下面的具體的迫切的工作：

a 最大限度的鞏固和發展蘇維埃區域。正確地執行一切黨和蘇維埃的法令，澈底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組織和利用羣衆的積極性爲蘇維埃運動的勝利而戰。採取一切必要的方法以堅強紅軍和在最短的時間內創立蘇維埃中央政府。

b 爲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反蘇聯的武裝干涉而戰。揭破國民黨和帝國主義一切反蘇聯戰爭的準備；真實地動員羣衆爲擁護蘇維埃紅軍，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武裝進攻而戰。加緊反對軍閥戰爭。動員重要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到紅軍中去。

廣大的普遍的創立『蘇聯之友』『紅軍之友』等等組織。擴大在反動區域的工農羣衆中蘇維埃政權的思想及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經驗的宣傳。

c 真實地動員羣衆爲反對資本的進攻而爭鬥；小心地周密地準備每一個工人階級的戰鬥；迅速地使職工會的工作有布爾塞維克的轉變，廣大地發展赤色工會的會員；真正地開始黃色工會中的工作；以奪取工人階級中的最大多數。

d 加緊對於目前正在劇烈開展中的反帝國主義的領導；組織與引導羣衆的反帝情緒的高漲到革命爭鬥的道路上；揭破一切資產階級及改良主義者的假的反帝國主義把戲，這種把戲的真實意義祇是在阻礙勞苦羣衆的民族的與階級自覺。爲着完成上面的任務必須特別地注意公開可能的利用。

e 各方面的努力的準備對於那必然要來到的今年秋收爭鬥的領導。蘇維埃運動與災

荒影響之下的農民鬥爭，假如我們有真實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則這些爭鬥將無疑的轉變為土地革命；同樣反動軍隊中的士兵工作在目前國內戰爭的環境中有特別的意義，應該加十倍地努力進行。

f 集中力量在大工廠內創立我們的支部；培養與提拔新的工人幹部；廣大地發展黨的組織。

g 根據目前的環境，各地黨部要特別注意從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的組織，嚴密黨的組織，堅決地克服黨內個別的叛變現象，澈底肅清機關主義和一切脫離羣衆工作的以及僱傭勞動的工作方式，消滅對於祕密工作一切忽視，務使今後工作能夠經常的進行。用羣衆的力量來衝破一切白色恐怖與壓迫。

(五) 爲着上面所指出一切的任務的完成：黨必須在兩條戰線的爭鬥上克服一切離開黨的總路線傾向。黨內主要危險，依然還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灰心，失望，消沉。

在中國的特殊的條件內，右傾機會主義緊接着公開叛背革命，同時他們更其採用了最可恥最懦怯的機會主義的兩面派的態度。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同時絲毫地不能放鬆「左」傾的李立三路線的殘留，這些殘留或多或少在各地黨的工作中表現出來。

爲着這些緊急任務的執行，要求全黨同志堅決的起來，對於黨的工作實行澈底的檢閱，在檢閱中盡量發展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評，發展下層黨員羣

衆的積極性，消滅一切國民黨時代瞿秋白李立三時代機會主義的殘餘，創造布爾塞維克的工作方法與作用，以完成歷史放在我們黨前面的中心任務！

通知：

因爲地下黨的工作條件與最近的損失與打擊，使中央直到目前纔能夠詳細的討論國際執委的決議。這種遲緩是黨工作上的極大損失。各級黨部接到此項決議與國際決議後，即應廣大地舉行討論。討論時必須將國際及中央決議更加具體地運用到各該地方。并將結果報告中央。國際決議與本決議應盡量在黨報上翻印。

中央

反帝大同盟執行委員會決議案

一切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的枷鎖之下求解放的鬥爭力量和範圍都增長了。在中國，在中國的百萬農民由無產階級指導着建立他們的軍隊，向反革命的國民黨的和帝國主義者的軍隊作英勇的戰爭。中國工農的爲民族獨立，爲土地，爲工農政權而作的英勇鬥爭給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殖民地民族指示出來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勝利之路。

在印度的羣衆們開始了很快地認識，從英國枷鎖下的解放是不能由消極無武力抵抗的叛賣政策的道路，不能由和敵人締條約的道路達到的。工人階級開始了使用羣衆大的罷工的武器，開始了懂得應該與廣大的被剝削的農民羣衆密切聯合建立反對英帝國主義的萬萬人的戰線。革命的青年和智識份子中已表現出來經常增加着對甘地主義與同一「左派」社會改良主義的厭惡，而傾向於真正革命的反對英帝國主義。

被壓迫的安南羣衆以無比的力量反對法帝國主義的殘酷白色恐怖而踏上了偉大的反帝國主義戰線的前行。

在埃及，帕勒斯丁納，摩洛哥，敘利亞與愛吉爾，在一切亞刺伯國家中反帝鬥爭的浪潮愈漸高揚。意大利法西斯主義雖則把得里波里斯（Tripoli）的亞刺伯人成萬地屠殺了，然而暴動者的鬥爭決心他並不能挫折下去。西屬摩洛哥的民衆的革命暴動與其

被西班牙共和黨和社會黨的臨時政府所擊敗不過表示這一亞刺伯區域的鬥爭在開場。

殖民地勞動羣衆在極端的鎮壓之下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決死的戰鬥。台灣的上番反對日本的壓迫者而暴動了。菲律賓的工人在革命政黨的領導之下走向團結，來從美帝國主義枷鎖下作解放鬥爭。荷屬南洋羣島的自由戰士儘管成千地被流放了而反對荷蘭帝國主義，民族解放的游行示威的消息仍不斷地傳來。

在非洲，馬達加斯加兒，坎亞（Kenya）剛比亞（Gambia）瓜得羅浦（Guadeloupe）洪都拉斯（Honduras）與聖多明果（San Domingo），在法屬與比屬剛果和在尼格拉（Nigeria）黑人羣衆走上了反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的道路。特別是在非洲的運動已達到了黑種和白種工人的有覺悟的階級鬥爭的階段（失業工人遊行，五一，罷工等）。美國的新特別法令對土人的土地加強搶奪，白種奴隸主人施行的加緊壓迫，新的恐怖之潮，私刑殺戮與逮捕并不能把黑種羣衆反對帝國主義制度的自由鬥爭阻止。新的絕大的後備軍加入了反帝國主義的戰線。

在拉丁亞美利加（南美洲）工農羣衆對美帝國主義同樣也對英帝國主義的鬥爭正在激烈化。那些由資本家，大地主集團與其將軍們所作的變亂，其目的無非使這一帝國主義來代替另一帝國主義而已。不斷地抬高的羣衆運動却用同樣的鋒銳向金元帝國主義和金鎊帝國主義施重擊。執行委員會祝賀尼加拉瓜（Nicaragua）的英勇戰士，他們

手執武器與美國的強敵對抗已經三年了。中美與南美的鬥爭，對中國的干涉，美國之幫助國民黨劍子手政府，對黑種人的中古時代野蠻的壓迫，南部諸邦的奴隸般的條件，這些都表明金元帝國主義的強盜的真面目。執行委員會宣佈墨西哥法西斯政府的穢行，作美帝國主義的無恥的工具殘殺羣衆而不恤，執行委員會認爲現在洪都拉斯（大失業運動）與古巴（大罷工）發展的鬥爭是本同盟的反帝解放鬥爭重要的現象。認定在拉丁亞美利加各國家遍處建立同盟的羣衆組織的條件已經具備了，并號召起來作新的舉動以擴充反帝鬥爭的羣衆基礎。

在埃及，敘利亞，帕勒斯丁納，在中國，印度，安南，在摩洛哥，非洲與拉丁亞美利加——遍處都是暴動和羣衆運動。民族壓迫的無比的壓力，鬥爭的無比激烈化，使得在主要的殖民地中由被壓迫民族中最強毅勇敢的階級——工人階級一天一天更高度地取得了反帝戰綫的領導，擔任了把一切被壓迫民族熔鑄成一個偉大的戰綫。

帝國主義者用盡一切方法來壓迫逮捕革命的反帝的自由鬥爭。他們嘗試由加緊剝削奴役被壓迫民族來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恐慌。世界經濟恐慌把殖民地國家的勞動羣衆的貧困，災難與剝削無窮地增加了。恐慌，特別農業恐慌在殖民地國家肆虐，其影響已使百千萬人到了絕境，爲任何他處所無有。奴隸勞動和強迫勞動更高度地成了帝國主義殖民地統治的組成部份。農民羣衆更多地動作起來，向帝國主義的炮壘和高城

衝打。

殖民地剝削之加緊反而影響到帝國主義國家勞動羣衆的生活狀況，增高他們的貧困。因此而羣衆們更見明白，帝國主義國家勞動者的生活利益是和殖民地民族的利益互相關聯的。被奴役民族的政治的壓迫也同此無窮的剝削而加劇了。每一極小的自由運動，每一建立民族革命機關，組織工農羣衆的輕輕嘗試都引起成千成萬工農學生的逮捕與生理的毀滅。各國的法西斯運動鼓勵起好戰的人種仇視，乃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用來撲滅革命羣衆運動，特別也在殖民地的。例如德國的法西斯軍官在蔣介石處供職便是。

正在生長的羣衆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憤怒迫使帝國主義者更多地利用宗教的組織來對被剝削羣衆的民族和社會的解放作戰。這在各教門領袖（羅馬的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教徒膜罕默德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等等）之反蘇聯的十字軍遠征，在華梯龍（*Hitler*）（羅馬教皇）的戰爭政策，在教皇的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通告。在甘地之在印度利用宗教宣傳等等可以見出。這一切與同明年在杜白林（*Dublin*）愛爾蘭首都）開的。大會聯系起來揭露了宗教領袖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走狗的作用。

在對被壓迫民族的戰爭的前綫上也立着第二國際。麥克唐納的「工人」政府對印度的自由運動作戰，使飛機轟炸印度的村莊，絞屠印度的革命分子，遣遠征軍去打緬甸

，使揚子江上的英國軍艦轟擊中國的工農紅軍。麥克唐納的工人政府喋血壓迫埃及與亞利伯民族的自由運動，并幫助南非洲的奴隸主人的政治。凡迪文，第二國際的主席受蔣介石的邀請遊歷中國。法國的社會黨人擁護法帝國主義在安南，敘利亞，愛吉爾，圖尼斯，摩洛哥，與法屬黑種人殖民地的流血的恥辱行爲。亞姆斯特坦（改良主義職工國際）的湯麥斯在殖民地組織反對革命工會運動的鬥爭，而擁護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警察工會。西班牙的社會黨人作革命的共和黨政府的人員和台柱而幫助喋血壓迫摩洛哥的暴動，與同喀塔羅尼亞（Katalonia）及其他地方的民族運動。比利時的社會黨人不僅擁護比帝國主義在剛果的恥辱政策，而且藉比國工人銀行去直接參加剝削黑人羣衆。荷蘭的社會黨人幫助打計劃挽救荷蘭在南洋羣島的統治并且直接參與該處的殖民地管理機關。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擁護新德帝國主義的在國際聯盟裏要求曼達特的企圖，就是要求新的殖民地。

帝國主義對被壓迫民族的恥辱行爲沒有一次不待第二國際和亞姆斯特坦國際的參加，並在本國的無產階級面前替作擁護。

在這兒那些所謂的左派社會民主黨却表演着更無聊的角色，麥克斯登，和費門在反帝同盟一九二九年佛朗克府大會上口頭儘管發誓忠於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而實際上則叛賣牠。費門爲國際運輸工會的領袖而不作任何舉動以阻止遣送軍械和軍隊去進攻中

國的蘇維埃。對於荷蘭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一句抗議的話也不講。費門先生從反帝同盟裏逃跑了（自己宣佈退出的）。儘管反帝同盟祕書處要求援助亞刺伯國家的革命暴動，而他才反對暴動而擁護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期洪黨（Zionists）。麥克斯登先生的態度也同樣的。儘管在佛朗克府大會上的一切光冕堂皇的申明，他毫不知恥地擁護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舉動，麥克唐納，伊爾文與鮑爾溫的對印度政策。他擁護帝國主義者及工黨政府在印度，中國，埃及，與其他英國屬地的整個反革命政策，而同時嘗試用激進的空話來網羅英國工人防止他們的革命鬥爭。

反帝同盟作澈底的反對帝國主義擁護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的革命鬥爭自然不能與這類的人有所共同。因此執行委員會批准英國支部之開除麥克斯登并且把這類的叛徒從隊伍中趕出去。他們的消失只有使反帝同盟加強的。

在大地主，高利貸者，王子，諸侯與貴族之外，帝國主義又有效果地用很小的，對於帝國主義殖民地制度的本質無損的讓許也來取得民族資產階級作聯盟者向增長不已的民族解放運動作戰。在各國的民族改良主義者由他們的行動證明了他們並不代表民族的利益，不向帝國主義的壓迫作鬥爭。他們時常站上革命鬥爭的頭頂上去，其目的只在於這樣更容易把鬪爭折斷。因叛賣民族利益而受償，他們從帝國主義者那裏得到小小的讓許，對於殖民地統治的本質無變改的。反帝同盟警告他的信徒們不要墮入民族

改良主義者所散佈的幻想中，以爲達到民族獨立不用革命鬥爭就可能而在利用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這話之下實際從屬於某一帝國主義集團，由此使得民族運動替這一帝國主義集團効勞。對民族革命運動最殘酷的流血恐怖，給叛徒——叛賣反帝鬥爭的——以小的讓許和預約，這就是目前帝國主義政策的本義。和印度的民族會議和中國國民黨，在帕勒斯丁納和亞刺伯執行委員會，在敘利亞和苦得爾華唐，在埃及和華甫待在南洋羣島和沙累喀伊斯拿姆大辦其交涉。反帝同盟警告勞動羣衆不要相信帝國主義者這些把戲，并號召他們起來對這些把戲鬥爭。號召起來揭露民族改良主義者之參加這種生意買賣。

反帝國主義鬭爭的激烈化很明瞭地把民族改良主義黨的領袖們的反革命作用揭露了。印度的民族會議（或稱國民會議請按經常使用者爲準 *Nationalkongress*）爲無足輕重的讓許而公開地把印度的民族獨立完全出賣了，這給了一個特別重要的教訓。民族會議的執委贊成了英國副王與甘地締結的叛賣條約。因此遂成了英帝國主義，印度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走狗，成了他們口頭上那般神聖的印度獨立的叛徒。

在這裏那些所謂左派民族主義者如耶華哈拉勒魯與博涉表演着更可憐的角色。勒魯以反帝同盟執行委員的資格光冕堂皇地負下澈底革命反帝鬥爭的義務，却證實爲甘地的副官了，他用左的激進的空話來幫助施行甘地的叛賣政策。勒魯與博涉嘗試過了而

且還正嘗試着最無恥地欺騙革命的青年和工人羣衆。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更認定，蘇巴斯博涉，魯易，幹得略等人也走上了這條路而放棄了印度自由的事業。

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認定勒魯是印度民族從英國枷担下解放事業的叛徒了。

在印度的廣大勞動民衆面前最尖刻地揭露勒魯之加入了反革命營壘而把他開除出同盟的隊伍去。執行委員會同時又警告印度的民族自由戰士們提防那已成了英帝國主義走狗的耶華哈拉納魯，博涉，魯易及其他左派民族主義者的一定要動手的欺騙眩惑的把戲。

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號召印度民族會議的羣衆們和他們的叛徒領袖們斷絕，超過他們的頭而去消滅那和英國結的恥辱條約，使用一切力量來組織爲印度完全獨立的鬥爭。反帝同盟以求完全獨立的革命鬥爭來和麥克唐納甘地的帝國立憲這民衆欺騙相對立。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號召印度的真正要求獨立的戰士直接來加入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同時紀念那被英帝國主義屠殺了的印度革命者巴卡特醒等人，他們是爲印度的自由鬥爭的事業而死的。凡是表同情於這些勇敢的被屠殺的革命者的人都應該加入革命戰線以促進鬥爭的勝利。這個鬥爭是不能夠由英雄式的個人行動成功的，而只能由有覺悟的有目標的工農和革命青年的羣衆行動。

反帝同盟祝賀南洋羣島的同志們，以自動的積極來反對那實行了投降政策的哈達。

以同樣的程度如帝國主義者之加強了他們之向被壓迫民族進攻，也同時加倍了國際的帝國主義的大舉干涉蘇聯的準備。他們在那裏嘗試，由被壓迫民族的勞苦羣衆中成立軍隊以襲擊那唯一的實現了民族自由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無疑地帝國主義者在當前的進攻蘇聯時要使用被壓迫民族的百萬勞動者去作反對工人國家的炮灰。

蘇聯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發展與民族自由的國家。五年計劃的無比的進步，迅速成就的社會主義建設對於一切在蘇聯裏結合的民族是一個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偉大進步。蘇聯的例子指示出來，根據着革命解放了的各民族的團結主義，先進的民族怎樣地兄弟似的扶助落後民族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叫一切附屬的各支部與各個人盡義務用一切力量來組織擁護蘇聯的鬥爭，來揭露帝國主義者的有系統的誣蔑挑唆手段，而告訴羣衆，這些反蘇聯的戰爭準備，是將要把殖民地勞動者送去給這反動的戰爭作炮灰的。反蘇聯的干涉戰爭同時也就是反殖民地民族自由鬥爭的戰爭。同盟特別指摘那講蘇聯強迫勞動的仇敵誣蔑，作這個誣蔑的人，就是自己在殖民地用盡一切方法來擁護強迫勞動和奴隸制度的人。

同時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教一切正直反帝的戰士注意，一切帝國主義者，特別美英法日帝國主義不僅金錢，軍火，遣送軍事顧問——德帝國主義參加最多的——不僅由供給反革命軍隊以戰具來幫助那反對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反動戰爭，并且用自己的軍隊與軍

艦進行了對中國工農革命的公開的反革命干涉戰爭。擁護中國革命需要反帝戰線中提起一切的力量。

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滿意地認定，單獨幾個領袖之懦弱遁逃與無恥叛變並未絲毫把反帝鬥爭削弱，恰相反地把他加強了，在營壘中有得到了更多的明瞭和堅決果斷。

這鬥爭是走進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了，一切矛盾的激烈化，局勢的嚴重使反帝同盟義不容辭地也加強他的鬥爭，鞏固他的組織。一切份子，凡是志願正直地爲被壓迫民族與少數民族的獨立而鬪爭的，不因恐懼勞動羣衆的社會要求而背離自由戰爭的營壘的都應該在一個戰線裏團結起來。反帝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會的各種決議案是同盟的任務的指南。根據這些決議案同盟是並且保持其爲一個超黨的，包括一切革命的自由戰士的組織。

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抬高起來民族解放運動是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羣衆的鬥爭最緊密關聯着的，並且大聲申說蘇聯是真正革命反帝鬥爭的高城。他認定單個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同盟支部總還未曾發展出一種和任務的偉大相當的積極性。殖民地國家一切革命力量的組織與結合，獲取革命工農羣衆道路線的繼續，仍保持爲反帝同盟的主要任務之一。

同盟執行委員會認定國際祕書處在佛郎克府大會以來時間中持有正確的路線，并在

大會決議案的意義上對於殖民地的重大事變採取正確的立場。牠爲單個的重要地方，特別爲英國，法國，比國，西部與南部非洲打造了組織工作的切實計劃。然而國際秘書處的工作和組織中的應當剷除的缺點仍必要以公開的批評認定出來。和各殖民地的直接聯絡不足。關於亞刺伯暴動與印度事變秘書處固然起了發動作用，而在好些別的事變例如最後的援救默魯獄中戰士，却落在運動之後了。也就那些發啓得好的舉動在多數國家中都祇在初期進行得好，隨後就常常過早地怠慢下來，並且不見有組織上的結果。在將來應該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和殖民地中作更多的活動的羣衆工作。再者對於中國與安南的恐怖沒足夠地組織抗議舉動。還沒有出刊國際的雜誌，并且一般地很少反帝的刊物這事實也應歸爲國際秘書處工作的缺點。他的工作在這種範圍的實現却要一切支部也認真地動手擴張他們的組織活潑他們的工作才可能。執行委員會不得不認定，在這一觀點上除英國相當成功（最近全國會議良好的進行）的例外在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儘管國際秘書處的勸告而僅有極小的組織上的進步。特別要指出來的是法國支部的消極性。執行委員會希望各支部從此幹起來克服他們的組織上的弱點。

定期在六月底國際反帝徵求週，各處都應該在這種意義上利用。在還沒有反帝組織的國家中（比國，捷克等）應開始建立他。反帝同盟應該成爲殖民地，歐洲的被壓迫民族與少數民族的一切民族革命運動的一個鬥爭聯合。并由他的各支部與參加的各

組織去發動吸引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動羣衆到反帝戰線的積極鬥爭裏來。

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認定在這反帝鬥爭的新的較高的階段中下列的綱領的要求應作他行動的總路線：

- (一) 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完全民族獨立；
- (二) 被壓迫民族的完全自決權；
- (三) 撤退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屬國中的駐軍；
- (四) 一切民族革命的組織，特別革命的工農組織完全自由；
- (五) 沒收帝國主義者的一切企業，銀行，礦山，大農場，土地等歸爲國有，否認對帝國主義者的債務，取消一切賠款支付；
- (六) 沒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交與勞動農民

只有誰承認這些要求而爲之鬥爭才能被視爲實在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民族壓迫的戰士

反帝同盟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付託祕書處以下列任務：

- (一) 根據上面的幾點製造一個綱領拿到各支部中去討論。
- (二) 眼見着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絕大意義把這些被壓迫民族和少數民族有系統地聯合起來，團結他們在同盟周圍或使其加入，並在執行委員會的機關中給與相當的代

表團。

(三) 被壓迫民族與少數民族的代表應該更多地吸引來參加執行委員會機關的工作與代表團。

(四) 祕書處應該盡一切必須的步驟，以出刊一種雜誌，來把反帝同盟的綱領和口號通俗化，傳達到羣衆中去，並成爲思想上政治上反帝鬭爭的聚合點。

(五) 各支部，特別帝國主義國家的應使積極化，特別注意在各國中建立領導份子和活動隊，以作爲羣衆間的聯系。

(六) 祕書處受委託，由於團合殖民地國家一切革命的工農組織與民族革命組織來加強反帝同盟。

(七) 祕書處受委託，特別對近東，在非洲的黑人區域，在拉丁亞美利加的反帝組織加重注意。

(八) 祕書處應留心使執行委員會的會員本人更多的親自參加帝國主義國家的反帝鬥爭之組織與宣傳。

(九) 還有一個重要工作是青年工作的繼續建立，國際青年祕書處工作之加強與各國青年支部之建立。

(完)

中國革命轉變的前途和任務

華 崗

三〇

一 引言

中國資產階級地主的聯盟沒有解決引起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革命的矛盾，他亦不能夠解決這些矛盾，恰恰相反，國民黨幾年來的反動統治，只有使這些矛盾更加深入更加劇烈。這些矛盾現在正在擴大的基礎之上重複產生出來，它用着歷史上不可延緩的力量預先規定着那新的更加深刻的革命浪潮的高漲。雖然目前的形勢，暫時我們依然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依然還沒有匯合起來。可是無疑的，土地革命受着無產階級的領導，將要更加發展，而不可避免的要引導到中國革命的全國高漲，而且事實上現在中國工農革命運動的新的高漲，已經為成無可爭辯的事實，這和托陳取消派與羅章龍等右傾機會主義投降派的預言，完全相反。

中國目前形勢的具體特點，正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突飛猛進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與政治危機更加深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尤其是帝國主義強盜進攻蘇聯壓榨殖民地更加兇暴及世界革命進一步高漲的國際背景之下；在國內經濟政治危機繼續增高，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統治分裂崩潰更加急劇的條件之下，開展着更殘酷的國內戰爭。

一方面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的統治分崩離析，新的軍閥混戰表現日益緊張的形勢，另一方面尤其重要的却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軍閥爲圖維持他們自己的剝削統治拚命的進攻紅軍與蘇區，實行無情的反革命的屠殺和戰爭，這樣使中國共產黨要更積極更緊張的領導廣大工農勞苦羣衆與工農紅軍，在澈底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土地革命的旗幟之下，以革命戰爭消滅反革命的軍閥戰爭，建立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力爭革命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

這種情形使我們要更積極的提出中國革命向前發展的道路和任務的問題。因爲「只有在中國革命發展前途的不可避免的觀點之上，才能夠設想現時鬥爭的進程，而正確的規定黨的現時任務和策略」（一九三〇年七月共產國際執委對中國問題決議案）。

另一方面，自從立三路線對於中國革命轉變問題的半托洛斯基主義實質和他對許多別的基本問題一樣暴露破產之後，黨內一般的都還缺乏對於革命轉變問題正確的了解，雖然有一部分同志對此問題的興趣已經逐漸提高起來，這就使我們積極提出這一問題并給以相當的解答更成爲必要。

二 爲什麼有革命的轉變？

首先要求我們解答的問題，就是爲什麼有革命的轉變？ 革命轉變的理論和實際建

樂在什麼基礎上？

我們每一個同志一定都懂得：我們國際無產階級所力圖實現的最終目的，是以共產主義的世界系統代替資本主義的世界系統。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已經過了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的準備，牠是人類唯一的出路。只有牠能夠排除資本主義系統的根本矛盾，把人類從腐化和沉淪中挽救出來。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懂得：經濟及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必然定律。此種不平衡規律，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形深刻，更形厲害。因此我們決不能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看作同時並起，一舉而成的動作。這就是說，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並不是同時並起，一舉而成的動作；如純一下子就同時建立起來的，它是要由多種時間不同性質不同的過程匯合而成的；如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往前轉成無產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解放戰爭，殖民地革命等等。祇在終結的革命過程才進到國際的無產階級專政。

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形加重。此種不平衡引起資本主義形式之不同，引起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程度的不同，更引起革命過程的各種不同條件和特殊條件。這些情形，使無產階級之獲得政權，在歷史上必然採取各種不同的路線和速度，使有些國家在向無產階級專政走去時，必然經過某種過渡階段，并且更使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也各不相同。

譬如說，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如美國德國英國等，因為有着強大的生產力，高度集中的生產，意義較小的的小經濟，及成立已久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所以在這種國家裏，政治方面的基本綱領要求，是直接獲得無產階級專政，經濟方面的主要要求則為：沒收全部大生產，建設巨大國家蘇維埃農莊，以數量較少的土地已給農民，盲目的市場關係的範圍較小，一般社會主義發展的速度，尤其是農民經濟集體化的速度極快。因此在這種國家裏，根本沒有『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過程。

另有一部分資本主義中等發展的國家如日本及西班牙葡萄牙波蘭等類國家中，它們在農村經濟上顯明地尚有許多半封建關係的殘餘，有社會主義建設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物質先決條件，更有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但是這種沒有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不必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特別階段來完成它，而可以由無產階級革命來把它完成，把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附帶任務。這裏與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底區別是很大的，這些國家裏掃除半封建關係的許多殘餘的必須性，是在無產階級革命上面烙着特殊的記號，但是那些在『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之下的革命過程，無論在過去或將來都不會有的，如像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這些國家一樣。

但是在別一部分資本主義中等發展的國家如巴爾幹半島諸國等類國家中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中國印度等國及附庸國如阿根廷巴西等類國家的革命道路却是另一種形式。因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庸國家中，其工業發展尚在萌芽時代，有時工業發展雖達可觀的程度，但大多數還不敷獨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中世紀式封建關係或「亞洲式生產方法」的關係，在有些國家的經濟及政治上層建築中，均佔優勢；最後更重要的就是這些國家的主要工業商業銀行等企業及主要交通工具，大田莊，種植場等等，均操在外國帝國主義的掌握中。在這些國家裏，具有最重大意義的，一方面是反對封建制度，反對資本主義前剝削形式等的鬥爭，和徹底實行農民土地革命，他方面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要求民族解放的鬥爭。通例，這些國家只有經過許多準備階段，只有經過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整個時期以後，方能達到無產階級專政；而順利的建設社會主義，則大多只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直接幫助的條件之下，方有可能。

同時在別一部分資本主義中等發展的國家，也要經過從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不過這種「轉變過程」比之於像我們中國等還沒有達到資本主義中等發展程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庸國要快些。這裏的區別也是很大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與在保存資本主義前期關係的程度上都很大的區別，但是他們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間的互相關係，在實質上是一樣的。雖然要克服的困難有不

同的程度，革命轉變的過程也有不同的速度，但是他們都要經過革命轉變過程的實質，無疑是相同的。

所以共產國際綱領中，說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形式』時，同時也就說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形式，把他們分爲轉變到或不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兩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主要的差別，歸結到從前列寧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通常的』與『非通常的』形式，因爲在列寧看來，非通常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有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傾向的革命。

三 中國革命目前的性質與前途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與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都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任務沒有解決，所以目前中國革命階段仍舊保存着以前的任務：消滅帝國主義統治，取消地主土地私有制度，打倒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聯盟，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所有這些任務就規定中國的革命當前階段還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

然而中國革命和普適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不同，首先從革命動力的成分上可以看出他的區別。雖然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外國帝國主義及封建地主的利益之間的矛盾，在

中國大革命的初期曾經推動民族資產階級採用革命的步驟，但是隨着革命運動的深入，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的日趨尖銳，再加上中國土地制度的特點與土地革命的開展，就使民族資產階級很快失去他自己的革命性，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早已脫離革命戰線而投入到反革命營壘中去了，因此中國工人和農民已經不是同着資產階級，自然更不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却要直接反對資產階級，而去執行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階段的任務。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特殊性，還在於：他的勝利就要開闢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中國社會的實質規定中國革命的中心內容是土地革命，同時中國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同時也就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却在準備着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這裏，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亦就是中國革命經過許多過渡階段，而逐漸徹底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的經濟的基礎。

所以『社會主義革命成份的存在，就是中國革命民權獨裁的特點。中國革命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將要比十月革命有更多的過渡階段；然而中國革命把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縮短得很多，與俄國一九〇五年條件之下所看得出的速度比較起來，中國革命從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要快得多』（共產國際一九三〇年七月對中國問題決議案）。

四 中國革命轉變的內部條件

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不僅有轉變到社會主義前途之歷史的可能，而且有歷史的必然。中國的前面站着一個絕對的問題：或者完全殖民地式的奴隸化，而羣衆更加破產；或者是蘇維埃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事實上中國工業農業的危機，使經濟上需要那些趨向於社會主義的過渡性質的辦法。而且中國革命不但要和封建制度軍閥制度實行殘酷的鬥爭，并且要和外國資本家以及中國資本家實行殘酷的鬥爭。中國的民族獨裁，將要有澈底沒收外國資本家以及中國資本家企業的必要，將要不能不進行很重要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步驟。這就是說：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先，便已經要奪取工廠與製造廠，因為我們的政權，雖然當他還是資產階級性的工農民主專政，但是必須反對資產階級才能存在，我們不僅要打倒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豪紳地主的統治，并且還要打倒資產階級的政權，資產階級因此將要遁逃，資本家將因此怠工，工廠企業將要因此停工歇業，工農政權將因此不得已而佔領他們。不僅如此，將來民權革命徹底勝利時，驅逐帝國主義，推倒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統治，將要進行更殘酷的革命戰爭，敵人武裝的抵抗與經濟的封鎖，比現在紅軍蘇區還只佔有小城市及農村的情形一定要更殘暴毒辣，那時候一方面掀動更廣大的工農羣衆起來實行鬥爭，另一方面也就勢必使工農

蘇維埃政府不得不由沒收外國企業銀行進而沒收本國資本家的一切大企業去組織指揮全國的經濟生活。另一方面就農業來說，中國農業生產力是很低弱的，又遇着空前擴大的災荒，當土地革命澈底勝利，可以從此開始向資本主義發展時，必然就要遇到一個極大的障礙，這障礙就是帝國主義與國內被革命打擊的地主資產階級及富農的頑抗。或者企圖用新的剝削方法，來壓制剛從半農奴制解放發展的小農經濟，使之處於不利地位，到那時候，一定迫使最多數的基本農民羣衆——貧農中農提出這樣的問題，怎樣才能更加集中力量去戰勝中國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障礙呢？彼時所能得到的答覆一定是趕快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即消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代以有組織的在國有城市工業統率之下的農村集體經濟，到了這樣轉變的時候，就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了。

再則，中國的情形，可以預料在革命政府之中共產黨要佔多數。因此，無產階級不但對於農民能夠實現思想上的領導，而且能夠實現國家組織上的領導。所以一般的說來，國內社會的前提總算是相當有利的，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無產階級和鄉村貧農的結合，在中國革命新的高漲的最初幾個時期，就已經開始形成起來，這種情形對於中國革命向前開展的速度和形式，自然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因為實行反對中國反革命的軍閥戰爭和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農民的主要羣衆將要受革命進

程的推動，而來贊助那些反對外國和中國資本的過渡性質的必要革命政策。

五 中國革命轉變的外部條件

中國的工農革命民權獨裁，比較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條件之下所決定的民權獨裁，將要有很大的不同，這裏的分別，首先就是中國革命的國際環境，現在已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的存在，他正在順利的發展着社會主義的建設。資本主義制度深刻恐慌的基本表現，即為世界經濟分裂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與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這一件事。

所以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它在無產階級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中的影響及權威的發展，就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聯續，增強與擴大。世界無產階級在有了蘇聯之後，才得到了他們的真正祖國，對於殖民地的運動，它變成了最大引力的中心。所以蘇聯是資本主義總的恐慌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不但是因為牠脫出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造成了新的社會經濟系統的基礎，而且還因為它一般的具有絕頂重大的革命作用，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的推動者，起了推動全世界無產者奪取政權的作用。這樣，世界革命的進程，推動宗主國工人，作征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并且更推動數萬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農，作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因有社會主義的中心，蘇維埃共和國及其蒸蒸日上之經濟力量之發展，

就使中國革命將更有力的完成土地革命與脫離國際帝國主義的羈絆，並且在經濟上可以與世界社會主義工業中心相接近而逐漸與之聯合，不但可以比較順利的由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並且有得到迅速發展經濟與文化的可能。

同時在資本主義的世界內亦有比較順利的環境以幫助中國革命的轉變。我們知道：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是發生於世界革命比較消沉的時期中，但是現在中國新的革命高漲的國際環境不相同了。現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政治危機繼續增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日益緊張，世界革命運動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有些國家如德國西班牙等且已走向革命危機的成熟，這樣中國革命有無產階級專政祖國及一般世界無產階級運動之助，而取得革命轉變的順利的國際條件。

六 中國革命將來轉變的形式

由於上面所述這些歷史條件，所以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底，就不可避免的開始社會主義的轉變。而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便要成爲這一轉變的起重機，也就是這一轉變的基本條件與形式。

中國革命目前直接的任務是要推翻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的統治，建立工農蘇維埃民主專政。因爲中國革命只有在工農蘇維埃革命民主專政，才能得到真正的勝

利。『幾個月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所成就的，比政治上停滯的平和的遲鈍的幾十年所成就的還要多』（列甯）。但亦正如列甯所指示我們的，這種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和天下其他事物一樣，有它的過去與將來，它的過去是與專制政體，農奴制度，君主特權作鬥爭，它的將來乃是反對私有財產制度的鬥爭，僱用工人對於工人的鬥爭，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

從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轉變到社會主義經濟的最必需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世界無產階級專政。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必須經過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過程。在為無產階級專政為改造社會制度而爭鬥的過程中，必須組織工農的聯合，以及反對地主與資本家的聯合，這種工農的聯合，是處在工人階級的思想及政治上的領導之下，而為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

蘇維埃政權的形式，直接從勞苦羣衆的廣大運動中產生出來，祇有它才能保障勞苦羣衆的最大的積極性，因之也就最能保障最後的勝利。蘇維埃政權乃是最高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它與國民黨的所謂民權主義絕不相同，因為國民黨的所謂民權主義，不過是地主資本家專政的遮掩形式，蘇維埃政權形式與歐美資產階級國會主義的共和國之間亦有天淵之別，何況現在因為危機的深入，所謂歐美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差不多都已轉變為公開的法西斯蒂的專政，國會主義已經急劇崩潰，資產階級國家已經加速度的法西斯

斯蒂化，所以胡適新月派的主張與國民黨同樣反動。

蘇維埃政權則不同，它公開承認自己的階級性，公開承認其任務是為極大多數人民謀利益，壓迫剝削者。它將無情的剝奪階級敵人的政治權利；在特別歷史條件之下，他為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起見，可以給無產階級以許多暫時的特別權利，使之比較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處更優益的地位。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領導下聯合羣衆組織羣衆的最好形式，它在實踐上吸收最廣大的工人階級，農民及其他勞苦羣衆來參加革命鬥爭及參加管理國家的事業。它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依靠着工人階級的羣衆組織，他在勞苦羣衆中實行廣大的德莫克拉西，他比任何其他政權形式，都更親密地接近羣衆。改選代表之權，撤回代表之權，行政權和立法權的合併，不按區域而按生產原則（工廠，作坊，農村等等）舉行的選舉——這些都是保證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廣大勞苦羣衆，能夠有系統地不斷地積極地參加一切公共事業（經濟的，一般政治的，軍事的事，文化的），因之，蘇維埃的德莫克拉西，乃是無產階級的德莫克拉西，農民及一般勞苦羣衆的德莫克拉西，反對剝削者的德莫克拉西。

所以，以蘇維埃為國家政權形式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就可以成為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出發點。至於這一轉變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完成，這一轉變將要採取怎樣的程度，那只有爭鬥及階級力量的對比才能決定，只有城市無產階級的和鄉村無產階級以及

無產階級的自覺力，團結力，組織力才能決定。

七 革命轉變與過渡時期的鬥爭任務

中國革命在目前發展的階段上，當然還並不剝奪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真正相反，尤其是對於農業，在消滅地主私有土地制度之後，消滅軍閥制度高利貸剝削之後，資本主義一定要表現向前生長的趨勢。中國革命經濟上的非資本主義性，並不在於立刻便會排斥一切社會關係裏的資本主義，而在於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利用爭得的經濟地位，將要造成那種前提和優勢，去徹底發展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的生產。這兩個傾向的鬥爭裏，無產階級的勝利不但要由國內的條件來決定，而且要由國外的條件來決定。共產國際已經明顯指示我們：社會主義是不能一下子直接實現的，過渡到社會主義要經過許多階段。進到社會主義的各個步驟，應當從羣衆的需要出發，應當要使大多數的人民認識這些步驟的必要。這些步驟應當是經濟實際情形裏面已經成熟的，應當是經濟上完全可以實行的。立三路線主張現在蘇區就要建立蘇維埃農場與集體農場，完全由於他那『中國革命勝利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的半托洛斯基理論出發的觀點，實際更是用『左傾』的空談來遮蓋他那『聯合富農』『反對平均分配土地』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立三主義有根本不認識在中國這一類的國家裏面，因

爲經濟狀況的原故，由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應當要經過好些過渡的階段。中國是小農經濟占優勢的國家，這些過渡辦法應當和農民主要羣衆的利益聯系起來。應當估計到各區域社會情形的區別，估計到農民羣衆的組織力量和覺悟程度的不同，估計到民族祠堂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影響的力量，應當記得：我們的任務不是取消，而是改造小農的經濟。所以規定過渡辦法的時候，無產階級無論如何不應當脫離自己農民後備軍。

同時，我們更應注意：在中國情形之下，由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鄉村中底階級鬥爭必然要愈趨劇烈起來。我們爲鎮壓鄉村資產階級起見，只有將鄉村中的貧農，鄉村中那些與工人階級最接近的一部分——鄉村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所以黨在鄉村中的基本組織任務是：組織雇農，苦力工會及貧農團。在這原則之下，必須把貧農與中農聯合起來，以對付反革命派及富農等阻礙土地革命發展的企圖。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什麼情形之下——在民權主義的土地改造之中，黨就應該認定自己的任務，是不動搖的力求農村無產階級獨立的階級組織，向他們解釋：農村無產階級的利益，與農村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調和的，並且要向他們警告：小農經濟制度的增大，在商品經濟存在的條件之下，永遠是不能消滅羣衆的貧窮的；最後，還要指明：必須完全的社會主義改造，才是消滅一切貧窮和一切剝削的唯一方法。

共產國際又指示我們：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步驟，可以大致的一般規定出來，這些步驟要在經濟上是完全可以實行的，並且能夠保障那些造成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前提。這些步驟之中可以有以下的辦法：外國資本的工廠企業，銀行；新狄加，股份公司，鐵路，大的航路，航空事業，汽車交通，首先是屬於外國資本的都收歸國有；在目前，只有當外國工廠能履行下面的條件的時候，才能允許他們繼續生產。

即：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承認並實行社會勞動法，承認工廠委員會。外國的企業家對於這些條件如果破壞一個，無論是怠工生產，關閉企業，干涉蘇維埃政府的內政，或幫助反革命等，蘇維埃政府均應立刻沒收牠收歸國有。對於反對工農蘇維埃運動而組織反革命戰爭的中國資產階級，爲着經濟上解除他們的武裝起見，同樣要把他們的企業和資本收歸國有；對於其他的小的企業則實行監督。並且要實行澈底的合作社化，從消費合作社販賣合作社的最簡單的形式做起；然後實行集體農場化，完全根據於農民自願的原則，並且可以得着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技術上的幫助，建立預算和國民經濟計劃，去實行繼續加強中國的經濟命脈。

關於土地政策則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平分土地是最堅決的最澈底的肅清土地上的封建殘餘的方法，肅清一切地主的私有制的遺跡，肅清一切富農與農民羣衆間所造成的壓榨關係。平分土地還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方法，而是最激進的民權的解決土地革命底任

務，堅決的改善貧農的生活。佃農與中農在平分土地時，即使比以前使用土地的數量減少，也是很有利的；因為革命把他們從壓榨式的佃租之下解放出來了。私有者的中農，在平分土地時，也是有利的，因為革命把他們從壓榨式的苛捐雜稅中解放出來了。

同時，平分土地將領導主要的農民羣衆走向一切土地收歸國有。中國共產黨主張將一切土地與水利收歸國有，在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之下，在工農民權的革命專政的條件之下，一切土地和水利收歸國有，這不但是最澈底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手段，而且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初步，是農村經濟進到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的出發點。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宣傳一切土地與水利收歸國有，組織貧農，團結主要的農民羣衆在土地水利國有底要求周圍。實現土地和水利國有的權利，要由蘇維埃政府的鞏固，革命在國內許多決定勝負的區域裏面得到勝利，以及主要農民羣衆對於這個要求的擁護來決定。

最後，我們提出中國革命轉變的問題以及宣傳社會主義的前途，同時必須指出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和國民黨孫中山主義的烏托邦根本不同，孫中山主義的烏托邦，幻想用部分的節制資本的辦法去避免資本主義的流弊，只要看看孫中山把自己計劃的實行和中國周圍資本主義世界的幫助聯繫在一起，就已經可以看得出孫中山主義思想的反動性質。同樣同第三黨所謂「非資本主義前途」的乾叫亦無絲毫相同之處，第三黨根本就是農紳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營壘的一部分，他們不過以在野派或半在野派的地位

，從另一方面去挽救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統治而已。再則，我們提出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問題，並不像托陳取消派似的認為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的。正是托洛斯基，他在認為中國革命現在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左傾」空談之後，隱藏着完全忽視現在發展着的農民羣衆的特點。對於托陳取消派，這是很大的特點：他們對於農民的力量和革命到來的估量不足，對於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階段的任務和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的過程，不能了解。中國革命的中心是土地革命。革命的本身，正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的形式裏發展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非資本主義的，就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的學說，和托洛斯基說中國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空談，絕對不能相容。托陳取消派這種空談，不過是一種假面具，用來遮蓋他們那孟色維克托洛斯基主義陳獨秀主義的「國民會議」的實際口號。至於立三主義所謂「中國革命勝利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的妄談，亦祇不過是一種半托洛斯基主義的現形而已。和上列各派反動思想作無情的鬥爭，亦就是保障中國革命轉變的任務之一。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稿

論陳獨秀主義

利 森

四八

一

陳獨秀主義是什麼？是中國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中之機會主義和孟塞維克路線之典型的代表。所有從中國近時革命運動中發生出來的各種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自戴季陶主義，彭述之主義，譚平山主義，以至鮑羅庭主義，都可以且應該歸納在這中國孟塞維克的總路線之中——即陳獨秀主義之中。

陳獨秀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而且帶着民族資產階級的理想跑到中國共產黨裏面來影響中國工人運動，原來是很明顯的。他是歐戰後中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的主唱者，美國式的『科學』和『民主主義』（新青年雜誌的兩個主要口號）的宣傳者；哲學上，他是從美國杜威博士的實驗主義進到法國啓蒙時代的機械唯物論。這恰好是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歐洲大戰時期中發展起來的思想和政治的表演。這一時期的表演，在『五四』時期確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

憑靠在民族資產階級和學生羣衆的『五四』反日運動，漸漸的軟弱下來，而由此運動所引起的北方工人運動（主要是京漢路工和唐山礦工）和上海以及廣東的罷工鬭爭

繼續不斷的表現出新的社會階級帶着偉大的革命力量跑出舞台。於是陳獨秀首先起來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學生羣衆說：『工人的力量比我們大些』。此時正當他們對於『五四』運動的前途發生悲觀，對於『五四』以後的發展方向發生徬徨，他們的先進分子正想『從下等社會』中找出自己的力量和憑靠，這就不得不使他們看中『時髦的工人運動』。因此陳獨秀同着他所影響的急進的智識分子就開始與胡適之派（新青年雜誌中的左翼）分化，改變自己的方向：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方向改變到社會主義的俄國方向；由凡爾賽會議和華盛頓會議改向遠東民族會議（一九二二年在第三國際旗幟之下召集的）。由此，陳獨秀成爲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

二

陳獨秀主義不是忽然一下形成的，他的發展經過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大約可分爲四個時期：一九二三年黨的三次大會之前後建立了他的孟塞維克的路線之一般的理論基礎；一九二六年三月事變前後以至武漢時期建立了他的機會主義的實際策略；武漢失敗至六次大會時，是他的動搖和消沉時期，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變後，進到公開的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總路線，由取消主義進到『資產階級工黨』之叛逆的社會民主黨地位。

首先看他在黨的三次大會時期所形成的孟塞維克路線之理論的基礎。這一時期有他最典型的兩篇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這兩篇文章最能代表他的一般理論的立場和傾向。

假若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陳獨秀看重過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那末，到一九二三年京漢路罷工失敗後，他就跑到孟塞維克的根本立場——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勢力。他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概括來說，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展，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此時中國工人階級的理想界分爲三類：（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有許多目前雖是近代產業工人，而他過去未來的生活并未與獨立生產者（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的環境絕緣，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脫神權，帝王之迷信……工人階級的思想尤其是宗法社會的而非國家的……第二，只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只在最進步的海員及鐵路工人罷工中才表現出來……第三，真有階級覺悟并且感覺有組

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的階級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鬥爭之需要，都不會感覺的工人，也并不是少數（『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固然中國工人階級不是沒有缺點的，可是陳獨秀經常的樂於從缺點方面來看中國工人階級。他在三次大會的演說中，簡直把中國工人階級咒罵得不成東西。什麼『宗法思想』呵！『不脫神權帝王迷信』呵！沒有『國家覺悟』呵！他舉了許許多多的瑣細事實來形容中國工人階級之『窮極醜陋』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上面所引的文章，是在大會開幕後寫的，語句口氣已經比在大會爭論時客氣萬倍了。他在大會中從中國工人階級的落後，神權帝王迷信及沒有國家覺悟的立場發出來的分析中國革命的動力，拚命的肯定中國工人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之後，他就很驕傲的誇大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他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同上文）。又說：『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基礎（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此文是大會前二星期寫的）。他在大會的答辯中，熱烈地辯護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主人。

他對於農民怎樣呢？大會中的左翼曾提出工人階級與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的理論與他對抗，這在他看來簡直不值一笑，因為中國農民更是宗法觀念，反動思想，神權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像』。大會閉會後，在他的論文中很客氣的這樣說：『農民佔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衆革命。但是，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慾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畏難苟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

在他的革命勢力的計算中始終沒有農民，因為他看定了三個原因，農民難於加入革命。試看他所計劃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線：『中國的經濟狀況，軍閥階級已與資產階級顯然分開，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離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資產階級應當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妥協，打倒共同的敵對的軍閥階級……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當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一切時候，陳獨秀是把農民放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之外，他自始至終了解這聯合戰線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聯合，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階級合作和階級妥協，在這革命聯合戰線中資產階級是居領導地位，而無產階級是附屬的。

陳獨秀怎樣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呢？他說：『半殖民地的經濟權大部分操

諸外人之手，政治權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諸本國貴族軍閥之手，全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在外國帝國主義者及本國貴族軍閥壓迫之下，有產無產兩階級共同起來，對外謀經濟的獨立，對內謀政治的自由，這是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

固然在黨的六次大會以前，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和任務全黨都沒有明確的觀念，然而如像陳獨秀始終不認識土地革命爲中國革命之主要內容，始終不認識而且不願認識工農民主獨裁制，這對於他完全不是偶然的。他說：「在普通形式之下，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國民革命成功後，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如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但是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算的可能，也並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亂的幹國民革命」(同文)。

那末，工人階級爲什麼目的要加入這革命呢？他說：「殖民地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意義就是對外要求民族之經濟的政治的獨立，對內則要求一般國民在政治上之自由。這種一般國民之政治自由，如集會結社罷工等之自由，正是中國工人階級目前至急的需要」(同文)。工人階級參加革命的目的就僅僅在這裏——不是爲得爭取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領導權，不是爲得工農民權獨裁制的勝利，更不在爭得革命之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這種轉變的觀念在他是完全沒有的。他同俄國的少數派一樣，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截然劃分爲兩個不相連續的階段，即現在既然是資產階級民

相革命，工人階級只有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和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再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對於農民運動也說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他說：

『所以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後國內產業勃興，然後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後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後農村間才有真誠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

從以上所述，就可明顯的看出陳獨秀主義在第三次大會時期所形成之理論的基礎，——即中國革命的工人運動中之少數派的路線；他對於革命動力的估量——重視資產階級，輕視無產階級，而忽視農民；對於民主革命聯合戰線的了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妥協，無產階級隸屬於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對於革命性質和前途的觀念——看不見土地革命的內量，看不見工農民主獨裁而更沒有看見革命有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只有『一心不亂的幹國民革命』，只有『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自然資產階級的握得政權』，待資本主義發展之後，將來再來社會革命。所有這些就確確實實形成了中國少數派的總路線。從他的『造國論』以至『汪陳宣言』以至中東路事變後的三封信，不過把這總路線『一言以貫之』罷了！

爲什麼使他這樣呢？這不是偶然的，因爲他自始至終是站在左翼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影響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既然自始至終是站在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以

不能了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而只能了解資產階級的領導，不能了解土地革命，只能了解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不能了解工農民主獨裁，而只能了解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和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造國論之精神）；不能了解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必然要轉到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了解革命是停留在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階段之上，或完全跳過此階段。

陳獨秀在三次大會的立場既然如此，他當時發出些什麼具體的口號呢？「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沒有階級鬥爭，只有民族鬥爭！」「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此時是鬼話！」「等待和國民黨分家後，再組織共產黨不遲！」……

三次大會閉會後，陳獨秀和馬林共同提議響應上海資產階級的民治委員會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辦法是請求國民黨發宣言，而不用共產黨名義發宣言。當時，我向他們抗議，才把這一個企圖打消。難道現在陳獨秀的取消主義和叛逆是沒有歷史的深遠的來源？

一九二五年的革命高潮，推動中國黨開始由智識分子的小團體變為工人羣衆的黨。黨在這高潮中起了相當的組織的和領導的作用。這一高潮首先就是證明中國無產階級之領導的能力與作用，打破陳獨秀馬林以至鮑羅庭等對於中國工人階級勢力之不相

信和輕視。陳獨秀在相當的短時期中，似乎多少變動了對於革命動力的機會主義觀點。可是一到五卅末期——張學良出兵鎮壓上海工人，郭松齡事變及吳佩孚攻取河南之後，又使陳獨秀對於工人階級勢力發生悲觀，對於時局發生不正確的估量。他同魏金斯基立刻修改以前堅決反對國民黨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漢時期就實行陳獨秀主義之機會主義的實際政策。

第一、改變只要左派國民黨的方針（堅決打擊右派，削弱中派和強大在中共領導之下的左派）號召國民黨右派合作，并送右派首領回廣東，這是三月事變的主觀原因之一。

第二、對三月事變完全採取無原則的退讓政策，并實行鄉村聯合戰線的機會主義策略，阻滯廣東的土地革命。

第三、北伐開始後，即將獨立的工人運動隸屬於蔣介石所要挾的民族利益之下，實行阻止和削弱罷工運動的方針；同時擴大鄉村聯合戰線的口號，去阻滯湖南高漲的土地革命。

第四、在上海工人三次暴動中實行『幫助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工人階級只要政治自由』的孟塞維克策略。

第五、對於已經開始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代表蔣介石採取卑鄙的屈伏退讓政

策。

第六、北伐出發，鮑維庭同陳獨秀完全把廣東交於李濟琛，盛行『以甲制乙以乙制甲』的小政客式的上層政策。

上面這些機會主義的實際策略，就規定了一九二七年四月間上海和廣東之大失敗。現在再看武漢時期陳獨秀主義之實際政策。這一時期，陳獨秀主義與鮑維庭主義混合起來，有名的西北學說的理論與實際成爲陳獨秀主義之變形發展。他的主要內容是：（一）迴避帝國主義離開東南工業中心，接出馮玉祥回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據地；（二）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後再說；（三）取消所謂工農運動的過火；（四）向小資產階級讓步；（五）承認國民黨的領導權，共產黨在政治上完全處於隸屬地位；（六）完全向汪精衛，唐生智投降，自動的承認退出國民黨和其政府，以換得共同打到南京去（詳見我的黨的機會主義史）。

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之斷送於陳獨秀主義及其變形的西北學說之手，難道還不顯明？

五

武漢失敗後，陳獨秀進到消沉與動搖時期。這一時期的特徵，他不僅頑固的拒絕承認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且開始演進到取消主義和合法主義的階段。一九二七年七月

底，他向臨時中央局提議：（一）把一切工會農會及政權機關轉交於國民黨左派；（二）我們在左派政權下進行下層羣衆日常工作；（三）暫時專做反帝運動，工農運動不要有所動作，以避過大的犧牲和破壞，這就是他的『保全』自己勢力的方法——取消主義合法主義。

以爲資產階級完全勝利了，革命完全沒有了。現在要緊的只是怎樣迴避犧牲保全勢力——這就是陳獨秀主義發展到取消主義的根本精神。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時，他提出下列主張：（一）蘇維埃口號現在不宜採用，（二）農民運動應在四不主義（不納稅，不還債等）的限度下進行；（三）中國共產黨不能一黨包辦革命，如譚平山等仍應與之黨外合作。

這一取消主義的『溫和』綱領，難道不是中國孟塞維克路線之繼續向前發展？

六

陳獨秀拒絕出席黨的六次大會，違抗兩年以來共產國際的電召；他只是口口聲聲說，共產國際『犧牲了我和平山』。然則他向那方面走呢？早就看得明白：他非走到反革命的營壘不可。南京政府向蘇聯進攻的冒險事業，就成了他的最後的轉變。他向中央進攻的三封信，不外是『資產階級工黨』的大綱。

他對中東路事變的態度根本是站在資產階級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觀點上，絕對的與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觀點相反。這不是偶然的。因為他自來就是帶着資產階級國家主義的影響跑到中國共產黨內來，現在仍然不得不帶着這副本面目跑出中國黨的隊伍之外去。所以他不關心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祖國之被攻，而且只關心於國民黨強盜統治的中國之變為塞爾維亞第二。他們的主要藉口是：「此時中國大多數民衆尙在眼前的具體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不能懂得擁護蘇聯的口號」。他所謂大多數民衆自然是把工人與資產階級混在一起。經過長期激烈的階級血戰之後的中國工人階級，在陳獨秀看來還是這樣落後，這樣不能了解擁護蘇聯口號。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他在一九二三年認定中國工人「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沒有國家的覺悟」，現在經過七年以上的鬥爭，中國工人已有了「國家的覺悟」即在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拿這個一九二三年所他說的中國工人對照起來已經是大進步了！陳獨秀先生！你不是沒有進步的呀，拿你的進步，與你所想像的中國工人的落後或進步去比較：你是進步得更遠了！中國工人只領導中國革命進到蘇維埃階段，而你却領導孟塞維克主義進到資產階級工黨：——進到公開反革命！陳獨秀先生，你不必拚命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口號」罷，你自己的「反對誤國政策」就是你們自己的階級口號；改組派同你們一樣的採用此口號：

陳獨秀對於革命失敗後的政權性質取了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這完全沒有什麼奇怪。因為他自始至終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一切階級關係都用資產階級做中心來決定。

看他怎樣說一九二七年的事變：

「這一種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和幫助，加增了他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的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對立地位之過程中變成殘餘之殘餘！

爲自存計，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下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這「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他所看到的主要的只是「資產階級取得勝利，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和幫助」，「封建殘餘受了最後打擊，……變成殘餘勢力之殘餘」。他絕對不會夢想到由這一轉變中國革命進到蘇維埃階段，資產階級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無產階級取得了中國之唯一的領導地位。這些小事情，在他是不會夢見的。爲什麼呢？因為他的中國革命的圖表素來就是這樣預定的：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下，發展資本主義，再來做社會主義革命。

所以現在陳獨秀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完全過渡到托洛斯基主義，這是一點也不奇

怪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是由蔣介石所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完成了，封建勢力不在了，帝國主義讓步了，現在所有的事情只是等待提高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以後再來幹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不要了，以後直截了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陳獨秀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之共同立場。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口號，自來在陳獨秀腦中就沒有設想過，直到現在依然不能設想。因為他所能設想的，只是既然叫做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那末一定是資產階級勝利，建立資產階級政權，那裏會有什麼工農專政這回事。中國資產階級從一九二七年以來已經勝利了，已經『形成了自己為中心領導的統治者，並且已實現了這樣的統治，就是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再則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在陳獨秀看來簡直不可了解，他至死也不會了解，因為這與他素來所設想的相去太遠了。他素來設想的革命主要動力是資產階級，若失了資產階級這革命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然則現在革命動力既然把資產階級除外，而革命任務又要反對資產階級，——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什麼？

所以陳獨秀和托洛斯基接着就提出『國民會議』做目前政治任務的中心口號與中國共產黨工農民主獨裁和蘇維埃口號相對抗。陳獨秀自來就不贊成採用蘇維埃口號。托洛斯基咒罵在武漢失敗後，採取此口號是犯了罪惡。不是別的，只是因為牠們認為蔣介石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現住所應有的任務只是召集國民會議來做議會

行動，合法運動，及『取得一些自由』罷了。這不是新的，仍是發展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的取消主義的大綱。

在這樣的取消主義之下他們自然要拚命否認中國革命高潮，用反對『盲動主義』來做阻止與破壞高潮的藉口。陳獨秀曲解列甯兩個波濤間的話來掩飾自己的取消主義，其實他在武漢失敗時就宣言革命在很近的將來很難再起。從他看來中國的事變似乎已經證實了他與彭述之的革命階段論：現在是南京政府穩定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長的歷史時期現在所有軍閥戰爭不過是資產階級發展的過程。托洛斯基在一九二八年就預言蔣介石制度的隱定。國民會義的口號就是建立在他所估量的中國革命低潮上面。

陳獨秀把自己裝做是革命勢力『保全者』極力咒罵八七以來共產國際與中共新的政策如何犧牲了幹部如何喪失了革命勢力，那麼我們首先看他在武漢政變時用什麼政策『保全』革命勢力；他同鮑羅廷規定投降的政策來『保全』革命勢力——自動退出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把一切革命領導權政權工農組織交給國民黨左派，用『適合工商業利益的政綱』同汪唐共同打到南京去。上帝呵！假若此時沒有共產國際堅決的出來打碎你們這一『保全』革命勢力的投降政策，還有今日布爾塞維克化的中國黨嗎？還能取得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之唯一的領導地位麼？你們自命為革命勢力的『保全』者和反對盲動主義的英雄，實際你們只是可恥的投降者，頑固的叛徒。再看你們七月會議的大

綱十一月的大綱（一九二七）以至中東事變後的大綱，難道你們革命勢力的「保全」者之假面具還不顯明麼？

七

陳獨秀現在全身投到托洛斯基的懷裏，用托洛斯基的旗幟來迴護他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來破壞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來進攻共產國際。他無恥的宣言他的錯誤是在所謂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領導之下做出來的。他宣言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的路線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及工農民主獨裁，而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是盲動主義的策略。他咒罵現在工農革命的高潮為「土匪式的擾亂」侵犯了資產階級的勝利「與穩定」，使他們國民會議和資本主義發展的計劃遭遇困難。他不要臉的誣蔑「國際的指導却在當進攻的時候教中國黨投降，當退守的時候教中國黨胡亂的拚命」。他認為一切罷工鬥爭，街上示威游擊戰爭都是盲動主義都是土匪式的擾亂。他不僅咒罵中國黨的領導機關為官僚主義他更咒罵「國際的領導站在官僚主義的路線上」。

還在武漢失敗時陳獨秀同鮑羅廷就說「如果說中國黨是犯了機會主義那末根本這機會主義就是季諾維也夫領導的國際教我們的，國際教我們加入國民黨教我們幫助蔣介石」。照陳獨秀的見解，加入國民黨就是「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

獨立性是鬼話」。這樣叛徒的思想難道是一九二三年國際教你們的？斷送上海暴動的勝利，對蔣介石卑鄙讓步與幻想，隸屬工人階級於民族資產階級之下，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工農運動的過火，以至向汪唐投降……難道這些是國際教你們的？現在你們的假面具要算完全揭穿出來了：你們根本否認工農民主獨裁的路線，認為機會主義的路線，因為這一路線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路線，是要建立蘇維埃的中國，保證他迅速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完全違犯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陳獨秀主義之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以陳獨秀同蔣介石汪精衛一模一樣的咒罵「共產國際破壞中國革命」。

八

中國革命運動中之有少數派路線和半少數派路線——托洛斯基主義——現在也如俄國一樣的，假如托洛斯基主義在俄國革命中表面上能維持一種與布爾塞維克對立的第三種路線和第三種派別，那麼在中國他（托洛斯基主義）一開始便與取消主義的陳獨秀主義完全混同，以與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路線相對抗。這完全是自然的因為一九二八年以後的托洛斯基主義已經從半孟塞維克的性質完全進到反革命。所以現在托洛斯基派與陳獨秀派在中國所進行的不止是「八月團結」而且立即進到「資產階級

「工黨」的地位這不是偶然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現在中國比八月團結時的俄國，階級鬥爭的劇烈與革命復興的狀況要不同些，現在的中國（一九二七年以來）階級鬥爭這樣的劇烈，與托洛斯基主義混合的陳獨秀主義以及托洛斯基主義的本身必然迅速進到社會法西斯蒂主義。陳獨秀派馬玉夫等在上海工人鬪爭中的工賊行為就表徵了這一社會法西斯蒂的前途——不是遠的將來的前途，而是目前的非常之近的前途。

這一社會法西斯主義必然成爲民族法西斯主義的補充和助手。

所以對於陳獨秀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就成爲中國共產黨最重要任務之一對於這種鬥爭的絲毫猶疑或調和態度就是幫助了反革命。

九

對陳獨秀主義的性質階級基礎以及其前途之不正確的了解就要弄弱對於他們的鬪爭。比如鮑羅廷在討論陳獨秀主義時（在莫斯科中國科學研究院）開口使說：「陳獨秀主義與西歐的孟塞維克主義有區別麼？我以為在業已走到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歐洲孟塞維克主義，與中國的孟塞維克主義之間是有區別的。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說他同歐洲的孟色維克是一樣的——這是不正確的。這個意義就是我們承認在中國已完成資產階級革命，而資產階級已站在政權上，孟色維克已在中國起社會法西斯蒂主義的作用。」

不能斷定中國孟色維克主義走到歐洲社會法西主義，因為中國革命的道路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是必不可免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所以說不上中國有資產階級的發展道路……所以陳獨秀與他的派別即中國少數派完全不要妄想他們與其歐洲兄弟——即帝國主義國家孟色維克起同樣的作用，換過說，中國孟色維克沒有任何前途』。

又有一個同志用書面這樣的寫着：『假如我們現在再提出一個問題：陳獨秀主義代表什麼東西，他的社會基礎怎樣？那麼我們明白看出一種回答，以為陳獨秀代表將來的中國社會民主黨——這是不正確的。社會民主黨有變成社會法西主義的傾向，有工人貴族做基礎，而且只有在財政資本和剩餘贏利發達的地方才有地位。以為陳獨秀和他的派別會成為中國社會民主黨那就會錯誤。因為要做出這樣的結論就須要設想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即開始第二個資本主義時代。照我的意見他的社會基礎就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他們一方面是自己的社會地位與中國資產階級，一部分買辦資產階級有關係的自由職業者學生等，另方面沒有脫離半封建地主的關係』。

上面的見解可以說是補充鮑羅廷的。他們做出陳獨秀主義與歐洲孟色維克主義的區別，在陳獨秀主義不會變成社會法西主義。主要理由是中國不是財政資本的國家，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工人貴族等等。這種不正確的區別和否認，不僅是建立在

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之機械的對照上面，而且建立在對於中國階級關係之不正確的
的了解上面。所以對陳獨秀主義的性質作用及其階級基礎就發生不正確的估量。

陳獨秀主義他在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鐵一般的證明是在中國工人運動內來執行中國
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無論陳獨秀及其派別的個人大都是由上面所引的城市
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出身；但當我們要正確的判斷陳獨秀的主義性質，作用及其代表的
階級基礎時我們就不得不：一方面指出他是在中國工人運動內來執行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
另一方面指出他是代表中國式的貴族工人（工頭及少數的高等熟練工人等）及一部分
被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影響包圍的落後工人。不指出這兩點就不能正確的了解陳獨
秀主義的性質及作用，也就不能正確的了解陳獨秀派與改組派及其他資產階級派別的區
別，和他（陳獨秀主義）的危險之更大。

陳獨秀主義代表中國式的貴族工人和被資產階級影響的工人，故自來就看不起中國
的工人階級的努力，而欲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利益之下。陳獨秀主義和歐
洲孟色維克主義在一切根本問題上——如階級關係，革命動力之不正確的了解（崇拜資
產階級，輕視無產階級與農民）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及政權性質等等沒有任何區別
；在工人階級內來執行資產階級的影響更沒有任何區別；代表貴族工人和資產階級影響
包圍的落後工人一點上也找不出嚴格的區別。毫無疑義的現在陳獨秀主義是隸屬於民

族改良主義下的社會改良主義（如四不主義，限制工人運動於部分的鬭爭，而反對工人的政治進攻，國民會議等等）。所以中國的孟色維克主義也如西歐一樣，必然要變成社會法西主義——而且正在變成社會法西主義。否認陳獨秀主義之社會法西主義的前進，就等於否認陳獨秀主義之孟色維克的性質。如果要在他們之間找區別祇能說中國孟色維克主義轉變成社會法西主義的速度比歐洲的特別快些。因為在中國發展社會改良主義至社會法西主義的條件遠不如西歐之具備。如果這一轉變在歐洲經過一個長時期的過程而在中國這一過程却是非常之迅速的。這不僅由於中國是殖民地的國家不能與帝國主義國家之資本主義的發展相比較，而且也是由於世界革命時期，尤其是中國階級鬥爭特別劇烈，不能容許中國資產階級工黨如歐洲社會民主黨一樣經過一很長的發展時期才轉變到社會法西主義階段，祇有在這樣的觀點上，不能籠統的說陳獨秀派完全同歐洲社會民主黨一樣。因為他的命運特別短促和不固定，他的發育特別困難。

以為指出陳獨秀主義必然變成社會法西主義——就是設想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這樣機械的可笑論證，完全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鮑羅庭主義近年以來顯然趨向於完全否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他把民族資產階級通看為買辦資產階級。鮑羅庭主義對於中國的階級關係又復活了彭述之主義的『新』解釋。

鮑羅庭主義否認陳獨秀主義之必然變成社會法西主義——這對於中國黨與陳獨秀主

義的鬥爭是很有害的。鮑羅廷主義是陳獨秀主義的兄弟。這一否認的意義就見辯證陳獨秀主義。

十

對於陳獨秀主義之狹義的不正確的了解也是很有害的。以為陳獨秀主義就是陳獨秀個人和其團體而與其他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以至現在還隱藏在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沒有思想上路線上的聯繫。所以為要充分的制勝黨內右傾的危險，現在主要的危險，必須充分的了解陳獨秀主義為中國革命中之孟色維克路線與各種已發生，以及正在發生的機會主義與傾向有密切的思想上的關係。我們單從陳獨秀的本身還不能充分了解陳獨秀主義，縱然陳獨秀自己在機會主義的理論方面和實際方面已做出整個的系統（如以上所述的）。我們必須更從中國革命中之已發生的各種機會主義派別，來觀察這一孟色維克的路線與系統。

首先來看戴季陶主義。他以民族利益為「最高原則」。換句話說，以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為最高原則，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之下；拚命的反對階級鬥爭，也無異是發揮一九二三年陳獨秀「只有民族鬥爭，沒有階級鬥爭」的原則。假若陳獨秀主義在五卅高潮時曾反對過戴季陶主義，那末從五卅末期和三月事變開始陳獨

秀主義在客觀上就成爲在中國工人運動中之戴季陶主義的執行者——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利益之下。一直到中東路事變陳獨秀提出的「反對誤國政策」的口號還是隸屬於戴季陶的最高原則之下。

再看彭述之主義。彭述之主義的特質就在用左的浮詞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來幫助陳獨秀主義進行把工人階級隸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口頭上很漂亮的叫「天然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實際上把革命領導權奉送於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彭述之主義的幫助，陳獨秀主義在黨內之宗法的統治與黨外實際機會主義的政策之發展不能那樣順利。

再看譚平山主義。他在戴季陶的最高原則之下宣佈「中國革命要得真正的成功，一定要以廣大的勞苦平民爲中心，聯合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構成民族階級與帝國主義作整個鬪爭才能實現。故中國革命充滿了階級性就是說中國革命的鬥爭，就是一種階級鬥爭，就是無產者國家與有產者國家的鬥爭。譚平山的民族階級和無產者國家，可謂把戴季陶的最高原則發揮盡致了。譚平山比戴季陶聰明些，他不反對階級鬥爭，只把階級鬥爭翻譯成爲「被侵略的無產者民族與侵略的有產者一種劇烈的階級鬥爭」。

陳獨秀比譚平山又聰明些，他現在率性用托洛斯基主義來防護中國不變爲塞爾維亞第二。

十一

最後不能不說到陳獨秀主義一個重要的伴侶——鮑羅庭主義。武漢時期鮑羅庭主義與陳獨秀主義混合爲一個東西，此處不用贅說。現在所說的，只是一九二七年後，鮑羅庭關於中國問題最近的見解和態度。

在討論陳獨秀主義時（在中國科學研究院），鮑羅庭宣言他在中國革命中的錯誤，在於他與陳獨秀之間發生了重大的政見，而他沒有把這不同的政見引到公開鬥爭；他宣言當時有廣東路線與上海路線的對抗；他的結論是：假若他的路線與陳獨秀的路線引起公開鬥爭，那就不會有武漢時期那樣的失敗。

不是一九二七年以後生長的人，大約不會相信鮑羅庭的話是真實的罷！然而不然，竟有同志公開出席替他辯護。可見鮑羅庭主義在我們黨的隊伍中直到現在不是沒有保留重大的影響和殘餘。這一殘餘保留在黨內終於有復活陳獨秀主義的危險。所以在反陳獨秀主義的鬥爭中決不能把鮑羅庭主義除外。

鮑羅庭在中國革命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假若說陳獨秀是中國的蒲蘭德爾，那末，鮑羅庭就是中國的拉狄克。所以他對於我們黨內同志的影響不是值不得注意的問題。

首先看他對於中國階級關係的新見解：

「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相互關係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當時剝斷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經紀地位的，是以皇帝爲首的高等官僚貴族……；第二個時期……；即你們所知道的買辦階級……；最後第三個，就是現在我們所處的時期，這一個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已在排擠第二時期的中間人，排擠買辦階級而開始與帝國主義發生各種相互關係」。

「……資產階級企圖廢除不平等條約，不外是企圖在中國創造一種條件，在這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更能密切與帝國主義聯繫。不僅在各大商埠條約上給他與帝國主義聯繫的可能，而且在全中國。換說一句即爲帝國主義肅清在中國道路上一切的障礙，實現買辦性質於新形式中，在新環境中，於極廣大的範圍中」。這在鮑羅庭主義的信徒看來，要算是極革命的極響亮的高調了。看他的下文說些什麼呢：

「講到這一點還必須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完全是另外一個程序的資產階級，就是這樣的資產階級。他要把中國工業化的大道上的障礙物掃除，準備同國內的封建勢力以及與封建勢力勾結的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然而我們所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資產階級」。

「當我們說到民族資產階級還極弱時，我們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不是指企圖剝斷中國與帝國主義間之經紀地位的資產階級，但是有點工業資產階級傾向的民族資產階級，那末我們就應當說這種資產階級現在還不能引導中國到工業發展的道路上去，因爲這種

資產階級現在還極弱』。

原來鮑羅庭主義把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同化之後，還保留一『不企圖壟斷中國與帝國主義間之經紀地位，準備同國內封建勢力及與封建勢力勾結的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極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現在還極弱還不曉得把中國引到工業發展的道路上去。而其將來怎樣呢？這點他雖沒有明說，但讀者不難從他的觀點做出結論，就是從鮑羅庭主義的中國階級關係的觀點非走到復活『民族資產階級還有革命作用』的機會主義不止。

鮑羅庭接着上文就來估量無產階級：

『這種資產階級在中國現在是極弱的。由此就可明瞭中國無產階級也充分的弱，數量太少，他的年齡，總共不過幾歲。他的基本羣衆不在中國內地，而在租界，完全與中國隔離的香港一類的地方。在香港，上海，天津，和漢口你們有工業無產階級基本羣衆，而在中國其他各地，工業無產階級在真正的字義上是很少的』。

鮑羅庭新的『租界無產階級論』的論證仍然回復到自己老的西北主義的結論，就是遷居上海，香港等租界之中國無產階級很難領導中國的農民，中國革命很難憑靠大城市的領導。所以在反動下，職工運動的工作沒有什麼前途，唯一重要的是農民遊擊戰爭的領導。中國全體共產黨都要加入遊擊戰爭，如歐洲共產黨全體參加工會工作一樣。鮑羅

庭主義的根本精神，自始至終，如陳獨秀主義一樣，懷疑與不相信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鮑羅廷主義不僅不相信中國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領導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中國革命之可能。他說：

「中國無產階級的缺點，在數量上，年齡幼稚上及其他方面，這些缺點之百倍的補償，就在不能把中國革命，中國無產階級從其他世界分開。假若拿中國無產階級從印度無產階級，和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特別蘇聯的無產階級分離起來，那末，自然不待說對於指導基本聯盟的農民他要遭受莫大的困難。假若中國無產階級是分離的，那末就很可能懷疑到他是否能成就擺在他前面的偉大任務，即關於指導農民與封建殘餘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等等。但假若拿他與印度無產階級，各國無產階級，特別蘇聯無產階級共同來看。那末中國無產階級之必不可免的歷史的缺點就百倍的補償起來了。從這樣的觀點看來，中國無產階級較強於中國資產階級。」

這是多麼漂亮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呵！托洛斯基不相信俄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鮑羅廷却比較更進一步不相信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有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中國革命之可能。

中國革命之社會主義轉變和社會主義的建設之必須依靠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幫助，尤其蘇聯的幫助，這是毫無問題的；中國革命之須要國際無產階級幫助也是毫無問題的。

可是照鮑羅庭的觀點，就完全是不對的。從列寧主義的觀點，中國革命不僅有自己充分的力量，而且他能促進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以及東方各殖民地革命；中國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強有力的理由，不僅在於與國際無產階級聯合的觀點上，而尤其在中國內部階級勢力之對比上。鮑羅庭主義完全與列寧主義相反，從他自己的階級關係的分析，他斷定中國無產階級比中國資產階級更弱些，只有在與世界無產階級聯合的觀點上中國無產階級較強於資產階級。所以他把中國革命的命運完全建立在國際無產階級的依賴之上。

鮑羅庭主義的信徒以為鮑羅庭同陳獨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鮑極看重農民勢力，着重游擊戰爭；縱然他在武漢時期與陳獨秀共同阻止了土地革命，而現在他却與陳獨秀「根本」相反，他「異常」看重土地革命。現在來看他對於農民問題的政見：

「現在說到農民方面。與農民的關係的問題，必須指出下列的根本要點：一、不是真的在中國鄉村中已發生這樣的階級變遷，其結果已使富農分化，而這富農已同着資產階級組成南京的政權，所以需要與富農鬥爭。我不否認中國鄉村有富裕的農民之存在。但是應當說明富農是什麼，其意義就不能如我們（指蘇聯——森註）所了解的。一樣，不能搬運革命以後的我們所有的富農觀念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國所有富農的觀念上去。這個不是一樣的富農。說到中國農村，那就必然須要一個全體農民的共同民主

的戰線去反對封建制度，反對軍閥制度，反對一切封建基礎的上層建築，反對帝國主義等等（以下大大地引證列甯——森註）。土地革命在中國只有憑靠在中國農村的統一戰線上才有可能。

此外關於國際狀況，他做了以下的肯定：「無論怎樣還沒有牢不可破的論證，證明在最近的將來，在太平洋上美與英日就發生武裝衝突。美在中國將採取最謹慎的政策」。

上面一切的話都是從羅鮑庭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之「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名的大報告中引出來的。這是新的變態中的機會主義的大系統，是西北主義之繼續發展：在中國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上——階級關係無產階級領導權對農民的策略及革命前途等——是與共產國際和列甯主義的路線不能並存的。假若拿了現在的鮑羅廷主義與一九二七和一九二九年以及一九二三年的一切機會主義去對照，便可看出中國革命中孟色維克路線之一貫的綫索。這一路線的中心點，是在對於資產階級的態度和對於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統一戰線之孟色維克的了解：從隸屬無產階級於資產階級（武漢時期以前），做小資產階級上層領袖的尾巴（武漢時期）以至聯合富農。假若陳獨秀在一九二九年用托洛斯基觀點來攻擊中共中央之業已改正的聯合富農的錯誤，那末鮑羅廷在同年就全國恢復以前鄉村聯合戰線的機會主義策略與譚平山的「民族階級」和統一戰線的理論內

外相應。由此不難推想：假若中國共產黨真正執行反富農路線到底時，陳獨秀主義便會同鮑羅廷主義一樣暴露其代表富農的真面目。

十一

陳獨秀主義一直到今有他的三個不可分離的機會主義同盟：即彭述之主義，鮑羅廷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彭述之主義早已喪失其獨立的影響，因為一方面他早已溶化於陳獨秀主義，另一方面鮑羅廷主義已攝取了他的精神。所以現在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廷主義實成爲陳獨秀主義左右之手。假若陳獨秀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的共同點在忽視土地革命，忽視農民爲革命的動力及不了解工農民主專政；那末陳獨秀主義與鮑羅廷主義的共同點就在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勢力與領導，輕視中國革命之內部的階級力量，及把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解爲隸屬於資產階級——自民族資產階級以至鄉村資產階級的通常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與陳獨秀主義的堅決鬥爭，同時就要求打擊他的左右手，——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廷主義。

公開的陳獨秀派和托洛斯基派在表面上現在雖然已驅逐於黨外了，但他暗藏在黨內的影響，特別是他的友軍鮑羅廷主義的影響還很嚴重。不少可愛的同志在思想上還不能完全從他的影響中解放出來（如對於富農，對於階級關係，職工運動和遊擊戰爭之不

正確的了解等)。這樣的現象在反陳獨秀主義的鬥爭中決不應當忽視。爲要澈底肅清陳獨秀的主義在黨內的殘餘，就要求這些同志在以後能自覺的與陳獨秀主義的同盟者鮑羅庭主義在思想上完全脫離關係。不然，黨就應該作不客氣的鬥爭。

十三

與「陳獨秀主義鬥爭的任務，尤其要執行於一切實際工作，羣衆工作，黨的生活及一切目前所發現的各種各色的不正確傾向的鬥爭之中，一切尾巴主義，黃色傾向失敗情緒，合法主義，和平發展傾向，黨內調和傾向，盲動情緒，保守觀念，極端民主化等等，如若任其發展都可變成陳獨秀主義的支流；隨時隨地制勝這些傾向，其意義就是制勝陳獨秀主義。中國革命中和我們黨中的危險現在主要的是右傾的危險。譬如富農路線的錯誤，在上級指導機關，雖然改正，但在實際工作上和在下級黨部中，嚴格的說，還是沒有改正過來，有些地方還正在發展。反對農民分土地，固然是富農路線，同時就是在分土地之中也發現了富農路線——如閩西分土地定出以生產工具及資本爲標準，顯然的是富農路線；同時在閩西蘇維埃區域中「不要增加工人工資」之不正確的提議也開始發現。

爲要制勝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首先要要求對於革命的性質，目前階級關係的變遷，

及革命發展的形勢有正確的了解和估計；對於這些主要問題的絲毫錯誤都是幫助了陳獨秀主義。托洛斯基主義幫助陳獨秀主義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誇大資產階級，看不見封建殘餘勢力，因此完全忽視土地革命；而事實上是企圖幫助資產階級來建立他們所「夢想的穩定」去實行國民會議制度；鮑羅廷主義幫助陳獨秀主義停留於他所了解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階段；誇大封建勢力，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企圖貫徹把中國革命隸屬於資產階級利益之下的路線；即把以前隸屬於城市資產階級的路綫變成隸屬於鄉村資產階級的路綫。這一孟色維克路線的危險在目前是非常之有害而帶現實性的主要危險。陳獨秀的根本立場，就是要利用托洛斯基主義的遮飾來實現這一孟色維克的路綫。在托洛斯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鮑羅廷主義，兩者都絕對沒有目前階級關係和革命任務的正確觀念，尤其兩者都絕對沒有革命轉變的觀念——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念。

我們有些同志在反對陳獨秀主義的過程中，常常發現托洛斯基主義的錯誤觀念，或鮑羅廷主義的錯誤觀點，尤其是後者佔多數。常常有人把反對富農的路綫與反對地主的路線對立起來，常常不了解在中國土地革命中之反富農是同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之反資產階級的總路線是一致的；常常有人過於誇大封建勢力而完全否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因此，又隱隱的發現復活以前的兩個革命階段論的傾向而完全忽視革命轉變

的觀點。這些都證明右傾是中國共產黨目前之主要的危險之表徵。他們不能正確的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及過程：當他們「嚴格的」區別革命的性質及任務時，便連革命的過程——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時，也把他完全劃成鴻溝，以爲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有一道「萬里長城」（陳獨秀主義和鮑羅廷主義就是這樣看法）；或則完全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而不自覺的墮落到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這種「右的」錯誤實際是幫助了陳獨秀主義。

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雖然是長的過程，但有快的速度之可能，因爲他具有很優越的轉變的條件——國際的和國內的。國內的條件，如一九二七年以來，無產階級取得了中國之唯一的革命領導權；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蘇維埃區域之建立，無地的貧農，僱農，苦力以及地少的中農佔鄉村人口之絕對多數；城市大工業具有相當的經濟前提，（此前提在工農民主專政的過程中更會大大的加強）；最後尤其是中國革命之反帝國主義的特性，和反資產階級的特性，——自城市資產階級以至鄉村資產階級。中國農民基本羣衆已在而且正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反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國際的條件，如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之大工業化與農村的集產化之異常迅速的發展，歐美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及印度等殖民地民族革命之高漲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資本「穩定」不僅劇烈動搖而且開始崩潰。這些條件對於中國革命轉變到社會主

義革命都有決定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應堅決的明確的站在列寧主義和共產國際的路綫上，來執行中國革命目前階段上的任務，同時準備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前提。他絲毫不爲企圖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左的』機會主義托洛斯基主義所動搖。同時，更絲毫不爲企圖停留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右的』鮑羅廷主義所動搖。他一定要澈底的克服陳獨秀主義及其左右手的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廷主義；他一定要領導現在的革命高潮迅速進到直接革命形勢，推翻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中國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由工農民主獨裁轉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獨裁制。

打倒陳獨秀主義及其左右手——托洛斯基主義和鮑羅廷主義！
全體黨員站到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路綫上來！

~~~~~  
(完)  
~~~~~


反列寧主義的布哈林

少 林

(一) 聯共黨內的右傾問題

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應該要明瞭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黨內的右傾份子如布哈林的言行，離開了黨的總路線，反對黨的策略。現在蘇聯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的機會主義。這右傾的機會主義，在蘇聯問題上，有些什麼主張呢？簡單的說來，就是他們主張在鄉村中不要阻礙富農經濟的發展，彷彿允許了富農的自由發展，富農就會送麵包來給我們吃的。右派忘記了富農是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我們不能去增加我們的敵人的力量，而削弱自己的工人階級！如果黨採取了右派『贊助富農的方針』，那末，富農在鄉村之中，可以成爲全國糧食的主人，而且可以引導農民走到資本主義的道路，剝削農民羣衆，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右派不懂得祇有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則上，去改造鄉村經濟，是使蘇聯消滅『糧食困難』的唯一出路——領導中農貧農的羣衆，實行『集體農莊』運動，鞏固『集體農莊』經濟，並且設立許多蘇維埃農莊，進攻富農，以至消滅富農——只有這樣，才能改造幾百萬農民經濟，保證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

右派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害怕困難，害怕階級鬥爭的劇烈，認為在鄉村中進攻富裕農民，排擠資本主義成份，是不對的，應該向富農採取讓步的政策。

富農用各種方法反對集體農莊運動，而稱讚個人經濟的好處。爲什麼？因爲集體農莊剝奪了富農剝削農民的可能。右派却首先不贊成黨特別去注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政策；他們說，「農民羣衆不會加入這些集體農莊的」。右派不願意承認，小的個人經濟，已經不能保證，不能夠改良貧農中農羣衆的狀況，只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可以比個人經濟，有更高度的生產。

富農不願意出賣麵包給蘇維埃政府，要使城市工人受餓。所以，蘇維埃政權和農民基本羣衆，親密的聯合着，對於富農，投機商人以及一切私藏糧食的人，採取「強迫」的政策。富農當然是不得意的。右派也是不得意的。右派說：不可以「強迫」富農。富農要求國家准他們自己定出糧食的價格；右派也說：應該定出高一點的糧食價格。右傾反對派向富農讓步的觀點和他們所提議的實行辦法，正是幫助富農，幫助鄉村資產階級，而對於無產階級是不利的。

右傾反對派對於農村經濟方面的觀點是如此。至於說到工業方面，右派雖然不敢公開反對蘇聯社會主義進攻的政策，可是他們不贊成黨採取生產速度加快的辦法。他們認為這種速度，彷彿是蘇聯所不能勝任的。他們不能夠懂得，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

，應該趕快加緊的進行，應該用全力在最短時期內，趕上資本主義的國家，並且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程度。——這種「趕上並且超過列強」的口號，是列甫所提出來的。右派因此不同意「五年經濟計劃」，認為應該要減少對於城市和鄉村的資本主義成份的進攻。

右派對於國際政策方面，他們看輕資本主義營壘的內部矛盾的劇烈，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世界，正在改造，資本主義穩定，可以鞏固，他們只看見資本家的勝利，不看見工人羣衆的左傾和革命運動的高漲。用不着說，右派的觀點，是列甫主義路線的仇敵，他們曲解列寧主義。過去的一年，完全證明了右傾反對派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實際的經驗，已經打碎了右傾反對派的預言，說黨的政策是要破產的；並且證明黨是執行了正確的列寧主義的路線。現在，不但以前那些黨內的懷疑派（右傾分子）要承認，甚至於外國資本家的新聞記者和專門家，也不得不承認蘇聯農村集體農莊的力量，承認蘇聯採取的五年經濟計劃，是一定可以實行，而工業化的速度，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成績了。

右傾反對派是農村中上層資產階級和富農羣衆的情緒和希望的傳達者，他們不願意放棄反列甫主義的觀點，他們停留在派別行動的道路上，在黨內組織自己的小組織，向黨的路線作鬥爭。

右傾反對派的觀點，表示得最完備的，就是布哈林。布哈林同志在黨內有很大的功勞，例如他反對過『列寧格勒的反對派』（加米聶夫，季諾維夫等），托洛斯基派（所謂托季反對派聯盟），曾經幫助黨的路線，做過劇烈的鬥爭。同志們應該要注意：在不久以前，布哈林同志還很有力的很堅定的反對『托季反對派』，而現在忽然自己跑到『右傾反對派』方面，——這種變化不是偶然的，不是沒有『準備』的。布哈林在和托洛斯基派鬭爭的時候，就提出『大家發財』的口號。當然，黨不能接受這個口號，斯大林同志直接說這個口號不是我們的，不是布爾塞維克的。布哈林的口號與列寧主義的路綫，是不同的。如果不糾正布哈林的許多不正確的觀點，那末對於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等，一定有極大的害處。青年的黨員還沒有知道：布哈林還在與托洛斯基派鬥爭以前，就是在一九二三年以前，已經屢次反對過列寧的意見，他的根本觀點，是和列寧主義不相同的。

在與托洛斯基派鬥爭的時候，托洛斯基派的信徒，尤其青年，知道了托洛斯基從前向來沒有在多數派方面，而是在少數派方面的，他曾經屢次向列寧主義和黨的政策，做過鬥爭，這樣，他們就拋棄了托洛斯基主義。當時聯共提起了托洛斯基從前的行動，去和托洛斯基取消派鬥爭。現在我們爲着幫助中國黨，也必須重新提起布哈林從前屢次違背列寧主義的錯誤和傾向。

因爲布哈林像從前一樣，他又動搖了，因此，必定要提出他舊的錯誤，方才更使我們明白他現在的錯誤。使我們知道：他的離開黨的路線，並不是偶然的。

(二) 布哈林對於戰爭問題和民族問題的錯誤 (1914—1919年)

一九一四年歐洲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布哈林就和列寧有不同的意見，當時布哈林在戰爭問題上，是反對列寧和俄國共產黨中央的政策，列寧以爲當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就是把這個戰爭變成推翻地主資本家的革命；應該把各國工人相互殘殺的武器，掉轉頭來去反對各國的統治階級。『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這是在戰爭的時候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的口號，當時布哈林雖然沒有顯明的反對這一口號，但是，他同時提出『和平』的口號（和當時還沒有加入黨的托洛斯基一樣），他提出這『和平』口號，事實上是削弱，模糊『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是一個新的號召羣衆推翻剝削階級的革命的口號；如果只是簡單的說『不要戰爭，大家和平罷』，那末，這就等於把工人階級往後拉，世界大戰以前，也曾經有過和平的時期，當時資產階級是『和平的』剝削了工人階級好幾十年，——現在只說，『大家和平罷』，豈不是請各國資產階級回過頭去再來『和平的』剝削工人麼？。這種口號，絲毫沒有革命意義，絲毫沒有無產階級的氣味。

因爲一切普通的人民，甚至於市僧，他們都害怕戰爭，亦會要和平而反對戰爭的，這種簡單的宣傳『和平』，是轉移工人階級的注意力，使工人階級不能專心一致去鬥爭，以達到變戰爭爲革命的目的。所以列甯說：這是『牧師式』的不革命的口號，簡單的宣傳和平，亦是欺騙工人的一種方式罷了。其實就是資產階級自己，等到打仗打弱了的時候，也會高叫『和平』呢！

說到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無產階級應當希望『自己的』國家失敗的問題（所謂失敗主義），布哈林又和列甯是不同意的。失敗主義是什麼呢？——如果『自己的』政府失敗了或者削弱了，這對於革命的無產階級，要實行推翻俄皇專制政府的無產階級當然是很有利益的。因此無產階級是要『自己的』政府失敗的。對於俄皇政府愈不好，對於俄國工人階級也就愈好。列甯說：『否認這失敗的口號，就是假革命』。布哈林却曾經反對這一點；這和當時的托洛斯基派又是相同的。托洛斯基派，和其他的半社會主義者半國際主義者一樣，他們當時口頭上反對戰爭，贊成國際主義，事實上，他們對於真正革命的口號和鬥爭，却是反對的。布哈林在戰爭初起的半年之中，堅決主張黨應當和托洛斯基接近。當時俄國的黨，對於這幾派的态度，却是很小心很謹慎的，這才是正確的态度。

一九一五年二月，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的國外組織，在瑞士白恩地方，召集了國外會

議（這就是所謂白恩會議），布哈林在這次會議上，堅持他自己的政綱，反對列寧。

但是，白恩會議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列寧指出布哈林這種觀點的錯誤，他說：『戰爭把布哈林推到半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方面去了』。譬如布哈林勸告工人說，——在資產階級政權統治之下，政權還沒有轉到無產階級手裏以前，——各個單獨的工人團體，可以去奪取已經關閉的工廠和糧食的倉庫，他並且認為這種奪取的辦法，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其實當時應當使工人階級的全部力量，首先注意去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如果不是這樣，那就要分散工人階級的力量，而使工人階級的任何勝利，都不可能。而且照布哈林的意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產階級沒有奪取政權以前，就可以實行社會主義。因此，列寧批評布哈林的這種觀點，說他是『蠢到萬分，是半無政府主義的』。因為只有無政府主義者，是這樣不懂得國家政權的意義和作用，所以列寧不得不很激烈的反對布哈林。

照理說，布哈林在白恩會議之後，應該要放棄他自己的錯誤觀點，整個的站到中央路線上來。但是幾個月之後（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布哈林和列寧之間，又發生了不同的意見——而且是非常之嚴重的，就是關於民族自決權的重要問題。布哈林認為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例如中國印度等，爲着自由和獨立而鬥爭，都是用不着的。他沒有看見這些國家的鬥爭，是在動搖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而且這也是無產階級

反對資本主義的，也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輔助的力量。尤其在俄國，對於民族問題，有更重大的意義。例如烏克蘭，波蘭，芬蘭等等是在沙皇壓迫之下的。如果不去爲民族自決權而鬥爭，那末也就不能夠爲社會主義爲民權主義而鬥爭。列寧說：『如果社會主義者，不去爲着烏克蘭，波蘭，芬蘭等民族自決的自由而鬥爭，那末這種社會主義者，就簡直是背叛民權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幫助了俄皇』。

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夠不管民族運動，決不能夠宣傳工人，要他們輕視那種反對俄皇帝國主義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他們這種所謂『馬克思主義者』說，『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我們不管什麼民族自決權的鬥爭，我們的工作，只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這簡直是世界革命的叛徒的鬼話。這是看不到中國印度等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對於共產主義的鬥爭，是有極偉大的意義的。大家要很清楚的懂得，我們工人應該對於這些鬥爭，表示極大的同情，應該用各種方法，去幫助這些鬥爭。布哈林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曾經反對過『民族自決權』的口號，這就是他間接的幫助了帝國主義。因此，列寧直接指出布哈林的觀點，是『非布爾塞維克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如果照布哈林的意見，那末，蘇維埃共和國，任何時候，也不能解決民族問題。布哈林在歐戰的時候，對於民族問題的策略，表面上是很『左』的，很『革命』

的』，但是在實際上，是暗中藏着右傾的『實質』。布哈林講的話。似乎是比较更『左』些，更『革命』些，但是實際上，很顯明的，恰恰上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當，因為他的政策，一點也沒有妨礙帝國主義，去壓迫殖民地和弱小民族。

我們不要以為布哈林和列寧之間的分歧，只不過在歐戰的時候，以為他在十月革命之後，就拋棄了自己的錯誤。事實上，甚至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布哈林還是堅持自己的錯誤。在十月革命之後的一年半中，他又改變形式，在俄國黨的第九次大會上，企圖反對民族自決權的口號。因此，列寧又詳細解說布哈林的錯誤，并指出在蘇維埃共和國裏，革命的無產階級尤其不能夠反對這個口號。列寧用波蘭問題來做例子。波蘭的人民，被俄皇壓迫了一百多年，因此波蘭的一切人民，甚至於工人之中，都有不信任大俄羅斯人的情緒。說蘇維埃的俄國，表面上是共產主義的旗幟，實際上也和俄皇一樣，要來壓迫波蘭的人民。布哈林提議，說我們用不着承認民族自決權，等於幫助和鞏固波蘭勞動羣衆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情緒。只有承認民族自決權是正確的的政策，才能夠澈底的消滅波蘭勞動羣衆不信任無產階級國家的態度，——這才表示無產階級的國家，和從前壓迫過波蘭的『俄羅斯』是不同的。

(三) 布哈林對於國家問題的錯誤

歐戰的時候，布哈林對於國家問題，又和列寧發生分歧。一九一六年布哈林替國外的「青年雜誌」做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許多錯誤。列寧說，在這些錯誤之中，有很重大的錯誤，就是模糊了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關於國家問題的分別。布哈林「抹殺」了他們之間不同的地方，而自己走到半無政府主義方面去了。在布哈林的結論中，認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者也應該像無政府主義者一樣，否認一切國家，對於一切國家都要仇視，一切國家都是不能利用的，因此，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不能得到明確的觀點。列寧向布哈林這樣解釋：「社會主義在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中，是贊成利用現代的國家及其機關的；同樣，在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亦贊成利用國家，做一種特殊的過渡方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種過渡的方式，而無產階級專政，亦是國家呵」。

列寧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認為戰爭要產生革命，已經是沒有疑問的了。既然到了無產階級革命，到了移轉國家政權到工人階級手裏的時候，那末，黨對於國家問題，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應該有完全明確的觀點，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而且，當時最出名的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正在曲解馬克思關於國家問題的學說，使這種學說，能夠適應資產階級的利益。布哈林對於這些問題，都沒有完全清楚的懂得；第一，他不懂得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長期過渡時期中，無產階級正需要

有自己的無產階級的國家；第二，他不懂得需要無產階級的專政，不但是爲着要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且還爲着要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因此，一九一七年列寧說：『在反對考茨基主義的鬥爭中，布哈林的錯誤是能夠亡黨的！』

這樣，我們可以看見，在歐戰的時候，布哈林對於極重要的許多問題，曾經有過很危險的動搖；所以列寧不能不對於布哈林有這樣的批評：『布哈林在政治上是非常不穩定的』。這裏批評的確是無爭論的。隨後還有許多事實，證明這種批評，的確是極端的正確。

（四）布哈林對於黨綱問題的錯誤（一九一五——一九一九年）

蘇聯共產黨的舊黨綱，分做兩部分：一是最高限度黨綱，二是最低限度黨綱。最高限度黨綱，說明我們最終目的，——社會主義；最低限度的黨綱，敘述最近期間的要求，這些要求，還沒有說到社會主義，而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之內，可以實現的要求。換一句話說，當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最高限度的黨綱，但是，當政權還在資產階級手裏的時候（譬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我們要提出許多要求，例如祕密投票的普選權，公民個人的不可侵犯權，消滅等級，教堂與國家分離，學校與教堂分離等等。從一九一五年起，

布哈林表示要取消最低限度的黨綱。列寧當時知道了一個英國的社會黨，也要想取消最低限度的黨綱；因此他就站在擁護最低限度黨綱的觀點上，說「布哈林亦是在這個問題上，受了引誘犯了錯誤」。二月革命之後，布哈林又表示黨應該把最低限度的黨綱取消，列寧反對他說：我們首先要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然後再來說取消最低限度黨綱的話！現在我們既然還沒有奪取到政權，政權還在資產階級手裏，那末，我們不能取消這個最低限度的黨綱。『因為說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之內，我們一點不要向資產階級要求，一切都要靠自己來實現，用不着做瑣碎的小事，——那就等於空洞的誇大狂』！『我們的勝利，現在還沒有達到，我們的頭腦，却已經沒有了』！工人階級沒有達到最後勝利以前，要克服很多困難，在這個過程中，有失敗和退却的可能，我們要很堅決很不動搖地達到我們的目的；現在既然我們還沒有達到勝利的目的，那末我們就不能以為自己似乎已經勝利了。這樣輕意的取消最低限度黨綱的主張，是犯了誇大狂。列寧的意思就是這樣，他用以下的格言來提醒布哈林。『去打仗的時候，不要誇口，打完了仗再誇口』。

一九一八年蘇聯共產黨第七次大會和一九一九年第八次大會上，爲了黨綱問題，列寧又和布哈林鬥爭，布哈林提議在黨綱的理論部門中，只要敘述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列寧認爲應當敘述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從資本主義極簡單的

形式起，一直到帝國主義階段為止，換一句話說，不但要像布哈林那樣，只看見資本主義的最高最複雜的帝國主義階段，有銀行交易所大企業股分公司等等的階段，而且還要看見極簡單的資本主義，——從小的農村經濟，小的商品生產裏，每天每小時所生長出來的資本主義。

黨綱裏必須指出簡單的資本主義形式，這是因為要明白的提出農民的經濟性質和我們對於農民的政策。農民裏面的富農，正是從糧食買賣的投機，從小商業裏的盤剝等方法中，生產出來的，這種投機事業和一般的商品買賣，亦是資本主義呵！布哈林恰好不懂得這種明白指出簡單的資本主義的必要，所以列寧說他對於黨綱問題的主張，是『書生式』的主張。

（五）在白萊斯德和約時期的左派共產主義（一九一八年）

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工人階級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使俄國脫離帝國主義的戰爭。破產的窮困的蘇聯，在那時候，再也不能夠繼續戰爭的了。兵士已經受苦了三年，軍隊完全沒有戰鬥力了。兵士在十月革命中，贊助工人，正是因為希望蘇維埃政權快些給他們和平。如果蘇維埃政權，不顧到幾百萬兵士的情緒，——這幾百萬兵士中，大多數是農民，——而還要繼續戰爭，那末，蘇維埃共和國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

因爲軍士上的優勢，無條件的是在德國帝國主義一方面。德國帝國主義靠了自己的軍事力量，向蘇聯提出極苛刻的講和條件。當時蘇維埃共和國，就應該選擇一下：還是在繼續戰爭呢？——再繼續戰爭，是一定要滅亡的；還是承認極苛刻的，極不利於蘇聯的和約，可是這可以給國內人民歇一口氣，去準備新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在這種情形之下，列寧是很堅決的主張：不管怎樣的苛刻的和約，是應該與德國講和的，這是救濟革命的唯一方法。當時，蘇聯的命運，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布哈林同志，自稱爲『左』派的共產主義者，主張要『實行革命的鬥爭』，而很激烈的反對列寧，用各種方法，企圖破壞列寧的講和政策，要拉蘇聯去戰爭。在這裏，我們應該要記得：當時一切資本家，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也要想把他們所痛恨的蘇聯，拉到戰爭中去，以達到消滅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當時無產階級利益，是要講和，資產階級利益，却是要戰爭。所以列寧說：布哈林贊成鬥爭的『左傾主張』是上了資產階級的當。當初列寧在中央委員會上，是占少數的，——贊成列寧的只有斯大林，季諾維夫等，其他大多數，是贊成布哈林和托洛斯基的。

托洛斯基對於德國和約的回答是這樣：『戰爭，我們是並不實行；和約，我亦不簽字；軍隊可以解散』。布哈林同志贊成托洛斯基，認爲德國軍隊是不會來進攻的。於是，那時候的中央中間，是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主張勝利了。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

政策，得到了極壞的結果。在白萊斯德地方，德俄講和會議上，托洛斯基聲明：「戰爭，我們是不要；和約也用不着要簽訂」。德國帝國主義者，聽見蘇俄政府的代表（托洛斯基），這樣聲明，就立刻下令進攻。那時候俄國已經絕對沒有組織有戰鬥力的軍隊，就大大的恐慌起來，各地方的戰線，都崩潰下來，兵士羣衆，亂七八糟的退下來——喪失了幾千尊大炮，幾千萬財產。托洛斯基布哈林的政策，結果是：在幾天之中，使蘇聯到了將近消亡的地步！在蘇聯軍隊失敗以後，列寧才在中央得到了一個轉機，決定要簽訂德國的和約（布哈林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還是投票反對列寧）。當然這個和約的條件，比失敗以前更要嚴重了，更其不利於蘇聯了。可是，簽訂白萊斯德和平會議的條約，始終是救了蘇聯的滅亡。列寧寫道：「事實告訴我們，布哈林否認德國進攻的可能，在事實上是幫助了德國帝國主義。新和約的條件，比以前的「更不好，更嚴重，更可恥了」這都是我們的可憐的「左派」的不好啊」。

布哈林當時反對列寧，企圖堅持自己的「左」的主張，是幫助了資產階級，削弱了無產階級，列寧寫得很對：「如果照布哈林的政策去做，當時就是有好的革命，也要弄到滅亡呢！」

在這時期中，布哈林很激烈的反對列寧和列寧的策略：布哈林退出中央委員會，進行自己的小組織，目的是要破壞列寧所實行的政策，他出版了小組織的報紙，在這報紙

上，特別攻擊列寧個人。布哈林在大會上，受着了失敗：他在這大會上，做了副報告，反對列寧的報告，可是大會上大多數，都贊成列寧，反對布哈林。大會之後，布哈林應當服從決議，去進行黨的路線了。可是他仍舊繼續他的小組織工作，在這一時期中，布哈林的行動，很明顯的是有分裂黨的企圖。當時布哈林一派，提出辭職，退出黨的中央委員會，退出政府，列寧就簡直不客氣的說：這是布哈林派的分裂政策。但是，當初被布哈林的革命空談所吸引的工人們，很快的明白「左派」共產主義的一切錯誤，拋棄了布哈林的小資產階級的所謂「左傾」政策。因此「左派」的領袖變成了「沒有軍隊的將軍」，——他們的分裂政策，沒有能夠實行。從布哈林登載在自己小組織的「共產」報上的文章裏面，就可以推想到當時列寧所受着的，是何等重大的攻擊，照布哈林說來：列寧對於戰爭和講和問題的立場，是「機會主義的立場」（就是說，這是妥協的，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益的立場），這是「絕無關欄的空談，可以斷送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近視眼的策略」「機會主義的空談」。我們尤其應該要指出來的：是布哈林把列寧和德國少數派考斯基去比較。考斯基在口頭上是革命的，但是在事實上是實行妥協政策的，照布哈林的意思，「列寧在實際上，是重複了考茨基的錯誤」。在歐戰的時候，考茨基對於帝國主義戰爭問題，做了些什麼錯誤呢？他「是反對革命，蒙蔽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並且轉移工人階級的注意力，使他們不

注意那反對帝國主義的艱難困苦的暴動戰爭」。『列寧現在也犯了反對革命的……錯誤』！列寧在布哈林的『左派』『共產』報紙上，受到這樣重大的攻擊。

在一九一八年，列寧與布哈林之間不同意的問題，不僅僅限於戰爭和和約問題。就是在蘇聯國內政策，蘇聯的經濟改造中主要問題上，布哈林與列寧的意見，也是不同的。布哈林和『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列寧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計劃，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彷彿不能夠與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并存的。他說，列寧的思想是『妥協的』。他反對利用資產階級的工程師專門家，來做恢復俄國經濟的工作，他不相信無產階級有能力去指揮他們替社會主義工作；他反對工廠裏實行勞動紀律，認為這是束縛工人的政策；他又反對每一職務中的『個人負責制』。在這許多情形之下，布哈林和『左派』的共產主義者，實行反對多數派的列寧主義，而去與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攜手。這就證明了布哈林同志和所謂『左派』，是實行了小資產階級的策略，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他們所宣傳的觀點，實在就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觀點。

一九一八年『左派』反對黨的鬥爭，走到怎樣的程度呢？看看當時社會革命黨左派，很正確的看到『左派』共產主義者的觀點很接近他們自己的政策，因此，社會革命黨在左派中間的人們，曾經走到布哈林那裏，和他商量共同實行一個政變的計劃，商量怎樣逮捕列寧和人民委員會委員。這些談判，當然是在黨的背後秘密進行的；而且在

許多年之中，沒有一個人知道。關於這個問題，還是有一次布哈林自己說出來的。當時社會革命黨與「左派」共產主義者，並沒有商量成功，過了一些時候，社會革命黨左派，就單獨的實行反對蘇維埃政府的暴動，當然，這次暴動，立刻就被革命的無產階級政府撲滅了。

(六) 蘇聯「過渡時期經濟」的問題(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〇年布哈林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叫做「過渡時期的經濟」。在這本書裏，他要說明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程。布哈林把這本書供獻給列寧，但是，列寧看了這本書的內容和傾向以後，就拒絕了這個「供獻」。

列寧讀了布哈林的書，就在書的邊上，批出布哈林錯誤的地方。他說，布哈林不是一個嚴格的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布哈林常常是這樣的：他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是對的，是照着馬克思的學說的；但是，解決別個問題的時候，就不對了，就不照着馬克思的學說，是照着卜克唐諾夫的方法了。

讀者應該知道布爾塞維克的歷史。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在俄國黨內布爾塞維克的一部分之中，在哲學方面，有些人開始發現了動搖和猶豫。馬克思主義唯物哲學的觀點，本來是整個布爾塞維克宇宙觀的基礎。這些同志都開始宣傳一些奇怪的

觀點，這些觀點好像是「科學」的，很「精細」的，對於沒有學過的人，簡直不能懂得的，不通俗的，可是實際上，這些觀點，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離開唯物論的，跑到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立場和牧師主義方面去的。這一派的布爾塞維克，卜克唐諾夫也是其中的一個，在他們自己的哲學著作中，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影響，爲着要暴露這些動搖，爲着要保證布爾塞維克黨的思想的統一，爲了擁護唯物主義，列甯就在一九〇九年，著了一本很大的關於哲學問題的書，這本書在黨的歷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黨內哲學問題意見分歧最激烈的時期中，布哈林的哲學意見與列甯是不同的，而與卜克唐諾夫是相同的。在一九〇九年，布哈林已經與列甯離開，他已經不是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觀點，從馬克思主義一跳到資產階級和半資產階級的理論方面去了。這是很重要的，應該指出的，因爲在最後的幾年中，布哈林所寫的著作中，仍舊發現許多卜克唐諾夫觀點的影響。列甯在一九二〇年還指出：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卜克唐諾夫主義的。在這本書裏，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問題布哈林的立場，亦有很大的錯誤。

（七）工會問題的討論（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〇年的年底和一九二一年的年初，正是新經濟政策代替「軍事共產主義」之

前不久，蘇聯共產黨裏，發生了一次極嚴重的討論，——工會的作用和任務問題的討論。這次討論是托洛斯基所開始的，列寧是反對討論的，布哈林都是贊成討論的。這次討論對於蘇聯的黨，有了很大的害處，因為這次討論，使蘇聯共產黨，不能夠充分的去注意當時最實際最緊急的任務：國內戰爭完結，過渡到和平建設的關頭，正要規定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關係。

當工會問題討論的時候，蘇聯共產黨中，形成了好幾派。布哈林亦組織了自己的派，布哈林派，最初彷彿是想站在托洛斯基派和列寧所領導的中央委員會裏的多數派之間，成立一個緩衝派，或者所謂中間派。當時贊成列寧的是斯大林季諾維夫等。而布哈林，實際上——向祇是反對列寧的政綱，他並不攻擊托洛斯基。所以，列寧說布哈林派，『是最壞最有害的派別主義的代表』，這一派的『害處和搗亂，也最厲害』。結果呢？布哈林完全和托洛斯基聯合，並且加入了托洛斯基的一派；蘇聯共產黨第十次大會上，布哈林是投票贊成托洛斯基的主張的。

當時，因為國內戰爭完結，經濟建設的問題，就成了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以為：爲着達到經濟建設的目的，爲着組織生產，改良生產，克服經濟的破壞狀態起見，應當趕緊把工會『國家化』起來，把工會變成國家機關的一部分，把工會溶化在經濟機關之中。這是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很大的錯誤。蘇聯無產階級革命成

功以後，工會的性質，自然和資產階級或封建階級統治的國家裏不同。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工會，有自己的特性：這是極廣大的無黨的羣衆組織；列寧說：這是『共產主義的學校』，這是學習聯合和團結，學習擁護自己的利益，學習經營和管理的學校』（看列寧文集第十八卷上冊，第六十二頁）。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却完全不懂得這層道理。照列寧的意思：工會一方面積極的充分的參加生產的組織和提高，因此，和經濟機關發生親密的關係，別方面還應當去擁護工人羣衆的物質經濟的利益，反對蘇維埃機關中官僚主義的惡化。不但應當要求『工人做好的工作（這首先是經濟機關的任務），而且應當有人來擁護工人羣衆的日常利益，因為經濟機關——工廠管理局，礦山管理局等等——往往對於工人會做出錯誤的事情，或者太不注意而發生侵犯某些工人利益的情形，（這就首先是工會的任務）。布哈林和托洛斯基，恰好沒有看見這一方面的問題。他們的主張，實際上是要取消工會，——有些老實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簡直這樣公開的說出來了。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辦法，是非常官僚主義的，他們不注意羣衆，不管羣衆的狀況。爲着要吸引極廣大的工人羣衆，來注意生產的問題，參加經營和管理的事業，必須經過工會，用宣傳的方法，用發展工人的階級意識的方法，來向他們解釋生產事業裏無產階級的任務。這一點是哈林林和托洛斯基所不懂的。照他們的意見，彷彿只要『從上面』實行，機關式的『混合生長』把『工會職員變成經濟機關的職員

」，加上上級機關的領導，加緊對於工人的「行政上的」調度，就可以改良生產。他們這種意見是非常片面的。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不懂得：軍事共產主義已經結束了，用不着了，再只用「行政上的方法」去對付工人是不行了。當時羣衆，因為戰爭和戰爭所引起的緊張狀態的緣故，已經非常疲倦，所以從前那種差不多軍事式的指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用不得了，從前那種主要只靠強迫和勉強的辦法，應當廢除，而要用新的方法，更民主的，更顧到羣衆日常生活的，更靠說服的方法。

對於工會問題的討論中，托洛斯基的重要錯誤，布哈林是同意的，並且他還傾向到工團主義方面去了。（工團主義者是贊成工業不要交給國家，而要交給職工會，例如某一工廠，應該交給那個工廠裏的工人，五金工業交給五金職工會，鐵路交給鐵路工會等等，工團主義者，否認黨的作用，認為政黨對於工人階級是用不着的）。在討論工會問題的時候，有一種觀點，接近於工團主義的，這種觀點，稱爲「工人反對派」；布爾塞維克的列甯主義者，也和這一派實行不調和的鬥爭。布哈林受了工團主義情緒的影響，說非黨組織的職工會，應該是經濟和工業的領導機關。布哈林事實上是主張工業機關中取消黨的領導作用。列甯很激烈的攻擊布哈林這種傾向。列甯說：「布哈林這樣說法，等於要分裂黨。正確點說，這種破裂，是工團主義派與黨之間的分裂。布哈林的錯誤，比托洛斯基的一切的錯誤，還要大幾倍」。

如果托洛斯基與布哈林的觀點，得到了勝利，這簡直使工人羣衆和我們的黨脫離，以至於職工會與黨之間的關係，弄到分裂。這種分裂，可以滅亡無產階級的專政。

列甯屢次的與布哈林和托洛斯基鬥爭，他在討論中時常注意到托洛斯基，布哈林，斯列亞潑尼郭夫等等的小組織行動，這種行動，可以使黨有分裂的危險。但是，黨內大多數始終是團結在列甯的周圍，列甯的觀點始終得到了勝利。

列甯在十次大會中，爲得要解決派別鬥爭的問題，曾經提出一個關於統一黨的決議，就是說，一切小組織都應該解散，否則，黨就要不客氣的立刻把有小組織性質的份子，開除出黨。這個決議在大會中通過了，這是一個反對一切小組織的決議，自然，也就是反對布哈林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攻擊了行會式的工團主義的傾向，尤其是一「工人反對派」。我們已經看到列甯指出布哈林的工團主義傾向，因此，十次大會的決議所說的工團主義，行會主義的傾向和小組織行動，正是指着布哈林而說的。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的：在這樣嚴重的討論之中，列甯屢次的注意到布哈林的危險的立場。列甯對於布哈林的批評是：——布哈林似乎是理論家，似乎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是「虛偽的」「模糊的」「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很多的例子之中，譬如布哈林對於解決工會問題的觀點，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既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末他亦不能稱爲布爾塞維克的列甯主義者。

(八) 國家資本主義，無產階級文化，國外貿易的壟斷等問題（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二年，布哈林與列甯的分歧，有以下的三個問題：（一）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二）無產階級的文化問題，（三）國外貿易壟斷問題。

照列甯的意見，在某種範圍以內，在某種條件之下，在蘇維埃國家中，可以有國家資本主義的。例如，企業的出租，和給與外國資本的租借。布哈林從一九一八年起，他已經是『左派』共產主義者，他反對列甯和黨，他所了解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在蘇維埃共和國的條件之下，是絕對不可能的，是沒有意義的。照他的意思，『國家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并存的，他認為只有在資產階級的國家中，可以有國家資本主義。這是一九二二年布哈林的觀點（參看俄國黨十一次大會前，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的文章）。當時，同意布哈林的，還有幾個別的同志。列甯已經注意到布哈林和其他的同情者的錯誤觀點。因此，他在大會上報告第一年新經濟政策教訓的時候，特別提出並且解說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列甯說：『這些同志，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明白，而只是『書生』式的瞭解，翻一翻舊書，只看見資本主義之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任何書裏也沒有寫到共產主義之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布哈林拘泥着經濟

學的庸俗觀念，很抽象的來瞭解這個問題，沒有把這個問題與歷史上的環境聯繫起來。

斯大林關於國家資本主義與新經濟政策聯繫的問題說：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列甯知道我們的工業落後，而農民需要商品，工人在工業很破壞的環境之下，不能夠使工業很快的發展起來，列甯認為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之下，許多可能之中，比較可能的，還是利用外國資本的幫助，來發展工業，經過這種辦法，建立蘇維埃政權與鄉村的聯繫。這樣的道路是無條件正確的，因為，我們在當時沒有別的可能，可以滿足農民，並且當時我們的工業，是破壞到極點，交通停頓，燃料又缺乏。後來，大家都知道，蘇聯的工業，雖然沒有得到外國資本的幫助，可是居然能夠獨立的恢復起來。這更加證明布哈林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布哈林不願實際政策上當時怎樣聯合無產階級和農民，而祇願談書本上的國家資本主義問題。

蘇聯黨的十一次大會上，列甯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理由，是否說服了布哈林呢？一點也沒有。布哈林不但不接受列甯的正確觀點，甚至於經過了幾年，在九二五年（列甯死了以後）他在有一次會議上，說他自己在兩個問題上，仍舊和列甯不同意的：第一，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第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的問題。自己，他認為列甯在兩個問題上，是不正確的。

布哈林和列甯對於無產階級文化的問題，亦有不同的意見。在一九二二年的秋季

和冬季，蘇聯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文化，有了很多的研究。在那時候，有一個『無產文化社』的機關，這個機關，現在還是有的，但是，從前是在卜克唐諾夫的影響之下的。卜克唐諾夫在一九〇九年就從布爾塞維克的黨裏開除出去了。卜克唐諾夫在無產階級文化問題上，從來沒有與黨同意過。『無產文化』派與卜克唐諾夫的錯誤，是什麼呢？就是——文化彷彿是離開全部的工人階級的發展和運動的。不需要取得資產階級舊文化中可貴重的部分，而可以勉強的造出一種特別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列甯對於無產階級文化問題，在一九二〇年就這樣寫：『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已經有世界歷史的意義。馬克思主義何以能夠得到這樣偉大的意義呢？——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但不拋棄資本主義時代可寶貴的一部分文化，而且是取得一切寶貴的東西，還要把這兩千多年人類思想及文化發展裏的寶貴東西，加以改造。祇有根據這種基礎，循着這種方向，繼續工作，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來貫通他，才是真正無產階級文化的發展』。當時列甯對於『無產文化派』，堅決的駁斥他們這種空想的不正確理論，實際上有害的一種企圖，就是想造成特別的限於自己組織內的文化等等。

『無產文化派』在卜克唐諾夫的影響之下，反對共產黨的影響，並且企圖把無產階級的文化運動與整個的無產階級運動對立起來，去造出自己的特別的文化，彷彿是最革

命的，其實不過是最狹義的行會主義式的『文化』。他們不估計到：工人階級不僅是物質生產的創造者（生產者），而且他們已經有了政權，來領導幾千萬的農民。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裏，列甯所改正過的中央的信上，說得很明白：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產文化派『是以資產階級的哲學觀點，當做無產階的文化，拿來給與工人；使工人惡化』。當時布哈林不同意列甯的觀點，而同意『無產文化派』（上面已經說到過，布哈林是在卜克唐諾夫的思想的影響之下）。

一九二二年秋季，有一個領導『無產文化社』的普列特聶夫（卜克唐諾夫派的），他在真理報上做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裏，充滿了卜克唐諾夫的精神。當時列甯極堅決的不同意這篇文章，但是列甯在這時候，已經病了，不能親自出來說話。因此，他委託耶郭夫立夫同志去回答這篇文章，並且他指出特別應該注意的幾點。列甯的意思是：就是不要一切智識份子式的空想和發明，如同卜克唐諾夫之類的『無產階級文化』，不要發展許多糊塗和有害的思想；對於這個問題，應該看一看羣衆的情形，就是『在我們這裏，有幾千萬無智識的，不能讀書不能寫字的，甚至於連卜克唐諾夫所輕視的這種資產階級文化的啓蒙程度都還沒有的人』。因此，取得資產階級文化中寶貴的東西，來提高羣衆的文化程度，這才是我們的責任。

關於普利特聶夫同志和耶郭夫立夫同志的文章，布哈林顯然是站在卜克唐諾夫派方

面，與列甯進行「長期的鬥爭」（這是布哈林自己說的）。列甯很堅決的反對布哈林的卜克唐諾夫主義的觀點，當耶郭夫立夫同志執行列甯的委托，寫了一篇文章，駁斥普列特聶夫的時候，布哈林就向列甯提出「哀的美敦」式的抗議（布哈林自己說的），要求取消文章的幾段，尤其是和布哈林的觀點不相容的地方；自然這種不同意，帶有很深刻的性質。

在一九二二年底，布哈林與列甯，對於國外貿易壟斷問題，又有了分歧。國外貿易壟斷，能夠保證恢復蘇聯的工業。布哈林所提出的辦法，却是削弱國外貿易的壟斷，使工業發展，更加困難。列甯就很堅決的反對布哈林的觀點，并且指出這些觀點的危險；這種危險，就是布哈林所提議的辦法，實在是有害於無產階級，而有利於蘇聯國內的資產階級的成份。

（九）結論

同志們！你們讀了以上所述的一個短短的敘述，就可以知道，在列甯生前的時候，布哈林就已經是反對列甯主義的了。但是如果不提起列甯在一九二二年底對於布哈林所下的最後一個批評，那末，這個敘述不會完全的。當然，列甯是知道布哈林對於理論問題是很有興趣的，而且在理論方面，是很有研究的，可是列甯很多次數的反對布

哈林，並且指出布哈林在解決各種問題的時候，不是完全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他的理論也不是完全用馬克思主義的。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一切實際的政策，是根據於理論的，科學的，如果這種根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那末在政策上，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這也就不是布爾塞維克的，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所須要的了。布哈林的很多的動搖和猶豫的來源，就是因為他的不正確的理論觀點，因為布哈林同志不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

當然，列甯對於布哈林，不是覺得沒有希望的，他以為布哈林在某個時候，都能夠完全貫通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實質，而完全站到無產階級的觀點上來。但是，這種希望，沒有能夠達到，列甯對於布哈林同志，有了很多年的認識，列甯在一九二二年底，根據這種認識，做了一個結論，他不得已而指出：「布哈林的理論觀點，可以不可以把他算做完全的馬克思主義的呢？」——這是很可疑的——這就是列甯對於布哈林同志最後的結論。

是否列甯指摘了以後，布哈林能夠從新研究一下，而站到真正馬克思主義和真正列甯主義的觀點上去呢？很可惜！布哈林不肯學習列甯的指示，而且他所做的更壞些，居然站到右傾的觀點上去了。很明顯的跑到黨和列甯主義的敵對方面去了。他應該知道，列甯在黨內有怎樣偉大的威信，可是，他曲解列甯的學說，企圖把列甯主義來

適應右派的要求。在一九二九年初，布哈林同志有一次演說，叫做「列甯的政治遺囑」，按照這篇演說，完全可以代表曲解列甯主義的觀點，說列甯曾經反對向富農作無情的鬥爭，好像列甯從來沒有說到集體農莊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改造鄉村經濟的道路，好像他也否認鄉村中的階級鬥爭等等。布哈林自己是右傾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他企圖把列甯亦變為右傾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好像說：「你們說我們是右傾，是機會主義，但是你們所說的右傾，却是真正的列甯主義」。這都是托洛斯基加米聶夫和齊諾維夫的老調，他們也企圖把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反對工人階級利益的觀點，當做「百分之百的列甯主義」。布哈林同志也走了同樣的道路。但是這種曲解列甯主義，把列甯主義當作右傾招牌的企圖，已經被黨揭穿了。

列甯對於布哈林的批評真正不錯，他說布哈林同志「在政策上像小鬼般的動搖不定」。在整整十年之中，從帝國主義戰爭開始起，一直到列甯死為止，在任何一年，任何一個問題上，布哈林與列甯的意見總不是完全一致的。這種不同的意見裏面，——從理論的科學的問題起，一直到劇烈的派別性的鬥爭為止，布哈林同志總是反對列甯主義的路線的。在一九一八年「左派」共產主義的時期中，或者在一九二一年討論職工會的時期中，布哈林好幾次拉了黨內一部分同志，到自己方面去，自然，在那時候黨內發生危機，——在黨內，布哈林的政策，或者可以「占到上風」，——每到這個時候，

列甯當立刻就警告全黨，指出布哈林的政策，是亡黨的政策，可以使無產階級專政滅亡的。如果在一九一八年黨內的鬥爭中，「左派共產主義」的首領布哈林，戰勝了列甯，而使黨按照他們所主張的戰爭道路去對德國宣戰，那末，無疑的可以使蘇維埃政府滅亡。如果討論職工會的時候，反對派的首領托洛斯基布哈林，在蘇維埃共和國極危險的時期中，戰勝了列甯，那末，誰都可以知道：這個危險，可以使黨與職工會分裂，就是黨與工人階級分裂，使蘇維埃政權，從此倒台。

黨很正確的反對「小鬼般動搖不定」的布哈林政策。黨應當在現在還要繼續與這種動搖的觀點，作堅決的鬥爭。

布哈林同志現在的動搖和猶豫的傾向，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布哈林以前的一切歷史。布哈林以前從左傾一方面好像極革命的，用無政府的工團主義，來反對黨和列甯；而現在呢？他從右的方面來反對黨。這種或左或右的傾向，一點却沒有什麼奇怪。只要本來是有傾向的人，他始終是要離開階級的立場：或者遇着了困難，公開的投降，妥洽，慌張而右傾，或者用革命的詞句，來掩蓋自己的絕望，膽小，掩蓋自己的沒有克服困難的能力，而「左傾」。至於在什麼時候右傾，什麼時候左傾，那末，要看具體的歷史環境和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來決定。譬如加米耶夫，齊諾維夫，在十月革命時候反對暴動，犯了右傾，而在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犯了「左傾」。批評蘇聯的

黨，說黨革命得很不充分。加米赫夫與齊諾維夫，是從右傾機會主義跑到「左傾」；而布哈林却從「左傾」的機會主義跑到右傾。或者以革命的空談，來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或者公開的說出來，這兩種情形在形式上看來，雖然是有差別，但是實質却是一樣：就是忘記了無產階級根本的利益，拋棄無產階級的政策，他們所要實行的政策，不是有利於無產階級，而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

黨已經把托洛斯基主義打得粉碎，對於代表小資產階級情緒，代表資本主義成份，代表富農情緒和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亦要鬥爭到底。團結在列寧主義周圍的黨，用極堅決的革命政策，與右傾的機會主義對立起來，只這種無產階級的政策，才能夠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

工人階級要揭破，消滅右傾的或「左傾」的機會主義的動搖和猶豫，並且消滅資本主義成份的富農，與基本的農民羣衆，建立極親密的關係，來克服我們面前的一切困難，然後才能夠執行我們歷史的使命：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廿六日的報紙上，登載了右派的首領布哈林湯姆斯基賴可夫三位同志的聲明書，他們在這個聲明書中，他們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且負責與黨內一切傾向作鬥爭，首先要反對右傾和調和派。這個聲明書是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後的幾天寫的；在全體會議上，右派的首領，還繼續堅持自己的錯誤，因此全體會議，

把布哈林同志，開除出政治局，而給賴可夫和湯姆斯基同志一個警告。

他們承認自己錯誤，是仍舊留着自己的『餘地』準備在適當的時機，重新再來攻擊黨。當然，這種聲明書，無可爭論的表示中央委員會有了極大的勝利。但是，他們的聲明書，是否忠實？是否他們完全拋棄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完全跑到黨的路線上來？這却要到將來才可以證明。因為各種各樣的机会主義派別，曾經很多次數欺騙過黨，如托洛斯基和加米聶夫，齊諾維夫，亦曾經寫了很滑頭很外交式的聲明書，在實際上，他們還是繼續他們的觀點，屢次在寫了聲明書之後，又起來反對黨的路線。黨當然接受他們三人的聲明書，但是黨同時等他們在實際行動上，來證明他們自己同意黨的路線，擁護黨的政策，而與右傾作堅決的鬭爭。自然他們三人的聲明書，一刻都不能停止黨與一切右傾理論和行動，作劇烈的鬥爭。現在在蘇聯國內，還沒有掘斷資本主義的根子，現在還有富農，商人，小資產階級，一般的資本主義的成份，這種分子，能夠影響到我們黨內最落後的一部分，形成右傾和調和派的情緒和觀點。所以與右傾和調和派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之一。

**BOB
JUSTICE
V
K**

經濟月刊

第四卷 第六期

上海

經濟月刊社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C

布爾塞維克 第四卷 第六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目 錄

中央決議案

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
中央給紅軍黨部及各級黨部的訓令

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提綱

滿洲事變與我們在反日運動中的基本任務

托洛斯基派和國民黨

中國人權派的真面目

少 峯

秋 白

秋 白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經濟月刊 第四卷 第六號

中央決議案

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 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

一、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主要特點，是江西工農紅軍衝破了敵人第三次『圍剿』與其他蘇區紅軍的勝利，是普及全中國的災民鬥爭，與澎湃着衝擊前來的反帝潮流。

江西工農紅軍主方在一個多月英勇的戰鬥中，擊潰了國民黨十一個師以上的兵士，消滅了五個師以上的步隊，使國民黨左中右二路全線潰退，使帝國主義國民黨第三次圍剿計劃完全失敗，使蔣介石不能不從前線逃回南京，宣告『勦匪軍事已告一敗落』。此外，鄂豫皖蘇區除鞏固原有陣地外，更佔領了廣濟，沂水，英山等縣，擊敗與滅消了敵人進攻的步隊。湘鄂西蘇區除鞏固原有蘇區外，更佔領了潛江天門等縣。中國蘇維埃革命運動，在工農紅軍的這些偉大勝利中，無疑的開展了更廣大的發展前途。這些勝利更充分的證明出中央關於敵人第三次圍剿的訓令的估計與指示，以及共產國際主

席團最近對於中國的決議的完全正確，同時也就又一次地給予那些對中國革命悲觀失望，對於工農紅軍造謠污蔑的反革命派——托洛茨基陳獨秀取消派，羅章龍右派，鄧演達第三黨等，以及黨內動搖，悲觀，失望，消極的那些立三主義殘餘與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致命的打擊。

我們工農紅軍所以能夠戰勝兵士數量上比我們超過數倍，軍事技術上比我們高明得多的國民黨軍隊，當然不祇是由於我們爲反帝國主義與土地革命而戰的工農紅軍將士的偉大的革命熱情與勇敢善戰，而且也由於蘇區內外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擁護。這一次我們的偉大勝利，更明白的告訴我們，祇有澈底實行國際與中央所指出的正確路線，正確的解決土地問題，鞏固蘇維埃與紅軍，以及領導千百萬工農羣衆的一切鬥爭，我們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這一勝利，對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是最大的威脅，而且將加速地促進中國反革命內部的崩潰過程。但是對於蘇區數十萬紅軍與游擊隊，以及千百萬掌握着蘇維埃政權的工農羣衆，却是一帖最有力量的興奮劑，使他們更其相信自己的力量，振起他們戰鬥的決心與勇氣。對於千萬萬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下飢餓着，死亡着，奮鬥着的工人農民與兵士以及一切勞苦羣衆，却是一盞指示出路的明燈，使他們更加易於跑到蘇維埃的旗幟之下自求解放，更加喚醒他們對於蘇區工農紅軍的擁護與創造新的工農

紅軍蘇維埃的熱忱與勇氣。

二、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一方面使中國的農村經濟急速破產，另一方面使新的生產力無從發展，以至造成了長期的經濟恐慌與不斷的災荒。今年泛濫全中國的水災，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必然結果。這一四十年來所未有的大水災，一方面更深刻的表現出了中國經濟危機的不可救藥，另一方面將更進一步的使這一危機，益陷於全部崩潰的境地。

全中國沒有飯吃，沒有衣穿，等待着餓死，凍死與病死的災民，現在已達一萬萬人，即佔全中國人口四分之一。國民黨雖是用了種種『賑災』名義，又從民衆身上，搜括了不少金錢，但這些金錢大都爲國民黨的軍閥官僚所中飽。國民黨在廣大的災民羣衆面前，完全表示了無辦法，與張惶失措的情緒，使他們不能不瘋狂般用戒嚴，監禁，屠殺等方法去對付這千百萬無告的災民羣衆。

這一部分的廣大災民羣衆，現在已經逐漸明瞭：國民黨不但不能救濟他們，而且祇能剝削他們，壓迫他們與屠殺他們。他們現在也開始知道用自己的力量來救濟他們自己了。示威游行，搶米，分糧，殺土豪，地主以及反對國民黨官吏，同國民黨軍警的衝突的鬥爭，現在正在大規模的開展出去。實行土地革命的游擊戰爭，正在蜂起雲湧般的推向前來。他們在蘇維埃與紅軍的影響之下，將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了解到祇

有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和創造蘇維埃與紅軍，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無疑的，這一千百萬災民的鬥爭，將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致命的打擊。

三、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功，世界革命運動的高漲，以至在幾個國家內革命危機的成熟，使帝國主義對於蘇聯，對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對於一切革命運動的進攻，更其加緊了。同時各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也正在日益增長着。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行動，以及他們相互間的錯縱關係，就是這一分析的最好的具體例子。而日本帝國主義却更露骨地，明目張胆地，表明了他一切的願望，用武力佔據了他所需要的東三省，要把東三省完全變成日本的殖民地。

很明顯的，日本帝國主義這一次佔據東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殖民地政策，與中國國民黨一貫投降帝國主義與勾結帝國主義政策的必然的結果。同時，這一事件，必然將更其加緊各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掠，與對於蘇聯的進攻。並且使帝國主義內部（尤其英，日，美）的矛盾，更其增加。這一件事，將成爲世界大戰，尤其反蘇聯戰爭的導火線。

但是伴着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加緊侵掠而來的，是中國民衆反帝潮流的高漲，尤其在日本佔據東三省之後。東三省的佔據，像電火一樣燃燒了千百萬工農羣衆的以至小資產階級的反帝熱情，使他們爲了中國民族的自由與獨立而鬥爭。當然，中國反帝運

動的發展所以如此迅速，不單是由於帝國主義的暴行，而也是由於中國國民黨一貫投降與勾結帝國主義，壓迫與屠殺中國民衆的下流無恥的行爲所造成的。國民黨「反帝」的欺騙的武斷宣傳不斷破產，使全中國的民衆覺悟到，祇有用他們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全中國的民衆，在實際鬥爭中，現在已經很快的了解到，要打倒帝國主義，就必須要打倒國民黨，而且實際的經驗，將告訴他們，只有蘇維埃政府，才能向帝國主義做徹底的鬥爭。

反帝的怒濤，現在正在向前呼嘯着。牠將沖破一切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藩籬與城堡。

在紅軍勝利，災民鬪爭與反帝鬥爭開展的背境上，我們當然也明顯的看到，工人鬥爭的發展。這鬥爭的反抗性質已經帶有很濃厚的進攻性與政治性，並且牠開始從自發的散漫的匯合成爲更自覺的，更有組織的，更偉大的鬪爭了。在有些產業部門中，同盟罷工的形勢已經日益成熟。農民鬥爭隨着災荒而更其發展。兵士的動搖，也日益加深。兵變的潮流現在已經普及於全國。在華北，革命的士兵第一次公開的打出蘇維埃的旗幟，實行平均分配土地，建立蘇維埃政權了。中間階級的動搖，與他對於國民黨統治的不滿也日益增加。一切這些革命勢力急速發展與反革命統治的日益崩潰的絲線，織成了全中國成熟着的革命危機的圖畫。這一圖畫，很明顯的映出了爭取革命

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前。途。

四、因為革命運動的發展，因為帝國主義的加緊進攻，因為經濟危機的加深，因為地主資產階級內部的不斷鬥爭，因為財政的破產，國民黨統治的崩潰正在加速進行着。但是促進國民黨的崩潰，使國民黨走向滅亡道路上去的主要動力，自然是廣大工農羣衆的革命運動，尤其是蘇維埃與紅軍的鞏固與發展。因此，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這一鬥爭，現在正在更劇烈的，更廣大的向前開展着。

無疑的，由於世界政治經濟危機的擴大與深入，由於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由於地主資產階級內部不能調和的矛盾，以至由於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國際帝國主義之間及中國各派軍閥政客間在目前遠正在加速尖銳化着他們相互間的衝突和矛盾。因日本帝國主義的佔據東三省，使英日美三國間的衝突更其露骨化，使北方馮閻軍閥加緊了反張與反蔣的鬥爭，因蔣介石第三次「圍剿」失敗，而使廣東出兵湘南。而且反動統治營壘中的衝突，矛盾與鬥爭愈加劇烈與複雜。客觀上便越有利革命鬥爭的發展，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革命的發展必然的促進反革命的團結。當着目前中國千百萬勞苦羣衆的革命怒潮突飛猛進的時候，國際帝國主義是同樣抖顫着，他們將不惜用盡一切方法來求得進攻革命步調上的一致。日本出兵滿蒙

所發的「反俄與防止華北赤禍」的宣言，無疑地是得到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資產階級的一致同情，英美在華報紙都異口同聲地警告國民黨各派軍閥小心着「今冬武漢有被共產黨領的危險」，要國民黨各派忠實同志聯合一致去加緊「勦共」工作。最近蘇維埃與紅軍的大勝利，災民與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勃發，將更其推動國際帝國主義更直接的，更明目張胆地，更血腥地向中國革命進攻。

自從滿州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的各派軍閥，正在「全國民衆一致抗日救國」的旗幟之下，團結一切反革命的力量，準備向革命做新的進攻。國民黨的「民族統一戰線」，實際是要工人增加生產，要農民加倍服從地主，要兵士更進一步的服從長官，要災民鎮靜犧牲，要紅軍放下武裝一致對外。很明顯的，這種統一戰線，不是爲了對付帝國主義，而是爲了對付革命。在這統一戰線之下，國民黨可以在任何時候，拿破壞民族統一戰線的名義，向工人農民與兵士進攻，實行牠屠殺的拿手好戲，很巧妙地將民衆的反帝情緒轉移到破壞民族戰線的「國賊」身上。國民黨現在正在「抗日救國」的呼號下面，向帝國主義做着買賣，準備在帝國主義直接指揮之下再用血與鐵來消滅革命運動。一切國民黨欺騙宣傳的急速破產，更加速了這一過程。

五、我們固然相信，在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死鬥爭中，不論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任何卑鄙行爲與惡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們已經注定了的死運。幾千萬以至幾萬萬中國勞

苦羣衆，在他們的先鋒——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一定能夠繼續不斷地戰勝反革命的進攻，以至根本推翻反動的統治。但是中央必須喚起全黨注意：雖然我們紅軍主力已經衝破了敵人的三次『圍剿』，雖然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時，恰當中國革命急速向前發展的時候，但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目前還沒有到達已經不能再與革命抗爭的死亡程度。他們是正感覺着死亡的逼近，而加緊頑強的抵抗。

因此不僅以爲第三次『圍剿』衝破後，敵人再沒有力量去進攻蘇區與紅軍的思想，是幼稚的自欺，即以爲第三次『圍剿』衝破後，再不會有像蔣介石第三次『圍剿』那樣大規模的戰爭，也是不合於事實的空想。實際上正因爲我們衝破了蔣介石第三次的『圍剿』，正因爲衝破了第三次圍剿後中國的政局是怒號着革命的大風暴，國際帝國主義者及各派大軍閥才更要努力企圖用『結團一致』的力量，去首先對付革命運動的先鋒——中國工農軍。

同時，我們必須看到中國革命的弱點，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這不平衡，在目前不但在工人與農民運動中存在着——（這是指工人鬥爭在主要的城市中還沒有到達直接爭取政權一點而言），而且在地域上也還存在着，雖是革命運動的急速發展正在使道不平衡，逐漸走向平衡。黨的主觀力量的薄弱，也不能不說是這種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黨在四中全会後的轉變，還沒有深入到下層黨員羣衆，黨的政綱還沒有爲更廣

大的工農羣衆所澈底了解，黨還沒有能完全領導工農羣衆的一切鬥爭，尤其是產業工人的鬥爭。

所於在目前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死鬥爭中，爲要得到更偉大的勝利，需要黨在蘇區與非蘇區內更加十百倍地去動員，組織和武裝更廣大的成千百萬的工農勞苦羣衆；需要黨更加十百倍地努力去領導蘇維埃運動與工農紅軍以及千百萬勞苦羣衆去更熱烈地更英勇地取得國內戰爭的勝利。

六、爲得要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央認爲在蘇區與非蘇區方面，應該立刻執行以下的緊急任務：

(一)蘇區的黨，在衝破了蔣介石第三次『圍剿』之後，必須立刻在政治上與軍事上鞏固已得的勝利，更堅決的更澈底的執行國際與中央的一切指示，更深刻的發展蘇區內部的階級鬥爭，引起最廣大羣衆鬥爭的熱情，來發展與鞏固蘇維埃，貧農團，雇農工會與職工會等，并且集中力量追擊敵人退却部隊，消滅牠的一方面，在政治軍事有利的條件之下，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在重復勝利後休息，致使敵人得以從容退却，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們的旗鼓，向蘇區爲新的搗亂。

(二)盡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紅軍十六軍，十軍及閩西新十

二軍必須與中央區打通。湘鄂西的第九師必須與鄂西紅軍打通。二軍團必須向漢水流域發展，取得與湘鄂西第九師與鄂豫邊第九軍的聯絡。此外十六軍與鄂豫皖，鄂豫皖與湘鄂西必須取得聯絡。這樣來擴大與鞏固蘇區根據地。

(三)在十月半前各蘇區必須選出和派出代表參加中央蘇區工農兵蘇維埃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選舉時必須做最廣大的宣傳鼓動工作，更澈底的實現蘇維埃政府一切法令。中央蘇區必須在十月革命節正式成立蘇維埃全國臨時政府。堅決地與那些藉口軍事緊張而推遲這一工作的錯誤傾向做鬥爭。各蘇區也必須於十月革命節前成立當地蘇維埃政府。

(四)立刻擴大與鞏固紅軍。堅決依照新頒的紅軍組織條例及政治工作條例實行改組。同時，必須從赤衛隊，少年先鋒隊中，挑選積極勇敢的份子來擴大紅軍。中央區應擴大到比原有的數目增加三分之二，鄂豫皖增加二分之一，湘鄂西增加三分之一。閩西十六軍，十軍等都必須擴大成爲軍或師。此外必須成立紅軍補充軍。中央區及鄂豫皖區各縣成立一團。其他各蘇區各縣至少成立一營。中央區須成立警衛師，湘鄂贛省，湘鄂邊省，與鄂西皖西的獨立師應充實起來。中央區與鄂豫皖省區至少創辦紅軍軍官學校及軍事政治學校各一所。各軍建立隨營學校。此外各軍必須開始城市戰，堡壘戰的演習。

(五)立刻發動與組織工農羣衆反對日帝國主義軍隊佔領滿州，反對太平洋戰爭，與擁護蘇聯的羣衆示威遊行。必須堅決的同那些以爲蘇區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傾向做鬥爭。必須利用這一機會，在蘇區內成立反帝同盟；更有計劃地，與更經常的領導與發展反帝的工作。這一工作，在目前帝國主義更猛烈地向中國革命進攻的形勢之下，應該特別加緊。

(六)要擴大蘇區至中心城市，要取得蘇區四周國民衆對蘇區與紅軍的同情與擁護；蘇區的黨必須有計劃地選派黨員，團員以至積極的工農幹部，到環繞蘇區四週的白色區域，首先，就是武漢，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南潯路，平漢路，武長路，株萍路等的工人，災民農民與士兵中去建立工作（中央區與鄂豫皖至少須派出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其他蘇區五十至一百人）。堅決打破一切白區工作都應該依靠中央的錯誤觀念。此外要盡量的將蘇區內部的災民羣衆組織起來，給他們以相當的訓練，派他們到白色區域去『報災』，去進行災民中的工作。

(七)中央及河北，山西，陝西的黨部，必須共同派遣十個到二十個幹部到晉綏邊新成立的二十四軍中去，加強政治上軍事上的領導，使之成爲燃燒起華北紅軍蘇維埃運動的火焰。

(八)在非蘇區方面，必須加緊擁護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的大勝利。最

廣泛的將紅軍勝利的消息散佈到廣大羣衆中去。做慶祝紅軍勝利，徵調工人幹部，選派代表，與紅軍募招的運動。必須把蘇維埃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法令草案，更多的翻印，分散出去，向羣衆做關於蘇維埃紅軍的宣傳鼓動工作，並且同蘇維埃臨時政府在十月革命節成立紀念日的羣衆運動聯系起來。

(九) 必須立刻訂出具體計劃，徵調幹部和工農中的極積份子去到災區工作，尤其是武漢，蕪湖，江北等地。在災民工作中，黨要注意到使災民鬥爭聯系到失業工人與城市貧民的鬥爭，以至繼續發展到農民的秋收鬥爭與冬荒鬥爭。要團結他們在災民團，災民自衛隊內而樹立起無產階級的領導。要從要飯吃的鬥爭引導他們到搶米，搶劫軍糧等廣大的災民的騷動，以至走向遊擊戰爭，土地革命與蘇維埃運動。必須同因為反帝鬥爭的開展而忘記千百萬災民的鬥爭的傾向做鬥爭。

(十) 黨應該特別加緊反帝鬥爭。尤其是反日鬥爭的領導，以開展反帝的革命運動，盡量同下層小資產階級羣衆，如像一部份革命學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貧民成立反帝的統一戰線，並且成立這種反帝的公開組織，而取得其領導。應該利用一切公開與半公開的可能，發行反帝日報與傳單標語，並且組織宣傳隊等，利用各種公開名義到街道上，尤其是工人區域去演講。在上海等地，現在應該立刻以「罷工 罷課，罷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工農武裝起來，反對日本帝國

主義』應該是黨目前的中心鼓動口號。但是這口號絕對不能同『打倒國民黨』，『擁護蘇維埃』，『擁護工農兵蘇維埃與紅軍』等口號的宣傳分裂開來。盡量用全力，來準備各個企業的總罷工，尤其是日本企業的罷工，使鬥爭更能得到無產階級的領導，使鬥爭擴大與深入。在滿州：黨要立刻分配幹部到南滿各地，中東路，吉長路沿線的農民羣衆中與動搖不滿東北軍閥的軍隊中去發動反日鬥爭，游擊隊戰爭與兵變，同時這一反帝鬥爭，必須同揭破國民黨的反帝欺騙與反對國民黨密切的聯系起來的全國反帝同盟，要利用反帝鬥爭的開展，在今年內成立起來。

(十一) 在上海，天津，唐山，香港，哈爾濱，大連的黨部在中央幫助之下，應該動員得力幹部去加強正在開展着的工人鬥爭的領導，去發展與鞏固赤色工會，和打入黃色工會中的工作。特別是去建立海員，鐵路，兵工廠的工作。同時盡可能的在某些城市中（如上海，唐山，天津等）努力去準備和組織某一產業的同盟罷工。

(十二) 江蘇，安徽，廣東，河南，河北，陝西，山西，山東 地黨部要在某些武裝鬥爭已經成熟的農民區域，集中力量去發動那邊的農民鬥爭，一直到游擊隊戰爭。在北方，更要特別注意兵變發展的區域（如山西，河北，河南），使這些兵變配合着當地的農民與工人的鬥爭，創造出北方的蘇維埃區域。

黨內兩條戰線鬥爭的加深，與組織上的鞏固，是實現上述任務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險還是右傾機會主義。這主義的表現在，對進攻蘇聯與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估計不足，或者企圖等待戰爭來討『便宜』的情緒，不相信蘇維埃運動與紅軍在目前能夠得到勝利，對於中國革命危機的日漸成熟表示懷疑，把土地革命和反帝鬥爭分割開來，對城市工人鬥爭的形勢估計不足與忽視，富農路線，黃色傾向，反帝運動中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以至對困難投降消極，怠工與失望的情緒和行動等。左的機會主義——立三主義的殘餘，也時常表現出來，如不願深入羣衆中去作艱苦的工作，而空喊脫離羣衆的口號，不願到黃色工會中工作，不知道利用下層統一戰線，以至懼怕利用任何公開與半公開的工作方式的關門主義等等。此外，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與對右對『左』的調和情緒與口是心非的兩面派，都是執行上述緊急任務的仇敵，黨必須對他們作思想上與組織上的鬥爭。以加急秘密工作（任何所謂『小』的破壞秘密工作的行動，都須給與嚴重的制裁），和深入羣衆的主要方式去鞏固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建立以少數黨員爲幾千以至幾萬羣衆的核心的支部工作，更廣泛地靈巧地運用公開與秘密工作聯繫的工作方法，從最近革命戰鬥中吸收工人，雇農，貧農的先進份子以至願終身爲無產階級利益而戰的智識份子來擴大和充實黨的組織。這些都是使我們黨更能適合於目前國內戰爭的環境的組織的迫切任務。這些思想上組織上具體任務的完成，更需要

黨善於使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與每位同志的艱苦卓絕的工作。中央堅決的相信：各級黨部必定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百分之百的把這些緊急任務完成起來！

中央給紅軍黨部及各級地方黨部的訓令

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緊急任務

一 蘇聯五年計劃將近成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更加深刻，歐洲許多國家的革命危機的前提的日漸成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日益高漲，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日益露骨，使世界政治經濟危機更加尖銳。同時，使國際帝國主義更加加緊對於中國的壓迫與剝削，國民黨幾年來統治的結果，使中國日益殖民地化而擴大和加深了全國經濟的破產，不斷的軍閥戰爭，加倍的官僚制度，空前的捐稅剝削，非人的白色恐怖，使中國廣大勞苦羣衆生活更加陷於水深火熱的地步，使這些飢寒交迫的千百萬羣衆不能不從革命道路上自求解放。蘇維埃政權及紅軍在有些區域經過兩三年的奮鬥，更加興奮了勞苦羣衆的戰鬥情緒和加深了國民黨統治的危機。中國最近事變的發展，顯明地表示出國際政治經濟總危機及中國政治經濟危機產生的必然結果，中國最近事變

發展的最主要特點是：工農紅軍得到空前的勝利，衝破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國民黨統治正式分裂成南京與廣東兩個政府。這樣，將使革命運動更進一步的高漲，反動統治更進一步的崩潰。

(一) 革命運動更進一步的高漲，這主要的表現在：

一、蘇區的工農紅軍得到空前的勝利，又衝破了敵人第二次的圍剿，蘇區內部的反革命勢力（A B 團，社會民主黨，戀愛研究社等）受到嚴重的打擊，工農紅軍更加鞏固和壯大，蘇維埃政權得到工農民主專政的初步鞏固，鞏固以至擴大了蘇區根據地。

二、反動統治區域的有些中心城市的工人鬥爭，日趨於重要產業部門，且帶有顯明的政治性，日益加重進攻的性質。

三、春荒時期的農民鬥爭的普遍爆發，各省所謂「盜」「匪」的日漸增多，紅槍會，大刀會，小刀會運動日益發展，分糧，吃大戶運動蔓延到關外各省。

四、國民黨軍閥軍隊，士兵的革命化，和鬧餉譁變的事實日漸增多。

五、反帝反國民黨的情緒在一般羣衆中日益高漲，因而影響到中小商人也在罷業等行動中表示出對國民黨的反對情緒的增漲，有些地方的學生開始着罷課運動。

(二) 但是革命運動的發展，依然表現出不平衡的狀態，這主要地表現在：

一、從地域上看，雖然紅軍和蘇維埃政權運動除湘鄂贛閩外，在安徽北部，河南南

部有了新的進展，但在其他各省的工農鬥爭還未達到直接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戰的程度，而且嚴格地看起來，全國反動統治區域的各地的羣衆鬥爭，也表現出各種各式的（地域上的和社會成份上的）不平衡發展的現象。

二、工人鬥爭雖然在有些中心城市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比起廣大的農民的蘇維埃運動來還顯然落後。中心城市內工人鬥爭不但還未曾達到直接為奪取政權而戰的程度，並且鬥爭也還表顯出嚴重的散漫，自發和不普遍的狀態，黨在工人鬥爭中的領導，尤其表現異常的落後。

（三）反動統治更進一步的崩潰，主要地表現在：

一、中國統治階級的最近一個新的統治形式——國民會議——在廣大羣衆中實際教訓宣告破產。統治階級各派都還未能找出更新的統治形式。

二、南京政府的假的統一完全宣告破產（廣東成立臨時政府），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崩離析更加急劇，軍閥戰爭將一觸即發。

三、統治階級的財政狀況幾乎已到水盡山窮的地步，外債滿期的達四萬萬八千三百萬元有餘，福建，湖北，安徽的省政府，均宣告財政破產，聲稱辭職，江西全省警察的欠薪的總辭職，稅捐繁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以致時常引起全業商人的罷業。

這些特點，充分證明出中國反動統治的政治經濟危機的繼續增長，造成革命危機的

先決條件日漸成熟，直接革命形勢在湘鄂贛這幾個主要區域正在逐漸生長着和成熟着！——首先就是江西省區以革命戰爭消滅反革命的軍閥戰爭，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力爭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幾省的勝利，實現湘鄂贛三省打成一片的蘇區，已成當前的緊急任務。這種事變的發展形勢，更證明共產國際去年七月對中國問題決議，十一月對於立三路線問題來信及中共四中全會決議的絕對正確；另一方面也就宣佈了立三主義者，羅章龍右派及托陳取消派對於紅軍蘇維埃發展抱悲觀失望，對於革命運動繼續高漲的形勢取懷疑態度，對於共產國際及四中全會作造謠污蔑等行爲的完全破產。

二 目前國民黨統治正式分裂成兩個中央政府（南京與廣東），北方各派正在進行着反蔣的軍事團結與各種派別的分合活動，軍閥戰爭已經處在劍拔弩張的形勢。這固然一方面反映着國際帝國主義爭奪中國市場的衝突的空前緊張（最近在反蔣問題上，主要地表現着英日聯合對美的形勢，當然同時在各派軍閥中也反映出英日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反映着軍閥制度及中國各派地主資階級之間的各種矛盾的異常尖銳，但主要地還是中國統治階級各派，在南京政府兩次大舉剿共遭受慘敗及國民議實驗宣告破產之後，爲着用各種分工合作異途同歸的政策來各找挽救反動統治的垂死命運的出路。因此，國民黨改組派，西山派，第三黨等，深恐羣衆對南京政府的不滿情緒會發育滋長起來成爲革命火燄的高漲與統治階級的解體，於是打起反南京政府的『剿共不力』的旗幟

來，企圖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團結在「廣東臨時國民政府」的周圍，以廣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孫石韓進行着第三派的團結，閻，馮，及奉系舊派等新北洋系的醞釀，久已消聲匿跡的吳佩孚及安福系均躍躍欲試，都不外乎想把「剿共」重責，自己担負過來，以免因國民黨統治形式破產而根本中斷了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血腥統治。國民黨蔣系的南京政府當然也不能不困獸獨鬥的掙扎，牠一方面拚最後一滴血去「努力勦共」，另一方面盡最後一息去準備對粵和對北方作戰。然而，統治階級各派在各帝國主義指揮之下的這種各找出路的鬥爭，不能不造成更有利於紅軍蘇維埃運動及一般革命羣衆鬥爭發展的各種條件，統治階級各派相互間的衝突和鬥爭越複雜劇烈，對於革命運動發展自然就愈加有利。但是，我們必須認識：統治階級營壘中目前還能這樣公開破裂和劇烈鬥爭的原因，除了上述種種外，主要地還因爲：一方面中國革命運動在目前依然發展得不平衡。另一方面，革命勢力的發展，還未能達到使敵人營壘中已經沒有了暫時用這些分工合作的方法，各找不同的出路的可能。如果工農軍有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佔領了湘鄂贛區域的一個或幾個中心城市，則革命的發展將更促進反革命力量的團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相互間不可避免地將要立刻暫時統一起來，以集中的階級團結力量來對付革命的危險（當然，其他原因也能形成這樣的結果——例如，某些中心城市工人鬥爭趕上了農民的蘇維埃運動，或者湘鄂贛以外主要區域有了廣大羣衆的革命怒

潮的爆發等)。這一可能與必然的形勢，在目前已開始顯露其端倪；英日美法等帝國主義的在華報紙，已經異口同聲提醒與教訓南京政府，廣東政府及北方各派軍閥們，應當暫時『和平妥協』起來，去對付共同的仇敵——工農紅軍。蔣介石與廣東政府最近的各種函電，北方各派軍閥的通電，宣言，上海總商會特別發出通電都把剿共列在第一位。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階級矛盾永遠超過於反革命內部的矛盾，國際帝國主義及中國統治階級各派，在自己內部相互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時，依然是企圖以暫時統一的反動勢力來鎮壓革命運動。

三 但是，我們堅決相信：帝國主義及中國統治階級各派的這種反動企圖，是不會如願以償的。帝國主義國家互相間的鬥爭，及中國各派軍閥相互間的戰爭，只有消滅了帝國主義制度及軍閥制度才能避免。在共同進攻革命的一致中，不獨不能真正消滅牠們之間的各種矛盾與衝突，而且要增加和尖銳化牠們相互間的各種新舊矛盾。因此，在牠們的『勦共』前提的暫時聯合之下，也並非就完全消滅了牠們之間因劇烈矛盾而給予革命方面以可乘或利用之機；而且我們相信：中國幾萬萬工農兵貧民勞苦民衆，與蘇聯及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勞苦羣衆的友愛的，堅決的革命團結，一定能夠戰勝中國地主資產階級與國際帝國主義的黑暗團結。在全世界政治經濟危機日益增長的基礎之上，開展着全中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在全中國政治經濟危機日益尖銳化的基礎

之上，發展着中國革命運動。國際帝國主義及中國反動統治階級各派，無法能夠消滅產生中國革命的那政治經濟的前提，便沒有任何方法能夠消滅中國工農兵貧民的蘇維埃革命運動。因此，我們相信：不僅國際帝國主義及中國反動統治階級各派，現在對付革命所採取的一切殘酷的壓迫與可恥的欺騙政策，將要立刻在我們勝利的工農紅軍及高漲着的羣衆運動之前迅速破產，就是牠們將來採取更進一步的壓迫手段與欺騙政策，結果也只有慘敗。蔣介石第三次進攻紅軍的計劃，在軍事上只是要更加多給紅軍以可乘之機，在政治上只是更加暴露國民黨反對羣衆和脫離羣衆的罪惡與弱點。蔣介石親自出發江西，即不作張輝瓚，胡祖玉之續，恐也難免作魯滌平，何應欽第二。廣東政府準備派赴江西剿共的香翰屏，余漢謀等料定也不會比南京政府過去的許多戰敗將軍起更多的作用。北方軍閥雖然再多送幾批兵馬去湘鄂贛「剿匪」，料想也不過又是些另外的岳維峻，公秉濬，孫連仲。就是英美日法帝國主義者，當着國民黨軍隊無力支持而實行公開武裝干涉中國蘇維埃革命的行動時，我們以幾萬萬工農兵貧民羣衆團結的威力，在蘇聯及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勞苦民衆的援助和同情之下，一定也能夠步蘇聯的後塵，戰勝帝國主義這種可恥的反動。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各派軍閥，在反動統治區域施行空前的白色恐怖，雖然使共產黨組織及革命羣衆組織，受到許多肉體的摧殘和暫時的打擊，但任何白色恐怖的手段，絕對不能根本消滅革命運動，而且不可免地

更要激起廣大羣衆對於統治階級的憤恨與誓死奮戰的決心。湘鄂贛三省是白色恐怖最嚴厲的區域，同時也就是紅軍蘇維埃運動最先發展和最先鞏固的區域，這一方面給了反動階級的白色恐怖以實力的回答，另一方面給了勞苦羣衆以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來衝破白色恐怖的堅強的自信。在國民會議這個總的綱領之下，從蔣介石到陳獨秀，從汪精衛到鄧演達，作了不少嘔盡心血的改良主義，及民族改良主義的武斷宣傳的欺騙，然而在國民會議這幕迷劇開演以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雙方實際行動，沒有一時一刻一樁一件，不直接間接地揭穿這幕迷劇的可恥真相。南京政府，廣東政府及其走卒們——托陳取消派，羅章龍右派，國家主義派等等——最近玩弄的許多假反帝的遮眼法術，在廣大羣衆真正反帝鬥爭向前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到可恥的破產。改組派，取消派，社會民主黨，羅章龍右派及黃色工會，農會領袖們所宣傳的那些資階級改良主義的所謂工農政綱——如二五減租，改良水利，部份的沒收土地，國民黨勞動法，工廠法等等——在土地革命及蘇維埃運動擴大深入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遭受到死刑的宣判。叛徒傅伯翠一類地『成立新共黨』，『土地歸農民，不要蘇維埃』的『新式』欺騙，托洛斯基教訓陳獨秀等的『不要罵紅軍，只須罵共產國際及中共的領導』的『巧妙』計策，或者將來更進一步地，學習德國反革命經驗來作些『土地歸農民』，『不要布爾塞維克』，『蘇維埃政權萬歲』等類的欺騙宣傳，我們也能應用勝利的布爾塞維克的

列寧主義的經驗來揭穿它們和戰勝它們。國際帝國主義及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在它們長期反動統治過程中，不僅已經掘成了自己的坟墓，並且已經培養成了大批的，有足夠力量埋葬它們到坟墓中去的羣衆。歷史已經註定了牠們的命運，對革命勢力的任何壓迫與欺騙，不能根本挽回他們的厄運。然而我們必須了解：帝國主義與各派軍閥政客對於中國工農紅軍及蘇維埃政權是抱着誓不并存的仇恨的，它們一定要用所有的力量來和工農紅軍拚命，蔣介石第二次進攻紅軍時比第一次增更多的兵力，定出更殘酷的計劃，國際帝國主義者在後面出過更大的力氣，在這次第三次圍剿當中，國際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各派軍閥政客們，一定要用更多的軍力來和紅軍作殊死戰，一定要更加重對於全國革命運動的壓迫與欺騙手段；我們絕不能因為我們兩次衝破圍剿的勝利，便存下輕敵僥倖的心理。我們必須認識：衝破第三次圍剿，需要我們比衝破前兩次圍剿用更多的氣力，就是揭破敵人的各種武斷宣傳的欺騙，也還需要我們艱苦的工作的努力。衝破第三次圍剿的迅速與否，全靠我們蘇區與非蘇區的工作如何而定。實現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完成湘鄂贛三省打成一片的蘇維埃區域，一定需要黨領導廣大羣衆作更艱苦的戰鬥！

四 因此，無論革命運動發展的客觀條件是如何有利，無論反動統治的維持是如何的困難，如果革命領導方面沒有及時的正確的策略，那麼，在決定勝負的戰鬥中還不能

保證革命方面的必然勝利。目前革命運動的發展，更加證明這一斷言的正確。凡是執行共產國際決議及四中全會決議的正確路線的蘇區（首先就是中央區，鄂豫皖，湘鄂西，閩西等），目前都得到強固工農紅軍及鞏固與擴大根據地的偉大勝利；而且各蘇區最近所得勝利的大小與他們各個實行國際路線先後和多少成正比例；只有未曾得到國際路線指示而繼續受立三路線領導的，如二集團軍過着逃跑奔竄的生活，而時常受到敵人的打擊。反動統治區域的中心城市的工人鬥爭，還表現出嚴重的散漫，零亂及自發性，反帝鬥爭還沒有成爲廣大羣衆的有組織行動。江浙各省，西北，東北及北方各省的農民鬥爭多半還帶原始性，半原始性及自發性，與我們黨過去受立三路線領導，以致不正確的領導工人鬥爭，放棄反帝運動，忽視農民運動，以及現在還未能走上羣衆這些鬥爭的真正先鋒地位，有極大的關係。中央喚起全黨同志注意：蘇維埃區域一般地還都是剛才開始執行國際路線的轉變，反動統治區域在執行國際路線過程中，還很少令人滿意的成績。立三路線與右的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兩面派的手段，調和派的思想，還隨時隨地的障礙着我們實際工作迅速的轉變，黨的領導還未能走上各種羣衆鬥爭的前衛，時常還表現落後，黨要能迅速地完成當前的緊急任務，首先就要全黨堅決執行國際路線的指示，不僅蘇區黨部要更加有力地動員起來，非蘇區黨同樣地要努力起來爲着當前緊急任務而奮鬥。非蘇區黨部對於擁護紅軍和蘇維埃工作作得極不充分，必須有一激

底的轉變。中央要求全黨同志立刻動員起來，執行下列具體決定，以便迅速地完成黨的當前緊急任務：

(一) 江西中央蘇區至遲在八一以前，必須開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其他各蘇區代表大會，也必須立即舉行。同時，反動統治區域的地方黨部——首先就是上海，香港，北平，天津，滿洲，徐海蚌——須立刻動員起來，領導廣大勞苦羣衆熱烈地作慶祝紅軍勝利的羣衆示威，集會，廣泛地宣傳全國蘇大會開幕及其政綱法令草案，號召工農兵貧民選派代表去參加蘇大會和加入工農紅軍，發起廣大羣衆的慰勞工農紅軍的募捐運動。

(二) 各蘇區利用自己連次戰勝的經驗，及敵人可乘的弱點來決定我們的新戰略，以鞏固根據地的陣營，配合着誘敵深入及擊破一方的戰術，來摧毀敵人「長追」的部隊，以發動廣大羣衆後方騷動和四出游擊的計劃，以瓦解敵人「堵截」「預備」的隊伍，以廣大地組織和應用農民赤衛隊，少年先鋒隊，及加緊鄰近蘇區的反動統治區域的羣衆工作及兵士工作，來打破敵人「利用民團游擊」及「黨，政，軍，民合作」的計劃，一方面堅決反對立三路線的單純的軍事投機觀點，以爲在軍閥戰爭將要爆發的時候，紅軍便可毫無顧忌的離開根據地而冒險輕進；另一方面堅決反對機會主義對國際路線曲解的庸俗觀念，以爲鞏固根據地的策略內容，便是使紅軍永遠保守着個狹小區域，在任何時

候我們的蘇區和紅軍均不應擴大。英勇卓絕地時時佔在軍事的主動地位，處處從應用廣大羣衆力量去戰勝敵人着眼，不絲毫放鬆敵我對比的優勢機會乘機消滅敵人的主力，加倍地鞏固蘇區根據地，同時，沿着根據地的周圍，鞏固的向前發展，以擴大蘇區的領域，是目前中心的戰略。同時，在敵我力量對比不利的條件之下，應該實行採取保存紅軍主力與避免正面衝突的戰略，在現時也依然有效。反動統治區域的地方黨部——首先就是進攻紅軍的主要後方區域的黨部，必須盡一切力量去發動農民的游擊戰爭，組織士兵的革命譁變和領導自發的兵變，進行軍事上的破壞工作，響應蘇區的軍事行動。

(三) 建立蘇區周圍的白色區域的羣衆工作——首先就是武漢，長沙，南昌，九江，岳州，南潯路，武長路，京漢路等，要成爲蘇區及非蘇區黨部目前的中心任務，必須盡力把這些區域的黨的組織基礎及羣衆組織基礎建立起來，發動羣衆鬥爭，領導羣衆響應紅軍和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

(四) 必須利用現時戰勝的便利條件，更加加緊建立與鞏固政治上堅定軍事上強固戰鬥力的真正「鐵軍」似的工農紅軍的任務。把最近作戰的勝利經驗中的優點和弱點搜集起來訓練我們的紅色戰鬥員，并且要把戰勝得來的各種武器能夠有組織地利用起來，開始作大規模平地戰及城市戰的演習。非蘇區黨部團部必須盡量把軍事專門人材軍事技術人員及軍事政治人材輸送到蘇區去。

(五)蘇區內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須變成經常性的系統工作，必須立即在各蘇區成立起『政治保衛處』專門組織，同時，要把肅反工作的真實基礎建築在廣大革命羣衆階級自覺性及積極性的身上，堅定地實行『土地革命不是富農的而是貧農中農的』這一正確原則，加之以無情的思想鬥爭，這樣來吸引廣大貧苦羣衆積極參加蘇區的肅反工作和使動搖的中農分子不受反革命欺騙利用。

(六)必須作到真正動員全黨加強士兵工作的轉變，中央要求蘇區及非蘇區的地方黨部——尤其是鄰近蘇區及軍事要塞的反動統治區域黨部，立即把所有黨員動員起來，同時，把青年團員及一切革命的工農成分都動員起來，要它們作定計劃的士兵工作，選派一部分政治堅定和能吃苦耐勞的黨員團員及一切革命工農分子，給以短期的政治軍事訓練，送入到敵人的各種（海陸空軍）部隊中去進行瓦解和奪取敵人士兵的艱苦工作，蘇區黨部除派人打入敵軍外，必須領導紅軍士兵加緊作戰場上與敵軍士兵『聯歡』的工作，對俘虜士兵工作，必須有一徹底的轉變，不應該只看重於開歡迎大會後給資遣散，應該是多動員廣大羣衆對他們多作一些較長時間的政治宣傳鼓動工作，然後把它們之中較好的成份吸收到紅軍中去，分編到我們堅強的紅色戰士一塊去，使他們學的軍事技術能夠拿出來幫助工農兄弟，而我們的紅色戰士能夠在政治上改造他們，同時，並應該分配他們以土地。當然，不願意留在蘇區的，我們必須給資遣散它們，鼓動他們到敵人

部隊中去散佈我們的影響。

(七)紅軍繁次的勝利與羣衆鬥爭的高漲，及爲着加速地衝破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更加重了黨在中心城市工作的任務。過去幾個月來，黨對於中心城市的工人鬥爭表現出嚴重的落後現象，許多自發的鬥爭黨未能去領導，甚至有些地方黨部忽視和放棄對工人鬥爭的領導，中央要求全黨立刻進行職工運動的轉變，從中央到區委，必須立刻建立起有經常系統工作的職工部以加強對工會工作的注意和指導。產業支部應該起赤色工會的黨團作用，加緊領導各種工人羣衆的經濟的政治的罷工，組織和領導有可能的某一產業（如上海絲廠及電車等）的同盟罷工，加緊在鐵路海員兵工廠工人中的工作，是對於我們工農紅軍的有力幫助。黃色工會中的工作必須成爲黨在職工運動中的經常工作。

(八)春荒夏荒時期的農民鬥爭正需要黨去領導，黨應該把發動農民的抗捐，抗稅，抗債，分糧，吃大戶種種鬥爭，奪取農民半宗教性組織內的羣衆，準備與發動農民羣衆的游擊戰爭，建立農民羣衆的農民協會或農民委員組織，成爲工作日程的第一位。

(九)反帝運動在紅軍蘇維埃發展的影響之下，在有些地方已經日漸捲入更廣泛的羣衆，蘇區與非蘇區黨部必須根據中央最近關於動員羣衆擴大反帝運動決議的指示，作到一個真正實際工作的轉變，同時，要立刻糾正過去對於青年與婦女工作的忽視錯誤，加緊對於各地團部工作的領導和幫助，立刻在各級黨部之下成立有經常工作的婦女部，

許多黨的省委，及地方黨部都沒有婦女工作的現象，是再也不能一天繼續下去的。

五 能夠真正完成上述任務的前提是黨的布爾塞維克的思想上的統一，組織上的鞏固，與革命的積極性，黨必須對於黨外敵人的一切反共產主義的反革命的思想，加以殘酷無情的鬥爭，必須把共產黨的政治面貌與政治要求，與一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別的政治面貌與政治口號畫分得清清楚楚，對於一切反革命派別提出的一切武斷宣傳與欺騙口號，都要及時地揭露其反革命性，要努力肅清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及民族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中的影響。在黨內實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尤須要具有百分之百的布爾塞維克的堅強性。一切離開列寧主義的傾向——那怕是極微小的和剛萌芽的傾向，都要給以殘酷的無情的鬥爭。加緊反對目前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向（首先就是對於革命運動形勢的估量不足，等待軍閥戰爭而放鬆擁護紅軍蘇維埃任務，以為軍閥戰爭不爆發什麼沒有辦法放鬆羣衆鬥爭的發動和領導……等傾向），絲毫不放鬆反對「左」的立三路線的殘餘，堅決地反對那些以為「四中全会後立三路線已經不成問題」，「立三路線殘餘已經肅清，不必慮及」的立三主義擁護者的武斷宣傳，殘酷地打擊那些以為「羅章龍右派」產後，右傾機會主義已經不十分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辯護士的可恥論調，隨時隨地的與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消極、怠工，等作決絕的鬥爭，對於口頭擁護國際路線實際反抗和不執行國際路線的兩面派，以及對「左」右機會主義的調和

派堅決地開火，尤其要對那些反對自我批評的各種傾向（如以家長制度壓制自我批評，用怠工辭職方式反抗檢查工作，以爲『批評就是攻擊，攻擊就是批評』等等）作殘酷的鬥爭，因爲沒有自上而下而上的殘酷無情的自我批評的武器，那麼，所謂加緊兩條戰線鬥爭及實行黨的工作轉變與組織改造等，都變成了一些時髦的空話，只有在銳利的自我批評的武器的鋒芒之下，才能揭露那些一切離開國際路線的反黨傾向的原形，才能轉變那些客觀上幫助敵人破壞和隔離羣衆聯系的組織方式與工作方式，才能將那些消極，失望，腐化，怠工，投機，動搖的異己分子從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中下層組織中洗刷出去，將那些階級意識堅定，工作情緒積極的好的幹部——首先是工人貧農雇農幹部吸引到黨的領導及組織中來，同時，堅決地打擊那些保持着各種派別觀念及對共產國際領導與護擁共產國際路線的同志們的侮辱造謠的殘酷無情地揭露以瞿秋白，李立三爲領導的一部份同志曾經有過的『小團體觀念』對於黨的危殆和罪惡，反對任何方式的反國際反黨的小組織傾向的活動，使中國共產黨更加布爾塞維克化，此外，目前緊急任務的執行，需要提高和發揚每個黨的組織與每個黨員的積極性，除却應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外，必須廣大地採取革命競賽的工作方式（不僅組織與組織間應訂競賽合同，個人相互間也當採用）。只有把全黨同志的積極性盡量發揮和運用出來，才能夠加速地完成黨的當前緊急任務。

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圍剿，我們在五個月時期內破衝了，第二次圍剿，我們在三個月便衝破了；現在敵人正開始着對紅軍的第三次圍剿計劃，中央相信全黨在接到中央這次訓令後，一定能夠立刻動員起來對於過去兩次訓令所指示過的工作作一嚴格的檢查，根據過去一切勝利和失敗的教訓，依據這一訓令的原則，立刻規定具體的工作計劃，以十二萬分的革命勇氣和熱忱來實現黨的當前緊急任務，那麼，我們將以更短的時間內取得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完成湘鄂贛三省打成一片的蘇維埃區域的光榮勝利！

（這一訓令應與中央給紅軍黨部及地方黨部的訓令的參改材料同時討論）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央政治局通過

編者按：這一訓令原已編入布報第五期發表的，後因印廠被敵人破壞，稿件遺失，故遲至現在始與讀者相見。但四月來革命鬥爭的經過，更其證明了這一決議的正確。

十月廿日

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提綱

一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

爲了重新分配世界市場，爲了更多的奴役世界勞苦民衆而興起來的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在各帝國主義國家內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政治恐慌。因這一恐慌的特別緊張，而第一次爆發出來的，即爲一九一七年俄國的二月革命。

列甯同志說：

『帝國主義戰爭，客觀上是不可避免的要特別推進和空前地加厲無產階級的鬥爭，帝國主義大戰一定要轉變爲敵對階級間的國內戰爭』。

『這種轉變開始於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的革命』。（『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

因此，俄國的二月革命，實際上是最初打破了帝國主義系統中的一環，並且是最脆弱的一環。這是因爲：第一，俄國有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第二，英法帝國主義和俄國十月黨，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的勾結，反對屢次敗北的沙皇政府。

俄國的無產階級所以是最革命的，『並不是因爲它具有特性，而是因爲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傳統』。（列甯，同上）

列甯同志說：

『如果沒有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三年中，俄國無產階級的偉大的階級激戰和革命的毅力，那末，第二次革命就沒有這樣的迅速（指幾天內完成革命的開始

級段)。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深刻地震動了帝制的基礎，掃除了幾世紀的舊習，驚醒了數百萬工人，和數百萬農民，使他們進入到政治生活和政治鬥爭中；相互的指示出（並且指示給全世界看）俄國社會的一切階級（和其主要的政黨），指出他們的本質，她們的利益和力量的相互關係和他們目前及將來的目的。第一次革命和革命以後的反動時期（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四年），盡情暴露了沙皇專制政體的內容使之纖微畢露。揭破沙皇以拉斯布丁為首的沙皇狗黨的一切腐敗，齷齪，淫亂，放蕩，顯示了羅曼諾夫朝的殘暴，這些，羅曼諾夫輩的強盜，把猶太人，工人，革命的鮮血，灑遍了全俄國；這個擁有千百萬俄畝的『超超等』的地主，為保障自己和自己的階級的財產起見，就是什麼殘暴舉動，什麼罪惡滔天，對於任何公民的摧殘和屠殺，都無所不爲了。

『倘若沒有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沒有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四年的反革命，那末，俄羅斯民族與居住於俄羅斯的其他民族的各階級，或許就不能有二月三月革命的八天內所表現出來的確定的自決；這些階級相互中間和對於專制沙皇的關係，或許就不能像二月三月革命的八天內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確定，倘若可以玄妙些說，那麼這八天的革命，正是經過十幾次主要和次要的練習後方才『排演』出來的戲；『角色』都相互知道自己的作用的地位，熟知自己的境遇，以至透悉較大

的政治方向和行動方法』。(同上)

同時，正因為在戰爭中沙皇政府完全表示了它的腐敗與無能，使在戰爭中逐漸壯大起來與逐漸取得政權的俄國資產階級，不能不同英法帝國主義者相互結合，去障礙尼古拉第二與威廉第二之間的『單獨』條約及單獨和平，去撤換維曼諾夫而代替以自己的政權，以取得帝國主義戰爭的勝利。

列甫同志說：

『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這樣迅速和這樣『激進』(表面上，粗看起來)，祇是因為一種完全不同的潮流，完全不同階級利益，完全相反的政治和經濟的企圖，在非常特出的歷史環境下，融合起來，並且非常『親密』地融合起來了。就是說：一方面，英法帝國主義的陰謀，爲着要延長帝國主義的戰爭，爲着要更激烈的堅決的進行戰爭，爲着要烤榨新的千百萬俄國工農，以求爲古契柯夫獲得君士坦丁，爲法國資本家獲取敘利亞，爲英國資本家獲得美索不達米亞等等起見，於是推動了米留柯夫，古契柯夫之流，上去奪取政權。他一方面：廣大民衆(全體城市和鄉村中最窮苦的人民)爲着麵包，和平，和真正自由，興起了深刻的革命運動。在某個知促的，時勢形成的特殊時期中，祇想掉換皇帝的比亭，古契柯夫，米留柯夫輩底鬥爭，也給革命的工人兵士以助力；但革命的工人兵士對之並不有所驚喜，他們

要把齷齪的沙皇專制政權破壞到底』。(同上)

正因為這樣，所以二月革命的特點，就是這兩種相反潮流的交流。這特點的具體表現，即是兩重政權的建立。

列甯同志說：

『彼得堡的工人兵士，以及全俄的工人兵士，爲着自由，爲着把土地給農民，爲着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和平，而堅決的起來打倒沙皇的專制政權。英法帝國主義的資本家爲着續繼和加厲這種戰爭，而玩弄宮庭的詭計，製造陰謀，慫恿古契柯夫及米留柯夫，屬望於他們，擺佈完全準備好了的新政府，這新政府在無產階級的鬥爭給沙皇政體以最初的打擊之後，即奪取了政權』。(同上)

這一資產階級的政府即由古契柯夫與米留柯夫等所組織起來的反革命的臨時政府。這個政府（這個政府，從目前戰爭的觀點看來，實際上不過是擁有無數量財富的『英法』洋行的夥計而已）並存的，還產生了一個新的，非正式的，尙未充足發展的，還比較柔弱的工人政府，它表現無產階級和鄉村城市中貧窮人民的利益。

這就是彼得堡的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列甯，同上)

關於這一新的政權，列甯在『論兩個政權』一文中更說道：

『這另一個政府的階級成份怎樣呢？無產階級與農民（穿着軍服的農民）。

這個政府的政治性質怎樣呢？這是革命的專政，即直接依靠革命的奪取，不按集中的國家政權所頒佈的法律，而由民衆直接從上創建起來的政權。這並不是一種存在於國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國家裏而統治於歐美各先進國家的那種尋常形式的政權。人們時常忘記這件事實，時常不加以思索，但全事線索，却正在這裏。

這新的政府，就是工農民主專政。『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在生活中實現了的工農民主專政』。（列甯，『論第路書』第一信）

但是因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組織和覺悟力的不足，這代表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府，這握有彼得堡一切實際權力的工農政府，並不能把政權完全拿到自己的手裏。却正相反，正因爲他們組織力與覺悟力的不足，它同臨時政府做了妥協與許多事實上的讓步，『已經並且把自己的地位，逐漸讓給資產階級』。（列甯，『論兩個政權』）

這一代表帝國主義，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是決不能給民衆以和平，麵包與自由的。它決不能滿足革命的工農民衆的要求。因此這革命必然要走向前去。所以二月革命不過是『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

『這一階段，大概總不會是我們革命的最後階段吧』。（列甯）

二 十月革命與兩條戰線的鬭爭

二月革命之後，列甯認為：

「俄國現時政局的特點，就在革命要從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因無產階級覺悟與組織的不足，把政府結了資產階級，在革命的第二階段上，政權應該轉到無產階級和一份部最貧農民的手中。」（『論目前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

所以列甯在二月革命發生之後第一篇他的文章中（即『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即是提出這樣的口號：

「工人們，你們在反對沙皇帝制的國內戰爭中，已經表示出無產階級民衆的特出英雄氣概，你們應該更表現出無產階級和全民衆的組織上的特長以預備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勝利」。

換句話說，目前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在怎麼使政權從資產階級落到無產階級的手裏。要達到這一目的，向這一目的走去，列甯最初就提出必須同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與左傾機會主義做堅決的鬥爭。

在多數黨內當時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者即為加米尼夫。加米尼夫當時認為土地革

命還沒有成功，工農民主專政還沒有建立，所以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還沒有完成，所以二月革命後黨的中心任務，是在完成徹底的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實現工農民主專政。很明顯的，這種觀點，是同列甯的觀點，完全處於相反地位的。不征服加米尼夫的這種觀點，黨決不能推動革命前進。

列甯認為二月革命已經結束了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因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是否完成，并不一定要看客觀革命任務的是否完成，而是要看新的政權性質。列甯說：

『自這次革命以後，政權轉到別個新階級，即資產階級的手裏。』

『在革命嚴格科學意義以及實際政治意義上講來，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到別個階級，是革命的第一個根本的主要標誌。』

『因此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革命已經完成了』。（『論策略書』）
同時，

『在俄國革命中，『工農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在某種形式下，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公式所能預見的，祇是階級的相互關係，而不是實現這種相互關係和相互合作的具體的政治機關。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在生活中實現了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同上）

所以布爾塞維克的口號與思想，一般的說來，已經為歷史所證實，雖是具體的事實

，却和任何人所期望的不同，却更要奇異些，特殊些和複雜些。加米尼夫等那些『老布爾塞維克』，不去研究新鮮的靈動的實際情形的特點，却祇是無意義的背誦爛熟的公式，自然對於目前的時局不能有正確的了解，自然會發生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因爲民主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所以列甯說：

『現在日程上，已有別的新任務：即在使這個專政內部，無產階級成份（反對保護祖國的，國際主義的，『共產主義』的主張轉變到公社去的等等之成份）和小財主，或小資產階級的成份（且夷之，采萊台里，司節克各夫社會革命黨，以及其他革命祖國保衛派，反對轉向公社去的運動和贊成『幫助』資產階級政府的那些人）發生破裂。

『現在要是誰祇講『工農民主專政』，誰就落伍在生活之後，他因此實際上就投奔小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因之就應把他送到布爾塞維克的革命以前的古物陳列所去（或可名之爲『老布爾塞維克陳列所』）。

從另一方面說來，加米尼夫這種主張，實際上是在夢想農民羣衆會自動起來，取得政權，而『完成』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的可能。當然，這種可能不是完全沒有的。

『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在估計時機時，不應該從可能方面出發，而應該從實際出發』（列甯），而實際已經告訴我們，這些農民的代表已經自動的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表示出

了資產階級同農民階級的合作。

「倘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看着將來這個階段的可能，而忘却他目前在農民和資產階級妥協時的任務，那他就變為小資產階級分子了。因為實際上，他就在宣傳無產階級，去信任小資產階級（這些小資產階級，這些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中，已應該和資產階級分裂）。他想到快樂甜蜜的將來之『可能』（那時農民不再為資產階級的尾巴，社會革命黨不再為資產階級政府的附屬品），而忘却不快樂的現存（當農民還是資產階級的尾巴，當社會革命黨人社會民主黨人還仍舊是資產階級的附屬品和爾伏夫『陛下』的對派）。（同上）

祇有堅決的同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派別分裂，獨立的去爭取廣大的工農羣衆，到多數黨的領導之下，才能使政權從資產階級落到無產階級的手裏，才能完成革命的第二階段，即無產階級的革命。加米尼夫那種觀點自然是代表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反對革命的前進。這同一切取消派，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所以工人應該幫助資產階級的觀點實際上沒有二致。

但多數黨除與加米尼夫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做鬥爭外，更同『左』的盲動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等做鬥爭。

列甯自己這樣的設問：

『但是我們會不會陷入主觀主義的危險，會不會有『跳越』尙未完成的（農民運動尙未過去）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而即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的那種危險呢？』（同上）

列甯自己這樣回答這問題。

『倘若我這樣說：『推翻沙皇，成立工人政府』（作者按：這是托洛斯基所提出的口號），那末，就有上述的危險。我所說的不是這樣，而是別個樣子。我說，在俄國，除工人，僱農，兵士及農民代表蘇維埃外（資產階級政府不計），不能有別政府。我說過，在俄國現時政權從古契柯夫，爾伏夫等的手裏，只能轉給這些蘇維埃，但是在這些蘇維埃中佔大多數的恰是農民，兵士，倘不按生活上，居住上，職業上的特質，而按階級的特質，用科學的馬克思的名詞來說，那末其中佔大多數的却是小資產階級。

『我在自己的提綱（作者按：即有名的『四月提綱』）中，絕對避免各種對於還未經過農民運動或一般小資產階級運動的『跳越』，避免以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爲兒戲的舉動，避免任何布朗基式的冒險。我已直接指示出巴黎公社的經驗。這個經驗完全摒棄了布朗基主義，並且說明只在大多數羣衆，本身自覺地起來行動時，才能保證他們的積極性。

「我在提綱中，非常確定地說明要在工人，雇農，農民，及兵士代表蘇維埃中間增加我們的影響。爲使不發生絲毫的疑慮起來，我在提綱中曾一再提出作忍耐的堅毅的適合羣衆實際需要的『解釋』工作。」（同上）

列甯與他所領導的多數黨堅決的反對提出『打倒臨時政府』的口號。這種口號，只能使我們陷於獨立，因爲臨時政府，是爲蘇維埃所擁護的。列甯也根本不主張因爲蘇維埃擁護了臨時政府，所以要反對蘇維埃。反對蘇維埃，就是同羣衆對立，就是自取失敗。『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這是列甯那時所提出的口號。我們黨的策略，是在蘇維埃中（即羣衆中）奪取影響，使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社會革命黨等孤立，把革命轉變到第二階段。

『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實現，也並不是『立刻實行社會主義』，但是它將採取許多步驟，實際地忠實地走向社會主義。

列甯在『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一文中說：

『無產階級政黨，在小農的國家內，當極大多數人民還沒有覺悟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時，決不能以『實施』社會主義爲其目的。』

『這種辦法，如國有土地，國有一切資本家的銀行和新迪加，至少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立刻加以監督等等，都絕對不是『實施』社會主義，但他們是無條件地必

需採用的，並且應當盡可能力量用革命方法，來加以實現。這些辦法，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且在經濟上已完全可以實行。倘不採用這些辦法，那末要醫治戰爭所產生的創傷，預防將來的經濟危機，都是不可能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永不怕奪取資本家和銀行家的破天荒的潤利」。（同上）

列甯堅決的相信：這代表工農政權的蘇維埃，倘使明天得到了全部政權，那末，牠必然能採取這種步驟，爲人民造幸福。

就是在四月五月六月諸事變之後，當彼得堡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主張武裝暴動推翻臨時政府時，列甯與多數黨認爲時機未到，堅決反對。所謂時機未到，就是說大多數的工農羣衆還沒有完全到我們的領導之下，第一次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反革命面目，還沒有完全暴露。必須經過七月的事變，多數黨才暫時取消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而提出了『打倒臨時政府』的口號。（關於這些問題，以後還將說到）

能夠站在少數地位，以反對『羣衆的穢氣』，換句話說，能夠清醒地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正確觀點，以這種觀點來教育羣衆，而不盲目的跟在羣衆的後面，在另一方面，又能夠不脫離羣衆，而領導羣衆，這就是列甯主義兩條戰線鬥爭的主要任務！

三 十月革命中多數黨策略的特點

從上而所說的，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多數黨策略的一個特點，就是要把廣大的羣衆鬥爭，放在黨的領導之下，多數黨就在羣衆的鬥爭中間，不倦的指出羣衆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的錯誤，解釋多數黨口號的正確，給羣衆的自發鬥爭以組織形式與領導，來擴大黨的影響，以準備十月革命的暴動。所以史達林同志在『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的策略』一文內說道：

『在準備十月革命中的主要因素，就是這種準備是在一個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進行的。這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特點，在準備時期，多數黨策略的基本特點』。但是多數黨用了什麼方法，取得了一黨的領導呢？

這方法就是在把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社會革命黨與少數黨，當做革命中最危險的敵人，經常的揭破他們的假面具，奪取在他們影響下的民衆，使他們陷於孤立的狀態。

在多數黨看來，在俄國準備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革命最危險的敵人是立憲民主黨。因爲在那時這一政黨是妥協的黨，是調和沙皇與人民的黨，實際上即是使人民服從沙皇的黨。所以多數黨那時攻擊的箭，主要的是射向立憲民主黨的。因爲不使沙皇與農民分離，我們就沒法子取得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在現在，在革命從民主資產階級的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階段時，立憲民主黨已經變成了統治的黨。鬥爭的現在已經不是沙皇與人民，而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這時候，對於革命最危險

的黨，是社會革命黨與少數黨，因為這些政黨是妥協的黨，是調和資產階級與勞苦民衆的黨，實際上即是叫民衆相信資產階級的黨。不使資產階級與勞苦民衆分離，我們就不能取得無產階級的勝利。

列甯論二月革命後多數黨的策略特點時說道：

「這種特點，即是我們第一要把酸醋和胆汁灌入革命民主派辭句的甜水中。我們應行批評的工作，解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社會革命黨，孟雪維克的錯誤，準備和集合自覺的無產階級共產黨的成份，把無產階級從小資產階級的瘴氣中，解放出來。」

「看來，似乎「祇」是宣傳工作。但事實上這是最實際的革命工作，因為我們已經不能再往前推進革命。革命已經停頓，已爲空氣所阻，已經「躑躅於原處」，其原因，並不是外方的阻礙，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武力壓迫，而是羣衆的盲目信仰。」

「祇有和羣衆的盲目的信仰，進行鬭爭（與他鬭爭只能并且應該在思想上，用同志的勸告，指出實際生活中的經驗），我們方能從流行的革命辭句中解放出來，而真正推進無產階級的覺悟力，以及各地羣衆奮勇和堅決的自動力，自動的把自由，民權及土地民有的原則實現，發展和鞏固」。（『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

只因爲多數黨這一策略的成功，所以他在二月到十月的革命過程中，從小資產階級政黨之下取得了大多數的農民羣衆。只是因爲這樣，所以他能夠推翻臨時政府，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

所以孤立社會革命黨與少數黨是十月革命準備期中多數黨策略中的第二特點。但是多數黨用那一種形式，用那一種口號達到了他的領導的形式呢？

「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這就是多數黨動員羣衆的中心口號。就是因爲多數黨能夠把這一動員羣衆的機關，變爲暴動的機關，政權的機關，新的無產階級國家的機關，所以它達到了它的目的。

多數黨所以把「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作爲動員羣衆的中心口號，這是因爲第一、蘇維埃的第一任務是在武裝工農，這些武裝力量同人民是不能分離的。第二、蘇維埃同民衆有最密切的關係，民衆很容易控制它與改造它。第三、蘇維埃的委員，可以依照人民的意志而變動，用不到任何官僚主義的形式。第四、它同各種職業有不可分離聯系，能很便利的採用各種改革方法。第五、它給被壓迫階級中（工人與農民）的先鋒隊，利用這一組織來教育廣大民衆參加政治生活的可能。第六、它把立法與司法合併爲一。同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比較起來，蘇維埃是德謨克拉西的空前的進步。它是世界上從來所沒有見過的爲了大多數民衆，爲了被剝削者與勞苦羣衆的德謨克拉西。

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曾經這樣的說：

「如若革命階級的創造力，不能產生蘇維埃，那末，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將是沒有希望的吧；因為如若依靠舊的國家機關，那無產階級當然不能維持他的政權，而一刻之內要造成一個新的機關又是不可能」。〔布爾塞維克能否維持政權〕這一口號的所以成爲準備十月革命的中心口號，就是爲此。

但這一口號的運用，也不是死板的，一成不變的。這一口號因爲革命形勢的變遷，曾經過兩個不同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在七月事變以前。那時多數黨提出這個口號的目的，是在使少數黨與社會革命黨同立憲民主黨分離，使多數黨能夠在蘇維埃內與這些政黨自由鬥爭，在革命和平發展中改變蘇維埃政府的成份，使蘇維埃的領導逐漸落到多數黨手裏。這當然不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無疑的，它是幫助這裡專政的建立的。因爲這樣多數黨很容易暴露出那些政黨的反革命性，使他們孤立。但是七月事變，使多數黨的計劃不能實現。反革命的將軍與立憲民主黨做了當時的主人翁，完全取得了政權，使少數黨與社會革命黨完全變成了他們的工具。這形勢使多數黨不能不暫時取消這口號，而提出「打倒臨時政府」的口號。

列寧關於這一問題這樣寫道：

「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乃是革命往前和平發展的口號。和平的意

義，不僅在於沒有一人，沒有一個階級，沒有一種強大的力量，會在那時（從二月二十七號至七月四號）反抗和阻礙政權之轉入蘇維埃手中。不僅如此，和平的發展在那時之所以成爲可能，還因爲各個階級及政黨在蘇維埃內部的鬥爭（在全部政權及時轉入蘇維埃手中的條件之下），可以最和平地最健全地解決。……

『政權之轉入蘇維埃手中，本身沒有並且不能改變階級的關係；他不能改變小資產階級的農民。但他可以及時的發生極大的効力，使農民脫離資產階級，而和工人親近，更進而與之聯合。……』

『七月四日的轉變，就是在於此後的情形急劇地轉變了。政權的動搖情形，因此停止了。在最主要的地方，政權已轉入反革命的掌握中。……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實際上變成反革命行爲的殺人行爲的幫手。……』

『政權轉給蘇維埃口號，在現在祇能成爲理想或笑話。這個口號，在客觀上要欺騙人民，灌輸幻想於人民的頭腦中，以爲現在還是和以前一樣，只要蘇維埃奪取政權，或提出接受政權的決議案便夠了——以爲在蘇維埃中，還有不犯幫同殺人的政黨，以爲已經過去的，還可以使他回復過來。』

『實質即是，現在已經不能和平地獲取政權。只有在堅決的鬥爭中，戰勝現時當權者以後，方能得到政權。』（『論口號』）

『打倒臨時政府』，實際上就是主張無產階級用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但是列甯堅決反對在現在立刻舉行武裝暴動。他說道：

『俄國的工人，已經有充分的覺悟，使他們不至在顯然的對於他們不利的時候，投入敵人的挑釁的羅網中。現在如果出來動作，反對敵人，那末等於幫助反革命，這是毫無疑義的。只有在最低下的羣衆中，發生新的革命高漲時，方能作堅決的鬥爭，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同上）

果然，七月事變之後，經過一個很短的反動時期之後，經過了柯尼洛夫反革命的暴動，開始了新的革命的高漲。工人農民兵士的鬥爭，達到了更高的階段，他們對於少數黨與社會革命黨的反革命已經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多數黨開始在蘇維埃中取得了多數。於是多數黨第二次提出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這口號的意義現在已經和第一次不相同。現在無疑的『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現在就是把政權直接交給無產階級。現在這口號，已經不是和平發展的口號，而是武裝暴動的口號了。

把蘇維埃變成政權的機關，使廣大的勞苦民衆經過蘇維埃同反革命鬪爭，脫離帝國主義的約束，直接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這是十月革命中多數黨策略的第三特點。但是最後，我們還要問：多數黨究竟用什麼方法能夠使黨的口號，變成羣衆的口號

？多數黨爲什麼并且怎樣不但能夠使工人階級的大多數，而且也能使民衆的大多數相信它的口號的正確呢？

列甯這樣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在思想上，已經取得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主要的事。沒有這個勝利底第一步也是做不到的。但從此到勝利，還離開得很遠。僅靠先鋒隊不能獲勝。倘然整個階級，廣大羣衆不直接援助先鋒隊，或至少不對先鋒隊嚴守善意的中立，對於敵人不是絕不贊助，那末，這時候把先鋒隊驅入死戰，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想要整個階級，想要廣大勞動羣衆，被資本家所壓迫的廣大羣衆，都走到這步，僅靠宣傳，還是不夠的。這裏要靠羣衆自己的政治經驗，這乃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不僅在俄國而且也由德國彰明較著地證明了。不僅文化低落且常時目不識丁的俄國羣衆，即文化卓越智識豐富的德國羣衆，也須以自己的皮肉，親嘗那第二國際英雄們所組織的政府之全盤懦弱無能，喪心病狂，狼狽失措，婢妾行徑（對於資產階級），卑污手段等等，親嘗不可避免的極端反動派之專政（俄國之柯尼洛夫，德國之卡普之徒）；這與無產階級專政相對照，逼着他們不擇個去從，而決定走向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第十章，『幾個結論』）

換句話說，多數黨不但要取得黨的領導，而且也要取得羣衆的領導，要達到這一目

的，必須使羣衆在自身的經驗中了解到多數黨口號的正確。這裏最有趣味的例子，即爲召集與解散立憲會議的經過。

多數黨從四月之後，即提出「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指出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的國會是根本不相容的。但是多數黨不但不提出反對立憲會議，而且要求臨時政府召集這會議。爲什麼呢？這是因爲：第一，立憲會議在羣衆中間非常通俗，羣衆都夢想這個東西；第二，立刻要求召集立憲會議，會很快的揭破臨時政府的反革命性，所以在立憲會議的選舉時，多數黨不但不抵制，而且參加，這種參加不但沒有害處，而且可以給多數黨以宣傳自己主張的機會。甚至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多數黨還親手召集了立憲會議，在立憲會議的前面提出了土地，和平與蘇維埃政權的要求。這樣使民衆親身看到立憲會議的反革命性，使立憲會議在羣衆的心目中，失去它的信仰。正因爲這個策略的運用，所以後來少數黨與社會革命黨提出「一切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絲毫也得不到羣衆的擁護。

使羣衆利用切身的經驗，了解黨的口號的正確，這是十月革命中多數黨策略的第四特點。

四 十月革命的三大特點

第二國際的「理論家」以及一切托洛斯基主義者，都一致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只有在資本主義發達，無產階級佔人口中的大多數，文化程度高的國家，才能發生，才能成功。俄國是資本主義發展比較落後，無產階級佔全人口中的少數，而且文化程度低落的國家，在他們看來，當然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專政。所以俄國的無產階級，起初只能像俄國的少數派所主張的那樣，先行幫助俄國的資產階級發展俄國的資本主義，增加自己的人數，提高文化，然後再來革命，或是等待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都起來革命之後再來革命。

然而，俄國的無產階級並沒有聽那些英雄們的謊話，而開始了他們的革命，並且在十月革命中取得了他們的勝利。這一勝利，當然不是偶然僥倖的，而是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實際的應用。誰不懂得十月革命這一特點，誰就不能懂得十月革命所以能夠得到勝利的原由，與他的國際的意義。

在歐洲大戰前與大戰時，列寧根據於他的帝國主義的分析得出「經濟與政治的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不變的規律」。在歐洲大戰以前，英國是世界上資本主義最發展，殖民地最多的國家。但是在二十世紀之初，德國帝國主義發展的速度，遠超於英帝國主義，這不能不使德帝國主義發生重新分配世界市場的要求，而與英帝國主義發生很厲害的衝突，這種衝突最後必然會引到戰爭。這種戰爭必然更其加緊帝國主義國家

內資本家對於無產階級與勞苦民衆的壓迫，加強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剝削，必然更進一步促進革命運動的發展，一直到革命的爆發。

因爲帝國主義的經濟是統治全世界的經濟，所以在帝國主義力量比較薄弱，比較不穩定的地方革命就容易爆發。換句話說：帝國主義戰線最先破裂的地方，必然是帝國主義力量最脆弱的地方。因此使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中的勝利變爲可能，就是這個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上是比較落後的。

列甯在歐戰時，曾經這樣寫道：

「經濟的與政治的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不變的定律。所以社會主義可以先在幾個資本主義國家，或甚至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間得到勝利。」

在一九一七年帝國主義力量最脆弱的地方，自然是俄國。所以最初打破這一帝國主義系統的，是俄國的無產階級，雖是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比較英美爲落後。

在帝國主義時代，想拿這一國家或那一國家的資本主義發達的程度，來決定革命爆發的先後，必然會陷於嚴重的錯誤。因爲帝國主義的經濟，已經使各國的國民經濟，變成了帝國主義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只有從世界經濟出發，才能預測，在這一系統的那一處，革命會最先爆發。同樣的，以無產階級數目的多少，或其文化程度的高低，來預計革命發生的先後。

十月革命的成功完全證明了列甯這一理論的正確，宣佈了第二國際以及托洛斯基主義者全部理論的破產。以後革命的過程，當然同樣的會依照列甯所指示的道路而進步。據目前（一九三一年）的形勢看來，革命將最先在德國，波蘭，西班牙，中國，印度等開始爆發，因為在這些國家是帝國主義系統中比較脆弱的地方。

十月革命是列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實際應用：這是十月革命的第一特點。

但十月革命的第一階段，不立刻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而是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依照第二國際的先生們與托洛斯基主義者的『理論』，在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是有一條萬里長城間隔着的。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必然有一個比較長久的時期，至少幾十年，然後才能發生無產階級的革命。在這期間得到政權的資產階級必須要逐漸發展資本主義，無產階級逐漸積聚他們的力量，一直到反對資本主義的最後決鬥（甚至不必經過任何決鬥，而自然的資本主義生長為社會主義！）。如像中國的一些小托洛斯基主義者，以為中國現在根本不能革命，先應該利用外資，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

俄國的十月革命，打破了左右機會主義者幻想。二月革命很快的轉到了十月革命。這一革命的轉變并不像一些機會主義者所幻想那樣，一定要依靠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或是資產階級革命任務的有否完全解決，而是要看階級力量的對比。當無產階級能

夠在實際鬥爭中把廣大的勞苦羣衆奪取到自己的領導之下，使他們能夠同無產階級在一起做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那它就能夠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

列甯在『無產階級革衆與叛徒考茨基』一書的最後一章內說道：

『從四月起遠在我們奪取政權的十月革命之前，我們公開的說，并向民衆說明：我們現在不能再留在這革命上，我們國家已大有進步，資本主義已大有發展，破壞已達到了空前的程度，這破壞要求我們（不論我們願意與否）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去。因爲除了這一條路，沒有其他的方法前進，沒有其他的方法救護被戰爭所磨難殆盡的國家，沒有其他的方法放鬆勞苦羣衆與被剝削者的痛苦。』

『得出的結果，正像我們所說的，革命的經過證實了我們的判斷的正確。起初我們同全體的農民反對君主政權，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所以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的。然後，我們同貧農，半無產階級，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鄉村的有錢人，富農與投機家，所以革命是社會主義的。想用人工的中國萬里長城來隔絕這兩種革命，以無產階級準備的程度及它同鄉村貧農聯合的程度以外的東西來分別兩者，那簡直是馬克斯主義最大的曲解與庸俗化，是用自由主義者來代替了它。這就是用資產階級對中世紀制比較時的進步性的大話，來做了擁護反對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底反動工作』。

列甯這種觀點，當然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而且是正相反對。列甯以爲革命性質的轉變是要拿階級力量的對比來決定，而這位托洛斯基先生根本除了工人階級外，不知道有什麼其他的革命階級。他完全忽視了俄國的農民羣衆。所以托洛斯基從一九〇五年起一直到一九一七年，他只有一個口號，就是『打倒沙皇，成立工人政府』。托洛斯基的這種『不斷革命論』，和列甯革命轉變的理論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嗎？

十月革命是革命轉變的勝利，這是十月革命的第二特點。最後，十月革命的第三特點，就是，這一無產階級的專政，是在工業無產階級與由他所領導的農民羣衆的聯合上產生出來的。

無產階級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在怎樣去征服城市的與鄉村的勞苦民衆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鬥爭時勝利的決定條件，就是在誰能取得農民羣衆。一八四八年與一八七一年法國兩次革命的失敗，就是因爲農民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十月革命的所以勝利，是因爲無產階級取得了農民。

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決不像一切機會主義者所想的，祇是一些有能力的策路家，依靠這一部分民衆或那一部分民衆，而握得了政權。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階級的聯合，是爲了推翻資本主義，取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的聯合，是在領導權屬

於無產階級的聯合。

所以列甯寫道：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與勞動的非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小雇主，農民，智識份子等）或其中的大多數的聯合。這一聯合的目的，是在資本主義的完全推倒，永遠消滅資產階級恢復舊制度的企圖，與社會主義的建設與鞏固。」

對於十月革命的這一特點，也不是任何機會主義者所能夠了解的。不，這些第二國際的英雄們，正在夢想，在資產階級國會中他們佔了大多數，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他們根本反對任何專政，他們主張用德謨克拉西的表決方法，在國會中取得政權？當然，這可以是各種各樣的政權，但決不是無產階級的政權！

五 十月革命的十四週年與列甯主義的普遍勝利

自從十月革命一直到現在已經有十四個年頭了。在這十四年頭中，經過了國內戰爭的時期，經過了新經濟政策採用後蘇聯工業的恢復與改造時期，集體農莊的普遍的發展，使黨開始了消滅富農階級這一政策的新的時期。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開始了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五年經濟計劃！

今年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正是五年經濟計劃的第三年，正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決

勝負的一年。從現在所有的一切看來，五年經濟計劃第三年的預算能夠完成，已經是無疑的事實。這就是說今年的工業生產品，比較去年將增加百分之四十五。這就是說五年計劃工業建設一門將在今年完成百分之七十九，而重工業主要部門，將完成百分之九十八了。在農業方面，在今年的春天，產麥區域，如像烏克蘭，北高加索，華爾加河區域等，農村集體化的工作，實際上已經完全成功。百分之八十的農戶，已經加入集體農莊，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已經變為集體農莊的土地。在其他產麥區域，百分之五十的農戶與百分之五十的土地已歸併入集體農莊。一九三〇年正月五日，與聯邦共產黨十六次代表大會與第六次全蘇維埃代表大會所決定的集體化的速度，現在已經完全超過了。在今年春天，三分之二的春耕是屬於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的。

今年春天的播種運動，在蘇聯已經得到了空前的成功。據今年七月農業人民委員會的統計，今年播種運動的總面積為九千七百萬海克脫，比較去年增加了九百萬海克脫。把去年的秋耕與今年的春耕合併起來，那今年度收穫的總面積比較去年度要增加一千萬海克脫。今年棉花的播種，比較去年要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亞麻百分之一百三十五，甜菜百分之一百三十，向日葵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黃煙百分之一百二十六。

在蘇聯現在已經沒有一個失業工人，不但這樣，而且缺乏二百萬新的工人。最近甚至從各資本主義國家招致很多熟練工人。工人的實際工資，在一九三〇年增加了百

分之十二點一，在一九三一年工業工人增加了百分之六，鐵路工人百分之八。全體工業工人百分之九十二只做七小時的工作，工人住宅的建築費，在一九三〇年為五萬八千二百萬，在一九三一年則為十萬一千萬盧布。有二千九百平方米突的土地上，已經建築了屋，而一九三一年建築的達一千萬。一百萬以上的工人家屬，已經遷移到新屋裏去了。文化教育經費也有了很大的增加。

即以莫斯科一處而論，一九三一年兒童到了入學年齡而進學校的同一九一三年比較增加了百分之二百零五，高等小學的學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四，職業學校增加了百分之二千，大學校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七。托兒所，幼稚園的數目，也有很大的增加。在夏天有十萬個學校小孩送到莫斯科鄉下去休養。百分之九十六的新生兒，可以得到醫生的檢驗。

人口死亡率，在歐戰以前，一千人中死七十五人，在一九三〇年只有十三人。戰前，一百小孩中死二十七人，在一九三一年一百人中只死十三人。……

一切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五年經濟計劃的這一年頭，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築的一年。社會主義向蘇聯內部資本主義成分的進攻，已經取得了決定一切的勝利。這證明出，在資本主義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內，不但可以開始社會主義的革命，而且可以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

但是十月革命之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所以能夠取得這樣大的成功，完全是因爲領導這些無產階級國家的，是拿有列寧主義武器的聯邦共產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也就是列寧主義的勝利。

然而列寧主義的勝利，不但在俄國，而且也在全世界。

列寧主義不但指點出了俄國革命的道路，而且指出了世界革命的道路。

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節，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長足進步的一年，但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崩潰更深一層的一年。這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現在是一天一天緊張了。這矛盾，現在已經成爲國際關係的中心。這矛盾，更加促進了資本制度的崩潰。

除了這一主要的矛盾外，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與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衆的矛盾，由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歷史上最大的世界經濟恐慌，而更形緊張了。在這種條件之下，各帝國主義者，正在打算怎樣犧牲勞苦羣衆，犧牲他們的勁敵，犧牲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犧牲蘇聯，從危機中解放出來。

在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節，我們更明顯的看到帝國主義資本家與他們的走狗，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對於工人階級的進攻，對於殖民地剝削與壓迫的加緊，與爲了爭取世

界領導與重新分配世界市場，而發生空前劇烈的鬥爭。帝國主義戰爭與武裝進攻蘇聯的危險，現在是日益緊迫了。

但是在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節，我們也看到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與有些國家內（如中國，西班牙，德國等）革命危機的成熟。革命的工人與農民，現在都大批的投入到列寧主義的黨，共產國際的領導之下，爲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爲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了。世界各國的共產黨，祇是因爲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的領導，祇是因爲它們本身的布爾塞維克化，因爲它更了解并應用列寧主義的理論與策略，所以他們都能逐漸的取得革命領導權，領導千百萬的工農羣衆去『搗毀天日』。全世界被壓迫的工人與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現在開始了解，只有像蘇聯的工農一樣，才能從資本主義鐵蹄之下，最後解放出來。

十月革命的十四週年將鼓勵全世界的勞苦羣衆，依照列寧的指示而鬥爭。全世界的工農羣衆將以革命的階級戰爭去回答帝國主義武裝進攻蘇聯的戰爭與帝國主義的戰爭！全世界的工農將追隨蘇聯先進的兄弟之後，爲了全世界的『十月革命』而鬥爭！

六 爲中國的十月革命而鬥爭

俄國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正是中國革命向前迅速發展時候。全中國經濟的恐

慌，是在繼續的加深。工人運動與農民鬥爭，不斷的向前發展，兵士譁變，已成爲普遍的現象，反帝運動的潮流，正在全國被壓迫民衆中擴張出去。反革命內部的崩潰，自兩廣獨立以來，到目前已經是更進了一步。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也日益明顯。統治階級內部的財政恐慌，以及最近基於經濟破壞而發展出去的全中國的水災，已達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而尤其爲目前革命運動發展的主要指標的，即爲蘇維埃紅軍的發展與勝利。

今年俄國十月革命的紀念節，正是中國蘇維埃運動，有了很大發展的一年。自從帝國主義國民黨開始『圍剿』蘇區以來，差不多已經有五個月了。在這五個月中，全中國各個蘇維埃區域，不但沒有爲反革命所消滅，而且取得了發展與鞏固。爲廣大工農民衆所擁護的英勇的紅軍，在和反革命戰爭中，已經不斷的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牠一次兩次，以至三次的衝破了敵人的圍剿，給了帝國主義國民黨以嚴重的打擊。

三次圍剿的衝破，必然的要更加將蘇維埃運動發展開去。在目前革命危機正在成熟的背境之下，幾個中心城市取得，以及一省與數省革命首先勝利的前途的爭取，已經成爲我們黨目前的中心任務。

要實現這一任務的先決條件，就是國際列寧主義路線的堅決的執行。要保證這一路線的執行，我們必須更深刻地研究俄國革命的經驗，要更明澈地去洞察中國革命目前

的性質與前途。

很明顯的，中國革命雖同俄國革命不完全一樣，但牠們在大體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中國革命目前的性質，同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性質一樣，是以工農為革命動力，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這一革命，同俄國革命一樣，將不停止於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而且將更進一步的轉向社會主義。

但中國革命同俄國革命也有不同的地方。第一，牠所處的環境同俄國革命不相同。就是在中國旁邊，現在有建設着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第二，中國目前革命的勝利，將是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徹底勝利，牠必須要解決中國革命目前的幾個基本任務。第三，在實現工農民主專政的革命政府中間，共產黨將佔絕對的優勢。第四，這一專政將要有沒收外國資本家以及中國資本家企業的必要，因此不能不進行很重要的社會主義的步驟。

根據這許多特點，所以國際去年七月給中國黨的信上說：

「中國革命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將要比十月革命有更多的過渡階段。

然而中國革命把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縮短得很多，同一九〇五年條件之下所能看得出的速度比較起來，中國革命從民主資產階級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要快得多。」。

中國的機會主義者，對於中國革命轉變的問題，都是不能有絲毫了解的。或者像過去的陳獨秀主義者那樣，認為中國革命只不過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所以要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或者像洛托斯基主義者那樣（也是現在的陳獨秀主義者），認為中國根本沒有什麼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希望將來無產階級單獨的奪取政權。他們都反對工農民主專政。反對中國革命的轉變。我們黨內過去的立三主義者，也同樣的犯了這種錯誤，以為中國革命勝利的開始，即是轉變的開始，而否認了工農民主專政這一階段的必要。實際上，一切這些機會主義者，不但在反對中國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且也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因為在中國，沒有澈底的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不在澈底的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之下，實現工農民主專政（即蘇維埃政權），就不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

但在中國革命轉變時期，必須沒有一刻忘記共產國際下面的指示：

『應當注意到：社會主義是不能夠一下子直接實現的。過渡到社會主義要經過許多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長期的過程，分佈在許多要澈底執行的具體辦法中間。進到社會主義的各個步驟，應當從羣衆的需要出發，應當要使大多數的人民認識這種步驟的必要。這些步驟，應當是經濟實際情形裏面已經成熟的，應當是經濟上完全可以實行的。應當估計到各區域社會的情形區別，估計到

農民羣衆的組織力量，和覺悟程度之不同。估計到氏族祠堂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影響的力量。應當記得：我們的任務不是取消，而是改造小農經濟。所以規定過渡辦法的時候，無產階級無論如何不應當脫離自己的農民後備軍』（一九三〇年七月國際信）

同志們！在俄國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節，我們更應團結得如像一個人一樣，在列甯主義旗幟之下，堅決的去執行國際與的四中全會所給與我們的路線，去爭取中國十月革命的勝利！

中央宣傳部 一九三一年九月七日

滿洲事變與我們在反日運動中的基本任務

少 峯

一

緊接萬寶山慘案與所謂朝鮮排華暴動事件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更藉口所謂中村被殺事件與謊稱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於九月十八日晚緊急的以武力佔領瀋陽營口長春與南滿安東兩鐵路線上的各重要城市，炮毀重要的要塞建築兵工廠及繁盛的街市，殘

暴的屠殺中國兵士與一般勞苦羣衆，同時更在次日佔領吉林延邊新民各地，并向青島天津北京葫蘆島秦皇島各地增兵，並委任瀋陽及其他地方的行政長官，折毀瀋陽兵工廠，移動大隊的駐鮮軍隊入滿。接着又連日用炸彈轟毀通遼錦州，不斷派軍艦向長江流域漢口上游等處示威恐嚇，到處挑釁肇禍，到處屠殺中國民衆，一邊又在滿洲指使中國軍閥豪紳袁金鎧熙洽等組織御用的所謂中和共和國，實際上東三省已經完全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變發生迄今已一月有餘，日本強盜的侵略及暴行依然有加無已，事變顯然還在伸張擴大之中。

這一嚴重的事變顯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殖民政策之產物，是日本武裝掠奪中國攫取整個滿洲作更積極進攻蘇聯之軍事根據地的野心的實現，日本帝國主義所以能夠而且不得不採取那個殘暴政策的原因是：

⊙劇烈的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用極大的力量打擊着日本帝國主義。日本的經濟危機『不景氣』現象，猛烈的發展着浸及一切生產部門與國內國外的貿易，廣大的羣衆失業，無產階級與一般勞苦羣衆生活的極端惡化，并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羣衆爭鬥的日益緊張與革命化（失業鬥爭之嚴重，罷工鬪爭的開展與朝鮮台灣的騷動），所有這些都促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採用更急進的帝國主義政策，加緊對殖民地的侵略與剝削，想把自己國內不絕增高的矛盾壓力更移置到殖民地身上去，滿蒙『廣袤七萬四千方里，

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鐵森林物之豐，當世無其匹敵。我國（日本）正宜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見田中義一對滿蒙積極政策之奏章），現在日本強盜公開佔領東三省，便是牠們『發揮帝國主義政策』（田中語），企圖保持其掠奪剝削統治之露骨的表现，雖然牠們『以培養帝國主義恆久之榮華』之狂妄的企圖，將不免被歷史命運所玩弄，因為現在社會發展之歷史鐵律已經慘酷宣告資本主義系統的歷史末路之逼近，但是這次滿洲事變總不失為日本強盜『發揮帝國主義政策』之露骨的表现。

③加以中國革命運動的開展，蘇維埃和紅軍的鞏固與發展，國民黨軍閥的進攻『圍剿』蘇維埃紅軍的屢次潰敗與覆滅，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高漲與災民鬥爭的風起雲湧，城市工人鬥爭的濃厚的反攻與進攻的成份，政治性質之日益顯明，農民游擊戰爭之發展，兵變潮流之勃起，以及北方農民羣衆的實現土地革命與建立蘇維埃政權之新起的行動（紅軍二十四軍在北方之成立），國民黨統治的經濟的財政的危機及其部分的分崩潰裂，更使帝國主義不能不發生自己對華統治動搖之刺心的感覺，不管托陳取消派與右派如何感嘆滿洲事件是因中國革命失敗消沉之結果，而日本帝國主義却不能不公開承認：『中國中部共產主義運動之發展，乃東亞之嚴重問題』（滿洲事變發生前日本宇垣之宣言），

同時中國國民黨軍閥又已不能隨心所欲的替牠們澈底消滅中國革命，外國帝國主義便更積極地進行組織公開的軍事武裝來干涉中國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與蘇維埃運動。事實上滿洲的佔據與武備的增加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爲更能便利的調動大批的海陸空軍來直接干涉北方及中部的游擊戰爭與蘇維埃運動，托陳取消派不懂得這種粗淺的政治常識，竟發出這樣驚奇的疑問：『如果牠（指日本）是因爲中國革命高漲而進攻，牠便直接向「工農運動和蘇維埃運動」動手，爲什麼反而自己動手打碎自己的工具——奉天勢力呢？』這對於牠有什麼必要呢？（取消派常委通告第五號）。其實『欲征服整個支那，必先征服滿洲』，正是日本強盜的如意算盤。至于滿洲領土及數十萬武裝在奉天軍閥手裏對於帝國主義本來沒有什麼危險，尤其在這次滿洲事變中國國民黨軍閥絕對不抵抗拱手相讓，使日本強盜以得滿洲如『探囊取物』的事實充分證明，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又要佔據滿洲并解除奉軍武裝呢？『這對於牠究竟有什麼必要呢？』，取消派百思不得其故，難道其中具有什麼難解之謎嗎？其實這一點也不難解答，這是因爲日本帝國主義恐怕這些武器會落到中國民衆——覺悟的兵士和工農手裏去呀！

③自然日本帝國主義這次佔領滿洲事變還有和直接干涉中國革命一樣重要的作用，那便是進攻蘇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驚人的成功，五年計劃的完成與超過，引起一切帝國主義的憤懣與仇恨。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間的矛盾，從沒有像現在這

樣猛烈地發展，因此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加倍地積極準備反蘇聯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乃是進攻蘇聯陣線之在東方的炮壘，滿蒙又是進攻蘇聯之重要的軍事根據地。而最近五年計劃的成功，使得蘇聯在西伯利亞東部的社會主義力量亦大大的增厚與鞏固，這就更加厲害地使日本帝國主義恐懼驚怖，尤其是蘇聯的存在與發展，給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與一般勞苦羣衆一個最大的刺激，而成爲他們實行革命鬥爭的大本營，在日本國內階級鬥爭日益急張的現在，不能不使日本的資產階級更加坐立不甯，所謂『赤俄主義猛進如此，益使我日本帝國寢饋難安』，『我日本帝國再與赤俄角逐于南滿曠野者，實爲國運之發展上所難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野心，從田中義一兩句話中已完全表明出來。最近遠東海參威朝鮮銀行支行的停業，日俄漁區與庫布貼現律的爭執，駐日俄大使之被刺等等，無一不證明日本準備進攻蘇聯之急進，這次滿洲事變更顯然是日本進攻蘇聯之積極步驟，日本佔領蒙洲之後事實上已大大推進了進攻蘇聯之實際陣線，白黨首領謝米諾夫在日本指揮下之重新活躍，白俄侵擾中東路事件不斷發生，都是鮮明的事實。托陳取消派一方面跟着帝國主義國民黨無恥造謠『第三國際進兵中國』（見取消派『工人報』第三期），另一方面又說進攻蘇聯『不是今天的事』（取消派常委通告第五號），其用意無非掩護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的進行與企圖緩和羣衆擁護蘇聯鬥爭的決心和運動而已。

④同時這次滿州事變的發生亦就證明各國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更加緊張與太平洋大戰的緊迫。資本主義世界，正在走向日暮途窮，牠們拚命想從危機中解脫出來，一方面主要的固然是加緊進攻蘇聯，但同時也就不能不推動各國帝國主義自己加緊爭取世界的領袖鬥爭，尤其因為殖民地銷售市場，原料產地，投資場所之壟斷的宰割，於是資本主義系統中之一般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強，財政資本列強間重分殖民地與勢力範圍之衝突也更加厲，就是說各國帝國主義強盜里分殖民的鬥爭亦更緊張了。所以現在國際關係的核心，自然是蘇維埃與資本主義世界矛盾的發展，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之日益緊迫，但同時，世界經濟中資本主義部分自身內部的矛盾，亦一天天更加尖銳起來了。在世界範圍內，這種帝國主義列強相鬥矛盾之樞紐，自然是老朽的英國與金元美國之衝突，而太平洋上列強衝突之主要基礎，則為日美之矛盾。日本對滿蒙獨佔政策，尤在在與美國『門戶開放，利益均沾』主義相抵觸，故日本公開宣言『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事實上奉天軍閥張學良最近親美之傾向，雖然他主要的仍是依靠日本以及美國在東三省勢力之逐漸擴張，也是促成這次滿州事變之導火線，事變之後，日美爭奪瓜分中國利益之鬥爭更加明顯。故滿州事變一方面主要的固然更加推進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之陣線，另一方面也就加強了帝國主義列強爭奪瓜分中國利益的鬥爭，促進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大戰將更迅速的爆發。滿州事變確實是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

之實際開始。

⑤然而促進日本這個侵略政策通行無阻的却又不能不歸功於國民黨的無恥的投降帝國主義及出賣民族利益，國民黨政府事前參預了日本武裝佔領滿州的計劃，遠在數年前孫中山就已和日本政府簽訂過『日本政府以友誼幫助廣東北伐，國民黨取得政權後即酬謝日本以滿蒙特權』的祕密協定，不久以前，日本武官及海軍到南京政府去公開提出『對俄必須首先取得滿蒙根據地』的主張，得到南京政府的承認，同時廣東政府也派陳友仁劉紀文赴日簽訂賣國密約；再則國民黨政府對於濟南慘案萬案韓案等等之屈服投降事實上都等於鼓勵日本加緊掠奪中國。事變發生，國民黨軍閥張學良蔣介石又下令不許軍隊抵抗，使日本強盜『如入無人之境』一天功夫佔領如許城市，不費吹灰之力便將中國數十萬武裝繳獲以去，將千百萬的勞動羣衆送給日本帝國主義者蹂躪，虐殺，奸淫與剝削。事後不但只有空口的抗議及向國際聯盟與美國強盜哀求乞憐，不敢有絲毫真正的反抗表示，反而號召『鎮靜』『無抵抗』與『逆來順受』，實際上更加緊對於羣衆的民族自覺和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殘酷壓迫，日本政府要求國民黨制止反日運動的通牒一到，南京政府廣東政府都立刻布告：『務須遵循正軌，否則格殺勿論』，接着國民黨政府即公開幫助日本槍殺反日民衆，於是上海寶山路血案與廣州永漢路血案便陸續開始排演，其手段之殘酷決不下於日本，可見國民黨政府不但無恥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

，給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與武裝佔領作開路先鋒，而且進一步槍殺反日民衆，公開擁護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瓜分中國之行爲。

一一

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次佔領滿州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之上實行的，牠的真實意義便是以武裝掠奪的方法，極力鞏固并擴張牠們在東三省的統治勢力，加倍地壓榨剝削中國的勞苦羣衆以找求本國經濟恐慌的出路，并依據着滿州的戰略上的各要點加強布置進攻蘇聯直接干涉中國革命與加強準備牠們帝國主義自己相間，主要的就是日美之間爭奪太平洋的領袖爭奪對中國統治利益的強盜鬥爭。所以這次滿州事變是各國帝國主義強盜反蘇聯戰爭直接干涉中國革命的具體步驟，同時也就是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特別是太平洋大戰與瓜分中國的實際序幕。

在世界經濟恐慌劇烈發展與革命危機日益成熟的情勢之下，在世界帝國主義者一致地瘋狂地進行反蘇聯戰爭準備的情勢之下，日本強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公開以武裝佔領滿州。其所以這樣順勝得手，便是因爲日本強盜利用着各國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革命進攻蘇聯的一致要求與國民黨軍閥的贊助幫忙，這一佔領與軍事行動確實推進了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陣線，很明顯的這次行動比之於兩年前國民黨軍閥進攻中東路事件

的軍事冒險，要更加幾十倍地的露骨和兇暴。牠們鑒於前次利用中國軍閥向蘇聯挑釁進攻之不易得手，非有更周密的布置不可，這次日本對軍事戰略的重要陣地之佔領，其設計之險惡，可以不書而喻，故日本軍隊一唾手取得南滿，一方面自己極積向北滿推進，另一方面即唆使白俄不斷向蘇聯挑釁。正在這時，英國帝國主義宣佈停止現金兌現之決議，德國陸軍參謀部忽告興奮活躍，中國國民黨國家主義派等亦放鬆日本暴行而着重宣傳蘇聯進兵中國，昨日倫敦路透電：英國國際事務院溫德翰且公然宣言進攻蘇俄非中國當局所能勝任，故日本在滿之權利，凡合法者，應予保障，如是方可合力以抗赤俄，可見反蘇聯戰爭陣線展開之危急，蘇聯對此次事變仍是運用一貫的和平政策，但因此却不能不更要提高廣大羣衆捍衛自己無產階級國家底戒備心與鬥爭毅力，因為事實上日本佔領滿州已經更明顯在實施牠們「得寸進尺方法以強進北滿地盤」，「與赤俄爲政治及經濟之角逐」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了。不僅如此，日本帝國主義雖然這次已經自己動手，然而牠那「欲與赤俄角逐必須驅支那爲前驅」的陰險政策仍在施行，國民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又大有「國可亡而赤俄不可不反對」之氣概，牠們一方面憑空捏造莫須有的蘇聯出兵與所謂「赤俄與日本提攜，在北滿平分秋色」之謠言，另一方面像新月派羅隆基等日本謀士（羅隆基在他所著「瀋陽事件」小冊子中屢稱「爲日本着想」，「願爲日本借鑒一着」，稱他爲日本謀士當無不合）竟公開宣言：中國被列強瓜分可以無慮

，獨怕「中國共產黨一旦成功，中俄兩國聯成一氣」，將使「亞洲局面不可收拾」。

加以日本強盜以利用列強進攻蘇聯的共同要求去吸引列強以牽制蘇俄，因此蘇聯更不能漫然掉以輕心。至於現在中國社會發現「聯俄」「恢復中俄邦交」的呼聲，則多半還是中國統治階級藉此向帝國主義撒嬌的作用，其中自然還有不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情緒很濃厚的一般人，因為四處絕路，於是又想起第二國際，想起聯俄政策，甚至於想叫蘇聯快快來打日本。但是這些人，在廣州暴動後南京政府無理殺戮蘇俄外交人員與蘇聯絕交，中東路事件的時候，南京政府攻打蘇聯的時候，他們是到那裏去了呢？他們爲什麼沒有反抗，而消極的贊助了反動統治賣國政府！自然蘇聯無產階級不但要捍衛自己的國家，努力建設社會主義，而且也極力贊助并實際援助中國工農的革命，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無產階級的蘇聯一直幫助一切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首先取消帝俄時對華的一切特權，在中東路事件中更可分證明蘇聯沒有絲毫侵略的野心，但是蘇聯的幫助中國乃是幫助中國數萬萬勞苦民衆的解放，她絕不能幫助中國剝削階級的國民黨軍閥地主資本家。覺悟的中國工農勞苦羣衆當然也不會放棄自己的責任，而一味去仰望蘇聯出來「打抱不平」擊退日本，反之，覺悟的中國勞苦羣衆一定更要在自己的鬥爭經驗中去了解並努力完成更高的國際責任，更要進一步了解目前帝國主義列強政策中的主要的與基本的傾向，是在於企圖推倒蘇聯，企圖造成全世界反動的恐

佈制度，進行包圍蘇聯與反對蘇聯的反革命戰爭，滿州事變後帝國主義列強的態度，尤其在這次日內瓦國際聯盟的提早集議，老奸巨滑的白里安之活躍與美國之列席理事會的事件中，更充分指明「現在的世界政治情形已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提到了前面，一切世界政治事件必然集中到一個中心點，即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反對蘇聯的鬥爭」這一重要的真理，因此我們也就更要提高保護蘇聯的鬥爭，去做帝國主義列強陰謀的答覆，同時我們也只有真正有力量去制止帝國主義及國民黨軍閥侵犯蘇聯，才能真正驅逐帝國主義完全滾出中國，在這種時候，蘇聯亦必能夠用她雄偉的力量幫助中國工農革命的勝利。

說明這次事件的根本樞紐之後，我們同時也要指明：世界經濟中資本主義部分自身內部的矛盾，尤其是列強爭奪中國殖民地的矛盾，經過這次滿洲事變亦更尖銳起來了。日本佔據滿洲之後，英美等列強即更積極向中國增兵，到十月二十日為止，美國新到驅逐艦已先後開到十五艘，開前次未有之紀錄，英法亦各新增駐華砲艦三艘，據時報調查：自九月十九日起至十月二十日止，英日美等列強駐華軍艦已逾百艘之多，計美艦三十八，日艦四十三，英艦三十九，其他法意十五艘，可見各國備戰之積極。英美日三國是代表世界最大的三個海軍國，而又是在中國互爭市場與原料的三個主要國家。自從世界經濟重心之移于美國與「金元」共和國之變為世界的剝削者，遂令美國資本主義與歐洲資本主義，尤其是與英國資本主義間之關係，更形緊張，于是老的保守的帝國主

義國家中最強大的英國與新的少年的獲得世界領導地位的帝國主義美國這兩國之間的矛盾，成了財政。本主義國家滿佈世界的衝突之樞紐。兩年以來，美國向英國資本勢力範圍與屬地如拿大等處之進攻，已大大的惡化了英美的關係，尤其在一九二八年英國保守黨內閣和法國談判海軍協定時，英美之矛盾更形緊張，後來英國工黨內閣二度上台，狡滑的麥克唐納因為要使列強火線更能向蘇聯進攻，於是廢止英法海軍協定，麥克唐納且親去紐約聯歡，於是英美衝突暫時有些緩和，但是牠們在各方面的矛盾仍舊蓄着昂進，最近英國危機更加增長，工黨內閣倒台，成立所謂聯合內閣，保守黨又起握政權，英美衝突亦必然繼續增高，在中國方面，自甯粵分裂以來，英美勢力角逐更顯而易見。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帝國主義相互矛盾的中心已經轉移到太平洋沿岸，而太平洋上湧現着的帝國主義相互衝突之主要基礎，則為日美之矛盾（自然英日之間亦有衝突，但在對美國的矛盾上英日却有相當聯合）。前面已經提到，滿洲事變之所以發生，除進攻蘇聯與直接干涉中國革命的主要作用，同時也就是英日美等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尤其是日本與美國爭奪中國太平洋大戰之實際信號，滿洲事變發生之後，日美衝突更突形緊張，各自都派大批軍艦飛機來華，一方面牠們是為的壓迫中國革命，另一方面也就是公開佈置太平洋大戰，同時日本對美國加入國聯理事會，也很明顯暴露日美衝突之緊張，『社會與教育』派胡愈之等所謂『日美聯合』，完全是無稽之談，牠們

的目的是在藉此遮蓋太平洋大戰之危險，使中國民衆不起來反對列強瓜分中國。中國國民黨政府依賴國際聯盟和美國強盜的奴隸行爲以及如『社會與教育』派樊仲雲胡愈之等『甯可使事件擴大，引起國際干涉』以找中國『生路』的反動主張，實際上都是希望英日美列強早早火併，預備把中國當頭彩去送給打勝的帝國主義。我們站在廣大工農勞苦民衆與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上，正應堅決反對列強瓜分中國，反對國際聯盟及美國強盜一切劫奪中國的陰謀，而且更要加強羣衆的革命鬥爭，爭得蘇維埃的勝利，把中國從帝國主義列強鐵蹄之下解放出來。同時我們也要懂得：任何一個帝國主義愈在自已相互矛盾緊張戰爭迫近的局面中，便愈企圖把戰爭烽火緊對蘇聯去掃射，雖然歷史不能由牠們作主，但是牠們都一想情願想先把蘇聯撲滅，然後自己再來火併，日本佔領滿洲之後，爲抵制美國的眼紅和干涉，便愈拚命向北滿與蒙古推進（自然牠同時也還在積極準備對美國戰爭），拚命誘發列強對於蘇聯的敵氣同仇，使大家的目標都集中轉向蘇聯去，前面所引英國溫德翰『允許日本佔據滿洲以共同抗俄』的宣言及今日報載捷克國家民主黨領袖克拉馬希『反對實行軍縮主張共同抵制』的言論，不過是更公開的表示。其實這次美國之所以加入國際理事會與國聯理事會這幾天的祕密協商，一方面固然表示列強帝國主義正在計劃瓜分中國，而同時牠們何嘗不是在協商進攻蘇聯的錦囊妙計呢？總之一切事實都告訴我們：滿洲事變之後，已經更進一步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瓜

分中國的戰禍。同時也就更明顯推進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陣線，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堅決反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太平洋大戰，反對列強瓜分中國，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實行變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的反動戰爭為擁護蘇聯爭取中國民族徹底解放推翻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死路。

七八

三

在國內反動統治方面經過滿洲事變亦起了深刻的變動，首先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殘酷暴行，激起廣大羣衆的反抗鬥爭，掀起反帝國主義浪潮之新的高漲，另一方面又因國民黨政府對帝國主義『鎮靜』『無抵』『逆來』受』，實際上完全是無恥出賣民衆利益與澈底投降帝國主義真面目之揭露，上海寶山路與廣州永漢路及南京福建等處公開槍殺反日民衆血案之不斷排演，更大大激起羣衆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統治之怒潮的高漲，給予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以新的重大的打擊，因此發生國民黨各派重新團結以圖挽救牠們自己反動統治的所謂『甯粵妥協』與『統一和平』運動。牠們在表面上掛着所謂『一致對日』『共赴國難』的招牌，實際上正在玩着『統一投降日本政策』『共同壓迫革命運動』的陰謀。同時一切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在野派亦都積極活躍起來，從國家主義派新月人權派『社會與教育』派一直到托陳取消派，差不多一致提出了牠們

所謂『對日宣戰』『組織國防政府』『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與主張，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國民黨正在團結一切反動勢力，以適應帝國主義列強與國內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統治之新的需要，準備一致來壓迫與虐殺工農革命運動。

現在中國出現所謂『組織國防政府，對日宣戰，以救國難』的呼聲，使我們不禁想起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法國資產階級所演之名劇：當時普法戰爭中法軍一敗塗地，拿破倫第三竟成俘虜，這一不幸消息傳到巴黎，次日（九月四日）就發生革命，資產階級爲防止工人勢力之崛起，乃組織所謂『國防政府』，藉口『捍衛國家』『以救國難』，剝奪工人及一切勞苦民衆的自由和權利，但實際上『國防政府』却已在和俾斯麥談判『投降』，後來民衆識破了牠們的詭計，奮起革命暴動，資產階級乃更公開『賣國』，『割讓許多要塞和堡壘，兩星期內繳納二萬萬法朗賠款』，其目的乃是在換得『強敵』來幫助牠們鎮壓國內革命，屠殺暴動羣衆。現在中國也出現所謂『組織國防政府以救國難』的呼聲，難道這僅是名詞上偶然的巧合嗎？絕對不是的。事實已完全證明；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真正敵人絕對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而是蘇聯與國內工農革命，牠們對於日本之佔領滿洲，絕對不敢抵抗，而只能『逆來受』。但是對於工農和軍與蘇維埃却必須加以絕對無情的圍剿與屠殺，同樣對於反抗滿洲事變反對帝國主義的廣大民衆亦非慘酷壓迫與槍殺不可。現在日本強盜已經向中國提出比二十一條更兇惡的所謂五條

件（即：①中日相互担保各不侵略，并保障彼此之土地完整，②中國境內各種排日形式連抵制在內須永遠取消，③保障中國境內日人生命與財產之安全，④償付用以敷造滿洲各鐵路之日款，⑤承認現有之條約權利，連日人在滿洲租地之問題在內）。而中國國民黨政府亦就公報宣布：『中日爭執上任何解決辦法，苟全世界認為公允與有理者，皆願接受，中國完全信賴國際聯盟，完全信用理事會之動作，定為公允而平等，故將絕對受理事會決議之約束』了（見十月十九日國民社中國政府總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正式之聲明）！國民黨政府出賣民族利益之鐵一般的事實還用得着其他事件的證明嗎！

現在所謂『和平統一會議』正在上海開幕，而其所要實現的正是上述這一『團結一切反動勢力，統一對帝國主義投降政策，共同壓迫工農革命運動』的勾當，牠們為要完全實現這一反革命任務，正在準備發行八千萬元的新公債，用『準備對日宣戰』的名義擴張法西斯帝的義勇軍，計開始對於紅軍蘇區之新的更殘酷的圍剿，實行有計劃的壓迫反帝運動，不僅如此，牠們還正在『和平統一』旗幟之下準備新的不可避免的軍閥混戰，幫助帝國主義兇暴的來劫奪並瓜分中國。因此一切事實都非常顯明的替我們指出：要推翻帝國主義，必須打倒國民黨，如果不同時堅決反對地主資本家軍閥國民黨，不堅決揭穿國民黨各派及其維護者：國家主義派，『社會與教育』派，新月人權派，托陳取消派等一切所謂『和平統一』，一致對日』『組織國防政府，以救國難』的面具，就

根•本•談•不•上•反•日•運•動•，•就•根•本•不•能•使•反•日•運•動•前•進•一•步•。

四

滿洲事變發生的時候，正是工農紅軍英勇的衝破第三次圍剿，蘇區逐漸鞏固與擴大，災民鬥爭逐漸興起，兵變騷動普遍發展，總之正當中國工農革命大風暴高漲怒號着的緊急關頭，所以此次反日運動一開始爆發起來，很快的發展成爲羣衆的，國民黨難于控制的範圍和程度。國民黨最初拿來玩弄自欺欺人的可恥工具，便是靜待國際聯盟及美國強盜的公理制裁，等到國際聯盟允許日本要求及美國以同樣公文并致中日雙方政府後，運動發展的程度和範圍更已經逐漸超出和脫離了國民黨御用和壓制，於是國民黨也就不能不轉變花樣來極力企圖用領導羣衆的方法來和緩，鎮壓與消滅真正廣大羣衆的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革命運動。——例如……：准許羣衆的宣傳，集會，示威遊行，以至空喊對日宣戰及組織義勇軍等等，然而經過九月二十六日國民黨御用的市民大會被共產黨領導羣衆轉變成公開革命活動，與蔣介石將大砲機關槍威嚇請願民衆打破學生請願幻想之後，國民黨所能再向前作的花樣已很有限，國民黨已很難再用其他方法來滿足羣衆當前的緊急需要，例如武裝羣衆，對日宣戰等等，所以國民黨的中心策略，又是怎樣儘可能地迅速地使羣衆鎮靜下來，既不要使運動變成真正武裝驅逐日本。

義滾出滿洲以及一切帝國主義滾出中國的真正民族解放運動，尤其不要使反帝怒潮與工人鬥爭土地革命災民運動及推翻國民黨統治聯系起來，勸學生安心讀書，工農努力增加生產和工作效能，兵士靜待政府解決，高呼『一致對外不要引起對內糾紛』『工農商學兵各階級團結一致，不要分裂戰線的階級鬥爭』（國民黨中央告民衆書）等等無恥麻醉口號，甚至造出希奇古怪的謠言，說什麼『江西紅軍派代表到南京要求與國民黨一致對日』，可見國民黨的張皇失措窮極無聊了。但是羣衆的反抗鬥爭還是繼續高漲，這使國民黨政府不能不由戰慄變成憤怒，於是國民黨的屠殺反帝羣衆與日本強盜的侵略暴行雙管齊下，到處實行白色恐怖，上海寶山路與廣州永漢路國民黨公安局慘殺示威羣衆的流血慘案便公開出演了！

這次運動之主要弱點，就是事變發生一月之久，而反帝的主力軍——工人階級還沒有完全參加鬪爭戰線。雖然滿洲事變發生之第三天，上海日本輪船碼頭工人即開始罷工反抗，接着廣東碼頭工人與九江碼頭工人及上海日商電廠工人一部分紗廠工人與鄭州日本紗廠工人等亦都陸續罷工，各地示威遊行，特別是雙十節上海各區的羣衆大會與示威遊行，其參加羣衆之最廣大與最積極的成分都是工人羣衆，因此，事實絕不如資產階級代言人周予同等所說的一樣：『勞動者比學生落後，勞動階級對於反帝運動已由領導者變爲追隨者』，事實上因正有了勞動羣衆積極參加鬥爭，才使運動能夠發展到更高階

但是，雖然如此，這次運動中工人羣衆確實還沒有完全參加國爭戰線，首先就是羣衆的組織如赤色工會與工人抗日救國會等始終沒有廣泛建立起來，罷工行動究竟沒有廣大發展起來，這就是使這次反日運動還沒有能夠更急劇並且更有力地衝破國民政府還企圖御用控制與可能御用控制的局面，還沒有能領導這次運動急劇地發展到更高的階段與更大的範圍。

五

工人羣衆所以還沒有更廣大更積極地參加戰線，罷工運動所以還不能廣泛的開展和深入，一方面固然由於帝國主義各派國民黨產本家及其工具社會民主黨新月人權派國家主義派托陳取消派羅章龍右派與黃色工會領袖對於工人羣衆之嚴重的壓迫及欺騙，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工人階級自己的羣衆組織——赤色工會及其先鋒隊——共產黨還未能把廣大工人羣衆團結在自己領導的周圍，尤其在實際策略上沒有很快把反日運動的怒潮與階級鬥爭的奮戰密切聯結起來，所以全國工人階級尤其是上海工人羣衆雖然已經充滿了反日的情緒，但是因為我們在發動他們罷工的時候，還沒有把『打倒日本強盜及一切帝國主義』『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三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中國民衆』『工農民衆自己武裝起來，趕走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與當時當地工人羣衆的迫切要求如加工資，

要房貼，要水貼等緊急要求口號聯繫起來，還沒有把反日運動與工人羣衆的日常鬥爭打成一片，因此也就不能使廣大工人羣衆立刻感覺到本身急切利害並立刻爲這些要求而行動起來。因此在這方面我們必須立刻實現一種轉變，就是要堅決把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的戰線同時並舉地開展起來，而且不僅對工人階級是如此，對於農民革命與災民鬥爭同樣亦應該如此。我們必須深刻明瞭：外國帝國主義與中國國民黨地主資本家軍閥官僚早已在經濟上政治上肌體銜接地勾結着，他們在剝削壓迫工農勞苦民衆是利害與共的，因此，誰也不應當把反帝運動與階級鬥爭支解分割。很明顯地，單純地一個反日口號既不能馬上給罷工工人以工資增加和生活待遇上的改良，也不能給廣大災民羣衆以馬上看得見和覺得到的利益，也不能鼓起兵士羣衆立刻違反着國民黨軍閥的法令而向日作戰或與工農羣衆聯合，反之，如果我們能夠正真把反帝運動與階級鬥爭同時開展并密切地聯系起來，則一定能夠領導這一運動發展到更高的階段與更大的範圍。

從前面的事實分析中，我們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滿洲事變不僅把帝國主義列強進攻蘇聯的戰線更推近了一步，而且也更緊張的促近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戰禍，因此我們在反日運動中的首要任務固然是要更百十倍地加強擁護蘇聯的鬥爭。同時也就必須更加強反對世界大戰，反對列強瓜分中國的鬥爭，我們必須抓住最近國際聯盟與美國強盜利用滿洲事變劫奪中國的種種事實，把反日帝國主義情緒和行動引導到反對英美

德法意等一切帝國主義利用日本出兵機 加緊瓜分中國與剝奪中國民衆的運動；我們不
但要逐驅日本強盜滾出滿洲，而且要逐驅一切帝國主義的勢力滾出中國，推翻一切帝國
主義的對華統治。

同時既然外國帝國主義與中國國民黨軍閥地主資本家早已發生機體的聯系；而事實
上也已一天天更加顯明的告訴我們：要逐驅帝國主義，就必須打倒地主資本家軍閥各派
國民黨統治。打倒一切組織『國防政府』『召集國民會議』的反動企圖。有什麼方
法能夠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呢？唯一的方法只有廣大工農兵士貧民勞苦羣衆的武裝
暴動，只有工農紅軍與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全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已經決定於今
年偉大的十月革命紀念節——十一月七日在江西開幕了；這一大會將產生中華工農兵蘇
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這是中國工農革命運動最雄偉的柱石，也是爭取中國反帝國
主義與整個工農革命勝利唯一的道路。

十月二十一日

托洛斯基派和國民黨

秋 白

- 一 飛機炸彈槍砲大刀之外的又一武器。
- 二 國民黨和托洛斯基派眼光裏的共產國際。
- 三 陳獨秀托洛斯基派的中國革命消

沉論和國民黨的統治。 四 「盲動主義的過火」恰好是國民黨殺人放火的「理由」呀！ 五 共產國際的組織力量「薄弱」，可是，國民黨和托陳黨且慢高興。 六 國民黨對於托陳黨已經欽賜「批評自由」了。 七 國民黨口中的托洛斯基派立場。

一 飛機炸彈鎗炮大刀之外的又一武器

國民黨對於中國革命的工人和農民現在是用全力來壓迫。所謂「勦赤」的大軍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起碼也有四五十萬，從今年五月蔣介石親自出馬到現在，也已經有四個月了！——以前的還不算在內。單這四個月裏面各地方被屠殺的民衆，真是數也數不清。國民黨的報紙上天天說「搗毀匪巢之偽政府黨部」，「殺死幾千幾萬匪徒」，「俘虜幾萬幾十萬」等等，如果照他們的數目算起來，國民黨殺人放火的結果，至少也有五六百萬以上的人民是被殺掉了！可是紅軍却仍舊存在着，有些地方而且還在發展。國民黨的這種屠殺政策，爲的是什麼呢？無非是保護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無非是保護中國豪紳地主的剝削和權力，無非是保護中國資本家的發財，無非是想用武力強迫工農民衆做他們的奴隸牛馬。然而紅軍和蘇維埃區域始終存在着發展着，雖然當前碰着極大的障礙，極困難的情形，而始終不但不消滅，反而日益得到更廣大的民衆的同

情和幫助，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這正是因為他們有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的指導，因此不但客觀條件有利於農民戰爭的開展，而且這種農民戰爭的有組織性有計劃性，能夠日益進步。所以國民黨的唯一政策就是竭力企圖消滅共產黨。大城市的租界政府，各省各地的軍閥政府一天到晚是在捉共產黨，一天到晚是在壓迫工人運動，及以一切革命的民衆運動。革命工人，爲着階級利益而鬥爭的工人，甚至於簡單的只開始表示反對減少工資反對苛刻待遇的工人，都被捉到監獄裏面去，受着非刑拷打，以至於鎗斃砍頭。普通的革命份子所受到的也是同樣的待遇，——只要他們敢於對工人農民表示一點同情，只要他們敢於說幾句話做幾篇文章來揭露國民黨的賣國殘民的罪狀，而主張工農勞動民衆奪取政權，他們的腦袋就立刻會有脫離身體的危險。至於共產黨員，那更不用說了。這樣，國民黨用來維持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的武器，是樣樣都有的了：攻打紅軍的飛機，炸彈，毒瓦斯，大炮，機關槍，槍斃革命工人和共產黨員的槍彈，砍他們頭的大刀，監獄，審判廳，一切希奇古怪殘酷暴虐的刑具。……可是，所有這些武器，看起來都不能夠保證中國革命的消滅，都不能夠保障國民黨的江山。共產黨在民衆之間的信仰反而一天天的擴大起來鞏固起來。

因此，國民黨還企圖用欺騙民衆的反革命宣傳來蒙蔽人民。蔣介石自己說過：他是一隻手拿着國民黨黨義，一隻手拿着槍炮去宣傳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什

麼？就是工農民衆應該做奴隸牛馬的理論。國民黨宣傳這種主義的時候，說句蔣介石自己的老實話，就是對民衆說：你們不接受二民主義，你們不安心做奴隸牛馬——你們不實行勞資合作，不犧牲階級利益而爲着中國民族（豪紳地主資本家）做苦工，那末，我們就請你們吃槍炮，吃炸彈，吃大刀，吃鞭子，總而言之，就是要你們的命。事實上的確是這個樣子，無論是中央黨部省黨部市黨部，無論是張學良是汪精衛是蔣介石戴季陶，都是這個樣子。但是，表面上，國民黨總要講幾句體面話，總還想迷惑民衆。

不過，因爲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太醜了，太無聊了，太血腥氣了，廣大的真正下層的勞動羣衆實在聽不進他們的話。他們竭力要在民衆之中破壞共產黨的信仰。然而他們說共產黨殺人放火，民衆却看見國民黨自己才是真正大殺人大放火，他們說共產黨賣國，民衆却看見國民黨自己真正是個帝國主義走狗……這怎麼樣辦呢？

好了，救兵到了——出現了一個托洛斯基陳獨秀派！托陳派冒馬克思主義者，冒充列寧主義者，出來罵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於是乎國民黨在飛機，炸彈，槍炮，大刀，監獄，法庭，三民主義的宣傳之外，又多一個武器——托陳派對於共產黨的造謠。

大家請看：最近自從蔣介石『御駕親征』以來，一切國民黨的報紙雜誌都爭先恐後的登載托洛斯基派陳獨秀派的文章，例如『光明之路』雜誌上最近（第一卷第十期）就有——一篇『托洛斯基派口中的共產黨』，這簡直是完全照抄陳獨秀劉仁靜等等的文章。

二 國民黨和托洛斯基派眼光裏的共產國際

中國勞苦羣衆革命的力量，在於他們能夠得到無產階級的領導，而中國無產階級是世界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經驗，世界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對於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是極其寶貴的，極其有力的領導。共產國際正是代表這種革命經驗和組織力量的總機關，在他的領導之下，蘇聯共產黨正在建設着社會主義，歐美一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城鄉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團結正益增長，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勞動民衆的解放運動，真正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和推翻帝國主義的革命，都圍繞着他的旗幟。

因此，做帝國主義走狗的國民黨，自然對於共產國際非常之切齒痛恨。托洛斯基派在這裏就給國民黨一個『很好』的幫助。請看：

國民黨說：共產國際在蘇聯實行的五年計劃是資本主義的建設，是要對世界各國實行經濟侵略，是要用屯併政策奪掉中國地主資本家的生意。托洛斯基派也說『斯大林派』的政策是十月革命的勝利消失，變成功富農的國家；進行着資本主義的復辟等等。國民黨說：共產國際是赤色帝國主義侵略東方民族。托洛斯基派也說蘇聯對於中東路問題的辦法是侵略中國，在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時候國民黨做着帝國主義的爪牙

，首先進攻蘇聯，企圖挑撥起各國反對蘇聯的戰爭，而托洛斯基派到處都宣傳不要幫助蘇聯！

國民黨說：共產國際曾經企圖包辦中國革命，等到『土地革命的政策行不通，煽動階級鬥爭的陰謀失敗之後，又說中國國民黨反動』（胡漢民的話）。而托洛斯基派也說：共產國際『反右傾是強迫執行盲動主義的政策，反左傾，是留作失敗後之說話餘地』（反對派告全黨同志書），——這就是『共產國際斯大林主義的領導之唯一的祕訣』。

這種謠言誣蔑，國民黨立刻利用起來，在『光明之路』上就引用這些話來說：『像這樣的國際領導機關，那裏有一點資格配領導世界革命，實質上早已宣告破產了！』（『光明之路』第七期第三頁）。

國民黨要放謠言宣佈『共產國際早已破產』，這是對於他們有利益的，他們要企圖迷惑中國民衆，使民衆不相信共產國際的領導。自稱『馬克斯列甯主義的』托陳派在這裏就老老实實是國民黨的走狗！本來，國民黨的幻想是要中國民衆根本反對共產國際，甘心做奴隸牛馬，完全不認識階級利益；然而最近幾年革命的發展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了，——民衆對於共產國際的信仰一天天的是在增高；於是國民黨退一步想，指使一班走狗來冒充『馬克斯列甯主義者』，說什麼共產國際領導錯了，說什麼『在階級利益立場上看來，中國工人正不可以相信共產國際，因為共產國際已經早已破產了』，——

這班走狗就是托洛斯基陳獨秀派。

三 托洛斯基陳獨秀派的革命消沉論和國民黨統治

托洛斯基陳獨秀的真面目，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冒充着馬克·斯·列·甯·主·義。陳獨秀派在一九二七年武漢時代自己違背共產國際的指示而實行機會主義，等到那次革命失敗，却來說什麼『共產國際斷送了中國革命』。這叫做死不要臉。當初陳獨秀派爲什麼反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呢？因爲他們認爲國民黨能夠完成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所以他們認爲共產黨用不着去領導無產階級實行聯合農民奪取政權的鬥爭，也用不着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照他們的意思，共產黨應當怎麼辦呢？他們說：應當讓汪精衛實行分共政策，至後，中國可以有資產階級式的民權自由，可以定定心心做些國會運動等等。這是要把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的尾巴——自由主義的改良主義的政黨。陳獨秀派的這種觀念一直保存着，到一九二九年，陳獨秀等就公開的出來說：『你看，從汪精衛直到張學良都是資產階級的政權了！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把資產階級的革命完成了，封建勢力已經只剩得餘孽的餘孽，國民黨政權可以穩定，統一，而且將有長足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托洛斯基派以前在蘇聯用些左傾的空談反對共產國際的政策，直到現在還自稱『左派反對派』。他們的『左』，『左』在什

麼地方呢？他們的『左』原來就在於斷定現在全世界都沒有革命運動的高漲，全世界都是反統治的日益穩定，中國更因為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已經走進了兩個革命之間的反動時期，中國國民黨統治穩定而統一，應該做的不是團結無產階級發展他們的經濟日常鬥爭，領導他們的鬥爭到爭取政權的鬥爭方面去，領導日益發展的農民戰爭，創造無產階級領導的紅軍……，而是國民會議運動。這樣，事實上是自稱『左派』的托洛斯基自然而然的暴露自己真相，和一九二七年的中國機會主義的最右派的陳獨秀走到一塊去。他們事實上始終只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一種，絲毫沒有無產階級，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氣息。他們只在夢想着世界的以及中國的統治階級快些穩定，給他們一點的當議員做社會改良『事業』的機會。

這種機會主義，客觀上不能夠不很快的走到反革命營壘之中去。現在托洛斯基陳獨秀派是已經走到了。恭喜恭喜！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從一九二九年底到現在一天天的深入，各國從德國一直到美國都在鬧着恐慌，有些地方，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南美洲已經發現許多工人巷戰，印度非洲等處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都在開展，分化，深入。這些情形是不是證明共產國際的觀察呢？稍微顧一點事實的人，不能不說這是鐵一樣的事實。

中國呢？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之後，國民黨是否統一了中國，完成了資產階級的

民權革命呢？一九二九年初開始的新的軍閥混戰——國民黨的軍閥混戰，斷斷續續一直繼續到現在，快要三年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的剝削還在日益加重，國民黨的統治是在動搖，一切種種資本家都趕緊依附投降勾結各派各系的封建軍閥，運用武力競爭的新式營經工商業的辦法，方才能夠勉強自存，而一般的中國工業就都在極深刻的危機之中，——這在沒有出路的中國農業的根本危機的背景之上，在國際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的環境之中，是自然的現象。

中國的工人和農民羣衆繼承着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偉大的革命經驗，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肅清自己隊伍裏面的機會主義份子（如陳獨秀之類），鍛鍊出新的領導，在這種客觀條件之下自然不是去做什麼國民會議運動，而是準備着自己的力量去爭得工農民權獨裁的建立——蘇維埃中國的建立。極艱苦的大城市之中的工人運動，領導農民戰爭——紅軍的產生，蘇維埃區域的擴張，都是這種準備的進行。這三年來的事實，是否是中國革命高漲的復興呢？誰都不能有什麼懷疑的，因為這是大家看得見的事實。

然而托洛斯基派陳獨秀派却說：世界沒有革命高潮，中國也沒有革命高潮！「中國的革命是消沉」了！

這種事實連國民黨都不能夠否認了。國民黨自己反對中國的工農勞動民衆，「動

匪」哪，捉殺共產黨哪，始終是越勦越多，越殺越旺。他們不能夠不深刻的感覺到自
己統治的動搖。國民黨所最怕的正是無階級羣衆和農民羣衆認識清楚這種客觀環境
，而團結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使他們自己的鬥爭很快的從自發的進到
有組織的。因此，在這沒有辦法之中想出辦法來了：這就是利用托陳派的宣傳來淆亂
工農羣衆的耳目。國民黨的反共機關報居然也說：

『本來革命高潮是要一定的時期具備一定的條件才形成的，不是隨時隨地都發
生的。但是共產黨爲要實行其不斷的盲動政策，隨時隨地都瞎吹革命高潮已經到
了，世界革命已經進入第三時期了……尤其是信口胡吹，說中國革命復興已經
成熟了』（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二頁）。

國民黨而說出這種話來，豈不是天大的笑說！不是不是，他們是照抄托陳派的文
章的，在這些句子底下便引出了一大段托陳派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謠言。本
來說起來是很可笑的：國民黨忽然說『革命高潮』了。如果國民黨自己承認是反革命
的統治，那麼，早就該請他們滾蛋；如果國民黨仍舊是叫共產黨是『反動的』，那麼，
這裏所謂『革命高潮』應當是『反動高潮』了！這裏的道理是：國民黨自己的三民主
義，訓政時期，考試制度——造產建設等等的所謂『學說理論』，實在太說不通了，羣
衆對於革命高漲的認識實在是一天天的清楚起來了，因此，國民黨就用托陳派的話來說

。這意思是講：你們看——這些「馬克斯列寧主義者」的托洛斯基陳獨秀，也說中國和世界沒有革命高潮，你們快些不要暴動罷，不要幹紅軍罷，不要鬧蘇維埃區域罷，快些來參加國民會議運動，勞資合作，提倡國貨……！這倒要算是「聰明的」辦法！這裏，托陳派又是國民黨的功臣。不過，還可以不算功臣，而算國民黨的忠實信徒，因為：國民黨說訓政時期，托陳派也說統治階級穩定，國民黨召集國民會議，托陳派也在主張做國民會議運動……真正心心相應呵！所以說托陳派是國民黨忠實信徒一點兒也沒有錯。既然是一家人，也就不便居功——他們的努力維持國民黨統治——反對紅軍，反對示威……——正是三民主義的忠實走狗應盡之義務了。

四 「盲動主義的過火」恰好是國民黨殺人放火的理由呀！

國民黨的忠實走狗——托洛斯基陳獨秀派怎麼樣替國民黨盡義務呢？他們也來反對盲動主義了。然而我們要知道：盲動主義錯誤的一個來源，正是黨內有些同志沒有完全脫離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是：中國革命，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決不能夠戰勝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一定要等待全世界大革命同時爆發。那麼，如果某一地方的工農羣衆已經發動，鬥爭已經爆發，紅軍的戰爭已經開始，那時怎麼辦呢？——照托洛斯基主義的邏輯的結論，就只有二條路：一是放棄鬥爭完全投降，

在工人罷工之中是妥協屈服，在農民戰爭之中是退守以至解散自己的隊伍，這是右傾的機會主義；二是盲目的拚命，不顧羣衆的組織準備工作，用孤注一擲的辦法，在工人運動之中就是兒戲的幾個幾十個幾百個人的暴動嘗試，在紅軍戰爭之中就是絕對不要根據地不要準備從內地衝向大城市，從各省衝向武漢上海，彷彿這樣便會立刻引起全世界大革命的同時爆發來救中國革命，這是左傾的盲動主義。這種錯誤是中國共產黨各級領導機關曾經做過的——我們公開的承認，我們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已經糾正這種錯誤！——革命的先進的階級決不隱諱自己的錯誤，他正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之中增加自己的力量整齊自己的隊伍，向着勝利的前途走去。可是，托陳派所反對的盲動主義是什麼呢？是不是這個盲動主義呢！當然不是，因為這種盲動主義部分的就是托洛斯基主義的變相。他們是不會反對自己主義的。他們所反對的盲動主義，却是他們造作出來的謠言：他們說共產黨用強迫的方法和收買的方法逼迫羣衆去示威，他們說紅軍敲竹槓強姦等等。這些完全是他們的造謠！

工人發動羣衆的示威，如何能夠強迫，如何能夠收買呢！這很明顯的——是這些托陳派當初在共產黨內反對示威運動，結果多數同志不贊成他們的意見，他們就說：贊成示威的是得了錢了。這是何等卑鄙齷齪的政客手段！

紅軍的工作人員，紅軍的兵士如何會敲竹槓強姦寺等呢？各地的豪紳資本家和國

民黨要這樣說，托洛斯基陳獨秀也這樣說！他們無非找着幾百件幾千件之中偶然的一件事實，偶然的一個個人的罪惡行爲——蘇維埃政府立刻要懲辦或者已經懲辦的行爲，就說是整個紅軍的情形。好來證明他們的理論——不要游擊戰爭，不要紅軍！這是何等明顯的反革命！

果然，國民黨把他們這些謠言引出來，立刻就下一個斷語：

『以上所說，已經把共產黨的罪惡，刻劃得淋漓盡致，真如電影一般一幕一幕的活現紙上，煞可觀也』（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五頁）。

這意思是說：請看自稱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托陳派也說共產黨和紅軍的確是姦淫擄掠收買匪徒無由取鬧的流氓，所以我們國民黨用飛機瓦斯毒炸死論千論萬的這些工農是有理得很，所以我們國民黨捉殺共產黨工人開槍轟殺示威民衆也是有理得很！大家想想，托陳派對於國民黨的功勞是多麼大呵！！

五 共產黨組織力量『薄弱』，可是，國民黨和托陳黨且慢高興！

國民黨在托陳派的贊助之下，拚命的摧殘工農運動；他們的狗運氣好的時候，破壞了些共產黨的組織，他們勉強的表示高興，引出托陳派的文章，來證明自己反革命的功績。他們說：

「總上以觀，可知共產黨組織的薄弱，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有什麼力量維持其存在！」（「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六頁）。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力量，固然並不是大得了不得，好得了不得，——共產黨自己絕對不吹這樣牛皮，共產黨天天是在切實的檢閱自己的力量，缺點，弱點，艱苦的進行羣衆之中的各種組織工作。然而共產黨的『薄弱』決沒有像托陳派所說的那樣無希望！

托陳派已經成了另外一個黨——資產階級走狗的黨，他們和國民黨一樣，認為共產黨是他們最主要的敵人，因此，他們竭力說得共產黨絲毫也沒有組織似的。他們夢想着用這種宣傳動搖羣衆對於共產黨的信仰，渙散無產階級的力量，並且企圖擴大自己的走狗黨，替資本家盡力。他們企圖用這種宣傳散布悲觀絕望的情緒，阻礙革命運動的發展。這種手段恰好對於國民黨有點用處，國民黨拿他們的話來『自欺欺人』。『自欺』是安慰安慰國民黨，說共產黨快要消滅了；『欺人』是迷惑民衆，說共產黨已經不能維持其存在了，你們也死了心罷，不要革命了，安心做奴隸牛馬好了。這裏，托陳黨的謠言又是好寶貝！

但是，你們這兩個反革命的黨，都慢些高興！受托陳派欺騙的工人份子——很少數的人，現在已經了解陳獨秀等的反革命的實質，而回到黨裏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正在日益進步的工作之下，日益密切的和羣衆聯系之下，開始新的發展。國民黨的欺

騙，即使借用那些冒充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托陳派的話，也是始終沒有多大作用的！

六 國民黨對於托陳黨已經欽賜『批評自由』了！

現在——我們看見國民黨的特別專門反共雜誌『光明之路』以及其他一切國民黨刊物上面時常很高興很得意的轉載托洛斯基陳獨秀派的大文章，——我們不能不回想起陳獨秀等最早的態度了。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以後，直到那年年底，陳獨秀說些什麼？其餘的托洛斯基派的口頭禪又是什麼？他們總是說：共產黨裏面是官僚主義的統治，沒有自由討論，沒有自由批評。他們很要求『批評』共產國際和共產黨的批評自由，他們反對所謂官僚主義。固然，共產黨內有的時候有些地方可以發生官僚主義的錯誤，可是，這正是共產國際和共產黨竭力反對的。至於托陳派所反對的是什麼呢？他們實際並不是反對什麼官僚主義，當他們能夠執行他們的機會主義的時候，例如陳獨秀當權的時候，都竭力企圖實行完全十足的官僚主義，以保障其機會主義的順利進行的。他們現在所反對的事實上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紀律！

無產階級的政黨的黨員，本來是要團結得很緊，我們的道路是艱險的困難的，我們黨員大家既然決定了走這革命的道路，自然就要有嚴格的紀律來團結我們，鍛鍊我們。我們的四周圍都是仇敵，我們時時時刻在敵人的砲火之下。我們聯合起來的時候，大

家都是極想自由的決定自己的道路的——決定要革命的，而加入黨，這就是決定要和敵人鬥爭，而不是投降敵人，不是和敵人妥協。可是，黨員之中有些人忽然跑出來說：我們大家都去投降罷（解散紅軍，拋棄蘇維埃的旗幟，參加蔣介石的國民會議，停止示威運動政治鬥爭）。黨員的大多數反對他們，說他們每個人的主張是投降是自己解除武裝。而這班人却大叫起來：啊哈！你們是官僚主義者，你們禁止自由批評！自然哪，你們要妥協要投降有你們的自由！現在國民黨已經欽賜你這種自由了。國民黨的報紙雜誌轉載你們的文章，引用你們的理論和謠言；總之，對於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隨便你們怎樣『批評』造謠，謾罵，詛咒，你們已經得到國民黨欽賜你們的極端充分的自由。你們的心願達到了，你們覺得怎麼樣呢？你們現在在國民黨御用之下，幫着他們的大砲機關槍來進攻中國的工人階級，中國農民羣衆，中國的共產黨，運用你們的筆尖，信口造謠毒罵……大概比以前在共產黨內『受着強逼』的做『違心之事』——贊助工農爲工農服務，要來得舒服得多罷，因爲現在這種地位，實際上的反革命地位，對於你們真是稱心如意，一點兒不自由也不覺得了。

七 國民黨口中的托陳派的立場。

托洛斯基陳獨秀派這樣的幫助國民黨：反對共產國際，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紅軍

——和國民黨異口同聲的說紅軍是殺人放火的流氓土匪，反對工人——和國民黨異口同聲說工人示威是受共產黨的收買，詛咒共產黨的組織力量說是『不能夠維持其存在了』，罵共產黨是官僚主義禁止人家的批評……總之，托陳派在國民黨的飛機炸彈槍炮大刀三民主義宣傳之後，替國民黨添一種反革命的工具，添一種進攻工農羣衆的武器。然而國民黨說：

『可知反對派——托陳派——和共產黨是一個東西，……是分不開的，是二而一的個東西』，（同上第一頁）。

這豈不是賞罰不明恩將仇報嗎？不然不然！如果國民黨公開的稱贊托陳派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說他們不是和共產黨『二而一的東西』，那末，這些托陳派就喪失了他們的特殊作用了。國民黨故意要說托陳派也是共產主義者，也是馬克思列甫主義者，然後才能欺騙羣衆，使羣衆相信他們的謠言。所以國民黨故意說托陳進是和共產黨『一而二的東西』，正是充分的運用這種進攻工農羣衆的特殊武器呀！

中國人權派的真面目

秋白

——中國人權派的『反對』國民黨和政府

中國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之下，現在有一個所謂『人權派』。這些自稱爲『人權運動者』的大學教授，胡適之，羅隆基等，在一九二九年寫了好些篇文章，說了好些俏皮話，搭出了『反對政府派』的架子。那位羅隆基博士並且曾經被捕過一次，——當然立刻就保釋了，——被捕而又保釋之後，做了一篇『感想』，說了一大泡憤慨的話。

最近，五月五日的國民會議開過了，所謂訓政時期的約法也頒佈了——這本是一九二九年人權派的要求：那時胡適之說過：『我們的口號是：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論理，人權派可以滿足了。中國的人權運動大功告成了！然而不然。國民黨的這種滑稽到萬分的約法，太欺騙不了人民——人權派是知道的，因此，他們又發了一次傳單表示反對那個約法。總之，他們的『反對政府派』（Opposition）的架子，還沒有拆掉。

現在中國的政治是異乎尋常的黑暗，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是異乎尋常的露骨，民衆一點兒自由也沒有，一點兒『人權』也沒有，有的只是挨打挨殺的『權利』，和餓死凍死淹死燒死……的『自由』。地主資本家自己，在國際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自然而然的，必然的分成許多種式的集團派別互相競爭和搶奪，演成軍閥混戰。工人階級，農民羣衆和一切勞動民衆，正在不斷的反和鬥爭；那不統一的散亂的中國地主資本家的階級統治，正在肢肢節節的瓦解，這裏許多脆弱的地方就已經拆了台——豪紳地

主資本家的統治推翻了，政權到了當地工農羣衆的代表會（蘇維埃）手裏。總之，目前的形勢對於整個的帝國主義和中國統治階級，實在是太沒有樂觀的根據。因此，不但民衆方面，一般的反抗情緒天天在那裏高漲，不但小資產階級的份子正在走頭無路的徘徊動搖，不滿意，就是剝削階級內部也說有很多的裂痕，互相的埋怨着，你說我是「赤禍」的罪魁，我說你是「造災」的能手。一般的景象，是個剝削階級手忙腳亂的樣子。於是「人權派」的一些敲邊鼓的議論和俏皮的文章，自然會有點兒的銷路。至於情緒是革命的一些人，讀了人權派罵政府的話，也覺得痛快，俏皮。

因此我們得問一問：「人權派爲什麼反對政府和國民黨呢？」

二 「反革命大競賽」之中人權派的新鮮旗幟

中國人權派反對國民黨和政府的原因，說起來很有趣，——是爲着國民黨不會反共，是爲着國民黨反共還不徹底，是爲着國民黨快要不能夠保障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了。中國的人權派表面上反對摧殘人權要求保障自由，實際上却并不是反對什麼國民黨，並不是反對什麼壓迫和剝削，而是反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壓迫剝削的不得法！——這是人權派的真面目。最近（『新月』雜誌第三卷第十期），羅隆基發表了一篇大文，叫做『論中國共產——爲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這篇文章就把人權派的真面目完

完全全的暴露出來了。

羅大人 (Sir Lo Longki) 不是被捕過麼？ 人權派胡適之等等不是被國民黨政府「警誡」過麼？ 他這篇文章難道是爲着要表明態度刷洗自己的「共產嫌疑」而做的？ 不是！ 不是！ 假使我們這樣說，未免太小看了羅大人們了。 這有他們人權派的政治良心——階級良心使他們做的。 他們的反對共產并不是從這篇文章開始的，他們的反對工農民衆是他們的階級立場。

中國自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之後，工農民衆的革命運動不久又開始發展，到現在蘇維埃區域的發現，擴大，紅軍的進展……共產黨影響的日益增高，在一般的經濟危機深人的背景之上，實在使整個的統治階級感覺到死亡的危機一天天的接近。 於是乎剝削階級的內部發現日益緊張的「反革命競賽」。

「反革命競賽」是什麼？ 就是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之中的每一個集團，每一個派別，每一批走狗，都爭先恐後的表示祇有他自己才是反對共產消滅「赤禍」的能手，都在力竭聲嘶拔劍張弩的聲討其他各派「勾結」「幫助」「引起」共產的罪名。 對付共產本領，早已成爲誰應當統治的最主要的考試題目。 一切種種反革命派在對付共產的問題上進行着極熱鬧的大競賽：

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却曾經聲明他們是反赤最早。

西山會議派幾乎要說他們「自始即反對國民黨之改組」，「首揭國民黨的反共旗幟」。

蔣介石戴季陶派說，沒有我們的三月二十政變和四月二十上海的屠殺，國民黨早已斷送於共產黨之手。

汪精衛張發奎派說，鎮壓廣州暴動之功應歸我有，而且現在再改組國民黨，實行「民主主義勢力」的大集中，方能根本消滅共產。

鄧演達譚平山派說，我們反對第三國際干涉中國和束縛中國革命，同時拋棄已經不是欺人的國民黨旗幟，而樹立第三個「民衆」的政黨，共產自會消滅於無形。

托洛斯基陳獨秀派實際也是說，列寧馬克斯思想的影響已在深入民衆，故必須假借「列寧馬克斯主義」之名，來反對共產國際和共產黨，然後共 才會真正消滅。

這個熱鬧的反革命大競賽裏面，每一派都開出一張藥方來，當做消滅共產的萬應靈藥。現在人權派的羅隆基大人，就把他們的藥方整理起來清清楚楚的寫了一篇文章。自然，人權派的這些藥名早就已經說過，現在不過是綜合起來罷了。因此人權派參加反革命大競賽的旗幟也就格外鮮明了。

三 人權派替地主資本家想着的「出路」

中國人權派對於地主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也和其他的剝削階級的一切派別一樣，抱着非常之悲觀的態度。他們說：經濟上……「兵事愈多，人民愈窮，人民愈窮，土匪愈起，土匪愈起，社會愈亂，社會愈亂，人民更窮……畢竟，窮亂，亂窮，……直到真正破產而止」，政治上……「已成的政府，不克維持，無形的政府，遍地林立，國家不求崩潰，亦必崩潰……稍有賢望……的人民……殺戮逃亡，幾已近盡。剩下一般市僧流氓，他們政見上朝秦暮楚，政績上行險僥倖。……地方政治愈惡化，人民愈紛擾，畢竟政治上……立刻真正亡國而止」。總之，國共相持的結果，在我們看來，亦有：（一）經濟上的破產，（二）政治上的亡國」。這都是說「假使共產黨繼續蔓延下去，既不能完全成功，又不能立刻消滅」的話。如果假定共產黨能夠成功，「成爲支配政局的勢力」，那又怎麼樣呢？據他的意思，中國工農只能夠打倒中國的資本家，而外國的資本家，可否動其毫末，是又成爲大問題」，他以爲「英美法日的共產革命未成功以前」，中國工農祇能夠在內地得到勝利，在大商埠上洋人要來共管。所以「結果，中國的內部，流氓共產；中國的商埠，洋人共管」。洋人共管，流氓共產」這是共產黨勝利後的局面，照他看來，自然這亦是破產亡國。再假定蔣介石討共勝

利，肅清了『紅匪』，那時又怎麼樣？他說：『儘管討共軍得到勝利，湘鄂贛澈底肅清，然而餘毒未盡，病根仍存，共產黨在中國，總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這樣：（一）如果共產黨的蘇維埃運動繼續蔓延，又不能成功，結果是『破產亡國』，（二）如果共產黨的蘇維埃運動『居然』成功，結果是『洋人共管，流氓共產』（三）如果共產黨的蘇維埃運動『幸而』澈底肅清，結果，這僅僅是暫時的，始終又要有『共產』發生——仍舊是老套。可憐呵可憐，中國的紳士，中國的資本家，中國的一切大人老爺，竟這樣的命苦嗎？

羅大人說：——不要緊，不要緊，我有絕絕妙的方法。這個救命方法是什麼？——就是第一，『在今日中國的狀況下，爲中國人求生路計，自然只有希望國民黨剿共及早成功』。諺所謂『兩惡相權取其輕』即此意耳。然而國民黨剿共工作的成敗，有待於他們的策略。因此，必須有第二個方法，就是：（一）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統一；（二）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黨治……這兩點做到了……共黨不剿自滅了。這裏，羅大人自己說的清楚得很，不用代他再加說明：——人權派的所謂人權，其最主要的用處是在消滅共產。人權派的立場，整個兒就是忠告國民黨說：要替帝國主義及中國地主資本家消滅共產，就必須擇取我們人權派的主張；我們人權派主張的『自由』決不是要平民羣衆自己得到什麼自由，我們人權派所主張的『自治』也決不是什麼具

正的平民羣衆的民權主義，這『自由』和『自治』都不過是豪紳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工農的更有效力的工具——比國民黨的統治來得更加有效力！這就是人權派在反革命大競賽之中的旗幟。

謝謝你，羅大人！謝謝你們，人權派！你把把『自由』和『自治』的真面目這樣顯露的標明出來，我們工農羣衆真是少吃幾碗迷魂湯，不勝感激之至！

可是，中國國民黨對於這些人權派，却不給他們以充分的發展可能。人權派這樣忠心耿耿的替國民黨上條陳，出計策，替地主資本家想出『剿滅共產黨』的辦法，而國民黨對他們，還是沒有好臉色給他們看，所以人權派要大呼小叫，痛哭流涕長嘆息的說經濟上破產，政治上亡國……這真是『孤臣孽子』的『椎心泣血』。所以大家不要聽見他們說什麼『思想壓迫，民情堵滯，走頭無路的時候，發生與爾偕亡同歸一盡之想』，就以爲人權派怎麼大胆的用革命來恐嚇國民黨。不是的，不是的。人權派是決不革命，誓死以反革命，而且是自命爲最會反革命，真正能夠消滅革命的專家呢！

四 權派贊助屠殺的『聰明』方法

總之，中國人權派的立場，根本上是和國民黨完全相同的。他們的所以反對國民黨和政府，原來是只因爲『國民黨採用共產黨的制度』。他們說：『如今國民黨的組

織，他的黨治的策略，他的由黨而產生出來的政府，那一項，不是師法共產黨，抄襲共產黨，整個的模倣共產黨？所以如果國民黨放棄這些『師法』共產黨的地方，人權派一定不但不反對他，而且要竭力擁護他。人權派的所以反對國民黨，決不是因為國民黨的政治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帝國主義走狗的政治，決不是因為國民黨的政治是壓迫和剝削工農民衆的政治，而只是因為國民黨的『採用共產黨制度』。

究竟國民黨的黨治是不是採用共產黨制度，我們以下再說。

這裏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人權派和國民黨的分別，決不是根本的政治立場上的分別，而只是他們自己所說的策略上的分別。什麼策略呢？他們自己也已經說很清清楚楚，就是『剿共工作……的策略』。

那麼，這策略上的分別，是否是國民黨主張用屠殺方法，人權派反對用屠殺方法呢？決不是的！國民黨主張用屠殺方法，人權派亦馨香而慶祝屠殺的成功——羅大人的文章裏有這麼一段：

『五十師大兵，五十萬人馬，主席出征，總長臨敵，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國民黨對剿共，總算慎重其事了』。

這幾句文章，已經是對仗工整，聲調鏗鏘，值得搖頭晃尾的高聲朗誦幾遍，以表示人權派頌揚國民黨的大殺人大放火大大摧殘蹂躪真正的自由和民治的情調。何況羅大

人還直說「只有希望國民黨剿共及早成功」！因此，我們斷定人權派絕對不反對國民黨的屠殺政策，絕對贊成國民黨的槍炮，飛機，炸彈，瓦斯等等……的一切殺人方法，認為這些不但不違背「自由」和「民治」，而且還有所不及。人權派的反對國民黨是反對他除屠殺政策之外，不會更精細的進行反革命的欺蒙人民的宣傳政策。所以人權派和國民黨的分別，所謂策略上的分別，只在於這一點。「分別」是有些「分別」，可是這個「分別」正是忠心耿耿的人權派，不辭勞怨，不避艱險的對於國民黨的直諫，這正是人權派努力幫助國民黨屠殺民衆的地方！

五 人權派所有的一些兒有限的常識

在有些問題上看來，中國人權派的確比中國國民黨要聰明些，的確比國民黨要有常識些，固然這點小聰明和小常識是有限的。比如，人權派對於共產黨的力量和在羣衆之間的影響，就有點兒小識見。

國民黨和一般肥頭胖腦的豪紳，常常說「中國無產可共」，而人權派知道這是沒有常識的蠢話。人權派知道「共產黨所主張的是根本打破私有財產制，是生產工具公有中國雖窮，私有財產制存在一天，生產工具私有制存在一天，土地私有一天……共中國就有發展的可能」！因此，人權派警告國民黨和豪紳資產階級，教他們

欺人，糊裏糊塗的說什麼『無產可共』的寬慰的話，教他們不要放心大胆而起來，更聰明些更精細些進行更澈底的反共鬥爭。

國民黨只知道造謠誣蔑說共產黨殺人放火，說什麼在蘇維埃區域已經『實行共產』，人權派可知道這也是糊塗昏蛋自己給自己當上的蠢話。人權派知道：國民黨『專制的中國，的確『有權可分』，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策略上很可利用的民衆心理，這或者就是中國共產黨可以成功的理由』！這裏，人權派了解到現在的蘇維埃運動，的確是中國統治階級的很大的危險。蘇維埃運動是工農羣衆自己起來拿到政權，這是工農民衆要解除壓迫和剝削的政治鬥爭，這是大多數『民衆心理』——政治覺悟上的領導方針。國民黨如果了解這一點，放任民衆心理的『共匪化』，懂得要爲着蘇維埃而鬥爭——爲着工人農民兵士以及城市貧民自己選出代表來組織自己的政府而鬥爭，那麼，這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最大危險。無論你用多麼怪誕的『共匪殺人放火，挖心肝，吃肚腸……』等等的笨宣傳，也嚇不退民衆的『蘇維埃化』。因此，人權派爲國民黨着想，爲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着想，提醒這一點，勸他們早些實行所謂『自由』和『民治』，挽回這種『民衆心理』的發展，還可以實際上更鞏固的保障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保障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

六 人權派用『共產嫌疑』恐嚇國民黨

人權派反對國民黨的黨治，不過是因為這個原因，不過是因為要挽回中國地主資本家統治的崩潰，不過是因要消滅工農革命。

所以人權派眼光裏的國民黨罪狀，只是：「①國民黨宣傳共產黨的主義（孫文說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②國民黨採用共產黨的制度（孫文的「以黨治國」）；③國民黨協助共產黨實際工作（黨衙門威權愈高，黨主義威權愈低，黨老爺聲望愈大，黨主義聲望愈小。天怒人怨，衆叛親離，時日曷喪，及爾偕亡，在這分際，共產黨利用人民心理，利用國民黨弱點，乘機以進了）」。

這種議論，在豪紳地主資本家看來，或者也可以算人權派在反革命大競賽之中可以博得錦標的手段。可是，在我們看來，簡直是不值一笑。中國現在有好些地主資本家看見國民黨不能夠保障他們的利益和統治，看見國民黨的反革命勢力一天天的動搖，的確會這樣抱怨國民黨。這就是人權派的階級背景。但是，在工農民衆看來，羅大人的這種議論，不過是更加暴露人權派苦心孤詣的替國民黨出計策保障國民黨主義的威權和聲望，更加暴露人權派苦心孤詣的替地主資本家出主意保障他們的統治罷了。

我們已經說過：人權派的小聰明和小常識也只有有限。這裏就已經看得出來了。孫文說民生主義又名共產主義。這正是孫文的老奸巨猾。他想偷天換日的把共產主義換成一個不痛不癢的孔孟仁政的民生主義。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和孫文的民生主義

，就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羅大人說因爲國民黨的主義有這樣的解釋，所以播下現在『共禍』的種子。這真是羅大人老爺式的見解。事實上，工農民衆只有了解一分國民黨的主義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剝削主義，他們才有一分革命。凡是現在熱烈參加革命鬥爭的人，沒有一個不是這樣。

再則，羅大人說，國民黨的『以黨治國』是學共產黨的榜樣，這尤其是天大的笑話。國民黨的『以黨治國』，冒充着模倣俄國，也是孫文蔣介石的狡猾。民衆的羨慕俄國無產階級和農民真正得到解放，這種覺悟十年以來一天天的增長，使得國民黨很早就搶着說：我們國民黨也學俄國辦法，他們想這樣欺騙民衆。其實，共產黨絕對不主張以黨治國！俄國的蘇維埃政府是各級蘇維埃選舉出來，從市區和村鎮一直到中央政府，都是工人農民！——總之，一切不剝削別人勞動的人民，真正普遍的參加選舉而選出來的。絕對沒有黨的機關指定政府的事！

至於說國民黨幫助共產黨的實際工作，那麼，這是羅大人們真正痛心疾首的事！國民黨的政治是太不巧妙了，一天天的更加激起工農的革命。可是，這是歷史的必然，沒有辦法，國民黨的腐化政治，只有蘇維埃革命能夠推翻他。

共產黨的黨員，在俄國不但沒有任何的特權，而且多負很多的義務，并且多加一重黨所給他的責任。舉一件極小的事來說：俄國一切非共產黨員，不論是政府機關或其

他社會團體的職員，可以拿到的薪水，是不受什麼限制的；黨員，就有一種「黨員的最高限度」——以前是二百五十盧布，現在是三百盧布。所以黨員無論兼職有多少，至多只有這一點收入，即「升官」也無從發財的。這爲什麼可能呢？因爲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每一個黨員都是爲着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工作，無產階級是爲着全人類的利益——創造將來的無階級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而鬥爭。而國民黨的黨員，在中國却是老爺，是大人，可以是封建諸侯，也可以是市井流氓，可以是資本家，也可以是資本家的走狗。國民黨的黨員替天行道——替帝國主義和豪紳資本家執行政權，一方面壓迫工農，別方面表演帝國主義豪紳資本家之間的互相爭奪——互相爭奪在工農身上榨出來的血汗。這些階級，中國的豪紳地主資本家，在歷史的道路上已經一天天的走近他們的死期，所以自然而然只有這些狼吞虎噬奸淫擄掠貪污卑鄙的代表——國民黨黨員。所國以民黨，爲着要保證豪紳資本家之中的某一些集團榨取工農血汗的特權，只能夠實行所謂「以黨治國」。誰借假得着國民黨機關和政府機關的名義，誰就可以多剝削一些；誰借假不着，誰就只能夠少剝削些。這是「以黨治國」的真諦。

羅大人，如果你願意知道爲什麼國民黨的「以黨治國」會發生在中國，我還可以告訴你另外一個理由。這就是你自己說的中國的「貧窮」。換句話說，就是中國豪紳資本家的「貧窮」。他們愈「窮」，就愈要互相爭奪，愈要互相爭奪，就愈要憑藉所謂

國民黨的『以黨治國』。他們沒有英美資本主義初興時代的餘裕，『可以規規矩矩』的在『自由』的市場上實行『自由貿易』的競爭，可以在國會式的『老牌民治主義』的政治舞台上實行『自由政見』的競爭。

因此，你羅大人的苦心，永世也行不通。你羅大人羅博士，很迷信英美國的憲政學說——不流血的帶着白手套的人權運動。可惜你羅博士投胎投晚了二三十年，又投錯了三四萬里。你現在在中國來用『共產嫌疑』恐嚇國民黨，要他放棄黨治，實行你的所謂『民治』，也不中用了。

七 人權派用『共產足以召共管』來嚇人

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狀況，很明顯的表示着一種趨勢，就是：如果蘇維埃運動暫時不能夠成功，那麼，中國只有日益殖民地化——亡國破產，而只有蘇維埃運動的勝利能夠救中國，只有蘇維埃運動戰勝國民黨，消滅國民黨的統治，消滅一切種種形式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獨裁，而建立工農民權的獨裁，才能夠把中國從帝國主義壓迫統治之下解放出來。蘇維埃運動，就是把全國的政權交給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從市區和村鎮起，由當地的工人農民，紅兵，其他不剝削別人勞動的人，不論男女，一概絕對平等的參加選舉，選舉出來的代表會議就是當地的政府，這些市區，村鎮，城市，省份的各級蘇維埃，再選出代表來，召集全中國蘇維埃的代表大會，就是全國最高的主權機

關，他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是中央政府。只有政權完全歸在這種蘇維埃手裏，只有這種真正工農民衆的政權實行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土地，沒收外國資本家的一切企業，實行真正保護勞動的工廠法，勞動法——八小時工作制等等，並且嚴厲處置怠工破壞生產的中國資本家，一直到沒收他們的企業……只有這樣，方才能夠把中國從經濟危機和破產之中救出來。地主資本家在中國現在也鬧『窮』，可是『窮』的只是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日益破產的一些地主資本家。他們雖然『窮』，自然還有因為他們的『窮』而大大發財的少數大地主大資本家，大軍閥，大官僚，大『黨老爺』。他們雖然『窮』，他們還是要剝削工農，而且他們愈是『窮』，他們愈加要加重剝削工農。工農對於他們不能夠比對於大地主大資本家有什麼特別優待。所以他們的地位是十分『爲難』。所以你們這班『窮』的地主資本家要想早些『脫離苦海』，只能夠等着『永生西天極樂世界』！總之，只有消滅中國的封建餘孽，消滅中國的土地私有，引導中國走上消滅資本主義的道路，才能夠解決中國的經濟危機。

羅大人懷疑着中國共產黨是不是能夠『動搖外國在華資本家的毫末』。中國的工人階級現在領導着農民戰爭，將來工人階級在城市的大暴動，他的勝利的發展必然要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什麼領事裁判權等等，必然要沒收外國資本家的企業和銀行。這是沒有疑問的。羅大人畢竟是紳士，常識有也有限，他自然很懷疑中國工

幾有這樣大的力量。他這種人根本也不相信羣衆的力量。但是我們只要舉一件歷史上的事實：漢口的英租界怎麼收回的呢？這不是什麼陳友仁的革命外交。這是武漢工人的羣衆力量，這是當時南部中國幾千萬農民革命鬥爭的力量。這還是在四不像的國民黨左派政權時期。將來蘇維埃的武漢，蘇維埃的上海，那更不必說，帝國主義的力量固然是非常之雄厚，飛機大炮比現在國民黨的軍隊自然還要強十倍百倍。但是，中國幾萬萬勞動民衆的真正動員一定可以戰勝他們。中國的革命不用等待英日法美國內無產階級先行革命；中國的革命民衆至少也可以直接在帝國主義到中國來的軍隊裏面發生革命的影響。俄國蘇維埃政府初初成立的幾年，有過十八路的戰線，抵擋過英美法日波蘭等等幾乎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國家。那時，英美法日等國的革命也沒有起來。可是，俄國蘇維埃政府始終戰勝了這些外國的反革命進攻，以及國內的白黨。爲什麼？因爲有真正羣衆的力量。何況中國最近的革命，正在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歐戰後的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已經大大的動搖的時候，各國的革命運動，——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至少可以對於帝國主義的進攻中國革命加以牽制。

羅大人當然不了解，也不願意了解這些，他還是以『共產適足以召共管』來嚇人。前清時候的保皇黨，如梁起超之流，早就用過『共和適足以召瓜分』的話嚇過人。

這些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的大人先生，企圖預防革命消滅革命的手段，也只有這一點兒。

羅大人始終沒有在梁超超的技倆之外，想出什麼多大的新鮮花樣。

八 人權派原來也用『流氓土匪』的口實反對真正的民權

再則，羅大人不但反對共產黨的『黨治』，而且以爲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才和幹部人才根本不能掌握政權。共產黨絕對反對所謂黨治，這我們已經在上文說過。至於領袖人才和幹部人才的問題，也不像羅大人所說的那麼簡便。蘇維埃的制度之下，共產黨將要是政治人才的學校，許多工人和勞動者能夠得到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和訓練，在關·爭·的·過·程·之·中·學·習·管·理·國·家·的·能·力。大人先生們自然是看輕工農，以爲他們之中不能夠有什麼領袖人才和幹部人才。可是俄國革命的經驗，以及中國蘇維埃區域現在已有一些兒小小的經驗，已經完全打破了大人先生們的成見。一九一四，一五年以前，俄國的紳士和資本家，夢裏也沒有想到現在俄國工人之中會產生這許多的人才。那時，除掉『地底下的』黨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列·甯·等·等。就是到了一九一七——一八年，還有許多白黨天天咒罵布爾什維克這些德國偵探，刑事犯，流氓，無賴……說他們的政權至多只有六星期。但是事實是怎麼樣呢？

自然，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就是羅大人的所謂人才，所謂領袖，所謂幹部，另是一種解釋。他自然只有紳士的眼光。他說：『目前共產黨所謂的幹部人才，大部份是中小學的青年男女學生……共產黨的所謂下級人員，公認的說，大部份是市井的流氓，

鄉村的土匪」。羅大人自己首先向國民黨提出警告說：「我們絕對不這樣輕視中國共產黨，認一切相信共產的人，都是殺人放火的土匪」。這是他對國民黨的忠心，教國民黨不要輕視。但是，他說了幾句之後，仍舊是「流氓土匪」的濫調。任大人先生的眼光裏面，下等人的工農兵士，究竟那一個不是流氓土匪呢？我們知道羅大人是個西洋留學的博士，博學多能，不至於抄襲人家的文章。但是，有一件湊巧得很的事實：俄國二月革命之後有一軍官說過一篇話，簡直像羅大人這種議論的俄文譯本，我現在也不必再把他「重新」譯成中國文。我們很知道羅大人不致於抄襲成文，同時，我們也很知道羅大人的階級立場使他自然而然的說出和俄國白黨軍官同樣的詞句。

總之，主張「民治」的羅大人，等到碰見真正大多數人的民權主義，勞動民衆的民權主義，鎮壓豪紳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民權主義，他就自然而然的說：這是流氓土匪的「快刀砍頭快槍殺人」。他不願意知道：現在建設着社會主義的蘇聯，現在五年計劃的成績震驚着全世界的蘇聯，當初正是他所稱謂「流氓土匪」的人才創立起來的。羅大人，請你看看蘇聯當初的「中小學生，流氓土匪」現在幹的是什麼樣的建設事業，至少要比你們這班博士教授們高明幾千萬倍呢！

九 人權派的理想原來如此！

那麼，羅大人的所謂「民治」究竟是什麼樣的民治呢？

這種『民治』是爲着劃共的利益的一——這在上文已經說過。詳細點來說明，就是：

①可以保持國民黨的皇位——羅大人說『英國的公園裏，人民可以公開講演打倒君主，直到如今，喬治第五依然是皇帝』，所以，照此推論下去，就是如果國民黨准許所謂『思想自由』，這正可以使國民黨經過二百年『依然還是皇帝』。

②可以使共產主義自行退落——羅大人說：十九世紀中葉及末年，英國的共產運動，也確有端倪！後來費賓學會這班學者們出來……創造所謂費賓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自行退落。我們覺得這種劃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聰明最敏捷的方法。

③可以取消民衆爭取政權的『口實』——羅大人說，國民黨一黨專政，所以人民要求政權，所謂『有權可分』，如果說是『民治』——取消一黨專政，就可以說，一切民衆都有政權了，不用爭取蘇維埃政權，這更加鞏固了『國民黨反共的立場』，滅消『共產黨的口實』。

④可以增加『人民』積極加入劃共的機會——羅大人說，現在『一班黨外的反共人民，熱心的束手無策，悲觀的坐以待斃』，如果說是『民治』，所謂『人民』——豪紳資本家一定還要更加積極，組織團體，大大的參加劃共。

⑤可以團結『人民』擁護國民黨的勝利——羅大人說：如今『人民不希望共產黨的成功，他們却切望國民黨的失敗』。爲什麼？因爲是黨治。如果取消黨治，『人

民」不至於切望國民黨的失敗了，就不期待國民黨以外的另外一個同是地主資本家的勢力來剷共了，而能夠團結在國民黨的周圍，切望并且幫國民黨剷共成功了！

⑤可以鞏固地主資本家的統治——羅大人說，「黨治」獨裁的結果，「自然是專政者腐化，政治日趨腐化，人民日趨叛離，這就是如今共產黨發展的機會」。如果取消黨治，把現在的地主資本家統治改良改良，就可以使他穩定而鞏固了！

請看，羅大人說得多麼清楚：每一條都是替國民黨打算，爲國民黨設想。羅大人的所謂「自由」和「民治」的目的是在保持國民黨——帝國主義走狗地主資本家的統治。

這種「民治」和自由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不過是英美式的憲政，國會制度，照羅大人的口氣，美國是一個理想的國家了：「美國是比較富足的國家，人民平均的財力，比任何國家的人民更高。共產黨在美國發展機會，比任何國家更小」。人派權的大人先生們甚至於說美國差不多每家都有汽車（見新月雜誌某期）。

這真是海外奇談了。美國「人民」平均的財力，比任何國家更高；美國人民的自由比任何國家更大？政治上美國的「平等自由」，我們只要看一看辛克萊哥爾德的小說就可以知道了：美國工人過的是何等慘酷的生活，何等的不自由，何等的不平等！這些文學家是美國人，他們知道美國社會的深切，至少比中國人權派的幾個美國留學生勝過一千倍。美國家家都有汽車的海外奇談，只好去騙小孩子！

同時，我們知道目前的世界經濟的事實：全世界經濟恐慌日益發展，而蘇聯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有長足的進步。蘇聯不但沒有一個失業工人，而且感覺到工人的缺少，而美國最近的官場報告，尙且說美國有七百萬的失業工人，加上沒有登記的失業工人，只做半工的失業工人，季候工人的失業工人，總數至少在一千萬以上！這些失業工人的生活是困苦到極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見：所謂最理想的「民治自由」國家的成績是怎樣，而蘇維埃國家的成績又是怎樣！

人權派的大人先生們，你們的「理想」不過如此！你們的理想，充其量不過是資本主義的「民治」——國會制度，帶上一層民選的假面具的資產階級獨裁，更聰明更敏捷的剝削勞動者的政治制度。你們現在的實際作用，只是幫助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忠告國民黨在屠殺之後還必須實行「民治」「自由」的欺騙。你們還嫌國民黨摧殘農民的自由，剝奪工農民眾的人權，太不澈底！你們說：「青年思想的左傾，紅色刊物的增加，學校做共產領袖的訓練所，書店做共產思想的件介，這是政府的飛機炸彈手槍快炮所不能搖動其毫末的」。言外之意，實在是不勝惋惜之至。所以要你們這所謂「反共政府派」大呼小叫鞠躬盡瘁的上這麼一大套「剿共剷共最聰明最敏捷的辦法」的條陳！人權派的真面目實在暴露得清清楚楚的了。因此實行無情的反人權派的鬥爭，應該是中國工農革命民眾在整個蘇維埃革命運動中重要任務之一。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第四卷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